目 录

序　言

郝维民

《内蒙古革命史》的编写工作整整持续了39个年头，前后经过三代学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才最终完成。我作为自始至终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有必要也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作为一项研究工作的终结。

内蒙古大学在成立的时候就把蒙古史列为研究重点。1958年6月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史研究室，由教务长史筠主持。我是8月间从历史系一年级调出来，以半工半读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9月间又成立了历史系蒙古史教研室，内蒙古革命史的研究也归并到了蒙古史教研室。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简史》手稿，还编印了自治区10年大事记和10辑《内蒙古革命史资料选辑》。由史筠多方协调和组织，并经内蒙古党委批准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史编委会。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任主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胡昭衡任副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勇夫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史筠任副主任、主编，章渍洁任副主编。12月间，组织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和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以及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和内蒙古党校的少数教学

研究人员，总计170多人参加，分头搜集资料，调查访问，分组进行编写。经过近半年时间，搜集了近千万字的各种资料，编出第一个油印书稿。不久，两校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复课，只留少部分教师继续编写，先后修改了两稿。之后，在史筠主持下，由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教研室的黄时鉴和我组成编写组，承担了全部编写工作。1960年2月和1962年3月在胡昭衡主持下，先后召开两次审稿会议，期间进行了两次修改。1962年4月11日，乌兰夫同志亲自听取了编写组的汇报，并概略地讲述了内蒙古革命早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对编写工作提出了要求。经过再度修改，于当年11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出了试版本。全书由绪论和6章正文、结束语、年表组成，民主革命时期分为4章，建国后1949年到1957年分为2章，总计19万余字。

1964年作出计划，对试版本修改后在196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正式出版发行。但是，由于提前到来的“文化大革命”，把仅印了三十多本的《内蒙古革命史》试版本打成了所谓“大毒草”，横加种种罪名，进行了无数次的批判。这不仅成为主编史筠的第一大“罪状”，而且加罪于其他编写人员，受株连者也不少。1978年11月，经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同意，将试版本重印近千册，广泛散发，一方面意欲拨乱反正，以示平反，另一方面也想听一听反映，再作修改。但是由于原班人员各有去向，而我只身孤掌难鸣，这阶段的编写工作就此暂告中止。

从1979年开始，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专题研究等工作。1980年夏天，在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潮洛蒙部长的支持下，由内蒙古大学报请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史编写组，特布信副校长兼组长，我任副组长，负责组织《内蒙古革命史》的编写工作。当时抽调了两位同志，并

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专批了3个人的编制，自治区财政厅专拨了编写经费，重新开始了编写工作。当时，一方面配合内蒙古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征集党史、革命史资料，一方面为编写工作进行前期准备。内蒙古大学为了把这项工作纳入长期的科学研究规划，1982年8月，报请内蒙古党委批准并于年底成立了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并将内蒙古近现代史的研究任务也从蒙古史研究室划归该所。1985年又给这个所冠以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的名称，与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相适应，也便于同国内外更广泛的学术联系。

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这个所对内蒙古地区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而且开始招收培养中国民族史学科内蒙古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以提高研究队伍的素质；资料建设发展迅速，在国内外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各级各类研究课题越来越多，使研究工作逐步拓展和深化，取得了一批有份量的开创性的学术成果。短短的几年功夫，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参编了国家民委主持的《蒙古族简史》，主编了《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呼和浩特革命史》等多部学术专著，编辑出版了《内蒙古近代史论丛》和《内蒙古近代史译丛》。这一切为《内蒙古革命史》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5年，由我主持，组织本所的金海、李鸿、赛航、甘旭岚等青年研究人员，正式进行《内蒙古革命史》的编写工作。首先整理资料，拟定编写大纲，进行专题研究，考订史实。1993年申报并经批准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项目；1996年9月完成书稿，10月28日由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持，经专家组鉴定验收，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认定验收合

格，于12月5日通知结项。这一阶段的编写工作也告完成。

在这一次的编写工作中，我们试图努力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从内蒙古的历史实际出发，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反映内蒙古革命历史的本来面目，准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书稿是否达到了这一要求，有待出版后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这次全书正文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个时期分为四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蒙古革命史，内列22节89目，前有绪论叙述历史背景，后加大事年表和参考图书文献资料目录，作为两个附录，总计50余万字。从总体上说，书稿内容比较广泛，资料翔实，以叙史为主，叙中兼论，史论结合，较前有很大的发展与创新。

《内蒙古革命史》的编写工作，在39年中经过上述两个阶段。作为史学研究工作来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两个不同时期写出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内蒙古革命史》，有诸多不同之点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中书稿的历史时限、章节体例、内容详略、论述方法等差异很大，明显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同时，除我之外参加编写的人员也完全不同。但是，必须看到前者为以后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而且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历史科学研究出现的新局面，广大革命前辈的忆述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者、档案部门的征研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书稿虽然最后出自我们之手，但其中凝聚着39年来为这项工作尽力的所有人的心血。当然，党和政府的关怀，特别是内蒙古大学始终如一的组织领导，是这项事业成功的保证。我觉得这番话由我来说是最适当的，我也必须有个明确的交待。

在几十年的研究、编写工作中，特别是近20年来，我们感到内蒙古近代史上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与内蒙古革命相关的问题也不少，而且必须作出正确的阐述，不容含糊，更不容回避。历史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不在于承认与否，而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只有正确地评述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才能成为后事之师。多年来，我们对于内蒙古革命史上的若干问题形成一些初步的认识，也体现在了我们的书稿之中。这里就主要问题略作说明，以便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内蒙古革命与全国革命的关系。现在看来不言而喻，内蒙古革命当然是全国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人们并不是一致认同这种看法，而是各有主张。历史不在乎你怎么看，也不在乎你主张什么，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又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并受当时复杂社会原因的影响。这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内蒙古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在绪论中对此已经作了概括。到了近代，内蒙古的社会也同全国一样，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蒙古各民族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蒙汉各族人民大众同国内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内蒙古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的不可分割性，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完全一致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内蒙古革命必然是全国革命的一部分。

内蒙古近代百余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上述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在近代前期内蒙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或是义和团运动中的反洋教斗争以及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持续不断。虽然是自发的分散的斗争，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却使它与全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表现出令人信服的一致性。从五四运动开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内蒙古革命与全国革命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革命的性质如此，革命运动发展的规律也如此。当五四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在北京爆发的时候，内蒙古地区很快有了敏锐的反映。从此，当全国革命高涨的时候，内蒙古革命便会蓬勃发展；而当全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内蒙古革命也处于低潮。到了土地革命时期，内蒙古革命也和全国革命一样，从失败中恢复、发展直至再次高涨。"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内蒙古的抗日救亡斗争迅猛发展，以察北抗战、绥远抗战为标志，成为举世瞩目的全国抗日救亡中心之一。"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蒙古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特殊的战略作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又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内蒙古自治运动为核心内容的解放斗争也发挥了特殊的战略作用，并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与全国同步取得了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一历史进程无可辩驳地说明，内蒙古革命是全国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随着全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全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内蒙古革命的成功。这是历史的结论。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内蒙古革命。这是内蒙古革命与全国革命关系中最关键的一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发现、认识和把握了上述内蒙古革命与全国革命的关系，才正确地领导内蒙古革命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内蒙古革命唯一正确的领导者。，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工

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而且一直没有间断，直至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内蒙古革命之所以能从自发的分散的斗争转变为有组织、有纲领、自觉统一的革命运动，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首先是提出了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方针和政策，而且在实践中逐步充实完善，指导内蒙古革命不断前进，并为内蒙古各族人民所认识和接受，变成革命的行动。从中共二大制定的民族问题纲领到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从中共《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的制定直到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决定，形成了完整的领导内蒙古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保证了内蒙古革命的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从培养干部，特别是从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入手，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在北京培养了蒙古民族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紧接着在内蒙古建立了第一批党的组织，肩负起了领导内蒙古革命的任务。从此，内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从组织上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在内蒙古发动了一场空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之后，革命虽然暂时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离开内蒙古人民，没有放弃对内蒙古革命的领导。相反，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革命才得以恢复、发展，再次走向高涨；党的组织不断发展，革命队伍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汉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逐渐成为内蒙古革命的中心和主体。在抗日战争中是如此，在解放战争中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从局部的分散的组织，逐步发展成为整体统一的党的领导机

构，直至确立对内蒙古革命完全的领导地位。这是内蒙古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团结内蒙古地区各种革命力量，逐步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包括蒙汉各族各界各阶层、各革命政党、各革命团体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内蒙古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源泉。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与中国国民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并领导组建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会农会牧民协会等工农牧革命群众团体，发动了内蒙古空前规模的大革命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建立反帝大同盟、农民抗日会、牧民抗日会、蒙汉抗日救国会和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武装，以及与绥远国民党当局形成联合抗日等，极大地调动了内蒙古各族各界各阶层的抗日力量，保证了内蒙古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最后胜利；在解放战争中，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具有更强的号召力，卓有成效地把内蒙古蒙汉各民族各阶层团结起来，发动自治运动，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夺取了内蒙古革命的胜利。

在内蒙古建立革命武装，特别是蒙古民族革命武装，是发展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夺取内蒙古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又一条成功的经验。清末以来，蒙古民族的武装斗争屡见不鲜，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也时有发生。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民族民主解放武装力量。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开展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进行了武装斗争的可贵尝试；在土地革命时期，也曾多方开展军运工作，试图建立革命武装，特别是对“蒙政会”保安队工作的开展，对蒙旗保安总队——蒙旗独立旅的组建；抗日时期该旅改称新编陆军第三师后，

在伊克昭盟抗战，八路军在大青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建绥蒙地方革命武装部队；解放战争中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部队以及绥蒙军区部队的建设与发展，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中坚持不懈地领导完成的。内蒙古革命武装是内蒙古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发展和胜利的中坚力量。

上述基本事实即充分说明，内蒙古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而胜利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内蒙古革命的胜利。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革命中的实践。内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关注的问题。毛泽东早在讨论建党问题的时候就发表了帮助蒙古等少数民族实现自治自决的重要主张；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制定了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这是破天荒地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提出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对蒙古民族问题也发表了重要的议论，反映了当时党的主要创始人对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视。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在其纲领、章程和决议中都列入了民族问题的内容。只要提到民族问题的时候，蒙古民族问题总是被列到位首，而且专门作出蒙古问题的决议，发出了一系列对内蒙古工作的指示、决定，对于内蒙古民族问题和革命斗争进行了步步深入的分析研究。1931 年，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并把党的民族政策列入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在 1934 年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阐述了苏维埃的民族政策，从理论

上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十分深刻的论述。1935年毛泽东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专门阐述了内蒙古民族问题和党对内蒙古革命的方针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内蒙古的实际，系统阐述内蒙古民族问题，指导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从建党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对于认识国内民族问题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可以说在内蒙古经历了这一探索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和侵略、奴役的问题；承认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使他们摆脱贫困；承认民族自决权，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行联邦制，或成立独立的国家，均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等几点基本认识并初步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彻底否定了中国历来的、特别是民国以来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这对于发动蒙古等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各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灭亡的危机，内蒙古即将全面沦陷。中国共产党及时指出蒙汉联合抗日是内蒙古工作的中心；1938年10月，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徭、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民族工作总方针，首先允许蒙古等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

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内各民族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总任务以及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提出各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针的重大转变。这是适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转变，是适应形势要求的正确选择。否则，中国将面临灭亡，蒙古民族以及中国各民族也将灭亡。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又在《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制定了蒙古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具体政策。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政策，对蒙古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提纲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在理论上趋于成熟，在政策上逐步完善，而且在一些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试验和实践，取得了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治运动，进行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伟大实践。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广泛地团结了蒙古民族各阶层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战胜了反动的民族运动，争取了各种民族解放的力量，开展了自卫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进攻，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奠定了实现全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开辟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道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共同纲领》规定民

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实践，终于找到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在建国前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无疑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

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大体上经历了探索、形成和实践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认识上有不同程度的深化，根据当时的认识和形势，提出过相应的民族政纲和方针政策，进行过多种实践。这如同认识中国革命一样，也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对历史发展规律认识与掌握的过程。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而且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样。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曾经主张过联邦制，也提倡过民族自决，但都没有行得通。不能以此来否认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最终最佳的选择，更不允许以此来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同样，在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历史的时候，不能因为经过实践最终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内蒙古民族问题而回避探索过程中曾提出过其它主张，更不能说我们从来只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何况也不能说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主张都是错的，这些主张的提出也有它适合当时实际的合理性。对此我们只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与阐述。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月，中共中央要求根据《共同纲领》中的规定申述党的民族政策；中央认为关于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过去在内战时期，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统治，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今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国家统一的

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因此，我们认为承认历史，正视现实，科学地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否则就无法研究历史，更无法阐述历史发展的进程。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四、关于内蒙古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内蒙古民族问题是内蒙古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无疑是很长久的。仅就近代而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清王朝、特别是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以及蒙古民族的部分王公上层与国内外统治者侵略者相勾结，压迫本民族的人民，是近代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要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只有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下分析每个时期民族问题方方面面的内容，才能正确地阐明内蒙古革命史上与民族问题相关的诸多问题。

在全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前期，蒙古民族面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侵吞他们的聚居区域，以设立行省消灭内蒙古的历史地域；同时对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蹂躏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掠夺，文化上的愚弄摧残，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其“满蒙政策”，加紧侵略内蒙古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对蒙古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政策，民族危机更趋严重。“七七”事变后，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则在内蒙古以反对伪蒙疆为名实行所谓“抗日灭蒙”的方针，对蒙古民族压迫屠杀，无所不用其极，使蒙古民族濒临灭亡的境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疯狂抢占内蒙古解放区，企图在这里建立反共基地，把破坏内蒙古自治与反共放在同等地位，于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便

成为蒙古民族的头号大敌。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不管形势怎样变化，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始终是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要消灭的对象。这就是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内蒙古民族问题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各种类型的民族运动。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运动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简单武断地下结论。一般的说，产生民族运动往往与民族问题相关。民族运动总体上有逆历史潮流，违民族意愿，损害民族利益的反动的民族分裂运动；有顺历史趋势，受民族欢迎，符合民族利益的进步的民族运动；还有为民族的彻底解放有组织有纲领的民族运动。这三种类型的民族运动，在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而且有不同的结局和各自的归宿。在大革命时期，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发动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是以蒙古族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它是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指导、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在国民党执政之后，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内蒙古设省为主要内容，由蒙古族部分王公上层和政界人士为主发动的民族运动，给背叛孙中山的民族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以不小的冲击。中国共产党支持蒙古民族的反设省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少数蒙古族上层认贼作父，依靠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场“独立”“自治”活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内蒙古东部地区充当了马前卒。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动的民族分裂运动。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这次民族运动的反动本质。之后，以德王为首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部分王公上层发动了所谓高度自治运动，也给国民党以设省为主要内容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又一次冲

击。这次运动虽然是由王公上层发动的，但应该说它或多或少反映了蒙古族各阶层反对设省的呼声，得到了一部分蒙古族青年和政界人士的响应。结果，国民党以成立欺骗性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平息了这次具有合理要求的民族运动。在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排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野心勃勃的德王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次反动的民族分裂运动。这就是伪蒙疆自治的出现，它持续了近10年，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揭露伪蒙疆自治，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同时，一直争取、团结伪蒙疆政权中的蒙古王公上层抗日，包括争取“德王回头抗日”。抗战胜利后，蒙古民族运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短暂期间，除极少数日伪残余势力外，绝大多数蒙古王公、上层人士和部分民族革命者、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的口号下暂时结合在一起，掀起了以“内外蒙合并”、“独立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运动，对于绝大部分人特别是民族革命者和青年来说，这实际上是在日本投降后的混乱情况下，寻求民族解放的一种探索。在“内外蒙合并”的要求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有力影响和耐心细致的工作，蒙古族各阶层很快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各种民族运动也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之中，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直至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蒙古族上层和政界人士也曾强烈地向国民党要求自治，结果乞求自治的梦想再一次破灭了。德王等少数王公上层、官僚政客以及部分政界人士，在国民党的统治行将覆灭的前夕，还急急忙忙地搞了一次短命的西蒙古自治。然而，德王等最后发动的这次反动的民族

运动很快便被民族解放的大潮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蒙古民族运动只有进行客观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才能正确地识别民族运动的性质及其作用，也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任何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不作科学的分析，简单地形而上学地作出这样那样的判断，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五、关于对蒙古王公上层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这是内蒙古革命史上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蒙古王公上层是蒙古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是蒙古族人民的压迫者剥削者，是蒙古族民主革命的对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清末特别是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蒙古王公上层的特殊待遇逐渐削弱，尤其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蒙古王公上层的权益；帝国主义又利用民族问题，竭力拉拢蒙古王公上层，蓄谋分裂中国。因此，在少数蒙古王公上层中产生了分离倾向，企图依靠外国侵略者保全其封建特权统治；也有部分蒙古王公为对抗民族压迫而发动民族运动；然而大部分王公上层慑于军阀、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压力而处于观望状态。因此，蒙古王公上层既是蒙古族人民的统治者，又是受民族压迫的蒙古民族的统治者。除了甘心附逆者之外，蒙古王公上层也受民族压迫之苦。在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中对蒙古王公上层，在不同时期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有利于民族解放的政策和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中也不例外。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是反对军阀、王公和帝国主义，提出废除王公札萨克制度，废除王公贵族的封建特权。这对于发动蒙古民族特别是蒙古族的被压迫人民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土地革

命时期，正当国民党将热、察、绥三特别区改设行省，蒙古王公上层的特权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参与了蒙古民族的反改省运动，甚至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对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后，东蒙少数王公上层被迫或因受骗而依附日本侵略者，西蒙的部分王公也因受其煽惑而有所动摇。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形势的变化和对蒙古王公上层的进一步分析，及时调整了对蒙古王公上层的政策和策略，提出只要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不管蒙古民族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都给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实行联合蒙古王公抗日反蒋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又进一步提出联合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蒙古民族各阶层共同抗日，甚至提出争取伪蒙疆头目德王回头抗日，反对伪蒙疆政权，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在解放战争中，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旗帜，联合包括王公上层在内的蒙古族各阶层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实现了蒙古民族的解放。在民主改革中对王公实行了特殊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民主革命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重要经验之一。

六、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对蒙古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从清末满汉官僚联合统治中国的格局形成以后便开始滋生。民国时期越演越烈，表现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对蒙政策的方方面面。从袁世凯政府在内蒙古设立三特别区、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国民政府改三特别区为三行省，到蒋介石宣布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其实质就是消灭蒙古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大汉族主义是表现在民族关系上的反

动思想，即国民党思想。在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压迫的政策是民族分裂的政策。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推行，外国侵略者的乘机煽动策划，是蒙古民族中产生地方民族主义，甚至发展成为民族分裂主义的重要因素。至于蒙古民族中的少数王公上层反动势力，他们既是国民党压迫蒙古民族的帮凶，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走卒。上面所说的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民族分裂主义。对于任何民族分裂主义必须予以揭露批判，坚决反对。因为它既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也有害于民族利益。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始终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可能有民族平等，也不会有民族解放斗争，更无法动员蒙古民族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对于民族压迫时代的地方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采取分析的态度和正确的政策，耐心诚恳地教育、争取、团结，使其走上民族解放的轨道；即使滑入民族分裂的漩涡，在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的同时，也要极力争取其回头，使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由于对这两种民族主义采取了正确而稳妥的政策，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制度，争取团结了除德王等极少数民族反动势力以外的大部分蒙古王公上层、政界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实现了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

七、关于内蒙古革命中的民族关系。在近代民族压迫的时代，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由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便产生了民族隔阂、民族纠纷，甚至发生了民族矛盾，形成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特别是由于外国侵略者、国内统治者和各民族内部的反动势力的煽动、挑拨，酿成了

更加严重的民族隔阂、纠纷和矛盾。所以，笼而统之地把民族压迫时代的民族关系，片面地歌颂为民族团结，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的。没有民族之间的平等，就不会有民族之间的真正和谐，当然更谈不上民族团结。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把总体上是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至于各族人民之间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特别是由于共同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压迫剥削形成的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则象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越来越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形成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民族关系深层次中的主流。不承认民族压迫造成民族不平等的恶果及其严重性，就不可能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也无法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看不到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共同的命运，同样也不会发现团结各族人民共求解放的深厚基础和可能性。只有各民族的主体——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代表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关系的基本观点。

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始者，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揭示了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实质，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同时阐明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共同命运；以共同对敌、共求解放的主张，逐步把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无论是最初发动大革命的时候，还是在革命低潮的年代；无论是抗日烽火席卷草原的岁月，还是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中，只有蒙汉各族人民才是内蒙古革命的真正动力。这种动力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下，才能真正形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联合，才能成为无往而不胜的力量。这是内蒙古革命斗争中民族关系的主流与本质。在这之前，没有民族平等的总体上的民族团结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只有在各民族获得解放之后才能完全

实现。

八、关于内蒙古革命中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实际上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谈到了不少。不懂得事物的特殊性，就不会了解事物的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常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应用和发展这一原理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上反映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是十分突出的。反映在政治上的内蒙古民族问题、民族运动、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反映在经济上的土地关系、农牧业经济、生产特点；反映军事上的蒙旗地方武装、民族革命武装；反映在文化上的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教育卫生等都有鲜明的特点。至于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则更具特色。在整个内蒙古革命过程中，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无处不存在，无事不涉及。由这些特殊内容构成的内蒙古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汇聚成了与全国革命的一致性。不了解这种特殊性，根据这种特殊性确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内蒙古革命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首次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了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据此制定了民族问题纲领；李大钊在论述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时，首先分析了蒙古社会的特点；中共中央的《蒙古问题议决案》对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以后的各个革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从毛泽东同志到党的许多领导人，凡论及内蒙古革命就要强调这里的特殊性，而且越来越深入，直至把它作为制定内蒙古革命方针政策的根据。乌兰夫同志把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对内蒙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原则，

创造性地应用到内蒙古革命的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的特殊问题。他说："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内蒙古实际之'的'，要创造性地工作，要踏出一条符合内蒙古实际的路子。这是我在内蒙古多年工作的真实体会，从多次成功和挫折中深切认识了的一条真理。"不管什么时候，不从实际出发，不懂得事物的特殊性，是没有不碰壁的。

九、关于对内蒙古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也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问题。内蒙古近代史，尤其是内蒙古革命史，如上所述的若干问题，与内蒙古古代历史，与国内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不甚相同，有它自身明显的特点，而且往往与内蒙古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相关。处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人物自然也有着与时代相应的特殊性。这是评价内蒙古近代历史人物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一点。

内蒙古近代历史是内蒙古乃至全中国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历史，它发展曲折，事件的头绪纷繁，而且与国内外政治密切相连，各种历史人物也在这起伏曲折、变化多端的历史进程中有各自的经历。对他们应当放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和评述。既要看总的历史背景，又要看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还要分析其在历史总趋势下的位置和作用，也不能不考虑其对以后历史发展的影响。

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既有革命队伍中的革命者，也涉及到蒙古族及其他民族的上层人物和实力人士，还得论及从上到下的政界人物。总之，类型繁多，层次不等，经历不同，归宿各异。革命者的经历有先有后、有长有短，贡献和作用有大有小，地位也有高有低，要根据历史的实际作出客观的评述。只要为革命做过贡献，不管贡献大小都应有他们该有的地位；即使做过错事，甚至

消沉落伍，也不能否认其历史上有过的作用；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面，为了说明历史的真实过程也要功罪分明，要体现历史的真实性。

其实对任何历史人物都应当是实事求是地评述，要以他们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对历史所作的贡献的大小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当然，《内蒙古革命史》不是人物传记，不可能提到所有革命者的名字，也不可能对书中提到的人物作出全面的评价，而是在该提到的时候才提到；该作什么样的评价就作什么样的评价。

以上是我们对于内蒙古革命史研究和编写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在这里特意提出来，意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以便共同研究，加深认识。我想这对促进内蒙古近现代史的研究，或多或少会有些作用，即使是其中一些看法未必科学，也企盼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997年5月18日

绪　论

《内蒙古革命史》这本书是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今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的蒙汉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历史。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部，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8个省、自治区毗邻，北部和东北部分别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有4200多公里的国境线，东西相距2500多公里，南北直距1700多公里，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人口2145.6万人，其中蒙古族377.5万人，占全国480.6万蒙古族人口的78.5%，是蒙古族人口最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另外还有78万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朝鲜等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下辖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阿拉善等8个盟和呼和浩特、包头、赤峰、乌海等4个地级市。盟市下辖52个旗、17个县、15个县级市和16个市辖区。内蒙古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发展曲折。在我们叙述正文之前，总觉得有必要对这里的历史沿革做一点追溯介绍。这或许对理解内蒙古革命史上的一些问题有所帮助。

一、源远流长的历史

内蒙古这个名称，来源于清代的“内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系指清朝编制的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6盟及其属下的49个旗。从行政建制和地域范围来说，内札萨克蒙古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内蒙古是不大相同的。由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建制的变化，内札萨克蒙古49旗中的有些旗早已隶属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有一部分旗或旗地已设州县，而且有的已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之内。今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清代的一些蒙古部、旗和地区，当时也不属于内札萨克蒙古，如阿拉善厄鲁特旗、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布特哈地区、呼伦贝尔地区、察哈尔八旗和官牧厂、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和札萨克喇嘛旗等。因此，中国北疆的蒙古地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说，把蒙古高原以大漠为界的南半部称之为内蒙古或内蒙古高原似乎更为贴切；从今天的行政建制而论，内蒙古当然应该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简称。无论是内蒙古高原，还是内蒙古自治区，就地域范围而言，大体上是相当的。我们在回顾这一地域的悠久的历史时，一律称之为内蒙古、或内蒙古地区、或内蒙古高原。

内蒙古高原从很早的古代起就有人类的活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南端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河套人”及其“河套文化”，今呼和浩特市郊区的“大窑文化”遗址，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见证；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到鄂尔多斯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100多处文化遗址，更是人类频繁活动的纪录；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夏家店遗址和西部地区的朱开沟遗址，是典型的青铜

文化。内蒙古出土的大量人类文化遗址和文物，既有夏商文化的特征，又具有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反映出了中原华夏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吸收的趋势。

在先秦时期，内蒙古高原上分布着猃狁、东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游牧民族。他们与商周王朝以及燕、赵等诸侯国之间既有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有相互争战的时候。其中匈奴壮大之后，称雄北方，而且在内蒙古高原上建立了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匈奴国。匈奴对邻国燕、赵、秦形成威胁，迫使这三国修筑长城，以防匈奴南犯。同时，燕、赵、秦也不时向北方扩张，，在内蒙古地区设郡管辖，而且大批华夏族人从中原迁往内蒙古地区，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以不同的形式在交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日趋频繁。

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大军北伐匈奴，扩大疆域、修缮长城，设置郡县，并迫使匈奴退据秦长城以北。秦灭亡以后，匈奴向东击败东胡，控制了呼伦贝尔地区和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向西击走月氏人，占据了河西走廊和今阿拉善地区；向南兼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等部；向北降服了丁零等族。内蒙古高原几乎全部为匈奴游牧军事政权所据。

西汉初期，汉、匈之间时战时和，到汉武帝时便对匈奴屡次发动战争，迫使匈奴退据漠北，汉廷在内蒙古地区设置大批郡县，进行管辖。而驻牧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东胡则分为乌桓和鲜卑。在东汉时期，内蒙古地区既有郡县辖地的汉人，也有匈奴人和乌桓、鲜卑人。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在东汉末年北匈奴西迁，而南匈奴和乌桓则南下入塞，归附汉廷。鲜卑却乘机扩大势力，南抄汉边，北拒丁零，西击乌孙，东败夫余，基本上控制了匈奴故地大漠南北，建立了又一个北方游牧军事政权。到东汉

灵帝光和年间，鲜卑政权瓦解了。

当东汉王朝分裂，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后，曹魏政权控制了北方部分地区。公元 265 年，晋朝（即西晋）取代曹魏政权。之后，由于宗室内讧而发生“八王之乱”，并导致北方民族纷纷起兵混战，在北疆和中原部分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形成所谓“五胡十六国”。公元 316 年西晋灭亡，次年又建东晋。东晋之后便是宋、齐、梁、陈诸朝，史称南朝。公元 386 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534 年北魏又分裂为东、西魏。公元 550 年和 557 年由北齐、北周分别取代东、西魏。577 年北周又灭北齐而短暂地统一了北方。魏、齐、周史称北朝。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蒙古地区先后出现了契丹、库莫奚、乌洛候、室韦、柔然、敕勒和突厥等民族。他们与魏、晋、南北朝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曹操远征三郡乌桓，迫其降服；又以怀柔手段安抚了鲜卑三大集团，从而控制了北方。北魏王朝建立后，逐步控制了北方的统治权。在公元 4 世纪末和 5 世纪初，兴起于漠北的柔然族于 402 年建立了柔然国，与北魏相对峙，双方争战不休。北魏迁都洛阳后，减少了对柔然的进攻，而通使和联姻多了起来。公元 552 年，曾附属柔然的突厥族强大起来，并灭柔然国，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突厥汗国，其控制的范围南抵阴山，北达贝加尔湖，东到辽海、西迄里海。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混乱时期，北方民族建立的游牧军事政权或国家基本上控制着北方及大漠南北地区，开拓和推进了北方历史的发展。

公元 581 年，杨坚灭北周而称帝，建隋朝，遂灭陈而统一中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 300 多年的割据局面，并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恢复了许多郡县，对其行使管辖。583 年，突厥以阿尔

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迁于漠南，归附隋朝，漠北突厥部众也纷纷南下归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仍为突厥人所据。东突厥到始毕可汗时，势力日强，遂脱离隋朝而控制了大漠南北。

公元 618 年，短命的随朝被唐朝取代。唐初，东突厥与唐朝南北对峙，并不时南犯唐境。628 年，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契丹、奚等族起而反抗突厥的统治，归附唐朝。第三年唐以六路大军击败东突厥，突厥部众近 10 万人归附唐朝。之后，薛延陀所属漠北铁勒、回纥等 10 余部也相继归唐。至此，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统一于唐朝。以后虽有后突厥政权和回纥政权出现，也有一些部族首领率众反唐，但是，最后或被唐征服，或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直至唐终，北方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势。

唐朝对漠南地区的汉人，是以道、州、县体制进行管辖，对于北方各族则以建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等特殊的行政建制行使统治。在相当于今内蒙古的地域设置的许多都督府和羁縻州，总称为羁縻府州，分别由相关的安东、东夷、燕然、瀚海、单于和安北等都护府节制管辖。整个内蒙古地区几乎全部纳入了唐朝的统治之下。这是以前历朝所没有的。而且唐朝对被征服或归附的北方民族，采取了与内地汉族相区别的特殊政策。这也是它统一北方，长期相安的重要因素。

公元 10 世纪初，世居今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契丹族强盛起来，于 916 年创立大契丹国，史称辽朝。经过不断的兼并战争，相继征服了大漠南北的许多民族，占据了东至于海，西到金山（阿尔泰山），北达克鲁伦河的广大地域。今内蒙古除了伊盟和巴盟以西大部分地区外，均在辽朝的版图之内。到 10 世纪中叶，辽朝的南疆推进到今河北、山西两省的中部。辽上京、中京均在内蒙古东部；今内蒙古分属于辽上京、中京、西京三道，边疆部族归

统军司和招讨司统辖。辽王朝与五代和北宋形成的北南对峙局面，长达200余年。

公元1038年，党项建国大夏，史称西夏。其疆域包括今内蒙古的伊盟、巴盟和阿拉善盟及今陕北、宁夏、甘肃等广大地区，与辽、金王朝和北宋、南宋并存了180余年。西夏在所属地域设置州、县和监军司，行使管辖。

公元1115年，女真完颜部在今黑龙江地区建立金国，逐步控制了东至日本海，西与夏为邻，南以淮河、秦岭与南宋为界，西北掩及大漠南北的大部分地区。今内蒙古地区分属于其北京路、临潢府路和西京路。专设东路、西北路、西南路三处招讨司管理北疆各族。金朝统治内蒙古地区达110余年。

公元7世纪以后，蒙古族的先民"蒙兀室韦"即世居今额尔古纳河流域。9世纪以后，蒙兀室韦及其居地的其他部族逐渐西迁于漠北斡难，怯绿连、土兀剌三河上源。1189年，铁木真被推举为汗，建立乞颜联盟。铁木真经过十多年的争战，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于1206年在斡难河即汗位，号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了蒙古汗国。成吉思汗自即汗位便屡征西夏，1227年西夏主献城出降，西夏亡。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1227年成吉思汗在军中病逝。其子窝阔台即汗位，1234年灭金，大漠南北遂统一于蒙古汗国之下。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不久迁都燕京，改名大都，以开平为上都，1271年蒙古改国号大元。1279年，元军灭南宋，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又一次实现了空前的全国大统一。元朝时期，中国疆域的规模，"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也就是北到西伯利亚，西抵今新疆地区，南至南海，东达鄂霍次克海，都属于元朝的版图。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今内蒙古境内

的元上都、中都所在的上都路和兴和路，大同路和汪古部领地内的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弘吉剌部领地内的应昌路和全宁路，都属中书省管辖，称为“腹里”。大宁路、宁昌路和泰宁路属辽阳行省；河套和套西的兀剌海路、亦集乃路则属甘肃行省；今伊克昭盟境内的察罕脑儿宣慰司属陕西行省。漠北是蒙古汗国自成吉思汗到蒙哥四朝的政治中心。元朝为控制漠北，一面派重兵驻防，征讨西北诸王叛乱，一面设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漠北的军民政务。后设和林等处中书行省，不久改称岭北等处行中书省，以管辖漠北诸王及各万户、千户。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不仅统一了大漠南北诸部，而且使这里成为蒙古民族最大而稳定的聚居区域，蒙古高原也由此而得其名，元朝统一了全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全国性中央王朝。应当说，蒙古民族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为开拓中国的北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368 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8 月，明军攻陷大都，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据大漠南北，以北元政权与明相抗。明朝虽屡以大军征讨蒙古，但终未占据蒙古全境，亦未降服所有蒙古各部，蒙古部落不时南下攻明，明蒙争战不休。直到 15 世纪中叶明建九边重镇和边墙，以边墙为界，形成明蒙南北对峙。由于蒙古各部在大漠南北纷争，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蒙古政权，基本上分为东部蒙古（即鞑靼）、西部蒙古（即瓦剌）和兀良哈三卫等三大部分。16 世纪初，达延汗统一了大漠南北蒙古各部，分为左右两翼 6 万户及科尔沁、兀良哈三卫等蒙古诸部。内蒙古地区的这种局面保持到明终。

公元 1616 年，东北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史称后金。他以联姻与蒙古科尔沁部结盟修好。其子皇太极即位

后，同样以联姻的办法相继使蒙古的扎鲁特、巴林、敖汉、奈曼等部以及索伦、达呼尔诸部归附后金。1632年，皇太极亲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归化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以及察哈尔部也归附后金。1636年，内蒙古16部49个封建主聚会于盛京，尊皇太极为“博克多彻辰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接着，克什克腾、乌珠穆沁、阿巴嘎、阿巴哈纳尔、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相继归附清朝。至此，漠南蒙古基本上成为清朝的属下。同时，喀尔喀蒙古三汗也向清朝献上表贡，以示修好。

清朝对率部归附的蒙古封建主给予宽待和安置，仿照满州八旗制将蒙古各部编制为旗，择任封建贵族为旗札萨克执掌旗政。陆续将漠南蒙古的24个部分编为49个札萨克旗，并分别在6处会盟，参加同一处会盟之各旗组为盟，以固定的会盟地名为盟的名称，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6盟的名称即由此而来。这就是所谓6盟24部49旗“内札萨克蒙古”之来历。此外在西套蒙古、归化城土默特部、察哈尔部以及呼伦贝尔、布特哈等地区，也编制了不属于“内札萨克蒙古”的札萨克旗，总管旗等，行使管辖治理。

当漠南蒙古的大部分蒙古部相继归附清朝之后，清朝便以此为基地，南伐明朝，北征漠北喀尔喀蒙古，西讨漠西厄鲁特蒙古。1644年明朝灭亡，漠北、漠西蒙古也相继归附清朝，清朝统一了全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再次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而且奠定了现今中国版图的基础。蒙古民族在大漠南北和漠西形成了三个最大而且稳定的聚居区域，蒙古高原和以大漠为界的内、外蒙古的称谓也为世人所公认。直到1911年，内蒙古地区在清王朝的有效管辖下度过了270余年。内蒙古的盟旗行政制度就是在清朝形成的。

中国从秦汉王朝到清王朝的两千多年期间，除了由汉族建立的唐朝和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等三个中央王朝，在内蒙古地区行使全面的行政管辖达700余年（其中元、清两朝450余年）外，秦、汉、魏、晋、隋、五代、宋、明等中原王朝在内蒙古地区只有局部的管辖，或与北方民族政权交叉管辖。这期间，北方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和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王朝，对内蒙古地区的全部或局部控制和管辖达上千年；由北方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以及由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分别建立行政设施，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也达300余年。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地区既有北方民族政权全面开拓治理的时候，也有汉族中央王朝全面管辖治理的时候；既有北方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全面管辖治理的时候，也有中原汉族王期和北方民族政权、王朝分别或交叉管辖治理的时候。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有战有和，有分有合。在和与合的时期，北方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战与分的时期，也没有中断联系，战也是另一种联系的形式，即使在分的时候他们也在继续开发各自所在地区的历史。这些战争是封建割据的产物，而割据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中原地区的封建割据战争数不胜数，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割据战争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有推进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积极意义，不管是由那一方发动的和那一方的胜败。战与和，分与合是辩证的统一，是受历史发展趋势制约的。历史上和平友好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小统一走向大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且是漫长、曲折的。内蒙古地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北方民族政权管辖治理的时候，还是中央王朝统一管辖治理的时候，或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交叉或交替管辖治理的时候；不管是纷争割据的时候，还是和平统一的时候，这里始终是中国疆土的一部分，这里的民族政权是中国的地域性的政权，这里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汉族是中国各民族中的主体，在创造中国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国少数民族，包括自古以来的北方各民族，在开发他们占有的中国60%的疆土的历史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作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各民族自己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少数民族在创造中国历史中的伟大作用是切不可埋没的。

“总之，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①]

二、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从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蒙古地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变化的进程有所不同，变化的方式和内容也略有差异，但是，内蒙古的社会同样变成了半殖民地半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六大以来》（上），第73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封建社会。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时候，沙皇俄国也对我国蒙古地区虎视眈眈。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和鸦片从海上打开中国的南大门，资本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拥入中国的时候，沙皇俄国也以武力相威胁，并施展极其狡猾的外交手段，从陆上打开了中国的北大门。于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南北呼应，相互配合，全面向中国发动了扩张侵略。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地化，是伴随着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侵略特权，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当然，英、法、美、日等对蒙古地区的侵略，也对内蒙古地区的半殖民化起了推进作用。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蒙古地区以及与蒙古地区相关的大片中国领土。中俄《爱珲条约》（1858 年）、《北京条约》（1860 年）、《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 年）、《伊犁条约》（1881 年）、《中俄密约》（1896 年）以及与这些条约相关的许多章程、合同、界约等，使沙俄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侵占了我国西北边疆巴尔喀什湖以东 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其中包括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唐努乌梁海 10 佐领、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阿拉坦淖尔乌梁海两旗，以及西北厄鲁特蒙古人游牧居住的地区。这样，沙俄对我国蒙古地区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形成包围的态势，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诸多方面进行侵略，妄图最终吞并蒙古地区。

——沙俄在蒙古地区攫取了设立领事馆以及享受领事裁判等特权。在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 年）中，沙俄获得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立领事、管理贸易的特权；在中俄

《天津条约》（1858 年）中规定，在中国经商的俄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争讼案件或发生刑事案件，应送回俄国按律处理，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中俄《北京条约》又规定，俄国在与中国通商之处均可设立领事馆，除伊犁、塔尔巴哈台已设领事馆外，在喀什噶尔、库伦增设领事馆；中俄《伊犁条约》规定在肃州和土鲁番设立领事馆，并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等5处，待俄国商务兴旺时也设领事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分别于1908年和1911年设立了领事馆。库伦领事馆也于1911年3月升格为总领事馆。沙俄在蒙古地区获得广泛的领事和领事裁判权，实现了从政治上控制蒙古地区的目的。

——沙俄在蒙古地区获得了减税、免税和自由贸易的种种特权。沙俄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涉及蒙古地区的绝大部分条约、章程中规定了它在蒙古地区的贸易特权。最初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只规定俄商在伊、塔两地贸易，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俄商经陆路到中国贸易，其人数、货物和资本不受限制；两国交界各处允许两国商人免税自由贸易；从恰克图运抵北京的俄商货物，经库伦、张家口，准其就地零星行销。1862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俄商在两国边境百里以内免税贸易，其“小本营生”可在蒙古各地免税经营，中国官员不得干涉；俄国货物经蒙古地区运抵天津等地，可在张家口酌留十分之二就在行销；俄国货运往天津等地，“只按各国三分减一”交进口税；俄商从张家口贩运土货回国，也只纳2.5%的子口税。这样不仅扩大了俄商在中国蒙古地区的免税自由贸易区，而且获得了减税特权。此后两次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使整个蒙古地区成为俄商的免税贸易区，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喀尔、乌鲁木齐及天山南北两路，俄商贸易也暂不纳税，而且

经科布多、归化城、张家口运抵天津的俄国货，也减三分之一的进口税，进一步扩大了减税免税特权。

沙皇俄国到20世纪初控制了蒙古、新疆地区的通商贸易，俄商足迹遍及蒙古各地，俄国商品充斥了蒙古地区的市场。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商在蒙古地区也只是往来经商，在外蒙古的贸易额也只有21.8万卢布，1860年在库伦只有一家俄国商店。20世纪初，在库伦经商的俄国人达3600多人；1903年库伦已有俄国商号13家，投资额达300万卢布；1912年发展到45家之多，投资额也激增到800万卢。1900年俄商在外蒙古贸易额增长到1690万卢布，40年间增长了80倍；在外蒙古留居的俄国人达10万之众。1885年，俄国在外蒙古开设了10个规模较大的商业公司；到1904年，在外蒙古的俄国茶叶公司就有8个，垄断了蒙古地区的砖茶贸易。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归化城、张家口以及多伦诺尔新旧庙、哲里木盟的葛根庙、呼伦贝尔的甘珠尔庙等召庙集镇，俄商出没频繁，俄国商品到处可见。

——沙俄在蒙古地区获得了邮政特权。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确定中俄“合办”恰克图到北京的邮政线路，公文、信函和物件，均沿蒙古台站由蒙古站丁以蒙古驼马运递；由俄国官员在库伦、张家口、北京、天津等站掌管站务，监督运递，运递人必须到库伦领事馆接头；邮政费用中俄各半。同时对各种邮件的运递期限、每日行程、运递次数、投递方式和邮件重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名为中俄合办，实际是全由中国负担，而邮政大权却在沙俄手中，而且主要是运递俄国的公文、信函和物件。其作用对俄国来说不在于邮政本身，而在于政治、军事的内涵。正如恩格斯当时所说：“既然邮政交通现在已作为权利赋予俄国，其结果是这种交通将逐渐转入俄国手里。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

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的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关于不列颠统治中国的梦想将完全破灭，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①

——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绝不甘心落后于沙俄，它们借助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赋予的特权，也争先恐后地向蒙古地区扩展侵略势力。19世纪后半期，内蒙古地区的归化城、包头以及张家口等主要城镇，英、法、美等列强的商品，尤其是纺织品和奢侈品占据了市场；90年代以后，英、法、美等列强也向外蒙古扩张，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城镇的美国纺织品销量激增；经北京、张家口、归绥到库伦等地商路的商品多为欧洲产品，尤其是英国纺织品占据了优势。英、法、美等列强的商人，颇有与俄商一争高低之势头。鸦片也以“洋药准其进口”为名输入蒙古地区，而且种植罂粟也成为普遍现象。英商还通过买办华商收购蒙古地区的畜产品，掠夺工业原料。当时以归化城、张家口为基地大量收购驼毛、羊毛经天津出口后的主要市场是伦敦和纽约。驼毛的出口量逐年增加，1879年出口驼毛近万担，到1889年增加到2.5万多担；1875年出口羊毛仅41担，到1882年达到2300担，1885年激增到2万担，1895年猛增到20余万担。到1911年经天津出口的蒙古毛类畜产品达50余万担。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是西方列强对蒙古地区经济侵略的特点之一。

——宗教侵略活动是西方列强侵略蒙古地区的重要方式之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一。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已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传教；1840年建立了蒙古教区。但传教仍属非法。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允许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赋予外国教会传教的种种特权。1864年，罗马教皇把蒙古地区划归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1883年，将蒙古教区分为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三大教区。在内蒙古三教区中总共建立教堂230余座，还有许多修道院、育婴堂和教会小学校。教会将低价收购或强行霸占的蒙古土地，以入教为条件租给贫苦汉族农民，以发展教徒，扩充教会势力，建立教会庄园，组织教会武装，自掌行政，自设公堂，不受中国地方官府管辖，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义和团运动中内蒙古的反洋教斗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侵略势力，但《辛丑条约》签订后，天主教势力反攻倒算，又以教案赔款掠夺了大片土地和牲畜，教会的侵略活动更加猖狂。

——19世纪9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沙皇俄国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在中国北方扩张领土，划分势力范围，输出资本，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进而称霸亚洲。

“银行加铁路”是沙俄侵略政策的集中体现。沙俄首先于1895年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第二年签订了《中俄密约》，获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进而签订了所谓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续约，签订了《银行合同》，确定由道胜银行承建中东铁路。道胜银行的权限极大，代收中国的各种税收；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的业务；铸造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公债之利息；敷设中国境内的铁路和电线等项工程。在满洲里、海拉尔、张家口、库伦、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立了道胜银行的分行，

发行货币，发放贷款，控制了蒙古地区和东北的金融市场。

中东铁路从赤塔始建，由满洲里进入中国境内，经海拉尔、哈尔滨至绥芬河出境，连接乌苏里铁路直抵海参崴全长 2800 多公里，内蒙古境内是 500 多公里。从哈尔滨至旅大展修支线，称南满铁路。1897 年 8 月动工，1903 年 7 月建成营运。内蒙古境内铁路占地 4 万余亩；沿线大片林场也被沙俄抢占；呼伦贝尔著名的扎赉诺尔煤矿落入俄国之手；奇乾河、吉拉林两大金矿也被沙俄霸占。沙俄在铁路沿线设置司法机构，驻扎军队，推行“自治”，驱逐华商，俄货免税、减税贸易，强行移民占地。与此同时，道胜银行在外蒙古库伦以北，恰克图以南租占开采 15 座金矿，并于 1900 年成立了蒙古金矿公司。沙俄对蒙古地区的侵略步步加深。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跻入侵华列强队伍的日本，派出大批特工人员，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活动。他们拉拢蒙古王公上层，邀请其访日款待，或派特务扮作教师或喇嘛，潜入蒙古盟旗，以办学为名从事间谍活动，出售枪支弹药，伺机策划暴动。日本为了与俄国争夺势力范围，1905 年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场日俄战争，以沙俄失败告终。通过日俄三次“协约”和四次“密约”，划分“南满”和内蒙古东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北满”和外蒙古以及内蒙古西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大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全面推行其殖民扩张与掠夺政策，向内蒙古东部地区派遣了各种不同身份的特工人员，进行多方面的特务间谍活动，为策动“满蒙独立运动”进行准备。

——沙俄利用民族问题进行侵略活动，是其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主要特征。无论是 19 世纪中叶的穆拉维约夫计划，还是 1893 年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其核心内容都是通过拉拢蒙古王公

上层，制造民族矛盾，煽动民族分裂，以吞并蒙古地区。这两个计划都得到了沙皇的首肯，而且一直在付诸实施。1894 年沙皇批准给巴德玛耶夫 200 万卢布的贷款，成立了“巴德玛耶夫商业公司”，以经商为名派遣大批特务潜入蒙古地区，广泛进行颠覆性阴谋活动。巴德玛耶夫周游内外蒙古各地，甚至到北京会见蒙古王公贵族，亲自策划民族分裂活动。俄国驻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军队、铁路、银行等机构，全面配合其活动，在哈尔滨还专门成立了蒙务机关，以馈赠贵重礼物、供应枪支弹药、给以贷款等手段，拉拢蒙古王公上层。哲盟札萨克图旗乌泰王府就是沙俄特务频繁入出的地方，也是其策划暴动中心之一。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沙俄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一手策划了外蒙古“库伦独立”，接着在内蒙古策划了呼伦贝尔“独立”和东蒙乌泰叛乱。1912 年底和 1913 年初，又策动、指挥外蒙古叛军向内蒙古发动军事进攻。但是，沙俄吞并蒙古地区的梦想，在中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下，随着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破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满蒙独立运动”也没能如愿。但是，日本侵略势力继承沙俄的衣钵，将被其称作“满蒙”的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作为它向外扩张、侵略的第一目标，而且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双管齐下，成为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主要国家。因为西方列强忙于欧战，难以顾及蒙古地区。1915 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首当其冲的侵略目标就是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直至瓜分势力范围，策动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地区，使包括内蒙古在内的蒙古地区变成为半殖民地。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内蒙古地区侵略的步步加深，国内社会政治动荡和变化的强烈影响，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也渐渐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以沙俄为主要角色的外国侵略势力，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割占领土到划分势力范围，从经济掠夺到政治控制，对蒙古地区进行了步步深入的侵略。它对清朝统治集团中满、蒙、汉民族成份的地位、作用及其变化，对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和蒙古地区社会各阶层对清朝态度的变化，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的影响，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外国的侵略既冲破了蒙古地区的封闭状态，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同时又与蒙古地区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抑制和阻碍了这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蒙古地区半封建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进程，使蒙古地区内部的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帮助清朝统治蒙古地区 200 多年的蒙古王公贵族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势力越来越加深拉拢，已产生靠近外国势力，疏远清廷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社会动荡的影响，蒙古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内蒙古的各种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蒙古王公贵族势力既失去了抵御外国侵略的武功，也难以平息内部的反抗斗争，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蒙古地区也削弱了它在清朝满族统治集团中强有力的联盟地位。相反，汉族实力派官僚越来越成为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力量，开始产生左右清朝内外政策的作用。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满汉官僚的联合统治，取代了以“满蒙联合统治”为基础的满洲贵族统治。于是，清朝对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松弛直至解除“蒙

禁"，蒙古地区由蒙古王公札萨克封建领主式的间接统治，改变为由清朝政府的直接统治，蒙古王公贵族在清朝的显赫地位淡化了，昔日的优厚待遇也受到影响。这种变化影响到蒙古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

——"蒙禁"政策是清朝政府为了限制蒙汉民族之间，蒙古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借以巩固"满蒙联盟"，以形成统治全国的基地。但这是违反蒙汉民族的意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政策，是不可能持久的。事实上从清朝中叶就出现了违抗"蒙禁"的趋势，有些蒙古王公私招内地汉人入蒙垦种蒙地，清朝政府也只能默认，而且不得不设置州县管辖蒙地的汉民。19 世纪中叶，这种趋势已难以阻挡，清政府先后将昌图、长春二厅升格为府，管辖新设置的蒙地县；在察哈尔地区索性推行蒙地官垦。"蒙禁"逐渐松弛，蒙汉民族之间，蒙古地区与内地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蒙古地区的封闭状态已被冲破。

——20 世纪初，清朝政府迫于国内外大势，不得不在全国推行所谓新政。通过一定限度内的政策调整、制度改革，企图改善财政经济状况，强化国家机器，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放垦蒙地是清朝在内蒙古推行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其目的就是筹措"庚子"赔款和兵饷，其结果是彻底废弃了禁垦蒙地的政策，事实上也是废弃了"蒙禁"政策。1902 年 2 月 5 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下谕放垦蒙地，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西蒙推行垦务，在绥远城设立督办蒙旗垦务总局，其下又设丰宁垦务局、张家口垦务总局和西蒙垦务总局，分别办理察哈尔各旗和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旗垦务，并官商合办东西两路垦务公司，承领转放部分蒙地，从中勒索。在推行新

政的10年中，西蒙放垦蒙地88700余顷，到1908年即搜刮押荒银达273万余两。东蒙放垦是由黑龙江、吉林、盛京将军和热河都统分别督办各自辖地的蒙旗垦务，未专门设置垦务机构。在推行新政的10年中，东蒙哲里木、昭乌达两盟放垦蒙地330余万垧零1.6万余顷，到1908年即搜刮押荒银387万余两。

放垦蒙地的直接后果是，大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被垦种，清政府既得地利又获地权；而大批蒙古族牧民被排挤驱赶到山区荒漠和边远地带，少数被迫转务农业，这对蒙古民族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大批被招垦种蒙地的内地汉族农民，也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大量的押荒银和地租，遭受沉重的经济搜刮。而放垦官员和地商正是从中渔利肥私者。当然，放垦蒙地也彻底打破了清朝隔离蒙汉民族的壁垒，结束了蒙古地区的封闭状态，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

——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推行新政之初除了放垦蒙地，筹款筹饷外，再没有提出其他计划和措施。但是，满汉官员筹蒙改制议论不少。其主要内容是在内蒙古改制设省，实行同内地一样的“郡县”体制，废除蒙古王公札萨克统治的传统的自治体制。在内蒙古的改制呼声中，也有一些蒙古王公札萨克提出蒙旗变革图强的主张，既有自主兴办图强的新政内容，也有不同于满汉官员单纯的改革蒙旗体制的政见。当然还是以维护蒙古原有封建统治权益为基础。

稍后，清政府除了增加苛捐杂税，向蒙古王公推行捐输等筹饷的措施外，还提出编练新军、兴办学堂、鼓励工商等新政的通常内容，在内蒙古各地也有所举动。1905年以后，为稳定蒙旗局势，清政府一面改变调整统治蒙旗的机构，东三省设蒙务局、司；中央资政院专设蒙古王公“钦选”席位，每盟出议员一名；

有的地方咨议局也设蒙古咨议员等，以笼络蒙古上层。一面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直接统治，清政府在内蒙古成批地设置州县。西部武川、陶林、东胜、兴和、五原等厅，东部昭盟林西、开鲁二县、卓盟阜新、绥东、建平等县；哲盟洮南府、辽源州和靖安、开通等 10 个厅县；呼伦贝尔胪滨府、呼伦厅等都是这一时期设置的。而且在昌图府、洮南府之上设立了洮昌兵备道。在内蒙古改设行省的议论和奏折也纷纷出笼，只是由于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实行。显然，清政府对蒙古民族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的苗头已经出现。

——清朝政府彻底转变对蒙政策的基本标志，除了上述推行放垦蒙地政策外，还要解除其他种种禁令，推行筹蒙改制，剥夺蒙古盟旗的传统自主权益。有些禁令虽然在推行放垦蒙地，兴办工商，创办学堂等新政过程中实际已被废弃，但是作为政令，是从 1910 年 9 月，清政府批准发布理藩部关于为筹办蒙务应酌情变通旧例的奏议开始的。所谓“变通旧例”就是废除旧制。其一是废除禁止汉民到蒙地开垦的规定，在已放垦的盟旗，允许汉民租佃蒙地和汉蒙之间典当买卖田宅；在未放垦的盟旗，与蒙旗协商，奏请开放。其二是不仅废除蒙汉通婚的禁令，而且奖励蒙汉通婚。其三是废除蒙古地区使用汉文和聘用汉文教师、书吏及用汉文命名等禁令，提倡教习汉文和使用汉文。

在上述“变通旧例”的同时，清政府规定蒙旗办新政，须“统由地方官监督施行”；原蒙旗自办案件，地方州县有权复审，逐步将蒙旗原有的司法权移交地方州县司法机关；汉民对蒙地享有永租权。

清政府的对蒙新政，虽然没能触动和改变满蒙“封王联姻”政策和王公札萨克制度，但已削弱和剥夺了蒙旗传统的自主权

益，甚至有些方面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如蒙古语文遭到排斥，蒙人参与宪政或地方咨议必须通汉语才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仅识满蒙文者仍以不识文为论”对待。上述诸多变化，说明清朝政府对蒙古民族已经在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而且对以后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内蒙古地区的渗透，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对内蒙古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内蒙古地区的农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商业贸易有较大的发展，近代工矿企业开始出现，近代邮电通信和文化教育也给内蒙古草原带来了新的气息。

——清末放垦蒙地，大开“蒙禁”，大批内地的汉族农民移居内蒙古，垦荒种地，发展农业，内蒙古南部靠近邻省地带出现了大片农业区、汉族农民相对集中在农业区。蒙古族牧民赶着牲畜一步一步地退出水草丰美的牧业地区，向北退入山区或荒漠地带，形成了蒙古民族相对集中的牧业区。在这两个地带中间出现了过渡式的半农半牧区，一般的就是蒙汉杂居区域。在半农半牧区，农业一直处在发展的状态，畜牧业日渐衰退。总的来说，内蒙古的农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以务农为主的汉族农民比之在内地，经济生活有了改善；畜牧业却出现了衰退的趋势，以牧业为主的蒙古族牧民或改务农业的蒙古族新式农民，其经济生活日益恶化，民族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由此而产生了农牧矛盾。农牧矛盾又导致了蒙汉民族之间的纠纷，甚至矛盾。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近代历史的终结。

——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的急剧增长，商品经济也在迅速地发展，新兴商业贸易集镇大批地出现。内蒙古西部有丰镇、武川、包头、五原，东部有经棚、绥东、辽源、洮南、海

拉尔、满洲里，还有蒙旗传统的庙会集市及遍布牧区的旅蒙商。商业贸易流通领域的逐渐扩大，促使商品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衰退。

——内蒙古的手工业和采矿业有了新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新型工矿企业和实业也开始出现。手工业仍以传统的皮革加工、制毡、木器加工、打制铁器和其他金属器皿加工为主。归绥的皮革加工作坊有 30 余家，毛毡作坊也有二三十家；采矿业仍以开采金银矿和煤矿为主，而且数量也急剧增加。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工矿企业，有转山子金矿、土槽子银矿和甘河煤矿，在归化城有毛纺工艺局，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有大布苏造碱公司，有喀喇沁右旗综合工厂、蒙古实业公司，有大兴安岭祥裕木植公司等。这些新式企业和实业，有的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创办的，有的是官商合办的，有的是蒙古王公和区外实业公司集股联合创办的，有的是蒙古王公筹资创办的，有的是蒙古王公联合集资兴办的，有的是蒙古族地方绅士在蒙古人中集股兴办的。这些新型企业不仅采用筹资集股等近代企业的形式，还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管理办法，已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尤其是有蒙古族参加创办，给仍处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社会注入了崭新的经济因素。这是蒙古社会的进步。

——近代邮电通讯事业的出现，为内蒙古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北京至黑龙江黑河镇电报干线，在郭尔罗斯后旗的茂林和布特哈旗总管府驻地尼尔基镇设立了中继电报所；从北京起，经张家口、库伦到恰克图的蒙古电报干线，在苏尼特右旗的滂江、乌得也设立了中继电报所；在昌图、辽源、洮南、赤峰、归化城等重要城镇设立了电报局、所；中东铁路呼伦贝尔段要站海拉尔、满洲里也开通了电报通讯。近代邮政事业发展更快，在内蒙

古东西部一些重要城镇相当普遍地开办了邮政局、所；清政府将内蒙古东部传递卓、昭、哲三盟各旗奏报、公文和蒙文承件的驿站改建为文报线路，在新民、辽源、昌图等处设置了文报分局；喀喇沁右旗札萨克贡桑诺尔布自筹资金，开办了旗内的电报邮政业务。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京奉（奉天）铁路的通车，对内蒙古经济的开放发展影响极大。

——在内蒙古推行新政期间，创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在西部，绥远城将军贻谷为编练新军而创办了绥远城武备学堂，接着还创办了绥远城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和初等小学堂，专收清朝八旗子弟和土默特旗蒙古人子弟就读。同时将归化城古丰书院改建为归绥中学堂，土默特旗启运书院改建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新设了归绥道初等小学堂。在包头、察素齐、毕克齐、丰镇等城镇也办起了高等、初等小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均开设了近代的新式课程。在东部，喀喇沁右旗创办了蒙古族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崇正学堂；在科左前旗新秋镇创办了蒙汉小学堂；在科左后旗马兰屯也创办了蒙古学堂；科左三旗在昌图联合创办了蒙汉高等小学堂及体育师范专修学堂。奉天省在省城办起了蒙汉高等小学堂及体育师范专修学堂。黑龙江省创办了海拉尔小学堂和齐齐哈尔满蒙师范学堂；清政府有关部门在北京创办了陆军贵胄学堂、满蒙文高等学堂和殖边学堂等，专收或兼收蒙古族子弟入学就读。新式学堂的出现，不仅讲授近代新式课程，传授新知识新技术，而且传播了近代新思想、新文化，带来了近代新风。尽管是有限的，但作用也是积极的。

综观1840年以来内蒙古的历史进程，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在内蒙古攫取了大量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乃至军事等方面的权益，使内蒙古成为其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促使内蒙古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解体，打破了内蒙古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内蒙古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因素开始发生、发展，在内蒙古社会中已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外国侵略势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以及内蒙古的封建势力相结合，限制、压迫这里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统治的基础还没有完全打破，内蒙古的社会同全国一样呈半封建状态。因此，在20世纪初，内蒙古地区大体上和全国同步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内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在内蒙古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这里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内蒙古各民族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蒙汉各族人民同以清朝统治者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内蒙古社会的两个主要矛盾。蒙汉各民族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内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在这两对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时任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的蒙古族爱国将领裕谦，在江浙沿海前线布防督战，并上书道光皇帝，主张抵抗，反对投降。1841年9、10月间，他亲临定海、镇海督战抗英。定海失守后，他与众将士立誓与镇海共存亡。在激烈的抗英斗争中，于10月10日以身殉国。是年11月，内蒙

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僧格林沁，奉命巡视大沽口、山海关防务。翌年，他亲率蒙古察哈尔部和东三盟蒙古骑兵5000余人，驻防天津海防和长城一线，时刻准备迎战侵略者。同时，蒙古族各阶层积极捐献军马银钱，支援前线抗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任清朝钦差大臣，亲率包括蒙古骑兵在内的清军万余人，积极布防，并与英法联军激战大沽口，大败侵略者。当时西方报刊称这是"中国人对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特别赞扬了蒙古骑兵的作用。1860年，英法侵略军增兵十倍，再犯大沽口，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和蒙古骑兵迎战侵略者，从大沽口血战到北京八里桥，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京津保卫战中，近万名蒙古骑兵参战，占清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仅昭乌达盟蒙古骑兵参战者便有1000余名，最后只剩百余人。应该说蒙古骑兵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付出了重大牺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

——在义和团运动中，内蒙古是全国反洋教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1900年夏天，义和团首先传入内蒙古东部卓、昭两盟，当地蒙汉群众纷纷响应，数万人围攻松树咀子天主教东蒙古教区总堂，外国传教士秘密勾结侵占东北的沙俄侵略军和清军，以武力弹压了这次斗争。赤峰、建昌、平泉等地的义和团和民间结社，奋起攻打当地的天主教堂，赤峰地区两座教堂被付之一炬。是年7月，义务团和蒙汉各族群众2000余人，配合官兵，首先攻打西南蒙古教区二十四顷地总堂，焚毁教堂，就地正法杀人凶犯教徒石险生等，活捉主教韩默理，并将其背插"老洋魔"字牌，在乡间游斗后，在托克托城示众处决。阿拉善旗蒙古族官兵，配合反洋教群众，包围三盛公教堂，驱逐藏匿于此的15名

外国传教士，收回教堂改建为喇嘛庙。伊盟南部蒙古族的“独贵龙”配合义和团攻占当地数座小教堂，围困小桥畔教堂达48天之久，拒绝官府劝阻，提出“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谁阻挠反洋教就打谁。中蒙古教区丰镇、凉城、集宁一带“几无一村不学神拳”，大部分教堂被捣毁，外国传教士纷纷逃匿于四子王旗。然而，义和团又与归绥官兵、四子王旗蒙古官兵相配合，攻打该铁圪旦沟和乌尔图沟的两座教堂，焚毁教堂，处死传教士和不法教民。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反洋教斗争，摧毁大小教堂73座，处死罪恶多端的外国传教士7人，许多传教士或被驱逐出境，或逃离内蒙古。在反洋教斗争中，蒙汉各族人民始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也是斗争取胜的保证。

——1900年7月，沙俄军队也乘机入侵我国东北，在呼伦贝尔地区，清军步骑5个营和当地各族人民一道奋勇堵截迎战侵略者，曾有三战三捷的战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乘势西侵河北西部和内蒙古察哈尔地区，法国侵略军从张家口西进大同，直逼丰镇，当地义和团和蒙古族官兵，奋起迎战，击退了侵略者。

——辛亥革命时期，沙俄策动内外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地区，分裂中国，并指挥外蒙古叛军窜犯内蒙古，激起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义愤。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庄严声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反对沙俄侵略；各政党和团体纷纷通电痛斥沙俄的侵略行径；各族各界也以不同的形式反对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内外蒙古的爱国王公上层和蒙古族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取消外蒙古“独立”，废除《俄蒙协议》。在库伦蒙古王公上层秘密会议上，有的爱国宗教上层拒绝在给沙皇的乞援信上签名；内蒙古东西部蒙古王公分别举行会议，一致反对库伦“独立”，赞助共和，拥护民国；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发表声

明，绝不承认库伦政府。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中国驻军，在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反击外蒙古叛军，到年底将敌军全部赶出了内蒙古；同时平息了东蒙乌泰的叛乱，遏止了呼伦贝尔"独立"，沙俄策划内蒙古"独立"的阴谋未能得逞。

鸦片战争以后，内蒙古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持续不断，斗争形式多种多样，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内容也丰富多彩，斗争的手段各有特点，从多方面反映出了内蒙古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独特性。

——19世纪中叶，当太平天国革命在南方兴起，并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大江南北的时候，北方内蒙古地区的反封建斗争也蓬勃兴起。50年代，哲里木盟南部科左后旗的汉族佃民开展了抗租斗争，反对王公札萨克增加租额，联名请愿，抗拒官府催租，在吴保泰、王柏龄和孟玉龄、霍义等带领下，先后发动武装抗租，斗争持续了六年之久，两次遭清军镇压，领导人被捕遇害，斗争失败。与此同时，卓盟土默特右旗爆发了"八枝箭"蒙古族人民的抗官差，拒摊派，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从联名具状，控告札萨克、官员，到聚众示威、修筑村堡、铸造土炮、武装反抗，与官府对峙十多年。直到1868年领导人福泰病逝，第三年常明等首领被热河都统派军队逮捕，发配内地服苦役，并撤职查办部分贪官，核减差役赋敛后，才告平息。60年代，卓盟土默特左旗蒙古族人民，沿用昭、卓两盟一带蒙古族传统的民间组织"勿博格得会"，即"老头会"的形式，抗拒官差，反对招民私垦旗地，数次赴京控告该旗札萨克贵族，历数其罪状30余条，因控告无效，1863年绰金太，那木萨赉等首领聚众数千人，以

"老头会"名义，武装对抗旗府，烧毁、抢夺贪官房舍、牲畜，击毙一名上层贵族。最后热河都统和卓盟盟长联合派兵镇压，领导人被捕杀、斗争失败。伊克昭盟"独贵龙"[①]运动，是蒙古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独特的组织形式。1858年，乌审旗"独贵龙"在潘吉等牧民的带领下，反对封建暴政、苛捐摊派、兵差徭役和贪赃枉法，反对强占蒙民耕地和强迫旗民代偿官府高利贷债务，盟旗封建统治者被迫作出让步，答应了"独贵龙"的要求。1866年，鄂托克旗蒙古族人民也组织"独贵龙"，进行了类似的斗争。1879年，乌审旗"独贵龙"在伊得木扎布、通那等人带领下，聚众300多人，继续联名控告贪官，宣布抗拒官差摊派，并揪出旗协理台吉等官员示众。旗札萨克为平息众怒，被迫将首恶官员革职惩处。"独贵龙"第一次成为与旗府抗衡的一支力量。1884年，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奉清政府之命偷袭抓捕了伊得木扎布、通那等60余人，将两位首领流放内地服苦役，其余人受到不同的处罚。但是，"独贵龙"并没有停止斗争，直到90年代末，还多次发生过规模不等的"独贵龙"运动。

——内蒙古东部白凌阿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声势最大的蒙汉族农牧民反清武装起义。它与东北汉族农民起义联合起来，形成三四千人的起义军，转战在卓、昭、哲三盟和吉林、奉天二省西部广大地区，攻打县城，焚烧衙署，解救百姓，对抗清军，声势大振。白凌阿是昭盟敖汉旗蒙古人，家境贫苦，自幼失去父母，早年以贩马为生，后又浪迹江湖，受内地农民起义的影响，

---

① "独贵龙"，蒙语意为环形、圆圈，参加"独贵龙"的人在聚会时坐成圆圈，以表示成员的平等身分，在上书呈控签名时，组成环形，不知首尾，避免暴露领导者。

他与汉族群众首领联合，在哲盟南部和义州、山海关等从事反清活动。1861年，与汉族王达为首的抗粮武装会合，发动义州反清起义，后与朝阳一带的汉族李凤奎、刘珠、才宝善等领导的义军联合，成为东北和内蒙古东部最大的义军武装之一。清军以重兵围剿多年，义军流动作战，游击各地，不为所败。清军曾三次宣布捕获白凌阿，但难辨真假。在他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传奇佳话。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东北义军被镇压之后，白凌阿起义军也屡遭挫折，1868年白凌阿在吉林省境内被捕遇害，历时近10年的白凌阿起义最终失败了。白凌阿起义有不少值得称道的特点，但最值得称颂的是蒙汉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事迹。

——在19世纪90年代，昭盟敖汉旗发生了金丹道暴动，在哲盟科右前旗爆发了图合木起义，科右中旗又发生了花里亚苏造反。昭、卓盟一带的汉族民间秘密结社金丹道，其宗旨是“反清复明”，成员多为租种蒙地的汉族佃民。部分深受蒙古贵族的欺压剥削，常遭天主教堂教士凌辱的汉族佃民，1891年11月，举行暴动，攻占敖汉旗贝子府，改立“开国府”，杀死达克沁贝子及其全家，昭、卓盟大部地区的教民蜂起响应，攻占焚烧王府、县衙和天主教堂，斗争矛头指向清朝官府、蒙古王公和外国教会。但是，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蒙古人，焚烧、抢掠蒙古喇嘛召庙、村屯房舍，酿成破坏蒙汉民族关系的严重恶果，给蒙古人造成极大的灾难，遂遭清政府直隶、奉天精兵镇压而失败。之后，一批流落于科右前旗的数千蒙古人，在图合木地方聚集，收藏枪支弹药，修筑据点，在刚布、桑布兄弟带领下，抗拒官差，打击王公贵族和富商大户，夺取武器、财物，征收粮秣牲畜，俨然成为农民割据政权。1901年俄国侵略

军配合蒙古王公镇压了起义。同时科左中旗王府护卫花里亚苏鼓动家奴、兵丁、旗兵搜集武器哗变造反，联名具状，列数该旗札萨克色旺诺尔布桑宝罪行48条，向盟府控告。色王畏罪逃跑，被花里亚苏闻讯追捕，围困在一座寺庙中，最后被迫自缢毙命。1902年清政府专派钦差大臣裕德查办，造反首领花里亚苏、花连等被捕遇难，造反失败。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蒙古东部最后三起自发的反封建起义，反映出内蒙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趋势。

——清朝政府在清末放垦蒙地的举动，遭到蒙古族各阶层的普遍反对，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到鄂尔多斯高原，爆发了蒙古民族空前浩大的反垦斗争。贻谷在西蒙督办垦务，首先遭到伊盟、乌盟蒙古族各阶层的反对，两盟王公札萨克以种种理由拒绝报垦，或借故拖延。伊盟盟长杭锦旗札萨克阿尔宾巴雅尔因拒绝报垦而被革职；准格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因反对放垦，组织武装抗垦斗争，惨遭贻谷镇压杀害。伊盟“独贵龙”运动成为抗垦斗争的主力军，乌审旗组成12个“独贵龙”，聚众2000多人，成立总部，誓死抗垦到底，使该旗垦务数年进展缓慢。杭锦旗组成13个“独贵龙”，以厂汉卜罗为首领，惩办主使放垦的官吏，武装击退垦务局护垦队。札萨克旗活佛旺丹尼玛指挥“独贵龙”，驱赶垦务官员，烧毁垦务局，一度终止放垦。郡王旗“独贵龙”围攻垦务官员，驱逐地商，击退护垦队和地主武装，并与达拉特旗“独贵龙”联合擒杀包租蒙地的地商。乌盟放垦遭到全盟上下一致抵抗，垦务进展缓慢。贻谷在西蒙督办垦务，遭到出乎意料的反对，最后只好采取对王公上层强迫报垦，违者革职查办，顺者晋爵褒奖的办法推行垦务，对抗垦群众施以武装镇压。由此更激起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清政府不得已将贻谷革职查办，

西蒙垦务受到沉重打击。

东蒙抗垦斗争的特点是，普遍举行武装抗垦。1904 年，苏鲁克旗人白音大赉聚众组织武装，在彰武、靖安、洮南一带武装抗垦；1906 年郭尔罗斯前旗人陶克陶率众抗垦，在科右前旗、中旗、扎赉特旗、科左中旗一带，捣毁垦务局，袭击垦务人员。该旗白音吐斯也和扎赉特旗绰克大赉等领导抗垦武装相机配合；科右前旗牙什也与陶克陶联合抗垦。如此广泛激烈的武装抗垦斗争，使东蒙垦务难以推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命调集大批清军，全力围剿抗垦武装。1907 年 7 月，清军统领张作霖率数十营兵力，追剿白音大赉抗垦武装，经多次交战，白音大赉寡不敌众，遂被迫退据索伦山；10 月，张作霖在黑龙江、吉林清军和蒙古王公武装配合下，猛剿陶克陶的抗垦队伍，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陶克陶撤入索伦山。翌年 2 月，张作霖率部进剿索伦山，抗垦武装撤出索伦山，转战东蒙各地，游击对敌，誓死抗垦。直到 1910 年 4 月，东蒙抗垦武装大部分被驱散，领导人除陶克陶退入俄境外，大部被捕遇难，抗垦斗争失败。

清末蒙古民族各阶层的抗垦斗争，是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保卫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牧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具有民族解放意义的斗争；也是辛亥革命前全国反清斗争的组成部分。它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期起了促进作用，也是蒙古民族觉醒的开始。

——20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了内蒙古地区。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决定成立蒙古分会；第二年即派王建屏、李德懋等从山西来到归绥、包头开展工作，发展会员，鼓动革命。云亨，经权第一批加入同盟会，成为蒙古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汉族王定圻、郭鸿霖、王廷选等也首批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城乡、学校、军队中广泛开展

革命工作。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各地响应。同盟会员云亨、经权、王定圻、郭鸿霖等积极在绥、包等地组织反清起义。11 月 9 日，同盟会员杨云阶、云亨等策动口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由张琳、曹富章率领起义，辗转到达包头，被清军管带诱骗入城，以宴请为名，于 12 月 24 日设伏杀害张琳、曹富章、郭鸿霖等，其他人幸免于难。12 月初，由张占魁、武万义（蒙古族）、马有才（回族）率领的农民军，在丰镇东北宣布起义，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相号召，进军丰镇。16 日占领丰镇，成立革命政权，宣布革命政策。同时，在陶林、凉城、兴和也有规模较小的起义。山西革命军北上到达内蒙古，在包头成立临时革命政权包东州，云亨、经权分别被任命为绥远城将军和归化城副都统。1912 年 1 月，山西革命军又撤回太原；丰镇义军也被清军攻击而退出丰镇，转入农村。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的反清起义无所作为地结束了。

辛亥革命在内蒙古有一定的反响，但没有形成足以推翻清朝地方政权的革命力量，尤其在蒙古族中响应者甚少。地处边远，同盟会的工作没有展开，是其原因之一，但是同盟会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条，极大地影响了蒙古民族对其民主革命主张的认识，蒙古民族对辛亥革命的冷淡，与此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盟会员王定圻、云亨、经权等继续开展反袁斗争；1913 年，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民开展驱逐绥远都统张绍曾的斗争；第二年冬天，又掀起了收回旗权，保全旗治的斗争。1916 年王定圻被捕遇难，云亨、经权等屡遭军阀追捕。1917 年，他们与蒙古族同盟会员革命党人满泰一起参加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法运动。喀喇沁蒙古族人士克兴额、白云梯，察哈尔的恩克巴图等，也南下广东，参加护法斗争，民主革命思潮在

内蒙古地区继续在传播。

——在辛亥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伊盟“独贵龙”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乌审旗蒙古族牧民在锡尼喇嘛的领导下，全旗组织起 11 个“独贵龙”，提出多项反封建主张和要求，在海留图庙成立总部，树起“独贵龙”旗帜，与王府旗府对峙，总揽全旗大权，处死罪恶多端的王爷福晋，迫使北洋政府蒙藏院撤革该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的职务，使乌审旗王公政权一度瘫痪。伊盟盟长两次派专员未能平息“独贵龙”。1919 年，盟长逊博尔巴图亲往该旗，以共商旗务为由诱捕了锡尼喇嘛，“独贵龙”暂受挫折。与此同时，杭锦旗的“独贵龙”在厂汉卜罗和旺丹尼玛的领导下，矛头直指军阀官僚、大地主、旅蒙商号，在河套地区兴盛一时。1913 年被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诱捕厂汉卜罗、旺丹尼玛等七位首领，押解太原囚禁。1914 年达拉特旗蒙古族牧民在阿尤尔扎那领导下，组成 5 个“独贵龙”，在柴登设立总部，提出 13 项要求，反对王公札萨克的封建暴政，组织武装，参加者数千人，割据一方，与旗府对峙。该旗札萨克逊博尔巴图被迫答应了“独贵龙”的要求。最后阿尤尔扎那被暗杀，“独贵龙”受挫。在东蒙昭盟亦有土门杰尔嘎拉领导的反垦武装斗争，有昭格庙高喇嘛、吴喇嘛领导的反封建暴政的斗争，有卓盟宝国图村汉族农民的抗税斗争等。反封建斗争始终没有中断。

在内蒙古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持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目标越来越明确，组织越来越严密，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国内外敌人，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究其原因，这一系列的斗争都属于自发的分散的反抗斗争，没有革命政党的统一领导，也没有

明确的革命纲领，政治上组织上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因此，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失败也是自然的。内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无疑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全国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五四运动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姿态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地波及到了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草原。蒙汉各族青年学生首先响应五四运动，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内蒙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兴起，为内蒙古革命注入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纲领的制定，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内蒙古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开始了内蒙古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首先从北京蒙藏学校开始，开辟内蒙古的革命工作，接着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创办革命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和民族问题纲领、制定内蒙古革命的指导方针、建立革命群众组织、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建立革命武装、领导发动了内蒙古的革命运动。

在全国大革命高潮中，内蒙古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相继展开，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以牧民运动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空前高涨，内蒙古革命以其突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与绚丽的色彩。

但是，在第一次全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作为全国革命一部分的内蒙古革命也遭受挫折而转入低潮。这里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

第一节　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

一、内蒙古青年响应五四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祖国大地沸腾，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沉静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也燃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烽火，而且越烧越旺，直至焚毁旧世界，迎来草原的新生。

由于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掠夺，内蒙古地区政治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五四运动时期，可供青年求知的小学屈指可数，中学廖廖无几，更无大专院校可言。当时，堪称内蒙古政治、文化中心的归绥，也只有两所小学，一所中学，即南高、北高和归绥中学。南高即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因其座落在归绥旧城南端，故称此名。它属土默特旗管辖，是内蒙古地区最早的一所

蒙古族学校，其前身启运书院创办于1724年（清雍正二年），1907年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1915年又改称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现称土默特学校）。该校的学生大都是蒙古族，当时只有200多名学生。北高即归绥高等小学校，今庆凯街小学，因其座落在归绥旧城北端，与南高相对应，故称北高，属归绥县管辖。归绥中学是内蒙古地区有较长历史的一所中学，其前身古丰书院创办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903年改称归绥中学堂，1912年又改为归绥中学校，时有四个班200多名学生。这三所学校总共有学生500多名。另外，在包头、赤峰、通辽、喀喇沁右旗也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小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内蒙古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巴文俊、王祥等积极参加了北京的反帝爱国运动。事前，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荣耀先代表该校参加了北京14所大专院校召开的示威游行准备会议。5月4日，蒙藏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示威。他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字样的多种旗帜、标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并举行总罢课，发表通电，号召全国掀起反帝斗争。5月5日，荣耀先代表蒙藏学校参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内蒙古青年就这样参加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列之中。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内蒙古传播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在归绥各校学生中宣传鼓动，讲述北京五四运动的实况，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了祖国北疆的内蒙古。

当时，呼和浩特各校的学生纷纷举行座谈会，谈论北京的五四运动，议论国家大事，一种新鲜的政治空气在塞外僻静的校院

中飘荡，沉闷的校院顿时活跃了起来。当谈到归绥的学生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敏锐而坚定地提出要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罢不罢，看北大，北大罢，我们就罢”。这种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各学校组织了学生会，领导学生运动。归绥中学在5月中旬举行罢课，南高北高也紧接着在下旬罢课。学生们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冲破学校当局的劝说阻拦，走出校门，奔赴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在被封建旧礼教束缚的近乎窒息的归绥各学校学生，走出罢课、游行示威这一步，是何等的可贵啊！标志着他们迈出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各校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组织了十多个小组，分头出动，游街走巷，打着小旗，散发传单，宣传北京五四运动，愤怒揭露巴黎和会的阴谋和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尤其是逐条揭露与内蒙古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指出了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反动本质和日本侵略窥视内蒙古的阴谋，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号召“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收回权利”等等。爱国学生们的这一举动，在古老的青城飘起了一股温馨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昂首眺望赞许者有之，拍手称快者有之，闭目沉思者亦有之……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归绥的“绥远总商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支持和拥护学生的爱国行动；就连时任绥远都统的马福祥也不敢轻举妄动，阻挠学生的爱国活动。

当然，归绥学生的爱国运动就声势和规模而言，与北京等大城市不可相提并论，但在内蒙古地区来说，确属首次，而且跟上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反帝斗争的形势。它在内蒙古地区起了启蒙作用，促进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思想解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内蒙古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蒙汉各族青年学生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能够并肩携手，共同反帝反封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

以说蒙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把它们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二、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及其对内蒙古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的年代，我国著名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倡导、设计、筹资和具体指挥筑成了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线——京绥铁路。京绥铁路建于 1905 年 4 月，全线分京张（张家口）、张绥（归绥）、绥包（包头）三期建成。当年 9 月 24 日京张段即建成通车。随即开始展修张绥段，但因筹资困难，时值辛亥革命政权交替，又逢军阀混战，工程时建时停，直至 1921 年 5 月 1 日才修到归绥，9 月 1 日正式通车。在归绥通车典礼大会上又决定向包头展建，于 1923 年 1 月修成通车。至此，京绥铁路全线通车，全长 886.16 公里，设大小车站 67 个，成为贯穿河北、山西、内蒙古三个省区，沟通祖国内地与西北边疆的第一条交通大动脉。

京绥铁路通车后，年盈利额曾达 200 万元左右。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统治，经营不善，且因贪官污吏把持路权、营私舞弊，又与外国公司勾结，出卖路权，使刚刚建成的国有铁路濒临倒闭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京绥铁路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没有节假日，而且也比其他铁路工人的工资低，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苦不堪言。从 1921 年开始，京绥铁路工人持续不断地举行罢工斗争，到 1922 年达到了高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绥铁路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是 1921 年 5 月为反对路局当权者违反路章而屡致重大撞车事故而举行的。当时，铁路《行车路签规则》规定，列车交换行车路签，必须由站长与司机直接交换。但是，不少站长玩忽职守，贪图享乐，轻视路章，屡

致撞车事故，司机、司炉十有九丧生，甚至含冤承担肇事之责。铁路工人深为愤怒，自动联合起来向京绥铁路局呈文，据实陈情，要求站长严格照章交递路签，保障安全。但路局置之不理。于是，全路机匠工人举行会议，再次呈请局长维护路章，仍被拒绝。在反复以礼请求未果之下，便举行了全路性机匠工人罢工，全部机车停开，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罢工的要求，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使铁路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京绥铁路在陈世华任局长时期，路政腐败达到极点。他滥用职权，网罗亲信，形成了多达 400 余人的掌握实权的寄生阶层，而且巧立名目，向帝国主义洋行订购大量不急需的车辆和材料，从中索取巨额回扣，造成路局负债累累。陈世华仅向日本三井洋行就订购了价值 2500 万元的机车、货车、铁轨、枕木等，按 15% 索取回扣，共得赃款 375 万元。为了逃避罪责，他不仅给属下分赃，而且向各方行贿。由于陈世华所为，京绥铁路负债达 3600 万元，致使屡屡拖欠工人工资。是年 12 月 10 日，全路工人公举各处课课长出面要求会计处长李懋勋发放 11 月份薪水。李不但不发工资，还恶言辱骂、殴打工人代表，铁路当局又不予理睬。于是，激起了广大铁路员工的极大愤慨。

京绥铁路工人以此为导火线，于 12 月 13 日举行了全路机务工人大罢工，并向交通部控告陈世华、李懋勋的祸路罪行，强烈要求严加查处。当时北京《新社会报》以《京绥路完全停顿》为题，报道了这次罢工斗争。与此同时，罢工工人代表团果断地夺回会计权力，推出临时会计，打开金库，发放工资，并严正宣告：京绥铁路是先辈工人艰难缔造，是我中华民族之骄傲，如今濒于崩溃，完全是一二奸贼之祸，所以不驱逐陈世华决不复工。

北京政府交通部迫于工人的压力，不得已派技监沈琪、司长

祝书之，查处陈李祸路事件。经过查证，陈李在京绥铁路的一切舞弊黑幕全部揭开，给国家和铁路员工造成的恶果大白于天下。面对陈世华贪污祸路罪行，交通部只好以陈世华因病辞职为由，免去其京绥铁路局长职务，由沈琪接任局长。京绥铁路工人总代表通电宣告："驱逐路贼陈李，业已达到目的，所有机车工电各部分公务，一律完全克日恢复原状。此次能得胜利，端赖内外一致。人心不死，公理难逃，谨为我本路同人三呼万岁，总代表林竞叩。"[①] 同时发表宣言，严肃告诫全路工人："自陈李祸路以来，同人含愤忍痛，祸机四伏，早知必有爆发之虞，顾忧苦口进言，冀其悔悟。不谓贪狠之性，习于天成，失节之妇，难言洁贞，忍隐至今，事非得已。此次事虽起于停发工薪，而实际在陈李之破坏路务，不然谁无身家，罔计利害，卵石之喻宁有不知，特以大义所关，难安缄默，是故风声所播，内而员司工役，外则各界同胞，无不一致赞同，共起援助。今者陈李去矣，原状已复，至于违法之约，如何废除，贪赃之罪，如何惩办，残破之局，如何收拾，负责有人，新任将到。同人等既抱牺牲保路于先，今又不能顾堕破甑于后，苦衷惟冀共谅，愆尤尚篆玉中，谨于十二月十八日一致恢复原状，听候长官办理，特此宣告云"。[②] 可以说，这在我国早期铁路工运史也是值得一书的事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对铁路工运的领导，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李大钊，巧妙地利用直系军阀企图以派密查员控制铁路的机会，派中共党员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等，分别到京绥、京汉、京

① 1921年12月19日，北京《晨报》。
② 同上。

奉、正太、陇海等铁路以密查员身份开展工运。何孟雄首先改组了由上层员司把持的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推选工人李连升任会长，何孟雄任秘书；并在京绥铁路沿线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今集宁）、归绥、包头八大站设立八个分会。从此，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绥铁路祸路罪魁陈世华被免职，但祸根并未铲除。他除向日本三井洋行订购车辆外，还向美国太康洋行订购货车 600 辆，价值 230 万美元，除付 40 余万之外，其余全部折成期票，如逾期不付，则付年息 8 厘，付清为止。此外，还七次向他国短期借款达 3000 多万元。在美国太康洋行通过外交途径催债的压力下，交通部总长高恩洪于 1922 年 6 月 12 日，竟与太康洋行签订了以京绥铁路抵押外债的所谓《展期合同》，规定由即日起将 8 厘利息改为 1.2 分，如逾期不付，即增至 1.8 分；太康洋行有权举荐有经验的会计监督车辆应用和收入，对车辆的收入进行专门登记，美国公司的代表有权随时查阅；车辆收入概数的一半，另帐登记，并存入美方指定的银行，如车辆每月的收入不够支付应付欠款，应由其他收入弥补。实际上是由美国太康洋行控制了京绥铁路经营权。

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出卖路权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全路工人的愤慨。在车务工人同人会的领导下，8 月 6 日，召开了铁路工人和员司大会，组织了“救国护路团”，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各站纷纷集会，抗议反动当局的卖国行为。7 日，车务工人同人会派林竞等 13 名代表到北京铁路总局请愿，向交通部呈文，揭露高恩洪与太康洋行所签订的亡路合同，声明“现在该路员司，迫于公义，奋不顾身，对于此项亡路合同，誓死不能承认，内外

一致，万众一心”。[1] 并限在一星期之内，完全取消这项合同。9日，车务工人同人会又发表《京绥路同人会反对交通部丧权之宣言》，陈述京绥铁路的重要性“各路无与伦比”，陈世华祸路罪责难逃，交通部与太康洋行私订合同，实属丧权亡路之举，“京绥铁路为西北各省区命脉，京绥亡，西北各省与亡，而全国也难幸保，务祈同发义声，一致挽救。”[2] 高恩洪不仅没有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诬同人会无理取闹。19 日，全路工务、车务、机务工人及总局员司 600 余人集会，决定如不取消亡路合同，京绥铁路即与交通部断绝隶属关系而独立，并向交通部发出了“哀的美敦书”。21 日，由 500 余人组成的请愿队伍，高举“京绥铁路同人救国护路请愿团”的大旗，举行示威游行，高呼“请求取消丧权卖路之合同”、“请求惩办丧权卖路之高恩洪”、“打倒卖国贼，取消亡路合同”、“誓死不做亡国奴”、“宁为护路而死，不忍偷安求生”等口号。请愿团先后到众议院、参议院、国务院请愿。22 日，请愿团又直奔总统府，陈述请愿缘由，要求惩办祸路罪魁和卖路主使者，京绥铁路要与交通部脱离关系，自行管理。高恩洪调动 200 多名警察和保安队伍，驻守京绥铁路局，企图武装镇压罢工运动。但是，同人会并没有屈服于反动当局的武装恫吓，30 日再次向国会递交呈文，请求依法提案弹劾，以彰法治。与此同时，全国各界联合会为声援京绥铁路救国护路斗争，通电全国，疾呼“京绥路为我国最完全之国有铁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实占重要位置。”“查此种合同缔结之手续，绝对非法，当然不生效力”，“立盼国人详察合同内容，力保交通命脉，一致否认亡

---

① 《高恩洪无地自容矣》，1922 年 8 月 11 日《黄报》。
② 1922 年 8 月 9 日《黄报》。

路合同，及其他借款契约，驱逐奸枭整顿路务”，[①] 表示了对京绥铁路的极大关注。

由于京绥铁路员工的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支持，31日交通部被迫致函美国太康洋行，撤回亡路合同，并惩办了祸路罪魁陈世华，维护了京绥铁路的管理权。这次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在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斗争过程中，何孟雄组织“工人文化补习班”、“工人夜校”，讲解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亲自编出通俗易懂的诗歌和顺口溜，如“工人苦，工人苦，工人裤子破了没人补”、“不做工的大肚皮，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结团体，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我们工人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世界是我们创造的……”，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在工人中流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京绥铁路工人小组也在各站组织起来，并领导车务同人会组织震动全国的车务工人大罢工，这标志着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已经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22年，由于军阀混战，路政腐败，工人们整整八个月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薪，生活苦不堪言。9月19日，新任局长余垿下令给全路员司人增月薪5元，至于对工人所欠工薪也只字未提，更不用说增加工资了。广大工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于是，车务同人会代表全路工人向路局提出发放工人八个月欠薪和增加工资的请愿书。在路局不予理睬的情况下，接连提出第二、第三次索薪请愿书，均被路局拒绝。何孟雄适时在张家口召开车

① 《亡路合同之反响》，1922年9月19日《黄报》。

务工人代表会，决定举行全路车务工人索薪大罢工。经过充分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宣传队、敢死队；拟定了“争平等、争人权、争自由、争待遇”，“工人要有饭吃，不能拿工人当牛马”，“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合法存在”，“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提出七项罢工条件，以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名义向路局呈明：工人一律加薪；节假日上班应发双薪；工人病故发全薪一年，因公身故，发全薪二年，积劳或因公致病告假，不得扣薪；在直奉战争中，工人节假日上班者补发双薪一个月；承认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路局开除工人，须先期通知同人会，以有辩护余地；发给工人与下级员司同样之制服。同时发表《京绥铁路车务工人为罢工告各界同胞书》[①] 和《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宣言》[②] 痛陈工人的疾苦，要求补发欠薪，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以维持活命。10 月 26 日，工人代表到路局请愿，要求在 24 小时内答复罢工条件，否则实行全路罢工。但是又被路局拒绝。车务同人会立即通知沿线八大分会，于 27 日举行了京绥铁路全线总罢工。工人纠察队维持罢工秩序，宣传队讲解罢工原委，敢死队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一切井然有序。

京绥铁路当局惊慌失措，美日等有关国家使领馆也为之震惊，纷纷打电话要求路局保护各该国公司的利益与安全。铁路当局暗中收买工贼，从内部破坏罢工。其阴谋败露后，又派军警企图弹压，结果均被挫败。28 日，交通部总长高恩洪迫于罢工斗

---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京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第 24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同上。

争的强大压力，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利益上对工人作出了一定的让步，罢工斗争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再次取得了胜利。29日，车务同人会发表《京绥路罢工胜利宣言》，肯定了罢工的成果和团结斗争的经验，号召“工友们，我们如果要争生存自由，那就应该大家联合起来，一步二步的向前进呀”，[①] 并宣布即日复工。

这一时期的京绥铁路工人运动，从自发的小规模的斗争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动全国的罢工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工运高潮的组成部分。京绥铁路线有三分之二路段在内蒙古或是临近内蒙古，它对内蒙古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沟通了塞外北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在内蒙古传播了革命思想，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直接促进了内蒙古革命运动的发展，它也是内蒙古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

三、蒙汉各族青年的反帝爱国运动

西方列强特别是有俄、日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觊觎、侵略由来已久，内蒙古各族人民也有光荣的反帝爱国传统。但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人们还未曾从理性的高度加以认识，只停留在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尤其是没有经过历史实践的青年，似乎处在朦胧的阶段。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启蒙，内蒙古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开始成为他们观察世界、认识事物的出发点。沙皇俄国虽然灭亡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

---

① 《京绥铁路罢工胜利宣言》，1922年11月7日《新民意报》。

国的“二十一条”中有五条是针对内蒙古的。因此，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是内蒙古蒙汉各族青年反帝斗争的主要内容。也许这也是内蒙古各族青年反帝爱国运动的特点之一。

砸日资电灯公司是五四运动后内蒙古青年反帝斗争的第一个回合。20世纪20年代，古老的青城呼和浩特还没有电灯，夜幕降临，全城漆黑一片。创办电灯公司，发展电业，是这里的民族工商业者和地方绅商的夙愿。1921年，北京交通系所属蔚丰兴业公司联合土默特旗总管以及绅商等，倡导兴办呼和浩特电业。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便呈报北京政府实业部备案，同时挂出归绥电灯公司筹备处的牌子，在火车站附近买地建厂。就在这个时候，天津买办商人沈文炳（字虎诚）也要在这里开办电业。他与一家日本公司相勾结，接受其资本，在归绥建立发电厂，企图独揽这里的电业，排挤地方民族工业。沈文炳凭借较强的资本实力，抢先购置设备，设计送电线路，栽埋电线杆，开始施工建厂，力排蔚丰兴业公司和地方绅商。同时，在归绥旧城大南街开办电话局，妄图一举垄断这里的电讯事业。于是，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之间的一场明争暗斗开始酝酿。

正在觉醒的呼和浩特蒙汉各族青年学生，对于这场斗争没有等闲视之。沈文炳借助日本资本的威风，在归绥横行一时，在架设电线时不管居民宅院或道旁路口，只要线路经过之处就任意栽埋电线杆；在郊区农田菜园也随意栽埋，而且不准电杆周围一亩大的范围内种菜种田，其态度极端蛮横，引起市民和农民的强烈反感。至于当地民族资本和绅商名流，也对学生暗中施加影响。于是，朝气蓬勃的蒙汉各族青年学生毅然冲到了斗争的第一线。1921年9月间，归绥中学和南高、北高的学生，在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先觉者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

争。他们提出“抵制日货”、“反对日资”、“自己办电厂，不要日本人办”，愤怒地遣责“二十一条”。他们扛着镐头、大锯和各种特殊工具，举行游行示威，揭露沈文炳的阴谋和险恶用心。游行队伍行至旧城大南街时，首先捣毁了沈文炳刚刚开办的电话局，切断通讯联络；接着冲向正在施工的发电厂，砸碎了门窗玻璃，捣毁了急待安装的机器和厂房设施；然后沿着已经架设的送电线路，一根接一根地锯倒或砍倒电线杆，沿途受到居民和农民的热烈欢迎，围观者拍手叫好，大声喝采。沈文炳紧锣密鼓开建的电灯公司，一瞬之间变成废墟，他的电业大王美梦也成泡影，而且灰溜溜地跑到包头避难，随后不认输而又到北京告状。但是，告也枉然，有谁能替小小的沈文炳作主呢？1922年，归绥最大的民族资本商业大号大盛魁，联络各商号集资，终于创办了归绥电灯公司。

这是一场规模不算大，内容也比较单纯的斗争。但在当时的呼和浩特来说是一桩颇有意义的事件，值得一书。它对于蒙汉各族青年来说，算是实实在在的含有反帝爱国内容的斗争，而且斗争的胜利促进了他们进一步的觉醒，在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斗争的胜利，支持了民族资本创办电业的信心，它的直接成果是归绥的民族资本和地方绅商创办了自己的电业。因此，这场斗争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效果。

五四运动以后，大体上每逢5月就组织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正式提出“二十一条”之日），似乎成为呼和浩特青年学生的惯例。他们借此机会举办座谈会，组织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由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这里的青年读书求知的欲望也日渐增加。除了原有三所学校的学生与日俱增外，1922年秋天又设立了绥远师范学校，以适

应教育事业的发展。该校初设两个班，招收了80多名学生。归绥新旧四校在校学生达千余人，比三年前增加了一倍。各学校不仅有学生会组织，还成立了绥远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中也产生了一部分颇为社会关注的风云人物。归绥中学的李裕智、吉雅泰、于存灏、孟纯、霍世休等，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也有云泽、多松年、奎璧、云润、赵诚、佛鼎等，已露锋芒，施展他们的才华，绥远师范学校的范建忠、李子才、刘生璧等也成为核心人物。他们在斗争中团结合作，在丰州滩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表演了一场又一场有声有色的爱国主义剧目。打盛记洋行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幕。

1923年5月，归绥各学校学生会为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5月7日上午，各校学生千余人按时齐集于归绥中学大操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纪念大会。于存灏代表绥远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讲，讲述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的意义，愤怒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径。有的发言者分析了日本侵略者首先染指内蒙古的形势，与会学生群情激愤，反帝口号响彻绥中校园。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示威者手执各色小旗，有秩序地从绥中出发，通过扎塔海河上的牛桥，进入旧城北门，从大北街大南街缓缓行进。游行队伍中不断发出“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关税自主”等口号，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宣传讲演，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一时间全城轰动，商人、市民和围观者，有的听讲演，有的抢传单，有的还插入学生队伍参加游行，爱国之心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形成群众性的示威运动。绥远都统府和归绥县当局面对这一颇有声势的群众性活动，持谨慎态度，只是静观，未加干预，游行示威直到中午时分方才结束。

声势既已造成，影响业已传出，绥远学生联合会决定就势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当天下午，各校学生会组织宣传队，分别深入街头巷尾、商号店铺，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活动。不少学生爱国热情高昂，到处慷慨演说："同胞们！卖国贼袁世凯为了作皇帝，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二十一条如果实行了，中国人不能管中国的国家大事，都由日本人来管，咱们就成为亡国奴了！……同胞们！这丧权辱国的卖国二十一条，咱们绝对不能承认。现在我们一面要求政府不承认二十一条，……一面要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希望大家齐心爱国、不要买日本货……。"[①] 他们还深入商店耐心开导劝说日货商号不要贩卖日货。不少商人被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所感动，客气地接待宣传队，有的商人连声表示："好，我们这儿没有多少日本货，把这点日货卖完了，就不再贩了。"有的说："我们这儿没有日本货，以后也绝对不贩卖日本货，不信，你们可检查检查。"[②] 可是盛记商号却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冷眼相待。因此，打盛记洋行即成为归绥学生这次爱国活动的高潮。

盛记商号座落在归绥旧城大南街南端路东，本名盛兴时，简称盛记。它是凭借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货侵袭内蒙古地区的过程中开办的专营日货的商号。盛记商号资本雄厚，有五间大的铺面，二层楼阁，店面宽敞，装璜华丽；经营绸缎布匹、衣服鞋帽、钟表五金、百货用品、清瓷茶具、文具纸张、糕点糖果、儿童玩具等等，可谓当时归绥城数一数二的

---

① 郝维民：《"五四"到"五卅"时期呼和浩特反帝爱国运动史实札记》，《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 232 页。

② 同上。

百货商号，颇为人们注目，尤其是一应俱全的日货，对当时的爱国学生却十分刺眼。当时，盛记在包头、丰镇、张家口等城市还设有分号，算得上京绥铁路线上的商霸之一。当归绥中学宣传队到达盛记时，不仅经理的态度蛮横，就连店员的面孔也冷若冰霜。学生们，晓以大义，以理相劝，劝其改弦更张，经营国货。该经理极端傲慢地狡辩："我们做买卖为的是赚钱，那一国的货有利，我们就贩卖那一国的货，你们当学生的念你们的书好了，不要管这些闲事。"[①] 这一下激怒了爱国热情沸腾的学生，他们厉声质问该经理："雪耻救国，人人有责，你怎么能说我们管闲事？""'二十一条'如果实行了，中国人就要作日本的亡国奴了，你还是个中国人吗？"这个奴颜媚骨、钱迷心窍的日货商，气急败坏地叫嚷："我是买卖人嘛，我就知道赚钱，我就要贩卖日本货，随你们的便……"当宣传队满腔愤怒地离开盛记时，那个经理还说了一句："哼，看你们能把我怎么了？……"[②] 而且恶狠狠地把传单撕毁，揉搓成团，扔在地上用脚践踏。在这一席爱国与卖国的唇枪舌战中孕育着一场大的斗争，决不会就此罢休。

归绥中学宣传队当晚向绥远学生联合会汇报了在盛记洋行发生的事件，学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对盛记洋行给予应得的教训，以申张爱国正气。随即通知各校学生会，8日上午在归绥中学大操场再次集会。会上，学生代表孟纯等详细说明了盛记洋行对学生运动的恶劣态度，并提出："对这样的卖国图利的奸商怎么办？"与会者同声怒吼："砸"。归绥中学校长祁志厚同情

① 郝维民：《"五四"到"五卅"时期呼和浩特反帝爱国运动史实札记》，《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23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同上。

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在会上讲话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绥远学联决定由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各派4名代表，南高与北高也各派2名代表，先与盛记经理辩理问罪，劝其悔悟，如果继续顽固蛮横，就以武力惩罚。正当行动之际，不料归绥警察局和学务局派员干预，传讯学生代表，要求停止行动。但是，学联不予理会，游行队伍仍按原定计划整队出发，直奔旧城大南街盛记商号，四路纵队，齐集街头，既不呼口号，也不演讲，围观者莫名其妙。当学生代表与盛记经理辩理无效后，突然有30多名身强力壮的学生义勇队，出其不意地冲进盛记洋行的店铺，将玻璃门窗和货架厨柜砸了个粉碎，盛记经理和店员面对来势猛烈、势不可挡的学生，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愤怒的学生们，推倒货架，将货物抛向街头，砸碎玻璃器皿和瓷器物品，把整筐糖果糕点倒在街上任意踩踏，特别是把东洋挂钟、手表扔在街头尽情砸碎，以表示学生是赤诚爱国、清白廉洁的。扔在街头的橡胶儿童玩具被学生们踩得吱哇乱叫，给参加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到半小时，这座象征着日本侵略者威风的盛记洋行，被砸得七零八落。

正在学生们兴致勃勃地砸打盛记日货及其设施的时候，从楼上扔下一座玻璃架装置的珊瑚树装饰品，不巧落在指挥学生的孟纯头上，头部致伤，血流如注。恰好警察局长余鼎铭派一批警察前来弹压学生，可是一看孟纯负伤，怕扩大事态，余鼎铭一反原意，赶忙向学生道歉，并将孟纯送往陆军医院治疗，决定一切费用由盛记商号支付。事遇巧合，学生们暗自发笑。

这场带有偶然而又富有戏剧性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绥远学联为了把斗争引向深入，会同绥远商会联合组织了日货检查团，决定：一、市内商号凡存日货，一律登记

封存；二，各商号如有日本资金，一律交出，听候处理；三，每日派出检查组到火车站检查到站货物，发现日货，予以没收。这一决定也曾付诸实施，学生们尽职尽责，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打盛记洋行的事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在斗争中经受了一次锻炼，而且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了爱国思想。这以后，不少青年在自觉地思考未来，思考人生，甚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离开家乡，奔走各方。

第二节 内蒙古革命新时期的开始

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民族问题纲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党的“一大”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内蒙古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从此也进入了光辉灿烂的新时期，其标志就是有了唯一正确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各民族共同缔

造了祖国的文明历史。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各民族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少数民族还多受一层民族压迫之苦。因此，各民族的命运是共同的，革命的任务也是一致的。在内蒙古地区，俄日帝国主义争相瓜分势力范围，妄图吞并内蒙古；西方美英等列强不甘坐视，也纷纷争先恐后地扩展其侵略势力。清王朝，北洋军阀则相继实行极其残酷的封建统治。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还遭受着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灾难。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使命，把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共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在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同时，又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历史的必然使中国的大地上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它正确地分析了内蒙古的社会状况，破天荒地指明了内蒙古革命的正确方向，坚定地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开始了崭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毛泽东从开始酝酿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时就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1920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探讨建党问题时提出，既要“在中国做事”，也要“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①] 这里既把帮助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帮助国际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又区别于国际革命，把它作为国内民族问题，主张以自治自决的方式实现民族解放。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 页，人民出版社，1983 年。

者首次论及国内民族问题，而且把它与建党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值得庆幸的是蒙古民族与蒙古民族问题成为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

紧接着，在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二大"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把国内民族问题列为大会讨论的重要议程。"二大"宣言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成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内地不同，仍处在原始的游牧经济生活状态之中，既有民族特点，也有地区特点。中国军阀的武力统一这些经济生活与内地不同的少数民族，只能助长军阀在这里扩大地盘，同时"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主张"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既使边疆少数民族摆脱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又可使中国实现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分析，党的"二大"在民主革命纲领中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①] 这是中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74、78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

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体现了毛泽东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考。诞生刚刚一周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科学分析，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在承认民族自决自治权利的前提下，参照当时苏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办法，主张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通过联邦自治解决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党的二大制定民族问题纲领，其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它对于动员国内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民族，为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关注和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支持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的领导之一。1923年1月，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这些解放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他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各民族平等联合。他说："中国的国旗上，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附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而且断言"凡是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论他是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军阀、一个党派、一个个人，没有不归于失败的。”“倘有悍然自大，不顾他人的自由，而横加侵害的，那么他的扩大，即是别人的削小，他的伸张，即是别人的屈辱，他的雄强，即是别人的衰弱，他的增长，即是别人的消亡。一方的幸运，即是他方的灾殃；一方的福利，即是他方的祸患。那么扩大、伸张、雄强、增长、获幸运、蒙福利的一方，固然得了，然而在那削小、屈辱、衰弱、消灭、罗灾、受祸患的一方，其无限的烦冤，无限的痛苦，遏郁日久，亦必迸发而谋所以报复与抵抗。”[①] 李大钊纵论社会问题，既通俗又深刻，而且把民族问题十分贴切地融入其中，对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把民族问题的实质及其重要性，把民族解放的必然性，提示得何等透彻啊！

二、蒙藏学校——内蒙古革命的摇篮

蒙藏学校是北洋军阀政府蒙藏事务局创办的，成立于1912年。意为供蒙藏等少数民族子弟就读的民族学校，座落在北京西城区石虎胡同。始办时只有中学班，学生人数也不过百人，就读者主要是蒙古族学生，藏族学生极少，也有个别通过蒙古上层进入的汉族学生。

以后又设专科，也称蒙藏专科学校。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经费困难而停学。几经周折，于1923年复学。当时曾在蒙藏学校读书的荣耀先，得知蒙藏学校要复学，便回到家乡土默特旗，动员这里的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读书，并与土默特旗总管府交涉，争取经费，接济家庭困难者。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历次反帝爱

① 《李大钊选集》，第415—417页，421—42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

国斗争锻炼的归绥中学、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纷纷响应，报考蒙藏学校。这一年的秋天，归绥中学的吉雅泰、李裕智、孟纯、高喜才等，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多松年、云泽（即乌兰夫）、奎璧、云润、佛鼎、赵诚、高布泽博、朱实夫等，总计30多人报名。他们兴致勃勃地离开自己的家乡，怀着为民族的前途而求知的欲望，奔赴北京。与此同时，内蒙古东部喀喇沁右旗的乌力吉敖其尔（吴献文，又名宝彦陶格陶呼）、王瑞符等，以及哲里木盟的特木尔巴根、乌云珠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蒙藏学校。复学后的蒙藏学校，由于一批正在觉醒的蒙古族青年的入学，显现出勃勃生气。

李大钊及其领导的中共北方党组织，敏锐地发现了这批来自祖国北疆的蒙古族热血青年，便决定开展蒙藏学校的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蒙古民族工作之始。党在北方的一些著名活动家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何孟雄、刘伯庄以及李渤海、韩麟符、朱务善等，先后到蒙藏学校开展革命活动，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问题。他们首先和这些蒙古族学生谈心交朋友，谈个人前途，也谈国家大事，逐步探讨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讲述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揭露北洋军阀压迫蒙古民族的事实，同情和关注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那种朴实平等的态度，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使许多人思想豁然开朗，而且争相介绍内蒙古的历史与现状，诉说蒙古民族的苦难生活，揭露帝国主义疯狂进行经济掠夺，北洋军阀无休止地强垦蒙古族的牧场，夺掠内蒙古的土地，有的蒙古王公与外国侵略者和军阀相勾结，压迫剥削内蒙古各族人民。他们所讲的一桩桩一件件具体事实，加深了李大钊等对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了解。

为了尽快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李大钊等首先着手培

养干部，尤其是蒙古民族干部。1923 年冬天，在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进而在一部分先进分子中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解党的民族问题纲领，给他们阅读《响导》、《新青年》、《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卓有成效地把一批蒙古族先进青年学生团结起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 年冬天，蒙藏学校放寒假以后，云泽、奎璧、赵诚、高布泽博、佛鼎、康根成、常瑞、康济民、张士祥等数十人，因为没有路费而回不了家，只好留校度假。党一方面组织他们到北京师范大学乐群补习班补习功课，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经常围着宿舍里的火炉讨论时局，探讨青年人的前途，更多地还是讨论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这也是这些青年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不平常的寒假期间，云泽、奎璧、赵诚、高布泽博、佛鼎、康根成等，由李渤海、韩麟符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春天开学以后，又有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孟纯、任殿邦、云霖等许多人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建立了团支部，多松年、云泽先后任支部书记。李大钊等成功地把这批蒙古族先进青年团结在了党的周围。蒙藏学校本来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中等学校，可是引起了各种政治派别的重视，除了共产党之外，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到蒙藏学校宣扬其主张，什么江亢虎、吴稚晖等还到该校发表演说，兜售他们的主义，以争夺这批青年。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北京的中共党组织加强了蒙藏学校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有人到该校活动，不时举办座谈会、谈心会、讲演会，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分批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924 年上半年，邓中夏在宣武门内的一座破庙里组

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除了蒙藏学校的多松年、赵诚、佛鼎外，还有其他学校的五个青年，邓中夏亲自讲解《共产党宣言》，还有赵世炎的夫人夏之栩和刘青扬等也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保密和不致引起敌人的注意，人数很少的许多学习小组互不联系，严守秘密。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多松年、李裕智、赵诚、奎璧、佛鼎、孟纯、云泽、云润、吉雅泰等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建立了蒙古族中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多松年任书记。另外，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喀喇沁右旗蒙古族青年白海风、吴文献（又名吴子徵，蒙名乌力吉）等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蒙古族中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在北京诞生了。

蒙藏学校的这一批蒙古族革命青年在北京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受了锻炼。他们参加纪念“二七”大罢工一周年，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等活动。李大钊赴苏回国后组织了报告会，讲述了列宁的生平事迹，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苏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就，引起了与会蒙古族青年们的极大的兴趣。他们向往十月革命，向往社会主义，思考中国革命，思考蒙古民族的解放。1924 年冬天，他们积极参加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各种活动；1925 年 3 月，奎璧、吉雅泰、赵诚、高布泽博以“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孙中山、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他们又参加了北京的五卅运动，并参加组织工作，担任北京学生运动的副总领队，孟纯就是当时北京学联的常委。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学生成为北京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活跃在北京学生运动的舞台上，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5 年初，北京政府竟通过蒙藏院决定取

消蒙藏学校的官费，妄图造成大部分家境贫困学生失学，以遣散正在成长的蒙古族革命力量。时任蒙藏学校校长的章武博士，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一面与当局交涉阻止取消官费的问题，一面筹集资金，甚至变卖学校的破砖烂瓦，以维持局面。蒙藏院竟撤了章武的校长职务，派蒙籍人士金永昌任校长，以图控制局面。中共北方区委识破了反动当局的阴谋，立即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取消官费的斗争。学生们到蒙藏院请愿，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惧怕学生，只好从后门溜走。学生们将金永昌的行李扔出校门，赶出了蒙藏学校。接着又派山东省警察厅长王维翰出任校长，以图武力镇压。但是，王维翰的下场不比金永昌好，也被学生驱出了蒙藏学校。虽经反复斗争，官费仍不予恢复。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为了保护和培养这批蒙古族革命力量，经过与各方面联系，决定分批送他们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广东等地学习深造。1924 年 4 月曾先期选送荣耀先、白海风到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又派王瑞符到第二期学习；1925 年上半年又派奎璧、赵诚、佛鼎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同年冬，又选送云泽、多松年、云润、康根成、荣照等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 年底和 1926 年初，从蒙藏学校和内蒙古三特别区分别选送贾力更、高布泽博、赵文翰、任殿邦、李春荣、麟祥、云继珍等 7 名蒙古族青年和王建功、郭宝安、郭宝山、左天顺、马德照等 10 名汉族青年，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学习；与此同时，又选送云继先、云星槎、荣崇仁、荣尚义、云继章、朱实夫等数十名蒙古族青年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和保护蒙古族革命力量所采取的果断而有效的措施，为内蒙古革命的开展创造了干部条件。另外，根据内蒙古革命斗争急切的需要，派遣吉雅泰、李裕智等回内蒙古开辟革命工作。

中共北方区委培养了内蒙古的第一批蒙汉族干部，为开展内蒙古革命创造了干部条件。

三、内蒙古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代，在内蒙古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于 1914 年和 1915 年先后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这实际上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省、分割统治蒙古民族的前奏。北洋军阀政府任命都统分别掌管三特区的军政大权，三特区的都统府分别设在热河的承德、察哈尔的张家口和绥远的归绥。这三个城市再加上包头，就成为当时内蒙古的政治活动中心。中国共产党首先从这几个城市开始开展内蒙古地区的工作。

1925 年年初，在孙中山先生北上，国共合作发动国民会议运动、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同时，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和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遂派于树德、韩麟符等分赴三特别区指导组建工作。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陈镜湖（字印潭、号小秋，化名李铁然）、杜真生。工委机关设在承德南营子三条胡同上口，公开挂出中国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的牌子，以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这一年的 5 月 4 日，以国民党热河区党部的名义，在承德“演武厅”召开中小学和师范学生近千人参加的纪念五四运动大会，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激发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会后在承德举行了示威游行，在热河地区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中共察哈尔工委由张良翰（又名张次平）、杨洪涛负责。1926 年秋多松年从苏联回国，任工委书记。工委机关设在张家口桥西的一间民房里。在

1922年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党的工作在张家口已有一定的基础，1925年初即建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别支部，王仲一任书记。特支主要在铁路工人和一些工厂中开展工运活动；工委则面向察哈尔特别区城市、农村和牧区的工作，两者各有分工，互无隶属关系。中共察哈尔工委的公开名义是中国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张良翰是区党部执行委员。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吉雅泰（蒙古族）任书记。工委机关设在归绥旧城巧尔气召，公开名义是中国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吉雅泰以区党部执行委员的名义公开活动。工委下辖萨县工委，书记是李端；和林县工委，书记是万寿；武川县工委，书记是温财旺；归绥县工委，书记是赵授恩；土默特旗工委，负责是崇德臣、孙承业。[①] 绥远工委在归绥的工厂、学校及其周围的旗县村镇比较广泛地开展了工作，特别是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共包头工委，李裕智（蒙古族，字若愚）任书记。工委机关设在包头召梁上的福徵寺，公开名义是中国国民党内蒙党部。工委在工厂、学校、军队、商界以及郊区农民中广泛地开展活动，并且对“哥老会”会众进行了争取工作。李裕智多方奔波，筹集资金，在包头大西街租了一处四合院，开办了“明德照像馆”，以此为掩护，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吸收地毯厂、铁工厂、泥木工场、甘草店的工人50余人参加学习，逐步发展了30余名党团员。上述四个工委的建立和党的工作的初步开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从组织上领导起了内蒙古的革命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并于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国

① 吉雅泰：《我的自传》，1956年。

共产党张家口地方委员会，肖三任书记，王仲一任组织委员，江浩任宣传委员。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肖三赴张家口时要求“以办国民党的名义，建立我们党的委员会。现在王仲一、江浩两同志在那里开展工作，在京绥铁路工人中活动，工作有起色。你到那里以后，要尽一切努力，把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壮大我们的革命力量，促进中国革命的成功……同时，要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的工作兼管起来。”① 1926 年初，调肖三回北方区工作，派丁之之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王仲一、江浩任原职，又派王一飞任军委书记，乐天宇任农委书记，张良翰、张书香、卢继亭分别负责国民运动、妇女运动和职工运动方面的工作。在张家口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党的组织系统，在铁路、工厂、学校和军队中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同时积极开展归绥、包头等地的工作。1926 年初，在归绥成立了中共绥远特支，路作霖任书记，杨曙晓任宣传委员；另外，在冯玉祥创办的包头《西北民报》社成立了中共《西北民报》支部，蒋听松任书记，副书记马吉良，支部成员有胡英吉、丁宝铨、刘贯一等。1926 年 9 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建立中共绥远特别区地方委员会，熊味根、路作霖先后任书记，杨曙晓、麟祥先后任宣传部长，路作霖兼组织部长，吉雅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并负责蒙古民族工作，路作霖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杨曙晓任副主任，贾玉琴、李士杰先后负责妇女部工作。地委下属中共归绥县委，路作霖兼任书记；中共归绥县西区委员会，书记王建功，组织部长张文理，宣传部长郝俊文，委员郄敬书。

① 肖三：《挫折》，《塞原星火》第 1 集（下），第 2 页，内蒙古革命回忆录编辑室编，1982 年。

四、革命群众组织与群众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逐步建立了一批各种类型的革命群众组织，为发动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成立以后，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青年工作，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实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青年运动是中共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内容。1925年5月，何孟雄奉派到京绥铁路工作，在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了共青团小组；9月，在建立中共张家口地委的时候也组建了共青团张家口地委，穆秉衡任书记，在铁路、工厂和学校中建立共青团基层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同时协助中共热、察、绥、包工委开展共青团的工作。1925年初，吉雅泰领导的中共绥远工委即在归绥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并发展了赵古铎等五六名共青团员。1926年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员会派路作霖到绥远负责共青团的工作。他以国民党的身份在绥远西北职业学校任训育主任，在该校建立了共青团的活动中心，广泛与青年接触，陆续发展绥远教育厅政报编辑杨曙晓、《绥远日报》社编辑李子光（又名贾一中）、归绥中学的陈国齐以

及张献孟、张国林、崔书铭、丁育文、李福、张国玺、王培治、陈国才等十多名学生加入了共青团，分别成立团支部、团小组，路作霖任归绥团支部书记，受共青团张家口地委的领导。1926年9月，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共青团绥远地方委员会，杨曙晓任书记、组织委员张国林、宣传委员崔书铭、学生部张焕文、刘进仁负责，工人部也由刘进仁主持。以共青团员为骨干的蒙汉各族进步青年，成为促进内蒙古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经过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洗礼的绥远蒙汉各族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绥远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23年，曾领导当时的学生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共绥远工委成立以后，首先抓了学联的工作，完善了学联的组织机构，加强了领导，由共青团员张焕文任绥远学联主席，学联下设总务、交际、募捐、宣传、纠察军等5个股，分别由归绥中学的张焕文、刘进仁、张国林、崔书铭和绥远师范学校的范建中负责，学联机关设在归绥中学。这时，除了原来的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归绥高等小学校外，还有新设的西北职业学校、绥远五族学院、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绥远农科职业学校、绥远工科职业学校等，青年学生的力量增强，学生运动日趋活跃。在归绥声援“五卅”惨案受难者的活动中，青年学生是主力军，是最活跃的力量；在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各项活动中，青年学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是工农大众，党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1925年5月，全国铁路总工会派何孟雄到京绥铁路工作，组织铁路工会和工人

俱乐部。在京绥铁路沿线各大站组建工会的基础上，8月中旬正式成立京绥铁路总工会，王藻文任委员长，李连升、杨干任副委员长，何孟雄任秘书长，会址在张家口，总会下辖8大分会，即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归绥、包头等站分会。在张家口的一些工厂中也建立了工会，还建立了人力车工会，并领导铁路工人开展索薪斗争、电灯厂工人的经济斗争、铁路工人反霸斗争等。在归绥工业不发达，当时仅有几家设备简陋、古老落后的手工业工厂，除了铁路，几乎没有现代企业和产业工人。福绥、福元毛织厂和铸造铁工厂算是较大的工厂，每厂工人也不过二三十人，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工资微薄，生活很艰苦。吉雅泰、路作霖、杨曙晓、彭振纲等党团负责人，深入到工厂、铁路和人力车夫中宣传革命，讲解马克思主义。路作霖是工科大学毕业，懂得一些纺织洗染方面知识和技术，经常到这些毛纺织厂与工人师傅和徒工讲这方面的技术，密切了与工人的关系，在福绥毛织厂发展了钟舍声等六七名团员。在福元毛纺厂也以同样的办法开展工作，发展青年团员。尔后依靠这两个厂的工人和徒工，在翻砂厂、铸造厂、造纸厂、毛单行等工厂企业进行了工作。在这些工厂、作坊的工人中成立了秘密工会。

1925年寒假和1926年暑假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归绥的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分别在归绥小学和民乐剧社组织了两期工人夜校，给工人讲政治教文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绥远的党团员负责人既是工人夜校的组织者，又是工人夜校的教员；青年学生中的党团员是工人夜校的组织者。刘进仁任工人夜校的校长，张焕文、张国林任主任，丁育文、崔书铭任教员。在归绥高等小学校举行了工人夜校开学典礼，并请该校校长任工人夜校名誉校长。路作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激发了工人的

主人翁思想和革命积极性。工人夜校的创办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夜校每晚上一至两节课，既学政治也学文化。在夜校的学员中先后发展了 20 多名团员，在工厂中成立了团支部和团小组。在京绥铁路工人中也积极开展工作，归绥火车站的机务段、工务段和车务段是开展工运的重点，培养和发展了一些团员，他们为掩护革命同志的往来和传送文件、传单、刊物提供了方便，保证了安全。1925 年末，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交战，京绥铁路饱经战争灾难，铁路工人两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工人生活极度困难，路局却不予理睬。中共张家口地委和京绥铁路总工会及时发动了铁路工人索薪运动，提出按时发放工资，保障工人工作安全，改善福利待遇，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要求。在京绥铁路系统和社会上广泛宣传此次索薪运动的理由和目的，并组织和训练纠察队，以维护运动的秩序和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在京绥铁路各次列车上遍贴索薪运动的标语，并向冯玉祥的西北督办公署发函说明运动的缘由，要求督办公署的帮助。包头、归绥车站首先举行了罢工，沿线各站大有响应的趋势。由于声势浩大的索薪运动，迫使京绥铁路当局电邀工人代表赴京谈判发薪事宜。京绥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藻文在纠察队的保护下，毅然赴京谈判，经过三天的据理力争，京绥铁路当局答应了发薪要求，索薪运动取得了胜利。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李大钊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曾发表《土地与农民》这篇文章，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能组织浩大的农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分析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必须实行“耕地农有”的政策，而且“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力量以为之完成”。1926 年 9 月 1 日，毛泽

东著文《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根本倒塌"。无疑，内蒙古地区的农民问题当然也是内蒙古革命的中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把农村工作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深入农村、教育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中共绥远特别区工委以中国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名义，把党团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召集到巧尔气召，宣讲农民问题，研究农运工作，并派到归绥周围农村和土默川，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调查研究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对土豪劣绅进行初步的减租斗争。中共察哈尔、热河工委也积极开展农村工作，为发动农民运动创造条件。

为了全面发动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工委于 1926 年 5 月选派 17 名蒙汉族青年学生到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中热河 4 人，察哈尔 5 人，绥远 8 人。5 月 3 日开学，学习了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法律、工运、农运等 25 门课程，并进行了军事训练，到农民运动高涨的韶州、海丰实地考察实习，9 月 11 日毕业。毛泽东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恽代英讲授《中国史概要》；李

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毛泽东主持了这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内蒙古地区的这批学员毕业后即回到各自的家乡，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投身到正在兴起的内蒙古地区农民运动高潮之中。

1926年，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日渐高涨。绥远特别区以归绥为中心，东到丰镇，西至萨拉齐，建立了部分县级农民协会，普遍建立了区、乡、村农民协会。绥远特别区农民协会会长是国民党左派人士李正乐担任，国民党左派人士李致方任归绥县农民协会总干事，共青团员杨植霖任秘书。两级农会设在归绥旧城南龙王庙和三关庙。据1926年6月统计，在察哈尔特别区也有区级农民协会1个，会员600人；热河特别区有区级农民协会5个，会员达2200人。[①] 是年10月，三特别区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青年，均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当地从事农民运动工作。贾力更、王建功、高布泽博、麟祥等回到绥远。麟祥留在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任农民部部长，其余人员深入到农村开展农运。贾力更、王建功在归绥以西毕克齐、兵州亥一带发动农民，扩大农会组织，开展反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斗争。高布泽博在察素齐、萨拉齐一线开展农运。他们发动农民给土豪劣绅按劣迹排队造册，准备斗争，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向神权、族权和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等发起进攻，捣毁了毕克齐的耶稣教堂，反对神官巫师装神弄鬼，违者游街示众。在农村掀起了向封建势力冲击的热潮。在中共包头工委、国民党内蒙党部李裕智的领导下，主要在包头周围以农民为主的“哥老会”会众中进行工作，以配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

合归绥一带的农民运动。当时有数万“哥老会”会众响应农民运动的口号，形成了巨大的农民运动势力。中共热河工委、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在陈镜湖的领导下，在承德、建平、赤峰、平泉、开鲁、林西、围场等县农村中广泛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进行了多次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建平、赤峰等县的反苛捐斗争最为激烈，平泉县还进行了反烟捐斗争，捣毁了税捐局。中共察哈尔工委、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在张良翰、杨洪涛的领导下，主要在察北一带内蒙古农村组织联庄会，曾率领1500多武装农民，夺取土豪劣绅的粮食，开展夺粮斗争，在农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直到1927年，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1927年1月“绥远——加入国民党党员共3600余人，其中以农民为最多。”[①] 可以判断，这些农民党员基本上是农民协会会员，当然也还会有非党农会会员。据是年7月统计，热河特别区的县级农会有9个，区级农会有13个，乡农会31个，村农会35个，会员发展到了5423人；察哈尔特别区也有1个县级农会，区农会4个，村农会82个，会员仍然600人。[②] 从这些零星片断的资料，也可以看出，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

五、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内蒙古的一批蒙古族青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一次又一次反帝爱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到北京蒙藏学校求学之际，幸运地很快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懂得了中国革命的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39页。
② 同上，第19页。

道理，不少人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得到了升华，对内蒙古革命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是他们革命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飞跃，是一次质的飞跃。这在他们创办的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在内蒙古的一批蒙古族年轻的革命者健康地成长起来之后，为了向内蒙古各族人民宣传革命，发动民族民主解放斗争，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由他们自己创办一个独具风格、而且以内蒙古的实际为内容的革命刊物。其主办者是多松年、云泽、奎璧等。经过再三斟酌，刊物起名为《蒙古农民》。

《蒙古农民》第一期出版日期是 1925 年 4 月 28 日，这也是创刊日期。《蒙古农民》是用蒙汉两种文字题写刊名，64 开本，每期 15 页左右，封面注明每份售铜元两枚，农民半价，联系是北京蒙藏学校奎璧。出版期数说法不一，目前只在中央档案馆存有第一、二两期。从这两期看，内容丰富，主题鲜明，题材多种多样，语言通俗流畅，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而且有各种醒目的栏目，诸如“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等，读起来格外新颖感人。

《蒙古农民》的办刊宗旨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结合内蒙古的实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以《开篇的话》为题，只用 16 个字，即“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开宗明义地宣布《蒙古农民》就是要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为宗旨，揭露军阀、王公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三者是蒙古农民的仇人。内容虽重大深刻，表述却简洁鲜明，实在是绝妙之作，也可以说是《蒙古农民》的发刊词。

《蒙古农民》的第二篇文章以《为什么出这个报?》为题，具体而深刻地阐明了军阀、帝国主义、王公是蒙古农民的仇人。文章开头介绍了内蒙古的地理范围，即“在中华民国北部地方，外蒙古的南边，有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和西套蒙古(指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这些地方共起来也叫作内蒙古。”接着，以“三个坏命运”为内容，诉说了内蒙古农民的悲惨处境，揭露了军阀、王公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一个坏命运就是军阀的压迫掠夺给内蒙古农民造成的苦难。内蒙古是“各派军阀的战场。这些军阀，你去我来，连年打仗”，“弄得死尸遍野，烟苗遍地，土匪蜂起”。1920 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直皖战争之机，联合直系，推翻皖系段祺瑞政府而把持了北京政权，次年就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别区都统。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败回东三省；1924 年又打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又打到关内，再次把持了北京政权。在第三篇文章《直奉打仗内蒙农民遭殃》中，分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揭露军阀对内蒙古农民的掠夺、践踏和屠杀。1924 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奉系军阀为备战，内蒙古东部热河一带“满田的高粮（粱)、谷子，全让大兵给喂马或践踏了，农民受尽一年血汗痛苦，结果一粒未得。新的粮草虽然未得，但旧有的粮草，尚不能自用，全让‘支应局’（为军队预备粮草的机关）给‘号’去，为两方军队预备粮台”。粮草被搜刮殆尽，“地方官又下了派官人派官车的命令，逃亦不能脱。人摊官差，就给军队运粮运草，担的担，抬的抬，甚且拉农民来掘战壕，在前线作苦工。要是摊官车，更须自备草料，往前敌运大兵，运粮草”，总之，农民“就得老实老实受军阀的宰制。”战争爆发后，战争前线的‘男女老幼，全弃家逃走。留下的家宅，有的变为兵营，有

的被炮火打完，有的被大兵烧成灰土。”即使离前线稍远的地方，粮草被大军吃尽，农民饥饿而死者遍地，壮年被拉去“与军队运子弹，掘战壕”，甚至发给一支枪，驱上前线打仗，其实“无所谓打仗，只是送死”而已。战后农民苦不堪言，热河变成奉军的地盘，就连当地的民团也被以助直打奉的罪名，“将民团团丁惨杀很多，将团丁枪械又收为己有”，“又强迫多种鸦片，多收烟捐，以图肥己”。除奉军践踏之外，直系降军万余“没有军饷，所以散布各农家，养着这些降队，每家至少养着三五个兵。”农民自己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何以养得起这么多大兵？由于战乱所致，金融紊乱，乱发票纸，物价飞涨，商业倒闭，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更是惊人的。“强而且壮的男子，即铤而走险，聚而为土匪。妇人孺子，饥饿而死或自杀的，更是多而且多。”为了让人们思考，还以标题字号醒目地单独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听说热河地方，一棵树上吊死了七个人，这是因什么缘故？”为了揭露奉直军阀一丘之貉的本质，第二期发表《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一文，指出“这次吴佩孚打了败仗，热河归了奉天管辖，听说现在热河的百姓很盼望吴佩孚来赶奉天，嗐！错了，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也是坏东西！上次打仗糟踏热河，吴佩孚就是一个大罪人”，“热河地面在吴佩孚手中的时候，他就是加重厘税苦害百姓的东西！我们早已尝试过他的利害了。因此，我们才说吴佩孚并不是好人。”文章还指出：“我们应自己结合起来要求取消一切不正当的厘税，才是好主意呢!”“所以说老百姓自己结合起来干吧!”《蒙古曲》是以打油诗，幽默而形象生动地揭示问题的栏目。其中一首诗写道：“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如此鲜明、生动、准确地揭示直奉军

阀混战的本质及其给内蒙古人民带来的灾难，指出靠自己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得解放的真理，真不失为是佳句、绝句。

蒙古农民的第二个坏命运指的是蒙古王公的专制压迫。在《为什么出这个报?》中指出："蒙古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有王公是第一号的大地主，所有农民，都是王公的农奴。"蒙古王公是全旗的专制统治者，但这时已不完全是全旗土地的所有者。由于清末和北洋军阀大兴蒙垦，蒙旗可耕土地大半已垦种，许多耕地的所有权已落入汉族地主、军阀和垦务公司之手，当然蒙古王公仍然占有大部分。不管由谁占有，他们都是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蒙汉各族农民。同时，蒙古王公对蒙古族农牧民仍然是封建特权统治者。《蒙古农民》第一期发表了《可怜的蒙古"奴才"的谈话》，以揭露王公的特权统治。这个奴隶一开口就心酸地诉说："咳！我是一个孤苦零丁，给王公作牛马，受专制压迫的蒙古人。我所受的痛苦，……告给你们，并告给同我一样受罪的蒙古人。"他讲述他家世代受王公压迫的苦难史。他的父亲是王爷的奴隶，听人说在他5岁的时候，他父亲失手打烂王爷的一个茶碗而被王爷活埋了，母亲悲痛不已，不到半年就死了，后来他自己也沦为王爷的奴隶。有一天晚上，他给王爷脱靴子，用劲稍大了一些，"王爷就大怒起来，照我脸上打了一个抖嘴说：你不用当我的奴才了。第二天就派了些如狼似虎的一班奴才，去我家中将我牛羊尽行赶走，又把我的房子土地也归公（没收）了。我搬了好些人，给王爷讲情，王爷一声一个不成，我知道是无望了！只好是再寻生活吧。"从此，他醒悟了。说他"居然把从前甘心受王爷压迫的头脑换了过来，才知道蒙古人不应该头上有王公，不应该受王公的专制压迫！"他说："我想蒙古人中，象我一样受痛苦的人多得很，我很盼望你们快些醒

悟，一同联络起来打倒王公！得到平等的快乐！起来干哟！”短短数百字的文章，通过一个奴隶的诉说，把王公与蒙古族人民的阶级关系讲得如此透彻，寓道理于故事之中，而故事又那么逼真，凡受过王公压迫，或目睹过王公压迫的蒙古人，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没有不动心的。为了破除迷信，冲击神权，还以《佛神并不灵》为题，讲了一个蒙古人“拉了20头骆驼，带了430两白银”，到五台山磕头拜佛，“磕完头把一切牲畜银两都施了佛爷，回家没有盘费不得不讨吃了”的故事，说明佛神不但不灵，而且“马上就让你当乞丐”。同时，又以《喇嘛应该娶媳妇》为题撰文，猛烈抨击了喇嘛教对蒙古族人民的毒害。总之，从各方面向王公封建势力挑战，向束缚蒙古族人民的封建思想和旧礼教进攻，倡导解放思想，唤起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意识。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给蒙古农民造成了第三个坏命运。在《为什么出这个报?》中指出：“近年来外国资本家与教徒勾结本地士绅与王公，组织大垦务公司，霸占国土……。”当然，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并非近年来的事，侵略的内容也并不限于掠夺土地。但侵占土地，最终要把内蒙古吞并，是其最主要的目的。国土沦亡，一切权利将尽丧，这是蒙古农民三个坏命运中最坏的一个。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又以《听差的讲演录》为题补撰了一篇短文，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职员，站在街头大声疾呼：“国可要亡，请诸位别走……”，于是发表反帝救国的演讲，他回顾了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在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帝爱国的情景，热烈鼓动掀起新的反帝斗争高潮。他大声呼唤：“此次五七（日本侵略者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快到了，游行，如同长虫一样，学生在前头，市民在后头。学生不怕，学生不走，鄙人敢代表。”“学生，在校是学生，到了街上，是教市民救

国的好教员，千斤重任，在学生身上，光市民不行，光学生也不行（人少）。如此看来非学生教市民不可，好在不忙，也别停着，一点一点的干，国一定是救得了的。”是的，《蒙古农民》的创办者们就是学生，就是五四以来冲锋在反帝爱国斗争前线的学生。他们讲的就是自己的事情，讲的就是自己的心里话，讲的如此朴实无华，感人至深，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蒙古农民》通过讲述蒙古农民的三个坏命运，十分贴切地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最后又是以《蒙古曲》中的一首诗形象地概括了这三个坏命运：“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

《蒙古农民》还正确地阐述了蒙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使命。在《为什么出这个报?》中指出：内蒙古的农田，“现在有蒙汉人民在那里共同耕种着。这个地方的蒙汉农民是很可怜的，用血汗种出来的粮米，每年被军阀分肥一大部分，还有被蒙古王公分肥一大部分，农民剩下的不够吃穿。”《蒙古曲》中的一首诗，把蒙汉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共同任务作了更加形象生动的描述“从前是：‘穷蛮子（指汉族），富鞑子（指蒙古族）’，现在穷成一家子。蒙古蛮子一家人，亲亲热热好兄弟！来！来！来！蒙古蛮子成一气，共同打倒大军阀！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共同打倒王公们！平平安安过日子。”这是对内蒙古蒙汉民族关系史的写照，是对未来事业的启迪。

《蒙古农民》还有一个栏目“外蒙古人民的生活”，主要介绍人们关注的外蒙古革命后的情形。这两期中共发表了两篇文章。在第一期《外蒙古情形的开篇话》中，首先把革命胜利后的外蒙古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与“正受军阀、王公和洋人的欺负”而

处在苦难中的内蒙古作了对比，在回答对比差异的时候指出："这里面没有什么深奥的妙理……内蒙古人受苦，并不是内蒙古人民的命运不好，更可知道外蒙古的人得享福，也不是天上的什么神什么佛爷王爷赐给他们的。"在《外蒙古的情形》一文中回答：外蒙古从前象我们内蒙古一样，受王公的欺压、中国军阀的欺压，后来更受俄国白党的压迫，外蒙古几个志士，跑到苏维埃俄罗斯去求救，苏俄允许了他们的请求，出兵把白党打平，扶助蒙古的革命党又打倒了王公，组织了一个独立政府。这就是答案。内蒙古人民也要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和王公，也要走这条路。这就是出路。

第三节　内蒙古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内蒙古地区中国国民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外有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列强，内有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买办势力，无产阶级要推翻这两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必须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因此，中共三大作出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

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推动、帮助，孙中山先生在1923年底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准备工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主张，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和政治基础。这次大会及其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它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宣言还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①] 从此，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统一战线的形式，广泛发动工农群众，组织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族人民，掀起中国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高潮。

为了推动北方的革命运动，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应李大钊的邀请宣布北上，发表北上宣言。中共北方区委和各界进步势力热烈欢迎孙中山北上，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欢迎活动，支持孙中山倡导召开国民会议，掀起促成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3月，孙中山、李大钊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中共三大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并加入"；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的决定，帮助孙中山先生在北方建立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共同发动北方的革命运动。从此，中国北方的革命运动也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形势。

这时，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内蒙古的热、察、绥三特别区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公开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开展革命工作，发动革命运动。北方区委派韩麟符、于树德、陈印潭、杨洪涛、吉雅泰、李裕智等一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分赴内蒙古各地，组建了中国国民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内蒙古四个党部。热、察、绥三特别区是北洋军阀在民国初年宣布建立的省一级行政单位；内蒙古作为蒙古民族聚居的行政区域仍然存在。所以，上述四个党部实际上是省一级的党部。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它只在全国 14 个省区建立了省级党部，当时内蒙古就占有 4 个。这就足以说明内蒙古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而且在国共合作中占有特殊的意义。就地理位置而言，内蒙古北邻苏俄、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取得苏俄支持的特殊方便的条件；就政治形势而论，中国军阀在这里的势力相对薄弱，而且已经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以西北边防督办坐镇张家口，控制着内蒙古三特别区大部分地区。1925 年初，李大钊应冯玉祥将军之邀，亲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共同发动北方革命问题，之后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派大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工作，积极促成 1926 年 3 月冯玉祥访苏。张家口成为开展内蒙古热、察、绥三特区革命的重要基地，一度成为内蒙古革命的指挥中心。

中国国民党热河特别区党部是 1925 年初，韩麟符、陈镜湖前往组建的，党部设在承德南营子三条胡同上口。陈镜湖打入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军队中，获得一席军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

位，在军队中，在社会上可以公开活动，与军政界建立了联系，创造了发展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到1926年初，热河特别区已建立县、市党部8个，党员3500余人，其中农民党员占80%，蒙古族党员占30%。[①] 国民党察哈尔特别区党部是张良翰、杨洪涛组建的。张良翰是蒙藏学校少有的几个汉族学生之一，是内蒙古卓索图盟人。他在蒙藏学校接受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初，察哈尔特别区已建县、市党部6个，党员3200余人，其中农民党员占80%，工人占5%，学生占10%，士兵占5%。[②] 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是李大钊派于树德帮助吉雅泰组建的。吉雅泰利用家乡的诸多关系，很快打开了局面，在归绥旧城巧尔气召建立了党部，公开开展活动。到1926年初，建立县、市党部11个，区党部53个，区分部284个，党员3600余人，农民党员占80%，工人占3%，商人占4%，学生占8%，兵士占2%。[③] 1927年初，国民党从武汉派来冷岗峰，改组了绥远党部成员，中共方面有路作霖、麟祥、刘进仁，国民党方面有冷岗峰、纪子明、焦子明，共由6人组成。内蒙古党部是李裕智在包头组建的，是中国国民党专门从事蒙古工作的党部，党部设在包头召梁福徵寺喇嘛庙上。1926年初，建立县、市党部6个，党员2100余人，党员中农民占60%，牧民占20%，兵士占10%，学生占10%。[④] 内蒙古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四个党部及其活动有几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热河、察哈尔、绥远、内蒙党务报告》。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热河、察哈尔、绥远、内蒙党务报告》。

个特点：一是这四个党部完全由中共北方区委派人组建，初期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而且中共内蒙古地区的四个工委分别与其是一套人员两个机构，1926 年 10 月以后国民党方面才派人参与，并从当地国民党员中选择一些人参加领导；二是这里国民党的活动以农村为主，农民党员占多数，而且也有一定数量的蒙古族农牧民党员；三是国民党、农工兵大同盟、农民协会的组织相互重叠，党员、盟员、会员也相互穿插，身份重叠。

1926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热、察、绥三特别区和内蒙古党部代表韩麟符、陈印潭、吉雅泰、李裕智等出席。1 月 16 日，李裕智在会上作了内蒙古党务工作报告，韩麟符作了热、察、绥三特区党务工作报告。他们全面介绍了内蒙古三特区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介绍了中国国民党在蒙古民族中的工作以及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合作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方针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蒙古民族问题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继毛泽东之后，对蒙古民族问题发表了重要的议论和主张。1924 年 9 月 17 日，陈独秀在《我们的回答》[①] 中反驳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攻击时说："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他结合

---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 576 页，三联书店，1984 年。

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指出："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陈独秀还用国民党一大宣言"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的主张进行驳斥。1925 年 3 月，李大钊专门发表了《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①] 一文，论述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文章虽然是着重以外蒙古的革命为例而论述了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但是，当时内外蒙古的蒙古民族问题的实质和民族解放是一致的。李大钊深刻地分析了我国蒙古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揭露清王朝"外既不能抵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中国，内复以种种手段防制境内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其对蒙古民族，纯用藩属政策，以笼络其王公及喇嘛，沦蒙古民族于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蒙古王公的封建制度、喇嘛教的愚民剥削四重压迫之下，而未由解脱。"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继承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于是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他热情赞扬外蒙古通过革命摆脱上述四重压迫，获得了民族解放。接着，他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援引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9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的主张，宣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李大钊指出：“中华民国与蒙古民族结合，即以此数语为枢纽。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即以此数语为汇归，”点明了蒙古民族解放的运动与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强调蒙汉“两民族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提携共进”，“严密的监视顽暴军阀之以旧日藩属征服的手段，施之蒙古民族，以防诱起国内民族间的嫌怨与纠纷，而为虎视于旁的帝国主义者所利用。”李大钊深刻地揭示了蒙古民族问题的实质，阐明了蒙古民族的解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了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第一次对蒙古民族问题的全面论述，也是具体指导内蒙古革命的方针。

1925年9月，在全国大革命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就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议，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会议特地作出了《蒙古问题议决案》，这是指导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性文件。《议决案》一开头就指出内蒙古地处祖国的北疆，“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而且特意指出“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了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这是领导内蒙古革命需要十分注意的问题。《议决案》分析了内蒙古的阶级关系、革命形势与内蒙民族解放运动与全国革命的关系，分析了革命运动中蒙汉民族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指出：“我们的党应

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系指汉族——引者）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等，同时却不应当掩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农工兵大同盟，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议决案》还从内蒙古革命中的民族特点出发，为了充分发动和领导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提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引者），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职任。”而且指出：“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① 应当说，内蒙古革命、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指导方针，内蒙古革命的高潮必将到来。

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建立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蒙古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向我国蒙古地区扩展势力，妄想吞并这块地区和灭亡蒙古民族；清王朝和北洋军阀对蒙古民族的压迫剥削越来越严重，蒙古民族濒临民族灭亡的境地；蒙古王公中的一部分人则与国内外敌人相勾结，成为他们侵略、压迫、剥削蒙古民族的社会基础。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20世纪开始以后，蒙古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和先觉者，无不考虑民族的出路和前途。但是，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4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平均地权，建立民国”16字纲领中“驱除鞑虏”这一狭隘民族主义的主张，使蒙古民族失望；辛亥革命后，蒙古民族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蒙古民族仍然挣扎在苦难之中。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科学主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外蒙古人民革命的成功，以及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蒙古民族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特别是一大批蒙古族知识青年，重新思考蒙古民族问题和民族的出路，一些蒙古族农牧民运动领袖也卷入了这一潮流。蒙古民族要解放，要成立一个领导民族解放的政治组织，成为他们的共识和共同的愿望。为此，他们从各自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出发，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探索，最后走到了一起，共同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当时在内蒙古追求民主解放的政坛上颇有影响的蒙古族人士有恩克巴图、白云梯等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毅然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他们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并决定参加北京执行部的工作。1924年底，白云梯随孙中山北上，发动国民会议运动。他在北京又联络了乐景涛、金永昌、李丹山、包悦卿等蒙古族社会人士，并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筹组内蒙古国民党，而且专程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考察，也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发生了联系。这是中国国民党方面支持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一部分蒙古族社会知名人士。郭道甫、福明泰则是呼伦贝尔达斡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称达呼尔蒙古。他们在呼伦贝尔地方发动青年运动，1917年组织了呼伦贝尔学生会，20年代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呼伦贝尔青年党，其主旨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解放。1923年因黑龙江省和呼伦贝尔当局对他们的不满，郭道甫带领一些青

年学生到达北京，福明泰也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郭道甫在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学校读书，兼作蒙藏学校教员。是年，因为蒙藏学校招生而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还到苏联进行了考察，与苏蒙方面建立了联系。回国后便与白云梯一起筹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伊克昭盟札萨克旗"独贵龙"运动首领旺丹尼玛活佛虽在北京被软禁，但也随时与在北京的蒙古人联系，并密切注视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动态，甚至派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隐居在北京雍和宫的伊克昭盟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首领锡尼喇嘛，一刻也没有忘记重振旗鼓的念头，而且与旺丹尼玛不时联络，共商对策。他们也与白云梯、郭道甫等发生关系，就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组建蒙古民族解放政党问题取得了共识。

中国共产党对于组建内蒙古蒙古民族政党的问题给以极大的关注。国共合作形成以后，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北京，在国共合作发动国民会议运动之际，李大钊与孙中山对蒙古民族问题以及组建蒙古民族政党问题也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孙中山组建北方国民党组织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和指导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除了发表对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之外，积极发动和组织蒙藏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荣耀先、李裕智、吉雅泰、多松年、奎璧、佛鼎、乌兰夫、王瑞符、特木尔巴根以及在北京的蒙古族中共党员白海风、吴文献等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筹组活动，而且同共产国际协调了行动。这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诞生的政治灵魂，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基本上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由共产国际组建起来的。

1925 年初，正当孙中山、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会聚在北京的上述蒙古族各方

面人士，借国共合作发动国民会议运动之形势，频繁聚会，热烈探讨召开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和成立内蒙古国民党的问题。最初，由孟尔司（即郭道甫，应为墨尔色）发起，策林栋拉巴（即白云梯，应为色楞东鲁布）任会长，组织了“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1] 乐景涛（母龙格，即穆荣嘎）、李丹山（满达拉图）、金永昌（阿拉腾）、包悦卿（蔡巴彦，即色音巴雅尔）以及奥齐罗夫（华旗尔，即敖其尔）等为会员，发出了《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布告》。这是筹建中的内蒙古国民党的雏形。

同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也称“内蒙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2] 50余人出席大会，讨论通过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宣言》。[3] 宣言首先声明“兹于本年1月13日，我内蒙所有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锡林果勒、伊克昭、乌兰察布6盟，及察哈尔、呼伦贝尔、齐齐哈尔、阿拉善、额济纳、西土默特等处蒙人代表，在北京开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我内蒙如何革新之问题，咸以为非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绝不足以解决此等重大问题，尤以为非议定内蒙自治事宜，绝不足以筹画其善后办法。今将其详细理由，郑重宣言……”接着分6个方面阐述了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的理由，并宣布了大会所讨论的6项基本主张：“一、内蒙地方自治事宜，以讨论内蒙各旗之政治组织，俾适於民治趋势为范围；二、对于内蒙王公，采取和平态度，以立宪之方法，谋各旗政务之折中革新；三、对于内蒙宗教方面，采取信教自由之大义，以

① 日本国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6—1—2—1—14。
② 同上。
③ 同上。

保护个人之人格；四、对于居住内蒙古区域内之汉人，竭力合作，以保障其权利；五、拥护五族共和，以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六、对于国内任何方面，凡表同情于内蒙地方自治事宜者，均可接近之。”同时制定了《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组织大纲》。为讨论内蒙古地方自治事宜，决定在3月15日以前在北京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凡年满20岁以上的内蒙古的蒙古族不分男女均有被选为代表的权利，还分配了代表名额，由15名行政委员组成筹备委员会，办理一切行政事宜，推选白云梯为委员长，郭道甫为副委员长。

这次大会按照上述基本政治主张的原则，以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致内蒙王公书》，陈述了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的缘由，分析了内蒙古、全中国和世界形势，阐明了民主潮流的趋向和保障“内蒙民族上土地上权利上”之安全的主张，指出蒙古王公贵族只要赞同和支持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为实现上述政治主张出力，即可恢复他们在蒙古民众中的信用，保存其现有的权势，消减蒙古民众对其怨恨及其将来的危险，要求蒙古王公贵族为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设法宣传，设法筹捐经费，设法劝导各蒙旗选派代表参加大会。

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这是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它是在国共合作发动国民革命的形势下形成的，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蒙古民族各方面的革命志士，为实现内蒙古自治，振兴蒙古民族，会聚一起，精心探讨，并作出相应的决定，这是内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大会的基本主张是在拥护五族共和，巩固中华民国的基础上实行内蒙古的地方自治，而且主张蒙汉合作，权利平等，并与同情内蒙地方自治的国内各方面取接近

之态度，这是正确的。当然对蒙古王公贵族以和平的革新方式进行联合，这或许是出于初期的策略，或许内部有不同的看法而正在进行探讨。另外，原定3月15日以前即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未能实现。这与3月1日至4月16日，孙中山、李大钊在北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与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不无关系。在北京的内蒙古各方面人士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和哀悼孙中山先生逝世，接着又爆发了五卅运动。因此，在北京没有如期甚至延期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决定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10月27日，经徐谦和李大钊介绍，冯玉祥会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以后经徐谦、于右任等多次奔走，促成苏联派顾问团帮助国民军训练军队。1925年1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出任西北边防督办；3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张家口会晤冯玉祥；4月苏联顾问团到达张家口，开始组织军事训练。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等地开设干部学校、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和钢甲车教导团等。冯玉祥倾向国民革命，并控制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这给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始发动革命运动。

7月间，内蒙国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白云梯、郭道甫等，先后从北京到达张家口，筹备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齐罗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人李大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以指导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在是年3月专门发表了《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9月中共中央作出《蒙古问题议决案》，特

别提出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因此，当时内蒙古地区的环境和形势，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的态度，以及对内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认识，宣传组织工作的准备，都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0月13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来自内蒙古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6盟，察哈尔、归化土默特、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阿拉善、额济纳、厄鲁特、青海等盟部旗蒙古民族中有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约百名代表出席大会。还有一批来自北京和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也列席大会。共产国际驻内蒙古代表奥齐罗夫、中国共产党代表江浩和王仲一、中国国民党代表李烈钧、冯玉祥国民军代表察哈尔都统张之江以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丹巴道尔计等出席大会祝贺。

内蒙古的蒙古族革命者和有识之士会聚一堂，放眼全国，着眼内蒙，拯救国家，振兴民族，成为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他们深刻地分析研究了内蒙古的政治、经济状况和蒙古民族的境遇、蒙汉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意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定了党的纲领，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和决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通过并发表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体民众宣言书》。[①] 这是全面反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宗旨、纲领和方针政策的文件。

宣言称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内蒙古大地放射出的振兴民族的曙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6-1-2-1-14（蒙文原件）。

一、宣言对内蒙古的历史与现状作了简明而透彻的分析，指出蒙古民族受民族压迫年久，曾期望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实现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和民族振兴，不料民权被军阀窃夺、国家被军阀分割，军阀的专制压迫代替了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二、宣言指出，中国军阀在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相互混战近 15 年。外国帝国主义是军阀混战的教唆者、挑动者和得利者，而中国人民则是受害者和蒙难者。只有苏联和革命的外蒙古，才是被压迫弱小国家的朋友。

三、宣言特别分析了汉族人民在军阀专制统治下，饱尝苦难，尤其是军阀混战造成的灾难更加深重。为了振兴国家，拯救民众，只有彻底完成 1911 年的革命才有可能。虽然国内外反动派随时想扑灭汉族人民的革命，但是我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坚信汉族人民必然能发动真正的革命，消灭一切反动派，实现自由与解放。只有全中国的被压迫人民彻底完成革命，中国的五族才能实现平等，才能亲同一家人。

四、宣言在分析蒙古民族的境遇时指出，由于汉族军阀的专制独裁和分割统治，蒙古人民的灾难比汉族人民更为深重，蒙古地区的分裂状态比汉族地区更为严重。因为军阀和汉族官僚时刻在想着消灭蒙古的盟旗，将蒙古人置于省县管辖之下，剥夺蒙古人的种种权利；汉族奸商吮吸蒙古人的血液，使蒙古人陷入债务的深渊；而蒙古王公贵族则与汉族军阀、官僚和奸商勾结在一起，走一条道路，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不惜出卖蒙古人民的一切权益。

五、宣言深刻地分析了蒙汉族人民遭受共同的灾难和面临的共同命运。指出蒙古王公贵族出卖蒙古的土地给汉族军阀、官僚

等专制独裁者，而后者又将土地高价转卖给内地无以安身立命的汉族农民，从中盘剥渔利。获利者是汉族官僚豪绅和蒙古王公贵族，蒙古族人民丧失土地而背井离乡向北方迁徙，汉族人民又落入汉族官僚土豪的圈套而更加贫穷。至于奸商的高利盘剥和王公贵族、官僚豪绅的无休止的掠夺搜刮，使蒙汉族被压迫人民处在灾难、穷困、疲惫、怨恨之中，苦不堪言。

六、宣言精辟地阐述了蒙汉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共求解放的道理。指出蒙古族人民在汉族专制独裁者和蒙古王公压迫下产生的痛苦和怨恨，已经凝聚成反抗压迫的无穷力量。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政党的成立就是标志，它将成为振兴民族，脱离专制，发扬民权的领导者；在蒙古地区的汉族人民不仅遭受汉族军阀、官僚、土豪和盗贼的压迫与掠夺，同样受蒙古专制独裁者的压迫。因此，在中国军阀没有完全被消灭之前，蒙古人民的自由与解放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只有蒙汉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同心协力，才能消灭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和一切压迫者。这对中国的大革命和内蒙古的革命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人民革命党就要致力于建立蒙汉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联合，完成共同的革命事业。内蒙古人民是本党存在的基石，汉族被压迫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及一切倡导革命的志士，是我们人民革命党事业发展的后盾。

宣言公布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和宗旨：1、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人民，争取自主决定和管理自己事务之权；2、中国人民消灭帝国主义和国内贪婪残暴者，建立真正的民权政府之时，我内蒙古的蒙古人也要建立民权革命政府；3、广大民众不分男女，均有平等参政之权。

据此提出了近期的政治目标和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

的政策措施。政治上：废除蒙古专制暴虐之旗札萨克的全部权力；旗政之权力移交人民，建立民选制度；建立人民代表会议机构。经济上：将蒙古专制暴虐者所有之土地，移交民选之旗政府所有；汉蒙杂居地区之土地，以协商互利办法解决；蒙古地方之土地事务，由民选机关管理，千方百计消除有害于蒙古地方的事情；禁止由民众偿付汉商和外国商人的债务，由欠债者偿债；成立人民互助合作社，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文化教育与宗教信仰；创立国立蒙古语高、中、初等人民学校，使贫民子弟免费受教育；保障人民健康，发展医疗卫生，创办各种慈善事业；由国家创立兽医机构，扑灭牛瘟等牲畜疫病；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以宗教名义向人民摊派官差。

大会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 14 名执行委员和 7 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同时又从中选出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福明泰、乐景涛、包悦卿、李丹山等 7 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选举白云梯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书长、金永昌代理组织部长。中共党员吴子徵和旺丹尼玛、锡尼喇嘛两位“独贵龙”运动首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李裕智（李若愚）、吉雅泰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党员佛鼎、多松年、乌兰夫、王瑞符、奇子俊等多人出席了大会。

大会决定创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创办内蒙古军官学校，出版《内蒙国民旬刊》和《内蒙画报》。

这次大会制定的纲领和政策，与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主张有所不同，主要是改变了对蒙古王公采取“和平态度”和对于旗政采取“折衷革新”的方针，提出要废除蒙古王公贵族独揽旗政的特权，废除王公札萨克制度，

旗政权力移交人民，建立民选制度。可以说这是从改良的办法向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转变。而且改变了召开内蒙国民代表大会以解决内蒙古地方自治问题的初衷，决定直接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内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次大会的精神与年初的主张相比是在发展，是在前进。

总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从它与共产国际、苏蒙两国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从它的纲领、目标和方针、政策以及与会代表的组成，特别是它对全国革命和蒙汉民族关系的立场观点，完全可以断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思想理论上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是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组织上是以蒙古族人民为基础，以革命派和共产党人为核心，团结联合各革命党派和各族人民，代表蒙古族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人民革命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民族政策的启发与鼓舞，国共合作发动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蒙古民族空前觉醒和要求民族自由与解放热情高涨的产物。它是内蒙古革命和全国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发展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0 月 20 日闭幕后，代表们分赴各盟旗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着手建立革命武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迅速展开，最初建立了 6 个党的支部，即北京支部，有党员 100 余名；雍和宫支部，有党员 50 余名；多伦支部，以多伦庙喇嘛为主，其活佛巴彦吉日嘎拉曾是筹组该党期间的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名誉会长；察哈尔支部，是由察哈尔左翼牧场总管达木林扎布和察哈尔八旗总管卓特巴扎布牵

头；鄂尔多斯支部，是以伊克昭盟“独贵龙”群众为基础；张家口支部，有党员50余名。

1925年12月14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贺大会的召开，并重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中国内各民族均有自决权；（二）中国统一国民革命政府之下，内蒙建设国民自治政府；（三）内蒙男女国民均有参政权等三大口号；而以促成全中国之革命工作，为进行唯一方法。”希望大会“议决协助敝党，而促进内蒙同胞自由平等，是所厚望焉！”贺信最后敬颂“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革命成功万岁！”[①] 同时决定派恩克巴图和乌勒吉赴会致贺。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冯玉祥国民军完全控制了绥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的发展也较迅速。特别是当年8月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迁到包头以后，旺丹尼玛、锡尼喇嘛和其他中央执行委员赴伊克昭盟各旗宣传革命，开展党务，建立党的组织。除了锡尼喇嘛在乌审旗大力发展党组织和组建武装外，奇子俊在准格尔旗、章文轩（札木杨什拉布）在鄂托克旗积极发展党务，其他各旗也有所活动。到10月初，在伊克昭盟“正式组成了34个区党部，党员人数增加到3千余名，合计其他盟旗共约6千余名。”[②] 在鄂托克旗“由各区党部召集了全伊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该“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别会议”，[③] 有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0号，1926年1月11日。

② 《内蒙古K.M.T致中国K.M.T中央信》（K.M.T即国民党），转引自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1页。

③ 同上。

40多名代表出席，对伊盟和全党工作做出了决议，还决定派得力党员“在乌兰察布盟各旗蒙古民众”中“竭力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渐次至于察哈尔及锡林果勒各盟”；[1] 在伊克昭盟各旗组织“独贵龙”，并普及到内蒙古各旗；在“独贵龙”内部组织党支部，实行党的领导；召开各旗党支部会议，组织旗党务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选派任命驻旗代表；向内蒙古军官学校选派学生等。10月20日到23日，在包头召开了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联合会议，两盟各旗均派代表参加，该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和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也派代表列席。会议决定两盟各旗召集党务委员会议，由中央任命各旗的负责人，发展党员；军官学校扩充机构，招生200名；重新组织各旗防卫军，由党中央任命各旗防卫军长官；各旗选派代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布利雅特蒙古考察访问；委托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代表团，与中国国民党谈判两党联合事宜。经过一系列的组织措施，该党在乌伊两盟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后，立即进行革命武装的建设工作。当时占据张家口的冯玉祥国民军，答应以参加国民军反奉系军阀为条件，帮助组建蒙古骑兵1000至1500人，提供进军热河的费用。经多方协商，冯玉祥国民军出资3千元，苏联出资3万元，中国共产党出资1万元左右，组织“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二、三纵队，编入国民军，由冯玉祥派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库伦代表张允荣任总司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乐景涛，中共热河工委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负责人陈镜湖、郑丕烈分别任纵队司令；由苏联供给步枪1000枝，机关枪20挺，子弹50万发，

---

[1]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1页。

派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福明泰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接运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

1925年11月间，乐景涛回到家乡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借助其父该旗管旗章京乐山贝子和旗札萨克布和吉雅的支持，在该旗保安队的基础上，招募了一批蒙古族青年，组成一支600余人的蒙古族革命武装，编为“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纵队，在昭乌达盟配合国民军与奉军作战。该纵队首克经棚城，奉军500余人弃城而逃，经棚境内约200余奉军投降。当地蒙民纷纷参军，一纵队扩充到1200余人。12月初进军林西，6日和7日经激烈交战，力克林西城，奉军退据乌丹城；10日和11日与奉军激战于乌丹，结果奉军大败，俘获奉军士兵和军官约1000名，缴获大炮7门及大量武器。接着向开鲁进军，与派往哲里木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包悦卿等联络，计划打开哲盟的局面。一纵队在昭乌达盟作战过程中，严惩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奉系地方官吏。林西征收局长全济、林东设治局长王立三、林东垦务帮办林绍庚以及经棚、林西、林东、乌丹等地一批奉军军官、警官和地方官吏被处决。蒙汉各族群众欣喜万分，蒙汉族人民“对国民军都表示好感，对蒙古军则特别有好感。士兵和人民之间没有发生由误会所产生的事件等，也没有发生士兵掠夺人民财物之事，蒙古骑兵队的纪律很好。”①

奉系军阀上下对内蒙古骑兵在昭乌达盟的反奉战争惊恐不已。张作霖呈文蒙藏院称：克什克腾旗札萨克布和吉雅纵容乐景涛父子“勾结赤党……纠合武装党徒数千人依归冯玉祥，实行赤

① 野津彰：《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转引自《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14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化，鼓惑蒙众……扰乱蒙疆，牵制奉军。”① 热河都统汤玉麟派林西知事张奉生调查称：乐景涛等“确系勾通赤党，扰乱蒙旗，不惟锡林、昭乌达两盟受其鼓惑，巴林亲王甘心助逆，其余各蒙旗均有同样之诱胁，既派出兵，又勒送青年蒙旗子弟赴训练处留学，宣传赤化，该乐景涛兼充赤党团长、纵队司令及训练处长。”② 内蒙古骑兵成为奉军攻击的重要目标。1926 年初，国民军讨奉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奉军在向关内移动的同时，集中力量反击国民军，国民军节节败撤。奉直军阀形成联合攻击国民军之势，国民军被迫于 4 月间撤出北京，退据南口一线。这时奉系、直系、直鲁联军和晋军联合成为所谓“讨赤”联军，从四面围攻国民军，形势严峻。8 月 15 日国民军向西突围，撤往绥远。“内蒙古特别国民军”三个纵队与奉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余部随国民军撤退到绥远。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绥远特别区，特别是在乌伊两盟发展党务的同时，也着手组建革命武装。1926 年夏天，白云梯、旺丹尼玛、李裕智前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筹建蒙古骑兵，在归绥受到中共绥远工委负责人路作霖的接待。在西北职业学校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杨曙晓、李子光和刘进仁参加。白云梯等介绍了在冯玉祥支持下组建蒙古骑兵的计划，与国民军绥远都统蒋鸿遇商谈组建蒙古骑兵事宜，交流了在绥远开展国民革命问题。之后，便以中共包头工委和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党部所在地包头为中心，开展建军工作，正式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旺丹尼玛任总司令，李裕

---

① 《昭盟盟长巴林王克什克腾旗札萨克布和吉雅章京乐景涛等依附冯玉祥被控通赤扰蒙革职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院案卷，第 572 卷。

② 同上。

智任副总指挥。旺丹尼玛和锡尼喇嘛从札萨克旗、乌审旗招来300余名“独贵龙”群众，除了由锡尼喇嘛组建乌审旗保安队的百余人外，其余备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乌拉特前旗由恩克巴雅尔招募了百余蒙古牧民组织了一支蒙古族革命武装；鄂托克旗是章文轩在原有“独贵龙”武装的基础上，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拨给部分枪支弹药，组建了革命武装。奇子俊（蒙名拉布敦）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回到准格尔旗革新旗政，组织新军，在全旗招募576名蒙古族青年入伍，组成蒙古骑兵团，奇子俊任团长，归国民军第一军指挥，由冯玉祥拨给俄式七七步枪500支，武装了部队。由于奇子俊组建蒙古民族武装，受到蒙汉群众的热烈拥护，特地编出“二少爷招兵”[①]的民歌：“沙圪堵点灯杨家湾，二少爷招兵忽沙沙的人”，形容参军者纷纷而至，也反映出奇子俊组建革命武装时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另外，从土默特旗、察哈尔等地也招募了一部分蒙古族农牧民参军，连同乐景涛的“内蒙古特别国民军”第一纵队余部，于1926年底正式组成了近2000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这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为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内蒙古革命的胜利而战的，全部由苏制武器装备起来的蒙古族新型革命军队。

在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过程中，乐景涛在克什克腾旗成立了蒙旗民兵训练处，招收40余名蒙古族青年入学，以培养蒙古族革命军官。在与奉军作战过程中损失严重，所剩无几。奇子俊也在准格尔旗组建了蒙旗民兵训练处，自任处长，以培养军事干部。恩克巴雅尔在乌拉特前旗梅力更庙成立了类似的军官学

---

① 奇子俊是当时准格尔旗护理札萨克那森达赖的次子，故称“二少爷”。

校，招收 70 名牧民受训培养，成为该旗革命武装的基础。在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同时，在包头创建了内蒙古军官学校，由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王瑞符任校长。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迁往宁夏银川后，接着又开展阿拉善旗的工作，发展党组织，扩建了军队，军官学校培养了第 3 期学生。据 1928 年 6 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公布的党员人数，在农牧民中发展党员 8 千余人，在军队中发展党员 5 千人左右，合计有 1.2 万人之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革命斗争中，特别是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古民族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了民族解放斗争。

五、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及其活动

中共北方区委在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从内蒙古的实际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在组织上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既要充分注意发动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又要注意蒙汉各民族联合起来，团结对敌，共同革命，共求解放，而且格外注意蒙汉各民族农工兵群众之间的联合。总之，调动一切应该而且可以调动的革命因素，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集中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王公等封建势力进攻，夺取革命的胜利。1925 年秋天，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明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并指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蒙汉民族的革命斗争以至内蒙古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①]

---

①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 5 页，1987 年。

1925年冬天，在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的主持下，在张家口诚洁旅馆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内蒙古的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及其他地区的蒙汉各族代表200多人参加了大会，代表中有工人、农民、士兵及内蒙古各地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京绥铁路总工会、张家口铁路分工会、电灯公司工会代表，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演，他从内蒙古地区的实际出发，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以及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任务，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正加紧对内蒙古的侵略；各路军阀也激烈争夺对内蒙古三特别区的控制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他们正在准备联合起来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是证明。他还针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问题，“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重要意义，并一再指出，蒙古族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①]要求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通过自己的组织，在内蒙古各族人民中广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混战的本质，动员各族人民起来反侵略反军阀。

大会在热烈讨论通过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纲领和任务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李大钊当选为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赵世炎、韩麟符当选为副书记；李大钊、赵世炎、韩麟符、贾大容、郑丕烈、吉雅泰、李裕智、王仲一、陈镜湖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还作出了与冯玉祥合作关系的决议，并决定创办农工兵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农工兵》。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

《农工兵》主要是针对农工兵的实际，以农工兵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刊物，以农工兵大同盟的纲领和主张为宗旨，以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状况和农工兵运动为主要内容，以通俗的文字、漫画等形式，有效地宣传农工兵的革命斗争，为农工兵的解放而呐喊，介绍内蒙古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由北京大学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参加编辑工作，中共北方区委和在内蒙古地区工作的同志撰稿。《农工兵》在北京、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广泛散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直到李大钊同志牺牲才被迫停刊。

这次大会是内蒙古的农工兵代表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面见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亲自聆听他讲述革命道理，直接指导内蒙古革命的大会；也是李大钊广泛联系内蒙古农工兵群众，指挥内蒙古革命斗争的聚会。中国共产党杰出领袖的形象，给与会者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不少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说，李大钊身着工人服装，出现在农工兵代表之中，与蒙汉群众一见如故，亲密无间。吉雅泰说："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人制服，一些工人见他穿的那样破烂，都要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他只是含笑说：'还是你们穿吧，还是你们穿吧'。他的态度温和可亲，和群众之间是那样的融洽自如，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①] 这是反映着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农工兵群众的慈爱，群众对领袖的敬仰。

大会之后，中共热、察、绥、包工委和中国国民党热、察、绥和内蒙古四党部，积极发展农工兵大同盟的组织，发展盟员。在热河，建平、赤峰、平泉、开鲁、林西、林东、围场、承德等县的农民和士兵中发展了大批盟员，建立了组织；在察哈尔，张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

家口以及察北各县的农民、洋车夫和警察中发展了盟员；在绥远，大同盟与工会、农民协会统一行动，联合开展工作，共同发动农工兵运动；在包头，主要是在“哥老会”会众中发展盟员，当时受大同盟指挥的“哥老会”会众可达 5 万人之众。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这一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蒙汉各族革命群众的联合组织，为掀起内蒙古地区的大革命高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也是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区委从内蒙古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领导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具体体现。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不仅是农工兵大联合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是蒙汉各民族革命群众大联合的革命组织。

六、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对内蒙古革命的影响和五原誓师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属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于 1924 年 10 月 23 日率部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著名的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把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12 月 18 日任命冯玉祥部下张之江为察哈尔特别区都统。1925 年 1 月，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任命国民军第一军第六师师长李鸣钟为绥远特别区都统。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其部属完全控制了察、绥两特别区。时值孙中山先生北上，与中共北方区委合作，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发展北方的国民党组织，掀起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正确地分析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的北方，特别是内蒙古热、察、绥三特别区的形势，作出了大

力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决定。李大钊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及徐谦，大力作争取冯玉祥的工作。于右任、徐谦亲赴天台山说服冯玉祥下山参政；1925年2月，应冯玉祥邀请，李大钊偕徐谦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晤，帮助冯玉祥制定了要求苏联援助国民军的计划，徐谦被聘为高等顾问；3月，李大钊又安排冯玉祥派专使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与加拉罕大使谈判苏联无偿赠送国民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军等问题；4月21日，李大钊又安排冯玉祥与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会晤，最后达成了苏联援助国民军具体项目的协议。冯玉祥立即派出驻外蒙代表，组织接运军援办事处。5月初，由30人组成的苏联顾问团到达张家口，帮助国民军进行军事训练，介绍苏联的革命与建设。这时，冯玉祥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宣侠父等一批中共党员和国民党派出的12名工作人员，与苏联顾问在国民军的俱乐部讲课，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国民革命，宣传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同时秘密传播马列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五卅”惨案后，李大钊、徐谦建议冯玉祥创办了国民军干部学校，发动京津等地大中学生投奔张家口，入国民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军各部工作。在李大钊的建议下，9月29日，冯玉祥派出国民军代表团赴苏联参观访问，李大钊参加代表团赴苏联。由于李大钊的影响和从中斡旋，加强了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当时，张家口成为国共两党特别关注的地方，国民党中央的代表纷纷到张家口活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邓中夏、张昆弟、范鸿劼、何孟雄、赵世炎、李汉俊等，相继到张家口指导工作；6月间，中共北方区委和粤区党委先后派高克林、卢少亭等200余名干部到冯玉祥国民军所属各部门和各地工作，为冯玉

祥及其国民军彻底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为开展北方特别是内蒙古热、察、绥三特别区的革命打开了局面。1925 年中共热、察、绥三特别区工委和中共张家口地委的先后建立，内蒙古 、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的创建，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动，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李大钊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所进行的大量有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倾向革命，是上述工作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坚持不懈地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进行工作，以及北方特别是热、察、绥三特别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冯玉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张家口召集反帝示威大会，支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在北京创办“今是学校”，收容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开除的学生，创办《民报》，宣传反帝革命理论，为“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修建纪念碑，公开站在了反帝革命战线的立场上，表明了自己的意愿。而且怀着对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热切向往，决心要求赴苏考察。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经过苏联大使加拉罕的安排，1926 年 3 月 20 日冯玉祥及其随员从内蒙古的平地泉启程，22 日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与国民党人于右任、徐谦及鲍罗廷等会晤，商谈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合作事宜。在蒙古参观访问的实践中，冯玉祥认识到革命政党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经徐谦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4 月 27 日启程赴苏，5 月 9 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数百名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5 月 11 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在中山大学举行欢迎冯玉祥大会，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致欢迎词，热烈赞扬冯玉祥的革命行动，冯玉祥也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团结起来，共同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之后，冯玉

祥一方面在苏联参观考察，一方面频繁与中共在莫斯科的负责人往来，请蔡和森、刘伯坚、朱务善、周达文等共产党人讲课，讲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讲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刘伯坚还特地与冯玉祥同住在一起，讲述苏联红军的历史与建军经验，特别是政治工作的经验。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于右任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径赴莫斯科，敦请冯玉祥尽早回国。冯玉祥毅然决定结束在苏联的考察，立即回国。

1926 年 8 月 17 日，冯玉祥在中共党员刘伯坚、邓小平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陪同下，结束了在苏联三个月的访问，从莫斯科启程，途经乌兰巴托回国。9 月 16 日晚到达绥远的五原。当时，孙岳、方振武、弓富魁、徐永昌、邓宝珊等均在五原。17 日晨 8 时，冯玉祥即召集会议，共商誓师事宜，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于右任以及孙岳、方振武、邓宝珊等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慷慨受任，并通电全国，发表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宣言，坦诚地陈述自己的心愿与献身革命的决心。

冯玉祥在宣言中说："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高鸣；来的时候，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他在历数军阀的罪行后指出："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

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他竭诚表示“遵奉中山先生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接受国民党两次代表大会决议、宣言，把国民军建成民众的武装，帮助地方工农组织，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顾全各方面各阶级之利益，“意义是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声明他的政治主张，“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①]冯玉祥正式表明了参加国民革命的立场。

当日正午12时，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率领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各军官兵万余人，在五原县旧城广场举行隆重的就职誓师受旗典礼。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国民军联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参加北伐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以党代表的身份，将青天白日旗授予国民军联军，刘伯坚宣读“九·一七”五原誓师宣言并讲话。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国民军主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邓宝珊、孙岳、方振武、弓富魁、石敬亭、过之翰以及白云梯等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绥远地方各界代表，在国民军和《西北民报》社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克林、史可轩、蒋听松、胡英初、郭伯瑞、丁宝铨、刘贯一、陈镜湖（即陈印潭）也出席大会。刘伯坚被聘为国

① 转引自高兴亚：《冯玉祥将军》，第84—88页，北京出版社，1982年。

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乌斯马诺夫被聘为政治军事顾问。之后，冯玉祥与中共北方区委、中共中央联系，表明其政治态度，要求给予帮助。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抽调人员，先后派肖明、陈延年、陈乔年、贾午、方中如、曾晓渊、李联珠、刘志丹、安子文、李子光等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军联军工作。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国民军工作方针》，中共北方区委提出《北方区对于三特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全面安排了国民军中的工作。国民军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下，特别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的开展，使国民军不仅恢复了元气，由弱变强，而且成为一支以国民革命为目标，有理想有主义的新型军队。冯玉祥带领十路大军，按照李大钊帮助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作战方针，西进南下，势如破竹，声威大振，发展成为拥有近20万人的革命武装，于1927年1月26日进驻西安，6月初与南方北伐军会师于河南。

李大钊以及中共北方区委、中共中央，争取冯玉祥参加革命，开展国民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十分成功的。五原誓师是其主要标志和结果。它在北伐战争迅猛发展之际，在中国的西北边疆树立起北伐的旗帜，开辟了又一个重要战场，无疑对北伐战争以及全国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典范。同时，不仅为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制造革命舆论与声势，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各族人民，推动了内蒙古革命的发展。

第四节　内蒙古革命运动的高涨

一、声援响应“五卅”运动

从 1925 年 2 月开始，上海、青岛纱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斗争。5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加强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推动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上海日本纱厂当局为阻止工人罢工，对罢工工人进行报复，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工人 10 余名。于是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各大学学生纷纷支援罢工斗争。5 月 28 日，青岛日本纱厂当局勾结奉系军阀枪杀罢工工人 8 名，重伤 10 余人，逮捕 70 余人。5 月 30 日，上海各校学生 2000 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屠杀逮捕工人、镇压罢工运动的罪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公共租界出动武装，巡捕示威学生和群众，当场枪杀 13 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开展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6 月 1 日实行总同盟罢工；7 日成立工商学联合会；11 日，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了 20 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上海各界的反帝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五卅”运动掀起的大革命风暴迅速地向全国发展。

6 月初，“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了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呼和浩特蒙汉各族的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屠杀工人、学生的罪行无比愤慨。中共绥远工委及时领导这里的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这时，绥远的学生队伍

有所壮大，除了原有的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归绥高等小学校外，又增加了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绥远五族学院、西北职业学校等中等学校，学生人数发展到2000余人。他们是这里的反帝爱国斗争的先觉者。中共绥远工委通过绥远学生联合会公开发动和组织各学校学生参加这场斗争。6月上旬，绥远学联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归绥旧城席力图召大院，主持举行各族各界声援"五卅"惨案蒙难者、响应"五卅"运动群众大会，学生、工人、商人和市民约2000人参加。绥远学联负责人介绍了上海"五卅"惨案和"五卅"运动的经过，揭露日、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学生、市民，制造"五卅"惨案的罪行，讲述了上海工人、学生英勇斗争的事迹，特别是工人代表顾正红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激起了与会者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比愤怒，"打倒帝国主义"、"惩办杀人凶手"、"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声不绝于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的爱国热情。大会发出通电，慰问在"五卅"惨案中蒙难工人、学生的家属，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响应"五卅"运动。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穿过大街小巷，广泛宣传"五卅"爱国运动，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高潮。中共绥远工委书记吉雅泰直接领导了这次运动。

在中共绥远工委领导下，绥远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三天总罢课，组织宣传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并发动劝募运动，从经济上支援上海受难的工人、学生。学生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商号店铺、居民院落，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讲，使更多的人了解"五卅"惨案的真象，并进行募捐活动。许多商人纷纷捐献，表达爱国之心。归绥最大的商号大盛魁主动捐献银洋100元，一般大商号也要捐献10元至30元，中等商号也捐助了3元

或 5 元，即使一些小商铺也要主动捐助 1 元 2 元不等。旧城大通钱庄不仅老板慷慨捐献，其厨师也从火房里跑出来捐助 5 元钱，并大发感慨地说："这是国家大事，爱国之心人人应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绥远分公司把整箱香烟搬到各剧场义卖捐献。绥远学联决定不向市民募捐，只作宣传。但许多市民住户、房东、房客也自愿捐助，钱数虽然不多，爱国心情真诚。凡捐献者均由绥远学联开具募捐收据。在短短的 3 天之内就募捐银洋 1000 多元，当即汇至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以表达祖国北疆的蒙汉各族人民对上海"五卅"惨案中蒙难工人、学生的同情和支援。

在以"五卅"运动为发端的全国大革命高潮滚滚向前发展的形势下，爱国热血沸腾的中国各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当然，也有极少数对时代的潮流无动于衷者，甚至对学生爱国募捐的行动持反感态度。当时在归绥旧城大北街路西九龙弯巷口有一家闻名全城的大馆庄，名曰南古丰轩。其庭院宽敞，门面是三层楼阁，连同正庭和两侧厢房全部是客座，建筑别致，装饰华丽，饭菜讲究，顾客盈门，颇有名气。当学生宣传队前往劝募时，老板出乎意料地只给了 1 元钱，学生们大惑不解。按说南古丰轩这样的字号捐助 30 元也不算多。学生们对这位老板的举动，既气愤又好笑，只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发他的爱国热情。可是这位吝啬的老板根本听不进去，固执己见。学生们没有收他的 1 元钱，并告诉他："你留着发财吧！……"可是老板反唇相讥："你们不是说捐献是自由布施吗？能捐多少捐多少，怎么给 1 元钱还嫌少呢？"在两种感情的尖锐对立中暂时结束了这场争论。在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绥远学联经过周密的安排，学生们与这位老板进行了一次颇具戏剧性的较量。这一天的清晨，几十名学生在南古丰轩还没有开门营业之前就聚集在南古

丰轩饭庄门口。当其一开门，学生们便蜂拥而入，把楼上楼下、正庭厢房的所有座席全部坐满。跑堂的伙计们殷勤地征询这伙奇怪的客人要吃什么？学生们众口一致地回答："什么也不要，就要白开水喝。"跑堂伙计们瞠目结舌，虽知有故，但又不敢深究，只好提白开水招待。学生们喝水聊天，看书唱歌，真要就餐的顾客，一看座无虚席，便扭头他去。老板又气又急，但又不敢说什么。到了中午时分，又来了一批学生把早上来的学生换回去吃午饭。老板给警察局打电话，学生并没有闹事，警察局也无法干预，反让老板好好应酬。南古丰轩被学生们整整占了一天。晚上学生们散去时还高声招呼"明天由师范请客，大家都来光顾。"老板一听更慌了手脚，急忙拜托商会向学联求情，表示捐助 50 元，请求学生们明天不要再来占座。一天没开张，亏本何止 50 元，真是不吃敬酒吃罚酒。这件事后来成为归绥城里的一个笑料。

三天的罢课虽然结束，但宣传活动并没有结束，每天的业余时间学生们成群结队地上街开展宣传。6 月下旬，各学校又相继停课，绥远学联组织宣传队分赴归绥近郊农村，向农民宣传"五卅"爱国运动。在归绥城北的坝口子、乌素图、攸攸板和城西的兵州亥、什报气等村，都有学生宣传队的活动。蒙汉各族农民群众初则好奇地围拢起来，倾听宣传演讲，继则思考议论"五卅"运动的内容，"五卅"运动的浪潮从城市向农村推进，逐步席卷了土默川。与此同时，绥远学联还派人到包头、萨拉齐、五原、临河等地联络进步势力，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包头还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吓跑了耶稣教外国牧师；在五原，地方绅士和县长出面接待绥远学联代表，并组织群众大会，宣传"五卅"运动；在临河，设置局长接待学联代表，支持学生反对天主教的侵

略活动；在萨拉齐，学生宣传队直接到耶稣教堂示威，解救了育婴院的一批婴孩，送入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慰问将士的活动。持续近两个月的宣传活动，使以归绥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空前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在这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因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五卅”惨案，归绥的英商和记洋行也成为爱国学生冲击的目标。这是由天津买办商人王静轩经营的买办洋行，设在旧城西沙梁，专营内蒙古西部的畜产资源，拥有骆驼队和十几辆汽车，掠夺内蒙古的畜产品，倾销洋货，排斥民族工商业。爱国学生毅然驱散了它的骆驼队，烧毁了部分汽车，扯下了和记洋行悬挂的英国国旗。王静轩不敢公开与学生对抗，但在暗中报告警察厅。警察厅长门致中武装干涉学生的爱国运动，无理责骂学生。绥远学联带领学生到绥远都统府示威。时任绥远都统的李鸣钟，是冯玉祥的部属，倾向革命，同情学生，责令门致中向学生认错赔礼道歉，确认了学生的爱国行动。

绥远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上海、济南、天津、北京等地学生联合会的支持。这些城市的学生联合会纷纷派代表或宣传队来归绥联络、宣传，鼓动这里的爱国运动。他们在街头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在上海、青岛的暴行，在旧城同和剧院演出反映“五卅”惨案的话剧。绥远都统府教育厅长沙明远，曾在北京民国大学任教，同情支持北京民国大学学生宣传队在绥远的活动，号召绥远学生去看他们的演出。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宣传队，在旧城北门外小教场为国民军演出日本侵略者惨杀工人顾正红的街头活报剧，士兵看后泪流满面，自发地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口号。绥远旅京学生同乡会也派出宣传队回到归绥，在旧城民乐剧社演出新话剧《孔雀东南飞》、《良心》、《可怜闺里月》、《一

念差》等。内蒙古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全国的“五卅”运动结合起来了，并揭开了内蒙古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二、“孤魂滩”事件

1924年12月，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遂派国民一军第五师师长率部进驻张家口，并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1925年初，派国民一军第六师师长李鸣钟率部进入绥远，并任绥远特别区都统。国民军完全控制了察绥地区。李鸣钟主绥以后，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即撤换贪官、整顿吏治；创办学校、革新教育；严行禁烟、改造烟民；剪辮放脚、倡导新风；兴建市政、创办福利；打击盗贼、清剿土匪；整顿财税、增加收入；官兵一致，与民平等。经过努力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绥远人民的好评，绥远出现了新气象。

1926年8月，国民军因在南口遭到直、奉、晋军阀的联合进攻而失败以后，向绥远撤退。不久，奉、晋军阀控制了绥察大部分地区。阎锡山派商震任绥远特别区都统，晋绥军接管绥远政权，奉军接管京绥铁路。商震竭力安排同籍直隶人和亲朋故友执掌绥远军政大权。阎锡山也派山西籍人士分享政权要职，只有绥远地方人士被排除在外。政界矛盾日趋复杂，贪官上台，旧制复辟，土匪横行，金融紊乱，国民军的革新措施全被否定。商震治绥，一心贪图搜刮钱财。绥远地区地籍管理混乱，地户所有土地一般多于地照记载亩数。另外，虽经多次放垦土地，但仍有部分所谓夹荒余荒，供放牧所需。商震一眼瞄准了地利可图，便提出要清丈地亩，重发地照，又要放垦夹荒余荒。清丈地亩多于原照记载部分，仍以荒地征收“押荒银”和田赋，而且补发新地照也

是一笔不少的收入。至于放垦夹荒余荒自然照收一切放垦费用。因此，清丈地亩和放垦夹荒余荒是商震主绥后开发财源的重要途径。于是在 1926 年冬天成立了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6 县地亩清丈局。晋系周锦斋任局长，山西人掌握了清丈大权，并拟于 1927 年春天开始清丈。清丈地亩无疑是对这里的蒙汉各族农民的一次严重的经济搜刮，尤其蒙古族的户口地经过清丈注册为官田。汉族农民租种蒙古族的户口地只交少许“蒙租”，清丈后转纳繁重的官租；汉族地户、地主和绅士在历年扩耕中多占的地亩被清丈出来后，必须重领地照，缴纳押荒银和田赋。商震在绥远清丈地亩的举动触犯了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利益，遭到普遍的反对。

国民军在绥远实行禁烟，禁种罂粟，查封烟馆，强迫戒烟，效果良好，深受欢迎。阎锡山、商震却把开放烟禁作为开发财源的另一条途径。1927 年春，他们力主在绥远种植罂粟，废除禁烟令，成立“善后局”，设卡征收过境烟税，征收烟灯捐，对烟馆烟摊和吸食者不予过问。这件事引起了公众的普遍的不满。

国民军撤出绥远后，所属西北银行发行的钞票被废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在绥远极其缺乏；民间习惯使用的硬币银元更少流通，致使货币流通匮乏。应各界的要求，阎锡山、商震答应发行“绥远善后流通券”，要各县成立“抵产局”，农民可以地契房约抵产借款，暂时解决货币流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发行纸币应急解决周转军费开支的困难，决定发行 100 万元“绥远善后流通券”。但是未及实施，绥远总商会已请准财政厅发行“救济市面兑换券”40 万元，商震觉得两者同时发行，反会引起金融紊乱，而且“善后流通券”的发行，油水不大。因此，决定停止发行“善后流通券”。急切期望得到流通货币的农民，对于

当局扣发流通券迷惑不解，激烈反对。

另外，由于军阀争战，你来我往，重兵驻屯，骚扰频繁，年关屠宰牛羊猪鸡，也要征收“割头捐”，百姓苦不堪言。是年底，旧城四栅口的群众毅然殴打征收“割头捐”的人员；东郊农民奋起赶跑了征收“割头捐”的人员。1927 年初，归绥、和林格尔两县开始清丈地亩时，连续不断爆发了抗清丈的斗争。和林格尔县地亩清丈局在该县南口新店子“台站地”清丈地亩时，周围 36 个村发生抗清丈暴动，驱赶清丈人员，包围清丈局，阻止了清丈活动。归绥县毕克齐丈地委员赵滁，依仗恶霸李福，偏袒权势，欺压百姓，索取贿赂，肥私中饱，民愤极大。农民运动特派员贾力更、在北京民国大学学习的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在内蒙古的交通员孟纯等，组织这里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会员，对赵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毕克齐镇三官庙戏场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地揭露赵滁的舞弊事实，揭露绥远都统署清丈地亩的反动实质，当场没收了赵滁向农民搜刮所得的银元和大烟土，并将其游街示众，宣布其清丈地亩的数字一律无效，最后赶出毕克齐镇。是年春节以后，各县地亩清丈局仍然紧锣密鼓地准备清丈事宜，以农民为主的各族各界也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一场激烈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颇有一点“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中共绥远地委和中国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共同协商，密切合作，决定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的名义，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活动。1927 年 3 月 26 日，国民党绥远党部召开会议，以 3 名中共党员和 1 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冷岗峰为一方，以 4 比 2 通过如下决议：一、组织农民游行示威；二、废除清丈费，要求释放因抗拒交纳清丈费而被捕监禁的农民；三、砸毁清丈局，砸毁县衙门，并决定召开以农民为主，有工人、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

大会，并作了部署。27日，召开中共党员、国民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特别是组织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并以鸡毛传贴向归绥周围的各级农民协会发出了通知，决定在3月28日上午，在“孤魂滩”举行群众大会。

“孤魂滩”位于归绥旧城城南，相传是清朝乾隆年间在这里的一块沼泽滩地上开辟一个刑场，被处死刑者如无人领尸，便就地掩埋，后来一些鳏寡孤独和乞丐流浪者死后也被埋在这里。大概“孤魂滩”之名也是由此而来。1906年伊盟准格尔旗协理台吉、抗垦英雄丹丕尔一家5口，被绥远城将军贻谷杀害于此；1916年，同盟会员王定圻因反对袁世凯称帝也被绥远都统潘榘楹枪杀在这里。中共绥远地委和国民党绥远党部别具意味地选择在这里举行群众大会。

3月28日上午，归绥周围的蒙汉各族农牧民和城里的工人、学生及部分市民约五六千人，手执各色旗，肩扛铁锹、锄头、扁担、木棍等护身器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孤魂滩”，平素寂静的乱坟岗，此刻热闹异常。不知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在这里修了一座孤魂庙。在庙前土台子两侧树起两根杆子，上挂一幅白布横联，上书“绥远难民大会”六个大字。简朴庄重的主席台上只坐着几位大会的主持者，国民党左派人士、绥远特别区农民协会会长李正乐担任大会主席，中共绥远地委派路作霖担任副主席。李正乐致开会词后，共青团绥远地委书记杨曙晓发表了热情激昂的讲话，愤怒地揭露奉晋军阀压迫、掠夺绥远人民的罪行，揭露绥远都统署清丈地亩开放烟禁、扣发善后流通券的阴谋，赞扬归绥、和林格尔两县农民抗清丈地亩及苛捐杂税的斗争，热烈欢迎和感谢蒙汉各族农牧民、工人、学生和市民热心于这场斗争，号

召与会者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接着是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界代表先后登台讲话，从不同角度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诉说绥远人民的痛苦，猛烈抨击贪官污吏，整个大会群情激奋，“打倒贪官污吏”、“反对清丈地亩”、“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等口号，震耳欲聋。大会期间，商震派其秘书赵伯陶前来阻挠，与会者不听其言，怒目相视，有人突然大叫：“正好，今天就用他来祭天”。赵伯陶一听丧魂落魄，扭头骑马逃跑。

大会结束后，由路作霖、杨曙晓指挥组织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绥远难民大会”的横幅为前导，由工人、学生队伍开路，浩浩荡荡地从“孤魂滩”出发，直奔财神庙街，一举捣毁了“归绥县地亩清丈局”，砸烂了清丈局的牌子和办公设施，烧毁了丈地文书档册。至于清丈局人员早已闻风而逃。游行队伍继续沿小南街、大南街、大西街，向归绥县政府挺进。途中，“回民促进会”理事艾辅庭和“明善堂”书局经理赵子南带领回民练武青年及“清佛教”善友赶来参加游行；旧城“上三元”、“裕合兴”、“天顺泰”、“聚生泰”、“大盛魁”等字号，以及一些钱庄、茶铺的店员伙计，在“大盛魁”经理段理庄的组织下，参加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冲出杨家巷，越过札答海河，直捣归绥县政府。归绥县知事冯延铸及县府官员早已闻风而跑，只有几个卫兵看守衙门。示威者在打倒冯延铸的口号声中冲进县政府，闯入后院冯知事的官邸，铁锹、锄头、棍棒横扫冯延铸家中的陈设，女学生撕烂了他的缎被褥和鸳鸯枕头，冯延铸多年收藏的古玩也无一幸存。此情此景使贪官污吏胆战心惊，工农群众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当游行队伍行至大北街时，包围了设在这里的财政厅、政务

厅和教育厅，高呼“打倒财政厅长仇曾诒”、“打倒政务厅长屠义源”、“打倒教育厅郭贵瑄”，并砸碎了这三个厅的牌子。时值中午，游行队伍向新城进发，到绥远都统署请愿。商震早有准备，将新城四门紧闭，并派大批军警布防城楼，荷枪实弹，显示威风。示威者要求见商震，赵伯陶诡称商震不在，一直相持到傍晚，示威者突然散去。

绥远都统商震以为事态已经平息，不料第二天清晨，又有三四千示威者再度齐集于新城门外，强烈要求进城请愿。相持数小时，商震深感拖延难以奏效，又不敢武力镇压，怕扩大事态，只能答应谈判。于是，示威者决定派李正乐、刘进仁、张焕文、陈志仁、阎肃、苗国华、辛崇业等各方面代表15人进城会见商震，谈判解决“难民大会”提出的问题。起初，商震不露面，只派赵伯陶周旋，不接触实质性的问题。代表们坚持要见商震面谈，不达目的决不出城。商震无奈，只好会见代表，进行谈判。经过激烈的争论，商震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六项要求，直到午夜子时，商震派卫兵打着灯笼送代表出城。在城外等候的数千示威群众，热烈欢迎代表们凯旋归来，青年学生唱起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的大革命时代的歌曲；有些共青团员还兴奋地唱起了《国际歌》。数千名劳苦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在绥远都统署所在的城门口欢庆胜利，这在绥远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归绥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李致芳、杨植霖等，通过绥远商务会和大盛魁商号的安排，准备了大量的切面和焙子，让饥渴一整天的农会会员就餐，直到天蒙蒙亮，才以民众的胜利结束了这场不平凡的斗争。

事后，商震发布了停止清丈地亩、严禁种植鸦片、照发善后

流通券等三项命令，并将归绥县知事、垦务督办冯曦等贪官污吏撤职，兑现了示威群众的要求。4 月 7 日，北京《晨报》题为《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的报道，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次斗争的基本内容。报道的副标题是“反对丈量余荒夹荒，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报道说：“绥远今以丈量余荒夹荒，积成民变。3 月 28 日晨，有市民五六千人，在归化城南之孤魂滩聚集示威，并散发传单。大致谓辛亥革命成功，不过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新招牌。所有专制时代的腐朽遗物与帝国主义的思想，完全留着云云。又历数各级长官罪状：一、垦务总办冯曦：绥远近几年来，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去岁更遭兵灾旱灾，人民之疾苦，犹倒悬然。凡为民上者，应当设法赈救，以舒民困，而彼不但不如此，反重行丈地，剥削民财，以致百姓破产，卖老婆者有之，卖子女者又有之。似此父母兄弟妻子离散，直是该总办所致。二、归绥县知事冯延铸：（一）大同知事任内，侵吞公款 20 余万元。（二）去岁军事紧急，伊藉寿馆为名，苛派勒索，侵吞四五万元，被蒋鸿遇都统撤差管押，罚洋 25000 元。（三）都统要车百辆，伊抓七八百辆，吃钱放卖。（四）假名各机关运炭，从中舞弊，希图厚利，一得四五万斤。（五）擅将田房学捐挪用，以致教育经费积欠数月，濒于破产。（六）提倡种烟。三、财政厅长仇曾诒：勒揩流通券，百姓持契而不得借款，以致束手无策，望而待毙。四、政务厅长屠义源：伊至绥服官有年，于绥民疾苦，宜格外垂怜。今者，不但不垂怜，反而破坏一切救灾善举云云。旋整队赴新城都统署请愿，事为商震闻之，遂将四门紧闭，只由代表数人入见，代表提出六事：一、打倒丈局；二、打倒垦务总办冯曦；三、打倒屠义源；四、打倒冯延铸；五、反对开放烟禁；六、反对扣发流通券。商震皆允照办。今已

发布明令三通。”[①]

三、牧民运动的发展及鄂尔多斯风暴

内蒙古的牧民运动主要是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以后发展起来的。该党的工作重心在蒙古民族中，特别在蒙古族牧民之中，而且是在该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同时开展牧民中的工作，发动牧民运动。当时，郭道甫、福明泰等在呼伦贝尔地区宣传革命，在牧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有部分蒙古族、达斡尔族青年奔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革命风气很快传播开来。在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盟等盟，白云梯、李丹山、包悦卿、乐景涛等在建党过程中，即宣传民族解放。喀喇沁、克什克腾等旗有一批蒙古族青年参加革命，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乐景涛、白海风等于 1925 年冬天，在这一带创办蒙旗民兵训练处，组建蒙古骑兵，参与国民军对奉军的作战，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建初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重大活动，影响甚广。这时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如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德勒格尔（宁春发）、乌勒吉敖其尔、白永伦、海文远、张福恩、陈青云、祁维翰等被该党送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学习，成为发展内蒙古民族革命的重要力量。在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一带，主要有纪松龄（赛胜阿，当时也译作肃生格）、宝音巴特尔（贺志远）、莫杰（孟克吉尔格勒）等在蒙古族中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党员纪松龄还在锡察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发展中共党员。乌兰察布盟主要是有恩克巴雅尔、芒来巴特尔在乌拉特前旗开展工作，争取该旗军队参加革命，在该旗创办新型学校。在土默特

① 梅仙：《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1927 年 4 月 7 日《晨报》。

旗，主要是吉雅泰、李裕智、奎璧、贾力更、高布泽博等结合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农工兵大同盟的工作，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特别是1926年秋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随同国民军西迁时，在包头为该党中央的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度成为指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的中心。

由于1926年下半年以来，奉直鲁晋军阀联合起来攻击国民军，内蒙古东部地区被奉军占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蒙古东中部地区的活动日益困难，农牧民运动遭到军阀的限制和镇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重心转到内蒙古西部地区以后，伊克昭盟的党务活动最为广泛，牧民运动的声势也最大。奇子俊回到本旗以后，除了组建蒙古族武装外，还创办了该旗第一所小学，发展人民革命党组织，颇具声势。鄂托克旗执掌旗政的活佛阿拉庙喇嘛章文轩早年领导过该旗抗垦"独贵龙"运动，颇有影响。这时，他接受革命主张，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党务，成立旗党部，组织牧民运动。札萨克旗是旺丹尼玛的家乡，他是该旗的活佛，早年领导"独贵龙"运动被马福祥逮捕交由北京政府软禁。旺丹尼玛回到包头以后，该旗牧民闻风而动，准备开展新的斗争。旺丹尼玛不幸在包头遇害，该旗党务受到影响。另外，杭锦旗、达拉特旗、郡王旗也发展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革命影响也逐步传开。在伊克昭盟各旗中，锡尼喇嘛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最有成效，牧民运动的声势最大，号称鄂尔多斯风暴。

乌审旗是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的发祥地，锡尼喇嘛又是"独贵龙"运动杰出的领导人。辛亥革命后，他曾领导"独贵龙"控制旗政，试图推翻封建王公制度，但被伊盟盟长诱捕坐牢。1920年越狱逃到北京，在雍和宫隐居几年。1924年返回乌审旗，

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但因遭王公的追捕而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俄国十月革命、外蒙古人民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发，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25 年回国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他从一个牧民运动的领袖转变成为自觉的民族民主革命家。1926 年 2 月，锡尼喇嘛秘密回到乌审旗，召集“独贵龙”群众开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讲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宣言、纲领和会议文件，受到“独贵龙”群众的热烈拥护，并纷纷要求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独贵龙”的基础上发展人民革命党，是这里开展党务的特点，很快即建立起 7 个党支部。4 月下旬，在海留图庙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旗支部，图孟吉尔格勒任书记，索德那木栋鲁布任秘书长。会议期间，突然遭到王公军队的袭击，扣捕了一批党员，抄去了党员名单和文件、书籍。锡尼喇嘛等数人突围成功，并向该党中央报告了事件经过。是年秋天，党中央派专员前往乌审旗，会同该旗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楞及“独贵龙”代表，经过协商决定，保证发展党务，开展工作。12 月 10 日，在芒哈图庙召开各支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旗党部，选出执行委员 5 名，候补委员 4 名，仍由图孟吉尔格勒任书记，索德那木栋鲁布任秘书长，尼玛林沁负责宣传，特古斯吉尔格楞负责组织。这时已有 8 个党支部 192 名正式党员和 253 名候补党员，还有 314 名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员。到 1928 年春天，在旗境西部地区又建立了 9 个党支部，发展正式党员 63 名，候补党员 134 名。[①] 从而在乌

① 《乌审旗党部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报告》（蒙文档案资料），1930 年 3 月 25 日。

审旗形成了有17个党支部700百余党员，组织健全，且能控制全旗局势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机构。这是“独贵龙”运动从自发的牧民运动向有组织有纲领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转变。

乌审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上述转变，是靠革命武装为坚强后盾的。锡尼喇嘛和乌审旗蒙古族人民，多年来在“独贵龙”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6年秋天，锡尼喇嘛从乌审旗动员了100多名蒙古族牧民，在包头建立了人民革命武装，并与党中央专员一起班师回旗，迫使王公答应了在该旗发展党务的要求。部队最初叫乌审旗保安队，11月整编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12团，锡尼喇嘛任团长。

在建党建军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乌审旗人民革命政权。掌管全旗政务的机关是公会，也是从苏维埃的名称义译而来的。旗党部和军队的领导人担任公会领导成员。为了对外联系事务的方便，对外仍用札萨克、协理等名义，而公会总理全旗行政管理、刑事判决、民事审理、财政收支、军事要务、文化教育等政务，行使政府职权。公会下设管理指挥部、审判部、军事部、仓库征税部及文化教育部等部门，选举公会委员5人，设主席一人，其他委员分管各部事务，并制定了公会工作规程等简要法。同时制定和实行了保障劳动人民权利的各项政策：即全部废除原有各种苛捐摊派，只为保证军需，每百只羊抽征一只；废除奸商的一切公私债务；禁止盟长等差遣官吏任意征乘乌拉、压榨盘剥人民，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汉商贩卖鸦片；创办人民学校，教习蒙汉语文；向中央军校选派学生，培养训练军政干部；实行男女平等，妇女有权入党；提倡植树造林，每户每年植树10株；任何人不得擅自扣留、出卖牧民散失的牲畜，

违者加倍惩处；废除对民间讼案的刑讯或惩罚、零星讼案调解了结，免予治罪；实行婚姻自由，喇嘛可以还俗娶妻等。人民革命政权的建立，各项革命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乌审旗的封建王公政权被推翻，封建王公制度被废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的要求得到了初步的体现。

乌审旗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使一切反动势力既恐惶又痛恨，时刻准备寻机反扑。该旗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楞为首的一批反动封建势力，乘革命还未及惩处他们的时候，偷偷逃到陕北榆林，与汉族军阀井岳秀勾结起来，妄图扑灭乌审旗的革命烈火。从 1927 年初到 1929 年初的两年间，井岳秀的骑兵由蒙古王公反动势力任向导，向乌审旗持续发动武装进攻，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最多调集骑兵 2000 余人至少也有二三百之众进攻乌审旗，许多召庙被焚毁，王府旗府档案帐册也被洗劫一空，人民的财产也遭受空前损失。但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 12 团，团结全旗民众，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两年来，同兵力多达 5 倍到 20 倍于己的敌人进行 20 多次较大的战斗，除两次失利外，其余各次均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歼敌 260 多人，革命军牺牲 9 人，[①] 军阀井岳秀始终无法占领该旗。锡尼喇嘛领导的革命军队，在自己的家乡，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发挥聪明才智和勇敢战斗的精神，创造沙漠丛林游击战术，时而钻入荆棘丛林，绕敌背后，突然袭击；时而分为小股，一部诱敌追击，引入丛林荒漠，余部侧翼截击歼敌；时而集中火力，猛打猛冲，乱敌阵脚，乘胜歼敌。总之，使敌人感到神奇莫测，望而生畏。乌审旗革命

① 《乌审旗党部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报告》（蒙文档案资料），1930 年 3 月 25 日。

武装的传奇事迹，就连当时的《绥远日报》也载文惊呼，它已“成乌审旗之劲旅”，“井（岳秀）曾派兵往袭，以多击少，竟为所败”，“于是乌审旗在伊盟遂无形宣告独立矣。”[①] 陕北军阀与反动王公势力相勾结，妄图以武力消灭乌审旗革命政权的目的破产了，乌审旗革命政权依然屹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蒙古民族解放斗争，乃至内蒙古革命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第五节　内蒙古地区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一、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奉系军阀的大屠杀

1926年，直奉军阀联合攻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南口。8月，南口失守，奉军占领北京。奉晋军阀沿京绥铁路进攻国民军，热、察为奉军所占，由高维岳出任察哈尔都统；国民军退据绥西河套，晋军占领归绥执政，派商震出任绥远都统；奉军控制京绥铁路，内蒙古的热、察、绥三特别区的革命形势恶化。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等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噩耗传来后，内蒙古各族人民沉痛无比，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面对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以各种形式悼念李大钊等革命者。在归绥五族学院礼堂举行了追悼李

① 1936年7月21日《绥远日报》。

大钊牺牲大会，陈之的主持会议、杨绍萱讲话，介绍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痛骂军阀张作霖残杀李大钊的罪行，有二三百人参加追悼会。另外，绥远职业学校、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愤怒地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

蒋介石、张作霖南北呼应，全国形成反共反革命白色恐怖以后，内蒙古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和国民党右派也蠢蠢欲动，磨刀霍霍。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久，绥远国民党右派纪亮、焦守显、潘秀仁、张遐民和李正才等公开打出反共旗号，组织所谓国民党清党委员会，逮捕了杨曙晓以及归绥中学的学生张国林、崔文彬、丁钰文和贾玉琴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并组织宣传队在街头鼓噪，辱骂共产党，张贴“打倒共产党”、“铲除跨党分子”等标语，并在绥远都统商震的支持下，派出军警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熊味根、路作霖、麟祥等党团员负责人以及王建功、刘进仁、张焕文等立即转移，未遭不测。中共绥远地委、国民党绥远党部以及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均被查封。各学校的学生会被解散，许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学生，有的被开除学籍，有的受到处分。工会被解散，工人纠察队被指责为犯罪，不少工人被传讯、监禁、搜查。土豪劣绅在农村兴风作浪，卷土重来，封闭农民协会，打击报复农民，公然叫嚣“不种老子的地，还是活不成，天下还是老子的”。农会积极分子有的躲避起来，有的弃家出走，大部分人消极沉默，农村普遍恢复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

奉军张作霖占领热河以后，陈镜湖等热河党的负责人带部队随国民军西撤到河套。中共热河工委、国民党热河党部以及农工兵大同盟、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均被迫停止活动。奉系高维岳任察哈尔都统之后，张家口的形势恶化，中共张家口地委以及青

年团地委也处在瘫痪状态。多松年于1926年秋天从苏联回国，任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为开展党的工作进行了巨大努力。他奔波于北京、归绥之间，联络同志，恢复组织，开展活动。1927年4月，他赴武汉参加中共四大。会后他回到北京得知李大钊等遇难，悲痛万分，冒着极大的危险回到张家口，在白色恐怖中采取应急措施，部署党的工作，不幸被叛徒告密而遭逮捕。他在狱中惨遭奉系军阀的酷刑折磨，但坚贞不屈，与军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揭露其残暴，特别是痛斥其对蒙古民族的掠夺压迫罪行。奉军都统高维岳气急败坏，将多松年游街示众后，钉死在张家口大镜门城门上，极其野蛮残忍地杀害了这位蒙古民族的优秀儿子、坚强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等之后，又一次以绝无仅有的残暴手段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证。

1927年10月，晋系阎锡山宣布参加北伐，绥远都统商震带兵东进攻打奉军，但被奉军击败而退到山西。奉军遂派郭希鹏出任绥远都统，绥远也落入奉军之手。奉军既杀共产党人，也不放过国民党，因此绥远的国民党右派也纷纷逃到山西，杨曙晓等被捕者乘奉晋争夺绥远的混乱之机，经地方人士的相助而幸免于难。1928年6月，奉军张作霖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军会攻之下，全部撤回东北，绥远又被晋军所据。内蒙古热、察、绥三特别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下也先后失败了。

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右派集团的叛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的状况与中国国民党相类似。当时，由于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民族政策和中共关于国内民族问题

纲领的巨大影响，同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胜利的国际环境中，在冯玉祥倾向革命，国民军控制内蒙古热、察、绥三特别区的条件下，蒙古民族中渴望民族解放的各种势力都在寻求民族的出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和王公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号下聚集到一起，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酝酿建党的过程中，白云梯、郭道甫、乐景涛等在内蒙古以及国内社会上层中都有各式各样的关系，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也有一批亲信和追随者。因此，在建党的组织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构时，他们及其亲信占据了主要地位，中央常委基本是由白云梯及其亲信组成，左右着党的主要活动。一部分蒙古族年轻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社会上以及建党中，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在党的主要领导层中无法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更没有掌握主要领导职务。因此，在革命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党内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分歧甚至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在该党中央迁到包头以后，旺丹尼玛凭他的社会影响和带兵打仗的阅历，被推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李裕智任副总指挥。早欲掌握军权的白云梯对此自然是不满意的。不久，旺丹尼玛被食物中投毒而遇害牺牲，白云梯迫不急待地接任了总司令，还十分奇怪地委任旺丹尼玛的夫人为副总司令。该党中央迁到宁夏银川以后，很少集中力量领导基层的革命运动，甚至反对农牧民组织群众团体，打击进步势力，阻碍革命运动的发展，热衷于内部的纷争，事实上削弱了革命力量。

1927 年 7 月，在银川召开了部分中央委员和乌伊两盟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特别会议，起初指责郭道甫在阿拉善旗的工作，停止了他的职务，引起无谓的纠纷。但是，由于李裕智、奎璧、吉雅泰、纪松龄、王瑞符、奇子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及乌伊

两盟代表的坚持，讨论了党的工作，并于10日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实现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成立内蒙古民主的自治政府；进一步加强与一切革命党派的联系，坚持共同的革命道路；彻底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制度，解放奴隶，废除封建徭役和苛捐杂税；在条件成熟的旗内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总理旗政大事；倡办文化军事学校，提高穷苦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各旗要创建人民革命军队，消灭敌人，保障人民居住、工作、学习、举行党的各种会议，出版、言论自由等权利；条件成熟的旗内组织人民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取缔奸商等。宣言最后声明："当今世界上被压迫之无产者和穷苦劳动人民，以及各弱小民族，为摆脱一切专横独裁之敌的压迫，为争取自由解放，进行浴血奋战之际，吾蒙古族人民应尽早觉醒，并与之密切联合，共同斗争，才能获得自由，达到安居乐业，取得进步，永与各民族一律平等，兴旺发达，最终享有人类福祉。"① 这是革命者同白云梯集团的一次重大较量。会议期间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内蒙古党务应由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各人民党派等几方面，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商决各项有关重大事项，"② 并决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次特别会议。这次大会还选举和决定了出席乌兰巴托会议的代表。

1927年8月5日，在共产国际驻外蒙古代表阿木嘎耶夫主持下，在乌兰巴托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中央常委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李丹山、福明泰、乐景涛出席；伊克

① 《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代表及全体委员特别大会宣言》，1927年7月10日，原件系蒙文。

② 同上。

昭盟乌审旗的孟和乌力吉、鄂托克旗的章文轩、准格尔旗的奇子俊（即拉布敦）、韩裕如、乌兰察布盟西公旗的芒来巴特尔、察哈尔的纪松龄、正红旗的宝音巴特尔（贺志远）、哲里木盟的布尼雅巴色尔、卓索图盟的吴文献、呼伦贝尔的察干喇嘛等 40 多名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派乌力吉敖其尔、白永伦、白海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派云润等参加会议。蒙古人民革命党书记丹巴道尔计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中国革命特别是内蒙古地区革命的形势，回顾了党的工作，揭露和批评了白云梯、郭道甫等背离党的纲领、丧失革命时机，延误党的工作的错误，批评他们之间搞宗派斗争给党造成的恶果。但是，白云梯、郭道甫初则拒不检讨错误，反而互相攻击，继续其宗派斗争；继则联合起来攻击会议代表对他们的批评是夺权，在丹巴道尔计的支持下，进行破坏会议，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阿木嘎耶夫支持共产党人和革命左派，规劝丹巴道尔计不要干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事务，教育白云梯、郭道甫检讨错误，挽回影响。与会代表以极大的耐心帮助白云梯、郭道甫认识错误，以党的事业为重，开好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的难苦工作和激烈的斗争，比较彻底地清算了白云梯等人的错误，统一了思想，重申了党的纲领，确定了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深入基层，加强群众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应付中国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继续发展内蒙古革命。会议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白云梯的委员长职务和郭道甫的秘书长职务，保留中央执行委员；撤销了金永昌、李丹山、巴彦岱（于兰斋）等人的中央领导职务；选举孟和乌力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白云伦为秘书长，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孟和乌力吉、白永伦、福明泰、布尼雅巴色尔、白海风五人组成；增选宝音巴特尔、纪松

龄、奇子俊、恩克巴雅尔、乌力吉敖其尔、云润、章文轩、察干喇嘛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乐景涛声明退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鉴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内蒙古地区的形势严峻，会议决定中央领导机关暂时设在乌兰巴托，会后派工作组分赴内蒙古各地恢复工作。

共产国际和新中央决定将白云梯等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或派往苏联学习。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丹巴道尔计不经共产国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同意，将白云梯、金永昌、李丹山、巴彦岱等10多人私自送出国境，让其潜回内蒙古。9月间，白云梯等回到银川以后，封锁会议精神，并以旧中央名义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内蒙古国民党反共宣言》，[①] 公开叛变革命。宣言称："近来，竟有少数投机分子，由莫斯科回库（即库伦——引者），宣传共产主义，破坏本党原有组织，利用本党在库新开特别大会之机，假第三国际之势力，操纵会务，强制代表推翻本党第一次全内蒙古代表大会之宣言及决议案，另行组织共产党部，实行赤色主义。"攻击革命左派"实欲将内蒙一片净土作将来讨赤之战场，置数百万人民于惨劫之中，引火焚身，害国殃民，与本党救人民之主义，大相径庭，况苏俄假第三国际扶助全世界弱小民族之美名，而实行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之事实"，声称："本党为保持蒙族，解放人民，脱离封建专制，完成国民革命起见，断不容赤色帝国主义流行于内蒙，陷我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故将混迹本党内之共产分子，按名查清，一律开除党籍外，更将本党纪律益加森严，训练益加精密，奋斗不懈，完成革命，兹将本党主义及最后主张一并宣言如左：一、拥护本党第

① 白云梯：《内蒙古国民党清共经过》，1928年10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

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一切决议；二、实行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旗帜下之各党军、各团体及外蒙国民党彻底合作，共同奋斗，巩固革命战线，以期国民革命早日成功；三、本党党员凡有违反本党主义者，均以敌待，立行铲除。”白云梯集团正式宣布，实行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并在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上，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致使内蒙古革命全面受挫而转入革命低潮。

白云梯在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同时，首先决定杀害李裕智，彻底夺取军队领导权。当时，白云梯以派部队支援伊盟乌审旗的革命斗争为名，要李裕智带兵前往，并派其亲信暴子青随同。行至途中，暴子青按白云梯的旨意，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李裕智。这是继张作霖杀害多松年之后，蒙古族的又一名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李裕智遭到民族内部叛徒的杀害。这时，在宁夏等地活动的共产党员奎璧、王瑞符、吉雅泰、贾力更等也被迫转移到外蒙古。白云梯早先派到乌审旗的包悦卿也开始叛变活动，更换部队军装和符号，扣捕杀害十多名革命者，并要将正在与井岳秀战斗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 12 团调离乌审旗，以扑灭乌审旗革命。但是，锡尼喇嘛识破了包悦卿的用意和背叛革命的行径，机智而勇敢地将包悦卿驱逐出旗境，未让其阴谋得逞。白云梯为表白其功绩，曾自述：“本党派包悦卿为内蒙革命军骑兵第一旅长兼前敌总指挥，领兵入伊克昭盟，攻击该盟长，宣抚各旗军队，铲除反动分子，同时解决有名首领格尔勒等数名，本年在各旗组织旗党部与区党部，在乌伊两盟及土默特各旗宣传党义，又于宁夏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反对共产党，同时在本党对于嫌疑者赛兴额

（即纪松龄——引者）等十余人分别开除党籍通缉之。”[1] 白云梯叛变革命后，即到南京向蒋介石请功。他表示了彻底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此次云梯代表内蒙党部莅京，为内蒙国民党同志直接受中央之指挥，以巩固革命阵线及统一党权起见特向中央提议改‘内蒙古国民党’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党部’，……此乃云梯之宿愿。”[2] 在获得蒋介石的首肯之后，6月间由白云梯“电邀包悦卿等十余人晋京，令改组本党，荐包悦卿等9人为内蒙古党务指导委员。本年7月，由宁夏起程，8月抵京，在中央宣誓就职，9月底北回，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同时派定热、察、绥各盟旗指导委员20余旗，同时翻译党义书籍多种，分发各旗宣传。”[3] 随即白云梯便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张家口召开各盟旗王公代表会议，决定在多伦设立内蒙政府；一切设施悉听中央政府之命令；联络国军，维持内蒙政府；全内蒙悬挂青天白日旗等。至此，白云梯集团彻底背叛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背叛了内蒙古革命，完全彻底地投入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其镇压内蒙古革命的帮凶。应当指出的是，白云梯等在他们当初参加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反帝反军阀反王公革命纲领的张家口，与蒙古王公握手言和结盟，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完全暴露了他们假革命的面目。

① 《内蒙古党务报告》，1929年3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 《白云梯委员对于内蒙议论之声辩》，1928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
③ 《内蒙古党务报告》，1929年3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确立其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国民党南京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专事统治蒙藏等少数民族的事务；在内蒙古设置热、察、绥三个行省，以分割统治蒙古民族；网罗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和官僚政客，充当其统治蒙古民族的工具；加紧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之下，陷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

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并加紧付诸实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一起变成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加紧向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扩张侵略，内蒙古面临全面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蒙古王公上层、官僚政客和政界人士，一部分人反对设省，要求自治，发动自治运动；也有一部分人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苟且偷生；少数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甚至鼓吹内蒙古“独立”，背叛祖

国、出卖民族利益。内蒙古民族问题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和发展内蒙古革命，始终坚持领导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面对新老军阀的白色恐怖，迎着反革命的腥风血雨，一批又一批地派出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内蒙古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问题，制定内蒙古革命的方针政策和蒙古民族政纲，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广泛进行群众工作，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大力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内蒙古革命在中共中央的就近直接领导下，得到了全面健康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中心，内蒙古革命以及抗日救亡运动，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的局面。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内蒙古地区的形势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内蒙古的确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过一年多时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和河北省以及察哈尔、绥远两个特别区。1928年7月，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提出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的建议。这自然是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内蒙古的一个重要主张和行将采取的措施。当内政部向国民政府正式提出改省的建议后，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当即电询阎锡山和北平、太原两个政治分会及河北省政府的意见，并征得同意。8月，内政部连同将青海、西康改省的意见一并呈送审核。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省，并要求内政部拟定改制办法和各省的名称。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内政部拟定的改省方案作出决议："（一）热、察、绥、青海、西康均改省；（二）旧直隶省口北道各县划归察哈尔，察哈尔原划绥远之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仍归还绥远；（三）五省省府组织，委员暂定五人，设民（政）、财（政）二厅，并得酌设教（育）、建（设）厅，余照省府组织法办理。"[①]另外，9月12日中政会又决定将集宁归还绥远。9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改为行省的命令。从蒋作宾提出建议到国民政府公布改省命令，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此紧锣密鼓地高效快速的行动作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行政建制的决定，足见其在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确立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国民政府的改省命令下达之后，到1929年初热、察、绥三省的政府即先后宣告组成。清王朝覆灭之前，在东北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改为东北三行省，并将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部分割划入东三省，而且开始考虑在内蒙古其他地区建立行省的问题。北洋军阀一上台就着手改变内蒙古的行政建制问题，1914年即先后设立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特别区，均委任都统管辖，总揽军事、政治、司法、行政大权。这显然是改设行省的第一步。不过，以后虽经多次议论改省问题，但在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反对下，始终没能实现。国民党一当政很快就完成

① 陆为震：《新六省之鸟瞰与西北之边防》，《东方杂志》第27卷14期。

了清王朝、北洋军阀的“未竟之业”。至此，我国蒙古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被分割于先后设立的8个行省之内，即呼伦贝尔部、哲里木盟以及伊克明安旗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划归热河省；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左翼和4牧群划归察哈尔省；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土默特旗划归绥远省；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划归宁夏省。于是，“内蒙古及青海蒙古等之名称，不复存在”，[①] “内蒙古之名词实已不当存在”[②] 等论调喧嚣一时。国民党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盟旗的地位及与省县的关系，但各盟旗的地域已被划入省境之内，而且规定各省省政府中设蒙古委员，由盟长或总管充任，事实上蒙旗已归省府管辖，即省府通过担任蒙古委员的盟长或总管行使治理之权，这是取消盟旗的一个过渡阶段。国民党的这一决定，使内蒙古地区的汉族官吏和地主、绅商欣喜若狂。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既得利益得到了巩固；向来角逐争夺内蒙古一席之地的各派军阀也颇为得意，积极安排人马争夺各省的权利。但对内蒙古的蒙古民族来说，这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他们的聚居区域彻底被肢解分割，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也将被瓦解，仅能起到维系蒙古民族的盟旗制度，也将要崩溃。这是清末以来，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标志之一。设省的严重后果反映在以后国民党统治内蒙古22年历史的过程中，反对设省也成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国民党当政后，对国内民族问题采取如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是它背叛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民族政策的必然结果。尽

① 黄奋生：《蒙藏新志》（上），第1页，中华书局，1938年。
② 谭惕吾：《内蒙之今昔》，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

管在 1929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提出的民族纲领中标榜“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1] 但是它抛弃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建国大纲》中规定的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扶助国内弱小民族之自决自治。组织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等实质性的主张，代之以“国族主义”、“中华国族”等抹杀民族差异的概念，以所谓共同利益、密切团结、“共谋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之建设”[2] 等空洞的口号，掩盖其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的实质。

国民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大刀阔斧地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六个行省的同时，也着手筹建其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所谓边政机构。白云梯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以后，于 1928 年 1 月建议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置蒙藏部，以取代北京政府蒙藏院，处理蒙藏事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几经讨论，决定成立蒙藏委员会。1928 年 3 月，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了蒙藏委员会第一个组织法。以后又经过修改补充，正式形成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并由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白云梯负责组织蒙藏委员会筹备处。6 月间，国民党中政会决定任命张继、白云梯等 7 人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指定张继、白云梯、刘仆忱 3 人为常务委员；7 月，各委员在南京宣誓就职，并派员前往北平接收北京政府蒙藏院。年底，国民党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委员增至 11 人。1929 年 2 月，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

蒙藏委员会实际上是从清朝理藩院和北洋政府蒙藏院演变而

---

① 《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第 61 页，蒙藏委员会编印，1934 年。

② 同上，第 62 页。

来的，其职能和组织机构大同小异。蒙藏委员会成立后的 20 多年中，其职能在多次修改的组织法中一直规定为“一、关于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二、关于蒙古西藏之各种兴革事项。”① 1929 年 8 月国民政府司法院规定，在处理蒙藏事务时，蒙藏委员会“于一定范围内，仍酌量援用理藩院则例。”② 1934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对于处理蒙古盟旗事项权限划分办法》中规定：“蒙藏委员会除依照本会组织法，掌理关于蒙古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外，前清理藩部则例所载关于蒙古各盟旗设官、奖惩、铨恤、军政、司法、宗教等事项，历经照例办理者，亦均系蒙藏委员会对于蒙旗直接主管范围。”③ 显然，蒙藏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掌管蒙藏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主管部门。其内部机构经过多次增设裁撤，基本形成了蒙事、藏事、总务等 3 处，参事、会计、统计、调查、编译等 5 室，还有秘书、参事、顾问、协赞专员等人员之设。蒙藏委员会所属单位有驻平办事处、蒙藏招待所、北平蒙藏学校、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蒙藏月刊社、杀虎口牧场、张家口牧场、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驻藏办事处以及派驻边地各调查组、蒙古各旗协赞专员等。蒙藏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一再增加，从 11 人一直增加到 35 人；在 20 年历任 8 位委员长中，除回族马福祥任职 1 年零 4 个月，蒙古族白云梯最后任职半年外，其余全部是汉族人士。在 9 任副委员长中少数民族人士除马福祥、白云梯各任职 1 年和半年外，1948 年 12 月增加了一位藏族人士喜饶嘉错。在委

① 《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 141，档号：1、2。
② 马福祥：《蒙藏状况》，第 65 页，蒙藏委员会印行，1930 年。
③ 黄奋生：《蒙藏新志》（上），第 216－217 页。

员中虽有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但其权力是掌握在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手中的。这种组成人员的民族结构也是蒙藏委员会性质的表现之一，即蒙藏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政府统治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机构，很难谈得上为少数民族办事，解决少数民族的实际问题，更不可能扶助少数民族的自决自治。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王公、喇嘛、土司等僧侣上层进行联络，起到维系、笼络、监督和控制少数民族的作用，协调解决省县政府无法单独解决所属地区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纠纷和问题。

为了协调划分蒙藏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其他部会之间对蒙藏事务的关系，1933年蒙藏委员会与内政部会商决定了《蒙藏委员会与内政部汇办案件之标准》，凡处理边疆各种事务，由内政部与蒙藏委员会尽量以互相商办为原则，蒙藏委员会处理凡与内政部执掌有关的事务，均应与内政部会商办理；内政部处理凡与蒙藏委员会执掌有关的事务，也均应与蒙藏委员会会商办理。在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部会中，还设立了专门处理边疆事务的部门。如教育部设有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还设有边疆党务处，由该处派出蒙旗党务特派员，管理蒙旗党务；国防部、军令部和参谋本部也均设有专管边疆有关事务的机构或派驻蒙旗军事专员，专门控制国防、军事事宜。特别是参谋本部的边务组，是蒋介石为直接掌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情况而设置的，由参谋本部次长负责。这是一个凌驾于各边政机关之上的特殊的机构。它经常奉蒋介石之命赴各边疆地区巡察，参与重大边疆事务的巡视和处理。此外，还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蒙藏事务联络机关，如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西藏班禅驻京、驻平办事处，西藏驻京、驻平办事处，绥境蒙政会驻京办事处，绥蒙指导长官公署驻京办事处等；还有一系

列指导监督机关，如西陲宣化使公署、蒙旗宣化使公署、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蒙旗宣慰使公署等。在张学良控制的东北政务委员会下设有蒙旗处，专管内蒙古东部盟旗的事务；在绥远省政府秘书处内专设蒙务组，负责内蒙古西部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的事务。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这么多边政部门和参与边政事务的机构，这是历来没有过的。

国民党当政之后，在新设行省设置各级统治机构的同时，大力镇压内蒙古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竭力笼络扶持蒙古封建王公、活佛喇嘛，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培植新的官僚、政客，以充当其代理人，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这是国民党确立其在内蒙古统治的重要施政措施。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内蒙古的国民党右派、奉晋军阀，以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右派集团，一起疯狂反共反革命，屠杀革命者，实行白色恐怖，使内蒙古革命处于低潮。尽管如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并没有屈服，一直在坚持地下活动，恢复党的组织，准备新的斗争。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从未中断。伊克昭盟乌审旗的革命政权依然屹立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内蒙古东部地区又爆发了著名的嘎达梅林起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左派力量，为恢复斗争而进行着艰苦的工作。这一切对国民党确立在内蒙古的统治自然是最大的障碍。国民党一刻不停地加强其镇压革命的措施和活动，共产党的组织一再恢复一再遭到破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和蒙古封建势力的联合攻击。国民党动员陕北军阀联合蒙古王公封建势力围攻乌审旗革命政权，蒙古族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锡尼喇嘛遭暗杀，乌审旗革命政权被颠覆，恢复了往日的封建统治秩序。嘎达梅林起义也遭到东北军阀和封建王公的血腥镇压。国民党在内蒙古掀起了反共、反苏、

反革命的恶浪。

在内蒙古大革命运动中，蒙古王公封建势力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他们对共产党、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外蒙古革命的反封建主张恐惧不安，对农牧民的反封建斗争视为洪水猛兽。总之，对革命抱有敌意，与之誓不两立。国民党的防共、防苏、防赤化的口号，自然得到大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喇嘛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也恰恰利用这一点，并考虑到蒙古封建王公掌握着盟旗的政治权力和武装力量，且在大部分群众中还有一定的权威，是维持内蒙古封建旧秩序的主要力量。因此，要决意利用与它在阶级利益上一致的蒙古民族内部的僧俗封建势力。国民党不再提当初曾高唱的“打破王公制度、唤起民众”之类的口号了，蒙藏委员会也不再提起当初在施政纲领和训政工作分配年表中的“革新蒙藏旧行政制度”、“废除封建的世袭制度”、“奖励自动取消封号之王公”、“实施全民政治”[①] 之类的规定。虽然将札萨克由世袭改为“任命”，但札萨克的人选仍然出自原札萨克家族之中的王公贵族子弟。而且内蒙古各盟长、总管被任命为各有关省的省政府委员，拉他们加入国民党，授以各种司令、宣化使、宣抚使等名义，甚至委以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所谓“尊重王公、崇信活佛”是国民党笼络蒙古僧俗封建势力的方针。1931 年 2 月，蒋介石亲自特召班禅来京，“垂询边情”；6 月，国民政府加给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第二年 12 月班禅二次进京，被委为“西陲宣化使”。国民党派班禅赴内蒙古各盟旗“宣化蒙民”。1934 年初，班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而且拨巨额专款支持他的活动。与此同时，章嘉呼图克图在国民党中央与蒙古封建上

---

① 《蒙藏新志》(上)，第 306 页。

层之间充当了一个十分卑劣的角色。1932 年 4 月，国民政府加给章嘉“净觉辅教”名号，12 月被委以“蒙旗宣化使”之职。由于章嘉为国民党“宣化蒙旗”有功，他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进一步加给“护国大师”的名号，又成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为了把这种笼络蒙古王公、活佛的方式形成制度，1934 年制定了《蒙古各盟部旗行政长官分班来京展觐办法》和《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以及招待规则、赏赉办法、展觐礼节、班次等项制度，以便实行有效的控制。

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十分清楚，在内蒙古实行强固的统治仅仅依靠蒙古封建王公、上层喇嘛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利用已经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新官僚、政客，也还要培植、招揽更多的为其所用的蒙古族年轻骨干力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在谈到蒙藏情形的时候说：“一是旧的势力逐渐动摇，一是新的势力不统一的发展。近来境内环境之变迁、生活之不安定、新潮流之鼓荡，不仅唯一尊贵之王公渐失民众之同情，即神圣尊严之喇嘛，亦渐失其信仰……现在如何改进其旧的势力，使其有规则的演进，如何指导新的势力，使其统一的向上繁荣，是为中央治理边疆的核心”。[①] 国民党全部收罗了以白云梯为首的背叛内蒙古革命的蒙古族政客，委以各种不同的职务；同时笼络利用以吴鹤龄为首的曾被白云梯一派称之为蒙古王公走狗的另一派蒙古族政客，使之在联络蒙古族上层方面发挥作用。吴鹤龄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包揽了蒙事处的一切。此外，国民党中央还三番五次地作出培养录用“蒙藏人才”的决议，决定设立蒙藏学校，并附设蒙藏研究班，以培养所谓“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

① 《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第 300－301 页。

才”，“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优先登录蒙藏人士，参加地方行政，并奖励蒙藏优秀分子，来中央党政机关服务。”[①] 甚至准许蒙古人适用特别入党办法，拉更多的蒙籍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专设蒙藏组织科，规划蒙藏党务；在其中央政治学校专设蒙藏班，在包头、西宁曾设分校，以培养蒙藏籍国民党嫡系干部。一些蒙古族国民党特务、党棍和小政客从这些机构中滋生出来，成为国民党内的蒙古族新贵。尽管国民党在笼络蒙古族知识分子和青年方面，采取了不少办法，但是因为它对蒙古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引起更多的人的反感，笼络愚弄的手段是不能持久的。许多蒙古族有识之士在民族危亡、革命高涨、特别是要求自治的斗争出现的时候，他们或与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或转到与国民党对立的阵营中。国民党怀柔羁縻的老办法也逐渐被蒙古民族所识破。

国民党在内蒙古设省之举，当即遭到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各盟旗盟长、札萨克纷纷致电致函国民党政府，要求暂缓设省，并派盟旗代表与一部分在北京的蒙古族人士组成“蒙古代表团”，由原蒙藏院秘书吴鹤龄率领，于 1928 年 9 月赴南京请愿。蒙古族各阶层这种激烈的反应和行动，国民党中央甚为震惊，未敢强力镇压，而取慎重态度，甚至蒋介石也在其手谕中要求转告请愿者：“孙公手创共和，以扶植五族共同发展为职志。政府秉承遗教，各盟旗倾诚向义……至于行政措施，亦必因地制宜，以期边地人民之便利，决不能忽视历史，骤事更张，……在中央未明定办法以前，一切均仍旧制。即希宣告所属，勿用惊疑，仍盼

---

① 《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第 64、66 页。

深念遐观，协力图治，巩固边疆，"① 以示安抚。1929年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蒙藏行政制度未经确定以前，所有名称官职，暂准照旧。"② 蒙古各盟旗王公上层最担心的盟旗制度被废除和王公封建权力被取消的问题，暂时缓和下来。同年6月，国民党在其三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蒙藏之决议》，并决定召开蒙古会议。1930年5月29日，在南京召开了蒙古会议，由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马福祥主持，除内蒙古西部和青海、新疆各盟部代表因中原大战而中途受阻未能出席外，其他盟部代表、蒙藏委员会全体委员、国民党中央代表以及东三省和热河省各派1名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谭延闿、胡汉民、孔祥熙、孙科等要员到会，还讲了话，以示重视。蒙古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蒙古的盟旗制度问题和自治问题。会上以省方和部会代表为一方，以盟旗代表为另一方，双方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取得一致。前者主张取消盟旗行政建制，代之以省县，更谈不上自治；后者主张盟旗与省县完全分治，旗隶于盟，盟直属中央。蒙藏委员会的提案同意蒙古盟、部直隶于国民政府，但要受所在省政府的监督。哲里木、卓索图两盟的部分代表分别提出建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机关、实行自治的要求。哲、卓两盟代表的方案在省方代表的激烈反对下被否决。会议历时两周，提出127件议案，形成60项决议案，包罗事项甚多，其中最重要是《蒙古盟旗组织法》。直到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经过修正加了一个"部"字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确认了蒙古盟部旗在体制上与省县同等的合法地位，保存了盟旗制度的现状；规定盟长以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1－（2）364。

② 《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第90页。

下各职官照旧，各旗札萨克照旧，保护了蒙古王公的封建特权地位。这个组织法中虽然有盟民代表会议和旗民代表会议的条款，实际上不过是在保护封建统治制度的躯体上套了一件有民主色彩的外衣而已。这部组织法既肯定了国民党在内蒙古的设省决定，又以保留盟旗制度的合法地位和保护封建王公的特权统治，达到暂时稳定内蒙古局面的目的，这也是国民党确立其在内蒙古统治的过渡办法之一。

国民党执政以后，在内蒙古地区通过设置行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采取各种强化统治的措施，到 30 年代初基本上确立了它在内蒙古的统治地位，形成了它对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统治政策。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及其由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是经历过一个发展、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日本侵略者觊觎内蒙古也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积极着手侵略“满蒙”。为此，日本在 1904 年和 1905 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日俄战争，与沙俄争夺“满蒙”。日本战胜沙俄因而从沙俄手中夺得了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支配权。随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侵略和独霸“满蒙”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1907 年、1910 年和 1912 年，日俄签订了三次密约，他们划分了在我国东北和内外蒙古的势力范围。在这之前，日本间谍已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活动。诸如伊藤柳太郎、吉原四郎、横川省三等间谍在内蒙古东部盟旗进行广泛的调查活动；日本女间谍河原操子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在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贡王

府潜伏下来，刺探情报。日俄战争中，日本派遣一个特别任务班，穿越内蒙古东部地区刺探军事情报和进行各方面的调查，并在喀喇沁右旗王府形成了一个间谍联络站。1906 年和 1907 年一批日本间谍在东蒙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1908 年以此调查资料编辑出版了《东部蒙古志》。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天津驻屯军，从 1909 年到 1915 年联合组织了对“东蒙古”的大规模实地调查，耗资 20 万日元。1914 年，日本陆军界官员在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地区进行所谓“纵断旅行”，搜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地理以及风俗习惯方面的资料，写出了《蒙古纵断旅行记》；同年，日本参谋本部、农商务省、驻华公使馆、“满铁”、奉天总领事馆等联合组织了“蒙古旅行团”，对内蒙古地区作了更加全面细致的调查，编纂出版了长达 2000 多页的《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在绪言中写明了“派遣旅行团的目的，是为了资助在顾及帝国将来发展和关系国防的东部内蒙古的帝国经营”。[①]在结论中提出经营的当务之急是“设定开放地”，“保证旅行通商的自由”和“获得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②] 另外还提出一系列建议，诸如培养精通蒙文的人才，发展与蒙古相关的文化教育、举办农事试验场、博览会、发行蒙文报刊等。

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 21 条要求；5 月 7 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内答复；5 月 9 日，袁世凯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是“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的七条要求，其中有五条是涉及内

---

① 石光真臣等编：《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第 1 卷，绪言，1914 年铅印本。
② 同上，第 13 篇。

蒙古东部地区的。一、日本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营造商工业应用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须要土地之租借权和所有权；二、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三、中国政府允许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臣民；四、中国政府如准许他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或以该地区课税作抵押向他国借款时，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五、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由此可见，20 世纪初以来，日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所谓“旅行”、“调查”活动，以及所编纂的“蒙古志”、“旅行记”、“调查报告”等，都是为上述五项侵略目的进行了准备。因此，内蒙古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目标中的地位也就十分清楚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内蒙古地区的过程中，拉拢和利用蒙古封建王公上层是其始终如一的手段；煽动、策划蒙古王公上层的“自治”、“独立”是为其“满蒙政策”服务的主要策略。早在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日本军队便以不触犯蒙古王公利益而得到蒙古王公的好感；进而又以派间谍为蒙古王公任家教、办学校，引诱王公访问日本，与王公合办企业，甚至给王公借款等办法拉拢王公。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连续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和浪人为此充当急先锋。川岛浪速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日本如果想在中国确立优胜的地位，首先要在“满蒙”建立巩固的立脚点，而且用特殊方法把“满蒙”收入其势力范围。所谓特殊的方法，就是策动蒙古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但是，他们策划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1916 年 10 月，巴布扎布为首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破

产以后，特别是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表现得隐蔽一些。在外交政策方面实行所谓“协调外交”，以所谓“和平的”、“渐进的”、“经济的”方式来扩张其势力，对“满蒙政策”的推行也是此种方式。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以后，日本商品开始大量流入内蒙古。几年之内，日本商品在内蒙古东部市场占了优势，百货日用品已充斥通辽市场，棉织品中日本货占90%。1920年林西市场上的日本商品的品种达43种之多。20世纪20年代以后，内蒙古特别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日本商品的广大市场。内蒙古地区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重要目标。20世纪初，日本人曾与巴林右旗王公订立过“合办东蒙古拓殖盛德公司”，各出资金5万元。1913年所办“中日实业股分有限公司”，资金达500万元。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向内蒙古输出资本。1918年“满铁”创办了“满蒙毛织株式会社”，资本达300万元，主要是经营内蒙古的羊毛。1919年在巴林创办了蒙古王公与日本资本家合资的“蒙古产业公司”。同年设在西扎鲁特旗的“隆育公司”，1921年设在通辽的“哈番农场”、1923年设在奈曼旗的“华兴公司”，都是以中日合办名义由日本资本创办的企业。修筑铁路是日本侵略者向内蒙古地区输出资本的重要途径。1913年10月5日，中日签订的《满蒙五铁路借款预约》，其中由四平街起经郑家屯到洮南府；由长春的吉长铁路车站起贯越“南满铁路”至洮南府；由洮南府至承德府，这三条铁路都是通向内蒙古的。1915年12月17日又签订《中日四郑铁路借款合同》，1919年9月8日再订《中日四洮铁路借款合同》。1917年4月到1923年10月修成了四洮铁路，日本投资近4000万元。1925年6月到1926年7月又修成了洮昂铁路，“满铁”垫资达

1700 余万元；京绥铁路张家口到包头段的修筑也从“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借款 600 万元。为了全面控制内蒙古的经济命脉，1923 年 11 月，“满铁”向日本政府提出“促进满蒙五铁道的敷设”，其中白音太拉到开鲁、洮南到齐齐哈尔两条铁路是深入内蒙古地区的。1925 年 9 月，“满铁”又提出今后 20 年间的“满蒙开发铁道网”，新建 35 条共计长 2800 公里铁路。其中有关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有 11 条。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经济侵略是步步扩大，逐渐深入。除了上述修筑铁路外，还特别热衷于投资经营土地。“东蒙古拓殖盛德公司”拟把“开垦荒地”作为第一种经营项目；“佐佐江农场”在通辽县占有土地 4.8 万多亩；“早间农场”也在通辽占地 41000 多亩；“华峰公司在东扎鲁特旗占地 14.4 万亩；“隆育公司”在西扎鲁特旗占地 54 万亩；“哈番农场”在通辽占地 1 万亩；“蒙古产业公司”在林西占地 324000 多亩；资本达 20 万银元的“华兴公司”主要在奈曼旗经营水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毫不隐讳地说：用收买、强占等多种手段取得大片内蒙古土地的所有权，使内蒙古逐渐在事实上成为“日本人之蒙古”。

1927 年 4 月组成的田中义一内阁，以极大的劲头推行“满蒙政策”。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在东京召开的所谓“东方会”，决定了所谓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在 7 月 7 日东方会议的闭幕会上，田中义一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指示，要在所谓“日华共荣”是“对华政策之根基”的幌子下，把“满蒙”和整个中国分割开来。声称“满蒙”在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所谓的“特殊地位权益受到侵害时”，“将采取武装干涉，并且要扶植和支持亲日的地方政权。”“东方会议”闭幕后，田中义一于 1927 年 7 月 25 日进呈日本天皇，即所谓的秘密

的《田中奏折》[1]对其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补充，对所谓“满蒙”的范围作了新的解释，即“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对其“满蒙政策”的内容、性质和实施步骤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奏折”对此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声称“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十分狡猾地提出：“我如欲进出内外蒙，可以与蒙古王公为对手，则缔结利权，使可有裕绰机会。”因此，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还要取得蒙古地区的土地、矿权和羊毛等特产的收买权。田中义一狂妄地宣称：“如其内外蒙古之土地，多数被我买有之时，斯时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欤？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欤？使世人无可辩白。”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到田中义一内阁时已经理论化、纲领化和系统化，它的实质也被田中义一表白的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按照田中义一的设想行事的。1931 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其公开推进“满蒙政策”的重要标志。

三、蒙古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

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但是，蒙古封建上层又掀起了颇有声势的“自治”“独立”运动。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当政以后，对蒙古民族实行在内蒙古以设置行省为主要内容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所

① 国难资料编辑社：《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第 1－58 页，生活书店，1938 年，广州。

致，同时又有日本帝国主义乘机煽动民族分裂成为重要的因素。在这场“自治”“独立”运动舞台上活动的各路蒙古封建上层的共同要求是维护其封建特权统治，他们既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设省置县，动摇其封建的盟旗制度；又反共反人民，即反对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当然，倡导者们的目的也有差异，行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具体做法形形色色。至于一批属于非上层人士的参加者，特别是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出于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关心，成为蒙古封建上层发动“自治”“独立”运动的重要力量，广大蒙古族农牧民群众，基本没有卷入这场运动。

在国民党政府酝酿在内蒙古设置行省的过程中，蒙古族上层人士中就有非常敏感的反应。1928 年 7 月，察哈尔部的杭锦寿、尼玛鄂特索尔（即尼冠洲）代表察哈尔 12 旗群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 12 项自治要求，其主要内容是察哈尔部 12 旗群不受当地县政府控制，要与内蒙古各盟旗联合实行自治，成立“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委员会分会”，直属国民政府管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支配；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委员会分会委员应由察哈尔部各旗群总管充任，并推举其中资望较深者任主席。但是，上述要求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不久，尼冠洲被遴选为国民会议代表，以后又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吴鹤龄率蒙古各盟旗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请求国民政府暂缓设省，也提出自治要求。国民党虽然没有接受请愿要求，可是吴鹤龄受到国民政府的优礼接待，并委以重任，由他筹组蒙藏委员会蒙事处，而且当上了处长。至于在 1930 年 5 月召开的国民党蒙古会议上哲里木、卓索图两盟代表分别提出的要求内蒙古自治的议案也被否决。不过这些要求内蒙古自治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的愿望，反映了蒙古族中潜在的社会运动的趋向。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和策划下，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族上层中也刮起了一股“独立”“自治”的逆风。巴布扎布丧生后，其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也成为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对象。1931 年 9 月 24 日，他们即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举行会谈，谋划内蒙古“独立”问题，并决定组建蒙古“独立军”，配合日本侵略军侵占内蒙古地区。就在甘珠尔扎布等正组织伪军的过程中，日本侵略者考虑到蒙古独立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而且正在筹划建立伪满洲国，并决定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即将建立的伪满洲国。于是，甘珠尔扎布纠合科尔沁左翼后旗五营统领包善一、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实权人物韩色旺，组建内蒙古自治军，打出了内蒙古自治的旗号。日本关东军委派和田劲中佐为顾问，指导组建伪蒙古军。包善一在他统领的五营 250 名骑兵和 1000 余名保卫团的基础上，又新招 1000 余人，由日本关东军提供 3000 支“七九”步枪和 60 万发子弹，组成第一军，共辖 8 个团，包善一任司令。韩色旺收编本旗官兵 1000 余人，新招 1000 人，接受日军“七九”步枪 1000 支和子弹 10 万发，组成第二军，自任司令。甘珠尔扎布则以苏鲁克旗地方武装和收编的几股土匪，共约 1000 多人，组成第三军，并由甘任司令。日本顾问当即主持三军司令开军事会议，决定由这三个军攻打通辽。驻守通辽的东北军第三旅 2000 余人，只留一营官兵和商团埋伏在城内，以空城计诱使主攻城池的包善一部于 10 月 13 日大摇大摆地进入通辽城。当他们正在大吃酒宴庆幸之际，突遭袭击而吃了大亏。蒙古自治军第一军在通辽首战失利，使第二、三军司令也泄了气。12 月中旬，在日本特务诹方策划、操纵下，在泰来召开了部分东蒙王公上层会议。扎赉特旗王爷巴达玛喇布坦、图什业图旗王爷业喜海顺和

寿明阿公爷等王公上层，以及博彦满都等参加。有一些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诹方主要鼓动蒙古人与日本合作，拉拢蒙古王公上层。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在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时，指定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为委员。2月18日，由菊竹稻藏主持，再次召集东蒙古王公上层和社会人士在郑家屯开会，除了参加泰来会议的人士以外，还有呼伦贝尔的凌升及东蒙的玛尼巴达喇等，研究所谓蒙古自治问题，作出了《蒙古自治行政区域的划定》的决议。菊竹稻藏讲话时透露：即将成立满洲国，而且在其国务院内设兴安局，专管蒙古人，科以上官员都由蒙古人担任，实行蒙汉分治。虽然没有谈及蒙古自治的具体内容，但是层层官位却吸引了一部分王公上层和社会人士。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在其下设立了兴安局。所谓蒙古“自治”便不了了之。

5月4日，寿明阿、博彦满都、吉尔嘎朗、满达瑚、玛尼巴达喇等5人，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代表的名义，前往长春向国际联盟调查团递交了《蒙古自治筹备会致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团的陈情书》，直接了当地提出内蒙古脱离中国而实行独立，目前加入满洲国，为其一部分。表示要同“东北各民族本自决自治之原则，平等团结之精神，以联合树立满洲新国”。[①] 而且十分露骨地表明“满洲立国确定以王道立国，蒙古为满洲国之一部，当然亦遵行王道主义。”甚至肉麻地吹棒“日本为东亚黄种民族中之文明先觉者，实有黄种各民族导师之资格，是以我蒙古欲图进

① 《蒙古自治筹备会致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团的陈情书》1932年5月1日，见《蒙古代表对国联调查团陈述之意见》铅印本。

化，确有请彼指导之必要。”① 这份“陈情书”对他们要求蒙古“自治”“独立”的实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内蒙古东部地区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部分从而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就是结论性的回答。

在这之后出现的百灵庙高度自治，是内蒙古西部地区部分蒙古王公上层发动的一次规模和声势比较大的民族运动。它给国民党对蒙古民族实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以一定的冲击，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

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的主要发动者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他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人称德王。德王生于 1902 年，18 岁时即袭任札萨克亲王，执掌旗政。他通晓蒙汉语文，年轻而有活力，不甘寂寞，善于广泛结交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经常出入于张家口、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不同于旧式王公。1925 年以锡盟代表资格参加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被任命为临时参议院参政。1929 年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还随班禅赴沈阳会见过张学良。1930 年左右，他密切注视着围绕国民党在内蒙古设省和蒙古各界要求自治、反对设省的活动，以待时机。1932 年开始，他为在国民党政界获得要职，开始了他第一次政界角逐活动。经过多方营谋，是年秋赴武汉时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他要求编组蒙古骑兵师，虽未得到应允，但却获得一批武器。他从武汉回来之后，拉拢一部分王公上层，组织蒙古代表团，乘蒙藏委员会要改组蒙古各盟部旗驻京办事处之机，利用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反对起草蒙古盟旗组织法的吴鹤龄，而想夺取驻京办事处处长之职，便率团赴南京请愿，再次受到蒋介石

① 《蒙古代表谒见国联调查团之问答》1932 年 5 月 4 日，见《蒙古代表对国联调查团陈述之意见》铅印本。

的接见，并与反对吴鹤龄的白云梯、克兴额等合作行事。结果未能如愿，第一次政界角逐失利。他在南京拜访有关部门和政界首脑，并以“复兴蒙古民族”的口号，拉拢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的蒙古族青年。他在返旗途中，在北平广泛接触旅平蒙籍知识界人士和知识青年。回旗后创办了蒙古干部学生队，云继先、于福赓任教官，从北平和各盟旗招收近百名蒙古族青年，以训练干部。同时与周围的蒙古族青年和年轻上层商谈蒙古自治问题，放弃了在国民党政界的政治活动，决心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

由于德王在蒙古王公上层中锋芒毕露，引起一些自居前辈的老年王公的不满。德王发动自治运动首先要征得锡盟盟长索特纳木拉布坦的同意，否则他将无法举事。于是，他请班禅亲往说服了索王。接着他代表索王请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巴文峻说服了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然后请班禅周游锡、乌、伊三盟宣传内蒙古自治，争取更广泛的支持，结果颇有成效。如此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活动，1933 年 7 月 26 日，在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召开了内蒙古自治第一次会议。但是，响应者甚少，只有锡盟和乌盟的少数王公和上层人物出席。在云王和德王的主持下会议三天，决定：一、要求中央许可内蒙古自治，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二、择期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由锡、乌、伊三盟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各旗王公和旅外蒙籍人士参加。8 月 24 日发出由德王等拟就的“自治”通电稿，决定 9 月 28 日仍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德王特在自治之前加了“高度”二字，这就是内蒙古高度自治的由来，人们也称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

第二次自治会议于 9 月 28 日召开，但因按时赴会者甚少，当即改为预备会议，由已到会者共商会议事项和程序，拟定了向国民党当局要求自治的呈文。呈文以激烈的措词陈述了要求自治

的理由："呈为边疆危急，情形日渐可虑，为期符合蒙众愿望，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实行自治，以救危亡，而固国防。"[1] 抨击以往政府"始而开荒屯垦，继而设县置省，每念执政者之所谓富强之术，直吾蒙古致命之伤。"[2] 陈明"我蒙古各盟旗执政者，咸恍然于事亟势迫，大祸势在目前，倘不联合，无以阻止消灭，而未来命运，舍自救无以为先导。惟是欲图联合，必应先从统一政治着手，以便革清行政积弊；欲谋自救必应将自决自治机关为适当设置，以增加利益与力量。"[3] 就呈文上述内容而言，所陈蒙古民族面临的危机是实际的，所提自治要求也是合理的，反映了内蒙古各盟旗的愿望。当然，这种自治仍然是不触动蒙古封建王公制度的自治，这是十分清楚的。

10 月 9 日，当大部分代表到达百灵庙之后，第二次自治会议正式开幕。由云王主持，德王作报告，先后举行五次正式会议，逐项讨论会议议事内容，直到 10 月 24 日结束。这次会议先后有 127 名代表出席，除锡、乌两盟各旗均有王公上层代表出席外，由于察绥两省政府的阻挠，归化土默特旗和伊盟各有 2 人到会，察哈尔部各旗无人出席。因此，称之为内蒙古自治会议的代表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会议通过的《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集中反映这次自治运动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之点："1、内蒙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2、内蒙自治政府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3、内蒙自治政府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

① 方范九：《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第 64 页，商务印书馆，1934 年。
② 同上。
③ 同上。

法律、命令行之。"[①] 这就是所谓"高度自治"的全部含义。会议还就组织机构、人事安排作出了决定，选举云端旺楚克为内蒙自治政府委员长，没有到会的索王和伊盟副盟长被推选为副委员长，德王任掌握实权的政务厅长，政府委员、各厅长官均由王公上层充任，一些蒙籍社会知名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虽然也担任了政府次要部门的职务，但只是封建上层自治的工具而已。

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采取各种办法阻止这次自治运动。蒋介石提出"首先烛破德王诡谋，恩威并用"[②] 的方针，蒙藏委员会作出派员劝阻，宣慰和拟具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方案的两项决定；察、绥两省政府除向国民党中央陈述阻止内蒙古自治的办法外，千方百计破坏百灵庙自治会议的召开；阎锡山甚至启用章嘉活佛和班禅活佛入蒙宣慰，劝阻自治。10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等部门联合提出解决内蒙自治问题的三项方案，即改蒙藏委员会为边务部，直隶行政院，为处理蒙藏事务之最高机关；在蒙人聚居省份，省政府下设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负责蒙旗事务；在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容纳蒙人，在内蒙适当地方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分校，以培养蒙人人才。第二天，国民党中央举行政治会议，讨论了上述所谓《改革蒙政方案》，并决定以此方案为据，10月下旬派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赴内蒙巡视。他们除沿途与察绥两省会商办法外，11月10日到达百灵庙，与自治会议方面进行谈判。双方各持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云、德二王等提出的甲种方案，即内蒙设若干自治区政府，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管理本区内各盟、

---

① 方范九：《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第64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068。

部、旗一切政务；各自治区间设一联席会议，商决各自治区间共同事宜的基础上修改为11项讨论纲领，双方达成协议，黄绍竑答应转呈中央。可是黄等在返程路经归绥、太原时，与傅作义、阎锡山密商炮制了完全背弃上述协议的《蒙古自治办法》11项，并呈报国民党中央，从而引起百灵庙自治会议方面和蒙古各界的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在南京的蒙籍人士猛烈抨击黄绍竑的卑劣作法，并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收回了《蒙古自治办法》11项。又拟定并公布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8项。其主要之点是，在蒙古适宜地点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之指导，总理各盟旗政务，其委员长、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各盟、旗公署改为政府，察哈尔改部为盟，各盟旗系统组织和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各盟旗牧地停止放垦，不再增设县或设治局；保障盟旗原有租税和蒙民原有地租；省县在盟旗代征各项地方税收，须劈给盟旗若干成等。百灵庙自治会议方面接受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8项。国民党当局于1934年3月公布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

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国民政府任命云王等24名蒙古王公上层和国民党政界的蒙古族人士为蒙政会委员，云王被任命为委员长，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吴鹤龄任参事长，还有一些王公上层和政界人士分任各处处长，一些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在各科室充任不同职务。轰动一时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国民党当局暂时缓和了最棘手的蒙古自治问题，蒙古王公上层掌握所谓自治机关蒙政会的权力，而且保住了封建特权统治，盟旗也有了一定的自治权力。一些政界人士也在蒙政会捞到一官

半职，追随德王的一些蒙古族青年也跻入了政界，似乎各方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对蒙古民族来说，虽不能说一无所获，但所得也十分有限，更谈不上有民族自治权力。蒋介石特意在蒙政会的全称中加上“地方”二字，就限制了民族自治的权力，而且“政务委员会”也很难行使政府职能，更何况在蒙政会之上又设了可以否决蒙政会决议、命令的指导长官公署，由国民党实力人物何应钦任指导长官。因此，蒙政会仅有的一点权力也难以行使。国民党察绥两省当局百般阻挠、破坏蒙政会的事情，而且傅作义建议国民党当局将蒙政会分为绥境、察境两个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在所属各盟进行策动。1936 年 1 月，国民党当局采纳了这个建议，2 月即在归绥成立了绥境蒙政会，伊盟盟长沙王被任命为委员长，并以阎锡山为绥境蒙政会指导长官。百灵庙蒙政会实际上面临解体，这个结局是必然的。

事实证明，蒙古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是不可能解决蒙古民族的自治解放问题的，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推翻民族压迫制度，消灭阶级剥削、压迫，才能真正实现蒙古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第二节　在艰苦岁月里的内蒙古革命斗争

一、内蒙古革命的形势任务与党的方针政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内蒙古革命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内蒙古的统治基本确立，而且采取了比北

洋军阀更为反动的统治措施；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内蒙古的方针和计划也已确定并着手实施；蒙古王公上层打着民族自治的旗号以维护其封建特权统治制度；蒙汉地主封建势力在农村牧区的统治依然如故，而且对农牧民的压迫剥削更加强化；蒙汉各族革命人民遭到反革命势力的报复与打击，革命热情受挫。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对内蒙古的形势与社会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全面分析，确定了内蒙古革命的方针与任务。

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的民族问题，1928年7月，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①] 在六大《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又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②]

从1928年开始，特别是中共六大以后，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和以后的内蒙古特委，当时主管内蒙古工作的中共顺直省委以及中共中央，均按照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和《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的要求，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阶级关系、民族问题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作出了具有相当深度的分析；对于内蒙古革命的性质、任务，特别是内蒙古民族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内蒙古革命的方针，制定了内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7页。

蒙古革命的政纲和政策，为恢复和发展内蒙古革命运动，从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准备。

在中共内蒙古特支、特委和中共顺直省委所作的一系列报告、决定、指示中，对内蒙古的社会经济、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土地问题与蒙汉民族关系，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与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内蒙古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特别是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作了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对内蒙古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问题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在1928年10月23日《致内蒙特支指示信》，[①] 1929年2月30日《给蒙委的信》[②] 和1930年11月5日《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③] 中，对上述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正式制定了内蒙古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内蒙古的民族政纲，全面部署了内蒙古的工作。

在论及内蒙古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时，中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军阀国民党和蒙古王公贵族、豪绅地主、高利贷奸商的统治、压迫、剥削下，政治黑暗、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内蒙古的现代工业非常微弱，只有少数新式煤矿和京绥铁路，城市中只有商业企业和手工工业；在内蒙古南部边沿地带、城镇周围、铁路沿线、河流两岸、平原地区，基本上成为农业区；在北部戈壁荒漠，山丘草原地带，仍然是牧业区；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还有一个农牧业交错存在的半农半牧区。概括地说："内蒙在经济上偏南已走入城市商业经济与农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1页。
② 同上，第100页。
③ 同上，第136页。

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偏北则仍是游牧社会。”[①] 民族和居民分布状况是“偏南（家）于城市及垦地务农的多汉人，偏北守着游牧的生活的多蒙人”,[②] 在半农半牧区则是蒙汉杂居、兼务农牧。“在总人口上说蒙族要占全人口的半数以上，自然民族问题便占了内蒙问题的主要地位。”[③] 内蒙古基本上是从游牧经济区域发展成为上述经济格局的地区，这既有自然发展的趋势，更是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对蒙古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所致。

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与民族运动，中国共产党从地方党组织到党中央，在许多指示、报告、工作计划和方针、政策的文件中，不断地进行探讨论证，反复地说明内蒙古民族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内蒙古的民族运动，是内蒙古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内蒙古革命的主要工作之一。中共内蒙古特支认为“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就是蒙汉两民族的农工兵牧群众，从帝国主义、军阀、王公、喇嘛、土豪劣绅、奸商压迫之下得到解放。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④]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内蒙民族运动在民族运动上说是很有革命意义的，我们应当积极领导”,[⑤] 内蒙工作的对象，“应特别注意于蒙古民族的工作。内蒙民族运动，应确定为蒙委（内蒙古特委——引者）主要工作之一。”[⑥] 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

---

① 《中共中央给蒙委的信》(1929 年 2 月 30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1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中共内蒙古特支：《关于内蒙古问题与党的任务的报告》(1928 年 4 月 9 日)，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16 页。

⑤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1 页。

⑥ 同上，第 100 页。

革命的中心问题。

在论证内蒙古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时，内蒙特支认为“农民所苦的是：战争、苛捐杂税、高利贷，总之是军阀与土豪的压迫。牧民的痛苦是：王公贵族的剥削与军阀的侵略、奸商的商业剥削。牧民中的阶级制度，还是贵族（王公）、僧侣（喇嘛）与奴隶。奴隶的生活最为苦痛。牧民与农民——即蒙汉两民族的平民中毫无冲突，他们并且很和平的在一个村落中生活着，并且蒙古王公贵族同样地压迫汉族农民。农民是王公的佃户，他们有给王公纳租的义务。蒙汉两民族平民的共同要求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王公、喇嘛、土豪、劣绅、奸商，建设农工兵牧的民主政府。”[①] 中共中央在分析内蒙古的工矿企业和城市阶级关系时认为，现代工矿企业被外国资本、军阀、官僚控制，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完全由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支配，生产条件落后、工人生活极苦。因此，矿工和京绥铁路工人以及城市手工业工人群众“无疑的是内蒙古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力和领导者”[②] 至于农村、牧区，蒙汉农民虽然不缺少土地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在王公、军阀、土豪劣绅、垦殖公司、外国教会和帝国主义资本家手中，农民所受地租、捐税、高利贷剥削是十分沉重的；蒙古牧民逐渐被排挤到北部的荒漠地带，生产条件极差，生活环境恶劣，逐水草而居，游牧于北疆，而且受王公贵族兵差徭役的折磨，受军阀的压迫掠夺，有的还是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蒙汉农牧民是内蒙古革命的主力军。

---

① 中共内蒙古特支：《关于内蒙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1928年4月），转引自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1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6页。

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确认，解决好内蒙古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蒙汉民族关系，是内蒙古革命斗争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共内蒙古特支、特委和中共顺直省委反复强调蒙汉民族团结斗争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应极力注意蒙汉被压迫民族的联合问题。我们应明白指示给蒙汉被压迫民众看：内蒙的中国军阀国民党不但压迫中国的工农贫民，同样也压迫蒙古的农民牧民，捐税的剥削，更是不分蒙汉贫民一样受着痛苦。王公贵族对于蒙古民众，是直接的压迫剥削，对于中国的农民也多有直接间接的剥削关系。蒙委应根据这些压迫剥削的事实，号召蒙汉贫民能在这种斗争中取得一致的联合，尤其要看做党的重要工作，且只有在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中，蒙汉民族才能一致地联合起来，蒙族解放运动才能获得中国工农贫民的帮助，而蒙族反汉官反汉商的运动，才不致变成反一切汉人的狭隘的民族观念。"[①] 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而且在此基础上"确认内蒙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雇农、贫农、中农），牧民、奴隶（以及兵士）。革命的对象是王公、军阀、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这一革命的任务是完成内蒙劳动群众——特别是蒙人——的解放，铲除封建制度，实行土地革命，赶走帝国主义，推翻王公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内蒙平民共和国，这样，这一革命在性质上应该是彻底的民族的民权主义革命。"[②]

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给以极大的关注。中共中央仍然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视为内蒙古革命，特别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2 - 103 页。
② 同上，第 137 页。

是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中共内蒙古特支、特委以及中共顺直省委对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白云梯集团叛变革命以后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仍然作为内蒙古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屡次要求中央指示方针和对策。中共中央在 1929 年 2 月 30 日《给蒙委的信》中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内蒙的中国党”（即指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党组织——引者）在工农运动中除了执行六大“确立的政纲和一般的策略外，还应对于内蒙民族问题及对内蒙国民党的态度有更明显的政纲和进一步的规定。”[①] 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预定原则”，针对内蒙古民族问题提出“关于内蒙民族的政纲应是：赶走帝国主义的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王公贵族的统治；建立内蒙民族共和国，承认民族自决权；蒙汉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取消王公贵族一切特权，取消奴隶制；没收一切王公地主的土地牲畜，归牧民自牧，农民自耕；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王公贵族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②] 同时针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指出：“关于对内蒙国民党的态度，应认定内蒙国民党只有在反对王公贵族地主极力领导被压迫蒙古民众，尤其是广大的牧民农民的斗争之条件上才能保证其为革命的群众的组织。”[③] 要求中共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应根据上述民族政纲影响它，使其逐渐成为群众的组织，也只有在它“日益深入群众尤其深入于蒙古牧民农民群众中而逐渐成为公开的斗争组织时，我们才能适用加入群众组织的原则有组织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2 页；此处“内蒙国民党”即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亦称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内蒙古平民革命党、内蒙民族党，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② 同上。

③ 同上。

的加入进去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的群众。”“现在还是党外合作的形式，可与他们开联席会议。”[①] 一方面共同反对王公贵族，反对中国军阀国民党，反对白云梯派；一方面站在蒙汉贫民的地位反抗地主豪绅及大商人的压迫，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观念。而且要指明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是会以反对他族而“消灭本族内的阶级斗争的。”总之，合作是“要使蒙族解放运动扩大起来，”[②] 要发展劳苦群众的阶级斗争，以完成民族革命。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践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在上述内蒙民族政纲的基础上，于1930年11月5日在《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中，制定了《内蒙的民族政纲草案》11条：“1、赶走帝国主义，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金融交通机关、企业、农场、牧场；2、推翻军阀国民党王公贵族的统治；3、建立内蒙平民共和国，实行完全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联合外蒙及苏维埃的中国；4、取消王公贵族一切特权，取消奴隶制；5、蒙汉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6、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7、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8、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9、取消军阀政府王公贵族的捐税徭役，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政教完全分离，信教自由；11、联合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联合外蒙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在这一政纲之下内蒙建立蒙汉工农牧民自己的国家，象外蒙的民族独立的平民共和国，内蒙的加入外蒙与否，加入苏维埃的中国联邦与否，完全由内蒙民众自决，同时，我们党应当广泛宣传苏维埃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2—103页。
② 同上，第104页。

制度和苏维埃的联邦制度。”[1] 而且要求译成蒙文在蒙古民族中大力宣传。同时，为贯彻上述政纲又制定了12项行动纲领和具体的工作安排。

全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领导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不仅恢复了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而且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特别是蒙古民族进行了可贵的调查研究，制定了领导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纲、方针、政策，并从理论上探讨了蒙古民族问题，为党制定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资料，应当说这是内蒙古革命对全国革命的一大贡献。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2] 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告国内少数民族书》，并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列入了民族政策的条款。

决议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少数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现状，在分析中国少数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历史时指出：蒙古人、西藏人和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新疆、甘肃等省的各少数民族，历来“受中国（即汉族）皇帝、地主、官僚、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和统治”；民国以来，这些少数民族不但没有得到民族自由与解放，反而受到军阀、地主、官僚、商业高利贷资本更加沉重的剥削与压迫，特别是代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少数民族更是加紧压迫剥削与屠杀。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8页。
② 同上，第169页。

决议案深刻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和民族问题的阶级根源时指出：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与屠杀的不只是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还有汉族的劳苦群众；少数民族人民不只受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而且还受民族内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往往还是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少数民族劳苦群众的工具。决议案庄严声明“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各民族联合起来共求解放。决议案宣布了苏维埃政府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政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必须规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国苏维埃政权帮助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一切地主资本家的革命斗争及民族解放运动；苏维埃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程度，培养与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等。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特别列入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规定中国各民族“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宣布“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

族文化和民族语言。”[1]

1934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苏维埃的民族政策”。[2] 他首先提出：“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这里既把少数民族作为中国革命的力量，又明确了解放少数民族的任务，二者的结合才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基点。毛泽东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缠回、甘肃回民、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都受着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自己内部的统治阶级，如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与英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相结合，使这些民族的广大劳苦民众遭受更加厉害的压迫与剥削，或者他们……直接投降于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迅速的殖民地化这些区域（如西藏、内蒙），更进一步的掠夺民众，这是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毛泽东十分精辟地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这里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全国革命的关系以及民族解放的途径等重大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并且满怀信心地指出：“共同的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66 页。

② 《苏维埃中国》第二集（1935 年印行）。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 年根据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版本翻印本，第 286 页。

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在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国内民族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列入了苏维埃宪法大纲，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在认识上、理论上和政策上趋于成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调查研究国内民族问题，特别是内蒙古民族问题和政治经济状况，制定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领导内蒙古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政纲的同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恢复和开展内蒙古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与内蒙古邻近的有关省委，陆续恢复和重建了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顽强地坚持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

二、中共内蒙古特支、特委及其活动

中共内蒙古特支、特委的组建，经历了一个特别曲折复杂的过程，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能准确而全面系统地谈清楚这个问题，只是概括地叙述其基本的组织状况和活动内容。

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是在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下，1928 年 2 月成立于天津。当时的成员有韩麟符、杨洪涛、郑丕烈、张述、芦东白、云润、曲步霄、辛觉民等 7 人，韩麟符任书记。3 月，中共顺直省委提出了《关于内蒙工作方针》，[①] 对内蒙古革命中涉及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着重探讨了内蒙古的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7 页。

政治状况、阶级关系、革命任务和工作方针，特别分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问题，要求打通与在库伦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机关的联系，互派代表，协调关系。4月9日，中共内蒙古特支作出了《关于内蒙古问题与党的任务的报告》，[①] 对于内蒙古的农业、牧业和工业、商业经济的状况，对于军阀、王公、喇嘛、土豪劣绅、奸商等压迫剥削蒙汉两族农工兵牧群众的现状，对于内蒙古的土地问题和土地关系，特别是对于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与内蒙古革命，内蒙古革命与全国革命之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对于内蒙古革命在全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等等，都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从而提出反对军阀、王公等一切剥削压迫者的任务和具体要求。就在4月间，上述7人以内蒙特支的名义联名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内蒙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②] 根据新得到的资料，又从12个方面综述了内蒙古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剖析了农牧民所受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获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左派已成立新中央领导机构，中共党员白海风、王秉章也加入其中，而且已派人来联络。内蒙古特支由此而于当月又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直接领导内蒙古的工作，以便处理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同时向中央报告了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的情况，热河有党员100余人；察哈尔之张北有120个村庄开展了武装夺粮运动，由杨洪涛负责；绥远有党员70——80人，由云润、辛觉民领导。热、察、绥三特别区党的活动开始恢复。6月间，内蒙特支曾两次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直接领导内蒙工作并尽速拨出活动经费。这时的内蒙特支书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2页。
② 同上，第20页。

记是韩麟符，成员有郑丕烈、玉山、张开运、子善、张次屏（即张良翰）等6人。

同年8月17日，郑丕烈代表内蒙特支向中央请示内蒙工作方针时说明，韩麟符受顺直省委处分而停止工作，其他成员或散失或离去，特委只有郑丕烈一人，要求中央重建内蒙特支。9月间，中共顺直省委制定了《关于内蒙党目前的工作计划》，重申了以往的基本主张，决定成立中共热河临时县委，郑丕烈任书记，张树、芦东白为委员；察哈尔的工作由张家口市委指挥；成立绥远临时县委，指定云零为书记，辛觉民参加，暂时不组织内蒙古特支。顺直省委的计划未及实施，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内蒙古特支，书记郑丕烈，成员有杨洪涛、张振海、孟集平。实际上从8月份开始，内蒙古的工作已由中央直接领导。1929年1月4日，郑丕烈向中央陈述了内蒙古特支的工作任务，并请求拨给活动经费，认为内蒙古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胜利，对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望中央继续研究。2月，中共中央在《给蒙委的信》[①] 中宣布内蒙特支即可改称中共内蒙古特委。1930年6月，内蒙古特委书记郑丕烈以及韩麟符等在天津被捕，特委遭受破坏。

从1928年初到1930年6月，从中共内蒙特支直到内蒙特委，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恢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除了联络原有党员，重建党组织的活动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内蒙古工作的方针、政策，为中央指导内蒙古的工作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建议；同时，由于中共顺直省委的看法不同，关系上的不协调，甚至产生了尖锐的争论，以致用很大的精力争取中央直接领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8页。

导内蒙古的工作，耗费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蒙古工作的开展。另外，这一时期党内当时的“左”倾路线对内蒙古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内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纲中均有所反映。

1930年9月17日，原中共顺直省委负责人之一李希逸提出了《关于热河工作的计划》，[①]除了简述内蒙古的基本情况，重申中央已定的内蒙民族政纲外，着重提出以热河为中心开展内蒙古工作的具体意见，建议立即组织中共热河特委。11月5日，中共中央讨论拟定了《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②]同日致信满洲省委，通知派李希逸主持内蒙古工作，先从热河开始，组建特委，由满洲省委指导，将来察绥组织发展之后，以张家口为中心，建立内蒙特委，以统一热河、察哈尔、绥远的指导。“在内蒙的组织还没有建立根基以前，只要热河党部与内蒙平民革命党发生关系。”[③]

在内蒙特委被破坏以后，特委下属党组织和各地工作的党员，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0月2日，由李铁然（即陈镜湖）、刘刚等主持，在热河滦平县金沟屯召开了内蒙各旗县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内蒙古特委，同时一方面派人赴北平与上级党组织接关系，一方面派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解决内蒙赤卫队与蒙古边防军的联系问题。10月16日，临时组成内蒙特委，李铁然任临时书记兼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刘刚，农民委员张一川、工人委员郭品端、青年委员刘汉民、军事委员陈修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14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6页。
③ 同上，第142页。

元、宫怒孔、王仲华、少数民族委员萧生嘎（蒙古族），并制定了特委的工作计划。1931年2月1日，中共内蒙各旗县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代表李铁然、刘刚、向北满特委李希逸和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内蒙党的工作报告》，[①] 接着又作了《关于内蒙古一般的经济状况的报告》。[②]

中共内蒙特委在上述报告中除了说明恢复内蒙特委和党的工作之外，对内蒙古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特别是具体剖析了军阀在热、察、绥三省提倡种植鸦片、挤占农田、征收鸦片税，造成粮荒，高利贷者乘机放贷盘剥，“一米三谷”使农民苦不堪言，抢粮之举时有发生，甚至流为匪盗，社会动荡不安等混乱问题；而且分析了内蒙古的文化教育落后于内地10年之久，东部每县平均有小学10所以上，而西部不及3所，图书杂志更为罕见；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加紧扩张势力，掠取土地，移民垦殖，组织所谓复兴垦务公司；法国的势力则在西部地区，主要以天主教为先锋，扩张侵略，建立教堂，形成“小天主教国”，占有大片土地，建立教会庄园；蒙古王公与军阀相结合，实行蒙地升科，并且增加苛捐杂税，压迫剥削蒙汉民众，大量的事实说明内蒙古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内蒙特委还报告了内蒙古革命活动的现状。内蒙古当时有党员93人，分布在张家口、多伦、围场、归绥、包头、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前旗、绥西河套、克什克腾旗、锡林郭勒盟、滦平县金沟屯等地；有县党部5个，旗党部3个，特支3个；有青年团员176人，分布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城市的学校和铁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23页。
② 同上，第133页。

路、部队、警察、民团、农村中，而且以内蒙古革命青年团名义组织了蒙汉学社，以研究蒙汉学术加强蒙汉民族的感情，总社设在北平蒙藏学校。工会主要在平绥铁路和归绥、包头等城市，在工业行业有所活动；军事运动主要在热河汤玉麟部 11 师 3 营，锡林郭勒盟蒙古骑兵和绥西河套王英部均有中共特支开展兵运工作，另外在赤峰、围场等地民团、警察中也有党的活动；在农村中，仍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工会、佃农工会等组织，但更多的是农民自发组织的秘密结社，如“三点会”、“一柱香”、“联庄会”、“红枪会”、“道德会”以及“哥老会”等，虽有封建宗法和迷信色彩，但基本上是抗捐抗税斗争的组织者。热河一带的武装抗捐抗税，反对蒙地升科斗争声势较大，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绥西的“哥老会”会众达 10 余万人，东部农民武装有的逐渐发展成为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以后，内蒙古特委以热河为中心，大力领导蒙汉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特别是组织义勇军进行武装抗日斗争。1932 年在日本侵略军侵犯热河的形势下，中共内蒙特委于 9 月 15 日发表了《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苦民众书》,[①] 痛陈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大声疾呼蒙汉各族工农牧兵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在内蒙特委的领导和影响下，热河地区农民抗捐抗税斗争持续不断，武装对抗汤玉麟部，相持数月；绥远赵承绥部一营发动兵变，汤玉麟部一团在承德哗变，强烈要求发放欠饷；北栗煤矿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与经理进行激烈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149—152 页。

斗争。年底，李铁然赴上海向中央报告内蒙工作，在上海中共中央受训练的王逸伦也参加汇报和讨论内蒙工作，并决定其为内蒙特委常委。李铁然和王逸伦返回北平后，于1933年1月初在北平八大胡同住所召开内蒙特委紧急会议，贯彻中央指示，改组中共内蒙特委，组成以李铁然、刘刚、王逸伦等4人为常委的领导核心；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成员20余人，蒙古族占半数，以组织和领导“蒙汉抗日同盟军”，决定成立5路同盟军，发表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决定各旗县党部全改为支部，大力发展党团员，扩建党团组织；并对工运、农运、学生运动、士兵运动、反帝运动、蒙古牧民运动作了部署；制定了内蒙特委3个月工作计划草案。

会后，内蒙特委负责人分赴各地开展工作，李铁然负责承德、围场、经棚、丰宁各县工作；刘刚负责建平、朝阳、凌源、平泉各县；王逸伦负责赤峰、开鲁、林东、林西等旗县，特委其他成员也随同前往各地工作。在围场由于军阀刘桂堂和土豪劣绅的阻挠，李铁然撤回北平。在朝阳一带由于义勇军大部西撤多伦等地，有的投降日寇，刘刚等也未能开展工作。王逸伦等3人于1月中旬到达赤峰后，分别在赤峰、乌丹一带开展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发展党员30余人，建立支部5个；发动了工人割鸦片争薪罢工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伙食，延长午休时间，达到了预期目的；开展农民分粮斗争，分粮两次共计15石，有所收获；发动土匪、民团打日本人的汽车，仅砸一辆，被日军镇压。国民党孙殿英部欲赴热河抗日，并派国民党左派人士李锡九与内蒙特委联系合作抗日。孙部开往赤峰，王逸伦等发动民众欢迎孙部抗日。2月7日，赤峰失守，孙部撤退，王逸伦等转入农

村开展工作，直至6月。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并向察哈尔进军。4月间，中共内蒙特委迁往张家口，李铁然、刘刚等以张家口为基地开展工作，在张家口、归绥、包头等地和平绥铁路组织蒙汉抗日同盟会，并参与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活动。5月12日，李铁然为组织同盟军事宜，从张家口赴张北途中遭反动民团袭击而中弹牺牲，时年33岁。这期间，平绥铁路已建立党支部，张家口洋车夫工会成立，参加蒙汉抗日同盟会者甚多；在热河农村组织了为数颇多的农民抗日十人团，准备开展农民武装抗日斗争；在学生和牧民中的工作也有所开展。但是，由于特委书记李铁然遇难，刘刚重病在平，王逸伦在赤峰，且与特委失去联系，特别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这一届内蒙特委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工作，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终止了活动。

三、中共绥远特支、特委及其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于1927年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作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决策。

“八七”会议后不久，党派郑卫华（又名李云鹤）和辛玺（又名辛觉民，归绥人）来绥远，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帮助恢复党的组织和革命活动。但是因为当地党组织被破坏，未能接上关系。10月间，中共党员李子光（原名贾一中，曾在归绥中学读书）从宁夏回到归绥，范建中也从河南回来，他们及时与隐蔽在农村的王建功联系，共同研究了绥远的形势和恢复党组织的问题。他们当即与中共顺直省委接上关系，并经顺直省委批准，于1927年10月在归绥旧城巧尔气召西院开会，决定成立中

共绥远特别支部，并派王建功赴北京向顺直省委汇报特支的组成和工作计划。

中共顺直省委于1927年8月1日在天津成立。顺直是以北京故名顺天府和河北省曾用名直隶省合称而来。顺直省委实际上是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接替中共北方区委领导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部及陕北等省市党的工作的大区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后，顺直省委受北方局领导。当时顺直省委下辖20个特别支部。王建功当时化名王定国，与顺直省委接上关系，并用中草药五味子水把中共绥远特支的组成和活动计划，写成报告上报顺直省委。中共顺直省委批准了中共绥远特支的报告，由王建功任特支书记，李子光任组织委员，范建中任宣传委员，特支成员有陈国奇、李亮明、惠志诚。特支机关设在归绥旧城巧尔气召，日常工作由惠志诚负责。顺直省委还派李佩衡来绥远指导工作，主持召开了特支会议，宣布了特支的组成，传达了顺直省委的指示，确定绥远特支的工作目前主要是联络同志，恢复党的组织，秘密开展群众工作。

中共绥远特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认真的考察，联络了30多名转入地下的党员，重新组织了革命力量，恢复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在归绥组建了3个基层支部，即城市支部，成立于1927年11月，麟祥任书记，吴成山、杨录为委员；归绥铁路支部，成立于1927年12月，江汉任书记，王贵、晓宏为委员；手工业工人支部，成立于1927年11月，钟金声任书记，白二才等为委员。包头支部，成立于1927年9月，姓郭的小学教师任书记；临河支部，成立于1927年7月，刘进仁任书记，李春秀、王汝贤为委员。

1928年6月，奉系军阀从绥远撤出以后，晋系军阀再次进占绥远，国民党右派又活跃起来，大肆反共，绥远特支的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右派熟知的王建功被通缉，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中断。因此，绥远特支决定让王建功转移到农村隐蔽起来，由李子光接任特支书记兼组织委员。9月间，李子光去北京与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汇报请示了工作，归途中在张家口与王建功相会，共同研究了工作问题。10月初，范建中被捕叛变，供出了3个党支部成员名单，国民党反动派据此在归绥进行大搜捕，麟祥、吴成山、杨录、钟金声、白二才也相继被捕叛变，形势十分严峻。

1929年3月，王建功、李子光回到归绥恢复组织。但是，由于叛徒告密，李子光一下火车即被捕，王建功回家后也被捕入狱。国民党派范建中到包头、临河破坏那里的党组织。然而由于他不熟悉那里的情况，没有达到目的。中共绥远特支虽然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它在白色恐怖中建立起来，联络了散失的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活动，更为可贵的是迎着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举起了党的旗帜，恢复了革命斗争。

中共山西省委十分关心绥远的革命斗争。1931年4月，派赵鹏九、刘子安、李莉春来绥远开展革命工作，并组织了中共绥远特委，赵鹏九任书记。他们是以考察实业为名来到绥远的。刘子安毕业于绥远师范学校，在这里人地皆熟。他一来就与范建中以及地下党员刘金元、傅恒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在旧城小西街田阜民的院内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下来，这也是特委机关所在地。

4月中旬，赵鹏九几经周折，在乡下找到了隐蔽于家中的王建功，考察了他的情况，详细听取了王建功汇报绥远特支的成立、恢复党的组织以及被破坏的经过，还介绍了1930年奉顺直

省委派遣来绥远工作的杨植霖的情况，为绥远特委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赵鹏九随即找到杨植霖，共商开展工作的问题。绥远特委经过考察，决定恢复王建功、杨植霖的组织关系。通过他们又联络了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特委的工作初见成效。

4月下旬，绥远特委决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开展一次公开的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在“五一”前夕的夜间，他们把油印的传单贴在了大街上。5月1日全城哗然，群众在秘密议论共产党回来了，不少人为之高兴，国民党当局却十分震惊，如临大敌，立即派出大批军警进行全城大搜捕，顿时归绥城里气氛十分紧张。在范建中搬油印机准备印传单时被特务发现。国民党当局据此线索首先抓了范建中，没经过几个回合的审讯，范建中再次叛变，交待了特委机关，出卖了党员名单和党的组织。国民党绥远当局如获至宝，当即逮捕了赵鹏九、刘子安、李莉春，接着逐个逮捕了王建功、杨植霖、刘金元、傅恒等共产党员，也逮捕了一批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人士。国民党绥远当局视此案为共党要案实行昼夜提审，同时进行严刑拷打，伴以威胁利诱，但是均未收效。于是将赵鹏九、刘子安、李莉春押往北平，交北平军分会审理；对王建功、杨植霖以共党嫌疑犯罪名分别判处5年和2年徒刑；对于其他株连者也进行了不同的处罚。

中共绥远特委在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遭到如此惨重的破坏，其主要原因在特委自身。特委在归绥还没有立稳足，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在对敌情不熟悉，对内部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便匆匆忙忙地采取公开活动的冒险行动，主动暴露了自己，导致了被破坏的结局。这是惨痛的教训，也反映出这届特委或多或少地受了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四、中共西蒙工委及其活动

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为恢复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从多方面多渠道组织力量恢复和组织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内蒙民族政纲和方针、政策，开展革命斗争。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决定从在苏联的蒙古族干部中选派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苏共党员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列宁共青团员德勒格尔（即宁春发）等回国，领导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民族工作。临行前，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瓦格涅尔与他们谈了话，介绍了国内的情况，布置了回国工作的任务。要求他们深入工农兵群众，进行长期的秘密的群众工作，要扎根于群众之中，在农村隐蔽下来，组织农民协会，准备开展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络地方党员和党组织，设法与国内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培养干部，特别是民族干部，大力开展民族工作，不但要做蒙古族群众工作，还要联络上层，开展上层工作；要开展军运，抓武装，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6月末，他们由佛鼎带队，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在苏联布利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转乘汽车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这里会见了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阿木嘎耶夫和中共在外蒙古党组织的负责人王瑞符，听取了他们对内蒙古情况的介绍，共同研究了内蒙古的工作问题。根据内蒙古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决定分三路回内蒙古，原则上各回自己的家乡，以便落脚尽快开展工作。在乌兰巴托他们还与奎璧、李森、三得胜相逢，畅谈分别数年各自的情况和见闻。革命的理想和民族解放的使命，把他们紧紧地维系在一

起，去迎接新的战斗。当时决定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为东路，回哲里木盟和热河一带，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开展工作；德勒格尔为中路，回家乡克什克腾旗和察哈尔一带也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名义进行活动；佛鼎、乌兰夫、奎璧组成中共西蒙工委，[①] 连同李森、三得胜为西路，回绥远省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发动革命斗争。佛鼎任书记，乌兰夫负责组织，奎璧分管宣传和交通联络。

中共西蒙工委佛鼎、乌兰夫、奎璧等 5 人，雇用在外蒙古经商的归绥北郊府粉营子村侯四的 9 峰骆驼，与回内蒙古的旅蒙商队混在一起，起程回国。跋涉浩瀚的戈壁，从乌盟四子王旗边境进入内蒙古，于农历 7 月 15 日抵达大青山北麓的武川。在这里稍事停留，一方面考察绥远的情形，一方面据情部署工作，并作了分工。佛鼎留在大青山以北，在武川县、四子王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发展线索，开展工作，黑沙兔为其落脚点；乌兰夫到大青山以南，以归绥为中心，在土默川一带农村开辟工作；奎璧在包头开办烟酒小铺，作为交通联络点；李森、三得胜回到家乡包头附近农村隐蔽活动，并向黄河以南活动，而且担任交通任务。随即他们各赴自己的工作岗位。

中共西蒙工委初到时，内蒙古西部地区特别是归绥、包头等城市的形势十分恶劣，晋系军阀统治绥远，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中共绥远特别支部刚被破坏，群众情绪比较低沉。奎璧回到家乡宝同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佛鼎闻讯赶回土默川采取对策。中共西蒙工委根据这种情况和既定的方针把工

---

① 乌兰夫的回忆和中央公布的乌兰夫简历称中共西蒙工委；佛鼎的回忆是中共三人小组，组成人员和分工相同。

作重心放在农村，首先在蒙古族群众中扎根，积极联络革命同志，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很快与在土默川农村隐蔽的共产党员贾力更、高布泽博、勇夫等取得联系，与先期回国的中共内蒙特支委员云润也接上了关系，形成了较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接着，他们利用家乡的社会关系，争取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恒升、朱尔圪旦、克力毕力生、满全、李存之、凯勒布正等一批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开展西蒙工作的重要力量。其中高凤英和毕力格巴图尔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共西蒙工委决定派贾力更、高布泽博、勇夫、高凤英、毕力格巴图尔、张禄等30多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以进一步培养蒙古民族干部，保存革命力量，为发展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创造条件。西蒙工委在联络同志、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年，佛鼎奉调回共产国际，乌兰夫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

西蒙工委由于坚持扎根农村，长期隐蔽，秘密活动，特别是由于很快联络了一批党员和革命者，增强了力量，逐步扩大了活动范围，群众情绪高涨，积极掩护党的活动，支持革命工作。在归绥到包头一线的蒙古族村落中，建立起许多可靠的活动据点和联络线，归绥以西的美岱召、黑沙兔、白塔、沙尔沁、把什、王毕前齐、奎素、台阁牧、毕克齐、东甲兰营等村庄，包头附近的阿刀亥、忽洞沟门、阿麻板申等村庄，均有党的活动。1934年，吉雅泰从苏联回国后，一度以喇嘛教为掩护，以召庙为据点，从归绥的席力图召、巧尔气召、乌素图召向西沿大青山麓，在卓尔沟召、美岱召、沙尔沁召直到包头召梁建立了一条联络线，并与西蒙工委接上了关系。由于西蒙工委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了以农村为基地，长期隐蔽，秘密工作的方针，使土默川的革命工作得

到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也没有被破坏。这是最大的成功。

为了扩大工作范围，打通与伊克昭盟革命者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络，1930年春天乌兰夫与李森冒着极大的风险，到达准格尔旗，与地下党员奇子俊联系。奇子俊是1927年8月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上当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这里也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者往来伊盟的中转站。乌兰夫与奇子俊取得联系后，部署了伊盟的革命斗争。中共西蒙工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艰苦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1931年7月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化名黄敬斋）以及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队队长吉合（化名张其胜）、党支部书记潘恩普（化名赵必成）3人回国，"取道外蒙古，到西北成立西北特委，以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尤其以民族运动为中心。"[①] 他们从莫斯科分别出发，于8月初齐集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会见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研究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回国后的工作任务、工作方式；并组成中共西北特委，王若飞任书记，吉合任军事部长，潘恩普为委员，决定分两路回国。王若飞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总方针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发动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西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反帝反国民党军阀和地主的压迫剥削，逐步实行土地革命；以宁夏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逐步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并建立与国际联系的路线。

9月间，他们分两路出发回国。王若飞、吉合由在蒙古的中共党员朱实夫（化名谢德林）担任交通，确定由东路经归绥、包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96页。

头到宁夏；潘恩普和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奥其罗夫，由巴达玛（即祁维翰，又名汪振东，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担任交通，由西路经阿拉善旗定远营到宁夏。王若飞等扮作旅蒙皮毛商，先乘骆驼从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入境，到达四子王旗乌兰花。王若飞改装富商抵达归绥，随即转赴包头，由朱实夫设法与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取得了联系。他们讨论和部署了内蒙古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着重研究了发动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王若飞对长期以来掩护革命者的土默特旗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表达了以“老一团”为基础组建蒙古族革命武装的意向。在乌兰夫的全力协助和安排下，王若飞派吉合并由奇子俊的警卫奇新民相伴，赴陕北与红 24 军接关系，到甘肃、宁夏了解西北的情况和西路潘恩普的行迹；由李森护送王若飞到后套五原县一带，调查研究绥西的情况；王若飞又在包头附近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动抗捐税反锅厘斗争。王若飞极力主张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按中共中央关于内蒙民族政纲的精神，拟定了《内蒙古平民革命党宣言》以发动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乌兰夫还以化名陈云章交给王若飞一份《工作的情形》的报告和《告全旗蒙民书》。由于赵诚、三得胜、奇新民等积极开展工作，在归绥到包头之间的察素齐、萨拉齐农村和伊盟准格尔旗、五原以及“老一团”等地方军队中，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支部 27 个，特组 2 个。王若飞、吉合正是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西北特委的指示：初步任务在于调查西北情形及西北各党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对于内蒙党可以当时情形建立关系接洽指示之，……最重要者即对回民暴动，须尽量参加及组织，确实拿着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充实到

组织中去，打入群众中去”[①] 的要求，开展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但是，正当王若飞启程前往宁夏之际，11 月 21 日晚，在住处包头泰安客栈被捕。第二天，乌兰夫得知王若飞被捕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转移隐蔽。当吉合到达宁夏以后，得知潘恩普、奥其罗夫也在阿拉善旗被捕，奥其罗夫遇难，潘恩普叛变，巴达玛几经周折到达伊盟乌审旗。中共西北特委在其两路人员未及到达宁夏会合之前即被破坏。

12 月上旬，王若飞被押解到归绥，关押在所谓“绥远第一模范监狱”。乌兰夫安排孟纯、李森等关照、营救王若飞的事宜后，当即赴蒙古向共产国际驻蒙代表报告王若飞被捕和中共西北特委遭破坏的问题。西蒙工委的工作也由此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932 年 3 月，吉合从宁夏返回包头，始知王若飞被捕，遂转移到土默川农村，与李森、奇新民等取得联系，并以种牛痘先生的身份在农村活动；不久，曾涌泉奉派参加西北特委，来绥得知王若飞被捕，便留在绥远与吉合等就地工作，以卖布、袜小商为身份，活动在土默川一带。1933 年 5 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乌兰夫、朱实夫赴张家口与中共河北前委联络，并策动“老一团”等蒙古族地方武装参加同盟军。7 月，同盟军 41 军孙殿英部开到包头，乌兰夫等与该部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政治部学生大队讲课，做政治工作。秋天，中共河北省委派刘仁到包头组建中共绥远工委，西蒙工委与河北省委接上了关系。这时，正值德王发动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西蒙工委

---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198 页。

将工作重点转向了大力开展蒙古民族运动上，乌兰夫的工作重心也转到了归绥。

五、蒙古族人民对封建势力的反击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一切反革命势力的袭击，蒙古族人民毫不畏惧地进行了英勇的武装反击。阿拉善旗“小三爷事件”、乌拉特前旗的武装起义以及轰动一时的呼伦贝尔暴动，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领导蒙古族人民对封建势力的武装反击，是对反革命势力的回应。

阿拉善旗地处内蒙古西端，虽然地理位置偏辟，但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这里成为内蒙古西部和宁夏、甘肃地区通往外蒙古的通道和要塞。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往中国的人员以及内蒙古的革命者，也经过这里往来于中国与外蒙古、苏联之间。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在这里接应从苏蒙运来的武器、弹药。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国民军联军控制内蒙古西部地区和宁夏、甘肃，以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移驻银川以后，为在阿拉善旗发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国民军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驻有军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专派郭道甫前往开展党务，于是以德钦一心诺尔布为首的一部分进步人士，接受了革命主张，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革命力量，举行了武装暴动。历史上称之为“小三爷事件”。

德钦一心诺尔布（简称德钦），汉名德毅忱，出身于蒙古族封建贵族家庭，其父是阿拉善旗第六代亲王的三弟，人们曾称他为“三爷”。而德钦也是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所以人们又称德钦为“小三爷”。因为阿拉善旗的这次武装暴动是德钦为首发动的，所以称“小三爷事件”。

“小三爷事件”的爆发，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辛亥革命以后，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鲁克甲喇，依靠北洋军阀在蒙藏院充任要职。1925 年 1 月，他以蒙藏军民长官的身份参加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得到北京执政府的信任。他常年住在北京，全部费用由旗里用骆驼驮运到北京，供其挥霍享用；代他执掌旗政的陈莽哈赖，网罗亲信，增加抽丁捐税和徭役摊派，除供应北京的塔王享用外，均挥霍或肥私。因此，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旗政极端腐败，老百姓怨声载道，就连贵族出身的德钦和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其极端不满。社会矛盾的激化，孕育着一场斗争的爆发。

德钦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兼通蒙汉语文，游历过北京等国内的一些城市，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思想比较开化激进。与他经常交往的田协安、孟雄、罗敖有等人在外交游较广，且有一定的文化，与旗内上层权势阶层也有家仇恩怨。因此，与德钦同有反对腐败旗政，主张实行民主的共识。当国民军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革命工作开展以后，他们首先响应，并通过各种关系，以旗盐务局、税务局和百货统捐局的一部分职员和大部分税丁为基础，组织起一个商团，以经商为掩护，准备待机而动。同时，大力争取蒙古士兵倾向革命。德钦还得到了国民军先后委派的宁夏主席吉鸿昌、门致中的支持，供给枪支弹药，组织革命武装的条件也基本具备。1928 年 4 月 22 日（农历三月初三）凌晨，武装起义终于发动。孟雄带领商团和国民军百余士兵，在德钦的指挥下向旗衙门王府进攻。起义来势突然，衙门卫队和文武官员未及防范，起义武装即占领了旗府王府。罗敖有当即组织已经响应起义的蒙古士兵，占据定远营战略要地，以防不测。陈莽哈赖等上层官吏当即被擒。随即宣布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及国民革命

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德钦任政务委员会主任和蒙兵司令，孟雄任副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齐尔任第二旅旅长。

阿拉善旗封建王公政权被推翻，起义者掌握了旗政，并召开庆祝大会。旗政务委员会宣布：一、没收塔王府的全部财产归公；二、公布陈莽哈赖的罪状，代表民意将其处以死刑，以平民愤；三、废除各种封建徭役，减轻人民负担；四、反对封建，提倡民主，不准留辫子。这几项简要而初步的革命政策措施，虽然不甚完备，但它反映了这次起义的反封建性质，而且顺乎民意，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在北京的阿拉善旗札萨克塔王听到起义的消息后，在惊慌之余便拼凑反动势力进行反扑，以图夺回失去的封建政权。他秘密派遣亲信潜回阿拉善旗，纠集残余势力，蛊惑不明真象的旗民，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了拼死的挣扎；同时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通过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派于长东瓦解革命武装，宣布所谓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决定：国民政府无废除王公制度的命令，该旗推翻札萨克一事全是门致中、德毅忱等人所为，并宣布解散革命武装，国民军撤回宁夏，“重兴原政务处，复行旧制”[①]。德钦等不得已被迫带领几个部下也到达宁夏。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四），阿拉善亲王旗政务处张贴告示，给德钦等罗织种种罪名后，警告民众“不得积怨，图谋报复，若不从此告，……定以违法论处”。[②] 诞生仅七个多月的阿拉善旗革命政权，

①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阿拉善盟文史》第4辑，第37页，1988年。

② 转引自《阿拉善文史》第4辑，第37页。

在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被封建王公勾结蒋介石国民党给颠覆掉了。

阿拉善旗的“小三爷事件”由于事前的准备不充分，群众基础薄弱，起义仓促，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内蒙古革命形势严峻，国民军南下，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仍然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偏辟的阿拉善旗，发动蒙古族人民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一次尝试，绝不是什么蒙古贵族内部的纷争，它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是无容置疑的。正因为如此，阿拉善旗塔王以极大的力量，采取各种手段追捕德钦等革命者。德钦等辗转于银川、五原、归绥、北京等地避难。1930 年德钦在归绥被捕，受尽各种酷刑之后，于 1932 年被无限期地流放到腾格里沙漠中的查干高勒庙，终因饥寒疾病折磨而死，其子也被杀。德钦被流放的当年 7 月 13 日（农历六月初十），该旗亲王达理扎雅发布“亲谕”，再次罗罪于德钦，称“罪犯德钦一心诺日布系本王近亲，且身为要员，本应以国事为重，安抚边疆，保全故土，却无视祖上，公然反叛，……致使祖辈中断香火，罪恶如山，虽碎尸万段而不及。今虽已身死，然其罪孽当究不误。”“又父王遗谕，将反叛罪人德钦一心诺日布……连同其子一并除名于家谱，降为庶人，今本王遵旨返旗，平定乱局，遵已故父王之遗嘱，重整家族”，将“反叛首犯德钦一心诺日布及其逆子等，一并革职，并于家谱中除名，永为庶人，使其不再靠近祖墓，以示家规。”[①] 这一“亲谕”把“小三爷事件”的反封建性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背叛贵族阶级的革命者。

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展活动最早的

---

① 转引自《阿拉善文史》第 4 辑，第 36 页。

地区之一。该旗贫苦牧民家庭出身的恩克巴雅尔（金安喜）自幼勤奋好学，18 岁即任旗府笔帖式（文书），20 年代曾在北京蒙藏院任文书，曾领导该旗“独贵龙”抗垦斗争。1924 年 1 月随乌盟副盟长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曾到外蒙考察，成为该旗年轻有为的社会活动家，不久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6 年秋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迁到包头，并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创办内蒙古军官学校时，他于 10 月 1 日在乌拉特前旗梅力更庙开办了内蒙古军官学校分校，招收 70 多名蒙古牧民、喇嘛入学，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出教官和苏联顾问协助训练，并发给武器，以此为基础组成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所属的一支武装力量。恩克巴雅尔依托革命武装，在旗里鼓动改革，按人民革命党纲领要求废除王公札萨克制度，实行旗长制；废除蒙旗种种封建等级制度；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婚姻自由；男子剪掉辫子；喇嘛还俗结婚，参加生产劳动；禁止种植买卖鸦片等。虽经多方鼓动，但是由于封建王公势力的反对，始终未能实施。

大革命失败以后，形势更加恶化。1928 年，绥远都统署下令该旗协理额宝斋追查缉捕恩克巴雅尔。8 月 16 日（旧历 7 月 2 日）借旗衙门祭旗仪式，突然派军队包围恩克巴雅尔部队驻地乌日宝力格，经过一天激战，最后突围向外蒙古边境转移。17 日，在途中大佘太以东乌兰呼都格遭袭击。20 日到达边境索伦山恩格尔庙，当夜被乌拉特中旗 200 余骑兵包围，恩克巴雅尔用机枪掩护部队撤入外蒙古境内，自己在撤退中中弹牺牲，时年 26 岁。这就是为后人所称道的“西公旗暴动”。事情虽小，精神可佳，表现了革命者恩克巴雅尔和这支革命武装的坚定意志。

1928 年 7 月爆发的呼伦贝尔暴动，也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在革命低潮中，奋力反抗蒙古封建上层和东北军阀统治的一次

尝试。同年6月2日，东北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中央常委福明泰和中央执委郭道甫，在共产国际和外蒙古的支持下，发动了呼伦贝尔暴动。郭道甫在1931年所著《呼伦贝尔问题》中说："呼伦贝尔蒙旗当局的腐败，越发深刻起来。""1928年夏，东北政局变化的当儿，巴尔虎（即呼伦贝尔——引者）人心跃跃欲试，大有揭竿而起的趋势。该党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呼伦贝尔南境，与外蒙交界的绰哥托松布尔地方，秘密召集该党代表大会，议决以武装革命，恢复呼伦贝尔的完全自治。并决定向海拉尔、兴安岭、满洲里三路进攻。"于是，在新巴尔虎两翼各旗和索伦两翼各旗发动牧民，争取各旗保安队和部分官吏，7月9日组成呼伦贝尔平民军，福明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杭达盖为大本营，树立革命旗帜。7月17日东路军攻击中东铁路乌奴耳车站；18日西路军切断嵯岗站电线，以造成中东路国际列车停运，引起东北局势紧张。至关重要的中路军未能按计划攻占海拉尔，起义军最主要的进攻目标未能夺取；由于起义军攻击中东铁路，苏联和蒙古怕引起国际争端，未能按原约予以配合；黑龙江当局立即派马占山部一个旅，在呼伦贝尔驻军的配合下，布阵围剿起义军民。

新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则认为呼伦贝尔暴动是政治问题，并非土匪行为，应以谈判解决，并当即派员谋求谈判。在谈判中，起义军提出要东北军撤到兴安岭以东，不设呼伦道尹，呼伦贝尔副都统民选产生，由蒙古人掌管税收等，两次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张学良遂派员持郭道甫的启蒙老师、辽宁省省长翟文选的信函，从中斡旋，促使郭道甫同意谈判。当时虽有部分人持有异议，但经过冷静思考，权衡利害，又恐酿成外交纠纷，难以收拾局面，最后作出让步。东北当局提出：一、都统衙门内添设

参议厅，容纳青年党成员；二、增加常年行政经费；三、增编蒙旗守备队等。[①] 郭道甫为了起义军民免遭涂炭，也图收拾起义失败的局面，于9月末，在呼伦道尹赵作人，海满护路军司令梁子信陪同下，只身前往沈阳会见张学良，接受谈判，说明缘由。呼伦贝尔起义的其他领导人福明泰等撤到乌兰巴托。郭道甫以张学良秘书身份落足沈阳，并开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轰动一时的呼伦贝尔暴动就此结束。

1929年8月，郭道甫在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三次预备会议上发表了《蒙古问题讲演录》，在综论蒙古问题和赞扬苏俄帮助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论述了内蒙古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激烈抨击了日本的"满蒙政策"及其阴谋，阐述了现代蒙古民族要与其他民族，尤其是蒙汉民族互相联合，互相扶助的必要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向在北京的张学良致电表示"誓死不做日本人的奴隶，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不久他毅然带领一批蒙古族学生撤退到家乡呼伦贝尔。为寻求苏联的支持，他于12月11日到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洽商，后被苏联当局逮捕判刑，死于集中营。

六、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星星之火

内蒙古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在全国大革命高潮中蓬勃兴起，在建立民族革命政党，组织民族解放武装，建立民主革命政权，发动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创立了民族解放运动新的里程碑。这是内蒙古革命的重要内容，

① 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历史语文学会根据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印行本翻印，第25—28页。

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全国大革命失败的形势下，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如此，蒙古民族没有被吓倒，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在祖国辽阔的北疆到处点燃起民族解放的星星之火。

中国共产党作为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刻也没有停顿对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关注和领导。中共中央、中共顺直省委、内蒙古特支和特委、西蒙工委以及绥远特委等各级历届党组织，一直把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为内蒙古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反复的调查研究，对内蒙古革命的形势与任务，特别是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制定了内蒙古民族政纲和方针政策，并在各地的斗争中付诸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对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给了极大的关注。认为白云梯右派集团叛变革命、投靠蒋介石国民党之后，应该充分利用中共党员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甚占优势的条件，积极联合左派，配合共产国际和外蒙同志，取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权，肃清白云梯右派集团的势力和影响，"端正内蒙革命运动的方针，在组织上切实成为劳苦群众的革命政党。"① 中央指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中央执委会在外蒙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要求与我们联络；他们中的重要成员是中共党员，如白海风、王瑞符等，"在左派中有一部分青年党员颇注意于群众工作，坚持内蒙民族独立，反对中国国民党军阀的革命主张，……他们所提出的'打倒王公'、'反对改省'的口号，

① 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内蒙工作方针》，《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8 页。

确能影响广大群众。”[①] 中央要求“一定要经过以我们的民族政纲影响他们，使之日益变成群众的斗争的民族组织，”[②] 要帮助他们在群众中发展，要互派代表在双方所在地经常发生密切的联系，甚至出席双方党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不仅再次肯定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革命性质，而且主张通过它来发动和领导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

1927 年 8 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之后，白云梯右派集团成员先行回到国内发表清党反共宣言，左派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到 1927 年底和 1928 年初，除留 3 名中央领导人在乌兰巴托主持中央工作外，其余成员陆续分组派回内蒙古开展工作。伊克昭盟是孟克乌力吉、章文轩、奇子俊等；乌兰察布盟是芒来巴特尔、恩克巴雅尔；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是宝音巴特尔（贺志远）、乌力吉敖其尔（乌献文）；卓索图盟是张福恩、陈青云；昭乌达盟是汪瀛洲；哲里木盟是布尼雅巴色尔，1929 年又派朋斯克、特木尔巴根；呼伦贝尔是福明泰负责。白永伦、白海风、福明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孟克乌力吉和奇子俊、章文轩等伊盟代表，于 1927 年底从乌兰巴托出发，途经阿拉善旗定远营，到达宁夏省银川，被宁夏省当局扣捕，几经周折脱险，回到伊克昭盟。孟克乌力吉回到乌审旗向锡尼喇嘛传达了乌兰巴托特别会议的情况，协助锡尼喇嘛部署了乌审旗的工作。根据中国革命失败，白云梯集团叛变革命的严峻形势，1928 年夏季，召开乌审旗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分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1 页。

② 同上，第 103 页。

党中央远在外蒙，难以得到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恶劣，也难以相助。于是决定将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19个党支部全部改称蒙旗固有的行政单位名称“嘎查”。整顿党组织，清理党员中的不坚定分子，纯洁革命队伍。同时，派人专程赴乌兰巴托向中央报告党务，请求指导。锡尼喇嘛还派人到陕北，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共商联合斗争问题。他还向部下说，我们的朋友在南方。这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和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锡尼喇嘛领导乌审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反击陕北军阀井岳秀联合乌审旗反动王公势力的不断进攻，捍卫乌审旗革命政权和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这块来之不易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11日夜间，军队内部的叛徒闯入锡尼喇嘛的住室，枪杀了这位蒙古民族杰出的革命家和民族英雄。噩耗传出，全旗震惊，人民悲痛不已。革命政权和人民军队当即逮捕了罪犯，经过审讯，确认罪证后，以革命的名义和人民的要求，处决了这几个民族败类。锡尼喇嘛于1866年11月6日出生于乌审旗一个蒙古族贫苦牧民家庭。他从一个贫苦牧民走上反封建王公的道路，又从一个自发的牧民运动领袖成为自觉的民族民主革命家，终生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奋斗不息，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鄂尔多斯人民将永远缅怀他，蒙古族人民将永远崇敬他。

1929年9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务委员福明泰等到乌审旗会见该党中央委员长孟克乌力吉，并召开秘密会议，分析了内蒙古的形势，确定了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部署了党的工作，应该说这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紧接着于1930年3月派中央执行委员宝音巴特尔、赛胜阿（纪松龄）以及孟和吉尔格拉等3人，专程到乌

审旗会同孟克乌力吉等部署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他们从察哈尔出发，途经准格尔旗，会见了中央执行委员奇子俊，广泛交换了党的工作的意见，随即赶赴乌审旗，于3月17日召开了鄂尔多斯、察哈尔秘密特别会议，研究确定了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阿拉善、土默特等盟部旗党的领导机构，决定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乌审旗作为革命根据地必须坚持斗争，加以巩固，并通过嘎查发动各地“独贵龙”，恢复“独贵龙”的组织形式，进行群众性公开合法的斗争。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大会，互通消息，研究斗争对策，以保护党的秘密工作。

乌审旗在当时是党政军组织齐全，并控制了全旗局面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孟克乌力吉也在这里。因此，中央其他领导人和一些盟旗的负责人不时到这里来研究工作。当时虽然难以起到指挥全局的作用，但为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进行了积极的工作。这些党的骨干和革命左派会聚在这里，不仅部署工作，而且认真深入地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研究了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1930年春天，他们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工作的指导原则，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结合内蒙古的实际，撰写并印发了一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对内蒙古的政策》的洋洋万余言指导性文章。文章内容极其丰富，理论分析精当，颇具说服力和鼓动性。

文章首先以“关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为题，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背叛革命，镇压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压迫、掠夺、扰害蒙古、西藏、回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宣布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党务指导委员会，拉拢革命叛徒和不坚定分子为其走卒；成立蒙藏委员会，以控制蒙藏等少数民族；

在内蒙古全部以及青海设置行省，推行县制，取消内蒙古固有的盟旗政权机构，剥夺蒙古民族的政治权利；甚至将裁减部队派驻内蒙古屯垦，以掠夺内蒙古土地和牧场。这是国民党新军阀之新的罪行。

其次，以“关于张学良与日本”为题，揭露奉系军阀把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分别划入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等省；对部分蒙古王公委以省政府委员，在长春、沈阳屡开蒙古王公会议，施行笼络，便于控制；勾结日本，修筑铁路、掠夺财富；派军驻屯、大兴军垦、抢夺蒙地；利用班禅，愚弄蒙众，控驭蒙民；增加苛捐、横征暴敛，陷蒙古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以“阎锡山和冯玉祥残部”为题，谴责其在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设置察哈尔省，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土默特旗设置绥远省；在张家口、归绥屡开蒙古会议，施以小恩小惠，笼络王公，控制蒙众；在省境设县，削弱蒙旗，大肆放垦蒙地，致生民变；在蒙旗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施展毒计，分而治之；冯玉祥残部在宁夏、甘肃，镇压回民起义和阿拉善旗蒙古民众的反抗。

第四、以“关于我们的蒙古”为题，综述了在中国军阀和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下，内蒙古盟旗组织被废止。内外反动派在内蒙设省置县，移民驻军，垦种良田，破坏牧场；修建铁路公路，掠夺宝藏；利用宗教，欺骗蒙众；离间内部，制造分裂，造成经济下降，民生极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蒙众稍有反抗，便以造反赤化之罪名加以镇压。呼吁蒙古同胞要猛醒，以坚决的革命斗争摆脱苦难，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和实现幸福的目标。指出舍此别无他途可走。自清朝以来对蒙古分而治

之，盟旗之间互不和睦，甚至相互倾轧，如同散沙一盘。此种状态绝不能继续。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之叛徒色楞东鲁布（白云梯）、阿拉坦（金永昌）、满达拉图（李丹山）等，已成为中国国民党军阀的走卒，民族的叛逆者，少数王公和无知青年也成为国民党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及军阀、日、美等外国帝国主义，是剥削、侵吞、欺骗、出卖蒙古民族的凶恶敌人。被压迫的内蒙古人民必须靠自己力量消除苦难，争取自由幸福。

第五、以“关于中国、日本、美国等反动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斗争、冲突及其内部的危机”为题，分析了日、美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以至在蒙古地区争夺权益，相互冲突的状况；分析了外国侵略者利用各自豢养的军阀及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仍然饱受资产阶级、军阀和地主的压迫剥削，蒙古、回回等国内少数民族仍然没有得到民族自决权力，在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座床下，工农革命正在爆发，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烈火也从旁燃烧，中国工农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统一中国革命的力量，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国内外反动派。文章赞扬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并指出，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已是四面楚歌，摇摇欲坠，注定要灭亡。

第六、以“关于支持内蒙古争取自由解放伟大事业的基石”为题，指出中国伟大的工农革命运动，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数百万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依托和后盾；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承认蒙古、回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内蒙古成立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工农革命政权结成联邦，应完全自决；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是内蒙古和回疆等少数民族解放斗争亲密的盟友和可靠的支持者，西北回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也是内蒙古革命的真诚的战友；德、法、英、美、日等国家

的工人运动正在发展，印度等国东方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内蒙古的自由解放斗争已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柱，外蒙古革命的胜利是对内蒙古自由解放运动的巨大援助，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事业的领导者，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巩固。凡此种种，是内蒙古自由解放斗争的保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经得到了多方面的援助。最后并呼吁：内蒙古同胞们，我们的自由解放斗争必将越来越发展……。

这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国内和内蒙古政治形势、革命斗争以及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发表的最后一次纲领性的文献。当时在伊克昭盟等地散发，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坚定蒙古族人民解放斗争的信心，恢复内蒙古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中央坚持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坚持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完全一致的立场。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30年代前后，内蒙古蒙古族人民的反封建王公、反军阀斗争始终没有间断。1930年2月，哲里木盟的蒙古族人民掀起了撤废蒙古反动王公的运动；1932年，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的蒙古族人民再次组织“独贵龙“，反对该旗札萨克康达多尔济的黑暗统治，反对晋系军阀掠夺牧场，实行屯垦。这都反映了蒙古族人民不甘忍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这一时期蒙古人民反对封建王公，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其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广的就是嘎达梅林起义。

嘎达梅林汉名孟青山，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即达尔罕王旗）人，称孟统领。富绕美丽的科尔沁草原，从清末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前后经过七次大规模的开垦，水草丰美的牧场日益

缩小，蒙古族牧民渐渐被排挤到荒漠之地，生活日趋贫困。东北军阀从开垦科尔沁草原已获巨利，但贪得之心并无止境。通过放垦牧场获利，是近代一些腐败王公（包括达尔罕王）的生财之道。军阀与王公这种结合，带给蒙古族人民的则是无穷的灾难。1929 年春天，科左中旗札萨克那木济勒色楞与东北军阀相勾结，在该旗设立垦务局，决定开垦该旗所谓“辽北荒”“西夹荒”和“北山荒”。这里所说的荒，就是还没有垦种的优良牧场，对农业来说似乎是荒地，而对牧业来说却是蒙古族牧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牧场，从来就不是什么荒地。该旗蒙古族人民和一些台吉、官吏，强烈反对继续放垦牧场，于是公推代表 60 余人，赴沈阳向长期居住于此的该旗札萨克那木济勒色楞请愿，要求停止放垦。该札萨克不仅不接见请愿代表，反而勾结奉天警察局，于 7 月 26 日逮捕了包括嘎达梅林在内的 4 名代表，并将其他代表驱赶回旗。不久，嘎达梅林等也被押送回旗投入监牢。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与其亲属和主张抗垦的有识之士共商营救嘎达梅林等。11 月 13 日，劫狱营救成功。嘎达梅林毅然举起抗垦斗争的旗帜，当即组织抗垦武装，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抗垦和反对封建王公的斗争。由于得到蒙古族人民的广泛支持，抗垦武装很快发展到近千人，转战在科尔沁草原上，袭击垦务局和王府的放垦官吏，使垦务无法顺利进行。于是，东北军派张海鹏部及其驻开鲁的 17 旅 3 个团进行会剿。武装抗垦斗争十分艰巨激烈，从科尔沁草原转战到乌珠穆沁草原，奔驰数千里，广泛传播了抗垦斗争的影响。东北军指挥这次会剿的是蒙古族“马贼”，时任 17 旅 34 团团长的李守信。他借助军阀武装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的优势，不停顿地追剿。起义部队武器弹药和物资匮乏，又无喘息之机，在战斗中减员甚多，又难以补充，到 1931 年初已只剩 200

余人。4月9日，义军在通辽以北舍伯图附近的洪格尔敖包被李守信率部队围困。在老哈河边的战斗中，嘎达梅林壮烈牺牲，只有20余人突围。嘎达梅林起义虽遭到军阀的镇压，但是它给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留下了永不消逝的巨大影响。“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这首雄浑壮烈的民歌唱出了起义的宗旨，唱出了起义的悲壮，唱出了民族的希望。这首歌至今还在内蒙古大地上，不分民族，家喻户晓，有口皆颂。

1929年秋天，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从莫斯科到达乌兰巴托以后，在外蒙古买了一套牛车，化装成旅蒙商人，从苏尼特右旗入境，经过克什克腾旗、开鲁、通辽到达郑家屯。他们在这里落脚后，分头调查研究哲里木盟各旗的社会动态，特别是蒙古民族的状况。在他们1925年赴苏联以后的近4年间，蒙古民族的处境每况逾下，牧场越来越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嘎达梅林的起义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他们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秘密活动，条件成熟就发展党员，以准备革命力量。当时决定朋斯克到旗县并存的康平县和宾图王旗活动，特木尔巴根在洮南万国红十字会办的学校中以教师身份掩护革命活动。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工作，他们联系了一大批蒙古族进步青年。1932年3月，正值伪满洲国成立时，他们召集哈丰阿、那钦双和尔、王海峰、郭玉峰、乌云达赉等四五十人，议论形势，分析蒙古民族的前途，激发民族觉悟。他们从这些人中选择了哈丰阿、那钦双和尔等20多名表现坚定的蒙古族青年，作为第一批发展党员的对象，经过考验，发展为党员，在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东蒙撒下了民族解放的革命种子。1932年4月，朋斯克赴共产国际报告东蒙情况。共产国际指示，一要采取各种形

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二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是王公贵族，喇嘛活佛，只要抗日就与他们联合；三要进行秘密的群众工作，目前不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以免暴露自己。并决定朋斯克今后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潘柯夫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指示。特木尔巴根在东蒙潜伏到抗战胜利；朋斯克于 1938 年由乌力吉敖其尔护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以日本特务嫌疑在那里被监禁 8 年。

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先后派出白海风、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白永伦、徐寿昆等，与先期到达的德勒格尔、乌力吉敖其尔、纪松龄等取得联系，以北平为中心，沿平绥铁路，在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在察哈尔一带建立了部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基层组织，在北平建立了联络点，为恢复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做了准备。

第三节　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施其“满蒙政策”和既定的侵略计划，1931 年秋天，在我国东北制造了所谓“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扬言这是什么“满蒙生命线的危机”。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又挑起了柳条沟事件，向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在短短的4个月零18天之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主要城镇和铁路线。1932年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即抛出了它早已准备好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明确提出"诱导满蒙从支那（中国）政权中分离，使之成为一独立政权统治之地区，并逐步具备一国家之形态。"在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由它控制的"国家"，从中国分离出去，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一切权利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2月16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主持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会议"，17日即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以筹备满洲国建国事宜，把没有参加会议的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也塞进这个委员会为委员；25日，正式决定建立伪满洲国；3月1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满洲国"成立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当时规定"满洲国"首脑为执政，年号大同，领域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各省和东蒙古各盟旗。3月9日，在伪满洲国国务院内设立了兴安局，掌管蒙旗事务，齐默特色木丕勒任局长。8月3日，兴安局改称总署，齐默特色木丕勒任总署长官。兴安局和兴安总署的职能相同，掌管特殊行政区域兴安省内一般行政，辅佐国务总理处理有关兴安省内旧蒙旗的旗务。1934年12月1日，在伪满洲国政府机构改革时，将兴安总署改称蒙政部，齐默特色木丕勒仍被任命为蒙政部大臣。蒙政部是与政府各部相同的行政上的中央领导机关，掌管伪满洲国内全部蒙旗事务。1937年7月1日，又将蒙政部改为兴安局，设总裁，巴林右旗札萨克扎噶尔任总裁；1940年，原扎赉特旗札萨克巴达玛喇布坦接任总裁到终。兴安局直属国务总理大臣，负责处理蒙古行政上的事务。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并设立兴安局以后，在内蒙古东部废除了盟部行政和王公札萨克制度，设立了兴安东、南、北3个分省，隶属于兴安局。兴安东分省公署在扎兰屯，辖布特哈旗、阿荣旗、喜扎嘎尔旗、莫力达瓦旗和巴彦旗，额勒春、博彦满都先后任省长。兴安南分省公署初在郑家屯，后迁到王爷庙，先后辖科尔沁左翼前、后、中3旗，科尔沁右翼前、后、中3旗，扎赉特旗，1934年10月又划入库伦旗和通辽县，业喜海顺、寿明阿、博彦满都先后任省长。兴安北分省公署在海拉尔，经调整合并辖新巴尔虎左翼旗、新巴尔虎右翼旗、索伦旗、额尔古纳左、右两旗、陈巴尔虎旗以及海拉尔市和满洲里市，凌升、额尔钦巴图先后任省长。1933年5月，设兴安西分省，分省公署在开鲁，辖扎鲁特左、右两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右两旗、克什克腾旗、奈曼旗、翁牛特旗、开鲁县、林西县，扎噶尔、诺拉嘎尔扎布、旺沁帕尔来先后任省长。1934年10月，伪满洲国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时，兴安东、南、北、西4分省升格为4个省。1943年10月1日，撤销兴安东、西、南3省建制，建立了兴安总省，保留了兴安北省，博彦满都任兴安总省省长，省会设在王爷庙。兴安总省下辖3个区行署，即兴安中心区行署驻王爷庙，辖10旗2县；兴安西部区行署驻开鲁，辖6旗2县；兴安东部行署驻扎兰屯，辖4旗2县。废除王公札萨克制度后，旗设旗长，由伪满洲国任命。在兴安各分省或各省公署里都设有掌握实权、控制一切的日本人参与官或次长，并兼省官房长官。兴安南省先后有中村撰一、都见泥三、市川敏、都甲歉介；兴安西省有中村、除野、海村；兴安北省有伊藤、中村撰一、河内由藏、森田正男、马迟信一、大园等任参与官或次长。在省公署下属机构或旗县也设日本人参事官，一切由他们说了算。这是日本人控制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地道的殖民地傀儡政权。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军事统治，在兴安省范围内设立了两个军管区，分管设在兴安4分省的4个警备军。1932年9月，在整编“内蒙自治军”的基础上，招募了蒙古青年学生，组建了兴安南警备军，巴达玛喇布坦任司令，日本人金川耕作任顾问，粟野为参谋长；同年设兴安东警备军，由收编各旗县地方武装编为两个骑兵团，一个独立山炮连，朝罗巴特尔、敖瑞平先后任司令，日本顾问泉铁翁，参谋长曾根崎；1933年设兴安北警备军，强征呼伦贝尔蒙古族青年编为两个骑兵团，一个独立山炮连和一个国境警察大队，乌尔金任司令，日本人顾问寺田利光，福龄任参谋长；同年设兴安西警备军，收编热河省汤玉麟属下李守信部和地方蒙古官兵组成两个骑兵团，乌古廷、郭宝山先后任司令。

1938年设立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巴达玛喇布坦任司令，统一指挥兴安军，撤销兴安东、西两个警备军司令部，增设兴安师司令部。与此同时扩充部队，兴安军共辖12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两个独立山炮连和一个汽车队，而且决定兴安军行文、讲话全部使用日本语言文字。1940年撤销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巴达玛喇布坦中将晋升为上将并调任伪满洲国兴安局总裁。设第九军管区司令部驻通辽，辖原兴安南、西两省驻屯部队；设第十军管区司令部驻海拉尔，辖原兴安东、北两省驻屯部队。此外，1934年7月，在郑家屯成立了兴安陆军军官学校，1935年8月，迁来王爷庙，形成培养军事干部，轮训现役军官的综合性军事学校。巴达玛喇布坦、甘珠尔扎布、郭文林、乌尔金先后任校长，金川耕作、下永宪次任顾问。由日本人操纵组建并实际控制的伪兴安军及其后续力量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以蒙人

治蒙的名义，在军事上实行其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军政殖民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疯狂的经济掠夺。首先设立所谓荒务局，以垦荒“借地养民”为由，招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在东蒙垦荒种田，由荒务局征收荒租。继则又提出土地奉上，将蒙旗土地奉献给伪满洲国，变蒙旗土地所有权为伪满洲国所有权。这是对蒙古民族的最严重的经济掠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次是对东蒙地区的牧业、农业、林业、矿业资源的掠夺更为惊人。1938 和 1939 年，掠夺羊毛 280 余万吨；以牲畜头数摊派“出荷”更为苛刻，每 100 只羊“出荷”25 只，每 300 匹马“出荷”100 匹，每 20 头牛“出荷”牛皮 1 张，每 5 只羊“出荷”羊皮 1 张。在农村大量征取“出荷”粮，而且在未征完“出荷”粮之前，要封闭全部碾磨房，连农民自用的粮食也不准加工。日本侵略者垂涎已久的扎赉诺尔煤矿，在伪满洲国成立之际就被接收过去了；东蒙古的金矿更是日本人注目之点。至于伪兴安省的税捐，可谓包罗万象。仅兴安各省内的地方税目就达 5 大项 38 个目，即国税附加捐 3 个目；地亩捐 1 目；法定杂捐 9 个目；许可杂捐 18 个目；省地方费法 7 个目。其税目名称无奇不有，所征税率也是惊人的。如果把伪满洲国的国税加进去，老百姓的税赋负担就可想而知了。

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沦陷，使内蒙古东部区的蒙汉各族人民和东北同胞首先蒙受了国难之苦。在南京政府抱定“不抵抗主义”的严重关头，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提出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 月 7 日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即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由满洲省委领导的中共内蒙古特委也及时发出了：团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踊跃参加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占领东北各重要城镇。10 月，开始进攻辽北蒙边地区（今辽宁省西北以及内蒙古哲里木盟一带）。面对日军的横行，伪军的猖獗，东北军军事委员会步兵训练组少将组长高文彬赶往北平，与张学良共商在辽北蒙边地区团结蒙汉人民共同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决定组织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指派高文彬为行署专员。并电邀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亲王府统领李海山、巡防骑兵统领刘震玉赴北平会晤。此时的李海山已识破了“日方挟其满蒙政策，首先利用蒙古。于是多方利诱，百计威迫，使与中国脱离，而作彼之先驱”[①] 的阴谋，他“不忍坐视我东北三千万民众沦于暴日铁蹄之下，任其黩武横行，奸杀蹂躏，即欲自行起兵抗日。”[②] 因此，立刻赶往北平，计议抗日。李海山受命任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司令，刘震玉任第二路司令，归行署指挥。10 月下旬，高文彬率领行署 20 余人到达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

---

① 李海山：《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新蒙古》（月刊）第 3 卷第 1 期（1935 年）。

② 同上。

之后，高文彬分别派王子印、张香阁、关翼青去做科尔沁左翼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以及科尔沁左翼中旗统领韩色旺的工作，改编了二人所辖的“蒙古自治军”，包善一被任为辽北蒙边骑兵总司令，韩色旺任副司令。

10 月下旬，在日本顾问松井清助指挥下的数千日伪军由通辽北萧河敖包、舍伯图一带进犯通辽。李海山率部采用侧面出击的战术，将日伪军围困，血战 4 昼夜，迫使其败退舍伯图。几日后，李海山获悉日伪军准备再度攻打通辽。便联络刘震玉部，分东西两路向舍伯图进攻，经 3 昼夜的激战，攻取了舍伯图。两次战役共击毙日伪军数百人。11 月初，日军“携铁甲车及坦克车，附以日蒙鲜军陆空联合，大举围攻通辽”。[①] 因寡不敌众，李海山等率部经激烈抵抗后退往开鲁。1932 年春，李海山、刘震玉两路军联合驻开鲁的东北军骑兵第九旅共同发动反攻，相继收复了余粮堡、莫力庙、曹家营子、舍伯图等重镇，共歼日伪军千余人，击毙日本顾问松井等军官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5 月，东三省民众后援会总会决定将三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区，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辖区划为第 5 军区，高文彬任司令。9 月，高文彬所辖的第五军区已拥有 8 个梯队，10 个支队，3 个独立团，达 4 万余人，分布辽北蒙边 20 余县开展抗日斗争。

为收复通辽，9 月 1 日高文彬率李海山、刘震玉等部约五个团的兵力向通辽日伪军发起猛攻，义勇军攻入城中与敌军展开巷战，激战至傍晚，敌援军从钱家店赶到，义勇军因弹药不足，又连日作战，力不能敌，经余粮堡转至康平休整。10 月 4 日，李海山、刘震玉再次向通辽进攻，很快占领了通辽小街基，由于敌

① 李海山：《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

援军近千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义勇军发起猛烈反攻，被迫撤回通辽西官银号。6日晚10时，李海山、刘震玉部向通辽发起第三次进攻，日伪军以坦克、装甲车进行反攻，战斗到次日凌晨，“终因我国武器不能抵敌方之武器”[1]及骑兵第九旅叛投日军而未能取胜。在三次攻取通辽失利后，义勇军又为夺取辽源、康平征战了两个多月。11月27日，血战五昼夜的义勇军被日军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围困于康平，在向开鲁方向突围中，牺牲惨重，高文彬被俘。1933年春，日军大规模进攻热河，李海山、刘震玉等部与疯狂的敌人数次浴血奋战后，被迫经奈曼、敖汉等旗退往察哈尔省康保一带。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将驻防康保的李海山部改编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蒙古骑兵第一路军，李海山任司令。7月，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李海山联合李海青部发起了收复多伦的战役。此役，李海山率领的蒙古骑兵以伤亡340余人的重大牺牲，歼敌700余人，收复了多伦县城，又乘胜攻占了城北大庙据点。之后，这支蒙古骑兵与同盟军并肩转战于察北地区。同盟军失败后，李海山部先后被编为察哈尔省商都警备骑兵第一支队，李海山相继担任支队司令、宝昌警备副司令等职。不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监押5个月之久。李海山是蒙古民族著名的抗日将领，他坚贞不屈的抗日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其结局与冯玉祥、吉鸿昌皆无不同。

李海山曾有过一段感人的自述，在此值得录书：“余自奉命起兵救国，所有各官兵，除本司令原统率蒙古兵外，其余均招集

---

[1] 李海山：《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新蒙古》（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

本旗壮丁，及蒙古望族，而枪马弹药，均系个人私有，俱以血汗金钱所买。我蒙古官兵被日本杀伤两千有余，而国土又未收复，遂被缴械致使蒙古战后余生，流离失所，无衣无食，死于沟壑道路者不知凡几。……饥寒之声，不绝于耳。余无以筹措，只仰天叹我蒙古牺牲、荡户救国、结果竟至如此，余不敢怨天尤人，惟愿国人察其愚忠，赐以教言。"①

1931 年 10 月，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并扶植起伪黑龙江省政权后，直逼海满地区（今呼伦贝尔盟海拉尔、满洲里一带，当时属黑龙江省）。至 1932 年 8 月，海满地区挂上了满洲国国旗，满洲里海关也驻进满洲国国境警察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二旅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义愤填膺。他拒绝了日伪高官厚禄的利诱，决心举旗抗日。他一面招募新兵，扩充兵力，一面创办兵工厂赶制弹药，同时积极联络附近抗日部队。9 月 27 日，在黑龙江陆军第一旅旅长张殿九的配合下向日伪军展开攻势。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一线各站护路军全部佩带"铁血救国"的臂章，占领火车站，扯掉满洲国国旗，切断接往齐齐哈尔的电话线；击毙和俘虏了海拉尔飞机场的日军及参与情报工作的日侨；逮捕了满洲里的日本领事及日军特务机关长；歼灭了满洲国国境警察队。11 月 1 日，在海拉尔东头道街体育场召开了 4 千余人参加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和誓师大会，一些中外记者、中东路苏联驻海拉尔站职员也参加了大会。大会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号召各族各界行动起来，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宣布了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动

---

① 李海山：《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新蒙古》（月刊）第 3 卷第 1 期（1935 年）。

员令；向全国发出通电，表达东北民众救国军及海满人民的抗日决心。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由苏炳文担任，副司令张殿九，参谋长谢珂，副参谋长金奎璧，前敌总指挥张玉挺。下设两个旅，共计5千余人，第一旅旅长张玉挺，第二旅旅长吴德林。同时响应海满抗战的还有马占山部朴炳珊炮兵旅、李海青的救国军、原黑龙江省军署卫队团中校团副李振华、卫队第三营营长张兢渡等。蒙古族上层进步人物选送了300名蒙兵编入救国军。从满洲里到富拉尔基，所有东北民众救国军都举行了誓师大会。会后，全线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前线总司令部设在扎兰屯。海满群众组成后援会支援前线抗战。

苏炳文在组建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同时，便计划进攻伪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驻扎于齐齐哈尔的日军多门师团的长谷部旅团为了守护其伪政权，阻击救国军渡嫩江，炸毁了富拉尔基江桥。10月3日拂晓，日军由齐齐哈尔以北渡江攻击富拉尔基，遭到救国军第六团一营猛烈的堵击，致使敌军弃尸数具退回东岸，出动飞机沿江扫射，封锁江面。6日晨，日伪军分乘30余只橡皮船强行渡江与救国军展开激战，在碾子山步兵二旅一团的增援下救国军团结奋战，英勇反击，敌伤亡甚众，于次日被迫停止进攻。8日，日军调集增援部队松木直亮14旅团主力组成中山支队从齐齐哈尔西南桦木港渡江，占据有利地势，向富拉尔基发起进攻，火力异常猛烈。救国军杀敌心切，顽强应战，给敌军以重创，日军紧急调飞机助战，在三架敌机在连续轰炸下，救国军伤亡惨重，血战两昼夜之后撤往腰库勒村休整，富拉尔基落入日军之手。20日，救国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出命令，立即攻克富拉尔基，以配合东线的朴炳珊、邓文，南线的李海青，北线的马占山、徐海亭、张兢渡等部会攻齐齐哈尔。21日晨，在第二旅四

团的增援下，六团、一团分别从东侧、右翼、正面齐攻富拉尔基，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救国军攻入市区与敌人展开巷战，击毙日军指挥官两名、重伤一名，敌军仓惶溃退，救国军收复了富拉尔基，此役在海满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27 日，约 500 余救国军将士攻至齐齐哈尔城外，日伪军急忙调集重炮轰炸救国军阵地，救国军撤回富拉尔基以待时机。

面对东北民众救国军的英勇善战，顽强拼搏，日本侵略者改用"和平攻势"，动员各方说客进行拉拢诱降。伪黑龙江省省长韩云阶曾数次致电苏炳文，要求解除误会，放出日侨，归还飞机，提议派伪齐齐哈尔市长赴米家坎议和，并许愿供给步兵一、二旅充足的军费和军需。并用飞机向海拉尔撒发"求和"信。关东军司令部也致电苏炳文劝降。关东军板垣少将为此曾亲抵齐齐哈尔策划。这一切均遭爱国将领苏炳文的严词拒绝。当时报刊曾以《胁诱不屈的苏炳文》为题，赞扬苏炳文的民族气节和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抗日决心。[①] 11 月 17 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发表通电，决心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海拉尔市举行了有 3 万民众参加的"声援东北民众救国军抗日救亡义举大会"，群众代表向苏炳文献上绣有"抗日到底"的锦旗，苏炳文代表救国军的将士们表示了与敌血战的决心。会后，群情激昂，青壮年踊跃参军，群众自觉组成"青年敢死队"，"民众预备队"，父老乡亲们自动捐献了价值数千元的慰劳品，后援会成员踏着冰雪上街宣传抗日，博克图兵工厂不分昼夜赶制地雷、炸药运往前线，救国军的将士们更是顶着严寒冰雪坚守阵地。

---

① 延光先：《御敌海满》，《"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第 23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年。

"和平攻势"失败后，日本侵略军决定以武力征服海满。日军陆军及关东军高级官员在齐齐哈尔召开军事会议，同时向齐齐哈尔调集大量兵力，包括野炮兵、重炮兵、骑兵、飞机队以及伪军，共计2万多人。11月中旬，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以关东军松木直亮的第14旅团为主力，在装甲车、坦克、飞机的掩护下逼向嫩江两岸，冈原支队在飞机与伪军的配合下向富拉尔基、腰库勒一线发起攻击，中东铁路沿线被飞机、大炮封锁，库勒呼拉一带救国军阵地遭到猛烈轰炸。救国军面对装备精良的入侵者，凭着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在枪林弹雨中血战4昼夜，终因外无援兵，内缺弹药，被迫撤至朱家坎。22日，在日伪军3万余人的攻击下，救国军奋力抵抗后为保存兵力再次撤往辗子山休整。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炳文同马占山急电南京求援，并致电国联要求制裁侵略者的暴行。然而，没有得到丝毫的救助和关心。27日，日军加紧了围歼部署，以飞机、重炮大规模地轰炸海拉尔、辗子山、扎兰屯。同时调动驻索伦日军由阿尔山迂回切断救国军通往热河的退路。日军平贺旅团、茂木骑兵第4旅团及伪军从北侧、西侧围攻辗子山，日军服部旅团由甘南伸入阻隔救国军与扎兰屯的联系。12月2日，孤军奋战中的东北民众救国军1、4团2千余人与敌殊死拼搏后全部壮烈牺牲于景星镇。另外约1700余人在李海青的率领下以游击方式边战边退，经关门山进入索伦山，于1933年初到达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3日，苏炳文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避免全军覆没与黑龙江义勇军首领马占山一起率官兵及民众4千余人乘火车退往苏联境内。临行前电告张学良将军："东北民众救国军与日军浴血奋战，今已弹尽粮绝，敌军节节而进，我军势难立足，为避免地方糜烂，减少损失，迫不得已，拟即饮

痛退入苏联。……。”[①] 4 日，苏炳文在苏联致电全国各界：“自海满举义以来，黑龙江省义军响应四起，而我前方将士，血战肉搏，屡挫凶锋。……”如今虽迫于强敌压境而退入苏联，但抗日斗志不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②]

1932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热河后，绥东县改为奈曼旗，旗公署仍设在原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镇。由日本顾问把持的伪旗公署为防止袭击，修筑城墙，扩充卫队，逼迫老百姓做劳工、服兵役，使奈曼旗各族人民终日挣扎于白色恐怖之中。时任奈曼旗保安队长的周荣久因豪爽仗义、杀富济贫、除恶铲霸、体力超群而深得奈曼、库伦、阜新一带民众拥戴。周荣久目睹日军残暴肆虐、溃兵四处逃散、难民背井离乡的情景悲愤交加，带领队伍回到家乡组织了奈曼旗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此举得到了有民族气节的奈曼旗地方绅士、曾任王爷府保安队长的马守山的支持，马守山本人因年迈体弱特派部下 70 余人参加了抗日救国军。周荣久还联络了辽西北票的兰天林抗日救国军，决定与兰部的裴玉卿率部配合攻打八仙筒镇，让兰天林攻取黑城子王府，成功后会师八仙筒，之后共同攻打开鲁、通辽的日军。

1935 年 7 月 23 日，周荣久乘辽河泛滥将开鲁和八仙筒阻隔之机，率领 250 余人在裴玉卿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仙筒镇。凌晨，周荣久、裴玉卿、敖力布、海虾分别率兵由北、南、东、西四个方向发起猛攻。救国军边打边向城内伪军喊话：“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给日本鬼子卖命了！”城中守军对日本人早有不满情绪，

① 延光先：《御敌海满》，《“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第 27 页。

② 同上。

听到喊话便纷纷停止射击，只剩日本人和顽固分子负隅顽抗。城内外的乡亲们得知救国军在攻城打日本人，急忙赶来助战，有的搬运弹药、有的救护伤员、有的索性接过死伤人员的武器加入战斗行列。一个叫苗仓源的壮士，冒着生命危险割断了日本人与外界联络的电话线。在民众的协助下，里应外合，不到两个小时就攻下城池。接着，救国军集中火力攻取旗公署，上午9时战斗胜利结束。公署中的日本人除藤川夫妇在伪财务科长王宪中的掩护下逃脱之外，其余全部被击毙捕获。参事官山守荣治、指导官中根长被当场打死，日本官员佐佐木正太郎、岩本、警长贺田金座、盐务局长木村等8人被活捉后绑缚大街示众并拉到城外枪决。其余伪军顽固分子除被击毙之外全部投降。伪警务科长刘宗勋逃往开鲁。战斗中共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各种枪械70余支、子弹数万发。另外，还从伪政权的监狱中救出爱国人士及无辜群众50余人，其中大多数当即参加了抗日救国军。抗日救国军在八仙筒镇发布安民告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仓放赈，镇压匪盗，抗日救国军良好军纪以及爱国爱民的主张深深感动了八仙筒的民众，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救国军迅速扩大。

驻开鲁的日军闻讯后迅速纠集重兵向八仙筒压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兰天林的部队又未如期到达，合攻开鲁、通辽的计划只好放弃。为保存实力，周荣久率部东进，在辽西与兰天林的部队会师，此时部队已发展到1500余人。8月8日，周荣久和兰天林率领抗日救国军包围了辽西重镇北票市，当日攻下矿务局，直逼火车站。奉天日军司令急忙调集皇姑屯、锦县、朝阳日伪军昼夜赶往增援北票守敌。面对强敌，救国军于10日撤离。之后，周、兰两部与辽西建平高体乾的抗日救国军会合，力量更加壮

大。日军深惧这支抗日武装的威慑力，立即派奉天松井部队、赤峰伪军42团、兴安西省警备团围剿。10月13日，日伪军向抗日救国军发起攻击。救国军利用大黑山与敌周旋，经过数次激战给敌军以重创。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救国军陷入重围，伤亡惨重，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猛烈轰炸下，周荣久、兰天林率部分别从东、北两山口趁着夜幕冲出重围。是役，击落敌机1架、击毁军车5辆，救国军同时也付出沉重代价。

1936年，周、兰抗日救国军化整为零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游击战。9月，周荣久率部转战于奈曼旗南部山区时，在乌鲁木头山与敌人遭遇。结果，周部大多数被敌机、大炮炸死，周荣久等3人为了不做俘虏最后自刎身亡。周荣久牺牲后，日本侵略者将他的首级悬挂于鄂尔吐板镇街头，企图以此威吓当地民众。然而，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内蒙古东部地区各民族人民点燃的抗日烈火始终在燃烧着。

三、绥远反帝大同盟及进步思想文化运动

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的相继沦陷，唤起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地处抗日前线的内蒙古蒙汉各民族人民更是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绥远地区的爱国青年不畏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深入街道、乡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归绥中山学院的学生自动停课到附近农村，沿京绥路的一些城镇进行抗日宣传。1931年冬，在绥远省立小学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杜如薪、进步青年苏谦益等人自筹资金，创办了油印革命刊物——《血腥》。同年寒假，杜如薪、苏谦益在教师中筹建“读书会”，以多种方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亡的

道理，呼吁各民族群众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1932年6月，受河北反帝大同盟的委托，于伶、李佩衡、邸力等人率领“北平文化总同盟”组织下属的“苞莉芭（俄语，意为斗争）剧社”赴归绥公演。剧团在归绥旧城小东街“大观园”剧场演出了《无线电急奏》、《瓦刀》、《SOS》等宣传抗日救国的新剧目，演出场场爆满，深受归绥民众欢迎。他们此次在归绥公演名义上是为绥远地区筹集赈灾款项，实则是秘密建立绥远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早在1927年，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发起成立的“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宗旨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国反帝大同盟”的总部设在上海。北平、河北等地都先后建立了组织。于伶等人在归绥演出期间与杜如薪取得了联系，并对绥远地区的抗日形势进行了详细了解，认为这里基础比较好，基本具备了建立组织的条件，便向杜如薪等人建议成立“绥远反帝大同盟”。6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在公主府南荒僻的大仙庙里召开会议，于伶、邸力、李佩衡、杜如薪、苏谦益、马麟参加。主要研究了建立“绥远反帝大同盟”的问题。于伶向大家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说明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组织的纲领和任务，提出为了有组织地开展抗日活动，希望建立绥远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杜如薪重点介绍了绥远知识界反帝救亡运动情况以及国民党省党部和傅作义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不同态度。大家就绥远的抗日形势以及今后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当即决定建立绥远反帝大同盟，并制定了斗争策略与任务。杜如薪任书记、宣传委员苏谦益、组织委员马麟，属河北反帝大同盟领导。迫于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绥远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确定北平的联系地点是慈惠寺，归绥则由邮电工人侯荫棠负

责传递信件。

绥远反帝大同盟以单线联系，秘密发展，逐步扩大的原则，很快发展为50余人。在建立读书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的基层组织有：中山学院负责人武达平，成员任子良、安吉人、杜琏、宋守德；师范学校负责人杨国兴，成员吴殿甲；归绥第一中学负责人杨叶澎（又名杨茂盛），成员韩燕如（又名韩尚宽）；省立第三小学赵维新；省立第五小学何继宗；铁路扶轮小学李迪九；归绥火车站何继武；农科职业学校也建立了组织。同时在包头、固阳也建立了组织，分别由朱葆光、侯清和负责。另外，王炳谡、李作栩（女）等也是绥远反帝大同盟的主要成员。

绥远反帝大同盟以读书会的形式开展读书活动，从而启发、唤醒、教育人们。他们利用各种渠道购置和搜集当时被列为禁读的书籍，秘密传阅。如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的《彷徨》、《呐喊》等，还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其它政治、历史等书刊。为了使更多的青年通过读书活动提高觉悟，增强反帝斗争的信念，他们采取手抄、油印等方式将“五卅”运动的宣传品、苏联十月革命的材料、反对日本侵略及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文章推荐给青年。绥远反帝大同盟还继续出版《血腥》刊物，为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将刊名改为《血星》，意寓鲜红的红星。主要刊登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政论文、杂感、诗歌，还有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国内国际形势和介绍苏联革命的文章。1932年5月，出刊了《纪念五一》专号。由于发行量增加，后半年由油印改为铅印。铅印后的《血星》从塞外闯入了北平、上海等城市，曾被上海的革命青年赞誉为“沙漠里的骆驼”。

1932年夏，在绥远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各中学学生会为核心的公开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同年7、8月间，受中央河北省委派遣到绥远工作的杨一帆与同行的北平文化总同盟的张璋二人，首先向杜如薪了解了绥远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情况，并充分肯定了他们成立读书会、办刊物、团结青年、宣传抗日、积极发展组织的工作成效。1933年2月，中共归绥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建立反帝大同盟绥远省委，由杨一帆、杜如薪、苏谦益、杨叶澎、马麟组成，以后增加了杨国兴。反帝大同盟绥远省委由中共归绥中心县委领导。

在1932年冬，由杜如薪、苏谦益等组织成立了归绥地区第一个业余话剧团“绥远剧社”，杜如薪担任社长。剧社借用傅作义部设在小教场的“联谊社”（又名”中山堂”）排练节目。1933年春节，剧社在大观园公演了《无线电急奏》、《英雄与美人》等剧目。为了增强演出效益，扩大抗日影响，演出前特邀了《绥远民国日报》编辑、文化界进步人士杨令德致词，苏谦益也作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讲。这次共演出了3场，深受各界群众的欢迎。

1933年4月，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绥远反帝大同盟派韩燕如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重点由爱国学生运动转到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一同抗日。会议历时3天。根据会议精神，绥远反帝大同盟有计划地开展了工运和兵运工作。分别在旧城小东街车厂、大有恒地毯厂、归绥火车站、面粉厂、毛织厂开展活动，同时在绥远省府卫队搞策反，在火车上散发传单，往警察身上贴标语等等。由于这一阶段的斗争没有注重隐蔽性，活动比较频繁而且暴露，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警察局对中山学院、第一中学、师范学校、女子师范，乃至邻近县城的学校进行了大搜捕。4月15日，当杨叶澎、韩燕

如再次来到城隍庙旁洋车工人住地宣传时，被便衣警察逮捕，从他们身上搜出《国际歌》歌词和反帝标语。16日，警察在中山学院附小逮捕了苏谦益。杨国兴在清水河被捕。6月，杨一帆在包头被捕。在进步人士和群众的掩护下，杜如薪、王炳熨、武达平、任子良、杜琏等反帝大同盟成员在妥善处理了重要文件和物品后先后安全转移。绥远反帝大同盟虽然遭到破坏，然而，在绥远地区传播开来的抗日救亡的影响却仍在继续。

1933年9月，绥远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武达平、章叶频、任子良、袁尘影、李穆女等，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下，组织了“塞原社”。他们提倡进步，反对封建，在民族危亡之际开展以新诗歌为中心的进步思想文化运动，把诗歌当作大众斗争的武器，时代进军的号角，来唤醒人们认识世界，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他们在中山学院以墙报的形式创办了《塞原》周刊。后来在进步人士杨令德的支持下，《塞原》从12月12日起作为《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发行。他们充分发挥这一舆论阵地的作用，集中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宣传抗日的诗文、小说、短文、书评、翻译文章等。作者们注重从社会现实中选取题材，着重反映工农劳动大众的生活，为工农疾呼，为民族而歌。如武达平的《水车》、《我的生命》、《奔》，绍曾的《抢碎炭》，志文的《逃难人的歌》，佛茵的《摆渡人》，刘映元的《病了的孩子》，章叶频的《到处都拥挤着饥饿的人群》、《愿你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送草老人》、《拾地皮菜歌》、《生活的担子》、《打铁者的歌》等。章叶频曾在1934年12月1日《塞原》第22期“新诗歌专号”的前言中疾呼：“在目前，内有天灾人祸以及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外来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支配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诗歌是该如何急迫地成为一种强烈的、有力的、作

为民众呼声的喉舌了。”[①] 在《塞原》“新诗歌专号”的带动下，《新绥远》上也刊登了新诗专页，《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也介绍新诗歌运动，绥远写诗的人逐渐增多，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空前活跃。绥远师范学校编辑出版了《心波》、《艺苑》，归绥中学出刊了《三家村》、《沙驼》等诗歌专号。12 月 23 日，“塞原社”在旧城北门外绥远新闻社举行了绥远文艺界茶会。归绥文艺界进步人士约 50 多人参加，文艺界著名人士霍佩心、杨令德、李这剧等也参加了茶会。会上讨论了文艺的方向、任务、内容与形式等重要问题，明确了文艺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关系，这次会议对促进绥远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至 1936 年底，由“塞原社”创办的《塞原》以各种形式共出刊近 50 期。

1935 年冬，章叶频、袁尘影、凌信之等组织绥远饭店的青年工人建立了“漠南剧团”，排练了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剧目，于 1936 年春节在归绥旧城“九一八”纪念堂公演后，受到爱国群众的欢迎。

1936 年 3 月 6 日，章叶频、袁尘影等创办了《新女性》，这是绥远最早的以妇女问题为主题的刊物。章叶频担任主编，《新女性》创刊号载于《绥远社会日报》副刊上。它号召绥远各界妇女应肩负起拯救国家和民族解放的重任，和男子一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同时为妇女的自身解放而斗争。他们撰写了《先解放我们的脚》、《我国妇女运动的前途》、《妇女解放与新文字》、《寄给故国的姊妹们》、《关于恋爱》等文章，刊登小说《菊姊》等，发表关于妇女生活的政论文，并介绍苏联劳动妇女的保健设施，苏联儿童的教育状况，苏联新婚姻法等内容，以唤起绥远妇

① 章叶频：《三十年代的绥远新诗歌运动》，《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第 36 页。

女的觉醒。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稿源中断被迫停刊，至此，《新女性》周刊共出刊 30 余期。

为了加强新诗歌理论和创作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新诗歌运动的发展，1936 年 4 月，“塞原社”创办了“塞原社诗歌研究会”，参加人有武达平、章叶频、北虹、王琳、许季明、绍曾、阿玉、狄敏达、张凡夫等。6 月 22 日，由章叶频任主编的《塞北诗草》旬刊创刊，这是“塞原社诗歌研究会”会员发表诗作的园地。这一时期在诗歌研究会的组织和推动下，绥远又涌现出更多的爱国青年为《塞原》、《塞北诗草》写稿，诗歌的战斗性也增强了，如北虹的《雨地行军》，杨植霖的《杀他个斩草除根吧》，韩燕如的《打回三岛去》、《架起太平洋的肉桥》，杨乃燧的《决心》，陈一之的《谁说好人不当兵》，章叶频的《前进，英勇抗战的弟兄》、《怒吼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给敌人阵营里的士兵》等等。1937 年 1 月 23 日，《塞北诗草》出刊第 7 期，这也是最后一期。由于《西北日报》副刊编辑杨令德在《边防文垒》上发表了美国记者斯诺的《毛泽东会谈记》而被撤职。所以，《塞原》、《塞北诗草》也随之被迫停刊。

1936 年 4 月，由霍佩心、杨令德、袁尘影、章叶频、武达平、胡燕丘、郭良才等组织创办了文艺半月刊《燕然》。该刊的出版曾为团结绥远文艺界人士，活跃绥远文艺界起了积极作用。

1937 年 5 月 16 日，绥远文艺界在“左联”负责人任白戈的指导下，借绥远新闻社客厅举行了由 50 多人参加的文艺恳谈会。会议重点讨论了“绥远文艺界目前任务及今后的方向”等问题，并决定为团结文艺界人士共同开展抗战文艺活动，筹备建立“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举由燕然社、塞原社、绥中文艺研究会、挺进社、心波社、生活讨论会、小[illegible]社等 7 个文艺团体组成筹

委会。在各文艺团体的努力下，30日在土默特中学礼堂举行了“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50多名文艺界进步人士出席。霍佩心代表筹委会宣读了“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宗旨：一、本会以协作之精神，实现绥远文艺界的联合，提高人民抗敌救亡的觉悟，充实救亡力量，推动救亡工作；二、发行定期刊物，把边疆抗战救亡的真象与意见传达给内地，同时将内地消息，报道给边疆的人们；三、举行定期座谈会。[①] 会议选出由21人组成的理事会，霍佩心、杨令德、武达平、章叶频、郭良才、张祝三、马映光为常务理事。霍佩心、杨令德、章叶频、张祝三、郭良才为出版委员会委员，主持抗战文艺的出版工作。将《燕然》半月刊定为“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继续出版，直至“七七”事变后才被迫停刊。

绥远反帝大同盟的建立和爱国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开展，体现了内蒙古各族各界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预示着内蒙古地区有组织有纲领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始。这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对于唤醒人民、教育群众、组织各民族人民奋起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从中共归绥中心县委到绥远特委

绥远反帝大同盟建立后，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绥远地区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巡视员杨一帆和北平文化总同盟的张璋来到归绥，与杜如薪等接上了关系。杨一帆、张璋在认真听取了杜如薪、苏谦益、马麟关于绥远形势及反帝大同盟的活动情况后，认为绥远反帝大同盟通过建立读书会，办刊

---

① 章叶频：《绥东抗战时期的绥远文艺界》，《呼和浩特史料》，第五集，第38页。

物，团结进步青年，发展组织，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是有成效的，同时提出要继续扩大工作范围，使各界群众都参加反帝斗争。杨一帆在帮助绥远反帝大同盟扩大活动范围的同时，积极向苏谦益、马麟等介绍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中国革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教育他们要在这场革命中经受锻炼，使自已成为一个立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帮助及党课教育，苏谦益、杨叶澎、马麟正式提出入党要求。1932 年 10 月，在绥远省立第 3 小学苏谦益的宿舍中，由杨一帆、杜如薪主持了三人的入党宣誓仪式。

在开展党的活动的基础上，杨一帆等人酝酿在绥远恢复党的组织。1933 年 1 月，杜如薪、张璋到北平向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时请示恢复党组织一事。不久，杨一帆与在河套地区开辟党的工作的王森（即郭同春）一同回到北平。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马辉之的主持下，在宣武门外的秘密地点召开会议。会上马辉之根据绥远形势指出应尽快建立绥远地区党的组织，以加强反帝运动的领导。并提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绥远不宜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先在归绥、河套分别建立组织，不发生从属关系，均由中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2 月，中国共产党归绥中心县委在杨一帆、杜如薪等人的筹备下成立。杜如薪任书记，马麟负责组织工作，苏谦益负责宣传工作。当时属中共归绥中心县委领导的党员有杨叶澎、武达平、杜琏、王炳熨、朱宝光等人。县委机关设在旧城九龙湾街，马麟驻机关负责日常工作。为以防万一还在旧城吕祖庙街另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县委的预备机关，并将秘密文件及重要物品保存在那里。

中共归绥中心县委成立以后，首先加强了对绥远反帝大同盟

的领导，组织盟员学习党的刊物，讨论形势，扩大反帝爱国运动的宣传。当时中共河北省委的机关报《北方红旗》以及进步刊物《青年之友》、《士兵之友》等，还有部分马列著作在盟员中秘密传阅。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县委将反帝爱国运动由知识界向产业工人及士兵中发展，使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在绥远地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之处罚。"① 顿时，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气焰嚣张起来，特务、警察全部出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杨叶澎、韩燕如、苏谦益、杨国兴等先后被捕，杜如薪、王炳熨等迅速转移到萨拉齐和河北保定，其他同志也就地隐蔽，中共归绥中心县委被迫停止活动。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从通辽和绥中基地分三路进犯河北省北部长城一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中共河北省委更加重视绥远地区的工作。5月，派刘仁（化名王崇义）来绥远开辟工作。8月，刘仁与吉合（化名张其胜）、梁一鸣（化名于岳山）在包头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绥远特别委员会，书记刘仁，组织部长吉合，宣传部长梁一鸣，委员鲁赍、安建平。绥远特委机关设在倾向革命的蒙古族人士恒升在包头召梁的家中以及恒升的老家沙尔沁阿都赖，刘仁等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起草文件。

中共绥远特委建立后便积极展开工作。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1933年拥有工人400名左右。刘仁首先深入到铁路工人中，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工资等情况，给他们讲资本家与工人之

① 梁寒冰、魏宏运：《中国现代史大事记》，12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间的雇佣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启发和教育工人，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同剥削者斗争。发展工人中积极分子入党，并建立了包头铁路党支部（当时简称“铁支”），铁路职工业余学校听差张廷珍任书记，支部成员有裴凤山及铁路扶轮小学工友陈同志等5人组成。同时还成立了由50余人组成的赤色工会小组。11月，特委派梁一鸣专门负责铁路工人运动。1934年4月，为了有力地团结广大职工，成立了有30多人参加的党的外围组织“兄弟团”以及工会委员会。6月，工人党员发展至13人，组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张廷珍任书记并领导工程处的工作，其他两名成员负责开辟机务处的工作，同时在机务处建立了赤色工会小组，有22人参加。在绥远特委的领导下，包头铁路工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其中有1933年8月24日的反对“包工制”的罢工斗争；1934年1月15日的反对“恢复包工、包伙”的斗争；7月27日的反对“拘押和殴打工人”的斗争；8月24日的反对“新章”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等等。铁路工人这种由被剥削到反剥削，从自发斗争到自觉革命的过程，是绥远特委辛勤工作的成果。直至1934年秋，上海铁路总工会派人接收了包头铁路支部的工作，绥远特委在包头铁路工人中的工作结束。

1933年7月，国民党孙殿英的41军进驻包头。由于这支队伍曾在赤峰与日军顽强作战，以及军中地下中共党组织的配合，绥远特委在41军展开了秘密的工作。首先选择了随军军官学校做为工作重点，刘仁亲自做副军长兼军官学校校长谭松廷的工作。经过一段思想工作后，谭松廷邀请刘仁给官兵演讲，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在进步学员中组织了“读书会”、“反帝红旗会”、“士兵大同盟”等组织，同时在学校的5个队中全部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在地下党支部的基础上建起了支干会。发动和组

织学员开展了反对打骂、开除士兵、反对枪毙学员、反对克扣菜钱和改善生活条件及医疗卫生条件等斗争。11 月，刘仁、吉合、梁一鸣等深入到 41 军较集中的泰安客栈，准备策动部分官兵起义，结果因准备仓促而未能实现。同年冬，41 军开赴河套驻扎，刘仁亲赴临河，继续在军队内部开展工作。绥远特委在 41 军的工作，一直到 1934 年春晋军占领 41 军军部所在地三盛公，迫使孙殿英的部队撤回临河全部缴械为止。

1933 年底，刘仁在 41 军内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帮助恢复和建立了中共临河县委的组织。中共临河县委曾于同年 5 月 23 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书记王森；组织部长先后由阎定础、杨子华、霍士奎（即霍士杰）担任；宣传部长侯进国；农运委员张鱼子、李四；兵运小组长魏思文。8 月，因驻河套晋军 110 团 11 连的中共地下党员在祥太裕发动了一起全连的武装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河套一带，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临河县委及下属 30 多个党支部受到严重破坏，临河地区党的工作处在危难关头。中共绥远特委详细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及时向河北省委作了书面汇报。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田夫、石心）的指示，特委把临河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区和三区，并加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1934 年 3 月，刘仁再次来到临河，恢复和改组了中共临河县委，王森继任书记，霍士奎任组织委员，侯进国任宣传委员。在一区恢复了一个有 20 多人的党支部，一个有 16 人的团支部，区里设一名干事，“穷人会”中有群众 70 多人。三区恢复了两个党支部，有党员 25 人，“穷人会”有 3 个小组。绥远特委根据临河地区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党团组织，一方面组织和发动农民向地主进行“要饭吃”、“吃大户”的夺粮斗争。6 月，王森离开临河回到北平。中共临河县委改组，霍士

奎任书记，侯进国任组织部长，王逸伦任宣传部长。8 月，霍士奎病故于陕坝，临河县委再次改组，王逸伦任书记，侯进国任组织部长，张五任宣传部长。1935 年 4 月，临河大顺城惨案发生后，形势恶化，河套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临河县委成员被迫转移，被通缉中的王逸伦到包头没有找到已经转移到乡下的刘仁、吉合，便只身到了北平。县委工作停止。

中共绥远特委成立后，就绥远地区形势及民族问题等情况向河北省委、中央驻北方代表做了汇报。1934 年 2 月 27 日，石心（即孔原）在《关于绥远党的报告》中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指出："首先要求着我们最大力量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内蒙王公勾结，企图利用内蒙民族运动，在其与王（公）一手包办的'自治运动'的烟幕弹底下，来有步骤的实现其进一步的侵略与鲸吞。将党的民族政策普遍在蒙古民族中进行宣传与解释工作，有计划地在他们之中去建立各种群众的革命组织，……在坚决进行反帝、反国民党、反王公、地主、喇嘛等斗争中去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的工作。"[①] 据此精神，绥远特委将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土默特地区的工作分成两个区，萨拉齐为西区，毕克齐为东区，特委的同志分别深入各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加强与蒙古族干部群众的联系。刘仁来到包头后立即与乌兰夫取得联系；在蒙古族干部李森的帮助下，顺利地在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安排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特委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视蒙古族同胞为朋友，所以这支蒙古族部队的不少官兵均帮助特委做过工作。吉合以行医为掩护在西区开展工作，经常深入农牧民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他耐心地给

①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240 页。

蒙古族群众讲民族平等、团结，推翻王公贵族，争取民族解放等道理。发动萨拉齐水涧沟门的农民，在旱季与地主展开了夺水斗争取得了胜利，从而增强了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信心。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1934 年初，绥远特委决定由梁一鸣用“内蒙古人民自治同盟”的名义，起草《告蒙古人民书》，同时由梁一鸣送往北平。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绥远特委在土默特地区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发展了五六个活动点，壮大了蒙古民族中的革命力量。

1935 年春，平津地区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包头一带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中共绥远特委与上级关系的中断失去了经费来源，活动非常困难。随着形势的恶化，梁一鸣、鲁贲、安建平先后转移，刘仁、吉合也撤到沙尔沁阿都赖恒升的家中。刘仁、吉合研究决定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请示工作，随后立即写信唤回在北平的王逸伦。在乌兰夫、奎璧的协助下，解决了旅途所需的骆驼、工具、食品、路费等。7 月，刘仁、吉合、王逸伦、恒升等一行扮作商人，翻越大青山，经四子王草原，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此中国共产党绥远省特别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五、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武装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又积极向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扩张。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贪婪暴行，1933 年 1 月 17 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表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等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

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协定。这一宣言反映了全国各民族人民联合抗日的愿望，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忱。

1932 年 10 月，爱国将领冯玉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来到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开展筹建抗日武装的工作。1933 年 1 月，中共华北地区党组织相继派张慕陶、吴化之、武止戈、许权中、宣侠父、马志敬、杨晓初等人到张家口、热河等地区，协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以及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3 月，热河失守后，冯玉祥秘密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5 日，共产党员吉鸿昌在天津毁家纾难、集资购买枪支弹药，率旧部赶赴张家口。4 月，汾阳军校（原冯玉祥教导团）官兵奉冯玉祥电召开抵张家口，被编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第二师，支应遴任师长。5 月 20 日，方振武率其抗日救国军冲破重重阻力由晋南进入张家口。

日军占领热河后迅速向长城各口及滦东深入。5 月 1 日，攻占察北重镇多伦，随之沽源、宝昌、康保等县相继沦陷。在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急于同日本妥协。5 月 31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一协定不仅使整个华北置于日军的监视与控制之下，而且为日军侵占全华北及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群众救国团体和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集会，并纷纷通电敦请冯玉祥举旗抗日。5 月 26 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公开竖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发表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

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恢复领土完整。"① 上午7时，张家口全城实行戒严，抗日同盟军占领了察哈尔省政府，撤销了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佟墉，逮捕了由北平军分会任命的警察处长、公安局长张九卿，收缴了全部警察的枪械，查抄了国民党蓝衣社派遣的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委任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保安处长、公安局长，张砺生为警备副司令。同时，发布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

5月27日，在中共前线委员会的领导下，张家口3千多名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及士兵集会，成立了"察哈尔省御侮救亡会，"选举了由5名中共党员参加的10名执行委员，捣毁了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发布了保护民众运动，取消苛捐杂税和释放政治犯等三个布告。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各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

---

① 转引自阮玄武：《回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15—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织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和青年参加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在东三省开展抗日活动的东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邓文、李忠义、汲汉东等部，蒙古族抗日武装李海山、刘震玉等部，绥远土默特旗的老一团也都参加了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6 月 15 日，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中共党员宣侠父、张慕陶等参加了大会。历时 5 天的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问题案》、《关于财政政策决议案》、《关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决议案》、《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佟麟阁、孙良诚、张允荣、邓文、张人杰、邱山宁、张慕陶等 11 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领导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抗日同盟军经过短期整训后，便计划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察哈尔北部的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6 月 20 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崔贡琛为参谋长，率邓文、李忠义、黄守忠等部北上攻取四县。中共前委组织了 10 名宣传队员，由柯庆施负责，随军做宣传鼓动工作。出发前吉鸿昌向全体官兵慷慨陈词：“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扶危。”① 同盟军的官兵无不为之感动，欢呼声威震山岳，士气激昂。出发时恰逢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加之同盟军补给无着，战士们除了携带一点炒米外，只能依靠沿途向农民征集一些土豆、大瓜等维持。然

---

① 转引自王崇仁：《回忆吉鸿昌将军》，《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47 辑，第 139 页，1992 年。

而这些困难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抗日同盟军的斗志，反而更激励了官兵们必胜的信念。各路军队集结于张北后，22日，由张北直逼康保。盘踞在康保的伪军，闻抗日同盟军大举北征十分恐慌，经3个小时的激战，当天下午同盟军克复康保县城。抗日同盟军进驻康保后，一面剿匪安民，一面做进攻宝昌的准备。

此时，宝昌、沽源地区集结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崔兴武部的主力。同盟军的北征迫使日军急令张海鹏自沽源调重兵增援宝昌，日军茂木旅团派出骡马千匹昼夜抢运弹药、武器，同时网罗当地土匪李占元、杨老八等不断分股偷袭，烧杀滋扰。另外，连日阴雨，队伍缺少雨具，人马衣服全被淋湿；沿途荒凉，村落稀少，每人每日一斤小米也难以保障，往往终日跋涉却难得一饱。同盟军历尽艰辛，清剿伪匪，保护民众，战胜了面临的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吉鸿昌在发往总部的电文中表示："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① 6月30日，抗日同盟军分别迫进宝昌、沽源。伪军张海鹏、崔兴武部在日军茂木旅团的支援下负隅顽抗。7月1日，抗日同盟军在解家营、刘家营、柳条沟一带与敌军展开激战。黄昏，3000多名顽军北退多伦，同盟军乘夜进驻宝昌，是役歼敌数百人，俘获甚众，除日伪官兵外，还有37名俄罗斯人。与此同时，沽源守军刘桂堂部反正，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第六路总指挥。此前，在抗日同盟军初建时，刘桂堂即派副军长尚武与冯玉祥取得联系表示参加抗日。刘桂堂之举使驻在沽源的张海鹏部部分伪军陷于孤立，被同盟军余亚农部击败退往多伦，是役歼敌700余人，俘获500余人，收复沽源。

---

① 转引自王崇仁：《回忆吉鸿昌将军》，《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140页。

抗日同盟军初战告捷，声威大振，一批投日伪军相继投诚。同盟军连克三县后乘胜追击，直逼多伦。多伦位于滦河上游，兴安岭之西口，热河、察哈尔两省的通道，地势险要，系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为了抵御同盟军的进攻，在多伦城外构筑了 8 排 32 座炮台，内外交通沟壕、电网以及数十座明碉暗堡，凡属攻城要塞均用交叉火力严密封锁，并大量调集增援部队。7 月 5 日，抗日同盟军张凌云部先锋军开抵多伦近郊前后七里河，前后孤子山等地，将敌前哨近百余人击毙。根据多伦的地形及敌人的布防情况，吉鸿昌在大柳树村召集前线主要将领开会，认真分析了双方的形势，认为面对强敌不能硬攻要智取，决定分兵 3 路包围县城，同时调重兵堵截敌增援兵力，力求速决。6 日，各部按计划集结，加紧备战，将士们决心誓死血战多伦城。7 日，抗日同盟军开始进攻，左路张凌云部进攻大厂一带；中路李忠义部迫进黄土滩子一带；右路刘桂堂部苏致广师攻取破窑洼一带；吉鸿昌、邓文两部进驻前后孤子山。23 时，同盟军开始猛烈攻击，经过彻夜激战，突破敌人两道外围防线，占领两道敌军战壕。8 日，日军以数架飞机助战，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展开反攻，战斗十分激烈。下午 6 时，右路乜玉玲师占领多伦西仓两端，敌军纷纷向城内逃窜。同盟军在是日战役中缴获步枪 113 支、战马 157 匹、轻机枪 70 余挺、重机枪 3 挺、战俘 290 余人。9 日，城外要点全被占领，敌军退居城内凭险固守。在敌军密集炮火的封锁之下，同盟军攻城受挫，被迫撤离火线。10 日，同盟军将多伦城重重包围。当晚，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肉袒匍伏前进，数次冲锋均未成功，同盟军伤亡 240 余人。11 日，同盟军从拂晓发起总攻。在日机的掩护下，伪军乘机向同盟军阵地扑来，双方展开激烈肉搏战，相持不下，日伪军退守城内，同盟军伤亡甚重。

当时，冯玉祥向前线发来电报勉励抗日将士："今日之事，进则具生，退则具死。死固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者。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所冀复兴国祚，与诸将士兵共勉之。而粉骨碎身以报国者，则祥愿以之自勉也"。[1] 电文极大地激发了全军将士的决心，一致表示誓死攻克多伦，以死报国。12日，吉鸿昌派副官刘亨香、马国栋率精兵40余人化装潜入城内调查敌情。凌晨总攻开始，吉鸿昌亲自袒臂冲锋，隐伏在战壕中的敢死队勇猛出击，潜伏于城中的40余人为四路分别至各城门口，混杂在慌乱的敌人队伍中高喊："同盟军进城了"、"吉鸿昌冲进来了"，敌人一听顿时惊慌失措，秩序大乱，无心恶战，丢下阵地忙于逃生。同盟军乘势冲杀，里应外合，于10时许，分别由南、西、北门攻入城内，历时3个多小时的巷内肉搏，残余日伪军由东门仓惶逃命。沦陷72天的多伦被抗日同盟军经5天鏖战光复，兴高采烈的多伦人民拥出城外欢迎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当日即致电祝贺："欣悉多伦业于今晨为我军完全克复。计自北征以来，我官兵壮怀奇节，奋不顾身，逐北追奔，节节胜利。兹更神武焕发，克复名城，壮色山河，增光民族。卓绝坚（艰）苦，扫逆迹于边廷，拉朽摧枯，振国荒塞，从知人心不死，事尚可为。……特电嘉慰，兹并勉筹奖金五万元，聊资犒劳。"[2] 多伦收复后，中共前委派出的随军工作团与宣传队，立即发动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参加人数达5000人。13日，冯玉祥

---

① 转引自刘涓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2页。

② 同上，第213页。

任命张凌云为多伦警备司令，率部固守。调吉鸿昌、邓文二部驻守沽源、独石口，与张部形成犄角之势，以防日军反扑南侵。同日，张家口军民在上堡体育场举行庆祝收复多伦大会，并向前方抗日将士发出贺电。中共张家口地区党组织、平绥铁路工会、察哈尔省御侮救亡会派代表满载着张家口各界民众募捐的慰劳品赶赴多伦慰问，并与抗日将士联欢庆贺胜利。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战告捷，使全国各抗日救国团体、爱国人士、各族各界人民欢欣鼓舞，相继致电慰问、祝贺。北平、天津、上海、江苏、广东、太原等地民众纷纷捐献财物支援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支持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士气更加高涨。为进一步收复失地，27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玉祥任会长，委员有吉鸿昌、邱山宁、佟麟阁、张允荣、方振武、崔贡琛、佘心清、温晋成、阮玄武、何章海、王际通、徐维烈等。并通电全国郑重宣布了抗日同盟军要乘胜继续收复东北四省，把日本侵略军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正值抗日同盟军积极准备收复东北四省之际，国民党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集军事会议，筹备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战争。由蒋介石自任团长的军官训练团，聘请以塞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及大批意、美军事教官，讲授"剿共"办法。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发表联名通电，诬蔑冯玉祥"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害统一政令"，"滥收散军土匪"，"煽动赤焰"等，劝冯玉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政治诽谤的同时施行经济封锁，不仅截断了国内各地及海外侨胞对抗日同盟军的经费、物资的援助，还将曾经给予抗日同盟军经济援助的爱国将军朱庆澜诬以贪污罪名而解职。蒋介石还使用其惯用伎俩，挑拨离间，

封官许愿，从内部分化瓦解抗日同盟军，并积极进行军事围攻，先后命令庞炳勋、冯钦哉、王以哲、徐延瑶、黄杰、关麟征等部向察哈尔逼进。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与日驻华武官柴山相勾结，调日军平贺旅团、茂木旅团以及伪军张海鹏部，使抗日同盟军处于四面被围的态势。在蒋介石、汪精卫的政治压力、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以及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8月4日，冯玉祥主持召开了抗日同盟军军政领导人会议。会上冯玉祥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形势并提出：如坚持下去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目前让宋哲元回来，我们可以保存些实力。方振武、吉鸿昌坚决不同意这种妥协的办法，他们主张抗日反蒋，日本人来打日本人，蒋介石来就打蒋介石，没有其他路可走。然而，出于无奈的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忍痛收束军事”撤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前往泰山。临行前发布了“告抗日军全体将领书”，并主持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全国军民抗日死难烈士祠”、“抗日烈士墓”的落成典礼，率领全体将士祭奠了抗日英灵。

冯玉祥将军下野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的抗日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的第29军收编，吉鸿昌、方振武拒绝收编，率部组成抗日讨贼军，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继续奋战于热河、长城一带。9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秘密同日军商定联合“围剿”办法，以日军从北，国民党万福麟、关麟征、黄杰等部由东、南、西三面对吉鸿昌、方振武进行包围，并有日机轮番轰炸。这支抗日武装终因敌众我寡、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告失败。轰轰烈烈、声震中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武装斗争虽被国民党蒋介石扼杀了，但是由此而体现的全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将永存。

六、气壮山河的狱中斗争

30年代的中国冤狱遍地。所谓绥远“第一模范监狱”更是人满为患，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中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有图财害命的、有被恶霸地主逼得走投无路而杀死恶霸的“杀人犯”、有为生活所迫而打家劫舍的“土匪”，然而为数居多者还是那些思想进步、敢于同反动当局斗争的“政治犯”。由于中共绥远特委、中共归绥中心县委的被破坏，赵鹏九、李莉春、刘子安、王建功、杨植霖、赵琏璧、杨一帆、苏谦益、杨叶澎、韩燕如、杨国兴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相继被投入绥远第一模范监狱。赵鹏九、李莉春、刘子安等3人被做为共产党要犯押解至北平。其他人因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均以与共产党有联系的罪名分别被判处两年半至五年徒刑。

1931年12月，由包头押来一位被称为“大共产党”的政治要犯，监狱内外十分紧张，看守们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王若飞，化名黄敬斋。同年9月受共产国际派遣由莫斯科经乌兰巴托来到绥远地区。主要负责开辟山西、绥远、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五省的地下工作。在包头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很快联络发展了20多人。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他居住的泰安客栈。王若飞察觉情况不妙，乘敌人挨门搜查时焚毁了随身带着的文件，当敌人冲进屋时，他将一张没有来得及烧掉的包头地区人员名单塞到嘴里，敌人急忙来抢，他一边与敌人搏斗，一面使劲嚼，等敌人从嘴里掏出来时已经成了一团纸浆。包头警察局长马秉仁多次审讯，均没有得到丝毫口供，只好转到绥远省政府，关押在第一模范监狱。身陷囹圄的王若飞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宁折不屈，他痛斥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背

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屠杀革命者，屠杀人民的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残暴，使得国民党绥远省当局对这位大共产党无可奈何。

王若飞的到来，引起了狱中其他共产党人、革命者的关注，积极寻找机会与他接近，而王若飞也不失时机地创造条件与难友们联系。当他得知杨一帆、王建功、苏谦益、杨植霖等都属于政治犯时，便很快分别用不同方式取得了联系。从此，以王若飞为中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勇敢的抗争。

在监狱斗争中，王若飞十分注意不断提高难友们的理论水平与思想觉悟，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斗争。经常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卑劣手段，提醒那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要注意隐蔽，尽可能避免与他直接接触，以防加重案情。他说："你们和我不一样，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公开地宣扬共产主义；而你们只是嫌疑犯，讲话、行动要慎重些"。他还经常教育那些性情急躁的难友，要讲究斗争策略，不可一触即发。他常提醒狱中的共产党员要坚定党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一个共产党员从被捕那一天起，就要准备随时牺牲自己，以视死如归的意志保护组织和同志，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位叫王书田的青年在狱中做送水杂役，在王若飞的帮助教育下成为交通员，经常在他们之间传递信息。一天，王若飞通过王书田给苏谦益等人传来一张纸条，上面这样写着：列宁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你们判刑二年半，转瞬之间就会出去的。我手头还有些书，有文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你们不妨借此机会，多读点书，多学点理论，以备将来有文可行，有武可用。[1] 从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

① 韩燕如：《我在归绥的斗争经历》，《呼和浩特史料》第四集，第52页。

苏联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法国塔尔海玛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狄慈根的《新唯物主义认识论》、刘大白的《旧诗新话》以及《世界史纲》、《纲鉴易知录》等哲学、历史进步书籍在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中相互传阅，并抓住时机秘密交流学习体会。

王若飞刚到绥远第一模范监狱时，因为他是共产党要犯，所以对他实行特别管理，甚至连放风晒太阳都不允许，在王若飞的据理力争下，不仅获得了放风的时间，而且有了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王若飞充分利用晒太阳的机会接触了解难友，对他们的家庭、民族、生活、思想直至他们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等情况都做了深入的了解，让他们了解国民党当局颠倒是非，欺压人民，草菅人命的黑暗统治，鼓励他们同反动派斗争。他说：我们所在的监狱是整个社会这座大监狱的缩影，认识了这里的各种人，也就认识了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认识了整个社会。他认为这些难友中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的人，只要耐心教育和争取他们，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待他们觉醒后就是一股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他经常用仅有的6元生活费以各种渠道给难友们买食品、药物，购买报纸给大家分析时事战局。每当放风时，难友们总要围着听他讲革命的道理。王若飞在难友们中的威信越来越高，这引起了监狱当局的不安，便安插普通犯人与王若飞同住，以监视和控制王若飞的行动。曾有一位叫王三毛的蒙古族青年被安排于王若飞的牢房，王三毛是被土匪恶霸逼得家破人亡之后，又蒙受了不白之冤被投入监狱的。这一切使他性格变得古怪而冷酷，对世道产生了不可言状的仇恨，监狱当局认为像王三毛这样没有文化、鲁莽而又对汉族成见很深的蒙古族，绝不会被王若飞“赤化”的。然而。在王若飞诚挚、耐心、兄弟般的关怀、教育和帮助下，这位原本纯朴、憨厚的蒙古族青

年开始念书了，王若飞用《三民主义》作教材，沙土地为纸，筷子当笔。一年以后，王三毛不仅读完了《三民主义》，而且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经王若飞的谆谆教诲，王三毛终于由一个只知阶级仇、民族恨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在狱中庄严地向党宣誓：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终身。王三毛不仅没有监视王若飞的行动，相反，他利用在狱中做杂工的条件，秘密为狱中革命者传送情报和材料。刑满出狱后，王三毛在一次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了更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王若飞在狱中坚持写作。在难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解决了没有笔和墨的困难，为了躲避狱吏的目光，他把笔截成香烟的长度，在麻纸、手纸、烟盒上写作，时常警惕狱吏的监视，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王若飞完成了约 20 多万字的文章，其中有《中国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大革命是怎样失败的》、《五卅惨案的经过》、《什么是凯马尔主义》、《中共简史》、《评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给傅作义的抗日意见书》、《周易辩证法》、《咸同年间贵州缠回暴动的经过》等文章。另外，他还根据狱中党组织的活动以及党员的要求，结合中国革命的形势，写了一部分短文在狱中传阅，像《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战略意义》、《怎样开展红色游击战争》、《怎样建立支部》、《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正确态度》等。这些文章给予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极深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狱中斗争的信心，为他们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王若飞在关注时局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动和领导难友们与黑暗的狱政进行斗争。名曰绥远第一模范监狱，实则人间地狱。那

里完全不顾犯人的死活，吃的饭又霉又臭，囚室里又黑又脏，老鼠、臭虫比比皆是。在这非人的生活环境中，经常有犯人死去，死亡率有时甚至高达每月上百人。监狱里还有名目繁多的规章，为了镇压犯人的反抗，他们用极其毒辣而残酷的刑罚来迫害犯人。中共党员杨一帆就是在这所模范监狱中被迫害致死的。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身染重病、生命重危之际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勉励难友们：天总是要亮的，鸟总是要唱的，日寇逼进华北，国民党出卖河山，拯救中国的重任，全在我们这些人的肩头，请转告同志们，要坚强地度过这最黑暗而又艰难的时期，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曙光中迎着胜利高歌猛进。目睹这一切，为了改善现状，争取生存权，王若飞发动和组织难友们与监狱当局展开了持久的斗争。他们一面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和抗议，一面设法与外界联系，揭露监狱内的黑暗，争得社会的同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难友们的团结反抗下，监狱当局被迫答应改善狱中待遇，提高伙食标准，不随意惩罚犯人。这些斗争的胜利使难友们真正懂得了只有团结斗争才能求得生存。

第四节　内蒙古革命的新高涨

一、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对内蒙古革命的决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在伟大的长征过程中，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接触了一系列民族问题，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少数民族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进一步认识

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作出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①]中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而且重申了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特别强调“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须作更大的努力。”对于少数民族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极其重要的结论，而且认为回、蒙民族工作成为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重点和主要方向。

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以后，内蒙古革命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很快着手开展内蒙古的工作。1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名义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②]指出：“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是蒙古人民中的工作，发动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与汉人官僚军阀的奴役，同他们一切的反日反汉奸军阀的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12月20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③]以高度的热情，旗帜鲜明地大声疾呼：“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还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6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19页。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732页。

必居其一，望速择之。”

宣言首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中国，向世界侵略、扩张、称霸的野心和计划。指出内蒙古民族已是首受其害者；日本侵略者“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同时把内蒙古的土地作为战场，把内蒙古人民当作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宣言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侵占台湾、东三省的事实，列举了它侵占内蒙古东部地区和察哈尔的罪行及其种种阴谋，严肃地指出：“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

宣言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阀对蒙古民族的压迫政策，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而且指使井岳秀等小军阀，“不断的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深刻地揭示了蒙古民族在国内的处境和面临的严重危机。

宣言在历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其红军抗日和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光辉业绩，特别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壮举之后指出：“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为此，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宣言中庄严地宣布：

一、原内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尔和土默特2部、宁夏3特别旗之全域，不论设县与否，一律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要撤销国民党于1928年在内蒙古设置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行省及其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内蒙古人民只有“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对于蒙古民族解放的最基本的权利，重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的基本主张，“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而且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待民族问题的彻底鲜明的立场宣布：“总之，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对于内蒙古地域范围内的汉族、回族、满族及其他各民族，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与蒙古民族享受同等的待遇，享有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及信仰、居住等自由。这也是蒙古民族得以解放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在宣布上述对内蒙古民族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同时，宣布将陕北军阀抢占伊盟的土地、盐池交还给内蒙古人民；在长城附近地带划为商业区，发展双方的贸易；保证红军及其游击队等武装绝对不向草地进攻，内蒙古人民也不要允许中国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经过草地进攻陕北根据地，“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宣言最后郑重宣布："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在这里宣布只要是抗日和反对中国军阀，蒙古民族不管是王公贵族或是平民，都要给以帮助。这是党对蒙古民族的工作方针从打倒王公，推翻王公札萨克制度向联合王公抗日反蒋的重大转变。

从建党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近 20 年期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对国内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形成了以下基本认识：一、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奴役；三、承认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利益；四、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使他们摆脱贫困；六、承认民族自决权，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实行联邦制，或成立少数民族的独立国家，均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自主权的同时，对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仍在探索之中。这些政策在当时，对于团结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发动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动员和促进作用。这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

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探索阶段。

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是指导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内蒙古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直接就近领导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是内蒙古革命顺利健康发展的保证；内蒙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反蒋斗争、开展蒙古民族工作、打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建立以陕北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区之一。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①] 中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决议"提出了三个战略步骤，其中在第一步陕西的17项任务中提出"着手绥远方面的布置"和"着手组织蒙古游击队"，要求在第二年2月5日前完成。在第二步山西的20项任务中提出"着手对内蒙民族的宣传工作，取得部分的切实的成绩"；"扩大蒙古游击队最少二百人"；"加紧对绥远的布置"；"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要在1936年2月7日完成。第三步就是向绥远推进。接着，毛泽东又于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②] 中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4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中共中央对内蒙古的工作作了上述全面的部署之后，于1936年5月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先后有赵通儒、曹动之、贾拓夫、张德生、毛泽民等参加蒙委工作，以陕北三边地区为基地，向北开展蒙古民族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发展陕甘苏区，创造西方新根据地，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5月4日决定红军西征。5月18日，组成西征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治委员、刘晓任政治部主任。19日，红军开始西征作战，5月28日即袭占伊盟南境之柠条梁。毛泽东、周恩来当天电示彭德怀、刘晓等取得柠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望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斗争七八期）扶助蒙民独立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1]鉴于这一带天主教堂甚多，要求对于教堂神甫以"不守信又勾结军阀摧残蒙汉民众为罪名"[2]处治，不以反教堂或帝国主义侦探对待；如俘获教堂神甫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妥送瓦窑堡；教堂、军阀所占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组织包括王公喇嘛军官在内的蒙民处理财产委员会，广大蒙民可分一部分粮物。关于蒙古民族工作，与蒙委书记高岗接洽。同时，成立中央巡视团，在团长贾拓夫率领下视察新解放区工作，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实行土改建政，开展党、团、农、工、青、妇等各项工作，特别是把伊盟和宁夏的蒙、回民族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

如前所述，30年代前后，围绕国民党在内蒙古设省和蒙古族各阶层要求内蒙古自治的问题，进行十分尖锐激烈的斗争。最后以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68页。
② 同上。

会”（即百灵庙蒙政会）的结局告一段落。这是国民党反对蒙古民族自治，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百灵庙自治运动虽然是以蒙古王公上层为主发动的，但它是针对国民党在内蒙古设省置县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各阶层的愿望。德王作为这次自治运动的发动者，对以自治权利极有限的“蒙政会”的结局作为百灵庙自治运动的结果，他是十分不满意的。更何况国民党绥远当局对蒙政会的百般刁难，分化瓦解，他更觉得失望。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德王早有图谋，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拉拢。1935 年底，德王应伪满洲国邀请赴长春访问，伪满洲国和日本关东军首脑轮番接见引诱，并答应给经费和物资的援助，策动其搞蒙古独立。1936 年 2 月 12 日，由日本侵略者操纵，在德王府成立了以德王为总司令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4 月 24 日，又操纵德王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了所谓“第一次蒙古大会”，通过了建立“蒙古国”的一系列决议，决定先成立“蒙古军政府”；5 月 12 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推选从未到会的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王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随日军西侵而来的李守信任总裁帮办兼蒙古军副总司令。日本侵略者以其扶植的蒙古傀儡政权为旗号，诱骗蒙古族上层人士，以实现其侵占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目的。8 月 4 日，日本侵略者即指挥伪蒙古军和汉奸王英的所谓“大汉义军”，向绥东红格尔图发动进攻，日寇的侵绥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在日寇进攻绥远的紧急形势下，8 月 14 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敦请他们抗日。毛泽东赞扬傅作义涿州抗战的精神后指出：“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逼，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

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①] 中共中央于8月24日发出了《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②]，指出："内蒙绥远，形势非常紧急，"日本制造的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向绥东发动军事进攻，旨在企图变整个内蒙古为其殖民地，进而吞并全中国与进攻苏联。同时指出，日本侵略者打着支持内蒙"独立自治"的旗号，利用国民党政府压迫内蒙古和内蒙古民族对国民党的不满，挑拨部分王公上层组织独立政府，脱离中国，企图完全掌握内蒙古的一切权力；德王的所谓独立政府，如同朝鲜、伪满洲国和东蒙兴安省一样，实际上要变整个内蒙古为其殖民地。

指示信指出：国民党政府"在内蒙所实行的政策，完全是民族压迫政策"，它并未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民族平等自由的主张，而是"压迫剥削蒙古人民，蒙政委员会与蒙古自治都是一些欺骗手段"，汉族与蒙古族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两民族应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但是，国民党政府却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制造民族之间的恶感与仇视，不仅不帮助蒙古民族抵抗日本侵略，反而改旗设县，编制保甲，收旧印发新印，威胁蒙古王公防共、阻止红军帮助内蒙抵抗日本侵略。

指示信指出，内蒙古民族面临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听随日本侵略者走德王的"独立自治"道路，则内蒙灭亡，变为日本的

---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16－421页。

殖民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摆脱国民党军阀的压迫，联合全中国人民、外蒙古人民和苏联，则可真正独立自治与繁荣。信中重申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主张和政策，而且主张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共同帮助内蒙古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帮助内蒙人民独立，反对干涉蒙古的内政。

关于内蒙工作，指示信明确指出“蒙古人民的斗争首先就应当是民族解放的斗争。”反对日本灭亡蒙古，为蒙古民族的生存、解放与独立而斗争，采取与蒙古人以“口头的、文字的、个人联络、结拜兄弟等等”方法进行宣传和交往，促使蒙古人民的民族觉醒。而且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华苏维埃、共产党支持蒙古民族自决的立场。蒙古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内部也必须建立统一战线，“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蒙古人民“必须把反中国军阀的压迫的斗争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顺利地开展反日斗争。但是，当中国军阀参加抗日斗争时，就应当与之联合抗日。内蒙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熟悉蒙古人民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蒙民工作，积累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蒙古干部，把蒙古人民吸收在中华苏维埃的影响下，逐步走到公开联合，“将来走到建立内蒙人民的革命政党，……走上将来的公开的独立组织内蒙政权与队伍，进行武装反日反中国军阀的斗争。”

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自从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把内蒙古的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内容，不断地作出重要的决策，制定方针、政策，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部署内蒙工作，把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蒙、回等少数民族工作，1936 年 10 月，将蒙古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

杨一木任副书记兼回民部部长，李静波任蒙民部部长、赵通儒任秘书长兼蒙民部副部长。中央不断派干部充实和加强蒙回等少数民族工作。

二、开辟伊盟发展绥蒙

伊克昭盟是大革命时期内蒙古革命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这里的蒙古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乌审旗，不仅是“独贵龙”运动的发源地，也是蒙古族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锡尼喇嘛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据地。1928 年，曾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的刘澜涛说，大革命失败后，伊盟乌审旗有一位到过外蒙的革命喇嘛派人来联系工作。1929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对陕西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对“陕北蒙旗须扩大民族自决，联合奋斗的宣传”，反对国民党对蒙古族的压迫，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在陕北蒙族的石里喇嘛……部队中，要特别加紧工作。”这无疑指的是锡尼喇嘛。1930 年开始，曹动之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积极开辟伊盟蒙古族中的工作，先后派陈占金、刘生富等以在蒙古族地区放牲口、做买卖为名，结交了一批蒙古族牧民，如石宝山、即合、根什达来、杨马佘、贺格罗以及已入蒙籍的汉族人张金贵等，向他们介绍共产党和红军。这些人有的参加了革命活动，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站，有的参加了游击队。1934 年，在靖边南山建立了蒙汉骑兵游击支队，曹动之任队长、吴亚雄任政委，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 27 个游击支队中的第 22 支队。蒙汉骑兵游击支队转战于陕北和伊盟交界地带的大小石砭、尔林川、城川、白泥井、巴图湾、纳林河、掌高图、海则滩、石湾、青杨岔、镇靖及盐池、甘泉、安塞一带。1935 年 5 月 4 日，红 26 军 42 师和红 27 军 84 师主力在陕北王家湾会师后，成立总

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蒙汉骑兵游击支队亦归其指挥，在靖边、横山、杜新庄、黑峰子等地进行的一系列战斗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这是陕北特委和陕北红军开展蒙古民族工作之始，在乌审旗蒙古族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便指示赤元县长城区党组织兼搞伊盟蒙古民族工作。1936年初，红军二路骑兵团司令兼政委张爱萍率部开抵长城区，根据党中央关于蒙古民族工作通过上层发动下层的精神，准备开展乌审旗上层人士的工作。曾参加锡尼喇嘛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奇国贤（蒙名道布庆道尔吉）是台吉（贵族），时任乌审旗保安司令部副官，在旗里失势，同情百姓，正在寻求与红军联系。他通过我党地下联络员张金贵到达陕北思家洼，受到红军盛情款待，张爱萍、高岗、曹动之、吴亚雄、田万生与奇国贤拈香结拜，成为结盟兄弟。张爱萍又带骑兵团在西沟为奇国贤隆重举行欢迎大会。张爱萍、高岗等向奇国贤介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对蒙古民族的主张，并对他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寻找红军和共产党帮助的精神，表示钦佩和欢迎，而且共同讨论了开展蒙古民族工作的问题。奇国贤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和张金贵一道回到旗里，在他的家乡乌审旗西部的部队中开展工作，争取奇金山（蒙名哈诺墨拉）、王悦丰（蒙名阿拉宾巴雅尔）等一部分知名人士参加革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一批台吉、官吏参加革命，有不少牧民如赵玉山、根存、那木几尔、阿木朗等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与此同时，他们在赤元县的帮助下，在乌审旗境外成立了乌审县苏维埃政府，田万生任主席，下设行政、军事等全套机构。上报中央后，中央当即批评了这种与国民党在蒙古地区推行“县制”无异的错误作法，月底即撤销了乌审县苏维埃政府。这虽然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给蒙古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

的教训。

在红军开始西征的同时，毛泽东主席于5月间致信伊盟乌审旗的盟克耳记[①]提出：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柠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②]重申了对蒙古民族的基本主张，为开展乌审旗的工作创造了条件。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安边、定边是战略要点，保持于敌人之手将成后患，清涧等城可为殷鉴。"[③]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时轮等通报西征红军"右路军占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争取长城内外教民、蒙民数万拥护抗日红军，恢复并扩大了三边苏区版图。"[④]6月10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宋时轮所率红28军和81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执行夺取安边、定边，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任务。从15日开始，左中右三路执行上述任务，至27日分别攻占了七营、盐池、定边等要地，继续全力扩大根据

---

① 盟克耳记即孟克乌力吉，是锡尼喇嘛革命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8月，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锡尼喇嘛牺牲后他掌握了革命武装，与该旗王爷达成妥协，当时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

②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上卷，54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③ 同上，第548页。

④ 同上，第549页。

地，至7月下旬完成了上述既定的作战任务；到西征结束时，为全面开辟伊盟工作创造了府谷、神木、靖边、柠条梁、安边、定边、盐池一线红军控制的依托地带。

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在中央巡视团、西方野战军政治部的配合下，以三边（即靖边、定边、安边）为基地，大力向伊盟乌审旗、鄂托克旗开展工作；同时，神、府苏区也向札萨克、郡王、准格尔等旗开展工作。为了落实《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承诺，取信于蒙古民族，中央巡视团和西野政治部决定，将从军阀马鸿逵手中夺回的盐池归还鄂托克旗蒙古族人民。这一举动在蒙古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国民党在伊盟以“防共”为借口，加紧对蒙古民族的压迫与掠夺，完全剥夺蒙古民族的权益，甚至实行蒙旗改县，发放县制新印，收回蒙旗的传统老印；废除蒙旗苏木嘎查行政建制，实行编组保甲；封闭边境，禁止蒙民与汉地通商贸易；从伊盟各旗抽马7000匹，组建骑兵等。国共两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对比鲜明，引起蒙古人的思考。于是，出于新奇、感激、考察、联络等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到定边的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和牧民络绎不绝。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在定边专设了蒙民招待所，由毛泽民负责接待蒙古族来访者，同时创办了训练班，联系和培养蒙古族干部。从乌审旗和鄂托克旗入手，全面开辟伊盟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

蒙古工委首先派田万生以边商身份到乌审旗与奇国贤接头，进一步发展关系，开展工作。8月间，在大石砭烂窑洼成立了中共乌审旗工作委员会，张兴畲任书记，组织委员曹动之，委员有徐子猷、田万生、詹玉其；以后由曹动之，杨彩彬先后任书记。工委成立后，一方面派干部深入旗境开展工作，一方面率领蒙汉骑兵游击队在边境参加红军作战，以扩大其影响。9月，红军在

横山县油房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蒙汉游击队也参战助阵。蒙古族队员善骑射、作战英勇，巴音达来、巴音朝呼、何三柱、玛乃等神枪手，均立战功，受到表彰，还奖励一面锦旗，并将他们的英雄事迹上报中央。但是中央在肯定蒙古族战士英勇行为的同时，严厉批评了乌审旗工委让蒙古族战士上战场的作法，指出如有伤亡，怎么向蒙古同胞交待？要求把争取和团结蒙古族上层人士，通过建立统一战线，作为工作中心，同时开展群众工作，尽快解散游击队，避免意外。不出中央所料，该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楞（奇德山）责怪了此事。蒙古工委和乌审旗工委派专人解释和检讨这件事，并劝说队员回旗参加革命。这是开展乌审旗工作的第二次教训。这两次教训使中共乌审旗工委委员们懂得了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复杂性，也说明党中央对待蒙古民族工作的严肃性和正确性。同时，这两件事在蒙古族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增加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感。

之后，中共乌审旗工作委员会从大石砭迁到该旗木图儿梁办公。借助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大力开展乌审旗的工作。田万生等与奇国贤取得联系后走遍乌审旗西部，结识了奇国贤的堂兄奇金山。奇金山时任该旗保安队中队长，对国民党压迫蒙古民族的政策十分愤恨，对共产党和红军表示佩服，很快在奇国贤带领下拜见高岗、曹动之，而且拈香结拜为兄弟，表示要投身革命。同时，田万生又与该旗保安队中队长王悦丰相识，并结拜为兄弟。王悦丰曾是锡尼喇嘛“独贵龙”运动的成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12团的一名排长，是与陕北军阀井岳秀骑兵作战的英雄。1936年11月间，中共中央派一批干部经乌审旗赴神木、府谷恢复神府苏区的工作，王悦丰欣然答应，并亲率11名战士护送赵通儒等六名共产党人安全抵达神府特区，而且在途中

又结拜为兄弟。奇国贤、奇金山、王悦丰等参加革命，打通了在乌审旗联络上层、深入下层的渠道，打开了工作局面。接着，田万生仍以边商身份与乌审旗王爷接触，进而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且把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等宣传品送给王爷，接着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爷赞赏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表示愿意帮助解决困难，经常往来，搞好彼此的关系。

对蒙古族上层工作的成功，为蒙古族群众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蒙古族群众纷纷要求到延安参观。乌审旗工委将这一要求上报党中央后，中央当即同意。1937 年 2 月中旬，田万生带领第一批蒙古族赴延安参观团 45 人，乘马行程 4 天到达延安。当天，朱德总司令看望了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第一批蒙古族牧民，问寒问暖，平易近人，牧民们无不敬仰；第二天，毛泽东主席也来看望大家。毛主席说，蒙古民族长期以来受压迫，尤其是受国民党的压迫更厉害，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要灭亡蒙古民族，我们应当联合起来赶走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牧民们无不感动，这些牧民深切感到他们的朋友确实在南方，这是锡尼喇嘛生前对他们说的。在延安的日子里，他们不断用深情豪放的歌声表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解放的愿望。

1936 年在红军西征过程中，6 月 9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同意他们与鄂托克旗王爷和保安司令章文轩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内容和原则，并要求他注意同鄂托克旗建立通商关系，而且能够经过鄂托克旗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这不仅是开辟伊盟工作的重要部署，也是打通苏蒙战略枢纽的重要环节。红军夺取定边、盐池后，7 月，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高岗亲率蒙汉

骑兵支队进驻鄂托克旗二道川、三段地、马场井地区活动；8月间，先后派高德义、曹布诚、金生华、白步华、綦生发、李占胜等大批政工人员到达三段地一带，成立蒙民招待所，实际是中共三段地工委，广泛联系蒙古族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0月，在三段地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鄂托克旗工作委员会，金生华、张生瑞先后任书记，曹布诚任副书记，委员有李占胜、綦生发、白步华等，很快发展了20多名农民党员，在三段地、二道川、二段地、胡芦素淖建立了4个党支部；陆续建立了漫水塘和洪山塘、北梁和东壕、马场井和报壕井、达赖火场和亚麻赖口子及道尔计洼、胡芦素淖和召皇口子等5个贫农分会，并在三段地建立贫农总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同时建立了一支40多人的游击队。

由于党的工作很快展开，影响越来越大。蒙古族上、中、下各阶层人士三五人乃至十多人一齐来访，工委详细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使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基本认识，加深了解，联络了感情。他们中除了牧民群众外，还有鄂托克旗的实权派保安司令章文轩的钱粮章京、米立克营长，西公爷等上层人也来联系，建立关系。是年秋天，乌审旗和鄂托克旗因旗界问题而发生纠纷，遂酿成兵戎相见，诉诸武力。双方战争数月，给两旗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当毛泽东从赴延安参观的牧民中得知此事后，特别关心这两旗的问题，并语重心长地说："兄弟阋于墙，必为外人所用，"要他们给王爷捎个话，希望立即停止战争，和平解决两旗的纠纷。中共中央也指示两旗工委要调解两旗冲突。1937年3、4月间，鄂托克旗工委书记金生华带着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信和一批宣传品，只身前往鄂托克旗阿拉庙，会见章文轩。章文轩心怀疑虑，怕是替乌审旗游说，且有

国民党特务背后使坏，准备加害金生华。经与鄂托克旗工委已有联系的钱粮管家和米立克营长的规劝，金生华幸免于难。章文轩终于明白了共产党诚心调解鄂乌冲突的真象，消除了误会。同时，中共乌审旗工委也在乌审旗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乌审旗也表示愿意和解。这时由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派参议赵锦彪前来调处。5 月 2 日，在乌审旗哈拉根图庙召集两旗重要仕官及军队营长以上官员开会，商定 10 项解决办法，双方签字勘划争执地界，乌审旗将抢来的牛羊马匹归还鄂托克旗，双方言归于好，形成了和平相处的局面。两旗上下对共产党能够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深为敬佩，尤其是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章文轩对此更是感激不已。这件事在伊盟各旗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促进了伊盟工作的开展。

从 1936 年 8 月开始，日本侵略者以伪“蒙古军政府”为旗号，组织蒙汉伪军向绥东进军。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奋起抵抗，察哈尔正红旗蒙古骑兵也起而配合，这就是著名的绥远抗战。到年底，击退了日伪军。这时形成了全国性的援绥抗战的高潮；“西安事变”又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于是绥蒙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的指示》[①]；2 月 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②]。中央在指示和信中明确指出对蒙工作方针是：一、“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傅抗战。”组织内蒙古人民帮助前线，到前线慰劳，参加绥远抗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448—449 页。
② 同上，第 450—452 页。

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指出："绥远的沦亡，即是蒙民的灭亡"，要求在绥远召开包括王公在内的蒙民会议，与傅作义共商援绥抗战方案，应当提出："（一）全蒙人民动员，（二）全蒙人民联合，（三）组织蒙民援绥抗日武装，（四）给前线以物质帮助，（五）组织慰劳团去前线。"绥远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既已抗战，就应改变"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的策略"，避免蒙民与傅作义对立，以致影响蒙民参加抗战实行蒙汉联合一致抗日。这是党中央对蒙工作方针和策略的重大调整。二、在蒙古民族中是帮助抗日派的形成，扩大左派力量，争取中间派，巩固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对右派应孤立分化，批评与打击并用。所谓左派即主张坚决抗日的一部分左倾分子，接近我党，但还没有形成力量；所谓右派即与德王有联系，受德王蒙蔽而期望德王救蒙古，国民党汤恩伯也在帮他们形成反共力量；王公上层中的大部分，因受国民党威胁而不敢接近我党，赞成抗日而又不敢坚决行动，即所谓中派。三、目前为迅速完成抗日援绥的中心任务，"不能放弃蒙民中的特殊要求之争取，减轻汉族对于蒙民之压迫，蒙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生活等，以动员与团结内蒙之蒙民。"但不能违背抗日的中心任务，有些特殊要求与傅作义会商解决，有些则以群众斗争去实现。另外，对围绕蒙古民族的土地问题形成的蒙汉民族的纠纷与矛盾，在蒙汉联合抗日的前提下，以消除民族仇怨为原则从实际出发具体解决。接着在6月间，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蒙民部又作出《目前绥蒙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工作》的决定，指出了日寇大举进攻绥蒙前的严峻形势，分析了国民党绥晋当局抗日的积极态度、绥蒙人民的觉醒以及绥蒙时局的特点，对目前党在绥蒙的任务和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要求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发挥蒙人先觉分子的作用，推动蒙古族各阶层参加抗日自卫

战争，汉族干部推动汉族各阶层参加抗日，形成蒙汉团结抗日的局面，而且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形式和条件，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要加强蒙古族妇女、青年、儿童的工作，按照不同的时机、季节和方式，开展蒙旗公职人员和蒙古士兵的工作；对汉族干部进行“蒙人化教育”，对蒙古族干部要进行提高文化政治水平的教育；揭露和打击汉奸蒙奸，消除他们的影响；创办蒙汉文刊物，编排适合蒙古人的剧目，编辑各种读物，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提出蒙汉联合抗日，誓死保卫绥蒙，收复热察失地，要求南京及绥蒙当局允许绥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和直接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自动武装缉私，要求救济灾民难民、减免苛捐杂税、实施国难教育、发扬民族精神等口号。中国共产党为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从方针、政策和策略到具体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促进了抗日救亡斗争和蒙古民族工作的发展。

1937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组建了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李衡任书记、王德任组织部长、郑林任宣传部长、白乙化任军事部长。他们从太原北上绥远到达包头时，归绥已沦陷，遂抵河套东北垦区。10月20日垦区举行武装暴动，宣布抗日救国，组成“抗日民族先锋队”，白乙化任总队长、王德任参谋长，当即开赴晋西北。绥远工委也改建为中共绥西工委，李衡任书记，郭敬任组织委员，王志成任军事委员；王建功、杜如薪、刘景平、李子超等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工委工作，主要在绥远国民兵（后改称游击军）政训处各部门进行政治工作。河套地区成为实行国共合作，与傅作义将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重要地区。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抗日救亡斗争也逐渐展开。

三、百灵庙军事暴动及蒙旗保安总队的建立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掌握“蒙政会”实权的秘书长德王，将他在20年代末组建的乌（得）滂（江）守备队调往百灵庙，执行警卫“蒙政会”的任务。接着他又多方筹集资金和武器，正式建立“蒙政会”保安队，陆续从察哈尔各旗招募士兵400余名，从乌兰察布盟各旗和土默特旗招募300余名，加上乌滂守备队，组成千余人的一支蒙古族武装部队，人强马壮，武器亦良好，颇有战斗力。“蒙政会”保安队的组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德王自然是把它视为推行蒙古自治，与绥察两省当局抗衡的实力；而绥察两省当局则把它视为推行其阻挠蒙古自治政策的障碍；中国共产党人和蒙旗社会进步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更希望这支蒙古族武装成为民族解放的力量。因此，从组建这支部队开始，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时已成为日本特务的陶克陶当上了“蒙政会”保安处长，主管保安队；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韩凤林当了保安处一科科长兼保安队总队长；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的云继先曾被德王聘为教官，这时任保安处二科科长，是乌兰夫的妹夫，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中共党员朱实夫任保安处三科科长兼教官，韩凤林被国民党捕杀后接任总队长。不久，中共党员白海风也奉派到“蒙政会”保安处任职，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党员纪松龄于1933年从苏联回国后除了在平绥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外，在原籍绥东察哈尔右翼4旗蒙兵游击队任参谋长、其胞弟纪寿山在“蒙政会”保安队任中队长，其侄纪贞甫（即贾鸿珠）任“蒙政会”教育处科长。另外还有纪明德、巴明孝、马福聚、白福山、巴振玉等不少察哈尔籍同乡蒙古人在保安队任职或当兵。他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在“蒙政会”和保安队中进行争取

工作，宣传抗日，鼓动民族解放。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从百灵庙自治运动开始时，就一直在关注自治运动的发展趋向，分析自治运动的背景和性质。“蒙政会”保安队开始在土默特旗招兵之际，他乘机派中共党员赵诚、云清、赵俊臣等到保安队当兵，又动员一批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和被国民党遣散的该旗“老一团”官兵报名入伍。于是，察哈尔和土默特蒙古人在“蒙政会”保安队中占了很大的数量，而且掌握了大部分实权。另外，北京蒙藏学校毕业的土默特人康济民，黄埔第4学期生荣崇仁，9期生云蔚以及巴文峻、任秉钧等土默特籍人士，在“蒙政会”或保安队任职者也不少。这也是党开展“蒙政会”工作的重要条件。

1934年秋天，乌兰夫为实地了解百灵庙自治和组建保安队的情况，乘“蒙政会”招兵之机，与西蒙工委委员奎璧同去百灵庙，以找熟人串门聊天的方式，宣传抗日救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共求解放的道理，并在党员中部署了争取保安队的工作。第二年春天，针对德王已有与日本人勾搭的苗头，乌兰夫再次只身到百灵庙，一方面通过朱实夫引见初会德王，以教员身份进行了一般性交谈，一方面向云继先和党员们说明，只要德王公开投日就乘机举行暴动。西蒙工委还派李森到百灵庙传递信息，了解情况。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到“蒙政会”保安队以后，在党员内和进步官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2月，德王应伪“满洲国”的邀请前往长春访问的消息，对云继先、朱实夫、纪贞甫、云蔚等震动很大。于是，云继先、朱实夫、苏鲁岱等当即专程到归绥会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以商对策，表明如德王公开投日就举行起义倒戈的态度。傅作义曾通过国民党驻“蒙政会”要员巴文峻做云继先、朱实夫的工作，要他们脱离“蒙政会”，参加绥远当局谋划中的“绥境蒙政会”。因此，他自然会赞

同和支持他们的态度。1936 年 1 月，云继先、朱实夫、赵诚等回土默特旗过春节时，曾向乌兰夫报告了德王的情况。乌兰夫仍然指出，只要德王在日本操纵下搞起蒙古独立运动，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

2 月 18 日，当云继先、朱实夫回到百灵庙时，得悉 2 月 12 日德王在日本人操纵下，在德王府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公开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德王既然任“蒙古军总司令”，要把“蒙政会”保安队作为组建伪“蒙古军”的基础是可想而知的。“蒙政会”大部分官员不知德王所为的底细，无所适从；保安队官兵也人心惶惶。在这紧急关头，云继先、朱实夫决定举行军事暴动，并分别与云蔚、纪贞甫等“蒙政会”、保安队进步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取得支持后决定于 2 月 22 日 23 时 30 分举事。在准备过程中，云蔚发现“蒙政会”也有异常动态，于是决定暴动提前于 21 日 23 时 30 分举行。云继先、朱实夫分头作好部署，分 5 路同时行动。云蔚作风果断，行动敏捷，作战勇猛，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蒙政会”稽查处，击毙处长、德王的亲信李凤诚，接着打开军械库，控制了武器弹药，武装了起义部队。其他各路也分别行动打开了看守所，解救了被关押的士兵；捣毁了电台、切断了“蒙政会”与西苏旗德王府的通讯联系；袭占了“蒙政会”保安处干部训练班，解除了乌滂守备队教官和学生的武器，包围了“蒙政会”驻会官员的住地，解除其武器，讲明举事之缘由；而且打开了会计科银柜，将 2 万余银元抛之于地，表明起义者为抗日救国，并非贪图钱财。暴动成功后，各路齐集南营盘，云继先、朱实夫宣布将起义部队编为 4 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起义部队稍作整顿后，连同赞同起义的“蒙政会”文职人员近千人，离开百灵庙，向归绥方向行进。

云继先等在暴动之前曾紧急派人通报傅作义，要求设法接应。行军途中，德王的乌滂守备队（俗称“袍子队”）骑兵和汽车尾追而来，经过激烈的交战，击退了“袍子队”。起义部队行至武川县二分子村，傅作义所派国民党35军421团两个加强营也赶到这里，一面表示“慰劳”，一面以保护为名包围了起义部队。而且诡称为避免日机轰炸，要起义部队交出武器，由他们运抵归绥发还。云继先、朱实夫以及云蔚、纪贞甫等起义的领导骨干，当即识破了国民党绥远当局的用意。但是面对与对方强弱悬殊，抗争难敌的局面，进退两难。因此，只能屈从，以图缓冲。

国民党绥远当局将起义部队带到归绥近郊以后，编为归绥县和萨拉齐县的“防共保安队”，分别安置在归绥县三两村和萨拉齐县水涧沟门驻防。同时，2月25日由云继先（保安处科长），苏鲁岱（民治处科长），贾鸿珠（教育处科长），任秉钧（财政委员会科长），康济民（参事厅参事）等5人领衔，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①] 陈述在德王东去不归，进而组织“军政府”之际，“谣诼繁多，莫衷一是”，“而会中负责者，一切均讳莫如深，甚至有危害生命。继先等不得已，遂率同官兵千余人，并联合职员百余人，于21日离开百灵庙。”声明起义者都是南京、北平各大学和军事学校毕业的内蒙青年，因德王的情况不明，又感到生命有危险，“在激于爱国热忱及不背叛国家原则下，无所谓斗争，更无所谓叛变。”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反证继先等之所为，谓之避祸可，谓之爱国反正亦无不可。”“诚恐远道传闻失实，或会方横加诬陷，谨布经过，尚希垂察。”在没有彻底探明德王的行迹和“蒙政会”的态度之前，基本上表达了暴动是为反

① 《蒙政会科长云继先等率众脱离百灵庙》，1936年2月26日《中央日报》。

对德王投日，主张抗日爱国的立场。傅作义将军既有反对德王投日的正义立场，也有绥远省无端压制“蒙政会”的一面；他支持百灵庙军事暴动既有反对德王的因素，也有瓦解“蒙政会”的用意。当暴动成功之后，他既支持、收编起义部队，也严加控制、刁难，限制其发展壮大。总之，傅作义既是坚持抗日的爱国将领，但对蒙古民族则是推行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的大汉族主义者。这就是他对待“蒙政会”、对待德王、对待百灵庙军事暴动和起义部队的问题上矛盾重重的原因所在。

不久，国民政府军政部将这支部队正式编为绥远省蒙古保安总队，而傅作义把“蒙古”换成“蒙旗”，即成为蒙旗保安总队，一字之更，用意可知。云继先被任命为总队长、朱实夫任副总队长，下分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特务队，官兵总计900余人，归傅作义指挥，经费和装备由军政部补给。

中共西蒙工委以及乌兰夫、纪松龄等对起义部队给以极大的关注。他们虽然为争取“蒙政会”保安队抗日做过大量的政治工作，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举行暴动。但未料到局势变化如此急促，未及帮助安排暴动便发生了。傅作义为削弱德王的势力，拟以绥境、察境两个蒙政会取代百灵庙“蒙政会”，并策动云继先、朱实夫参加绥境蒙政会。乌兰夫说：“对此，中共西蒙工委当时尚不明了。还有德王搞所谓‘独立运动’的具体步骤，也是中共西蒙工委无从深悉的。”① “我当时不在百灵庙。但是既然搞起来了，就要帮助它，就象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那样。队伍下来了，

① 乌兰夫：《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6月8日。

我立刻去找到了云继先，帮助做政治工作。”[①] 正值乌兰夫等共产党人帮助云继先、朱实夫开展工作之际，德王也派其心腹章文锦混入蒙旗保安队，百般拉拢下级军官和士兵，培植其势力；国民党绥远省当局也歧视、压制保安总队，致使部队人心浮动。是年秋天，章文锦乘机策动部队的部分人哗变，在总队和二大队驻地毕克齐绑架枪杀了总队长云继先，绑架、软禁了副总队长朱实夫、军需主任孟纯、第一大队附陈应权、第二大队长云蔚、大队附纪寿山等人。章文锦随即带哗变士兵开往百灵庙，傅作义派部队尾追，在交战中打死了大批哗变士兵，起义部队遭受了惨重损失，部队几近溃散。乌兰夫和纪松龄等在这危急关头，千方百计帮助朱实夫收拾残局，收拢部队。纪松龄主动代理总队长，中共西蒙工委决定让云清、赵诚再归部队工作。1936 年底，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际，国民政府军政部派白海风收容、整顿该部。1937 年春，经整顿后沿用原部队番号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任命白海风为总队长，下属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特务队，纪松龄任第一大队长，朱实夫任第二大队长；增设军训处和政训处，纪贞甫任政训处处长，乌兰夫任政训处科长，孟纯仍任军需主任；同时从土默特旗接收了原部队散失的一批士兵，新招了一部分壮丁，总计达 900 余人。整编结束后，接着进行政治、军事训练。8 月间，奉傅作义之命，先后驻防于百灵庙、固阳等地。10 月，蒙旗保安总队受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指挥，并改称“蒙旗混成旅”，两个大队改称团，纪松龄、朱实夫分任团长。随即开赴归

① 《乌兰夫同志对<内蒙古革命史>编写组同志的谈话记录》（1962 年 4 月 17 日下午于内蒙古党委书记楼会议室），参加人：胡昭衡、周明、云丽文；编写组成员史筠、黄时鉴、郝维民。

绥，迎战日本侵略军。10 月 13 日，在归绥城南大黑河一线与东北挺进军、绥远国民兵共同抗击日军。14 日下午马占山视察前线后命令撤军，蒙旗混成旅也奉命撤出火线，退往包头。17 日南渡黄河，经伊盟开抵陕西省府谷县之哈拉寨驻防。1938 年 8、9 月间开回伊克昭盟，抗击日伪军，成为内蒙古地区一支规模最大的蒙古族抗日武装。

四、绥远抗战与援绥抗战运动

1936 年 1 月，日本侵略者占据察北 6 县后便加紧了对绥远地区的侵略步骤。首先在绥远地区设置特务机关，羽山喜郎为归绥特务机关长，一批日本浪人频繁活动于丰镇、集宁、萨拉齐、包头一带，形成特务网，专门从事搜集情报、挑拨民族关系、拉拢收买民族上层、扰乱破坏社会秩序等活动。

在日本关东军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拉拢、扶植下，5 月 12 日在化德建立了“蒙古军政府”，组成了两个军 8 个师近万余人的伪蒙古军，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另以王英为总司令，张万庆、雷中田为副司令组成“大汉义军”。还有以王道一为总司令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关东军派遣一批日本军官担任伪蒙古军和王英伪“大汉义军”的训练和作战指挥人员。并积极部署、调动兵力，令德王部驻守化德，李守信部驻守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防尚义、商都，德王的嫡系部队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驻百灵庙，调集热河伪满骑兵 5000 名驻守多伦、沽源一带。日军飞机不断在归绥、包头、百灵庙、陶林、集宁一线上空侦察，汽车昼夜不停地运送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

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于 8 月间飞抵绥远“访问”，企图

用分化、离间的阴谋拉拢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结果遭到傅作义将军的严词拒绝。傅作义严加限制日本特务机关在绥远地区的活动，并且以武力制止了日军在包头飞机场修建飞机库的企图。面对侵略者的侵绥野心，傅作义指挥国民党绥远驻军冲破重重困扰，毅然发动了绥远抗战。同年 7 月初，伪西北防共自治军一部直犯兴和县。这次日军侵绥战争的试探性行动被国民党驻军击退。7 月 30 日，王道一亲率 2000 余伪军进攻绥东红格尔图和土木尔台。8 月 2 日，国民党集宁驻军奋起反击，毙伤敌人过半。王道一溃逃回商都后被日军枪决。

10 月 5 日，由田中隆吉主持，在化德召开了侵绥军事会议，德穆楚克东鲁普、李守信、王英、卓世海、张海鹏等参加。会议重新部署兵力，决定分 3 路作战，李守信率伪蒙军第一军守兴和一带；德王率伪蒙军第二军在土木尔台一带待命，准备直取百灵庙；王英率部驻土城子一线，拟先占领红格尔图，然后由百灵庙、红格尔图直逼归绥，继取集宁、包头、河套，达到占领绥远全境的目的。宣布从 10 月起至战斗结束，部队一律发给双薪，战斗所需武器、弹药等补充，均由日方负责。当时在日军指挥下的部队有李守信伪蒙军约万余人，王英的伪军约 1.3 万人，卓世海的伪察蒙保安队及金宪章伪军等万余人，连同日军派遣到伪军中的各级指挥和特工人员，总兵力号称 4 万，大有倾巢犯绥、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侵略者的猖獗气焰，傅作义深感责任重大。他一面向国民党当局陈述绥远安危事关国家前途，不能再蹈东北复辙；一面秘密召开各级军政人员会议，制定对敌战略战术，印发宣传抗战的士兵读物，鼓励官兵同仇敌忾，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秣马厉兵，枕戈待旦。

11月12日，日军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石玉山、杨守诚两个骑兵旅及金宪章一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向红格尔图进犯，并用3架日机轮番轰炸。当时驻防红格尔图的国民党军队仅有一个步兵连和两个骑兵连，以及察哈尔正黄旗蒙古骑兵和当地自卫队百余人。13日夜，日伪军向红格尔图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战终夜，至14日上午将日伪军击退。15日，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度进攻，又被国民党守军击退。当日，国民党增援部队赶到，士气为之大振。16日晨，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日伪军约5000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行猛烈轰炸，攻击、冲锋达7次之多。国民党守军在蒙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不畏强敌，奋勇抗击，连续击退敌人的冲锋。正当激战之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命令绥东防守副总指挥董其武率部抄袭设在红格尔图东北打拉村、土城子的田中隆吉、王英的指挥部，同时派兵秘密迂回至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18日，国民党军队全线反击，包抄了敌指挥部，日伪军全线崩溃，向商都方向逃遁，一直被国民党骑兵部队追击至察哈尔境内。红格尔图战役从14日至18日，共激战5个昼夜。毙伤敌军数百名，俘虏敌军300余人，缴获汽车数辆，大车数十辆以及电台等其它物资甚多。傅作义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绥远抗战的首战告捷，重创了日伪军的锐气，鼓舞了绥远各族军民的斗志，更为百灵庙战役奠定了基础。

百灵庙距归绥约170公里，是绥远北部宗教、交通要地，庙宇建筑宏伟，地势险要，历来属兵家必争之地。红格尔图之役失败后，田中隆吉即派王英伪军金宪章、石玉山部协助伪蒙军穆克登宝部固守百灵庙并积极备战，企图以百灵庙为依托向绥北各地进犯。11月23日，由察北用汽车运送大批武器、弹药至百灵

庙。24 日，陆续运送 5000 名伪蒙军至百灵庙。傅作义侦得日伪军的军情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收复百灵庙的行动计划，任命绥北防务副总指挥孙长胜、孙兰峰为收复百灵庙战役的前敌总、副指挥，率骑步兵各 3 个团及炮兵、装甲车队等，于 11 月 22 日集结于距百灵庙东南 75 公里处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23 日夜 12 时，部队准时到达百灵庙附近的攻击位置，一声令下，同时向各攻击方向及地点猛烈进攻。日伪军尽管在山上山下筑有坚固工事，却无人防守，待枪声大震时，始从梦中惊醒，起而仓惶应战。日军驻百灵庙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亲自指挥，拼死阻击，激战 3、4 小时之久。将至拂晓，百灵庙仍不克。为防天亮后敌派援军及飞机助战，遂令炮兵集中火力掩护装甲车队及步兵进攻，日伪军在炮火的猛烈攻击以及步、骑兵的勇猛冲击下，渐渐力不能支，惊慌失措。加之伪蒙军 20 余名官兵倒戈，里应外合，使敌营腹背受敌，顽抗之敌终于溃败。盛岛角芳、穆克登宝等日伪军分乘汽车夺路而逃。24 日晨 8 时，残余日伪军全部被歼，百灵庙收复。此役毙敌 300 余人，伤敌 600 余人，俘敌 400 余人，缴获炮 9 门、枪 600 余支、无线电台 3 部、汽油 500 多桶、粮食 2 万袋，及其它各类军用器材、地图、战马和大量弹药等。傅作义部伤亡 300 余人。日伪军不甘失败，连日派飞机侦察、轰炸。12 月 3 日，盛岛角芳携王英“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 4000 余人由大庙再犯百灵庙。孙兰峰率部奋起反击，敌军死伤 500 多人，被俘 200 余人，雷中田也中弹丧命，余敌溃逃，百灵庙战役再度告捷。

红格尔图、百灵庙战役后，伪军阵营混乱，军心浮动，多数官兵想摆脱日军控制而弃暗投明。傅作义也发出公告，对伪蒙军晓以大义，对投诚者悬以重赏，但提出条件为捕杀军中所有日军

顾问。12 月 7、8 两日，王英“大汉义军”石玉山、金宪章部 4000 余人将该旅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 20 余人全部处决，又消灭了大庙伪蒙军穆克登宝残部 2000 余人，缴其全部军备，于 9 日正式通电起义。石玉山、金宪章的倒戈，穆克登宝部的覆灭，大伤了日伪军的元气，使傅作义部士气大振。针对这一有利形势，傅作义下令一举收复日伪在绥远的最后巢穴大庙。12 月 10 日，傅作义部向大庙发起攻击，困守大庙的日伪军一击即溃，所有辎重、弹药及军用品全被缴获。12 月 17 日，王英“大汉义军”安华亭、王子修率两旅起义。至此，“大汉义军”基本瓦解。日伪军残余全部退往察北，绥远抗战宣告胜利。

绥远抗战期间，傅作义将军坚决抗日的正义之举受到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援绥抗战，同时宣布红军准备立即开赴晋绥抗日前线，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战到底。毛泽东将绥远抗战称为“全国抗战之先声”。不久，中共中央特派南汉宸率慰问团来绥远慰问抗日将士，并赠送了“为国御侮”的锦旗。自 11 月中旬以来，全国各地掀起援绥运动，各社会团体、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均以不同形式声援绥远军民的正义斗争。上海等地组织了救护队、慰劳队、义勇军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为绥远将士赶制棉衣，并赶赴前线慰问官兵、救护伤员。在收复百灵庙的次日，上海各界人士推举黄炎培等 7 人组成代表团，携 10 万元捐款飞抵绥远慰问抗日将士。另外，由山东齐鲁大学的李田耕、宋汀组成的慰问团，南京妇女慰问团，北平学联代表团的郑天翔等，山西新生剧院赴绥演出队、新安儿童旅行团等先后来绥慰问和演出。著名记者范长江亲

自到红格尔图实地采访，写下了题为《壮哉，红格尔图》的专题报道。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石奇甫特地赶至绥远拍摄了百灵庙抗战纪录片。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各地各界纷纷来电祝贺。毛泽东、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电贺绥远抗战的胜利，高度赞扬傅作义的爱国之举。1937年1月21日，由上海左联组织的以陈波儿为团长的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一行30人到达绥远，在《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告前方将士书》中，深情地转达了上海人民声援绥远抗战的爱国热情。为绥远军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剧目。由崔嵬指挥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另外，著名音乐家吕骥、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强等也先后来绥慰问演出。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及年轻学生、儿童等不仅在归绥看望伤病员，而且顶风冒雪，翻越大青山、蜈蚣坝，到大庙、乌兰花、百灵庙等地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北平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曹国智，从绥远归来后深情地写下了《从北平到百灵庙》一文。她在文章中写到："9日下午，我们去两个伤兵医院慰劳，重伤的弟兄不能起床，我们便挨着病房，一间一间探视。他们有的被炸伤了头，有的被枪弹射穿了胸，有的截去了双脚，有的断了双手，还有的没有了眼珠……。10日，我们乘长途汽车到乌兰花慰问了反正部队，汽车完全是在披着积雪的山峰和无边无际的沙漠中行进。没有绿色的田野，没有茂密的树木，也没有毗连的房屋，所有的只是荒凉和寒冷。汽车的行程越长，天气也就越冷。车来到一个山谷里，我们遇见从百灵庙调回来的骑兵部队，一共有两百多人。每人都握着缰绳，他们在风雪中已经走了五天了。一身都是沙土，脸色好像烤焦了的枯

皮，眼睛深深地陷落，犹如两个红火球。马呼呼地吐着气，有时也发出一声长啸。他们就是夺回百灵庙的战士。我们赶快下车，迎上前去，把慰问品送到每一个战士手里，并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热情的慰问……。”[①] 当时的塞外绥远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瞩目的中心，极大地鼓舞了绥远军民的爱国激情。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界人士、工人、教师、市民、学生捐赠的款物约折合 500 万元以上，其中仅津、沪两地《大公报》代收的捐款，至 1936 年底即达 23 万元之多。捐献的物品中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对绥远抗战的深切关注。

1937 年 3 月 15 日，在归绥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举行了“绥远挺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族军民 3 万余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等出席大会。著名学者傅增湘、傅斯年，上海闻人虞洽卿，文艺界崔嵬、吕骥、张瑞芳，北平学联代表、广西大学学生会代表等也参加了大会。傅作义主持大会并致悼词。会上宣读了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以及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民间团体的祭文。傅作义在悼词中说：“这次绥远抗战，敌炮摧残你们的肢体，毒瓦斯遏止你们的呼吸，还加风雪严寒掣裂你们的肌肤。但是凭你们热血的沸腾，终于战胜一切，完成下列使命：一、尽了军人守土的责任。二、保证绥远领土的完整。三、恢复已丧失的民族自信心……。你们为国家的生存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前途，虽不由你们手里完全建筑成功，可是你们的热血来开阔

---

① 曹国智：《回忆百灵庙劳军》，《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25 辑，第 214 页。

了这一条新的路线。"① 17 日，在归绥市小校场举行了阅兵式，参加检阅的步、骑、炮各兵种，军容严整，步伐整齐、使各界人士为之振奋。

绥远抗战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广大民众抗日要求而形成的沉闷局面，体现了只有坚决抗战才能制止侵略的真理，激励起人民奋起抗日的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正如天津《大公报》1937 年 1 月 15 日的社论所说："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成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五、各族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感召下，全国各大城市民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抗日、反对妥协。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此时，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蓬勃兴起。内蒙古东部各族军民面对日军的疯狂入侵，拿起武器与东北抗日武装相配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斗争，在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归绥、包头等地的各界人民要求抗日的集会游行，以及抵制日货的风潮，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融为一体。知识界和学生则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唤起民众。12 月间，北平

① 靳书科：《大青山下吊忠魂》，《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25 辑，第 243 页。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代表郑天翔、张士珍来绥远慰问抗日将士，在归绥与章叶频取得联系，交谈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并一致认为在国难当头，绥远岌岌可危的形势下，绥远的爱国青年应该立即组织起来，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不久在旧城小西街49号章叶频的家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天翔、张士珍、章叶频、吴殿甲、赵维新、吴秉周、武达平、苗顺栗、郭新清（女）、张和（即张又新）、高德慧（女）、贾鉴秀（女）、张志德等十多名青年。郑天翔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当时华北的形势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性，讲述了北平“民先”队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生动感人的事迹，然后重点谈了在绥远建立“民先”组织的意义、要求和任务。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并推选章叶频任队长兼管宣传工作，武达平负责组织工作，并安排具体人员专门负责各校学生工作。还分别建立了男生队、女生队和青年工人队等基层组织。郑天翔、张士珍回到北平后，把绥远成立“民先”的情况及组织关系报告了“民先”总部，“民先”总部便及时与绥远“民先”建立了秘密的通信联系。至此，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在绥远建立了。

“民先”绥远队部成立以后在各中等学校的进步青年中发展队员，编写了一批声援绥远抗战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诗歌和文章，刊登在《塞原》、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和《朝报》、《小喇叭》等进步期刊上。在轰轰烈烈的援绥抗战中，“民先”队员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募捐支援前线，积极参加前线慰问活动，帮助各地来绥慰问团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成为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1937年2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到会代表24人。他们代表了全国18个地方“民先”队部的6000多队员。会议确定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政治的实现；把救亡运动广泛地发展到各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大众中；积极建立人民武装；开展国防文化运动；积极发展“民先”组织等。会议决定凡没有派代表参加的地方“民先”队部，会后均由“民先”总部派人进行传达。3月初，“民先”总部派人来绥传达了会议精神。“民先”绥远队部立即召开领导骨干会议，根据总部制定的抗日救亡基本任务，讨论、确定了“民先”绥远队部的工作方针：“1、尽量争取公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特别抓住绥东抗战这个大好时机，在各阶层中，特别是工农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3、动员“民先”队员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国防文化活动；4、积极在各校进步同学中发展“民先”队员；5、学习军事，建立武装，要见机而行，慎重从事。”①

1936年9月18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开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为了争取进行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民先”绥远队部组织成立了“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贾润芝为总负责人，武达平负责组织工作，章叶频负责宣传工作，吴殿甲、吴秉周、赵维新等负责各校学生工作。绥远牺盟会在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之外，还先后向山西牺盟会输送了36名进步青年。这部分人首先被分配到太原军政训练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其中大多数参

① 章叶频：《回忆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呼和浩特史料》第二集，第77页。

加了决死队，成为坚决抗战的山西新军的骨干。在他们中有中共党员杨植霖、苏谦益以及郑庭烈、张志德、吴殿甲、赵维新、段松林等人。与此同时，"民先"绥远队部还帮助学生联合会开展工作，动员学生利用假期深入城镇、农村向各民族群众宣传绥远抗战的胜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并且积极扩大组织，到归绥沦陷前"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00多人。绥远沦陷后，"民先"队员除少数人留在绥中地区隐蔽活动外，大部分随部队撤到绥西后套，坚持绥远抗战，一部分前往晋北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到了延安。

1936年冬，为了进一步唤醒和团结广大妇女组织起来抗日救亡，陈介平（即陈渔农）、谢汝珍、郭新清、李作栩、屠忠顺等人发起成立了绥远妇女会。11月6日，绥远省妇女会成立大会在归绥召开，参加大会的有30多位各界进步妇女。大会通过了《绥远省妇女会简章》；确定了以"联络感情，促进妇女解放并唤起妇女解放救国情绪"的宗旨；提出了"拥护政府抗敌救亡，绥远妇女联合起来做抗敌救亡工作，争取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争取妇女参加救亡运动的自由，打破夫贵妻荣的旧观念，反对一切压迫妇女的法制与旧礼教"等主张；选举了陈介平、谢汝珍、李作栩、赵承芳、卜效夏等5人为理事，陈介平任常务理事。妇女会下设总务、宣传、交际、救护、劝募等5个股，总部设在当时陈介平工作的绥远省立第四小学。

绥远省妇女会成立以后，在蒙汉各族各界妇女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共发展会员70多人。并在绥远《西北日报》副刊编辑杨令德的支持下，在该报副刊上开辟了"绥远妇女"专栏，陈介平任主编。专栏共出刊9期，内容以号召绥远各界妇女团结起来，实现男女平等，提高觉悟，关心

国家大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在绥远抗战中，绥远省妇女会更是抓住时机组织会员，在街头巷尾以演唱讲演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动员人们在国难当头之际行动起来，为了救国、救家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组织妇女募捐队，动员各界募捐，支援抗战。号召妇女踊跃参加救护伤员队，尽快学习和掌握救护知识。她们相继穿梭于旧城小东街伤兵医院及公教医院为伤员洗伤口、换药、包扎，耐心鼓励伤员安心养伤，争取早日重返前线。同时，妇女会成员还积极参加接待全国各地来绥的慰问团、救护团的工作。

为了广泛动员各族各界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 3 月 7 日，绥远省妇女会在省立第四小学礼堂举行了庆祝国际妇女节大会。在会上由李月轩介绍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来历以及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自由解放运动的情况，陈介平向大家作了绥远省妇女会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任务的报告，发出“坚持抗战到底，妇女要为抗日尽一切力量，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工作”的号召。绥远省妇女会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芦沟桥事变爆发为止。绥远省妇女会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妇女运动史上成立最早的妇女组织，它极大地鼓舞了绥远省妇女争取解放以及抗日救亡斗争的信心，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在她们中的部分人直接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绥远省妇女会的成立使妇女逐步走上了抗日救亡第一线，标志着广大的绥远各族妇女的觉醒。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溃，虽有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军民组织义勇军同日本侵略军殊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又无后援，相继失败后被迫退入关内。大批义勇军官兵与东北难民流落北平，露宿街头，衣食

无靠，生活十分窘迫，虽有抗日救亡的热忱却报国无门。经多方交涉，南京政府终于决定拨放专款，在绥远河套地区安北县（今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7万亩荒地上设立垦区，安置东北难民。这里东临乌梁素海，西接河套平原，南靠西山咀，北至阴山山麓，地广人稀，属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垦民中除东北难民、义勇军官兵及其家属外，还有平、津、鲁、冀的学生和少数难民。大部分垦民不仅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军事技术，而且极富爱国热情。从此，垦民们不仅有了栖身之所，同时也将东北人民的爱国斗争精神带到了垦区，这里便成为积蓄抗日力量和发展河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根据地。

扒子补隆垦区建立后，东北义勇军中的共产党员白乙化、陈钟、吴梦久、柴山、乔永昶、秦晓光等人面对国土沦丧，人民涂炭的惨痛现实，决心组织起来抗日救亡。他们一面通过同反动势力的斗争教育垦民，提高思想觉悟，发展抗日力量，为建立抗日组织和武装创造条件，一面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筹建党的地下组织。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派东北特委从事义勇军工作的苏梅到垦区，以子弟小学教员的身份领导垦区党的工作。很快建立了垦区特别支部，苏梅任书记，委员有陈钟、祁志仁，党的活动在垦区逐渐活跃起来。“一二九”运动后，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的白乙化委托同学吴文启（化名吴涛）到垦区协助党组织工作。不久，北平、天津的部分学生响应共产党提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分批来到垦区，党的队伍和抗日骨干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36年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衡到垦区组建中共绥西工委，李衡任书记、陈钟、彭达、张文远为委员。为了加强垦区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葆华主持组建了中共垦区工委，白乙化任书记，王志成、王方为委员。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组织垦区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垦区工委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抗先队），发展了100多名队员，并出版了抗先队油印刊物《抗日先锋》，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日益活跃的垦区抗日救亡运动，吸引了大批平、津学生来垦区参观、学习、劳动。浙江青年学生还组成数十人的新安旅行团，携带电影放映队来垦区慰问。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垦区人民的抗日斗志。抗先队组织了近600多人的游行队伍声援绥远抗战，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支援绥远抗战，提出要打回东北老家。垦民们纷纷报名，要求组织起来开赴前线。同时以垦区抗先队的名义组成慰问团，筹集大批钱物到绥东慰劳抗日将士。西安事变后，垦区抗先队召开群众大会，控诉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卖国政策，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积极主张抗日。白乙化、吴梦久还亲往西安与东北军联系，表示愿听东北军调遣，做收复东北的先锋。以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白乙化又专程赴北平，在原西北移民办事处旧址设办公室，招收东北军学兵队队员。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学联的帮助下，招收了80多名学兵队员和青年学生，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为以后建立垦区抗日武装准备了干部队伍。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也全面展开。

日本侵略军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沿平绥铁路西进，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大同、集宁、归绥、包头等重镇，建立了察南、晋北和蒙古三个伪自治政权，后合并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所谓蒙疆政权。内蒙古西部地区除了伊克昭盟大部、河套地区和阿拉善、额济纳旗以外，都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里的蒙汉各族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下整整度过了八个年头。

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侵略者入侵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始，就领导这里的蒙汉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大力开展蒙古民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和组织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完成了中共中央的战略任务。在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同绥远国民党当局、蒙古族各阶层以及其他各族各界建立广泛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斗争，有力地阻止了日本侵略军“南下西进”的企图，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极其艰苦、危难的环境中，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进行抗日斗争；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进入热河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发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开展抗日斗争；还有部分蒙古族革命者和热血青年，在日本侵略者严密控制的条件下，积极探索民族的出路。总之，他们没有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内蒙古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全面调查研究蒙古民族问题，千方百计地培养蒙古民族干部，认真研究和制定抗战时期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蒙古民族工作，发扬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从理论上、政策上探索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基本形成的阶段。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内蒙古的形势

一、抗战全面爆发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沦陷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日军向宛平县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此爆发。日本侵略者大量增兵华北，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于8

月 14 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而后，又连续发布了一系列通电、宣言、决定，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坚持不懈地努力，由于全国抗战形势的迅猛发展，国共双方经多次谈判，终于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于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内蒙古地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族各界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迅猛发展。7 月底，由绥远民先队、牺盟会、妇女会、学联等抗日救亡团体联合组织起“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这时，中国共产党派周小舟、潘纪文等先后赴绥开展抗日工作。共产党员潘纪文、杨植霖、王一然、武达平等团结各抗日群众团体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上层人士，在国民党第 7 集团军政训处办起了由 200 多名青年组成的训练队，培养抗日骨干，并于 9 月创办了《绥远抗战日报》。绥远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吞并中国，推行“速战速决”的侵略计划。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当时国内形成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同时还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日指导路线，即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工

农红军在改编为八路军以后，三大主力115师、120师、129师不久便出师山西抗日前线，一面在华北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一面深入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曾先后组织了几个大的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加之敌强我弱，国民党军队虽节节设防，最后还是严重溃败。

在华北战场，日军占领平津后，编组华北方面军，集中30余万兵力向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三方面进犯。8月14日，日本关东军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赴多伦指挥。8月27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以板垣征四郎为师团长的华北方面军直辖第5师团配合下，占领了张家口。当时担负察绥前线抗敌任务的，主要是由傅作义将军担任总司令的第2战区第7集团军。在绥东驻防的有国民党门炳岳率领的骑7师，马占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何柱国率领的骑2军以及绥远国民兵6个团。中国守军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8月14日，由董其武率领的218旅收复了商都县城。24日，化德也为国民党军队收复，驻化德的德王和一部伪蒙军逃往多伦。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张家口后，按其既定的侵略计划，立即向平绥路西段进攻。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陷落。这时，傅作义曾以绥远省主席名义致电阎锡山请求回绥守土抗战，而阎锡山却令其率部南撤雁门关，参加忻口战役和守护太原。绥远省在傅部主力撤离后，实际上已失掉了屏障，形势岌岌可危，留守绥远的部队只有35军435团、骑7师、东北挺进军、蒙旗保安总队和国民兵6个团。9月19日，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分两路进攻右玉和丰镇、集宁。驻守丰镇的国民兵第1团奋力抗敌一天一夜。23

日，丰镇陷落。27 日，集宁守备司令曾延毅临阵脱逃，日军占领集宁。29 日，绥远省民政厅长兼国民兵司令袁庆曾带领绥远省政府人员和从丰镇、集宁退下的部队离开绥远，撤向山西河曲。

10 月 5 日，日本关东军又开始编组以后宫淳为师团长的第 26 师团，配置察绥地区，并由后宫淳指挥察哈尔派遣兵团，担负侵占归绥、包头的任务。10 月 10 日，由酒井镐次率领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个旅团，在德王、李守信伪蒙军的配合下，开始分三路向绥包进犯。

是时绥包形势已十分紧张，只有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和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等少数将领把涣散的部分绥远守军整编抗敌。准备在归绥周围阻敌的守军有新组织的国民兵、骑 7 师、东北挺进军和蒙旗保安总队。10 月 11 日，日军乘汽车从集宁出发，从南路侵占凉城，尔后又逼近归绥，在蛮汗山西沟门受到国民兵阻击。12 日和 13 日，国民兵和蒙旗保安总队在归绥以南大黑河一线奋力抗敌。中路李守信带伪蒙军 4 个师沿平绥路西犯，在旗下营以西的斗金山受到马占山挺进军阻击，相持半日后守军撤退。[①] 北路德王带伪蒙军 4 个师沿大青山后向归绥包抄，已于 10 月 2 日占领百灵庙，在武川为骑 7 师所阻。14 日，日伪军以重炮猛攻，守军纷纷西撤，归绥失陷。16 日，日伪军继续西犯，占领萨拉齐县城；17 日攻陷平绥路的终点包头。11 月，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保安司令森盖麟沁投敌后，日军又侵占了准格尔旗黄河以北地区和达拉特旗部分地区。至此，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重要城镇和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全部以及主要交通线平绥路相继

① 《李守信自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20 辑，第 235 页。

沦陷。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加之日伪军于1938年3月进攻伊克昭盟东胜遭到失败，河套及黄河以南的伊盟地区仍由国民党军队控制。伊克昭盟和河套地区则由抗日的后方迅速变成了抗日的前线。

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过程中，还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对绥察地区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屠杀和肆意蹂躏。日军占领丰镇后，枪杀了78名国民兵训练团壮丁；10月16日，攻占萨拉齐县城不到两小时，便残杀手无寸铁的居民49人。日寇的法西斯暴行激起内蒙古各族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恨。

日军侵占内蒙古西部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以后，由于兵力不足、战线延长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无力继续西进。另外日本侵略军还企图据守平绥铁路线，在绥包等地派驻重兵，伺机西进南下，威胁我国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并力图使内蒙古占领区成为其巩固的后方基地，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实行殖民统治。与此同时，着手大力进行扶植伪蒙政权的工作。

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及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积极推行其“满蒙政策”的第二步计划，企图把内蒙古西部地区变为“第二满洲国”，从而达到准备对苏作战，确保“满洲国”西邻和进一步向我国西北、华北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张的军事、政治目的。同时企图获得一个掠夺自然资源和战略物资的重要场所。为此，日本侵略者早已在积极进行吞并内蒙古西部的所谓“内蒙工作”，大力扶持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

"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侵占察绥晋北的过程中，又加紧了建立伪政权的步骤。1937年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立即于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占领大同，又于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14日，日军占领归绥，接着便筹备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0月27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飞临归绥，主持召开了所谓"第二次蒙古大会"。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以所谓"严防共产、民族协和"为基本方针，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推选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并将归绥改称"厚和豪特"。1938年3月，云端旺楚克病死。7月1日又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该政府由德王任主席，李守信任副主席。

1937年11月22日，上述三伪政权代表汇集张家口，按关东军预定计划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人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并代理总务委员长。1939年4月29日，德王就任总务委员长。9月1日，在日本驻蒙军和金井章二操纵下，将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这个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仍以所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改善民生为理想，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来标榜。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设有政务院、参议府、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法院、最高检视厅和政务委员会。政务院下设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等7个部，还有牧业总局、蒙疆学院、蒙政审议会等。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把"防共"和"民族协和"作为基本方针，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其行政区域包括察南政厅、晋北政厅、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

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和张家口、厚和豪特、包头三市。“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于1941年改称“蒙古联合自治邦”，1943年又改称“蒙古自治邦”，一般都称作“蒙疆政府”。无论其名称如何变化，它始终是日本侵略者控制的一个傀儡政权。日本驻蒙军、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日本最高顾问主宰着一切。在伪蒙各级政权中虽有一批蒙古人、汉人充任各种职务，但在他们身边的日本人以顾问、次长、参事官等名义掌握着实权。据1941年《蒙疆年鉴》记载，这种大小太上皇有566人之多。伪蒙疆政权实质上已成为“满洲国”第二。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的整个战略部署上，十分重视对蒙疆的占领和统治。1938年11月30日，在御前会议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中规定：“蒙疆是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日本驻蒙军在1939年5月8日拟定的《蒙疆建设基本计划》中，提出要把蒙疆变为“防共特殊地带”。在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多次下达的“大陆命”中，首先提到的就是：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之线以东地区的稳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各要地和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治安。因此，在内蒙古西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加强了它的殖民统治。

1937年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将新编组的第26师团配置于绥、察、晋北地区，攻取该地区的察哈尔派遣兵团则大多返回原占领地区。1938年1月8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又编组了直属大本营的驻蒙兵团，兵力由第2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组成。7月，驻蒙兵团改称驻蒙军，转隶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基干兵力由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1939年1月增调来的

骑兵集团主力组成，约3万余人，分布在伪蒙疆地区。莲沼蕃、杉山元、冈部直三郎、七田一郎、上月良夫、根本博等先后充任驻蒙军司令官。驻蒙军司令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占据张家口及周围地区；第26师团占据大同、归绥、集宁等地；骑兵集团占据包头、固阳、萨拉齐、安北等地。除了日军主力，还有遍布蒙疆各地的日本特务机关。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在张家口设立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负责管理蒙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联络部长官为陆军中将酒井隆，同时兼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在归绥、包头、大同、化德、阿巴嘎、嘉卜寺、百灵庙等处，均设有权力很大、活动范围很广的特务机关。

伪军是日本侵略者控制蒙疆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各盟旗县及乡村、牧区。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设于归绥，李守信任总司令，高场损藏、小仓达次等先后任最高顾问。伪蒙古军下属9个师，起初有万余人，后缩减为几千人。1940年，第1、2、3师整编为伪靖安警备队3个集团12个大队，其余6个师整编为4个师。此外，日本侵略者还装备起以汉奸王英为总司令的伪绥西自治联军和以白凤翔为总司令的伪东亚同盟军数千人，还有伪巴彦塔拉盟警察队、伪鄂尔多斯蒙古挺进队以及伪警察、自卫团、保安队、保甲团等。伪军没有任何独立性，完全是日本顾问、教官、指导官操纵下的傀儡军队。

蒙疆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以战养战”和经济掠夺的重要基地。日本侵略者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个伪政权合为统一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不仅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更为了便于掠夺我国资源。因为平绥铁路横贯其间，日本侵略者早已垂涎的察南龙烟铁矿、晋北大同煤矿、绥远的皮毛以及其它矿藏，都可以通过控制这条交通线来获得。因此，日本侵略者把以平绥铁路

线为中心的蒙疆经济全面控制起来，并使之殖民地化。1937 年 11 月，设立蒙疆银行，接着在各主要城镇设立分行，大量发行“蒙疆银行券”，从而控制了蒙疆地区的金融。1940 年伪蒙疆银行副总裁日人寺崎宣称：“兑换券之流通量达 5500 万元”，而其资本总额仅为 1200 万元。从 1938 年到 1941 年，在蒙疆设立的日本资本经营的公司企业就有 73 个。日本侵略者通过“大蒙公司'、“蒙疆公司”、“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大同炭矿株式会社”、”蒙疆畜产股分有限公司”、“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等，垄断了内蒙古西部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疯狂掠夺各种物产资源。仅 1938 年，从蒙疆输出的各种物资总额即达 10839 万元。1940 年又修筑了包头至石拐沟运煤的铁路。日伪还通过名目繁多的税收来搜刮老百姓，主要有鸦片税、盐税、统税、关税、田赋、契税、烟酒税、印花税、牙税、营业税、屠宰税、斗税等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更指使德王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所谓“生产协力三大原则”。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进行经济掠夺，更为了在中国推行罪恶的“毒化”政策，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鸦片生产，强迫老百姓种植鸦片，使伪蒙疆统治区成为战时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1939 年 6 月成立“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年生产收纳鸦片 887019 两，金额 331.9 万元；1940 年、1941 年连续两年大增产，1940 年收纳鸦片猛增到 6717912 两，金额 6263.5 万元，纯收入 1562 万元；1941 年将鸦片种植面积扩大到 91.1 万亩，收纳鸦片 11242953 两，金额达

8916.6万元。[1] 在1940年伪蒙疆贸易输出总额中，鸦片输出额竟占52%。由此可见生产、贩卖鸦片获利之巨。鸦片被日本侵略者称作他们手中的"黑色金子"，鸦片政策成为"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用鸦片来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则用以毒害中国人民，企图以此消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内蒙古西部各族人民首当其害。另外，日本侵略者还将伪蒙疆生产的90%以上的鸦片输出到北京、上海等中国各地。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蒙疆实行奴化教育，大肆鼓吹"亲日防共"，并宣扬所谓"抑汉扬蒙"，制造蒙汉民族矛盾，企图达到其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目的。对于内蒙古未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对一些蒙古王公上层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进行欺骗宣传，妄图逐步灭亡整个内蒙古。

三、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殖民统治的强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统治。内蒙古东部蒙汉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遭受着日益深重的灾难。

1937年5月8日，伪满洲国发布《满洲国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大纲》。7月1日，伪满开始实行行政机构改革，将原来管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政部撤销，在伪满中央机构中设立兴安局，由扎噶尔任总裁。兴安局成为日本关东军直接控制的总务厅下设的三个局之一，同时直隶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专门负责蒙政基本方针和联络调整蒙政事务。1937年伪满改革省一级"官制"

---

[1] 参见（日）江口圭一：《资料·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岩波书店，1985年。

时，各省的日本人总务厅长一律变为省次长。兴安各省也不例外，由日本人把持着各级政权的一切权力。1943年10月，将兴安东、南、西省合并为兴安总省，由博彦满都任省长，日本人白滨任参与官。同时保留了兴安北省建制。上述伪政权无论名称如何变化，实际上都是依附于伪满洲国而由日本侵略者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1938年，伪满各省实行地方税制改革，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税和附加税，在兴安各省的地方税目多达5大类38种。[①]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经济掠夺，设立荒务局，以"借地养民"为幌子，招来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田，由地局征收荒租，县旗四六分成。1939年在制定所谓《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以后，更多的日本移民进入"满洲"，兴安南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等区域都成为"开拓"的第一线至第三线地带。1938年9月，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召集蒙古王公代表18人到他的官邸"座谈"，强制实行"开放蒙地奉上"，把蒙旗土地变为满洲国所有。这样，日本侵略者巧妙地通过伪满洲国出面夺得了蒙旗土地所有权。对于面粉、米谷、羊毛、皮革等都颁布了各种统制法，并强迫农牧民"出荷"农牧产品。如每5头牛出1头，10匹马出3匹，20头牛出1张皮，10只羊出3只羊、2张皮，每1只羊出1斤毛等。许多农牧民因交不齐"出荷"而被抓捕，农牧业生产也被严重破坏。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在日军占领期间，牲畜头数下降了73%。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东部设立9个材务分署，大量掠夺森林资源，把大兴安岭划为三个经营区，乱砍滥伐，共砍伐木材1000多万立方

①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19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米。在内蒙古东部，日本侵略者也同样种植贩卖鸦片，不择手段地利用鸦片政策为其战争经济服务。

为了强化对内蒙古东部的军事统治，日本关东军在海拉尔附近配置第23师团，在伪兴安各省都驻有不同数量的日军主力和宪兵队。同时，还把兴安四省划为4个警备区，以蒙人治蒙之说，欺骗、利用蒙古人统辖蒙古骑兵，称之为“兴安军”。实际上仍由日本人直接操纵。伪满洲国国军系统共设11个军管区，设在兴安四省范围内的是第9、第10军管区。第9军管区设于通辽，司令官甘珠尔扎布，日本顾问菅野谦吾，第10军管区设于海拉尔，司令官郭文林。1938年，伪兴安军撤销兴安西省和东省两个警备司令部，添设一个兴安师司令部，统归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指挥。兴安师的军官多数由日本人担任，师长为野村登龟郎，士兵全是蒙古人。

伪兴安军在日本关东军驱使下多次进行征战，许多蒙古族士兵在战斗中丧生。1938年，伪兴安军编为兴安支队，参加伪三江省“治安肃正”，围攻抗日联军。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还把“满蒙”视为其入侵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地。日本关东军对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怀有侵略野心。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挑起了诺门罕战争。战争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进行。日本关东军、伪满兴安军和苏联、蒙古人民共国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这场战争历时135天，至9月16日，以日满军死伤54000余人的失败而告终。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驱使伪兴安军7千余人前去参战，结果遭到苏蒙军的大量杀伤。大批蒙古族士兵不愿做炮灰，逃脱日军控制，离开战场，返回家乡。诺门罕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辽特务机关在查不干庙，屠杀了17

名不愿做炮灰的兴安军士兵。

对内蒙古东部蒙、汉、达斡尔、鄂温克等各族人民群众，日本侵略者同样采取屠杀和镇压政策。1940 年，一支日军部队开到呼伦贝尔的乌启罗夫鄂温克族猎民聚居地，把猎民的枪支全部收缴，然后开始对 14 至 70 岁的猎民分批进行军训。一个叫大拉非的猎民因反抗集训而遭迫害致死。1943 年 2 月，驻满洲里的日本宪兵队怀疑新巴尔虎左旗边境地区的蒙古族牧民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某种联系，遂以“反满抗日分子”罪名，突然逮捕蒙古族牧民、活佛及藏族喇嘛 16 人，进行严刑拷打。被捕者中有 1 人死于监狱，4 人下落不明，其他人直至日本投降时才获释。

日本侵略者为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奴化教育，办起了育成学院、兴安学院、扎兰屯国民高等学校、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等。1937 年开始推行“新学制”。“新学制”的特点就是殖民奴役性。它妄图把中国人民训练成日本侵略者任意驱使的“忠良”亡国奴才。“新学制”把日语列为“国语”，在中小学还开设“国民科”、“建国精神”等课程，并强制学生进行军训。在伪满建国大学，广招蒙古族青年入学，对他们灌输亲日反共思想。按照日本侵略者制订的《对蒙古人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是继续利用蒙古王公贵族统治广大蒙古族群众，另一方面则离间蒙古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坐收渔人之利。例如在伪兴安军官学校对蒙古族军官的教学中，特别强调“培植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民族的斗争意识，严禁持有排斥这种斗争意识的观念”。① 同时还强调反苏排共，以驱使蒙古族官兵为其对苏战略服务。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 14 年中，占整个伪满洲国地域三分

①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第 208 页。

之一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殖民地化步步加深，各族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遭受着民族的屈辱和深重的灾难。同时，他们也一天天觉醒，抗日斗争的烽火在内蒙古草原燃烧起来。

四、抗战爆发后的内蒙古西部国民党统治区

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之后，内蒙古未沦陷的地区只有伊克昭盟、河套和阿拉善、额济纳旗，而这些地区在抗战时期主要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

1937 年 10 月绥包失陷后，溃退的绥远各系国民党部队和陕西、宁夏的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进入河套及伊克昭盟。门炳岳的骑 7 师先后转赴杭锦旗和五原一带；李大超的国民兵进驻五原并改编为绥远游击军；马占山的挺进军退入伊盟，后因与从陕西开进伊盟的高双成 86 师争夺东胜未果，遂迁驻准格尔旗。不久，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也先后派部队进入绥西。此外，绥远未沦陷区的武装还有汉、回、蒙各式保安队、游击队、自卫队等。1938 年到 1939 年，进入河套、伊盟的国民党正规军和杂牌武装竟有十三四个系统之多，为全国各省区复杂纷乱之最。[①] 这些军队因互争军事指挥权及驻军地点，发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军事上极不统一和非常混乱的状态。一切军事费用，均以向民间无计划地强征摊派与勒索方式解决。因此，上述各部队不能合作一致共同抗日。至傅作义部队进驻河套以后，这种局面始有变动。

傅作义率部撤守太原后，于 1938 年初任第 2 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队驻山西离石县柳林镇。4 月，傅部曾反攻绥远，发动

① 西北研究社编：《抗战中的绥远》，西北研究社出版，1941 年，转引自《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册），第 345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绥南战役。6 月，又移驻河曲。是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 8 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傅作义脱离了阎锡山的体系。1939 年 2 月，傅作义率 35 军由河曲抵绥西五原，正式设立第 8 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着手调整绥远省党政军组织系统。傅作义除担任第 8 战区副司令长官外，还兼任 35 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及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省会设于陕坝。国民党中央则派遣特务数十人进入河套，一面监视傅部，一面积极策划反共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中共政治工作人员的具体帮助下，傅作义部官兵颇思振作，更坚定了抗日的信念，并且从思想、组织、军事、物质上为绥西抗日战争的发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和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下，傅作义也开始把共产党员排除出境。傅部派往绥远敌战区的督察专员、游击县长和“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与大青山八路军搞磨擦。他们中的顽固势力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欺压蒙古族群众，被群众称之为“反共灭蒙亡国军”。由此可见傅部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及其对蒙政策的一个方面。

伊克昭盟是未沦陷区中蒙古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抗战期间先后进入伊盟的国民党军队约 2 万余人。除前述的门炳岳、马占山、高双成、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队外，曾在归绥抵御日本侵略的蒙旗保安总队亦进驻伊盟，后改为蒙旗独立旅（或称蒙旗混成旅）。1938 年国民党又将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3 师（简称新 3 师），师长白海风。新 3 师名义上归国民党统辖，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

1941 年 11 月，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伊盟守备军总司令，总

部下属新26师，师长何文鼎。陈长捷实际上是国民党在伊盟推行“反共灭蒙”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抗战以来，国民党的对蒙政策，基本上还是继续过去的大汉族主义传统。1936年2月设立于归绥的“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在日军进攻绥包之际，迁至伊盟札萨克旗。绥境蒙政会虽直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与绥远省政府并列，按其性质是为“促进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事业”的机关，然而在国民党错误的民族政策之下，它实际上有名无实，所谓“自治”是无法实现的。在绥境蒙政会迁伊之时，国民党政府又把“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设在榆林，由阎锡山充任指导长官，朱绥光任副指导长官，就近控制伊盟和绥境蒙政会。另外，国民党还在伊盟札萨克旗设立了“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蒙旗宣慰使公署”、“察绥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蒙旗三青团特派员办事处”等一系列党政军特统治机构。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则驻东胜。

国民党以抗日名义在伊盟派驻大批军队，设置诸多机构，事实上并未认真实行抗日。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派达拉特旗的森盖麟沁带领300人渡黄河进占伊盟北部之柴登召，并设置据点，驻守伊盟的大批国民党军队却未加抵御，与之“和平”共处两年多。因伊盟在地理上接近陕甘宁边区，且有共产党八路军在伊盟的抗日活动和政治影响，所以国民党顽固派便力图限制与排挤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极力阻止、隔断蒙古族同共产党八路军的联系，以便从侧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另一方面大力推行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政策，在各盟旗强行编组保甲，干涉旗政，加重经济剥削，残杀爱国志士，加强对蒙汉各族人民的直

接控制。陈长捷到伊盟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对蒙古族人民的残酷的军事统治和无休止的敲榨勒索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1943年的“伊盟事变”。

抗战时期，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地，一直处于宁夏军阀马鸿逵的统治之下。1937年秋，国民党派徐子献为阿拉善旗军事专员。随之，马鸿逵以防守阿旗为名，派马鸿宾所部35师1个团进驻阿旗定远营。1938年春，马鸿逵又以换防名义调集大批部队突然进攻定远营，阿旗保安队和蒙汉居民奋力抵抗一昼夜。最后，马鸿逵部解除阿旗保安队武装，并将阿旗札萨克达理扎雅押往银川，后转移到兰州软禁8年之久。同年秋，马鸿逵在阿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开始编制保甲，摊派税款。接着又设立了“宁夏省银行驻定远营办事处”，垄断了阿拉善旗的皮毛及土特产，并先后强征骆驼1000余峰、马2800余匹、牛500余头。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工作的方针及其领导的抗日活动

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只有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能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国内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同各少数民族间的长期隔阂。日本帝国

主义者也十分清楚，欲灭亡中国，必须分裂中国各民族的抗日团结。于是便利用中国国内存在的民族矛盾，从“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到“七七”事变，先后成立伪满洲国，组织伪蒙疆政权，不断进行挑拨离间并对少数民族进行威胁利诱，企图“分而治之”，逐步吞并全中国。因此，正确解决国内各民族对抗战的态度问题，团结与发动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全面抗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而制定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内蒙古是蒙古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处祖国北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不仅把内蒙古东部纳入伪满洲国统治之下，而且占领了内蒙古广大地区，策划建立伪蒙疆政权。蒙古族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欺骗利诱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继续坚持民族压迫政策，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仍看不清形势，分不清是非。所以，在内蒙古争取与团结蒙古民族抗战，更是一个十分迫切和严重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战争应该是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旗帜，逐步提出了抗战时期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和适应抗战的正确的民族政策。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①] 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将大举向内蒙古西部地区进攻，号召绥蒙人民动员起来阻止日寇的进攻，强调指导内蒙古工作的地方党组织和工作人员要把蒙古民族的抗日运动作为头等重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45页。

要的任务和一切工作的中心，提出蒙古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出绥蒙和蒙汉联合抗日是目前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193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①]中，及时提出："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之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应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的动摇分子（如德王之类）到抗战中来。汉人的政府与军队，应该同少数民族的上下层建立良好的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使他们自愿的同我们亲密的联合"。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②]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更全面具体地阐述了团结抗日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总方针是："团结中华各民族（汉、蒙、回、藏、苗、夷、瑶、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③] 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是："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习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的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第8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第1004页。

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①

中国共产党这一完整的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的总方针和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为团结与发动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成为抗战时期在内蒙古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和进行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

在团结抗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斗争和蒙古民族工作全面展开，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二、蒙汉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在归绥等地的抗日活动

1937 年秋，当日军占领绥包，国民党绥远驻军及军政机关退散以后，内蒙古西部沦陷区蒙汉各族人民便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一时间，失败主义的情绪到处蔓延着，溃兵、土匪则趁火打劫，归绥周围更是日伪横行、盗匪烽起。人民群众深深地陷入了国破家亡的灾难之中。

就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和日伪气焰最盛的时侯，坚持绥远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等，决心组织抗日武装，毅然进行武装抗日的尝试。1938 年春，杨植霖等在归绥附近农村发动蒙汉农民和名言小学一部分青年学生，首先组织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595 页。

起一支十几个人参加的“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缴获了溃兵和土匪的一部分枪支。但因没有组织武装和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很快被国民党溃兵所冲散。为争取“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真正抗日，杨植霖曾打入“自卫军”政治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绥包失陷，杨植霖曾随“自卫军”总部退到伊克昭盟，转赴晋西北，向八路军120师首长汇报了开展抗日活动的情况。随后又奉命返回绥远再次从事争取“自卫军”的工作。“自卫军”头目王有功、郭怀汉等并无抗日诚意，争取工作失败。刘洪雄争取策反托克托县伪蒙军的工作未果，杨植霖与卜存良合组游击队的工作也受挫。尔后，他们又到归绥城中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这样，他们几经挫折，仍坚韧不拔，在武装抗日斗争中积累了经验教训。

1938年6月，杨植霖在家乡什报气村动员了6个农民，搞到5支枪，重新组织了一个小游击队。接着积极争取邻村大户张有聚抗日，于是张有聚带20余人与杨植霖合组抗日武装——抗日团。这时隐蔽在滕家营一带的高凤英和农民党员王之的也动员了一些蒙汉族农民，与抗日团汇合，一支蒙汉抗日游击队就在斗争中产生了。

蒙汉抗日游击队以大青山为依托，活动于大青山南麓、平绥铁路沿线及归（绥）武（川）公路两侧，由几十人发展成100多人的骑兵抗日武装。游击队曾在旗下营附近伏击敌人火车，在归武公路伏击敌人汽车，夜袭了归绥城北坝口子村伪警察所，并严惩了阻挠游击队征集物资的伪地主保甲团。蒙汉抗日游击队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逐步扩大了影响，鼓舞了绥远敌占区蒙汉各族人民的抗日信心，震动了日本侵略者。到1938年8月，这支游击队发展到230余人。

日本侵略者极力进行欺骗宣传，挑拨蒙汉民族关系，这在游击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蒙古族共产党员高凤英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游击队员们讲述蒙汉人民的共同命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欺骗宣传，使蒙汉游击队员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团结，蒙汉抗日游击队得到了巩固。

在游击队创建过程中，刘洪雄奔赴晋西北，请求八路军 120 师派部队挺进大青山。此时 120 师正组建大青山支队，刘洪雄向八路军详细提供了大青山地区的情况。

与此同时，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绥远的蒙古族共产党员贾力更、奎璧等，积极配合蒙汉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也在归绥周围展开了地下抗日斗争。

蒙汉抗日游击队虽规模不大，也没有在军事上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它的存在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在国民党驻军败退和敌伪气焰最盛之时，由共产党人率领蒙汉人民在绥远敌占区奋起武装抗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坚定信念和中国各族人民不可被征服的坚强意志。蒙汉抗日游击队的出现，也使持续数年的绥远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斗争发展。

1937 年 9 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 120 师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月下旬，120 师命 358 旅 716 团副团长宋时轮率该团 2 营组成宋时轮支队，星夜开赴雁北大同地区阻击日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1 月，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即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已经结束，以共产党

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 120师在大同、雁门关、忻县、太原以西，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内，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120师宋支队、358旅、警备6团和雁北独立军6支队都先后活动于山西雁北地区，并时常进入绥远东南部的清水河、凉城、丰镇、和林等地，在绥远敌占区传播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并在这一带建立了大同、丰镇、凉城、左云、右玉中心县动委会和以凉城马头山为中心的大、丰、凉、左、右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张学年、胡一新、石青山等到清水河建立中共县委和动委会，开展抗日活动。12月31日，宋支队攻克了清水河以北的杨林子据点。1938年春，120师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收复了7座县城，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20师又作出了宋支队开赴平西，359旅开赴恒山和358旅组织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的三项决定。6月，国民党傅作义部反攻绥远之役未成，从归绥向南退却，敌人跟踪追击，占领偏关城。在雁北坚持斗争的八路军358旅716团、715团、警备6团、骑兵营掩护了傅作义部撤退，毙伤敌200余人，并收复了偏关。雁北地区是延安和晋西北通向绥远大青山地区的战略要地。由孙超群、张达志率领的警备6团和刘华香、胡一新率领的雁北独立第6支队，经常跨越长城进入绥东南地区，在厂汗营、脑包村、杀虎口、红砂坝等处多次战斗，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1938年2月，6支队在杀虎口战斗中歼敌200余，支队政委胡一新光荣牺牲。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据地建立以后，警备6团和6支队在长城内外多次配合大青山八路军作战，为发展和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8年冬，中共大、丰、凉、左、右中心县委书记陈一华牺牲于丰镇地区。此后，在马头山地区还成立了中心县委和县动委会领导下的丰凉骑兵大队。

总之，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组织领导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抗日斗争，八路军积极活动于绥东南一带，这不仅大大增强了绥远敌占区蒙汉各族人民抗日的信心，而且也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伊克昭盟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伊克昭盟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南临长城与陕甘宁边区相连，北隔黄河同河套、包头、归绥相望，东边又与山西的偏关、河曲为邻。因此，伊克昭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和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大青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同时，它又是日本侵略者西进南下的屏障，也是国民党军队大量驻扎的地区之一。伊克昭盟成为国、共、日三方争夺之地。

日本侵略者占领绥包以后，进而企图吞并伊盟，实行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森盖麟沁投敌并占据准格尔、达拉特旗部分地区以后，日伪又进驻杭锦旗王府，在鄂托克旗阿拉庙一带修筑飞机场，企图长期占领伊盟。1938年3月21日，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包头设立“伊克昭盟公署”，任命原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齐尔为代理盟长，进一步向伊盟展开政治攻势。许多蒙古族上层人士处于动摇状态，有的在作伺机应变的准备。大批国民党军队进驻伊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从

而影响于伊盟的抗日大局。值此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伊盟，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蒙汉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在初步开辟伊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伊盟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全面领导了伊盟的抗日斗争。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三边特委，由白如冰任书记，以加强对三边、伊克昭盟和宁夏工作的领导，动员蒙回汉各族群众抗日。1938年1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内蒙古工作问题，李富春、高岗、王若飞等出席。会议分析了内蒙古形势，指出内蒙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蒙汉各族各阶层与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提出了“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蒙汉联合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①] 等口号，并决定采取发动下层与联络上层相结合的方针，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5月，蒙古工作委员会改称绥蒙工作委员会。绥蒙工委由白如冰任书记，李衡任组织部长，赵通儒任宣传部长，高增培任秘书长，于占彪任军事部长，白成铭负责青救会工作，白凌云负责妇救会工作，委员有云泽（乌兰夫）、白海风、孔令甫、刘兴源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同时还决定，八路军警备骑兵团从定边出发，途经盐池、五湖洞、鄂托克旗王府，进入伊盟的中心地区桃力民。绥蒙工委对外称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骑兵团称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孔令甫任司令员，白如冰任政委，刘兴源任副政委。绥蒙工委进驻桃力民后，成立了中共桃力民工委和河

①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143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1987年。

套特委，白成铭任桃力民工委书记，刘瑞森任河套特委书记。此外，还在包头附近的中滩地区成立中共包（头）固（阳）工委，在乌审、鄂托克、杭锦、札萨克、郡王、准格尔、达拉特旗和东胜县都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河曲县委、偏关县委也先后派干部进入准格尔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通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加强了对伊盟抗日斗争的领导，促进了抗日斗争的发展。

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在伊盟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蒙古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动员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工委将干部组成宣传队，编印了《绥蒙抗战报》，并大量散发蒙汉两种文字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重申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他们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绝不侵犯群众利益，帮助驻地蒙民解决实际困难，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严格纪律取信于民。在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及时地把农牧民、青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而后，在桃力民建立了伊克昭盟战地动员委员会（亦称抗敌后援会），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半政权性质的群众组织。同时展开了对地方上层和友军的统战工作。如土默特旗的总管荣祥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绥蒙工委派王浩等到郡王旗苏泊尔汉荣祥的抗日游击军中当连长。准格尔旗奇子祥的保安队在黄河北岸驻防，这里的渡口，是延安与大青山联络的通路之一。绥蒙工委派人与奇子祥联络，达成了互不袭击和他的部队向我提供交通方便的协议。乌审旗的那素滴勒盖（雷寿昌）营长，比较早地跟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为深入开展乌审旗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为了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加强对绥远工作的统一领

导，决定合并绥蒙工委和大青山工委，成立中共绥远省委，白如冰任书记，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随之，白如冰等原绥蒙工委的成员转赴大青山。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以骑兵团活动区域为中心，继续领导伊盟抗日斗争。为着地理的便利和解决问题的迅速，伊盟工委由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同时与绥远省委保持密切联系。中央还决定，骑兵团为训练整顿，也暂调三边地区，赵通儒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上校联络参谋名义，继续在桃力民地区开展工作。1939 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徐子猷、王万义、李维新、牛刚等为伊盟工委委员。同年冬，赵通儒调回延安，由刘瑞森任伊盟工委书记，杨一木、李维新、徐子猷为委员。1940 年冬，又由杨一木接任伊盟工委书记。

伊盟工委继续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组建了中共包头县委、准旗工作团和达旗区委，动员群众，扩大了抗日武装，并争取与国民党驻军和蒙旗部队开展抗日联合。1940 年，乌审旗保安队营长那素滴勒盖在伊盟工委的团结争取下，认清了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从伊盟投奔延安，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

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骑兵团进入伊盟后，即于 1938 年秋派于占彪等带领十几名八路军工作人员，深入包头以西的中滩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准备逐步建立一个抗日游击区。中滩北依乌拉山，南临黄河，东与包头接壤，西连西山咀，蒙汉杂居。在这里建立游击区，对于阻敌西侵河套和窜犯桃力民地区，并与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相联结，均有重要意义。于占彪等首先在马二圪堵村争取了窦文林等几个农民，又通过他们逐步扩大了范围。八路军

针对当地蒙民受国民党军队欺凌而被赶入乌拉山的情景，多次与国民党驻军谈判，终于使这支国民党杂牌部队同意蒙民下山归乡。八路军派人进山邀请蒙民下乡重建家园。这样，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蒙汉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也高涨起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滩游击队。不久游击队由十几个人发展到百余人。

在八路军骑兵团撤出伊盟时，留下一个排兵力和数名干部。1939 年，在伊盟工委领导下成立了八路军骑兵第三营，宋飞、牛刚先后任营长。骑兵团留下的一个排扩编为第1 连，连长李生业，指导员陈敬仰；母活稍党员训练班编为第2 连，连长李占胜；中滩游击队编为第3 连，连长窦文林，指导员钟春林，副连长边万富。中滩游击队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在此基础上伊盟工委在中滩建立了中共包固工委。中滩游击队积极同傅作义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通过傅作义解决了游击队的粮食问题。同时，中滩游击队还派人和大青山八路军联系。1940 年春，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派陈刚、杨建林到中滩与包固工委取得了联系。不久，陈刚率数百骑兵从高台梁来到中滩活动，给包固工委和中滩游击队以很大支持。在日军向河套大举进犯时，中滩游击队配合门炳岳骑7 师，阻敌数日。此后，中滩游击队奉命撤到伊盟工委所在地乌素加汗村。

蒙旗混成旅开赴陕西省之哈拉寨后不久，奉命增防山西省河曲县城。乌兰夫设法与八路军120 师取得联系，并得到了物资支援。1938 年1 月2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蒙旗混成旅工作的意见》，要求将部队党务委员会半公开的领导方式改变为“秘密存在”；以抗日救蒙会“团结蒙古王公、平民一致抗日”，而且以此“可以得到国民党的援助”，“巩固与扩大全蒙抗日的团

结及蒙汉抗日的团结"，"要求德王及伪组织内的王公、平民回头抗日"，"须拥护中央政府蒋、阎及北路总司令傅作义"，广泛与蒙汉各方发生关系，注意多培养蒙古干部。[①]不久，白海风、纪贞甫赴武汉向国民党申请军饷，纪松龄代理旅长，乌兰夫代理政训处处务，并对部队进行整训。这时，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改该部队番号为蒙旗独立旅，建制人事未变。5月，乌兰夫、白海风在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进一步明确了该部队的抗日方针。秋天，蒙旗独立旅奉命驻防伊盟郡王旗和杭锦旗一带。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②]中又指出，对于蒙旗独立旅"应该看到他是内蒙民族中最前进的力量，最大的抗日军队，他的领导者白海风等也是内蒙民族中最进步的青年。""应该了解这个部队的特点，不宜有急性的过左的要求。……帮助这个部队在内蒙民族解放中起着极大的进步作用。"1939年夏，国民政府军政部将该部扩编为新编陆军第3师，并划归第8战区指挥，白海风任师长，乌兰夫仍为中共党务委员会书记和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共党员纪松龄、朱实夫、孟纯、克力更、寒峰、云蔚等分别为各团和各部门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在新3师形成了秘密的核心力量，为阻击日伪军南进，防守伊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扩军和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乌兰夫在赤老图沟主持举办了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干部，特别是蒙古族干部，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同时派出奇希古等政工人员，配合中共伊盟工委和八路军骑兵3营在桃力民一带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群众工作。

---

①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148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13页。

新3 师曾两次奉命开赴达拉特旗河防地区与日伪军作战。1940 年，从全师抽调兵力，攻打盘踞在达拉特旗新民堡、张来顺营子的日伪军，阻止了敌人南进的企图。1941 年春，再次奉命出兵驱逐窜入东胜县柴磴寨子的日伪军，痛击了敌军南犯行动。新3 师在伊盟成为阻击日伪军的重要力量。

1941 年1 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派以陈长捷为首的伊盟守备军进驻伊盟，排挤和围攻中共伊盟工委及骑兵3 营。伊盟工委在痛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避免磨擦的精神，同骑兵3 营一起撤回陕甘宁边区。同年夏，国民党为控制和瓦解新3 师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下令调往甘肃靖远县驻防；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已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也被迫撤回延安。

1941 年秋，国民党部队除准备在南线包围陕甘宁边区以外，还准备在北线派何文鼎部进驻安边柠条梁，企图从两面夹击。为了粉碎国民党这一军事部署，八路军陕甘宁边区驻靖边的留守部队保安2 团和359 旅骑兵团一个营，在贺晋年等指挥下，于11 月11 日解放了鄂托克旗的城川，以堵截何文鼎部的来犯。随后，成立了中共城川工委。城川工委与乌审旗、鄂托克旗工委归三边地委领导。

四、河套地区的抗日活动和革命斗争

1937 年10 月，在日军占领绥包的严重形势下，安北县东北垦区人员急剧分化。有的要求开赴抗日前线，有的打算解散垦区。中共垦区工委决定领导垦民暴动，夺取武器组织抗日武装。10 月19 日，工委组织20 多名共产党员，在王志成等带领下，采取突然袭击，一举缴获了垦区办事处警卫股的枪支弹药。随即

召开垦区群众大会，宣布暴动胜利，并很快控制了局势。10 月20 日，去太原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请示工作的李衡和北方局派往绥远工作的王德等回到垦区，垦区队伍开到五原。绥远工委决定，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让队伍再返垦区进行训练，而后成立“抗日民族先锋队”。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并争取由绥包退至河套的马占山东北挺进军共同抗日，由白乙化通过挺进军中的地下党员李又闻、邹大鹏的关系，将队伍编入挺进军。11 月，由东北垦区暴动队伍组建的抗日民族先锋队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套地区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先锋队总队长白乙化，副总队长吴梦九，参谋长王德，政治部主任吴涛，下设4个中队，共100 余人。11 月底，先锋队做为东北挺进军的先头部队南渡黄河。1938 年1 月，抗日民族先锋队到达山西河曲，与马占山部脱离了关系，编入八路军120 师。以后这支队伍在白乙化率领下开赴平西抗日前线。白乙化任晋察冀军区第10 团团长，1941 年牺牲于平北。

抗战之初，傅作义部退至山西。绥远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自包头撤到河套陕坝。李为安定军心和训练部队，成立了国民兵司令部政训处。中共绥远工委决定借此机会大力开展国民兵的工作。李衡等同跟随国民兵西撤的一批共产党员郭敬、刘景平、杜如薪、赵化南等分别在国民兵政训处任职，展开工作。这时，绥远工委改为绥西工委，李衡任书记。绥西工委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国民兵中的工作。李衡担任了国民兵政训处副主任，郭敬、王建功、王志成等担任国民兵各团的政训主任。他们在国民兵中建立了政治工作体系，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了党的力量，在军队和地方都培养了一些骨干，并往延安选送了一批青年。

1938年，国民党西安行营指派高参来绥视察，把李大超带领的国民兵改编为游击军。4月，李大超因游击军“赤化”而被撤职，政训处随之解散。由于环境恶化，在游击军中秘密建立的绥西工委结束了工作，李衡回到延安，其他同志也相继撤离，只有个别同志仍留在河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垦区暴动和开展国民兵工作的同时，中共临河地下党组织也开始恢复，并在青年学生和文教界培养、壮大了进步力量。1937年冬，中共党员韩是今由桃力民到临河开展工作。临河城内以知识分子为主，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刘进仁任书记，并发展青年知识分子李贵、侯野烽等加入党组织。侯野烽还担任临河民众教育馆馆长，吸收进步人士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临河党支部以临河一校为中心，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还把县政府机关报《临河公报》改为《临河日报》，中共党员刘时平等参加编辑工作。1938年春，临河支部在临河民教馆成立“学友会”，联络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大力开展抗日宣传。

到1938年4、5月间，在河套的许多城镇、乡村、部队、垦区先后建立或恢复了中共党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从而推动了河套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

1938年5月，在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河套特别委员会，刘瑞森（遂生）任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光明任组织部长，钟春林、马建华任军事部长，刘进仁任统战部长，刘一山、王国华为委员。河套特委接替了绥西工委的工作，机关设在临河民众教育馆。刘瑞森担任《临河日报》主编，取得了合法身份。

中共河套特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利用公开的进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进一步动员与

团结了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在东至扒子补隆，西到磴口，南靠黄河，北依狼山的整个河套地区，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使河套地区的革命活动同大青山、伊克昭盟、陕甘宁边区的斗争相呼应，特别是为动员与组织群众，促进与联合国民党傅作义部抗日做出了贡献。

1938 年 6 月，河套特委在五原成立了中共五原支部。月底，中共临河县委重新组建，刘进仁、林光辉、马建华等先后任书记。到年底，临河所辖 6 个区都建立了区委，全县共有党支部 19 个，党员 400 多名。1938 年 7 月 21 日，中共五原县委正式建立，骆时、刘一山、赵化南、李凡等先后任书记，共建立 4 个区委，9 个支部，发展党员 100 多名。12 月，中共安北县委成立，赵子超、郭北宸、李石英、董有等先后任书记，全县共建立 6 个党支部，有党员 50 多名。到 1939 年 11 月，河套地区共有中共党员 560 多名。

1939 年初傅作义率 35 军进驻河套以后，中共河套特委也从各方面配合了对 35 军的统战工作，发挥了团结与组织群众抗日的作用。中共地下党员王一然、乔培新分别担任了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临河县和安北县的县长，刘进仁、赵子超等任动委会主任。河套特委掌握并通过《临河日报》，宣传了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抗日的主张，揭露与打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

1939 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张彝鼎任第 8 战区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姚大海到河套视察，促使傅作义限共、反共。在此情况下，除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被遣送而外，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对中共河套地下组织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在河套地区的革命活动受到了限制。

1939 年 12 月，河套特委书记刘瑞森调任伊盟工委书记，刘

景平代理特委书记。1940 年 2 月，河套特委归伊盟工委领导，伊盟工委派刘宏生任河套特委书记。7 月，郭北宸接任书记。这时，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张庆恩在河套建立了“绥远省调查统计室”，开始大规模向中共河套地下组织进攻。临河民教馆当月即被破坏。11 月，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临河县委书记赵子丰，赵经不起刑讯和诱惑而叛变，供出中共地下党员 124 名。这样，相继有 200 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国民党特务将他们关押在陕坝“战青团”，进行审讯、迫害。中共河套特委，临河、五原、安北县委及区委及许多基层组织，先后遭到破坏。12 月 23 日，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在赴伊盟途中也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同时采用高官厚禄、“美人计”等手段拉拢诱降。但郭北宸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1942 年 8 月下旬，郭北宸同志英勇牺牲。

1943 年，中国共产党在河套的各级组织暂时停止了活动。在傅作义部队中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则一直坚持着工作。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河套地区的革命活动，自始至终都执行了抗战这个总任务，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项抗日主张，在人民群众和国民党部队中广泛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推动了河套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建立与发展了党的组织，为延安、伊盟等地输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取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河套的工作也受到了挫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的河套地区，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对国民党的阶级本质认识不足，特别是地下党组织保密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在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和个别党员叛变的情况下，使党组织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第三节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一、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及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大青山位于横亘绥远省全境的阴山山脉中段，海拔2000公尺左右。它东起灰腾梁，西连乌拉山，东西绵延700余里，南北宽百余里。大青山南麓有肥沃的土默川平原濒临黄河，北麓是广阔的乌兰察布草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方有蛮汗山与之相望，并与晋西北形成山水相连的地势。

大青山地区，即指大青山脉南北的绥远省中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包括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四子王旗及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旗；绥远省辖之武川、陶林、兴和、丰镇、凉城、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固阳和包头、归绥、集宁等县市，面积约9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50多万，其中汉族人口约130万，蒙古族人口20万左右，还有一定数量的回、满等其他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里形成了蒙古族聚居、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多民族杂居地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内蒙古西部而形成的绥远敌占区，即为大青山地区的范围。

大青山地区地形多样，高山、平原、丘陵、草原、河流、湖泊参差排列。大青山主峰九峰山一带山势最为陡峻，而灰腾梁一

带则多为起伏的丘陵地带。大青山南北气温相差近一个月，由于热量与水分的差异，使大青山构成了农牧业生产上的一条重要界线，南麓为农业区，北麓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这里农牧业发达，丰年产粮可供当地居民食用三年，皮革绒毛远销国内外，而且有煤、铁、石灰石、石棉、云母等多种矿藏。这里交通便利，平绥铁路联结主要城镇，其他集镇也均有公路相通。归绥、包头两个主要城市，是绥远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青山地区居于华北和西北之间，成为沟通我国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纽带。上述客观条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建立伪蒙疆统治中心的缘由所在。

在抗日战争中，大青山地区对敌我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战略部署来考察，日军占领绥察，建立起一个伪蒙疆政权，而大青山地区正是伪蒙疆统治的心脏地带。这里集中了日本驻蒙军的主力部队、特务机关以及伪蒙军的主力，实行军事统治。同时还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经济资源、挑拨民族关系和实行“以战养战”、推行“毒化”政策的重要地区。日本侵略者企图以蒙疆地区为后方基地，向东与伪满洲国相连；向西进军我国大西北，以便肢解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向北形成对蒙古和苏联进行军事进攻的前沿阵地；向南则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包围夹击，并威胁陕甘宁边区。由于日本兵力不足，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决定“确保占领区”，而西苏尼特、百灵庙、包头、黄河、黄泛区、合肥、芜湖至杭州之线以东的占领区首先被划为“治安地区”。以后，又称伪蒙疆地区为“蒙疆确保区”，大青山地区则被称为“蒙疆防共隔绝地带”。

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

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来说，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能够牵制日军兵力，阻止日军西进南下，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能起到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积极作用，并使大青山地区成为晋西北根据地的外翼，推动整个晋绥抗日战争的发展，进而与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呼应，形成更广阔的敌后战场。开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可以动摇日本帝国主义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戳穿伪蒙疆的反动本质，树立起蒙汉团结抗日的旗帜，粉碎日本侵略者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在抗日反攻阶段到来之时，还能形成一个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于打通国际交通线、沟通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加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也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在绥远敌占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局势和战略需要出发，适时地作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八路军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从 9 月八路军主力出师山西到 11 月太原失守，八路军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保卫太原的作战。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奔赴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了敌后解放区战场，相继建立起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8 年春，日军把主要进攻方向转向徐州、武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暂时无力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的机会。为了发展华北的游击战争，扩

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武汉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各师除留出部队继续巩固已创建的根据地外，要实行大幅度分兵，向广大敌后地区和平原发展。1938 年 4 月，晋察冀军区派出支队向平西、平北、冀中平原挺进；晋东南 129 师则分兵进入冀西、冀南、豫北、冀鲁边平原地区。同一进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指示 120 师调查绥远敌占区情况并组织大青山支队，准备挺进绥远。这一战略部署的目的，在于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大青山、晋察冀和晋东南各根据地相互联接、相互呼应，使日军侵占的平绥、同蒲铁路及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重要城镇，完全处于我各根据地的包围之中。

1938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滕代远电询 120 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能否在大同以北之兴和、商都、康保地区建立根据地，能否沿大青山脉组织一支游击性质的骑兵支队。若能实现，西至新疆边境东迄满洲，整个内外蒙交界区域可成为游击地区。[①] 4 月 18 日，毛泽东、滕代远再电贺、关、肖并转宋时轮，在平绥路以北包括丰镇、集宁、天镇、阳高之北部及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即化德）、陶林、武川直至张北等县这一广大地区，能否创建游击根据地？要求迅速调查见告。[②] 5 月 14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贺龙、关向应、肖克等，明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③] 6 月 7 日，贺、关、肖等将调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3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② 同上，第 4 页。
③ 同上。

查情况电报朱德、彭德怀。6 月 10 日，朱德、彭德怀转报毛泽东，说明大青山地区的重要性和气候寒冷的特点，建议组建骑兵团或调陕北骑兵团前往，或由 120 师另派步兵为宜。[①] 6 月 11 日，毛泽东复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应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之。惟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陕北骑团现控制河套蒙古广大区域，在定（边）、盐（池）以北五百里之杭锦旗一带，配合蒙民抗御敌军南下，故不能调动。"[②]

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八路军挺进大青山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和具体部署，八路军 120 师迅即着手组建部队。1938 年 6 月下旬，120 师决定派 358 旅 715 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敌占区，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支队亦称李支队，由 358 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委，358 旅参谋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358 旅 714 团政委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715 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参谋长李文清，下属 3 个营。第 1 营营长傅传作、副营长邹凤山；第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5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② 同上，第 6 页。

2营营长唐金龙；第3营营长陈刚。每营有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共15个连。每连有指战员120人左右，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715团是120师仅有的4个老团之一，这个团排以上干部约140余人，绝大多数参加过红军长征，有的还是1927年的老赤卫队员。战士中也有五分之三参加过红军。因此，大青山支队是一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实战能力的部队，是一支有很高的政治军事素质、装备也较强的部队。

支队组成以后，在山西五寨举行了挺进敌后誓师大会。而后从五寨出发进至平鲁、左云、右玉、怀仁、大同及长城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积极准备挺进大青山。

在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组建以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也在7月于岢岚县城组建了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总动委会）。同时，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战动总会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也编属总动委会。总动委会和四支队，决定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敌后，参加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组织各级动委会，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1937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阎锡山谈判时在太原成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成立的由各党、各军、各界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山西的合法机构。战动总会由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南汉宸任组织兼宣传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王尊光任动员分配部长，武新宇任副部长。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是武新宇，组织部长武达平，宣传部长张晋勋，武装部长李维中，动员分配部长乔凤山。它是战动总会的派出机构，担负开展绥远敌占区的抗日动员工作，在抗日民主政权

未建立以前，还代行政权职能。总动委会还组建了六七十人的一个干部队，作为建立绥远各级动委会的骨干。为了加强对总动委会工作的领导，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组织了中共大青山特委，指导绥远敌占区动委会的工作并开展地方党的工作。中共大青山特委由武新宇、李维中、武达平、张晋勋组成，武新宇任书记。

战动总会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太原成成中学爱国师生组成的一支知识分子抗日武装。太原成成中学是192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晋籍学生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员曾在该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工作，遂使该校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进步学校。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和中共山西省委均设在成成中学，刘少奇、周恩来都曾住在这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师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地推动成成中学师生的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10月，成成中学组织抗日义勇队，报名参加的爱国师生有200余人，参加者还有太原其他几所中学的40多名学生，成成中学校长刘镛如任队长兼政委。参加义勇队的学生年龄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不久，义勇队改为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11月，奉命向晋西山区进发，12月，改编为战动总会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四支队辖两个连、一个直属队，每连3个排约80余人，刘镛如任支队长，冯福厚、黄政先后任副支队长，宋玉森任参谋长，宁德青任政治处主任，曹振之任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1938年2月，四支队参加了八路军收复晋西北7县城的战斗。3月，改编为山西保安二区游击第四支队。5月至6月，在偏关、五寨整训。7月中旬，即编为总动委会游击第四支队，决定与大青山支队一起开赴大青山地区，军事上受大青山支队统一指挥。

1938年7月底、8月初，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总动委会及第四支队，约2300余人，开始向大青山进军。从晋西北到大青山，只有400多公里，但由于日伪军堵截围攻，部队经过两次北上才进入大青山。

部队北上之时，驻绥远的日军1个旅团和伪蒙军9个师，分别扼守于丰镇至包头间的平绥路沿线和整个大青山地区。为了阻止八路军进入绥远地区，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层层设防。

北上前夕，大青山支队活动于雁北右玉县境。这时，从大青山来晋西北与120师接头的刘洪雄也到右玉与大青山支队取得了联系。贺龙、关向应、肖克将刘洪雄反映的绥远敌占区情况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作了报告。7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进军大青山的命令，120师政委关向应亲自到右玉传达进军命令并部署了进军事宜。7月29日，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喆指挥下，由王尚荣率3营为先导，从杀虎口越过长城，踏入绥远凉城县境，进军到厂汗营。

7月26日，总动委会及干部队由岢岚抵五寨，与第四支队会合。8月2日，总动委会和四支队也出师北上。

当大青山支队越过长城时，敌人从大同、左云、丰镇、凉城等地调集5千余日伪军，分7路围堵。大青山支队为保存实力，避免与敌正面交锋，决定分路突围转移。支队和总动委会、四支队分别向偏关方向转移。部队在倾盆大雨中经两昼夜急行军转移到偏关东北的贾堡一带。敌人围歼大青山支队的计划落空，但第一次北上受阻。

8月下旬，部队从贾堡开始第二次北上，仍向右玉前进。部队夜渡浑河，以神速的行军再经杀虎口越过长城，安全跨入凉城厂汗营一带。先头部队3营为了给大部队插入蛮汗山创造条件，

深夜袭击了天成村敌据点，消灭伪军一个连，炸毁敌汽车十余辆。同时，大部队从岱海滩以南经香火地，顺利到达蛮汗山主峰脚下的太平寨。

蛮汗山在平绥铁路南侧，与大青山遥遥相对。这里是联结大青山同晋西北的要地。八路军进入蛮汗山是挺进大青山的第一个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在 7 月间就曾指示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后，应先以主力进入归绥、武川、陶林、集宁之间的地区，另以一个营活动于平绥路南，以保证大青山与雁北的联络。经研究，决定由李井泉、武新宇、王尚荣等率主力向大青山腹地前进，姚喆率 1 营留在蛮汗山，宣传组织群众，并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跨越平绥铁路。

李井泉等率主力继续北上，很快集结于平绥路南旗下营与三道营之间的山区。8 月 31 日夜，主力部队的全部人马胜利通过平绥铁路，于 9 月 1 日到达预定地点大滩和甘沟子。

大青山支队 1 营在蛮汗山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抗日影响，赢得了群众称赞。日伪军数千人向我活动地区围扑而来，1 营便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在崞县窑子激战半日后，迅速退回平鲁境内。与此同时，八路军警备 6 团亦于 9 月 8 日从五寨出发北上，配合掩护大青山支队的行动。14 日，警备 6 团全歼厂汉营守敌。大青山支队 1 营在平鲁接应了彭德大等向大青山运送的 1400 多件皮衣，全营又向大青山进发。1 营北上时，警备 6 团又以夜袭平绥路丰镇以北的红沙坝火车站相掩护，歼敌百余，一度切断了平绥路交通，敌军慌忙增援。警备 6 团与敌周旋数十天后撤回雁北。同一时期，1 营进入蛮汗山区。10 月初，1 营也顺利越过平绥路，抵达速勃图一带与主力会合。至此，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及总动委

会、四支队圆满地完成了挺进大青山的任务。不久，八路军在面铺窑子与杨植霖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师。

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正当国民党 35 军反攻绥远失败而撤出绥远之后，八路军 120 师大青山支队和总动委会、四支队却冲破敌人重围，带着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任挺进到绥远敌占区，象一把尖刀直插日本侵略者统治的伪蒙疆的心脏。

八路军挺进大青山时，整个绥远敌占区是日伪蹂躏、兵匪横行、山河破碎、百姓遭殃的混乱局面。时值塞外深秋，八路军指战员们还身着单衣，群众未及发动，大青山地区日伪军的数量又十倍于我，这一切都为创建游击根据地增加了困难。但是，八路军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展开了游击战争，经过一系列的战斗，逐步开辟了包括绥中、绥西、绥南[①] 三块游击区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从而大大推动了内蒙古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八路军首先进驻绥中大滩一带。从第三天起，大青山支队就接连进行了几次战斗，迅速打开了绥中抗日斗争的局面。

9 月 3 日，大青山支队夜袭陶林县城，揭开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陶林城是位于大滩以东百余里的日伪大据点。9

① 这里所说的绥中、绥西和绥南，只是就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范围而言，不是从整个绥远省范围划分的。绥中指归（绥）武（川）公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北，集宁至土木尔台一线以西地区；绥西即归武公路以西，包括武川、归绥西部，萨拉齐、固阳县全部，托克托县一部和包头以东地区；绥南指平绥铁路以南，以蛮汗山为中心，包括凉城、清水河、和林格尔县及归绥、托克托、丰镇县的一部分。

月3日凌晨，李井泉率支队2、3营向陶林进发，傍晚至乌兰合页山地隐蔽。深夜，3营一个连从北门攻入县城，消灭伪军一部，日军在碉堡里拼命顽抗。当集宁援敌赶来时，支队为避免腹背受敌撤回大滩。这次战斗虽未攻克县城，却使八路军声威大振。

9月9日，支队2、3营在李井泉、王尚荣率领下，突然向绥中重镇乌兰花发起进攻，将驻守乌兰花的伪蒙军第7师一个加强连和四子王旗保安队共180余人全部俘虏，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80余支，战马100匹。支队进入乌兰花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此时四子王旗札萨克派二喇嘛布音道尔吉来与支队谈判，说明该旗保安队与伪蒙军不同，要求释放被俘的王府保安队官兵，并保证今后不与八路军为敌。大青山支队当即决定释放保安队全体成员，退还全部枪支马匹，经教育后全部遣散。

八路军袭击陶林、乌兰花，使敌人惊慌失措。9月中旬，敌人连续从归绥向大青山以北运送日军和物资，企图阻止八路军在绥中的活动。大青山支队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影响，果断决定在归武公路蜈蚣坝伏击日军汽车。9月下旬的一天，支队2营在蜈蚣坝活捉了一小队伪警察后，设下埋伏。当4辆满载日军的汽车爬上坝时，我军突以密集火力射击，敌1辆汽车栽到山沟里，其余3辆全被击毁，日军死伤80余。归绥大批日军前来增援时，我军已向井儿沟转移。

八路军经一个多月战斗，特别是经过上述三次较大战斗和群众工作，首先胜利地开辟了绥中游击区。

乌兰花战斗以后，大青山支队、总动委会和四支队领导在武川西南大青山深处的井儿沟召开会议，决定在坚持和发展绥中斗

争的同时，尽快开辟绥西和绥南游击区。

李井泉等带领支队3营、2营5连、四支队2连及总动委会部分干部，进入武川、萨拉齐、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后脑包、官地一带，开辟绥西游击区。当敌人获得支队西进情报后，立即从包头、固阳出动满载日军的汽车37辆，想在支队尚未立足之前消灭或驱逐。2营5连掩护机关人员向九峰山转移，3营面对4倍于己的敌军，顽强战斗一整天，击退敌人数次进攻。敌伤亡较大，最后拖尸败逃。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西，首战告捷。不久，王尚荣等率3营雨夜奇袭了陶思浩车站，消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大批粮食、伪蒙疆钞票和军用物资。

为了给日伪军更大的打击，支队3营连续作战，决定袭取包头附近的石拐镇。石拐镇有伪蒙军一部及一个伪保甲团。支队3个连分路进击，俘敌300余，毙伤百余。战斗结束，3营9连暂留石拐镇做群众工作。数天以后，大批日伪军前来围扑，9连大部从镇北撤出，惟在镇南土堡里担任警戒的一个班未及撤退，于是，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打退敌人数次冲锋，并击毁敌坦克1辆，汽车4辆，毙伤敌20余人。天黑以后，这个班战士全部突围。

八路军在绥西三战三捷，绥西游击区局面很快打开了。

八路军在绥南地区工作开展较早。雁北八路军常在绥东南一带活动，大青山支队北上时也在群众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然而真正开辟绥南游击区还是从邹凤山等率1营3连、四支队1连的部分动委会工作人员回师蛮汗山开始的。1938年10月13日，贺龙等曾电示李支队：“依据大青山亦须积极向铁道以南开展群众

运动与游击战，与警6团衔接发展，不至陷于孤立。”① 10月中旬，邹凤山等率部重返蛮汗山，任务就是开辟绥南游击区，保护大青山与晋西北的交通线。

日伪在绥南的据点集中在平原地带和较大集镇，当时蛮汗山区据点不多，主要是大小股匪对群众危害最大。于是，我军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山区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根据群众要求，我军对扰害蛮汗山的几股土匪进行了坚决打击，夺回了被土匪抢走的财物，归还原主，解救了许多被土匪掠去的妇女，得到群众的极大信任和拥护。

支队司令部根据蛮汗山和大青山地区的气候地形特点，要求绥南部队尽快由步兵装备为骑兵。绥南部队决定通过打土匪缴获马匹来武装骑兵，先后打击了三股土匪势力，缴获了百余匹战马和一部分枪支，很快组织起了骑兵。这是大青山支队组织骑兵的开始，也是开辟绥南游击区的特点之一。

从八路军挺进绥远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立。在东起灰腾梁，西到包头、固阳，南到黄河、长城，北到四子王旗的广阔地区，形成了绥中、绥西、绥南三块游击区。以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逐步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

在开辟游击根据地过程中，总动委会和四支队工作人员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支援抗战，号召各族各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很快成立了区、乡、村三级动委会和农救会等群众组织，不仅解决了部队过冬衣物，而且建立了若干支地方游击队。当时在绥西的一部分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

---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68页。

卫军”也积极与我军接近。动委会和八路军积极开展了对“自卫军”的统战工作。李维中、刘水仔等到“自卫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初见成效。

1938年12月间，日伪军近7千人从大同、丰镇、集宁、归绥、包头一线出动，兵分三路，发动冬季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刚刚建立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绥南，日伪军数千人向我活动中心碾房窑子一带合围，我刚组建的绥南骑兵立即分散兵力，及时跳出外线，转移到晋西北右玉西山。在绥中，三路日伪军向大滩、西河子一带分进合击。我军及时侦知敌人动向，果断地撤向土匪康德胜盘踞的孔脑包、土城子一带。几路敌军不仅没有合围到八路军，而且还互相误会对打起来。在绥西，日伪军2000余人向巴总窑子一带疯狂“扫荡”，我绥西指挥机关撤向万家沟，3营骑兵连奔袭包头城，日军急忙撤回一部守城。此后，3营主力经过韩沁坝、马场梁、九道拐、明安川等数次战斗，彻底粉碎了敌人对绥西的“扫荡”。日伪军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扫荡”以失败告终。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120师主力开赴冀中，大青山支队715团主力也奉命东进冀中。12月22日，715团主力由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离开大青山经雁北直抵冀中。715团留下1营3连，2营5连、6连各一个排，3营营部及9、10连和机枪连一个排。加上四支队、动委会工作人员，总计不到1000人，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

从1938年底到1939年初，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分别在绥中、绥西和绥南进行了剿匪斗争，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自民国以来，匪患一直是绥远严重的社会问题。抗战开始

后，绥远敌占区的交通线和较大城镇被日伪统治，而广大农村则成为土匪的天下。当时活动在敌占区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多数是由国民党散兵和杂牌军组成的，也有的就是由土匪武装凑合而成。至于流窜大青山地区的大小土匪则不下几十股。土匪给绥远敌占区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致使许多老百姓无以生存。八路军挺进绥远，转战阴山700里，打击日伪，深受广大群众爱戴。同时，群众也纷纷向八路军哭诉土匪的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为民除害。所以，清剿匪患已成为八路军进一步取得民心、站稳脚跟和能否顺利开展游击战的一个迫切问题。大青山支队根据党对土匪的有关政策，对“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中的土匪武装一般按友军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联合、促使其抗日。对作恶成性的惯匪，不听劝阻继续危害群众或妨碍抗日的大小股匪以及投靠日寇的匪部，则予以坚决消灭。

八路军剿匪斗争在绥中、绥西和绥南同时展开。1938年12月，当日伪军向绥中游击区大举“扫荡”，我绥中部队转移到土城子、孔脑包一带时，由于土匪洗劫，我军无法筹措给养，群众纷纷要求打土匪。于是我军将以康德胜为首的匪徒包围，俘获匪徒三四十人，解救了一百多被土匪抢去的妇女。为了让群众过一个太平年，我军又于除夕之夜突袭了在银贡山一带作恶的大惯匪夏军川匪部，俘土匪六七十名，缴获百余匹马和一些枪支弹药，解救出一批妇女。八路军在绥中冲垮了康德胜、夏军川两股巨匪，其他小股土匪也遭到毁灭性打击。绥西土匪主要活动于萨拉齐和托克托县平川地区，数十人一股。1939年初，绥西八路军先后剿灭了十几股土匪，其中包括惯匪红蚂蚁、三拐子等。八路军在绥南开辟游击区是从剿匪入手的。绥南最大的股匪是肖顺义，绰号干豌豆。我军在老赞窑子首次活捉20余名土匪，解救

年轻妇女近百人。第二次战斗在美岱村。第三次战斗，我军在陶卜齐附近的什惧窑子一举全歼已投降日寇的干豌豆匪部，俘排长以上土匪头目 24 人，缴枪 70 余支，战马百余匹，为蛮汗山区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经过剿匪，基本肃清了三块游击区的匪患，八路军进一步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

第四节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对绥远敌占区工作的方针

1938 年 10 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但是经过我国军民 15 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已无法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迫将侵华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持久作战。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侵略者逐渐以主要军事力量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12 月 22 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对中国国民政府重申“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并确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区域”。1939 年初，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由武汉陷落前的 30 万增至 60 余万人，在伪蒙疆也增加了一个骑兵集团。

在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认真总结了抗战经验，正确估计了抗战形势，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

中央政治局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会确定要进一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为实现党在抗战新阶段的领导作了全面的战略规划。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绥远敌占区的实际，提出了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指导绥远敌占区工作的一系列方针、任务、政策和策略。

1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从以下八个方面全面部署了绥蒙的工作：（一）任务问题；（二）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三）在蒙人中的工作；（四）友军工作；（五）汉人群众中的工作；（六）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七）部队行动与扩大问题；（八）党的组织问题。指出："我们党与八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要去唤起和团结蒙汉一切力量，一致联合抗日，是要以我们正确的扶助境内少数民族解放政策，去帮助各方消除蒙汉间的对立，是要以我们坚持抗战的模范作用，去提高蒙汉军民王公官吏抗战必胜的信心，是要广大的展开绥蒙抗日游击战争，把绥蒙全境造成敌人不可征服，不能巩固统治的游击区，逐渐在将来敌我力量的变动中，形成坚强的抗日根据地，形成我反攻阶段的前进阵地。"[①] 对于绥远敌占区的工作，中央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是多方面的；强调了蒙古民族工作；要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争取伪军；李支队要努力在绥东、绥中、后套一带发展，把这一带建成坚强的抗日游击区，与晋西北及陕甘宁边区抗日斗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12页。

争相呼应，并且始终坚持游击战争，在斗争中还应使自己迅速装备成骑兵；最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绥远省委，以李支队活动为中心，领导绥远敌占区及河套一带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成为全面开展绥蒙抗日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1938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出《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①]的指示，指出“大青山北靠外蒙，敌正重视，察热游击战争尚未开展，又形孤立，欲在那里建立冀察晋型的根据地，在今天则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指示对伪军、土匪、自卫军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要求从长期游击战争的特点出发，作好与傅作义和绥远当地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掌握对伪政权的策略；指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另一个基本任务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为争取蒙古民族各阶层抗日，提出“对德王仍应采取争取的策略，继续执行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对蒙汉民族间的土地问题要求“地方政府应依据具体情况分别公正处理”；必须切实教育部队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发扬其文化，不得侵犯蒙民的利益；为了做好蒙古民族工作，要吸收蒙古民族知识分子抗日，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同时要求发展地方游击队，培养地方干部。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总结了一年多来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和问题，分析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436—437页。

了绥远敌占区的形势与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并根据新的情况部署了今后的工作，指出“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准备将来的局面，是绥远敌占区总的任务”。[①] 决定认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是异常艰苦困难条件下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大地提高干部党员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与决心，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应克服关门主义倾向，建立党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加强群众工作。要开展城市工作，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要把蒙古工作做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通过总结绥远敌占区游击战争和党的各项工作的实践经验，更加完善了党在绥远敌占区工作的方针、任务、政策和策略，从而正确地指导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绥远敌占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也是坚持绥蒙抗日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抗战时期，绥远敌占区党的组织随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八路军挺进大青山时，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曾组织中共大青山特委，同上大青山。为了全面加强对绥远敌占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绥远省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中共绥远省委由白如冰任书记兼蒙民部长，李井泉兼军事部长，武新宇任宣传部长，白成铭任组织部长，赵通儒任伊盟工委书记，刘瑞森但任河套特委书记。伊盟工委在建制上归绥远省委，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46 页。

但由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同时与绥远省委保持密切关系。中央决定成立绥远省委以后，原绥蒙工委和大青山特委即撤销。1939年3月，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带领原绥蒙工委部分人员和晋西北派往绥远的160多名干部到达大青山，中共绥远省委正式组成，并开始工作。以后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党的领导机关有过多次变动。

1939年3月至11月，中共绥远省委领导河套、绥中、归（绥）陶（林）、绥东4个区域的工作。中共河套特委辖临河县委、五原县委、安北区委；中共绥中特委，书记杨植霖，辖萨拉齐县委、武川县委、托县区委、武（川）固（阳）工委；中共归陶工委，书记武达平，辖武（川）东县委、陶林县委、归（绥）武（川）工委；中共绥东工委，书记白成铭（兼），辖凉城县委、丰（镇）兴（和）县委、集（宁）丰（镇）工委。1939年12月，在河套特委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以后，中共绥远省委改称中共绥远区委，辖绥西地委（原绥中地委）、绥中地委（原归陶工委）、绥东工委和归绥工委（书记宁德青）、土默特旗蒙古工委（负责人贾力更、奎璧）。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确定，为使绥远敌占区工作与晋西北连接起来，提议绥远敌占区与雁北地区合组晋绥边区党委，受晋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7月24日，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绥远区党委设在雁北，将雁北地区工作划归绥远区委领导，并派刘俊秀等与绥远区党委合组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刘俊秀任组织部长，王聚德任社会部长兼宣传部长，于占彪任武装部长，张达志、赵仲池为委员。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辖绥西、绥中和雁北地委，书记分别是王聚德（兼）、贾长明和赵仲池。

1941年3月，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撤销，在中共晋西区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白成铭任组织部长，王聚德任社会部长兼宣传部长，于占彪任武装部长，王建功任秘书长，下辖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兼，10月牺牲）、白成铭（兼）；绥中地委，书记贾长明；绥南地委，书记李权超。

1942年10月，因绥远敌占区形势十分困难，绥察区党政军机关均移驻晋西北偏关，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任命高克林为绥察边区党委书记兼骑兵支队政委。10月24日，晋绥分局决定绥察边区党委与雁北地委合并成立中共塞北区工作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胡全任副书记，白成铭任组织部长，苏谦益任宣传部长，曹振之任城工部长。塞北区工委辖绥西地委，书记白成铭（兼）；绥南地委，李权超、崔岩先后任书记；雁北地委，书记胡全（兼）。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于2月17日电复晋绥分局，同意在绥远成立中共绥蒙区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并批准高克林等10人为党委委员。中共绥蒙区委员会下设绥西地委、绥中地委和绥南地委。

中共绥远省委和历届党的领导机构，按照中共中央对绥远敌占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大力开展党的工作，领导了广泛的地方性与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共绥远省委建立后，首先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上述党的领导机构和许多党的基层组织，一些地区成立了旗县委、区委以及基层党支部。在八路军游击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一些重要城镇和广大乡村，还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开展地下斗争。1939

年3月至11月，绥远敌占区已有党员582名，河套地区也有党员560多名。[1] 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已经形成坚持绥远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力量和先锋部队。

为了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开始组建骑兵。在较短的时间里，一支英雄的八路军骑兵支队便建立起来，驰骋在阴山南北，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同时组织和发展了群众抗日武装，到1940年即建立起地方游击队12个，游击小组则更为普遍。

绥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及时领导和开展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首先通过动委会发挥政权职能，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游击战争。在此基础上又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和绥察行政公署，成立了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乡一级革命“两面政权”。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还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游击战争，到1939年底，绥远敌占区已有农救会员4，000多人，青救会员75名，自卫军470人。

结合绥远敌占区的实际情况，绥远中共党组织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族各界各党派各阶层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如对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地主阶级及各种地方势力的统一战线工作，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对伪军伪政权人员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使不少伪据点和伪政权保持中立，有的暗中与我联系，为我提供情报。

蒙古民族工作是绥远中共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通过在蒙古族群众中深入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公开揭露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国的阴谋和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使许多蒙古族群众认清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71页。

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参加了抗日。通过对蒙古族上层的工作，使许多民族上层人士以至伪蒙疆一些军政人员也同情支持抗日。还大力培养蒙古族干部，在蒙古族先进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并一批批地选拔蒙古族青年，输送到延安培养。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绥远敌占区的地下抗日工作。曾一批又一批地派出优秀干部，打入日伪统治强固的城镇、乡村和铁路沿线，以各种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日活动，积极配合支持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抗战期间，始终坚持了归绥、察素齐、陶林、武川、丰镇、集宁、萨拉齐、托克托等城镇及附近乡村的地下斗争。1938 年冬至 1939 年初，刘洪雄、郝登鸿、宁德青等共产党员进入归绥，取得了合法身份，成立了中共归绥工委。归绥工委秘密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成立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发展到 200 多人，并建立 3 个党支部。1940 年 7 月，由于缺乏地下斗争经验和隐蔽政策执行不力，归绥工委和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遭到日伪破坏，刘洪雄、贾恭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救国会员 100 余人壮烈牺牲。在其他城镇、乡村和铁路沿线，先后派王威、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张万精、高陵平、李大光、张少庭、高增贵、史学文、曾则西、李德元、郑朝珍、杨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斗争，使地下斗争成为绥远敌后抗战的又一条重要战线。

三、大青山骑兵支队和骑兵游击战争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以后，武装斗争依然是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主要形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则是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力军。根据大青山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对敌斗争需要，在 715 团主力东进冀中以后，大青山支队逐渐由步兵转变为骑兵。

大青山地区除大青山、蛮汗山是山峰较多的地区外，大部地区是丘陵地带及平川和草地。这里地广人稀、冬季严寒，出产马匹又多，十分便于骑兵活动。我军以山区为依托，向丘陵平川发展，长距离奔袭敌人和开展反“扫荡”，加强三块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客观上都需要组建骑兵。另外，绥远敌占区的伪军大部分是机械化部队和骑兵武装。所以，八路军从来到大青山就注意到了建设骑兵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也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①]

大青山支队在游击战争和剿匪斗争中，缴获了一批战马，绥南部队首先装备为骑兵，其他部队也陆续装备为骑兵，加上支队原有骑兵连，到 1939 年 1 月，支队指战员共 1480 名，有战马 609 匹。部队要完全装备为骑兵，所需马匹鞍具除了继续在战斗中缴获和购买一部分外，其余多数是按照合理负担政策在广大群众中筹集的。许多蒙汉群众出自爱国之心，主动把好马捐献给八路军。同时，指战员们还主动请教当地善骑射的蒙汉族群众，经过一段刻苦训练，掌握了骑乘作战和马匹驯养的本领。这样，大青山支队很快由步兵变成了一支机动性很强的骑兵部队。

1939 年夏，八路军 120 师大青山骑兵支队正式组建，李井泉任支队长，姚喆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7 月份，骑兵支队拥有指战员 1500 余人，战马 1471 匹。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骑兵支队将所属部队整编为 3 个营，1 营在绥南，2 营在绥中，3 营在绥西。1940 年 2 月，李井泉奉调回晋西北，姚喆任支队长（后改称司令员）。彭德大牺牲后，张达志任政治部主任。1941 年，陈刚、张成功分别任支队副司令员和参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16—617 页。

谋长。1940年5月28日，贺龙、关向应向毛泽东、朱德请示批准将大青山骑兵支队营的建制改为团的番号。冬天，将骑兵1营改为骑兵1团，团长邹凤山，政委范宝顺；骑兵2营改为骑兵2团，王贤光、李国良先后任团长，彭宝山、刘水仔先后任政委；骑兵3营改为骑兵3团，朱有德、蔡久、于占彪（代）先后任团长，姜文华任政委。1941年12月，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电令将四支队改编为骑兵支队独立营，黄厚任营长兼政委。

大青山骑兵支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壮大，在敌强我弱、环境艰苦、供给困难、远离后方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大青山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为游击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展开，建立了丰功伟绩，并且创造了开展敌后骑兵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

1938年底至1940年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加紧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大规模“扫荡”15次，袭击我军30余次。1939年4月3日到5月31日，敌人调动一个旅团的兵力，并以三个师的伪军相配合，对绥中、绥西、绥南游击区进行了持续大“扫荡”。绥中部队采用“蘑菇战术”，伺机消灭小股敌人，并袭扰平地泉、红格尔图，冲出了日伪包围圈，转移至武川、陶林交界处。日伪军对绥中的“扫荡”，以耗费200多桶汽油和毁坏十余辆汽车而告终。绥西部队以大万家沟一带为活动中心，隐蔽于各个山头打击敌人，敌人的目的也未达到。绥南骑兵与雁北骑兵大队相配合，在东沟门歼灭日军50余，取得了组建骑兵后的第一次胜利，而后转移到右玉西山。但是，在凉城车骡子沟，绥东工委、动委会及部分游击队被敌包围，多数突围，凉城县委书记张

治华、骑兵连指导员陈金龙等壮烈牺牲。在二龙宿太附近，四支队1连指导员秦赞忠和40余名战士为国捐躯。

1939年冬，绥南骑兵1营配合警备6团、雁北骑兵大队，在丰镇以东大庄科一带开辟了游击区。同时，由冀文广等组织了丰东工作团，把绥南游击区从蛮汗山区扩展到丰镇以东。

从1938年9月到1940年1月，八路军在绥远敌占区共与日伪军战斗120余次，击毙日军1000余人，伪军5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缴获500余支枪和其他战利品，击毁敌汽车50余辆，并多次破坏敌电台、桥梁、铁路等设施。[1]

1940年，大青山骑兵支队胜利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进攻，使骑兵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国民党在绥远敌占区的势力主要是"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和1938年设立的行政督察专员、游击县长等。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主动争取联合"自卫军"共同抗日。但是，当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开始反共活动以后，特别是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自卫军"顽固派便越来越猖狂地进行反共磨擦活动。"自卫军"参谋长鄂友三等指挥部下向八路军袭击、缴枪、抢粮，杀害我军政人员。他们抗日不足，欺压百姓、实行"反共灭蒙"政策有余。自卫军头目王有功则与日本特务机关频繁往来，准备投日。总之，"自卫军"顽固派已成为阻碍抗日游击战争顺利发展和危害蒙汉各族人民的一股政治势力。八路军骑兵支队按照对友军的政策，曾多次对"自卫军"晓以抗日大义，并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然而大青山的国民党

① 李井泉：《一年余来的大青山游击战争》，1940年10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0期。

顽固派却执迷不悟，反共丑剧愈演愈烈，致使八路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反顽斗争。

1940年初，毛泽东、王稼祥在给贺龙的电报中指出："在大青山扫荡投降之自卫军是必要的。"[①] 在"自卫军"加紧投日反共的情况下，贺龙、关向应于2月5日通知大青山骑兵支队准备反击"自卫军"顽固派。春节期间，骑兵支队驻绥西、绥中和绥南的部队统一进行了反顽斗争。在绥西，骑兵支队全歼"自卫军"总指挥部，俘顽军300余，缴枪600余支，同时缴获了"自卫军"与日寇勾结的密信。在绥中和绥南，骑兵支队消灭顽军4个连。经过反顽斗争，大青山地区的"自卫军"顽固派被彻底打垮，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并且出现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在反顽战斗中，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光荣牺牲。

同年，日军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扫荡"十几次，但均为我抗日军民所粉碎。骑兵支队1团在绥南同敌人进行较大战斗15次，不仅坚持了绥南游击战争，而且保证了大青山与晋西北交通的畅通。骑兵支队指挥机关和2团在绥中粉碎敌人五次"扫荡"，与敌人进行较大战斗17次。3团在绥西与敌人进行较大战斗18次。据不完全统计，骑兵支队在1940年共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95次，毙伤日伪军794人，其中毙伤日军428人，伪军366人，俘日伪军193人，击毁敌汽车7辆，缴获枪支586支，战马571匹。骑兵支队指战员共牺牲180人，负伤184人。

1941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在华北实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在伪蒙疆地区则实行所谓"施政跃进"运动。1941年6月实行第一次"施政跃进"，强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12页。

化伪蒙政权体制，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军民实行更加残酷的围剿和“三光”政策，在大青山18道主要山口和蛮汗山各主要山口设置重兵，挖掘“封锁沟”，垒“封锁墙”，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晋西北军区指示大青山骑兵支队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并实行隐蔽政策，以保证完成既定的战略任务。

大青山骑兵支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在越来越严重的艰苦斗争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在敌人的“扫荡”围攻中，指战员们几乎每天都处于临战状态，经常是人不脱衣，马不卸鞍，有时昼夜游击，不得睡眠。由于供给困难，部队有时数日得不到食物。但是，战士们不仅经受住了这种恶劣环境和艰苦生活的考验，而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了游击战争。骑兵支队以连为单位，采取机动灵活的分散游击活动，时而快速奔袭薄弱之敌，时而迅速转移避开敌之主力，时而在山地丘陵与敌人兜圈子，时而又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这一年，骑兵支队与敌人交战108次，共毙伤日伪军394人，击毁敌汽车6辆，炸毁敌火车一列，缴获枪240余支、战马383匹。骑兵支队牺牲96人，负伤138人，骑兵2团团长王贤光也在战斗中牺牲。

骑兵支队在1939年冬开辟丰东游击区基础上，又在1941年初组织了绥东工作团，活动于西起陶林、集宁，东到商都、兴和，南抵丰镇，北达土木尔台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绥东游击区。绥东工作团以集宁北部的黑土坡一带为活动中心，并成立了3个分团，组织了3支骑兵游击队，有200余人。同时还开展群众工作，争取伪军、民族上层、开明士绅以及教会支持抗日。绥东工作团还以陶、集、商、兴、丰联区政府名义进行工作，并在3个分团活动区域分别成立了3个区政府。在骑兵1、2团支援下，

绥东工作团的抗日影响遍及东绥上述各县，从而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区的范围从绥西、绥中和绥南扩展到绥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曾开辟了数条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和新疆军阀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集团以后，中共中央在甘肃和新疆的国际交通线受到国民党的威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开辟国际交通线，特别是通过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建立延安——大青山——乌兰巴托交通线。1940 年，毛泽东、朱德指示大青山骑兵支队应分遣部队，立即向中蒙边境一带活动。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等曾亲自领导，中共中央交通局吴德峰等直接主持这项工作。1940 年 4 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派王聚德到绥远敌占区组建了中央社会部绥远站，开展对日伪情报工作和对苏蒙的联系。1940 年 10 月，中央交通局派李春田、林亭等参加骑兵支队，开辟途经大青山地区的国际交通线，中央指示骑兵支队拨一个骑兵连掩护他们的行动。从 1941 年 2 月到 1942 年，他们通过四子王旗中蒙边境线多次往返于乌兰巴托、大青山、延安，传递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许多重要文件，有时还输送物资，护送领导同志。直至 1942 年骑兵支队司令部向偏关转移时为止。以后，中共中央又建立了由延安经伊克昭盟、宁夏、阿拉善旗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交通线。

1942 年 10 月，大青山骑兵支队根据形势的变化撤销建制，塞北军分区成立，继续坚持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

四、抗日游击政权和抗日游击队

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分为动委会和抗日游击政权两个时期。

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同八路军一起挺进绥远敌占区以后，即在大青山游击区广泛进行抗战动员工作和动委会的组织建设工作。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组织与武装群众参加抗战，动员财力物力支援抗战，为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条件，为建立抗日政权打下基础。绥远敌占区各级动委会的建立成为政权建设的初期阶段。

从 1938 年 9 月至 1939 年初，各级动委会组织在开辟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陆续建立。1938 年 9 月 21 日，在绥中大滩成立了大青山第一个区动委会，即武川县三区动委会。参加这个动委会的除了总动委会的干部外，还吸收了包括乡邻间长、有威望的绅商富户、开明地主士绅、农民、知识分子、当地驻军及少数民族代表。在短短数月之内，武川三区动委会征集到大批物资，较顺利地解决了绥中部队的供给问题。10 月以后，绥西动委会、绥中归武陶县动委会、蛮汗山区的归凉县动委会和绥东动委会相继成立。

动员物资、解决军需是各级动委会的中心工作之一。动委会干部深入到各阶层群众之中，反复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积极动员群众为抗日出力。当时主要是动员粮食、马匹、款项、皮衣、鞋子等，动员物资按照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粮出粮、有马出马的合理负担原则进行，即按各区乡财力和住户的收入，以一定比例负担。合理负担政策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战时财政经济所依据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少开明绅士、地主、富户纷纷主动向动委会捐献粮食、皮衣和马匹，有的一次拿出 400 石粮食支援八路军。

组织、武装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是动委会工作的重要环节。1939 年 1 月至 4 月，动委会以春耕生产为号召，普遍组织起农

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等民众抗日团体。此外，动委会干部还深入城镇和平川，组织起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救国会、蒙民救国会等，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各区动委会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到 1939 年底，游击队人数已达 650 多人。

1939 年 9 月，总动委会改称八路军绥蒙总动委会，王廷弼、武达平先后任主任。它的主要工作是动员、组织、武装民众，兼用政府名义实行行政领导并开始政权建设工作，向抗日民主政权过渡。而动员物资等财经工作的组织领导，主要由骑兵支队负责。1939 年秋，在绥西万家沟成立了统筹统支物资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由彭德大任主任。

根据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曾指示逐步将动委会过渡到抗日民主政权。1939 年 12 月，在绥西先后成立武（绥）归（川）县、萨（拉齐）固（阳）县、萨（拉齐）托（克托）县县政府。1940 年初在绥中成立归武县、陶林县，在绥南成立归（绥）凉（城）县县政府。接着成立了绥西、绥中和绥东专员公署。这样，第一批地区和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起来。

1940 年 7 月 28 日，贺龙、关向应发出"建立绥察游击行署之抗日民主政权作为根据地"① 的指示。8 月，绥远敌占区各族各界各党派抗日力量代表会议在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绥西武归县小西梁村召开。这次会议也称绥察人民代表会议，通称西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无党派抗日民主人士、抗日部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方绅士代表和蒙古族、回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79 页。

族等少数民族代表共200余人。会议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共商团结抗日大计，并计划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绥察行政公署。但会议期间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电示，为照顾与国民党傅作义的统战关系，暂不成立绥察行政公署，决定先成立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简称绥察行政办事处，推选姚喆为办事处主任，杨植霖为副主任。会议还批准成立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和萨拉齐、固阳、武归、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集、丰凉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正式取消动委会和筹委会。从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动委会完全过渡到了抗日民主政权阶段。这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胜利发展和游击根据地建成的重要标志。

随着游击战争形势的发展，绥察行政公署于1941年4月15日正式成立，杨植霖任主任，苏谦益任副主任。行署下设民政处，苏谦益兼处长；财政处，处长赵全璧；秘书处，处长马南风；建设处，马南风兼处长；教育处，处长曹振之；蒙政处，处长贾力更。同时成立行署党组，苏谦益任书记，杨植霖、马南风、赵全璧、靳崇智为党组成员。绥察行署辖4个专员公署，绥西专员公署，专员李维中；绥中专员公署，专员程仲一；绥南专员公署，专员杨国兴；绥东游击区专员公署，专员杨叶澎。9月1日，行署增设军事部，于占彪任部长，各专署和县政府设军事科，以加强各级政府对地方武装的领导。1942年秋，绥察行署随部队撤到晋西北偏关，以后改为塞北行署。

在绥察行署的4个专员公署之下，成立了一大批县、区基层抗日政权。绥西专署辖武归县、武固县和萨拉齐县，1942年冬还成立了萨武固包边区联合县。绥中专署辖武川县、归武县和陶林县。绥南专署辖归凉县、丰凉县、和林县、托和清县。以上抗

日民主政府均为高度游击政权，机构人员变动频繁。在大部分相对稳定的县内，设置了区政府。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最基层的政权是乡政权，但其性质不同于区以上抗日政权，而属于革命两面政权。这就是在游击战争的特定环境中，利用绥远敌占区日伪乡政权，以合法的形式为抗日办事，即明里应付敌人，暗中帮助我方办事的乡政权。

在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以后，绥察行署于1941年10月1日公布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①] 明确提出了绥察抗日政权的性质和任务，制定了施政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绥察抗日政权的性质是，绥察境内抗日的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亲密团结起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绥察、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战斗的抗日民主政府。

绥察抗日民主政权具有下列特点：(1)高度游击性。因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高度游击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以在游击战争中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也具有高度的游击性，人称马背政权。(2)区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约占区以上干部的80%，另外还有少数国民党人士和进步分子。(3)以政府名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政府。

绥察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绥察历史上的创举。它与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蒙疆政权相对峙，从各方面公开行使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力。绥察行署先后公开制定、颁发了50多个法令、训令、条例、办法、通令、布告、决定、指示，并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蒙古民族工作、争取与瓦解伪军伪政权的工作、群众工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265页。

作、妇女工作和各项民政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经济工作是巩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绥察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中心内容。从动委会时期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经济工作始终是政权工作的中心环节。绥察行政办事处和绥察行署先后公布了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条例、办法，并纠正了以前财经工作中的一些紊乱现象，逐步完善了财经制度。1941 年 8 月，中共绥察区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绥察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①] 对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绥察行署也对财经制度进行了整顿。

绥察行署按照合理负担政策进行抗日救国公粮、税款和各种军需物资的征收，保证了大青山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武装约 3000 多人的供给和党政军民的经费开支，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游击根据地生产的措施。尽管游击战争环境艰苦，但是各级抗日政府还是力所能及地开展了适合于游击战争环境的各项经济建设。绥察行署颁发了有关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训令和条例，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均创办了铁匠、毡房、熟皮房、马装具小作坊，保证了骑兵军用必需品的生产和自给自足。1941 年，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仅武川、陶林、归凉 3 个县就交纳救国公粮 14 万石，有力地支援了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此外，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还把一部分上好的皮衣和数量可观的款项送到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支援了全国抗战。

与此同时，绥察抗日民主政权和游击根据地全体军民还以巨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敌经济斗争。针对日本侵略者在绥察的经济掠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227 页。

夺，对大青山游击区的严密封锁以及生产贩卖鸦片的“毒化”政策，大青山抗日军民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掠夺、反封锁、反“毒化”斗争。他们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坚壁清野”，粉碎了敌人多次“扫荡”。游击队到处袭击征税抢粮的日伪军，缴获了大批物资。他们还利用适合游击战争的革命两面乡政权，采取各种形式从经济上同敌人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抗日民主政府把反对敌人“毒化”政策，打击与限制敌人生产鸦片作为对敌经济斗争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除了揭破日寇的“毒化”阴谋外，还通过收缴烟土，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对鸦片的生产与贩卖，减少烟毒的泛滥和削弱敌人“以战养战”的力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绥察抗日民主政权是建立在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基础之上的，即建立在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游击队，政权无法存在，而游击队又是在抗日民主政府组建和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的。从绥察行署到专署、县、区政府都有一支人数不等的游击队掩护，政府活动到哪里，游击队也跟到哪里。游击队成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形式，它既担负保卫抗日政权的重任，又配合八路军部队作战，并不断为八路军部队补充兵员。

在绥中，最初成立了武川县三区动委会直属游击队、归武区游击队、陶武区游击队、武川县一、二联区游击队、陶北区游击队等。1940 年又组建了陶林县、武川县、归武县游击队，并成立了几十个游击小组。1942 年 4 月，绥中共有 9 支游击队，计 218 人。在绥西，先后在武归县八区、美岱召、百只户、芨芨梁、固阳四边区组建了小游击队。1940 年 1 月，成立了萨县游击队。1939 年秋，在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领导下建立了蒙古

抗日游击队。在绥南，1939年成立归凉县游击队和归凉县五区、一区、四区游击队。1940年成立丰凉、丰东游击队以及和林县、托县、托和清县二区游击队。到1942年，绥南游击队发展到360多人。

为了加强对各地游击队统一领导和党政机关的警卫力量，中共绥远区委于1940年6、7月间，成立了绥察独立第2支队，简称2支队，于占彪任司令员，白如冰兼政委，统辖绥中、绥西、绥南3个游击大队。1941年8月24日，绥察区党委决定2支队和地方游击队归政府直接指挥调动。12月，2支队番号取消，所属部队归大青山骑兵支队统一指挥。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始终战斗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游击队多次担任锄奸、放哨、侦察、袭击日伪、破坏公路电线、掩护党政工作人员、征收抗日物资等任务。1941年3月，绥中游击队奇袭三道营火车站，获大批武器弹药。萨县游击队从1940年到1945年经历较大的战斗35次。蒙古抗日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就夺取伪军战马60多匹，以后编为八路军正规武装。

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是在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产生、发展、壮大的。它植根于群众之中，同千百万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大青山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游击队并肩战斗，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群众在冰天雪地里，深夜为八路军运粮，有的群众伪装娶媳妇，用花轿把敌人禁购的物资抬出城来。他们充当八路军的向导和耳目，医护了几乎所有伤病的八路军指战员，更有许多群众为掩护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和保护伤病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至于他们为抗日贡献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更是无法计算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大青山抗

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人民群众是抗日游击战争力量的源泉。

第五节　蒙古民族工作与绥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绥西抗战

一、抗战中的蒙古民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怀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为促进蒙古民族的解放和争取蒙古民族团结抗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开展蒙古民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并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加强这一工作。

蒙古民族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中心工作之一，而且也是有关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成为执行团结抗日民族政策的楷模。

1938 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了少数民族工作。西北工委除联系和指导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外，还主管陕、甘、宁、青、绥 5 省工作，包括这 5 个省的蒙族工作和回族工作。西北工委委员张闻天、邓发、肖劲光、高岗、李富春、高自立、谢觉哉、贾拓夫、王若飞、李维汉等都参加了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参加少数民族工作的还有乌兰夫、高克林、孔飞、王铎、刘春、牙含章、刘庚、朱侠夫、刘景平、陈元方、杨静仁、何承华、何长庆、沈遐熙、周仁山、马寅、乌兰、克力更、关起义、张光天、郑义、郭敬、

赵通儒等。西北工委下设民族研究室，专门研究蒙、回民族问题，向中央系统地提供制定有关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依据。

为了深入研究蒙古民族问题，争取和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西北工委先后派人到伊克昭盟7旗和土默特旗进行政治和社会调查。1939年5月，派王铎等深入伊盟，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联络上层王公，发动蒙汉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940年冬至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还组织边区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深入伊盟开展蒙古文化考察。考察组在4个月时间采集鄂尔多斯民歌100多首，考察了鄂尔多斯蒙古族舞蹈和民风民俗，回到延安还举办了蒙古文化展览和蒙古民歌联唱会。

1939年6月21日，当成吉思汗灵榇为避免日寇破坏由伊克昭盟迁往甘肃而途经延安时，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干部与群众2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祭典，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总部代表滕代远、王若飞等参加祭典。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由吴玉章任会长。同时还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1942年5月5日，延安各界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会。这些活动，对促进蒙古族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蒙汉团结都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导蒙古民族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在1937年7月《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1938年11月《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和1940年4月《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等文件中，都对蒙古民族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作出了重要指示。

1940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在进行充分的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代中央拟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 毛泽东批示：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个提纲是继1935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以后，在系统、全面和深入调查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的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民族工作总方针和四项基本政策的具体化。

"提纲"首先以"蒙古民族的特征"为题，简述了蒙古族的历史；分析了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状况，蒙古族内部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汉族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压迫剥削蒙古人，蒙古地主贵族剥削汉族农民等重大社会问题；提出蒙古民族在沦陷区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在政治上处于很少有权利和独立性的附属地位，而且喇嘛教对蒙古民族的毒害也是极其严重的。

其次，概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过程，认为日本侵略者利用大汉族主义对蒙古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蒙汉之间的成见，制造一系列挑拨蒙汉民族关系的口号，拉拢蒙古民族；分析了伪蒙疆政权的特征，指出它的傀儡性质及其内部的蒙古王公上层中有坚持投敌的蒙奸，有的幻想依靠日本侵略者摆脱大汉族主义压迫，有的受日寇威胁而参加伪蒙政权等三个派，指出伪蒙政权与日寇的矛盾和伪蒙政权与广大蒙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因此，日寇与伪蒙政府的统治是不巩固的。

第三，指出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在蒙古民族中的影响，

---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第1118—1125页。

认为清朝以来的大汉族主义者“在蒙古地方实行殖民、屯垦、建省、设治，其结果，就是使广大蒙人从那些原来已经保存不多而较肥沃优良的地方，被排挤到更荒凉的沙漠地带，更陷入极端落后与黑暗痛苦的生活”；大汉族主义者与蒙古最黑暗势力相结合，对广大蒙古人实行专制统治，毫无民主权利；大汉族主义者极力抑制蒙古民族文化的发展，使蒙古人民长期处于文盲和愚昧状态；大汉族主义者极力阻止与压迫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打击革命力量；大汉族主义者激化了蒙汉民族矛盾，制造了蒙汉民族的仇恨与成见，被日寇利用来侵略内蒙古；抗战以来，国民党不仅没有改变大汉族主义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在蒙古民族中实行“防共”“反共”，甚至提出“抗日灭蒙”的口号，阻止蒙古民族的抗日觉醒，破坏蒙汉各民族的抗日团结。

第四，分析了蒙古民族对抗战的态度。首先指出“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直接受日寇统治、压迫、侵略，并且它居住于中日战争极关重要之战略地带，是中国抗战必须争取的力量，所以蒙古民族在抗战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接着分析了沦陷区蒙古民族对抗战的三种不同的态度，除甘心附逆者外，原来幻想利用日寇强化自己统治的王公已开始动摇，由于受日寇压迫而心怀不满的王公开始同情抗战，广大下层蒙古人对日寇与伪蒙政权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而且日益同情抗战，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有了抗战的认识和希望，他们团结在八路军周围，开始了抗日运动；在未沦陷区，由于日伪在蒙古人中的活动及其影响，国民党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以及日伪和国民党在蒙古人中进行“反共”“防共”活动，蒙古人对抗战持冷淡观望和应付的态度，赞助抗战的蒙古王公上层是少数，多数持中立的态度，坚决降日者虽不是多数，而坚决抗日者也还是少数，大部分是中立、

观望者。因此，“蒙古民族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这就是现在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之一。”

第五，探讨了团结蒙古民族抗日的可能性，即日寇是蒙古民族最大的敌人，日伪在蒙人中的欺骗及蒙人对其幻想开始减低；中国坚持抗战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在蒙古人中的政治影响更为扩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对内蒙古抗日的解放运动将会有更大的作用与影响；蒙古民族中有了一部分抗日的先进分子，广大蒙古人的觉醒在增长，大多数王公是可以争取的。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党、政、军、民首先是共产党、八路军要“协同蒙古内部的抗日分子，进行最大的和不断的努力，而其中心关键即在对蒙古民族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予以实力的扶助与推动。”

“提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的基本根据是，一、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并反对伪政府，组织蒙古民族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力量；二、肃清大汉族主义压迫政策，实行蒙古民族在国内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三、实现蒙古民族一切必要与可能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提纲”提出了对蒙古民族的 9 项 26 条具体政策：

一、唤醒并动员蒙古民族推翻日寇的统治，推翻伪政府，将日寇从内蒙地方及中国境内驱逐出去。为此在蒙古民族中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蒙奸及其傀儡政权，揭露其一切欺骗宣传和阴谋诡计；争取伪蒙古军反正，争取伪政府中的蒙古王公，反对出卖民族国家的蒙奸。

二、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为此蒙古民族在敌后有权组织各盟、部、旗、群的抗日政权，并成立统一

的蒙古地方政府，建立抗日根据地；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省县不得干涉盟旗政府在管辖区域内行使政治、经济、文化职权；在蒙古地方设县、治局，必须由蒙古人自愿与自主，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强迫设施，已设县与治局者，应有蒙人参加，税收应有定额，并作为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费用；取消或调整各级管理蒙古事务的机构，设立由蒙古人组成的中央管理蒙古事务委员会，中央政府和有关省政府应有蒙人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在蒙汉杂居的地方政权机关，应有蒙人参加；国民参政会和有蒙古人的地方参议会均应有蒙人参政员和参议员；凡蒙古民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中应设置由蒙古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蒙古人有关的事务，调节蒙汉关系。

三、开放民主，保证蒙古人有抗战建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组织各界各阶层的各种团体参加抗日。

四、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障喇嘛庙，提倡与鼓励青年喇嘛参加生产，反对与禁止任何侮蔑、轻视蒙古民族的言论与行动。

五、帮助蒙古民族改善与提高其人民生活。政府拨款救济牧民，抚恤流亡；禁止强迫侵占蒙古人的牧场与土地，在蒙古人自愿与自主的原则下，实行垦荒，帮助蒙古人赎回抵押的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派捐、派款、征收马匹及无偿徭役，减轻水草税；禁止高利贷及贱买贵卖，调济蒙人日常需用的农产品、工艺品。

六、帮助蒙古的抗日军队，组织与扩大抗日武装，开展并坚持敌占区的游击战争。蒙古民族抗日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改善兵役制度；提高官兵抗日自卫的政治认

识；帮助蒙古人的军事训练，扶助民众抗日武装。

七、实施抗战教育，发扬蒙古民族固有的优良文化与光荣的革命传统，培养抗战建国的人才。设立各级完全免费的学校；全国各重要学校广招蒙古青年完全免费入学，设立蒙民班，要有适合蒙古人生活习惯的设备；成立喇嘛训练班，提高喇嘛的政治文化水平；蒙古民族的文化教育用蒙古语文，蒙古人民有自己选择语文的权利；蒙古青年有自己选择学校的权利。

八、扶助蒙古人民改进畜牧生产，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办毛织皮革工厂，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合作事业与信用借款，发展与提高蒙古民族的经济生活。

九、改善蒙、回、藏、汉、维吾尔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彻底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传统与狭隘的民族观点，教育各族杂居地方的各民族以平等亲爱的态度对待蒙古族人民；蒙古地方的政府、军队也必须以平等的原则对待各民族人民，尊重其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蒙古民族与汉、回、藏、维吾尔等国内各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

“提纲”从蒙古民族的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提出了实现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正确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对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此后制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初步打下了基础。这些政策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都得到了实施。

1941 年 5 月 1 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七条明文规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

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① 同年6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社论，指出“这是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唯一正确的民族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边区政府统一领导下管理境内少数民族的事务。此后，在三边分区的城川还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在陕甘宁边区，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对立，蒙、回等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经济文化方面也得到边区政府的帮助。1941年，从伊克昭盟投奔延安的那素滴勒盖被聘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并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1943年7月31日，当那素滴勒盖因病在延安逝世后，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在临终的遗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是唯一能够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因为他们是真正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先进革命力量，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也就是真正解放蒙古民族的唯一方向。”②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团结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认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动员各民族共同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至关重要。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逐步开展，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热情投奔延安。因此，对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抗战形势、任务、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有计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78页。

② 1943年8月9日《解放日报》。

划地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民族工作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办了两个少数民族班，培训那些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少数民族学员。这是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开始。同年8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随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中共中央和西北工委多次指示大青山地区党组织，从绥蒙地区选送大批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培养。1939年8月29日，第一批蒙古族青年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这批蒙古族青年多数来自土默特旗，共20多人，他们是张录、布赫、云世英、云照光、云曙碧、云治安、云成烈、云生格、云祥生、云玲、云林秀、云晨光、荣志忠、巴增秀、李文精、李永年、金玉、李贵茂、朱玉珊、成义、奇峻山、赵俊峰、张玉庆等。为了照顾这些蒙古族青年的特点，陕北公学将他们单独编队进行教学和生活管理，组成第55队，又称为蒙古青年队。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影响下，一批批蒙古族青年来到延安。仅1939年到1942年，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先后动员、组织了九批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加上部分汉族青年，共有100多人。其中蒙古青年还有云北峰、潮洛蒙、浩帆、赵维新、李振华、达成义、云继光、云曙芬、墨志清、锐军、徐史、黄静涛、黄静波、云志厚、李勇、王淑英、张才旺、李银标、李清、陈炳宇、寒峰、云一立、塔拉、李存柱等几十人。此外，跟随那素滴勒盖起义的30多名伊克昭盟蒙古族青年也编入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6月30日，陕北公学正式组建民族部，共有学员180余人，包括蒙、回、满、汉等民族。

为了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适应更广泛地动员组织各民族参加抗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

立延安民族学院。1941年9月18日，延安民族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全院聚集了蒙、回、藏、苗、满、彝、汉7个民族的200多名优秀青年。其中，蒙古族学员人数最多，占学员总数的40%。到1942年夏，延安民族学院学生增加到300多人，编为7个普通班。延安民族学院的创建，使中国共产党大批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走向正规化，是民族干部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44年夏，民族学院迁到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办学，称三边公学民族学院。1945年3月，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到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内的城川办学，称为城川民族学院，并很快招收了伊盟地区50多名蒙古族青年。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项战略任务，而且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和延安民族学院，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都能够针对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学校的性质和各民族学员的特点，对学员进行革命基本知识和文化教育、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分别开设了文化基础课、政治课和少数民族语文课。这些课程紧紧和抗战实际相联系，和各个民族的历史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和学员的思想实际与文化程度相联系。延安民族学院以“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作为各族师生员工学习、生活的共同准则，树立了良好的校风。毛泽东曾亲笔为延安

民族学院师生题写了“团结”两个大字。[①] 各民族学员之间、师生之间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不允许有任何的民族歧视，少数民族学员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完全受到了尊重。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延安民族学院组成了一个平等民主、团结友爱、抗日的民族大家庭。民族学院师生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和各项文娱活动。经过几年的学习，各民族学员普遍提高了文化水平，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增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民族干部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干部，仅在延安民族学院培养的蒙古族学员就有 150 多人。同时，也为全国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一大批少数民族领导骨干和优秀的民族工作者。经过长期锻炼，其中有不少人担任了中央或本民族地区党政军等重要领导职务，也有不少人成为一些行业的专家或文学艺术家。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对蒙古民族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

八路军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密切联系蒙古族各阶层，在实际活动中切实保护蒙古民族利益，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受到了蒙古族群众的欢迎。在

①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 131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和土默特旗长期坚持斗争的蒙古族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之后，蒙古民族工作更加系统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加强蒙古民族工作的领导，中共绥远省委设立蒙民部，在蒙古族比较集中的绥西、绥中地委和县委设立了蒙民部，同时成立了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在动委会曾设立蒙民工作委员会，在绥察行政办事处及绥察行署下设蒙政处，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个部门，专门处理蒙古民族事务，专署和县政府中也分别设立蒙民部或科。许多蒙古族先进分子踊跃加入抗日阵营，在各级蒙古民族工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开展民族工作的骨干。

从1939年秋到1942年，为了大力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八路军骑兵支队和游击队曾多次护送蒙古族青年往返于大青山、晋西北、延安和伊克昭盟等地。成批的蒙古族青年冲破日伪的封锁和引诱，毅然奔赴抗日圣地延安，这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蒙古民族工作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动员和选送蒙古族青年的工作中，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委负责人贾力更、奎璧、高凤英、李森、勇夫、赵诚、恒升等做了大量工作。蒙古族优秀共产党员贾力更在带领一批蒙古族青年由大青山启程赴延安时，不幸英勇牺牲。

帮助蒙古民族建立抗日武装，是大青山地区蒙古民族工作的又一重要环节。1939年秋在绥西组建的蒙古抗日游击队是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第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李森、高凤英先后任队长，贾力更、徐秉智、彭光华、奇峻山先后任指导员。蒙古抗日游击队在游击战争和争取伪蒙军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抗日行动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绥蒙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不断帮助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使之很好地发挥了号召与团结蒙古民族抗日的作用。1941年，蒙古

抗日游击队担负着为大青山骑兵支队筹集过冬粮食和保护绥察区党委机关、绥西地委、专署的任务。10月28日，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蒙古抗日游击队长高凤英和15名游击队员在万家沟小火烧营地被敌人包围，王聚德、高凤英等12人在战斗中牺牲。

为了争取蒙古王公上层抗日，大青山支队也做了大量工作。八路军攻占乌兰花并释放了被俘的四子王府保安队人员以后，曾与八路军谈判的二喇嘛从此认为“八路军是最好的军队”，四子王旗保安队与八路军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关系。二喇嘛以后住在卓资山以北的红召，这里又成了八路军伤病员的秘密休养所。当守卫红召的蒙古族群众被国民党“自卫军”解除了武装时，八路军又为二喇嘛补充了武器。

团结广大蒙古族群众抗日，是蒙古民族工作的基础。《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作出关于民族平等、不准随意开垦蒙地和干预蒙民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规定。绥察行署还发布《告蒙古同胞书》[①]，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各级抗日政府在征集抗日物资时，对蒙古族群众一般不摊派款物，不增加蒙古族群众的负担。在八路军活动的各游击区，蒙古族群众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与共产党、八路军形成了亲密团结的关系。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如察素齐的沙尔沁、把什、达尔架一带和绥中灰腾梁的那斯太、黄花圪墩、转山子、乌兰合叶、独贵沟一带的蒙古族群众，都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涌现出许许多多蒙汉团结、抗日救国的动人事迹。

在内蒙古的最西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还两次派遣周仁山

①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301页。

等从兰州进入额济纳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并使一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绥蒙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绥远敌占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对此中共中央从方针政策、内容及形式等方面都作过明确的指示，指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坚持绥远敌占区游击战争是不可分离的"，[①] 要按照绥远敌占区的特点，以正确与灵活的政策策略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绥远敌占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有同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有在农村的统一战线，有在城市的统一战线；有同宗教、会门、社会团体的统一战线，还有同伪军伪政权中的非顽固派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工作体现在我党政军各项活动之中，其形式与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如前所述，八路军在开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曾与活动在大青山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建立过良好的统一战线关系。在"自卫军"中的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和投日的情况下，我军曾进行反顽斗争。此后，绥远党政军组织按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重申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抗日大局为重，欢迎愿意抗日的部队、党派、团体及个人精诚团结共同抗日。许多被俘虏的"自卫军"官兵，经教育后被发还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46页。

武器，释放归队，表示要改恶从善，回头抗日。1941 年以后，荀子臣、鄂友三、王有功等又率部到大青山，继续搞反共磨擦，八路军则始终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仍耐心地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在广大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争取团结一切开明地主、士绅赞助抗日，改造乡政权，使之成为革命的两面政权，为抗日办事。开始，以动委会的形式建立农村统一战线，当抗日政权成立后，统战工作便成为政权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经过农村统战工作，绥远敌占区许多开明地主士绅和上层人士靠拢八路军，参加动委会，积极捐献粮草、衣物、皮毛、枪弹支援抗战。经过对伪乡政人员的改造，使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依托地区的大部分乡政权变成了革命两面政权。在游击活动区域也有不少革命两面政权，这些乡政人员大部分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保持抗日立场，成为农村统一战线中的骨干力量。在敌人控制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乡政人员能保持中立。对于少数死心塌地追随日寇的汉奸特务则予以严厉的打击。

在绥远敌占区的大小城镇都有一批爱国商人，他们深受日本侵略者压迫掠夺，有着抗日的愿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许多爱国商人以各种形式支援并参加了抗战。乌兰花镇吉义昌、公义昌、四合成等店铺与八路军长期合作，察素齐、毕克齐一些爱国商人还从包头、归绥购进一部分骑兵用具，提供给抗日部队。

绥远敌占区城乡一些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争取鼓励下也积极投身于抗日事业，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中都吸收了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工作。1942 年，仅绥南地区就吸收 40 多名农村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他们在各项抗日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归绥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国会中，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及其他各界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在绥远党组织送往延安学习的蒙汉族青年中，大部分是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

此外，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还在绥远敌占区天主教会管辖的教堂、教民中以及哥老会、家理等会道门组织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争取一切爱国力量抗日。

伪军工作是绥远敌占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又具有特殊性。绥远党政军各系统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从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出发，积极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大青山八路军在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及时与伪蒙军第1、2、3、6、7、9师所属部队建立了联系，有的还与我军订立秘密协定，不干涉我军行动，为我提供情报及军需品，有的在被迫与八路军作战时，故意朝天放枪。在绥西，地下党员和八路军干部较早地对伪塞外防共自治军第2师进行争取工作，使该师师长韩伍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并信守诺言，为八路军购买了许多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医药用品，并在整个防共2师中扩大了抗日影响。但由于少数干部未注意隐蔽政策，公开教唱抗日歌曲，防共2师被日军缴械。韩伍逃出后又招集旧部，在八路军帮助下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后韩伍被内部奸细所害。绥远党组织还在伪蒙军18团、伪蒙军第7、9师中进行争取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绥察行署先后发布《关于动员伪军反正爱国的布告》、《告伪军暨伪政权同胞书》等文告，给伪军指明了弃暗投明、反正爱国的前途。到抗战后期，绥远敌占区伪军哗变、反正和投奔抗日阵营者日益增多。

同傅作义将军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部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绥蒙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内容之

一。在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和历次关于绥蒙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都反复强调了同傅作义部队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抗战初期，傅作义将军也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抗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且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1937年，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傅作义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多次交谈，使傅作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1938年初，傅作义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山西离石县柳林镇时，毛泽东派曾三、程子华与他会谈合作抗日事宜。随后，傅作义派周北峰去延安谒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其巩固部队。不久，中共中央应傅作义的请求，从延安数次选派共产党员和抗大学员、民先队员到傅部，并指示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和八路军120师选派潘纪文为特派员，协助傅作义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和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3700多名新战士，补充到傅作义部队中，增强了傅部抗日的实力。4月间，傅作义率北路军发动绥南战役，先后收复清水河、和林县城，并攻至归绥以南的一间房一线。但在日伪优势兵力的夹击下，傅部向晋西北撤退，八路军120师及时予以接应。6月，北路军总部移驻河曲，继续与八路军接触。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不在友军中发展党员的指示，派南汉宸、罗贵波到河曲，向傅作义提交了在傅部帮助工作的5名共产党员的名单，以便开诚布公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傅作义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率部进入河套地区以后，在傅部帮助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也随之到达。这时，中共中央又派南汉宸、肖克、曾三等到五原与其会谈。在同共产党人的

交往中，傅作义学到了共产党开展政治工作和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的许多经验。

从1938年秋到1939年上半年，在傅部35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除了公开身份的潘纪文、左青、黄建拓、黄克、赵会山等，还有未公开身份的冼依、鲁志浩、杨子明、吕林等近百人。在傅部进入河套之前，中共绥西工委和河套特委已加强了河套地区的工作。傅部进入河套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河套地区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傅作义共同抗日，形成河套地区全面抗战的局面。傅作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35军逐步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军、师、旅、团设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数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如潘纪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左青任宣传科长，鲁志浩任新31师政治部主任。他们在35军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唱抗战歌曲，学习进步书报，提倡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进行军容军纪的整顿，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在共产党人的宣传、教育、影响和帮助下，提高了部队官兵的爱国思想，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从而使35军士气大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此基础上，傅作义加强了对部队的整顿和军事训练，将35军补充为三个师。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统一思想，改革地方行政工作，实行军民抗战，1939年3月下旬在五原新公中由傅作义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傅部高级幕僚和共产党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着抗日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讨论，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右派代表在是否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等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共产党代表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拥护。傅作义与共产党代表在必须调动全民族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议决定成立绥远抗日动员委员会，并研讨了绥西抗战形势。这次会议后被追认为第一期“抗战建国讨论会”。

1939年5月，傅作义在百川堡正式主持召开了“抗战建国讨论会”，即第二期讨论会。至7月底，讨论会共举办五期，历时3个月。讨论会将地方区以上，军队营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轮训，参加者近千人，河套地区许多公开和秘密的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抗战动员工作，并增加军事训练课目，会场上还张贴着“抗战不分东西南北，建国不分男女老幼”等标语。这次会议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实行全民动员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为此后绥西抗日战役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绥远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宣布成立。这是战时动员兼办地方行政工作的机构，分省、县、区、乡四级。省动委会主任由傅作义担任，副主任袁庆曾，下设组训、宣传、军事、妇女、动员、报社等组、室，中共党员潘纪文、武践实分别任组训组组长和主任，李特（女）任妇女组组长。五原、临河、安北3个县的县长和动委会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各县所属9个区的区长和区动委会主任，有7个区由共产党员担任。

绥远省动委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产生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民三位一体的抗日组织，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实施。中共河套特委和35军中的党组织利用动委会动员、组织群众，支援抗战，并壮大了党的组织。动委会为傅作义部队征集了大量新兵和粮食、草料，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大充实了傅部力量。为配合部队作战，动委会把村民编为团队，按年龄体质分别组成自卫队、担架队、运输队和儿童团。妇女组成立了救护伤员队、缝纫洗衣队，流动宣传队则用自编的节目进行街头、村头抗

日宣传，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整个河套地区抗日气氛十分浓郁。动委会的工作为傅作义部队进行绥西战役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党员在傅作义部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引起国民党中央的疑虑和不安。百川堡“抗战建国讨论会”期间，在傅部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八路军“游而不击”，大肆进行破坏捣乱。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彝鼎、国民党中央委员姚大海等分别向傅作义施加压力，鼓动傅作义排除共产党。傅作义迫于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于 1939 年 7 月将潘纪文等一批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撤销职务，“礼送”出境。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傅作义也加紧了排共、反共活动。从 1939 年 9 月到 1940 年底，先后有 100 多名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和革命青年离开河套返回延安。1941 年，河套地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被捕。这样，中国共产党同傅作义部队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1942 年夏，傅作义在河套实行新县制，取消了各级动委会组织，河套由原来的 3 个县改为五原、临河、安北、晏江、米仓、狼山 6 个县。

三、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西抗战

傅作义将军是国民党著名的爱国将领。自 1933 年的长城抗战，1936 年底的绥远抗战，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他一直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前线。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傅作义将军又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在总结多年来抗战经验和部队经过整顿，精神面貌、物质条件都已改善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了包头、绥西、五原 3 个战役，写下了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包头战役，是傅作义部队变战略防御为战术进攻，出敌不意，主动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一次奇袭。

1939年冬，日军陷长沙、南宁，南方形势紧张。国民党军事当局为牵制华北日军南下，曾命令傅作义部出击乌拉山后之大佘太一带敌人。傅作义认为攻击这个目标，对日军不关痛痒，只有进攻与河套相邻的敌人在华北的重要战略据点包头，方能收到牵制敌人的功效。

包头是敌人必守的重点和准备继续西犯的据点。是时以小岛吉藏中将为首的驻蒙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及主力一部驻包头，骑兵第1旅团、骑兵第13、14联队分驻萨拉齐、固阳和安北。在包头周围还有伪蒙军5个师，城内筑有以钢筋水泥碉堡群为骨干的坚固工事。傅作义部队的情况是：由傅作义兼军长的35军，下辖董其武101师，孙兰峰新31师，袁庆荣新32师以及军直骑兵团、炮兵团，还有游击军两个旅。此外，属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指挥的部队，还有骑兵第6军军长门炳岳兼师长的骑7师，五临警备旅，宁夏马鸿宾35师和骑兵旅，以及由反正部队改编的部分游杂部队。

傅作义客观地分析了双方兵力情况，决心进攻包头，决定用长途奇袭和攻城打援战术攻占之。首先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如在驻地构筑防御工事，让敌人以为毫无进攻意图。同时又考虑到进攻包头之后，敌人可能向河套反扑，于是将大批粮秣弹药埋藏在河套的沙窝和狼山南麓，作长期作战的准备。而后下达作战命令，由骑7师破坏归绥至萨拉齐的铁路，并阻击增援包头之敌；以新31师及五临警备旅1个团为主攻部队；以新32师截击固阳、安北之敌并及时援助攻城；以101师为总预备队，协同攻城、阻敌；以宁夏35师守备河套。

12 月 19 日凌晨，攻城部队急行军来到包头以北黄草洼附近。这时傅作义得知骑 7 师已于 18 日破坏了归萨间铁路并与伪军激战，乃决定 19 日夜开始攻城。当安春山指挥的 93 团进抵包头西北城门时，守敌大部分在熟睡，于是抓住战机，组织突击队登城。93 团一个营在城上的两个伪蒙军哨兵协助下，迅速全歼了守西北门的日军数十人，并打开城门。傅部又有一个团和几个连趁势攻入城内。在沉睡中的日军，突闻枪炮声，仓促应战。进城部队直指日军指挥部，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包头居民纷纷为部队送茶饭，指引道路。到天明时，许多敌军被消灭，大部敌军退至日军司令部大院，凭借优势火力拼死顽抗。城区虽大部为傅军占领，但是后续部队未能及时大量地攻进城内。

20 日至 21 日，由固阳、安北增援的日军赶到。101 师、新 32 师凭借有利地形予以阻击，并将援敌包围，歼敌大部，同时俘虏伪蒙军近 300 人。但与援敌的战斗迟滞了部队向城边靠拢的速度。21 日下午，张家口、大同、归绥等地的大批日军陆续开来，与傅作义部队在黄草洼一带展开鏖战。敌人以飞机、坦克、大炮轰炸扫射，傅部损失很大，战斗持续到 21 日夜。这时傅作义看到奇袭包头、牵制日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且继续恋战，恐遭更大损失。于是下令撤退，首先掩护攻城部队出城，其他部队向五原转移。12 月 24 日，傅部主力退到中滩，日军追兵亦撤回。

包头战役击毙日军骑兵第 14 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等日伪军众多，俘伪团长 1 名及伪军数百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并牵制了晋北、察南及华北的部分日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傅部官兵也伤亡千人以上。

绥西战役，是傅作义部队在敌人大举进攻河套的情况下，采取避敌锋芒，打其侧翼，以游击战术困扰消耗敌人的战役。

傅部奇袭包头，不仅使敌人大为震惊，而且深感傅作义部队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于是敌人扬言要“膺惩傅作义”，“彻底消灭傅作义军”。从1940年1月14日开始，日军驻蒙军第26师团、骑兵集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主力和从平绥、同蒲沿线各地抽调过来的第27师团、110师团、37师团、41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第16旅团的各一部兵力[①]以及伪蒙古军6个师，配属汽车千余辆、坦克数十辆及大炮飞机，准备向河套地区大举反扑。1月28日，日伪军统由坐镇包头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指挥，分3路向河套进犯。

此时傅作义部已做好准备，决定以主力在有利地区布置预设阵地，诱敌深入，一举将敌主力夹击歼灭于运动之中。若不成功，立即改变方式，主力隐蔽，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术，阻止、袭扰和消耗敌人。战斗打响后，骑7师在马七渡口与日军激战一天，旋退至黄河右岸。而在乌不浪口奉命抵敌的宁夏35师，一经敌人猛冲，便败退下来。101师利用城堡、围墙反击敌人，后进入狼山湾休整。新31师、新32师分别阻敌后亦各自转移。傅作义指挥部设在伊盟圣纳格尔庙。第一阶段战斗，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傅部受到较大损失，日军占领了五原、临河、陕坝及三盛公等地。但因傅作义部主力及时转移，加之地方群众空室清野，日军占领之处所得无几。而日军却扬言傅军已全军覆没，并委任大汉奸王英为“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在五原设立日本特务机关，成立了维持会。

2月5日以后，傅作义令各部队灵活机动、分区游击，继续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第1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袭扰敌人，并造成敌人补给上的困难。日军虽侵占了河套一些县镇，但消灭傅军主力的目的未达，锐气渐衰。临时抽调的东线部队亦深恐旷日持久，后方空虚，急需回防。至2月底，日军主力逐次撤离绥西，分别回驻原防地，仅在五原地区留驻伪绥西自治联军、伪蒙军三个师和日本五原特务机关、宪兵队、汽车队以及由察南、晋北调来的伪警察队等，总兵力约1万余人。后守备河套之敌又放弃陕坝、临河，驻守在丰济渠以东，企图随时依靠包头方面机械化部队援助，长期占据五原。傅部收复临河、陕坝后，集结兵力于丰济渠以西，与日伪军形成对峙局面。绥西战役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消耗、疲惫了敌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傅军主力的计划。

五原战役，是傅作义部队与河套人民群众收复失地，奋勇杀敌，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役。

1940年2月底，傅作义在临河县亚麻来村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研讨攻取五原的策略，决定整训补充部队，发动群众备战，于3月中旬进攻五原。

傅作义认为，从河套敌我力量对比看，我占优势。关键是如何有效地阻止敌人援兵。根据历年经验，黄河在春分前后开河解冻，若利用这一时机掘溃乌加河，放水泛滥，使南北两条大路泥泞翻浆，就可使敌人机械化部队无法进行增援，而五原之敌也逃窜无路，这是天时；我方对作战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这是地利；我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正义在我方，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均在我方，这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傅作义首先从部队中挑选勇敢精壮、有作战经验的官兵800余人组成掏心突击队，准备直捣敌五原司令部。令新31师、五临警备旅主攻五原新城，新32师攻占五原旧城及附近地点，101

师负责于乌加河一线阻敌援军，其余各部配合作战。

3月20日夜，各部统一行动，展开了攻取五原的战斗。傅部800名敢死队员用“掏心战术”突进五原城内，攻城部队随后涌入，分割包围了日本特务机关、绥西联军司令部及各据点，义和渠以东日伪军大部被歼，残敌纷纷逃集日军指挥部负隅顽抗。傅部官兵猛烈冲击，以炮火摧毁敌工事，捣毁了日本特务机关和王英的司令部，收复五原新城。

新32师进攻五原旧城及周围据点时，遇到伪蒙军顽强抵御，双方伤亡众多，袁庆荣师长负伤，赵寿江营长及全营官兵几乎全部战死，仅余7人。增援部队赶到后，于21日收复五原旧城。22日，驻五原的日伪军大部被歼。

21日下午，日军增援先头部队乘汽车百余辆到达乌加河。随后几日，大批日军赶到，但桥梁早已被毁。101师隔河向敌猛烈射击，阻敌架桥，双方展开炽烈的拉锯式血战。日军为河所阻，焦急万分，集中十余架飞机，数十门火炮，疯狂攻击301团阵地。301团官兵伤亡极重，仍继续还击。敌倾全力，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用橡皮船渡河。是时五原新旧城已全部收复，傅作义遂下令101师转移。日军进入五原时，五原城已成一片废墟。城外游击部队不断袭击，敌人不敢继续停留，只携带数百具敌尸骨灰，循原路退返包头。

至3月23日夜，五原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此役，击毙日军大桥大佐、五原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等，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俘敌300余人，缴获大炮16门，汽车50余辆和大批武器弹药。五原战役被当时报刊称之为“五原大捷”，举国欢欣。国民政府特电嘉奖，并授傅作义将军“青天白日勋章”，国内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或派代表团前来慰问。战役结束后，

傅作义在陕坝隆重举行了慰劳军民庆功大会。

傅作义将军发动和领导的包头、绥西、五原战役，经100多天连续战斗，终以五原大捷宣告结束。经过上述战役，不仅有效地牵制了华北日军兵力，而且肃清了侵入河套的日伪势力，巩固了大西北的屏障。五原战役也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颇大。

绥西三战役取得这样的胜利，有以下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在于以傅作义将军为首的广大官兵有着坚决抗日的爱国热情。绥西三战役，正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主力退居重庆、西安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之时进行的。当时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消灭新军，而傅作义没有参加反共军事行动，却取得了抗日战役的胜利，这表明了傅作义将军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区别。在绥西三战役中，许多爱国官兵为国捐躯，仅在五原战役中阵亡的官兵就有679名，其中排以上官佐45名。[①] 在包头战役中，城内有7名战士未及撤出，他们孤军奋战，绝不投降，直到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其次，在于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绥西三战役时，35军中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多数还留在部队中，动委会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共河套特委大力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并在临河马场地组建了一支百人抗日游击队——战地服务队。敌人占领五原之前，中共五原县委带领群众拆除了五原隆兴长的城墙，使敌人无垒可守，为克复五原清除了障碍。广大群众更是同仇敌忾，多方支援部队。在五原战役中，乌兰脑包群众掘开了乌拉壕，灌注了乌加河北岸，断绝了敌增援部队由乌不浪口至五原的

① 《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六辑，第202页。

通路。当6名日军逃至五原城东30余里的农民王大老虎家时，王与其弟王二老虎协同邻人用菜刀铁锹将日军全部砍死，割下首级送到董其武师部。百川堡附近小脚老太婆刘大娘，发动该乡妇女抬运伤兵，送水送饭。再有傅部303团团长宋海潮在乌加河阵地受重伤，大肠外露；后为老乡刘大宽、郭四毛旦发现，即抬回村护养，使其生还。在整个战役过程中，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所以，五原战役的胜利，是爱国官兵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深入发动群众、支援抗战的结果。

第三，在于八路军的配合作战。当傅部奇袭包头时，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为阻敌西进，攻占了毕克齐敌据点和旗下营火车站，一度截断了平绥路交通。八路军陕北骑兵团中滩游击队还直接参加了进攻包头和在绥西阻击敌人的战斗。由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敌人的牵制，加之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西战役的胜利，才使日军未能大规模继续西犯。这一时期傅作义部队和八路军的对日作战，构成了绥蒙地区国共合作抗战的良好范例。

第六节　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

一、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的抗日活动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内蒙古东部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七七”事变以后，又发展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从 1939 年底至 1942 年，三进呼伦贝尔广大地区，同呼伦贝尔各族人民一道，竖立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北抗日联军于 1937 年发展到 11 个军，以后逐步编为第 1、第 2、第 3 路军。1939 年初，在北满地区的抗联第 3、6、9、11 军统编为抗联第 3 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1939 年冬，在敌强我弱、环境困难的关头，抗联部队又整编为 12 个支队，抗联第 3 路军辖第 3、6、9、12 支队。

日本关东军在 1939 年诺门罕战争中失败以后，更加紧了对抗联的“讨伐”。中共北满省委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开辟新的游击区，并准备把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林区变为抗日联军的总后方，同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12 月，抗联第 3 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北满省委的决定，组成西北远征军指挥部，任命原 6 军参谋长冯治刚为指挥，王钧为政治部主任，率军直教导队和 12 团骑兵，首次进入呼伦贝尔。

冯治刚率 100 多名抗联战士，越过冰封的嫩江，进入今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进入这个地区。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汉、满、蒙等民族杂居的地区。抗联队伍到达莫旗北部的小库木儿屯，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该屯德高望重的达斡尔族老人孟哈苏代表全屯群众表达了他们愿与抗联共同抗日的决心，并让他的儿子与冯治刚等成为结拜兄弟。部队在深入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方针后，北进太平庄，与一支伪警察大队相遇。这些伪警察都是达斡尔族，为了尽量争取这些受敌欺骗的少数民族，冯治刚让抗联干部祁宝贤等喊话，不料祁宝贤被伪警察开枪打死。在此情况

下，抗联部队迅速包围了伪警察队，将其大部俘虏，经教育后又全部释放。这是抗联在呼伦贝尔的首次战斗。

1940年2月3日，抗联队伍进入阿荣旗三岔河流域的五马架屯。傍晚，一个联队的日军乘30多辆汽车向五马架屯冲来，双方展开激战，抗联队伍在天黑后摆脱了敌人。4日，抗联部队又在三岔河任家窝棚与敌遭遇。在战斗中冯治刚等5名抗联干部战士英勇牺牲。次日，王钧率部队消灭30余名敌人后突围。

冯治刚牺牲后，抗联部队继续转战于林海雪原，多次袭击日军山林守备队，在乌奴尔林场营救了200多名伐木工人，并缴获大批物资。这支抗联西北远征军，在呼伦贝尔地区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纵横千余里，打击敌人，宣传组织群众，播下了抗日的火种，初步开辟了一些游击活动区。3月底，部队返回嫩江以东，向军部汇报情况。

1940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决定继续开辟呼伦贝尔游击区，同时期望尽可能打开一条通路，沿呼伦贝尔南下，和冀热察八路军取得联系，以便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部派遣第3支队第二次进入呼伦贝尔地区。

3支队由原6军3师师长王明贵任支队长，原北满省委委员、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任政委，王钧任参谋长。3支队首先进入阿荣旗，在宝泉镇缴了一个伪警察署的枪，随后转入边壕以北活动。敌人察觉后，从齐齐哈尔派大批部队赶来讨伐。11月30日，3支队在阿荣旗鸡冠山与日军相遇，支队7、8两个大队分路突围。日军用优势火力切断了抗联两支突围队伍的联系，双方展开激战。支队政委高禹民等8人为掩护大队突围，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5人被俘。3支队在打死日军1名高级指挥官，打伤多人以后，分散突围。不久在郭家窑一带将队伍重新集结起来。

12 月，3 支队在阿荣旗的金山屯、西靠山屯等处与日军和伪兴安军组成的讨伐队多次战斗，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部队越过布特哈旗、绰尔河，一直到伊敏河上游的毕里图，进入今鄂温克旗草原，试图穿过西部草原到热河与八路军联系。然而这里距热河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仍有大批日军、伪兴安军和白俄匪徒尾追，在旷野中行进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 3 支队决定返回嫩江以东。途中与白俄匪徒和伪兴安军交战两次，取得了胜利。1941 年 1 月，3 支队退入苏联境内休整。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数十万人企图从远东进攻苏联，策应德国法西斯，在北满和呼伦贝尔地区布置了大批军队。抗联 3 路军指挥部命 3 支队三进呼伦贝尔，继续在布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博克图、牙克石一带发动各族群众，扰乱敌人后方，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这时，3 支队由王明贵任支队长，王钧任政治部主任，陈雷任宣传科长。

7 月，3 支队第三次跨过嫩江进入今呼伦贝尔盟，在阿荣旗北部和莫力达瓦旗格尼河两岸农村活动，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国会，袭击了格尼努图克伪警察所，惩办了汉奸。是年秋冬之际，3 支队北进，深入博克图。10 月 1 日，3 支队由达斡尔族猎民孟德仁带路，奇袭了日伪盘踞的伊列克得沟 26 公里的满铁林业所，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日本把头川崎，缴获一批军用物资和马匹，向当地工人宣传了抗联的宗旨，然后进入大兴安岭腹地小二沟、阿里河鄂伦春族聚居区。

3 支队在原始森林里遇见了以盖山为首的鄂伦春族部落。抗联部队经过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主张，很快赢得了盖山头人的信任。盖山提出要支队领导人与他们结盟，支队领导尊重鄂伦春族同胞的风俗，与盖山等结为兄弟。从此，这个部落的鄂

伦春人真心实意地帮助抗联，一部分鄂伦春青年猎民还参加了3支队，盖山的女儿占柱梅也成为抗日积极分子。在盖山等协助下，3支队还成功地袭击了日本经营的“义合公司”。

此后，3支队转战到牙克石以北的扎顿河一带。11月间，3支队在林场工人的带领下，夜袭了扎顿河日军山林守备队，打死敌军十余人，将伪山林警察队1个连全部缴械，并动员获得解放的伐木工人100多人参加了抗联，壮大了队伍。

1941年底，3支队离开呼伦贝尔地区，在呼玛河一带整训月余。时值严冬，部队衣食困难，在库楚河西山经过与敌人的一场残酷战斗，受到很大损失。直至1942年初，3支队被迫进入苏联境内休整。

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3路军总指挥部于1941年9月又派第9支队进入阿荣旗、莫力达瓦旗一带，在政委郭铁坚、参谋长曹玉奎等率领下，发动群众，建立地方组织，准备与3支队一起活动。9月下旬，9支队一个分队涉过嫩江，到达莫力达瓦旗北部的郭尼屯。由于特务告密，9支队被大批日伪军包围。经过一整天战斗，9支队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次日，敌人又调重兵围攻，支队政委郭铁坚、参谋长曹玉奎等大部分指战员壮烈殉国，仅有指导员孙志远带领十几人突围，在群众掩护下进入阿荣旗。但是，孙志远等始终没有找到3支队，他们便在三岔河、五马架、石家窝棚、沃尔会河一带坚持斗争。1942年秋，9支队全部撤往苏联。孙志远带6名抗联战士一直在阿荣旗活动到1943年6月，最后也过界到了苏联，与李兆麟带领的抗联部队会合。

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历经千辛万苦，前赴后继，在呼伦贝尔广大地区展开了抗日游击活动。抗联部队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抗日，粉碎了敌人

多次围剿和挑拨我国民族关系的阴谋，并且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有力支持。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朝鲜、蒙古、汉族群众和抗联战士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抗联部队在同武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日伪军的多次战斗中，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200 多名抗联干部战士长眠在呼伦贝尔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不仅扩展了抗联活动区域，而且为推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八路军在热河的抗日斗争

1938 年下半年，在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和冀东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以后，逐步开辟了冀东抗日根据地。1941 年，晋察冀边区领导的中共冀东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决定巩固和扩大冀东根据地，派部队和工作人员挺进热河南部地区，打开伪满洲国的大门，以冀东为依托，开创热南抗日游击区。在包括宁城、赤峰、喀喇沁右旗在内的热南地区开辟抗日游击区，对于沟通关内和东北的交通要道，打开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给在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带来抗日的信心和希望，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在抗日反攻阶段到来时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打下基础。

1940 年 8 月，冀东党组织和八路军负责人李运昌，派周治国等领导的工作组在热南迁安、青平一带组织了游击队。随后，周治国又派李青山等 6 人深入承（德）平（泉）宁（城）地区活动。10 月，在宁城县霍力霍川一带争取了当地的红枪会、黄枪会，组建了一支 24 人的游击队。年底，在宁城霍力霍川、驿马

吐川、八素台等地，都有了游击队的活动。

1942年5月，冀东根据地组织路北武装工作队28人，开辟承平宁地区工作，建立了4个区级抗日政权。11月，冀东军分区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向北向东发展”的指示，派主力部队11团和12团700余人跨越长城进入热南。11团参谋长高桥率200余人攻占了宁城洼子店、黄土梁、八里罕等伪警察署，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1943年2月，主力撤回关内，高桥率11团2连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并于4月攻下宁城榆树林子“组合”。承平宁地区抗日斗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宁城成立了第5、第6两个抗日区政权。

1943年5月，中共冀东地委决定正式建立承平宁联合县，分别设立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任命黄云（杨雨民）为工委书记，周治国为办事处主任。为了更迅速地扩大和巩固承平宁抗日游击区，配合联合县的工作，冀东军分区于6月组建了冀东军分区第3区队（相当于团的建制），开赴承平宁地区。第3区队由高桥任队长，黄云任政委，下辖两个连，一个侦察通讯排以及电台队和副官处，共约500人。3区队成为这一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承平宁联合县党政军组织机构成立以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先后建立起8个区级抗日政府，其中的3区、5区、6区、8区都建立在宁城县境内，在宁城还发展党员21名。同时，积极联络各族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宁城八肯中章京营的一个蒙古族地主，经我抗日干部争取后，毅然辞去警察署长职务，转而为抗日做地下工作，并为我提供情报和枪支弹药。

3区队和地方游击队在1943年和1944年，同日伪军进行了

多次战斗，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43年8月，3区队和游击队打死窜到宁城、平泉组织伪协和会的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和宪兵队长夏谷，袭击了宁城黑里河川头道营子和三座店敌据点。9月，消灭了驻宁城驿马吐川谢杖子据点的山本守备队，打死日军25人，随后又在下坡子战斗中生俘伪警察97名，拔掉了驿马吐川敌据点。

1944年初，在供给困难和敌人对游击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联合县工委和3区队决定攻打宁城县城小城子。2月6日夜，3区队、游击队和抗日群众经过1个多小时战斗，攻克了宁城县城和伪警察署，俘伪警官4名及伪警察多名，缴获布238疋，伪满币10万元和大批军用物资，击毁敌汽车一辆。尔后，部队和群众连夜搬运物资转移。攻克宁城县城的战斗，使热河日军大为震惊，人民群众则受到很大鼓舞。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也登载了这一胜利的消息。

经过连续不断打击敌人，承平宁联合县游击区日益巩固和扩大。1943年7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又指示游击区应努力向东北发展。3区队多次深入喀喇沁右旗活动，许多地方干部先后被派往宁城北部、赤峰南部。承平宁抗日游击区实际上形成了以宁城为中心，东至朝阳、凌源、建平，西至围场、隆化，北至赤峰，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在中心地区还建立了相当一部分抗日的两面政权。

从1941年冬开始，日本侵略者为了剿灭热河的抗日斗争，割断人民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实行了极为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即把几个或数十个村庄的群众都集中到公路、铁路沿线的一个村庄居住，并在四周修上围墙，谓之“集团部落”。到1943年末，仅宁城县就有430多个自然村，19000余人被赶入部落。同

时，日伪采取围剿东北抗联的办法，组织许多讨伐队围剿我军政人员。特别是宁城一度被八路军攻占后，关东军及伪热河警备司令部、辽宁第4军管区等调遣7个讨伐队，连同日军共万余人，对承平宁地区进行反复“扫荡”，经济上严密封锁，使热南抗日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时期。

袭击宁城以后，承平宁工委和3区队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进一步坚持游击战。1944年3月下旬，承平宁地区日军兵力激增，3区队在敌重兵包围中连续战斗，减员严重。经研究，决定部队立即转移，主力回关内，一部分人在赤峰、围场间活动，由队长高桥带一个排坚持宁城一带，牵制敌人。

1944年3月29日，高桥等22名战士在宁城八素台双庙村附近的老戚沟被日伪讨伐队包围。高桥沉着地指挥并掩护大家突围，同200多名敌人顽强战斗，最后高桥等9人壮烈牺牲。在此之前，承平宁工委组织部长陈革率领的一支游击队也被敌人包围，全部牺牲。4月25日，赵洪武带领的游击队在宁城大双庙龙潭沟与敌激战后，18人被俘。敌人对他们威胁利诱，逼迫他们投降。赵洪武等18名英雄视死如归，没有一个投降，凶狠的敌人将他们一个个杀害，最后敌人来到年仅16岁的丙丁火身边，恫吓其投降。丙丁火痛骂敌人，最后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党政军组织在反“扫荡”中受到了很大损失。至1944年9月，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地方干部陆续撤回关内。

在热河南部的抗日斗争中，人民群众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战时期宁城县有210人参加了八路军。人民群众在生活上、物资上给八路军以巨大支援，许多人为掩护八路军舍生忘死。宁城四道沟的姜廷怀父子和本村7名群众为保守八路军活动机密被敌人抓入监狱拷打，4人被折磨而死，却无一人泄漏机密。霍力霍川妇

女修桂英3年如一日，每天爬山越岭，在深山里前后护理过八路军伤病员14人。宁城黑里河川青年郭春年、黄茂荣反对敌人集家并村，在山上的小窝棚里先后养护了8名抗日战士，黄茂荣的父亲因此被敌人抓去打死。

1945年2月5日，中共冀热辽边区委员会、冀热辽军区和行政公署按照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的战略方针，为恢复热河地区的抗日斗争，创造解放东北的前进阵地，作出《关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派3支北进支队挺进热河，逐步恢复了热南的抗日局面。5月，又成立了宁（城）赤（峰）联合县，由夏洪林任中共宁赤联合县工委书记，张立文任办事处主任。6月，由郝福鸿率领的中路北进支队在宁城八素台、公爷府等地开展活动，张立文等在宁城大明、二龙、汐子、一肯中、八肯中等地恢复工作。他们一直坚持斗争，直至日本投降。

第七节　坚持抗战夺取胜利

一、坚持大青山敌后游击战争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苏联的战争。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更集中日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残酷的“扫荡”。解放区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

运动”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伪蒙疆区域，特别是在大青山地区，则连续推行了几次“施政跃进”运动。内蒙古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出现了极端困难的局面。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合时宜的政策，开展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内蒙古敌后抗日斗争的形势，在详细听取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报告以后，中央书记处于1941年8月9日发出《对大青山工作的意见》，[①] 指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战略意义甚大，要求得长期生存，应根据大青山地区的实际，保持大青山为游击区，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认为大青山抗日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成绩，号召党政军领导同志亲密团结起来，去对付艰苦的斗争，并且在组织方面作出了加强大青山地区统一领导的决定。1942年2月5日，中共晋西区委员会也作出了《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详细总结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困难时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指出：“今后绥远工作的总方针不在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在于组织数量庞大的党和骑兵，而在于坚持游击战争，坚决执行隐蔽政策，积蓄力量，以备将来。”[②] 中共中央和晋西区委的指示，为战胜严重困难，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大“扫荡”。为了“迅速恢复蒙疆地方的治安”，扫除其阴谋配合法西斯德国而北进苏联和准备对苏蒙作战的障碍，日本侵略者对大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87页。
②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24页。

青山地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攻的“总体战”，同时还准备对游击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7月18日至21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连续视察了张家口、包头、归绥和大同，作了亲自部署。7月25日，驻蒙军出动日军一个机械化师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以及驻绥远晋北的伪军，总兵力近30000人，在飞机配合下，首先分5路对大青山绥中游击区进行“铁壁合围”，妄图一举围歼大青山军政领导机关和骑兵2团。

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在绥中大滩、聚宝庄等地活动的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部、绥察行署机关、骑兵2团、绥中地委、专署及武川、陶林县政府和游击队处于严重关头。他们根据晋绥军区指示，经过周密侦察，决定在张达志、苏谦益等率领下，分路与敌周旋，尽快突围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挫败敌人的计划。骑兵支队主力在绥中银矿山等地与日伪军周旋整整8昼夜，于8月2日夜胜利突围，越过平绥路，到达蛮汗山区。绥察行署机关及所属游击队也历经艰险，于8月4日夜突破敌人封锁线，转移到绥南游击区。8月7日，突围部队与骑兵1团会合于抢盘山。

当敌人发觉我主力转移后，一面继续在绥中“扫荡”，一面组织兵力围追堵截。至8月17日，敌人在绥南地区已集中兵力8000余人。在此情况下，我军政领导机关和骑兵主力决定采取适合游击环境的隐蔽斗争方式，与群众打成一片，继续坚持绥中、绥南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雁北右玉山区和晋西北偏关方向转移，待机回师绥南、绥中。8月底，绥察行署机关抵偏关。9月2日，“扫荡”绥中的日军主力陆续撤回，绥中秋季大“扫荡”基本结束。在此期间，骑兵支队主力与敌人战斗多次。9月中旬，日伪军又被迫停止了在绥南、雁北的围追堵截。此后，

我骑兵主力以偏关、雁北为依托，在长城内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敌人不甘心在绥中、绥南"扫荡"计划的失败，10月15日，又以6000千余兵力突然对绥西游击区展开"梳篦式清剿"。绥西领导机关和骑兵3团在姚喆等率领下与敌人战斗6次，然后分散转移。一个月后，敌人撤退，绥西部队和游击队又返回原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敌人从7月下旬以来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长时间、大规模的"扫荡"，使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人力、物力和财力受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加强，绥远敌后游击战争处于抗战以来最艰险、最困难的时期。游击根据地的面积、人口、抗日部队都缩小了。但是，由于领导机关和抗日部队主力都已顺利转移，为今后继续坚持和恢复大青山抗日局面保存了力量。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骑兵主力转移到晋西北偏关和雁北地区以后，偏关即成为领导绥远敌占区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1942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绥远（大青山）与雁北（晋西北第5军分区）合并，成立中共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绥察行政公署后亦改称塞北行政公署，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党政军机关均驻偏关。在晋绥分局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塞北区也陆续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为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在领导机关和骑兵主力转移、敌我力量悬殊、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始终在大青山地区坚持着英勇卓绝的斗争。塞北军分区骑兵3团、教导大队、分区直属骑兵两个连、绥西地委、专署及县区游击队在绥西游击区继续以

隐蔽斗争方式，度过了大青山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1942 年冬至 1943 年春，正是大青山地区滴水成冰、大雪纷飞的时节。八路军指战员们的粮食十分紧缺，弹药无法补充，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医治，部队只好露宿深山。他们化冰雪止渴、烧篝火取暖，以莜麦糊、土豆、灰菜籽充饥。他们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陆续组织工作组下平川开展工作。由郝秀山等带领的武归县 8 区游击队发动群众，保证了骑兵 3 团秘密后方基地骆驼场伤病员的物资供给。在绥中，留在该地的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化装成老百姓，坚持分散的隐蔽斗争。骑兵 3 团、绥察行署游击队和绥西游击队先后进入绥中地区活动，抓住时机打击敌人，振奋了绥中群众的抗日情绪。在蛮汗山区，绥南游击队和党政工作人员长期坚持斗争，与日伪军、汉奸、特务进行顽强的拼搏。他们动员组织群众，争取伪军，打击小股敌人，保证了大青山与晋西北的联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共绥南地委书记崔岩、张云峰，绥南专员程仲一，武川县长李康，归凉县长原民、县委副书记赵效敏，骑兵连长常继生等一大批同志先后牺牲于大青山地区。但是，大青山抗日军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扫荡”和封锁所吓倒，他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确定的隐蔽斗争方针，积蓄了力量，度过了难关，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迎接反攻阶段的到来继续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成为坚持内蒙古地区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

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和“伊盟事变”的爆发

1941 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继续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在伊克昭盟，国民党顽固

派愈来愈猖狂地付诸实施所奉行的“反共灭蒙”政策。

1941年冬，陈长捷在担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并率大批国民党部队开进伊盟以后，开始实行所谓“党政军一元化”政策。随即以“一挤二压”的手段，一方面把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排挤出伊盟，企图建立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用“政治渗透”、“军事渗透”、“经济文化渗透”的政策从各个方面加强其反动统治。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在政治上遭受空前的民族压迫，经济上遭受前所未有的掠夺和搜刮。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国民党特务捕杀了要求抗日、倾向进步的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强迫各旗保安队接受“训练”。守备军总部向根本不产粮食的牧区强征粮食，甚至搜取蒙古族妇女的头饰。更为蒙古族各阶层无法容忍的是，陈长捷成立“屯垦督办公署”，宣布开垦牧场30万亩，从而激起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普遍反抗。在很短的时间内，达拉特旗人民发动4次“独贵龙”运动，蒙古族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43年2月21日，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毅然杀死了追随陈长捷主使放垦的国民党驻伊盟党务特派员、蒙古民族的败类白音仓。这一事件成为“伊盟事变”的直接导火线。事发后，陈长捷不顾多方劝阻，向札萨克旗王府派兵进行镇压。3月26日，札萨克旗保安队和当地蒙古族群众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包围了设在札萨克旗新街镇的绥境蒙政会、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扣捕了一些国民党党政人员，杀死顾兆忠等国民党官僚、党棍、特务。震动全国的“伊盟事变”终于爆发了。

札旗武装起义集中反映了伊盟蒙古族人民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意志。在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推动下，包括

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等大部分上层王公、喇嘛，也同情和赞助了起义。起义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开垦蒙地，拒绝蒙地驻兵，减轻派购军粮，按月发给保安队粮饷等4项要求。

札旗武装起义得到了伊盟各旗人民的响应。鄂托克旗保安队在阿拉庙一带集结，待机行动。4月15日，乌审旗保安队部分官兵和群众2000余人，在大队长奇金山的领导下也举起了义旗。他们在乌审旗王府所在地也捕杀了40多名国民党特务、官僚、党棍，捣毁了电台。

"伊盟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指令陈长捷、何文鼎以伊盟守备军骑7师、26师主力进行镇压。3月31日，守备军两个团进攻札萨克旗王府，起义军民奋勇抵抗。4月1日，国民党军队在大炮掩护下攻占沙王府，起义队伍同沙王一起撤离王府，向乌审旗转移。5月5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乌审旗王府。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对伊盟各旗实行全面军事弹压的局面，马鸿宾部队弹压鄂托克、杭锦两旗，马占山部队弹压准格尔、郡王两旗，驻河套的傅作义部队控制达拉特旗。国民党军队的镇压受到札、乌两旗起义军民长时间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屠杀、镇压蒙古族人民的罪行，对于札、乌两旗的起义军民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热情帮助。起义队伍在乌审旗红柳河以南地区，得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妥善安置与保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主张和促进"伊盟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军事镇压失败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5月12日，沙王代表起义者提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的6项要求：1、陈、何部队立即撤出伊盟；2、严惩肇事罪魁陈长捷、何文鼎，释放被捕蒙胞；3、赔偿蒙胞损失，救济被难蒙胞，

抚恤被害蒙胞家属；4、保证蒙胞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的权利；5、保证蒙胞人权，不得任意更换军政职员和杀害蒙胞；6、免征蒙胞土地、驼马牛羊及粮食。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国民党当局答应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蒙地和征派粮畜，暂撤驻札旗王府的军队，“宣慰”札、乌两旗。10月初，沙王和起义军民回到了札萨克旗。

1943年3月，即“伊盟事变”爆发前后，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公然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伊盟事变”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压迫以至妄图消灭蒙古民族的面目。国民党军队在镇压札、乌两旗起义时，对当地蒙古族进行了残酷屠杀和疯狂掠夺，札萨克旗王府被掘地3尺，沙王府几代积聚的财物被劫掠一空。“伊盟事变”虽以沙王和起义者返回札旗而基本结束，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又重新控制了札萨克旗。国民党当局还假意派大员组织“宣慰团”到伊盟进行“安抚”，而同时也订下了“缉拿严办”札、乌两旗起义主要领导者劳赖和奇金山的计划。1944年2月24日，国民党特务诱杀了劳赖；1945年2月，又谋害了在乌审旗坚持斗争的奇金山。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屠杀、压迫蒙古族人民反动政策的继续。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的体现。

与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对各少数民族给予亲切关怀和热情帮助。共产党不仅在“伊盟事变”中支持起义军民的正义斗争，主张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且在“伊盟事变”后，进一步领导和帮助伊盟人民的革命斗争。共产党的组织在伊盟各地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和抗日斗争，并以乌审

旗红柳河以南地区和鄂托克旗城川一带为据点，积极开展对蒙古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乌审旗起义的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编成一个团的武装，并依托陕甘宁边区，在大石砭、小石砭、耳林川一带建立了根据地。1945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建立了中共伊盟工委，加强了伊盟工作。

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

1943年春天，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节节败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在中国战场，日本侵略者虽然对解放区频繁"扫荡"，但其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在发生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晋西北根据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抗战局势由敌进我退转变为敌退我进。中共塞北区工委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工委一方面采取轮训干部方式，从1943年春开始陆续把各地区党政军干部抽到偏关进行整风学习，一方面运用晋西北"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经验，逐渐派遣骑兵部队、武工队和工作组进入大青山地区，展开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

1943年7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从骑兵1团抽出9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武工队，由安正福任队长，深入和林县山区开展群众工作，争取了各据点的伪军，迅速在和林县打开了局面。同年夏秋季节，又派李佐玉、王瑜山等率领工作组、武工队进入绥中地区和归绥周围平川活动。冬天，塞北军分区骑兵1团从山西右玉西山挺进蛮汗山，骑兵2团自偏关进入绥南，并逐步向绥中发展。在困难环境中坚持绥西斗争的3团，其游击活动范

围也日益扩大。整个绥蒙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的转机。

塞北军分区 3 团在绥西，仅 1944 年上半年就与日伪军作战 12 次，毙伤、俘敌 130 多名。8 月至 10 月，又消灭伪军 70 余人。活动在萨县的 3 团 2 连，从 1942 年至 1944 年，先后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 40 余次，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连队。

绥中李佐玉等领导的武工队、游击队深入群众，打击“清乡”的日伪特务汉奸，重新打开了局面。骑兵 2 团、3 团在绥中多次与日伪作战。1944 年 8 月 5 日，黄厚等率 3 团在陶卜齐附近的韩家窑子，全歼了敌厚和警务段副段长内田留三郎带领的特务工作队。10 月 11 日，骑兵 2 团伏击由厂汗脑包至拐角铺的伪蒙军 1 个中队，生俘 45 人。至此，绥中游击区形势已大为好转。

1944 年 4 月下旬，敌 26 师团出动 2000 余人，向朔县、平鲁、清水河、偏关大举“扫荡”。塞北区军民奋战 7 天，与敌作战 31 次，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毙伤敌伪军 71 名，俘伪军 34 名，炸毁敌火车一列。骑兵 1 团在上半年与敌作战 13 次。2 月 14 日，在厂汉营附近毙、伤、俘日伪军 37 名，3 月底在南寨、南北场击溃敌人 130 余名，4 月 18 日在右玉东山丁家村生俘伪大同省公署直辖警察大队长、右玉特务大队长等敌伪特务警察 38 名。在和林县，安正福率武工队于 3 月间成立了和林县抗日民主政府。武工队以和林为中心，工作范围扩展到周围 280 个村庄。9 月，又收复敌据点 4 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对安正福武工队予以很高评价，毛泽东也曾批示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

大青山抗日部队还一边战斗，一边生产，1944 年 4 月多次打退抢粮敌人，解救群众 40 余人。5 月间共开荒 5717 亩，种菜

324 亩。[①]

经过抗日军民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到 1944 年 8 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恢复到了 1942 年敌人大“扫荡”之前的局面，同时还开拓了和林、清水河等新的游击区。这时由我军控制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总面积已为 11 万多平方华里，总人口 46 万，其中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面积为 3 万多平方华里，人口 15 万。

1944 年 8 月至 9 月，晋绥军区主力发动秋季攻势战役。塞北军分区部队配合晋西北攻势，在 1944 年下半年又取得毙伤日军 88 人，毙、伤、俘伪军 400 人的胜利。绥中、绥西和绥南 3 块游击区的联系都重新打通并得到了发展。

1945 年 1 月，中共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决定以最大的力量开展敌后之敌后的工作，主动积极进攻，把敌人挤到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为全面反攻创造条件。2 月，晋绥军区发动春季攻势，大青山和雁北地区也转入了局部反攻阶段。在为期 70 天的春季攻势中，塞北区八路军在绥西将敌人从大庙酒馆、庙儿沟据点赶走，在绥中连续挤退和攻破活佛滩等 8 处敌据点，威胁平绥铁路，解放区扩大 4 万平方华里。在平绥路以南，我军重点围困并攻击清水河境内敌据点，经过 79 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 265 人，连续攻破北堡、暖泉、杨湾子、土山子、曹家塔等据点，收复国土 7200 平方华里，村庄 357 个，解放同胞 19000 人。在整个大青山地区，敌伪节节败退，日伪兵力被迫集中到铁路沿线的重点城镇。

1945 年 6 月中旬，晋绥根据地军民在取得春季攻势胜利的

---

① 1944 年 9 月 26 日《解放日报》。

基础上，又发动了夏季攻势，塞北军分区部队在平绥路南北两线向敌人展开进攻和围挤。路北我军在绥中先后攻破十顷地、蒙古寺、黑老、厂汉脑包、米粮局、大脑包等据点，在绥西攻破三道窳等5个据点。路南我军经过36天围困，收复王庄窝据点，毙、伤、俘日伪军67名，解放村庄65个，将清水河南部敌人全部消灭。6、7月，我军共战斗54次，毙、伤、俘日军54名，伪军125名。

在抗日军民的强大攻势下，日本侵略者在绥蒙的统治摇摇欲坠，平绥铁路西段大同到包头的广大地区，仅有临时编成的日军第4独立警备队驻守。7月，敌人被迫从绥中、绥西撤除21个据点，归绥城只有日军300人，主要依靠1000余伪蒙军支撑局面。以德王、李守信为首而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伪蒙疆政权，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青山抗日军民已处在全面反攻的前夜。

在坚持和恢复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还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同绥远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继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多次击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傅作义将军发动五原战役之后，驻河套、伊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仍起着阻止日军西进南下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几次反共高潮，绥远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43年，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绥远国民党当局也按照国民党中央的部署，派遣军队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搞磨擦，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这时国民党在绥远驻有35军、暂3军、骑4军等数万军队，却拥兵河套，并不积极向敌占区日伪军主动进攻，而是利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困难时期和兵力较少的机会，逐步派遣绥西第一挺进军5个纵队及战工队等杂牌军窜

扰我根据地，妄图把八路军赶出大青山，向敌后抗日军民“收复失地”，建立所谓绥察“防共地区”。鄂友三、郭长清、乔汉魁等顽固派甚至勾结伪军，进占我绥西、绥南游击区，残害百姓，排挤、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为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大青山八路军在兵力少、日伪“清乡”、“扫荡”的情况下，对国民党顽军的猖狂进攻予以坚决回击。为了保卫大青山抗日成果，1945 年 2 月，八路军晋绥军区增派步兵 9 团开赴绥西。

1945 年 6 月，国民党顽军 5000 余人向绥西、绥南地区进攻，并在我游击区大肆烧杀掠抢。为彻底粉碎顽军对大青山的进攻，并对日全面反攻，中共中央决定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和晋绥军区 27 团北上大青山。7 月 6 日，八路军在和林格尔地区驱逐顽军 1500 余人，毙、伤、俘顽军 100 余，首先巩固了绥南根据地，而后向不断进犯绥中、绥西的顽军进行猛烈反击。7 月 11 日，袁光、黄厚等率骑兵旅、3 团、9 团等部向占据井儿沟等处的顽军邬青云部反击，在黑脑包击溃顽军 400 余人，毙、伤、俘顽军 121 名，收复井儿沟等地。7 月 13 日，我军歼灭绥中顽军苏美龙部 360 余人。8 月 11 日，姚喆、康健民等率骑兵旅、27 团、3 团在绥西李气沟、白菜坝等地全歼鄂友三部顽军两个团，顽军残部逃回河套。经过激烈的反顽斗争，大青山地区的国民党顽军基本被肃清。这就为我军在绥蒙发动全面反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国民党当局不会因此而放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时机，绥蒙地区抗日军民在向日本侵略者反攻的同时，还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四、内蒙古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6月22日，美军攻占冲绳，日本帝国主义陷于孤立困境。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不断胜利，已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已发展到100万，民兵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

辽阔的内蒙古地区是抗战后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全面反攻、扩大人民力量的重要战略地带。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对于在华北和热、察、绥地区的战略反攻作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5月，冀察军区部队发动察南战役，把日伪军压缩到张家口和铁路沿线的少数城镇里。6月，由李运昌等领导的中共冀热辽分局和军区组织了3支部队挺进热河，第1支队向隆化、围场挺进，第2支队向平泉、宁城、赤峰挺进，第3支队向绥中、朝阳挺进，打响了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前哨战。1945年初，晋绥分局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晋绥边区今年要扩大一倍，主要发展方向是雁北和绥远。由于共产党、八路军长期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因而在反攻阶段到来时，绥蒙大青山地区就将成为战略反攻和配合苏蒙联军作战的重要阵地。2月，中共中央同意晋绥分局在绥远成立绥蒙区党委的建议，批准将中共塞北区工委改组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并以高克林、姚喆、张达志、乌兰夫、武开章、杨植霖、苏谦益、白成

铭、曹振之、康健民等10同志为区党委委员。7月，绥蒙政府成立，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同时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兼政委，张达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此外还加强与充实了绥中、绥西、绥南党政军领导机构。绥中地委委员由王再兴、杨叶澎、王建功、康天明、李佐玉、李波、宋克缵、黄厚组成，王再兴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康健民任军分区司令员，宋克缵任专员。绥西地委委员由白成铭、王道三、武达平、贺吉祥、蔡九、刘卜一（即奎璧）、李维中、李发印、沈新发、姜文华组成，白成铭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蔡久任军分区司令员，李维中任专员。绥南地委委员由张毅忱、高铭卿、范忠祥、郑天翔、安正福、李云龙、李国良组成，张毅忱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范忠祥任军分区司令员，郑天翔任专员。全面反攻前夕，绥蒙军区所辖骑兵旅、骑兵1团、2团、3团、步兵9团、27团、偏清支队、骑兵大队、步2营、教导第3队以及武工队、游击队已对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形成了包围的局面。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法西斯对波茨坦公告加以拒绝。8月6日和9日，美国军队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为了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并履行雅尔塔会议所承担的对日作战的义务，苏联于8月8日对本日宣战。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本宣战。

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在远东最高统帅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下，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4路同时向日军发动进攻。外贝加尔方面军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在乔巴山元帅指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合作下向兴安岭——沈阳方向进攻；第1远东方面军由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向哈尔滨——吉

林方向进攻；第2远东方面军由布尔加也夫上将指挥，向松花江一线进攻；太平洋舰队协同3个方面军作战并向朝鲜北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进攻。

苏军的对日作战，大大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使中国抗日战争立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8月10日至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出受降及对日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如遇抵抗，即予坚决消灭。命令八路军向绥察热挺进并配合苏蒙联军作战，同时命令冀热辽边区的八路军迅速进入东北。在接到上述指示和命令后，各解放区百万雄师先后整装出动，向日伪发动了全面大反攻。

苏蒙对日宣战以后，在内蒙古西起乌兰察布，东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广阔地区，由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一道对日进攻。苏军第17、36、39、53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①突破了满洲里——扎赉诺尔与海拉尔——阿尔山两道日军坚固的工事区，越过了大兴安岭和内蒙古北部广阔的草原。东路在8月10日至14日先后占领满洲里、海拉尔、牙克石、突泉、索伦、王爷庙等地。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仍未放下武器。8月15日至17

① (苏) 弗诺特钦科著，沈军清译：《远东的胜利》，第28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

日，苏军先后占领林西、乌丹、通辽、赤峰、博克图、扎兰屯等城镇。8月10日至16日，西路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普列耶夫将军指挥下联合作战，向多伦方向疾进，很快击溃了这一方向的日军和伪蒙古军，先后攻占多伦、康保、张北等地，19日占领承德。至8月22日，苏蒙联军共前进950公里，并占领长春、沈阳、大连等城市。苏蒙军为解放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履行了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在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给予决定性打击之时，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作战，并收复山海关、热河。从察北、晋绥、山东等解放区向东北反攻的人民军队，配合苏蒙联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遭受14年蹂躏的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各族人民，终于彻底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在解放区军民对日大反攻中，晋绥解放区的反攻作战于8月11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展开。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部队统一由贺龙、李井泉指挥。北线指挥部由吕正操、高克林、许光达、孙志远负责并指挥绥蒙军区及2、5、11分区。北线反攻作战以归绥为主攻方向，并担负歼灭平绥路西段沿线敌人、收复绥远全省和阻止国民党傅作义部抢占解放区的任务。8月12日，晋绥军区命姚喆、高克林、张达志等集中绥蒙军区部队立即向归绥及周围地区进军，命许光达率32、36团北上增援。这样，以归绥为中心的北线反攻作战全面展开。我军于当日收复陶林县城，并阻断平绥路交通。8月15日，骑兵2团收复武川县城，9团、27团攻占察素齐、毕克齐和兵州亥车站；17日，绥中部队占领旗下营、陶卜齐、白塔车站。归绥已处于我军包围之中。

8月18日晨，我军27团、9团、3团向归绥城发动猛烈进

攻，经激烈巷战直捣市中心大十字街，并包围了伪蒙军总司令部。随后我军发动强大政治攻势，迫令伪蒙军缴械投降。城内多数伪蒙军见大势已去，准备投降，并派出代表与我军谈判。而少数军官却拖延时间，准备投靠国民党军队。正在此时，国民党35军31师一部及郭长清挺进纵队等3000余人，从南茶房突然攻入城内，向我军展开疯狂进攻。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归绥，归绥遂为国民党军队抢占。

在解放区军民举行战略反攻、不断攻克日伪据点和逼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时，国民党蒋介石却不惜与日伪合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令傅作义率国民党第12战区所有军队火速接收平绥路沿线重要城镇。8月11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包头以后，继续向东进攻。18日，又以重兵向八路军刚收复的毕克齐车站进攻。守卫毕克齐的两个连，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顽强阻击一整天后撤出。绥蒙军区所属部队重新集结于归绥周围，拟再攻入城。

在绥蒙军区部队进攻归绥的同时，许光达率领的独立第2旅36团由保德直抵清水河县，19日全歼清水河伪军1000余人，收复清水河县城。随后，吕正操率领的32团亦进入绥南。28日和31日，我军又收复凉城、和林格尔，并在新堂外围及岱海滩一带歼灭国民党顽军1个团。

在平绥铁路沿线大反攻中，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分路配合苏蒙联军作战。冀晋军区第4、5军分区部队向大同、丰镇、集宁、商都进击，冀察军区第12、13、19军分区部队向张家口、张北、多伦、沽源进击。8月14日，收复兴和县城。22日，又攻克平绥铁路战略支点集宁、丰镇两县城及车站。23日，冀察部队解放了张家口，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张家口的解放，

不仅宣告了伪蒙疆政权的彻底覆灭，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控制热察，发展东北”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

在内蒙古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反攻作战中，许多伪军官兵反正起义，如伪蒙军第9师和伪兴安军部分官兵，主动和苏蒙联军、八路军联络，杀死日本军官，举行起义。

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的形势，决定解放区抗日军队一般以相当大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的局面。根据新的方针，我军在绥蒙地区除巩固已收复的城镇外，还努力扩大解放区。不久，我军在商都、百灵庙、张北等地与苏蒙联军会师。至此，内蒙古沦陷区各族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在全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时侯，也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全国人民包括内蒙古各族人民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内蒙古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日本法西斯铁蹄踏入祖国神圣领土的时侯，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抗敌御侮、气吞山河的壮丽篇章。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也为内蒙古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进行的一次全民族抗战。内蒙古地区同全国一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蒙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组织、启发各族各界各阶层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官兵参加抗战，使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革命力量又成为在内蒙古坚持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内蒙古各族人民前赴后继，浴血抗战。其间的许多先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有许多宝贵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珍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援助了中国各族人民，苏蒙联军还直接解放了内蒙古东西部的广大地区。同样，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抗击和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大部分兵力，支援了苏、美、英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这里，当然也包括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第四章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9）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是中国革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重要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为了实施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的战略目标，从西北、华北、东北全面开展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使内蒙古革命出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各族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保卫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果实；全面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努力统一蒙古民族的民族解放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积极组建蒙古民族革命武装，保卫解放区和促进自治运动；广泛发动各族人民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适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的领导机构，公开确立党的领导；开展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民主改革，解放农村、牧区的社会生产力；努力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经济及工商业、文教卫生事业，改善人民生活；开展自卫解放战争，巩固和发展解放区，支援东北、华北解放战争；坚持和发展绥蒙地区的革命斗争，实现绥远和平起义和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和

平起义，内蒙古全境解放，内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内蒙古历史光辉而伟大的里程碑。

第一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蒙古

一、内蒙古的形势及其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恢复和加强其对全国的独裁统治，加紧部署内战，企图限制、削弱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攫取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尽一切可能争取实现和平，一方面坚定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内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尖锐斗争。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人民、各种政治力量都将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经受斗争的严峻考验。

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北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苏蒙两国对日宣战，解放了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八路军解放了绥蒙包头以东地区，形成了与冀热辽、晋察冀、晋绥和陕甘宁相连的大片解放区。对国共两党来说，内蒙古地区均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争夺内蒙古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战线上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在日本投降以前，国民党已派出特工人员在伪蒙疆军政人员

中进行活动；当内蒙古地区的对日作战尚未结束之际，绥远的国民党驻军即从河套、伊盟地区大举出动，在日伪军的接应下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先后夺取了包头、归绥以及绥东、绥南的大部分城镇。10 月间，国民党调集 17 个军约 40 万人向华北解放区迫进。绥远国民党军队全线出动，企图夺占张家口，与平、津的国民党军队相呼应，形成对热、察、绥解放区的分割包围，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切断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企图抢夺内蒙古以至北方地区的抗战胜利果实，进而消除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北方的活动，独霸东北、华北、西北。控制内蒙古地区是国民党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重要一环。国民党除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在其军队尚难以到达的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则利用部分蒙古族政客从事所谓“复员蒙旗”的活动，招纳地方封建势力及日伪残余，拼凑反动地方武装，在解放区大肆骚扰，准备迎接国民党的到来，恢复其反动统治。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蒙古地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兴起了空前高涨的蒙古民族运动。由于蒙古族中不同政治倾向的各种势力，在民族解放的共同口号下暂时结合到一起，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分别掀起了以“内外蒙合并”或“独立”、“高度自治”为内容的民族运动。在兴安盟王爷庙，由部分曾在伪满洲国兴安总省任职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一批蒙古族革命者、青年知识分子会聚一起，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宣布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成立了东蒙党部，发动“内外蒙合并”运动；在呼伦贝尔地区，部分蒙古族、达斡尔族上层人士也进行“内外蒙合并”的活动，成立呼伦贝尔自治省，宣布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伪蒙疆的少数高级官

员和部分上层人士，在蒙古青年革命党及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下，在德王府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委员会”，主张“内外蒙合并”，进而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日本投降后的短暂时期，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出现的“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和活动以及各种政权、组织的建立，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苏蒙联军及其下属机构的支持；同时也是蒙古族各种政治势力在国共两党均未能控制内蒙古的情况下，以民族解放为旗号，探索民族出路的尝试。内蒙古民族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苏、蒙相继对日宣战以后，苏蒙联军以强大的攻势，使日本法西斯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土崩瓦解，内蒙古中、东部地区获得了解放。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对苏蒙联军钦佩不已。特别是蒙古民族中的有识之士、青年知识分子以及部分上层人士，期望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得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帮助。苏蒙联军进入内蒙古的初期，曾宣传“内外蒙合并”，主张内蒙古“独立”或“高度自治”。苏蒙联军的一些高级军官还不同程度地直接鼓动和参与当时的“内外蒙合并”和“独立”“自治”活动，甚至给予某种许诺。此后尽管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和要求，但是它毕竟对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内蒙古的蒙古民族运动更加复杂化，甚至导致蒙古民族运动走了一段弯路。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大力开展内蒙古革命斗争，发动蒙古民族的自治解放运动，是抗战时期的既定方针。日本投降前，乌兰夫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确定了他在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事业中主要领导人和民族领袖的地位；以乌兰夫为主席的绥蒙政府的成立，就是准备以绥蒙为基地全面开展内蒙古的工作。日本投降后，绥蒙大部分解放区被国民党反动派抢

占，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力争绥察热全境》的指示；9 月 19 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指出：“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①] 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与国民党建立“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战略意图针锋相对，在地跨三北，紧连冀热辽、晋察冀、晋绥、陕甘宁解放区，背靠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于粉碎国民党建立所谓“防共隔绝地带”的图谋，对于中国共产党控制整个三北，推动全国革命的发展，对于以内蒙古为试点，实践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国民党为在内蒙古地区恢复其统治秩序的活动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军事部署。首先，在原来的 10 个战区之外，又增设了若干个战区；其次，从西南、西北调集大批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进逼，以准备尽快抢占大城市、控制主要铁路交通线。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为迅速抢占包头、归绥、大同、张家口等战略重镇和平绥铁路沿线地区，1945 年 6 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第 12 战区，辖绥远、察哈尔两省，特晋升傅作义为第 12 战区司令长官；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拟定的《挺进华北准备计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64 页。

划大纲》[1] 将傅作义部35军编为绥西方面总预备队，配备充足的武器弹药和通讯、运输装备，准备沿平绥路向大同方向进军；派骑兵挺进军第一纵队王有功部及第五纵队鄂友三部进占武川县一带，第四纵队邬青云部进占绥东陶林县一带，第二纵队郭长清部进占绥南清水河县一带，以围攻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绥蒙军区部队。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发出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投降。8月11日，国民党第12战区长官部在绥西陕坝镇召开党政军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了进军绥远、察哈尔，接受包头、归绥、集宁、大同、张家口等地日伪军投降事宜；决定组成由孙兰峰为首的第12战区东进接收指挥部代表傅作义接收上述地区日伪军的投降。与此同时，傅作义命令所属暂3军（军长袁庆荣）暂17师接收包头市和凉城县；暂11师由东胜县驻地向归绥进军，接收日伪军投降；令35军（军长鲁英麐）新31师由驻地后套出发经包头进军归绥，协助暂11师接收日伪军投降，其一部分兵力开往陶林县，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该县；令35军101师经集宁进军大同，接受大同日伪军投降；令35军新32师开往集宁、丰镇，协助地方行政人员接收这两个县；令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率领所部新骑4师、新骑6师由驻地哈拉寨出发北渡黄河进驻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凉城四县，相继接收上述各县县城，并阻止八路军

[1] 这个计划是根据蒋介石1945年6月4日的手令，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军政部拟定，并经蒋介石批准。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1），第558—561页、第5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北上，与进驻绥包部队取得联系后向察北、东北进军。[1] 傅作义还任命步兵旅旅长于霖瑞为河套地区警备司令，担任该地区防守任务。8月18日，蒋介石正式指定傅作义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指挥原辖各部，负责接收热、察、绥三省地区。”[2]

按照上述紧急部署，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当即从后套、伊盟等地出发，沿平绥铁路及绥南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凉城一线蜂涌东进。8月13日，孙兰峰率领第12战区东进指挥部接收人员先期进入包头市，命令日伪军暂不缴械，与伪警察一道维持市内治安，并通过日军特务机关电台，通知驻大同、张家口日军必须向12战区司令长官指定的指挥官投降。8月17日，傅部35军暂17师第3团进入包头市担任城防，正式接收该市。18日，傅作义率第12战区长官部抵达包头市，当即成立包头市政务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任命马秉仁为包头市政务委员会主任兼警备司令。

8月18日凌晨，国民党新31师安春山部及骑兵第4师刘万春部，向刚刚被八路军绥蒙军区部队收复的毕克齐镇发动猛攻，驻守毕克齐的八路军两个连顽强阻击激战一天，因寡不敌众，当晚撤出战斗。安春山、刘万春所部抢占毕克齐后继续进军归绥。

同日，正当八路军绥蒙军区部队在姚喆司令员的指挥下攻入归绥旧城，逼令伪蒙古军缴械投降之际，从托克托县开到归绥市郊南茶坊一带的国民党骑兵挺进军第2纵队司令郭长清与市内伪

---

① 《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机密作战日记（1945年8月—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第1976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② 《八路军·参考资料》（1），第584页。

蒙古军第5师师长门树槐取得联系，率部进入市区，配合伪蒙古军向八路军发动反攻。国民党35军暂11师先头部队和新31师也赶到归绥西郊投入战斗。于是，国民党军队与伪蒙古军里应外合，夹击八路军，绥蒙军区部队被迫撤出归绥，暂11师和新31师先后进入市区，占领了归绥。傅作义命令暂11师担任归绥市城防，新31师向陶林、兴和一带进军，郭长清部开往清水河县接收该县。

8月22日，傅作义等率领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人员抵达归绥，成立归绥市政务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任命李居义为归绥市政务委员会主任、温永栋为归绥市警备司令兼市长。同时还任命了归绥、包头、集宁、丰镇、陶林、凉城、清水河、武川、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固阳等县的县长。

国民党中央命令傅作义整编伪蒙古军，将伪绥西联军改编为第12战区暂编骑兵第1集团军，任命汉奸王英为集团军总司令，下辖暂编骑兵第1、2、3师；将伪蒙古军改编为第12战区暂编骑兵第2集团军，任命李守信为总司令，宝贵廷为参谋长，代行总司令职务，下辖暂编骑兵第4、5、6师；还将伪蒙古军炮兵部队改编为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直属野炮营。10月初，傅作义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暂编骑兵第2集团军番号改为新10路军。

8月23日，傅作义部35军新101师沿平绥路东进至集宁，孙兰峰率先遣接收人员同时到达，当即成立集宁政务委员会及警备司令部，任命张恺然为集宁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县长，任命孟昭第为警备司令。与此同时，新32师驻防集宁、丰镇等地。当天，驻大同日军奉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命令，派两个中队乘火车到集宁，迎接孙兰峰等前往大同接受日军投降。孙兰峰等一行当即乘火车到达大同，新101师也随后进驻大同，开始接收事宜。阎锡

山的第2战区代表楚溪春以大同是山西省辖区为由强烈要求由第2战区接收，孙兰峰则坚持由第12战区接收，双方各不相让。后经傅作义同意将大同交由第2战区接收，孙兰峰带少数随从人员乘飞机前往北平。

这期间，傅作义部35军暂17师第1团奉命开往凉城，企图从八路军手中夺取该县城。该团在凉城附近遭到八路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团被歼。此外，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北渡黄河，经归绥到卓资山集结。9月初，奉傅作义命令经由隆盛庄、张皋镇、新平堡一线向宣化进军。9日在柴沟堡附近沙家屯遭八路军包围袭击，遂败退到渡口堡、西阳河堡、新平堡等处，在两天的激战中伤亡惨重。11日，马占山率残部突围撤退到张皋镇、隆盛庄等处休整补充，不久又奉傅作义命令进驻大同，担任保护铁路交通的任务。

至此，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从河套、伊盟地区出动以来，不仅从日伪手中接收了包头、归绥等重要城市，而且抢夺了八路军已经解放的丰镇、兴和、尚义、武川、陶林、凉城等县城，绥蒙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抢占。但是，国民党第12战区抢占张家口、打通整个平绥路、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进而吞并全部内蒙古解放区的企图没有得逞。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际，苏蒙联军已经推进到了张家口北狼窝沟坝上，并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配合苏蒙联军围攻张家口，逼令日军缴械投降。但是在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根据蒋介石关于日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

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①] 的命令，同时也为了掩护张家口等地各机关的日籍职员和侨民撤退，拒绝向苏蒙联军和八路军缴械投降。当时在张家口的伪蒙古自治邦主席德王、副主席李守信等则向各方面谋求出路，派代表同苏蒙联军联系，却被对方扣留。国民党军统特务梁芝祥、王野人和国民党绥蒙党部特派员于福庚、杨润霖等潜入张家口，竭力拉拢德王、李守信等投靠国民党；王野人还送来蒋介石委任德王为蒙古先遣军司令，李守信为新 10 路军总司令的电令，要求他们掌握军队占据蒙旗地方，阻止八路军进入。但是，由于当时苏蒙联军已经解放了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等蒙旗地方，八路军和苏蒙联军又把张家口团团围住，并向市内发动进攻，德王、李守信等自身难保，根本无法替国民党占据蒙旗地方。8 月 19 日，德王、李守信等随日军撤退部队乘火车逃往北平。不久，德王、李守信、吴鹤龄等又从北平经西安到重庆，投靠了国民党。8 月 23 日，八路军攻占伪蒙古自治邦首府张家口市。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苏蒙联军的迅速推进，日伪统治迅速崩溃，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等盟很快变成为解放区。但是在卓索图、哲里木、昭乌达等盟以及呼伦贝尔和嫩江流域的部分汉族聚居地区，一些国民党特务和部分伪职人员却纷纷出来，乘一时的权力真空建立起维持会和国民党党部。他们或造谣惑众，扰乱人心；或收编伪军、土匪等待国民党大部队前来接收。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辽蒙党部派魏伯章等特派员到双

① 《八路军·参考资料》(1)，第 573 页；另外，蒋介石命令日本驻蒙军必须向第 12 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投降，同上书，第 584 页。当时由于傅作义派不出接收人到张家口，驻蒙日军乃撤退到北平，向国民党北平受降官、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投降。

辽县和通辽县建立国民党党部，并向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渗透、扩充他们的势力，先后在该三旗秘密建立了党部。国民党特务又与通辽县大林一带的土匪和包善一、徐邦统、包尔罕台喇嘛等人的地主武装勾结，企图控制这一带的局势。此外，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于1945年9月间派蒙旗特派员李宗洲等到海拉尔一带活动，在呼伦贝尔建立国民党党部，以待国民党接收大员前来接收。大兴安岭东麓的莫力达瓦旗、巴彦旗[①]等地区，各种反动武装和土匪蜂涌四起。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网罗这些武装，拼凑所谓的“光复军”、“挺进军”、“保安队”等，骚扰地方，抢掠财物，使当地各族人民遭受了又一次的灾难。

国民党中央方面为配合在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动，利用国民党政府内的一些蒙古族官僚政客、特务以及刚从伪蒙疆地区跑到重庆的一部分人，给以各种名义，派往北平及东北进行活动，企图确立国民党在整个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为此，蒙藏委员会首先于1945年9月29日在重庆成立了以白云梯为团长的“蒙旗宣抚团”，成员有吴云鹏、荣照、何兆麟、刘廉克、金崇伟、达密琳多尔济等人。“蒙旗宣抚团”于10月16日由重庆飞抵南京，11月3日到达北平，召集在北平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开会，宣传国民党中央的所谓“德意”，组织“蒙旗复员协进会”，办理在平蒙籍失学失业人员登记、救济等事宜。[②]另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了“蒙古宣导团”，任命原伪蒙古自治邦政府政务院院长吴鹤龄为主任，并立即派往北平，一面替国民党安抚、拉拢从内蒙古

① 巴彦旗成立于1933年1月，1949年4月撤销建置，辖区并入莫力达瓦旗。大体包括今天的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北部几个乡。

② 白云梯：《蒙旗宣抚团工作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代号141，档号164。

地区逃亡到北平的蒙旗上层人士和原伪蒙古自治邦政府职员；另一方面负责“复员”各盟旗组织的工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成立了“蒙旗复员委员会”，任命原伪蒙古军参谋长乌古廷为少将参事，协助东北行营进行原东三省境内的蒙旗复员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其已“接收”的地区，全面恢复了旧有的统治秩序。不仅恢复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原有建制，而且在东北重新设立了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个省，用以取代伪满洲国的行政区划，建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方政权。这样，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西布特哈地区被分别划入辽北、吉林、嫩江、兴安等省。国民党又在其占领的盟旗地方，一面恢复旧有的县治，一面搞所谓“蒙旗复员”活动，规定按照 1931 年颁布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恢复盟旗。在内蒙东部的哲、卓、昭盟地区还恢复了伪满洲国时期已废除的封建王公制度，企图利用蒙古王公上层来为其统治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内蒙古地区不管用武力抢占地盘，还是用政治欺骗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其消灭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同化国内少数民族这一主要目的服务的。所以说内蒙古各族人民在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同时，又一次处于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的紧要关头。

三、中国共产党为保卫内蒙古解放区的斗争

国民党第 12 战区傅作义部在占领大同以西的全部铁路及其沿线战略要地以后，与北平、天津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相呼应，逼向张家口，对热河、察哈尔两省解放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中共中央根据苏联红军即将撤离东北，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以及国共重庆谈判暂时难有结果等战略形势，于9月19日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争取控制东北”。具体作战部署是晋察冀、晋绥两军区之部队，坚决打击傅作义、马占山部的进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①] 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图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0月15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出《绥东战役命令》，部署此次战役的步骤，提出“敌集中固守数据点、延长时间，此时我可攻击平绥道上之某要点或数要点，引敌增援，而击灭之，并大举破坏平绥铁路，”[②] 达到“先打傅顽主力，以解西顾之忧”[③] 的目的。16日，中共中央又向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发出《对平绥战役意义之指示》，指出“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而绥远之毕克齐、归绥、武川、集宁、丰镇、陶林、凉城、清水河等地或为我原有之解放区，或为我不久前所收复，均被傅部在日寇援助下，协同伪军王英、李守信等所强占，……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④]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绥东战役命令》（1945年10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159。

③ 同上。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7页。

平绥战役（或称察绥战役、绥远战役、绥包战役）由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共投入53000余人的兵力，由聂荣臻、贺龙统一指挥。从10月18日开始，晋察冀部队沿平绥路由东向西推进，晋绥部队从右玉北上，绥蒙军区部队由商都、百灵庙等地南下，以卓资山为会师目标，从东、南、北三面向绥远地区国民党军队进行夹击。19日，晋察冀部队攻占了张皋镇、三水岭及隆盛庄。20日，晋绥部队夺取凉城、天成村一带。傅作义部在八路军猛烈攻击之下，仓皇向集宁、归绥集结。晋察冀军区部队乘胜追击，21日占领了丰镇，并夺取了大同以北的铁路线，截断了山西阎锡山部与绥远傅作义部之间联系的交通大动脉；24日，夺取了绥东重镇集宁。25日，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指挥晋绥军区部队一部，于卓资山包围了国民党新编第26师何文鼎部，激战一昼夜，毙伤该部1000余人，俘1800余人，解放了卓资山；接着，又攻克旗下营，很快进入了归绥市郊。

傅作义为保存实力，不被八路军各个击破，决定集中兵力于归绥、包头二市，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以攻为守，依城野战。傅作义令其主力部队35军、暂3军、骑4师、炮兵第25团、战车防御炮营等部24000余兵力集结于归绥，担任城防；令26师、补训101师、补训新32师、第10路军各师及伊盟达拉特旗森盖麟沁部等12000余兵力集结于包头，并任命第12战区政治部主任董其武为包头防守指挥部总指挥。傅作义又从北平空运山炮数门到包头；从大同空运交警总队陈启祥部两个大队1000余人，加强了包头的防守力量。此外，傅作义还命令鄂友三、乔汉魁、郭长清、王有功等游杂部队分别北靠大青山，南依黄河两岸，配合归绥、包头城防部队，向解放军展开游击机动战。国民党在归绥、包头及附近城乡的驻军连同各路杂牌军队共计约5万余人。

针对国民党军队固守归绥、包头的作战部署，聂荣臻和贺龙研究决定，在扫清归绥外围之敌的同时，兵分两路分别围攻归绥、包头。首先命令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达志指挥绥蒙军区康健民骑兵旅和晋察冀军区陈金昆骑兵旅，配合晋绥军区王尚荣所率独立1旅，火速西进，围攻包头，并要求他们在西进途中随时侦察敌情，及时报告；要破坏铁路，切断敌人运输线；如与敌军遭遇，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与此同时，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参加平绥战役的主力部队在聂荣臻、贺龙亲自指挥下，10月31日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从11月5日开始，向归绥市区发动攻击。聂荣臻、贺龙分别在城东陶卜齐村及城北乌素图村亲自指挥作战。我军在夜间由炮兵轰击，步兵突击，向归绥守敌发动数次攻击，但均未攻破敌军城防工事。国民党守军在夜间固守城池，白天则以二至三个师的兵力向城外我军阵地反扑，前后反攻五次，均被我军击退。归绥围攻战形成敌我对峙局面。

我西进部队进至毕克齐以东什报气附近，遭到国民党杂牌军石玉三部七八百人的阻击。经过一天激战，毙伤敌近200人，俘获约40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战马。在察素齐又与敌郭长清部龙震子、二得子等杂牌部队和地方保安队1000余人遭遇。为扫清西进部队的障碍和解除攻打归绥部队的西顾之忧，王尚荣指挥所率步兵从东、北两个方面向察素齐进攻；张达志指挥康健民骑兵旅在察素齐西南堵击。从凌晨到下午四时经十多个小时的激战，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毙敌200多，俘敌600余人，获战马500多匹。龙震子和二得子仅带百余随从乘马突围逃跑。西进部队两战两捷，使附近敌军杂牌部队闻风躲避，萨拉齐守敌不战而逃。张达志、王尚荣所率步、骑兵很快抵达包头市郊，并于11月9日开始对包头守敌展开进攻。我军攻打包头的战斗十分

艰苦，虽曾一度攻入市区，但因敌我兵力悬殊，而且缺乏巷战经验，敌军又将突破口堵住，使我军后续不及，孤军奋战，难以坚持，被迫撤出。

这时，获悉宁夏马鸿逵已派一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增援傅作义部，为包头傅部守军解围，使我围攻包头之部队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聂荣臻、贺龙乃研究决定，由贺龙、李井泉率领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先攻取包头，并相机消灭马鸿逵援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继续包围归绥；归绥守敌如西援包头，则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在攻取包头之后，再集中所有部队会攻归绥。

贺龙、李井泉率部沿大青山南麓火速西进包头，并立即决定由王尚荣带领358旅716团攻打包头城东北转龙藏高地及城北敌军；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指挥绥南1团攻打发电厂和面粉厂；周士第参谋长带领715团攻打包头城西门及黄土梁一带敌军；714团攻占火车站，进攻南门。但是，由于敌军防御工事坚固，我军数次强攻不下，而且国民党每天从北平派三至六架飞机侦察和轰炸我军阵地，致使包头攻坚战又形成僵持局面。时值冬季，气候严寒，我军指战员衣服单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而且缺乏攻城所需重武器，一时难以攻克包头。由于敌我在绥包对峙月余，遂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和调遣部队的时间。宁夏援绥之敌在包头以西之西山嘴、哈业胡同一带虽遭我军阻击，未敢继续东进，但却牵制了我军相当一部分兵力；归绥守军骑4师由师长刘万春率领，绕道准格尔旗并指挥该旗奇子祥部及达拉特旗邬青云部，由老龙渡口渡河，增援包头守军；国民党东胜县第3区司令郭跻堂打着宁夏马鸿逵部队的旗号，也北上增援包头；此外，鄂友三也率骑兵3000余向包头以南地区运动。我军在包头处于三面受敌之不利地位。聂荣臻、贺龙司令员当即将归、包战局报告中央军委。

11 月 23 日，中央军委电示聂荣臻、贺龙："如果你们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1] 12 月初，正当我围攻包头之部队撤到萨拉齐，制订下一步攻打包头的计划之际，国民党则集中兵力拟攻张家口。根据华北战局的这一变化，中央军委于 12 月 12 日电示聂荣臻、贺龙，要求结束平绥战役。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部队撤离归绥战场，速返张家口；晋绥军区及绥蒙军区部队分别撤至归绥以东卓资山、十八台、凉城、集宁、丰镇一带，坚持绥东、绥南解放区。

平绥战役历时近两个月，虽未完成消灭傅作义主力、解放绥远大部的战略任务，但"此役共歼敌 12000 余"，[2] 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和林、凉城等县城，解放了绥东、绥南 6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孤立了大同守敌，保证了张家口西侧之安全，基本上扭转了察、绥地区的形势，给绥远、察哈尔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为我党我军建立察、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经过我党、我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全国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队的坚决反击，迫使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战谈判。但在 1946 年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前，蒋介石又密令各地部队迅速抢占军事要点。1 月 10 日至 17 日，国民党傅作义部动用全部兵力，与大同的阎锡山部东西呼应，向绥东、绥南解放区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企图一举夺取卓资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1。

②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研委办公室、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征编指导组办公室：《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第 295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山、集宁、丰镇等战略要地，打通大同与归绥之间的铁路交通。1月12日，傅作义部暂3军在其军长袁庆荣的指挥下，偷袭卓资山；同日，傅作义部又占领了和林、陶林两县城；14日，敌新编骑兵第4师及新10路军第4、5、6师3000多人在孙兰峰的指挥下攻占了集宁；同日，占领和林之敌军一部进犯凉城；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从大同出发进占孤山车站；敌骑兵第1集团军王英部也曾一度袭入丰镇城内。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集宁、丰镇、卓资山等地我守军采取了自卫反击的方针，在晋绥、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有力支援下，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偷袭卓资山的敌军被我军击溃，伤亡惨重，逃回归绥；进犯凉城之敌遭我军痛击；袭入丰镇之敌被我晋察冀部队打垮；1月10日至18日，绥蒙军区部队配合晋绥军区20团和晋察冀军区马龙旅，在绥蒙军区统一指挥下组织了收复集宁的战斗。此次战斗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战马800余匹，于17日收复了集宁。至此，我军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抢占军事要点的企图，恢复了原有阵地，再次稳定了绥蒙地区的局势，取得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绥蒙解放区的又一次胜利。

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盟地区，在随着苏蒙联军的进入而成为解放区之后，我军又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迅速调动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根据地。同时，派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进入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等盟，保卫内蒙古东部解放区。

1945年8月17日，中共热中地委即派干部进入赤峰，建立中共赤峰市委和市政府，杨稚威任书记，张立文任市长。10月，在建平、宁城、新惠、乌丹等县建立了人民政权。11月，中共

冀热辽中央分局正式决定把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县和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划为热北地区，成立了中共热北地委、热北军分区和热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命王逸伦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任命张盘新为专署专员。同时还成立了林西、经棚两县人民政府。热北地委和军分区成立后，领导当地军民打击土匪武装，维持社会治安，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控诉清算汉奸、特务的斗争，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作好驻防林东一带的昭乌达盟警备总队和子章部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坚持热北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5 年 10 月初，新四军第 3 师奉命从苏北根据地出发向东北进军。12 月初，3 师到达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解放了阜新县。月底，3 师独立旅进入库伦旗，建立了“八路军驻库伦办事处”。[1] 1946 年 1 月 12 日，3 师师长黄克诚率该师第 8 旅及三个特务团，攻克被国民党收编的地主、土匪武装占据的通辽县城，歼敌 1000 余人。16 日又驱逐了盘踞开鲁县境的国民党张念祖部，解放了开鲁县。21 日，中共辽西省委派以赵石为团长的蒙古工作团到科左后旗，开展蒙古民族工作。第 3 师解放通辽、开鲁以后建立了中共通鲁工委，任命喻平为书记，相应地成立了通辽、开鲁县政府。为开展哲里木盟地区的蒙古民族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任命方知达为书记。蒙古工委对外称“蒙族联谊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团结民族上层，培养蒙古族青年，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为我党在该地区全面开展蒙古民族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由于我党我军在绥远、察哈尔地区对敌作战的胜

---

① 库伦旗史志办公室：《库伦三百年大事记》，《哲里木史志通讯》，1984 年第二期。

利及东北根据地的初步建立，使国民党反动派在内蒙古地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建立所谓“热察绥防共隔绝地带”的企图彻底破产，从而保卫了内蒙古解放区，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各族人民，为顺利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创造了条件。

四、蒙古民族运动的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蒙古族各阶层都非常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蒙古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进步的上层人士，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怀着羡慕和向往的心情，有着争取蒙古民族解放的满腔热情和强烈愿望，并且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做了各种各样的应变准备；大部分蒙古王公上层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争取民族解放的要求和愿望；只有一小部分蒙古王公上层企图利用蒙古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要求，打着各种旗号，进行政治投机；曾经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少数王公上层，在日本投降后便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或成为其走卒，或向国民党乞求“自治”。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运动，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勃然兴起。

当苏蒙联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时候，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蒙古族人民满怀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得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这样在内蒙古地区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到中西部的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普遍掀起了一场“内外蒙合并”的运动。但是，当“内外蒙合并”问题由于受《雅尔塔协定》的限制而不可能实现时，便转而发动了内蒙古“独立”、“高度自治”运动。

苏蒙联军进入锡林郭勒、察哈尔盟以后，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蒙疆政权土崩瓦解，原来的盟旗政权都已瘫痪，新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急剧的社会变化之中，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开展活动，以寻求政治出路。

当时，伪蒙疆政权中的一些高级官员和上层，在苏尼特右旗机关、学校中任职的部分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以及该旗部队，都聚集在苏尼特右旗南部沙漠中的陶高图庙，以暂时躲避苏蒙联军的进攻。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日伪时期秘密成立的蒙古青年革命党的部分骨干。该党主张联合苏联和蒙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当苏蒙联军进入苏尼特右旗以后，蒙古青年革命党的负责人德力格尔朝克图、胡尔沁毕力格、布仁赛因等主动出面与之联络，并得到了苏蒙联军驻苏尼特右旗部队负责人罗布桑和伊万诺夫的支持。于是德力格尔朝克图等在陶高图庙公开了蒙古青年革命党，扣捕了日本武装特务。

8 月 16 日，根据苏蒙联军驻苏尼特右旗部队负责人要求，聚集在陶高图庙的这批蒙古族各方面人士全部迁到了德王府。在那里，由吉尔嘎朗（德古来）、穆克登宝、补英达赉、都古尔苏荣等联合德力格尔朝克图等青年知识分子共 13 人，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委员会”，[1] 以下分设参议府、参军府及若干个委员会，以此作为临时的权力机构。同时蒙古青年革命党和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向罗布桑、伊万诺夫正式提出了“内外蒙合并”的要求。由于他们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无权作出明确的答复，建议组成一个代表团到乌兰巴托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高层领导人接洽。于是由德力格尔朝克图代表蒙古青年革命党，“由都古尔苏荣代表政界，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66 页。

斯文丹巴达喇嘛代表宗教界，组成了一个三人代表团"[1] 前往乌兰巴托。与此同时，以蒙古青年革命党和内蒙古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各旗以及东部盟旗发出通知，决定在苏尼特右旗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并明确提出大会将讨论"内外蒙合并"的问题。

正当在苏尼特右旗的人们筹备召开代表大会之际，蒙古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拉木扎布等一行以政府代表身份到前线慰问苏蒙联军，回程经贝子庙、苏尼特左旗等地来到苏尼特右旗德王府。他在德王府接见各界人士时，除表示慰问之外，主要说明：由于《雅尔塔协定》的关系，内外蒙古不能合并，内蒙古的事情属于中国内政。我们的独立刚刚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所以不能越界干涉。至于内蒙古的事情，应由你们自己作决定。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拒绝了"内外蒙合并"的要求，在德王府的人们便改变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事内容，决定讨论"内蒙古独立"的问题。为此，他们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内蒙古独立宣言》、《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等文件，以便在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

1945年9月9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苏尼特右旗原蒙古军幼年学校礼堂召开，有来自锡林郭勒盟各旗、察哈尔盟七旗（正蓝旗、太仆寺左旗除外）、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派来的代表和当时在苏尼特右旗的各界人士共计80余人参加大会。大会上首先选举产生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处。大会共举行三天，讨论通过了《内蒙古独立宣言》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最后

---

① 德力格尔朝克图：《我所了解的"蒙古青年革命党"》，乌兰察布盟政协编：《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二辑，111页，1984年。

又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27人，内有常务委员11人。[1] 政府委员有补英达赉、达密凌苏龙、穆克登宝、都古尔苏荣、吉尔嘎朗、特克希布彦（王宗洛）、阿拉坦敖其尔、乌力吉敖其尔、道尔吉勇荣、德力格尔朝克图、胡尔沁毕力格、布仁赛因、乌力吉那仁、都固尔札布、苏德那木永荣、罗布桑诺尔布、寿明图、哈丹巴图尔、色迪嘎尔玛、额尔敦陶克陶等人。接着政府委员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部长、副部长。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下设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交通、总务、宣传等部。原伪蒙古自治邦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赉任临时政府主席；原伪蒙古军第7师师长、察哈尔右翼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任临时政府副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吉尔嘎朗、穆克登宝、特克希布彦、乌力吉敖其尔、胡尔沁毕力格、布仁赛因、郭勒敏色等任各部部长或副部长。

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组成以临时政府副主席达密凌苏龙为首的六人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代表团的任务是感谢苏联和蒙古政府出兵解放内蒙古；请求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承认新成立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其临时政府；同时提出五项要求，"第一项要求苏联代为广播内蒙古成立人民共和国事，第二项要求将来世界和平会议内派代表参加，第三项要求借款五千万元，第四项要求帮助接济成立五个师的机械化武装，第五项要求借贷汽车五十辆，汽油五十万桶及电台和收音机多架。"[2]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66页。
② 同上，第967页。

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再次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乔巴山在接见这个代表团成员时曾表示："外蒙因国际关系不能帮助内蒙脱离中国成立独立国家，目前内蒙应当各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各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求得民族解放。"[①] 10 月 20 日，蒙古方面将这个代表团部分成员送回内蒙古。

抗战胜利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部分蒙古族革命者、开明上层人士，大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曾在伪满兴安省任职的官吏也纷纷汇集在兴安盟王爷庙，在苏蒙联军的支持下，酝酿、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蒙古民族运动。

1945 年 8 月 18 日，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人在王爷庙发起、组成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②] 宣言提出：公开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内蒙古解放军，协助苏蒙联军驱逐日寇，恢复地方秩序，铲除封建势力，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民族平等，联合中国革命力量，为蒙古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宣言还提出了内蒙古将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指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张。

8 月下旬，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首次党员会议。哈丰阿作了题为《党的经历》的报告，宣布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会议选举哈丰阿为东蒙党部秘书长，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萨嘎拉扎布、旺丹、桑杰扎布等 13 人为党部执行委员。会议宣读并通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临时党章》及《党纲》。9 月 13 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召开执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967 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4—1—6。

行委员会议，作出了向各盟旗派出工作人员，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青年团等项决议。会后，由近百名青年组成的工作队被分别派往内蒙古东部各盟旗，开展宣传《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组织旗党部，吸收新党员以及建立旗、县政府等活动。同时动员、组织蒙古族各界群众进行了以“内外蒙合并”为名义的签名运动。10月2日，集中在王爷庙的反日起义官兵在苏军城防司令部的支持下，成立了拥有350人的警备大队，下设4个中队，杜固尔扎布任大队长。警备大队在兴安盟中部地区立即展开了防治鼠疫，收缴散落枪械和清剿土匪等行动，迅速而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

10月下旬，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等10余人组成“东蒙古人民代表团”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局递交“请愿书”及签名簿，提出“内外蒙合并”的请求。乔巴山、泽登巴尔等蒙古党政领导人拒绝了代表团的请求，并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领导下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建议。

11月，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召开。以乌力图、协儒布僧格（李鸿范）、达瓦敖斯尔等组成的东蒙古代表团应邀参加会议。会前，代表团向会议组织机构呈递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要求对“内外蒙合并”的主张给予支持。代表团一行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政府领导人林枫、张学思、吕正操、高崇民等的亲切接见。林枫等人在谈话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支持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权利，实行民族自治的一贯立场。同时指出：内蒙古人民的当务之急，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争取民族解放；“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现实的。建议尽快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工作的乌兰夫

等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自治运动。东蒙古代表团接受了这些意见。乌力图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领导下，争取蒙古民族的解放。代表团回到王爷庙后，将会议情况向各界进行了传达。

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东蒙古人民代表团"返回后，"内外蒙合并"的宣传及签名活动逐渐停止了下来。部分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在对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后，决定立即开展东蒙古自治运动，通过发展自治运动，统一内蒙古各盟旗，进而实现内蒙古的"独立"。12 月 9 日，在王爷庙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预备会议，筹备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向各盟旗派出工作人员，进行会前的宣传、动员。同时派出包玉琨为代表，到张家口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建立联系。

1946 年 1 月 16 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葛根庙召开。内蒙古东部 36 个旗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制定、通过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对政府职能、行政区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 日，发表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①] 宣布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以兴安、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盟，呼伦贝尔、布特哈部，伊克明安、齐齐哈尔、苏鲁克旗为管辖领域，"实行高度民族自治"，"建设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②] 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统一指挥内蒙古东部地区各支蒙古民族武装。在 2 月 15 日的会议上，经选举产生了政府委员 15 名，博彦满都当选为政府主席，玛尼巴达喇当选为副主席，哈丰阿为秘书长；选出由哈丰阿、特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运动档案史料选编》，第 338—340 页。
② 同上，第 296 页。

木尔巴根等45人组成的政府“小呼拉尔”；设立了政府职能部门四部三处，任命阿思根为内防部部长，特木尔巴根为经济部部长，达瓦敖斯尔为民政部部长，张铁铮为司法部部长。同时，变更了原行政建制，除将兴安、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盟，呼伦贝尔地区改称省外，又在原兴安东省地区划设了纳文慕仁省，并任命了各省省长。

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分别致电表示祝贺。中共党员胡秉权、朱继先、黄文飞、王新波等应邀参加了会议。胡秉权以延安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受到了与会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欢迎。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废除了日伪统治时期强加给东部各盟旗人民的租税负担，制定了《经济建设总要》，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初步规划。1946年2月，创办了东蒙古实业公司，恢复了纺织、制铁、车辆修造、粮谷和皮毛加工等行业的生产；成立了东蒙古人民银行，对货币和市场进行了整顿；开辟商业渠道，组织木材、食盐等物资和畜产品运往东北解放区，进行易货贸易，部分缓解了各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上面临的严重困难。同时还兴办了部分医院、学校等，创办了《东蒙新报》，为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东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对于稳定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动荡局势，打击土匪和地方反动武装，抵制国民党势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东蒙工作创造了条件。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其发布的“宣言”、“施政纲领”和“自治法”中提出的一些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人民渴望摆脱民族压迫，争取解放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意愿。

但是，由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领导成员及自治运动的参与者成分较为复杂，所持立场不同，因而在政治主张中反映出不同的倾向，使得东蒙古自治运动呈现出进步与反动、正确与错误并存的复杂局面。在“内外蒙合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不同倾向的政治主张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进步势力一方面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仍坚持“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持有怀疑。而部分上层分子则与国民党进行联络，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1945 年 9 月 29 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发出《致在东北国民党党员书》，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国民党是“分工合作，殊途同归”，提出与国民党达成谅解。为探寻国民党对东蒙古自治的态度，1946 年 2 月 11 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以玛尼巴达喇、桑杰扎布等 7 人组成的“东蒙人民代表团”经长春抵达北平，并欲前往重庆向国民党当局请求承认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赴重庆的要求未能得到国民党准许的情况下，玛尼巴达喇等人与寓居北平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进行了接触，并邀请德王北上，参与东蒙古自治运动。在北平期间，玛尼巴达喇等人谒见了熊式辉、熊斌等国民党要员，还受到了国民党军统局首脑戴笠的接见，被称为“内向人士”。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促使部分蒙古族革命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对民族运动的方向、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主动与在东北开辟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部队建立联系，共同打击活动在兴安盟地区的国民党势力和土匪。在稳定社会秩序的斗争中，蒙古民族武装与八路军的团结、合作关系初步建立了起

来。1945 年 10 月，王爷庙民警大队在杜固尔扎布、王海山等青年军官的领导下，与到达西满地区的八路军嫩江 1 支队取得联系。王海山等与朱继先、王新波等八路军指挥员在葛根庙订立了共同发动和组建军队的协议。应八路军的要求，民警大队向嫩江 1 支队派出部分战士担任骑射教练员，还选派战士到白城子八路军干部训练班学习。

抗战胜利后，以惯匪阎振山为首的“维持队”与国民党“光复军”相勾结，在王爷庙地区形成了一股危害各族群众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的恶势力。1945 年 11 月，民警大队向驻白城子的八路军辽北军分区提出共同消灭这股匪徒的要求。八路军嫩江 1 支队派出由营教导员张义成率领的 10 余名战士赶赴王爷庙，在民警大队的配合下，解除了“维持队”的武装，捕获了匪首阎振山，为各族群众清除了祸患。11 月底，大批“光复军”进逼白城子，八路军辽北军分区机关处在危险境地。王爷庙民警大队闻讯后，立即前往救援，掩护军分区机关安全撤离。1946 年 1 月，白城子再次遭到“光复军”围攻，八路军嫩江 1 支队急电王爷庙求援。已扩编为民警总队的王爷庙地区蒙古民族武装迅速出动 4 个大队的全部兵力驰援白城子。在曹家窝铺，民警总队与嫩江 1 支队会合。经民警总队长杜固尔扎布和嫩江 1 支队司令员夏尚志共同商定，组成了联合指挥部，集中兵力向白城子外围之敌发起猛烈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敌军 700 余人，继而乘胜收复了白城子、洮南、安广等被反动地方武装占据的县城。

1945 年 12 月 5 日，兴安盟突泉县的反动地方势力发动暴乱。国民党“光复军”第 11 师 500 余人占据了突泉县城，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八路军辽北军分区派在突泉县工作的胡秉权、张廷钧等 10 余名干部、战士遭到扣押。王爷庙民警总

队得悉这一情况后，即由阿思根率领第2大队火速前往营救，八路军嫩江1支队也派出战士配合行动。18日夜，救援部队发起突袭，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激烈巷战。次日凌晨，敌军弃城溃逃，被监禁的八路军指战员全部获救，突泉县也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营救八路军的行动，在内蒙古东部一时传为佳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组建了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并拟在内蒙古东部的6个盟分别设立6个师的建制。为加快建军进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干部前往相邻解放区，与东北民主联军和地方民主政府取得联系，在打击国民党土匪武装、地方政权建设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1946年1月25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兴安南部地区主任乌力图等在辽源（今辽宁省双辽市）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张平化等举行会谈，就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部队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签订了协定（时称《吕阿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接受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领导、指挥，共同打击反动武装；西满军区向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派驻政治工作人员，并提供武器弹药及部分给养。《吕阿协定》的签订，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是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民族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化道路的开端。

1946年3月，在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人的倡议、主持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改组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部分为进步青年所反对的伪满官吏被清除出党的领导机构，修改并重新制定了党纲和党章。新的党纲明确提出："与蒙古人民革命党、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与巩固的关系"，进一步表明了联共反

蒋的政治立场。同时还主张“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独立，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①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下，东蒙古自治运动经历着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各种政治倾向间的矛盾和斗争，加速了民族运动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进步力量日益壮大起来。部分蒙古族革命者、青年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合作关系的初步建立，使自治运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自治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国内外形势以及内蒙古的历史和现状缺乏冷静的观察和正确分析，使得“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继“内外蒙合并”的错误主张之后又占据了自治运动的主导地位。在决定前途命运的严峻历史时刻，东蒙古自治运动面临着重大抉择。

日本投降后，呼伦贝尔地区处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局势一度混乱不堪。1945 年 8、9 月间，在苏联驻军的扶持下，部分城镇旗陆续组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临时性机构。在海拉尔，成立了以汉族商人傅锦堂为首的“海拉尔自治公署”；德春、卓德巴等蒙古族、达斡尔族人士也组建了“呼伦贝尔蒙旗行政公署”，管理呼伦贝尔地区各牧业旗的事务。

8 月 19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驻海拉尔。同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哈木苏荣率领的慰问团也进入呼伦贝尔地区。慰问团在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群众聚居的牧业区进行了以“内外蒙合并”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8 月 22 日，慰问团在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召开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一项主张呼伦贝尔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书，并发动、组织群众进行了签名活动。8 月 23 日，由善吉密图普、功果尔扎

①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4—1—6。

布等7人组成的呼伦贝尔代表团与哈木苏荣等一道前往乌兰巴托，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呈递“决议书”，要求呼伦贝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9月，以原伪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为首的数十名蒙古族、达斡尔族人士聚集海拉尔，酝酿发动民族自治运动，筹备组建权力机关和军队。10月1日，额尔钦巴图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并对政府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事项进行了讨论、磋商。与会人员一致推举额尔钦巴图为呼伦贝尔自治省主席，善吉密图普为副主席。选举了若干蒙古族、达斡尔族、汉族人士以及一名苏联侨民为政府参事。自治省政府下设政务、财务、实业、公安4个处及所属8个科，任命哈达为政务处长，战镇寰为财务处长，卓德巴为实业处长，平福任公安处长。组建省政府保安队，阿迪雅任队长。

10月8日，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大会在海拉尔举行，海拉尔、南屯一带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汉族各界群众近百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宣布：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正式成立，以海拉尔为中心，在呼伦贝尔原有管辖区域内实行高度的民族自治。驻海拉尔苏蒙军城防司令部、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等军队、机关派出的代表共20余人到会，苏军军官卡尔洛夫在会上致辞，表示祝贺。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成立后，撤销了海拉尔自治公署，任命了海拉尔、满洲里、扎赉诺尔等市镇的市长及各旗旗长，将政府保安队扩编为保安总队。

11月，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派出郭文通等人赴长春，试图通过国民党东北行营要求国民党当局对呼伦贝尔实行民族自治予以承认，结果遭到拒绝。郭文通一行转而前往哈尔滨，与中共中

央东北局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中共嫩江省委派到海拉尔开展工作的苏林等人也与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影响下的产物。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军对其给予了大力支持。它所持的反对民族压迫，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道路等政治主张，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呼伦贝尔地区蒙古、达斡尔等民族人民的愿望。自治省政府的成立，初步稳定了呼伦贝尔地区的局势，特别是对于稳定和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牧业区经济，缓和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困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自治运动的兴起，对国民党势力在呼伦贝尔地区的活动给予了抵制和打击。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曾于 1945 年 10 月派出蒙旗特派员李宗洲等人到海拉尔活动，企图建立国民党党部，被自治运动领导人严令禁止。因此，国民党在海拉尔等地的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呼伦贝尔地区的革命斗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自治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领导权等问题上，呼伦贝尔自治省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政治立场的分歧和权力之争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较多的派别并导致了长期的相互对立。大多数自治运动的参与者虽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主张坚决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渗透，但又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缺乏了解，因而对中国共产党开展呼伦贝尔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持有怀疑、抵触态度。他们强调呼伦贝尔情况特殊，以历史上曾实行过自治为由，试图依靠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援助，实现呼伦贝尔的“独立自治”。声称：“摆脱一切异民族的统治”，“不允许任何方面干涉呼伦贝尔的内

部生活。”[1] 出于对其局部地区利益的考虑，当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时，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未派代表参加在王爷庙举行的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围绕自治运动的道路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中，少数上层人士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主张呼伦贝尔的自治须得到国民党的认可而应等待“接收”。以青年为主体的进步势力则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及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联合其他地区的蒙古族革命力量，共同反对国民党，争取民族解放。

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和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呼伦贝尔独立自治的主张逐渐趋于沉寂，但在民族解放的方向、道路问题上，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处在重要历史关头。

五、蒙古族青年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蒙古族青年朝气蓬勃地投身于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真正的民族解放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有更多的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成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支强大力量。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地区的广大蒙古族青年，在严酷的环境中积极地探索着民族的出路。日本法西斯的奴化教育不仅未能使广大蒙古族青年成为任其驱使的工具，反而使他们的民族民主思想日趋激进。进步青年们冒着危险在学校和军队中宣传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的主张，举行秘密聚会，酝酿组织反日的革命力量。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桎梏，实现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成为蒙古族进步青年的共同信念。抗日战争胜利后，蒙古族青年结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体，

---

①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档案，第7、9号卷。

战斗在各地斗争前线，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日本统治下的伪蒙疆地区，德力格尔朝克图、布仁赛因、赛春阿等一部分具有反日进步思想的青年，于1944年夏天，在张家口秘密组织了蒙古青年革命党。他们主张依靠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帮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自决。他们还秘密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在张家口和苏尼特右旗举行了几次秘密聚会，初步制定了反对日本统治的行动计划，并逐渐从张家口转移到苏尼特右旗活动。在该旗几所学校的学生中通过讲授蒙古民族历史等形式增强了学生的民族意识，秘密传播了一些反日思想。1945年8月苏、蒙对日宣战前，该党成员已发展到十多名。当苏蒙联军机械化部队进入锡林郭勒草原时，该党在苏尼特右旗的一部分党员派德力格尔朝克图、胡尔沁毕力格等人主动出面欢迎苏蒙联军，并极力说服当时撤退到苏尼特右旗陶高图庙的部分伪蒙疆高级官员及该旗上层人士，扣捕了两名日本武装特务，交由苏蒙联军处决。蒙古青年革命党得到了苏蒙联军驻苏尼特右旗部队负责人的承认和支持，公开印发该党的章程和纲领，发展新党员。[①] 与此同时，苏尼特右旗伪蒙古军幼年学校学生，于8月10日在该旗毕西勒图庙举行暴动，杀死了稻永、佐滕、堀内等3名日本教官，集体投奔苏蒙联军。[②] 蒙古青年革命党在这些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蒙古青年革命党当时也赞同“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并参与了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活动。

① 德力格尔朝克图：《我所了解的“蒙古青年革命党”》，《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8－109页。

② 同上，第109页。

10月间，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派乌兰夫、奎璧等到苏尼特右旗解决“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在乌兰夫等人的耐心说服教育之下，蒙古青年革命党的绝大部分成员很快认清了伪蒙疆个别上层利用他们达到维护自己特权统治的企图，放弃了“内蒙古独立”的错误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解决内蒙古民族解放问题的方针政策，为改组、解散“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后，蒙古青年革命党自行解散，其大部分成员到张家口，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投入到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之中。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兴安盟王爷庙为中心掀起了蒙古族青年运动的高潮。数百名青年知识分子和反日起义官兵于1945年9月组建了蒙古民族武装——王爷庙民警中队，有效地维持了王爷庙及兴安盟中部地区的社会秩序。散布在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以及东北各城市的大批蒙古族大、中学生也纷纷聚集在王爷庙，投入到建立地方政权、打击国民党势力和日伪残余、清剿土匪的斗争中。部分地区的青年还自发地建立了组织，担负了团结青年、稳定地方局势的任务。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的蒙古族青年于1945年8月间先后成立了“大同会”、“同盟会”，与在当地开展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9月，云集在王爷庙的近千名蒙古族青年开始酝酿组建统一的革命青年组织，以团结青年，领导青年运动，其组织名称定为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在青年团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问题上，经会议讨论，大多数青年虽同意接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但明确反对该党所持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并表示与参与自治运动的部分原伪兴安省上层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1945年10月5日，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成立大会在王爷

庙贾家店举行。第一批团员共计 300 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团的执行委员会，特木尔巴根兼任秘书长，特古斯朝克图为副秘书长，布特格琪为组织部长，鲍荫扎布为宣传部长。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团的纲领及章程，发表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成立宣言》。团章规定：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是内蒙古青年的先锋队；以蒙古族的自由解放，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①] 会后，青年们分别前往内蒙古东部各盟旗开展工作，建立青年团基层组织，参与、组织“内外蒙合并”的签名活动。

在东蒙古自治运动复杂纷呈的局面中，广大蒙古族青年坚持联共反蒋的政治立场，积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主动与八路军及东北解放区各相邻的地方政权取得联系。

10 月，王爷庙民警大队在杜固尔扎布、王海山等人的领导下，与到达西满地区的八路军建立了联系，王海山等与八路军嫩江 1 支队朱继先、王新波等指挥员订立了共同发动群众和组建军队的协议。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派出旺丹、纪锦涛等人赴白城子，会见了中共白城子地委负责人任志远、朱继先，在剿匪、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设立了联络站。布特格琪等青年团领导人也前往齐齐哈尔，与原东北抗日联军王明贵部建立了联系。11 月，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邀请前来王爷庙地区参加剿匪战斗的八路军指战员为青年们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

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过程中，蒙古族进步青年对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45 年 12 月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8—1·32—1。

18日，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以蒙汉两种文字刊行了油印小报《黎明》，报道时事，宣传苏、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介绍中国革命的历程，以及中共关于时局的主张；连载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青年团还经常举办团课，学习马克思、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和社会发展史知识，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这一时期蒙古族青年开展的革命活动为东蒙古自治运动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

1946年初，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和中共东蒙工委相继成立，从此，蒙古族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张策、胡昭衡、胡秉权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蒙古族青年的革命热情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们活跃在各阶层、各行业群众中，引导、协助青年积极开展清匪反霸、除奸、护路等项工作，并将部分蒙古族青年陆续送往东北民主联军设在北安、齐齐哈尔等地的军政院校学习，还协助创办了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青年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对少数民族歧视压迫的罪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蒙古族青年开始对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进而逐步抛弃了“内外蒙合并”、“独立自治”等错误主张。

当东北解放区以清匪反霸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蓬勃展开并波及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后，青年们由初期以宣传工作为重点的活动迅速向掌握军队、建立地方政权的方向发展。他们仿效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深入群众，动员、组织力量，与地方封建势力、国民党土匪进行斗争，建立由革命青年组成的地方武装力量。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青年们的觉悟得到了提高，从而对东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1946年4月，内蒙古东西部的自治运动实现了统一。5月29日，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在王爷庙召开了团员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接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决议。6月1日，颁布了新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纲、团章》，规定："本团以团结内蒙古广大青年，提高政治觉悟，成为民众之先锋，积极参加内蒙古之解放事业，为建设和平民主的，健全繁荣的新蒙古而奋斗。"[①] 从此，内蒙古广大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内蒙古工作的有力助手。1946年上半年，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吸收杰尔格勒、杜固尔扎布、特古斯朝克图等数十名蒙古族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批青年干部担任了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工作。在保卫和建设内蒙古解放区的斗争中，青年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人为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一、中共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方针及全面开展内蒙古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部署总体战略方针、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地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密切关注内蒙古地区形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8—1·32—2。

势的发展，积极开展工作，并制定了内蒙工作的方针。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①] 指示电。

中央首先指出："在目前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连（联）系的有利地位。"显然，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是建立巩固的后方和联系苏蒙、打通国际通道的关键，而且也是内蒙古具有极重要战略地位的核心问题。因此，中央将内蒙古民族问题视为内蒙古革命的中心问题。

同时，中央确定"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提出从各旗开始，放手发动与组织蒙古民族的地方自治运动，在纯蒙古人区域建立自治政府，在蒙汉杂居地带则建立蒙汉联合政府；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盟旗的自治运动。而且要求党内应有统一的领导和政策。

中央要求制定对内蒙的各项政策时，"必须适时而慎重"，要求在制定政策之前，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要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的态度，调查日本和国民党过去如何统治内蒙的情况及其恶果，掌握目前内蒙各阶层的动态。中央就当时内蒙工作提出：要在蒙古族各阶层中揭露历史上国民党和日本欺骗与统治内蒙的罪行，以消除蒙古人对国民党的幻想；对于德王、李守信等应采取打击、分化、孤立的政策，争取反德王、不与德王合作的上层分子，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对伪军除最反动者外，应取宽大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64页。

政策；颁布盟旗自治政府简明纲领，建立地方武装，培养与提拔蒙古民族干部，检举蒙奸，举办有利于蒙民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军队必须保持良好纪律，尊重蒙民风俗习惯；要求由乌兰夫主持制定部队对蒙纪律及必须注意事项，以资遵守；扶植蒙古人中的进步力量，处置蒙奸、没收其财物等工作，必须发动蒙古人自己进行。

中央明确了西蒙工作的领导关系，大政方针由中央决定，实际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分别处理，乌兰夫从中联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蒙族干部统一由乌兰夫分配，每个地区要有一个主要的民族干部。中央特别要求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和冀热辽分局“均应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内蒙问题”。

中共中央在研究和制定内蒙古工作方针的过程中，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伊克昭盟和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开展呼伦贝尔地区和兴安盟、哲里木盟的工作；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冀热辽分局领导开辟乌兰察布盟、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工作，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各中央局分区负责，全面开展内蒙古工作的格局。同时以张家口为基地，以锡察盟为中心，大力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取得经验，全面推广。

当八路军进入张北县城以后，田户等将伪察哈尔盟公署的进步分子组织起来，于 8 月 22 日成立了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试图发动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特克希布彦（王宗洛）率领该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到达张北，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联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当即派乌兰夫率奎璧、克力更、陈炳宇、黄静涛、达成义、旺楚克、李新民、田户等十多名干部，以及当时在张家口的赛音济亚、寿明

图、高兴赛、胡尔沁毕力格等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并由一个警卫排护卫，从当时绥蒙政府驻地商都出发，于 10 月初到达苏尼特右旗德王府。

乌兰夫等同“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在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中深入了解情况，通过个别交谈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讲述内蒙古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介绍中国共产党目前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指出“内外蒙合并”、“内蒙古独立”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也是不允许的，而且对蒙古民族的解放是不利的。乌兰夫等还揭露补英达赉、吉尔嘎朗等伪蒙疆高级官吏鼓动“内外蒙合并”和“内蒙古独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从而争取了广大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和特克希布彦等一批蒙古上层人士。他们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同意改组政府。乌兰夫提出，临时政府应当改名为蒙古自治政府，并指出改组后的政府仍然是临时性的，将来还要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正式的政府。驻苏尼特右旗的苏蒙联军代表反对乌兰夫的意见，于是与苏蒙联军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仍然决定改组这个政府。补英达赉被迫退位，但仍保留了政府委员职位。中共方面有 5 个人参加政府，乌兰夫任主席兼军事部长、奎璧任内政部长、克力更任经济部长、田户任军事部副部长。另外，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被选入政府。由于当地粮食困难，燃料缺乏，交通不便等原因，政府搬迁到张北。乌兰夫等按照中共中央对内蒙工作的基本方针，争取蒙古族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团结以特克希布彦为首的一批蒙古族上层人士，成功地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争取锡察盟一带主张“内外蒙合并”、“内蒙古独立”的势力，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道路。

9月30日，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宝源（今太仆寺旗宝昌）召开了察哈尔盟各旗总管和代表联席会议，共计16人参加。会议宣传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民族政策，讨论了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向。最后各旗总管和代表一致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成立察哈尔盟各蒙旗联合办事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迁到张北后，乌兰夫建议上述办事处改为察哈尔盟政府，要求参照绥远省政府和绥蒙军区司令部公告的11项政策内容，制定察哈尔盟各旗的政策。

10月27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开展锡察盟工作和解决“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情况。11月8日和9日，晋察冀中央局两次致电中央，根据乌兰夫的意见提出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一个群众团体，又“带有政府的咨询机关性质”，[①] 由它“办学校、联络各盟旗，团结王公、喇嘛与知识分子，准备将来成立内蒙自治政府。”[②] 1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内蒙工作，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自治政府的方针，目前在各省区内之蒙民可成立地方性质之自治政府，分别归绥、察、热省政府领导。”[③] 11月23日，晋察冀中央局提出《目前对内蒙古政策的几个要点》，[④] 1、建立区域性的自治政权：各盟旗建立包括各个阶层的自治政权，并选举代表参加各省政府，在民族自决与自由平等联合的原则下接受各省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97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976页。
④ 同上，第981页。

政府之领导；各省政府帮助和改造各盟旗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蒙民生活，以建立内蒙古统一的自治政府。2、群众运动：发动内蒙古各阶层人民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它是群众运动统一的领导机关；目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帮助各盟旗建立和改造政权；创办各种为人民服务的福利事情；将来在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内蒙古统一的自治政府。3、准备建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恢复和编制盟旗保安队，发展民兵，改造旧军队和训练军事干部。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不仅积极支持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而且为联合会制定了基本方针与各项具体政策，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

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1945 年 11 月 6 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乌兰夫任筹委会主席。筹委会下设秘书处和总务处，具体负责召开大会的筹备事宜。由于各盟旗代表纷纷前来张家口报到，并带来各种提案，筹委会又于 15 日成立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对于大会代表资格，根据“一、在内蒙人民中有声望的；二、对内蒙解放运动有过贡献的；三、参加过抗战的”[①] 等条件来进行审查。21 日，筹委会又将出席大会的代表编成若干小组，互相研究提案及讨论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草案。25 日，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预备会议。筹委会主席乌兰夫说明召开预备会议的意义，并由克力更报告大会筹备经过。预备会议选举乌兰夫、奎璧、克力更、乌兰、田户、苏剑啸、乌力吉那仁、索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举行筹备会议》，1945 年 11 月 27 日《晋察冀日报》。

德那木扎木缚、阿拉登特古斯等9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通过了大会议事规程、会场规则及选举法。

1945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市远来庄礼堂隆重召开。当时的伊克昭、乌兰察布、巴彦塔拉、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等8个盟和阿拉善、额济纳、东布特哈、西布特哈、索伦等36个旗的代表以及有关军政团体和学校的代表共计79人参加大会。会场布置庄严肃穆，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和蒙古著名革命领袖苏和巴图尔的巨幅画像；会场四周遍悬各盟旗和各有关机关、团体赠送的贺幛，其中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贺幛题词是“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先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题词是“蒙古人民解放的灯塔”。[①]

上午11时，大会在悠扬的军乐声中正式开幕。代表们首先向革命领袖画像致敬，并向所有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三分钟。接着，乌兰夫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他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在内蒙古历史上，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今天的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的热忱援助之下，已经开始获得了解放，并且正在大踏步的向着全内蒙地方自治的方向迈进，”“今天内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赞助之下，才能求得彻底解放，才有其光明灿烂的前途。”他号召与会代表“把大会的各种决议带回各个盟旗去，使涣散着的蒙古人民组织起来，

① 秋浦：《大会第一日经过详情》，1945年11月29日《晋察冀日报》。

发动起来，为彻底实现全内蒙的地方自治而奋斗。”①

应邀参加大会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代表刘澜涛在讲话中热烈祝贺大会的胜利召开，他追溯蒙古民族遭受民族压迫和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后说：“内蒙古民族达到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以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亲密合作，才能求得内蒙民族的真正自治和民族平等。”他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愿以最大可能的力量来帮助内蒙古地方自治运动的成功。”② 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察哈尔省主席张苏等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一致强调蒙汉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另外，东西布特哈旗代表阿尔登巴图和察哈尔盟镶白旗代表哈斯瓦齐尔分别讲话，对于来宾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指示和殷切期望，表示感谢和诚恳接受，并坚决表示今后决心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下，为内蒙古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27 日，乌兰夫向大会作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发动内蒙古群众运动的最高统一的领导机关，也是建设内蒙古民主政府必经的桥梁。27 日，大会讨论通过了“意见案”，并正式确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方针是：（一）在政治上，通过自治运动首先建立各盟旗自治政府，在民族平等与民主自由的原则下分别接受热察绥等省政府的领导。在各该省政府的帮助下，发展内蒙古各盟旗的政

---

① 《云泽主席开会词》，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传部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1945 年 12 月 15 日。

②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暨晋察冀军区代表刘澜涛先生讲话》，《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逐步实现全内蒙古的自治，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二）在军事上，建立为人民服务的内蒙人民自卫军，以肃清境内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民主自由，巩固革命社会的秩序；（三）在经济上，确立为人民谋福利的经济政策，提倡合作贸易事业，禁止和取缔奸商的不等价交换和欺骗贸易，发展蒙古族人民的畜牧业生产，发展原有的手工业，没收敌伪财产，创办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和救济贫苦人民；（四）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普及的方针和说服教育的方式，使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尽快恢复各盟旗旧有的学校、并创办一所内蒙古学院和短期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蒙古民族干部；（五）在医疗卫生事业上，在各盟旗设立一所小型医院，免费为蒙古族人民治病，组织和改造喇嘛医、中医等医疗人员为人民、为生产服务；并适当解决兽医问题，以减少牲畜的死亡率；（六）对于喇嘛，采取信教与不信教自由的政策，用说服教育的方式争取小喇嘛学文化，让一般喇嘛为民族事业服务，并对喇嘛庙的财产加以保护；（七）在民族关系方面，揭露过去大汉族主义者和日本法西斯的挑拨离间阴谋，广泛宣传蒙汉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才能使内蒙获得解放的道理，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以照顾蒙汉人民大众利益为出发点，正确解决蒙汉杂居地区的土地问题；（八）在宣传方面，要利用一切时机向蒙古族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法西斯欺骗宣传，使蒙古人民真正认清民族解放的道路；（九）对于旧政权人员方面，要彻底肃清蒙地之法西斯残余势力，改造过去伪政权中之工作人员，使之重新为蒙古民族服务；（十）各盟旗政府可以建议各省政府，

与外蒙古交涉通商问题，以繁荣内蒙之经济。[①]

大会还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会章”规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宗旨是“团结内蒙古各阶层人士，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发动与组织内蒙古人民，彻底肃清法西斯残余，坚决反对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建立内蒙古民族平等、包括各个阶层的地方性的民主自治政权。从事适合于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新建设，以求内蒙彻底解放，并为实现自由联邦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②] 联合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设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中推选一人为主席，并兼常委会主席。联合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秘书处；各盟设分会，受联合会执委会直接领导，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下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妇女、秘书等六科。各旗设支会，受盟分会直接领导，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各苏木亦设苏木支会，受旗支会直接领导。会员 3 人以上即可组织会员小组，受苏木支会领导。“会章”还规定了联合会代表大会和执委会以及各级组织会议的会期和会员的资格、权力、义务等。

同一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与会代表提出的“关于发展各盟旗经济建设案”、“关于赈济灾民案”、“关于振兴牧业案”、“关于复兴各盟旗必要的交通通信案”、“关于成立内蒙古学院创办训练班并急速创办各盟旗学校案”、“关于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重行编审教科书案”、“关于创办报社、印刷厂、编译馆图书馆

① 《云泽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对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25—27 页。

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

案”、“关于普遍推行医疗卫生保健工作案”、“关于确定宗教信仰原则案”、“关于组织各盟旗人民自卫武装案”、“关于组织志愿兵（民兵）案”等11个提案，它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医疗卫生、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内蒙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代表们主人翁的地位，表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意愿。

28日上午，与会全体代表在从未有过的民主气氛中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乌兰夫（云泽）、奎璧、乌兰、孟子裕、克力更、旺楚克、田户、乌力吉那仁、胡尔沁毕力格、包崇新、苏剑啸、田协安、陈炳宇、丹巴、索德那木扎木绰、才喜雅拉图、松津旺楚克、李海山、萨穆丕勒诺尔布、李新民、索德那木勇荣等21人当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些委员不仅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而且包括蒙汉等民族的各阶层人士，其中有工人、青年学生、士绅、王公等。特别是有一位蒙古族妇女代表乌兰当选为委员，而且与乌兰夫并列得票榜首，这在内蒙古历史上是第一次。接着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通电全国反对内战》、《电谢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文件。宣言热烈欢呼内蒙古人民历史命运新时期的开始，声明“为了广泛的发动内蒙人民实现民主自治，大会代表一致通过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它将领导内蒙人民走向民族解放的大道。大会一致认为欲求内蒙人民全部彻底之解放，唯有拥护中国共产党之领导，舍此即无内蒙人民之解放。”[1] 大会代表发表通电，严斥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全体代表以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

无限的深情电谢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对内蒙人民解放事业的帮助，深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以民族平等的精神帮助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向前发展。"[①] 最后，乌兰夫代表新选出的执委会致闭幕词，他热情地赞扬了大会的成功，并代表执委会表示："我们一定要为内蒙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期望与会代表将大会的一切决定和民主与团结的精神带到各盟各旗，以唤醒与组织人民，付诸实施，"只有如此，我们的斗争才有力量，我们的解放才有希望。"最后他说："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在毛主席英明的民族政策领导下，在各民族人民、各进步党派、各民主人士的赞助下，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能够完成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解放内蒙古。"[②] 大会在欢快的音乐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胜利闭幕。

11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向全国发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公报》，[③] 首先欢呼内蒙古人民"消灭了反动战争，打垮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解放。""衷心的感谢苏蒙联军和八路军，以及国内各民族的男女老少诸位同胞对我们的伟大的帮助。"接着揭露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和对内蒙古人民的统治，批驳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否认中国少数民族存在的谬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的罪行，宣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宣布联合会的宗旨和各项政策、主张，特别强调"内蒙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
② 同上。
③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41—43 页。

当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首次执委会议，增选关起义、包正言、图们巴雅尔、庆格勒图等4人为执行委员，增补胡格吉呼、黄静涛为候补执行委员；执委会全体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乌兰夫、奎璧、克力更、关起义、包正言、田户、索德那木扎木绰、乌力吉那仁、胡尔沁毕力格、包崇新、乌兰等11人为执委会常务委员；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刘春任秘书长，奎璧任组织部长，克力更任宣传部长，乌兰夫兼军事部长，索德那木扎木绰任青年部长，乌兰任妇女部长，刘景平任秘书处长。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革命群众团体，同时又是一个团结内蒙古各族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还代行政权职能，是一个半群众团体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实际是当时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过渡到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一个桥梁。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创举，具有突出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和时代特点。在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兴起各种形式和不同内容的蒙古民族运动的情况下，联合蒙古民族各阶层，包括联合各种形式的蒙古民族运动，以民族区域自治实现蒙古民族解放，联合蒙古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现共同的解放，完成内蒙古的民族民主革命。联合的意义深远，联合的力量无穷。这就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意义和作用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伟大实践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蒙古民族运动纷起的时候，正式树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帷幕。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全面展开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立即派出大批干部到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和东部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兴安盟等地，积极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各项方针、政策，筹备成立联合会各盟旗分、支会和盟旗政府；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武装；开办各类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创办蒙汉文报纸，宣传报导各盟旗状况和自治运动；建立实业公司，组织恢复牧区的商品流通。

1946年初，苏剑啸和陈炳宇带领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察哈尔盟代表，到察哈尔盟开展自治运动和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各级组织。他们在察哈尔盟租银地哈巴嘎召集全盟各旗旗长及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举行会议，经过民主协商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盟分会筹备委员会。会后，各旗旗长和筹委会委员分别深入到镶黄旗、商都旗、明安旗、正白旗、镶白旗、正兰旗等地调查了解地方情况，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发展会员，筹备建立各旗、苏木（佐）支会。到2月中旬，察哈尔盟共成立了9个旗支会，67个苏木支会和437个小组，发展会员共达4091名，其中女会员439名，喇嘛536名。[①] 从3月10日开始，在全盟范围内进行了由下而上的普选，选举产生了各旗政府委员和旗长，同时选举产生了出席全盟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3月27日，察哈尔盟人民代表大会在明安旗多恩海拉罕（又称女子部，即女子学校校舍）隆重召开，共有156名代表出席。大会讨论通过了地方自治、财政经济、文化教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察盟获巨大发展》，1946年5月30日《晋察冀日报》。

育、政府工作方针、迁移自由等40余件提案，选出陈炳宇、苏剑啸、索德那木扎木维、哈斯瓦其尔、色伯克扎布、拉木扎布、劳布森、伊德玛扎布、布彦等9人为察哈尔盟政府委员；仲山、额尔和赛音为候补委员，正式成立了察哈尔盟政府，陈炳宇当选为盟长，色伯克扎布和哈斯瓦其尔当选为副盟长。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盟分会也宣布成立，苏剑啸任主任，拉木扎布任副主任。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还先后派潮洛蒙、旺楚克、赛音吉雅、奇峻山、丹巴、云世英等到锡林郭勒盟开展自治运动。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在锡林郭勒盟各旗普遍成立了联合会支会，发展会员6000多名。[①] 经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于3月10日在贝子庙成立了锡林郭勒盟政府，松津旺楚克任盟长，陈炳宇任副盟长，潮洛蒙任代理副盟长。盟政府下设秘书处、教育处、财经处、公安处、喇嘛事务处。4月5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林郭勒盟分会也宣布成立，阿拉坦敖其尔（苏尼特右旗旗长）任锡盟分会主任，赛音吉雅任副主任。5月，锡盟代理副盟长潮洛蒙在贝子庙主持召开了由全盟各旗王公、仕官及联合会干部等200余人参加的大会，宣布锡盟政府及联合会锡盟分会成立的经过和人员组成，讲述了成立锡盟政府和盟分会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要求与会的王公、仕官等积极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促进社会进步，共同维护锡盟的社会秩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使命。6月，由于分会主任阿拉坦敖其尔提出辞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

① 《王宗洛在执委扩大会上作锡盟工作的报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210页。

会常委会任命奇峻山为锡盟分会主任。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盟分会和锡林郭勒盟分会直属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委会领导，锡林郭勒盟政府和察哈尔盟政府在行政上归察哈尔省政府领导，实际工作由联合会常委会负责。盟分会“与盟政府的关系是领导关系，而不是平行的关系”，[①] 盟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干部任用调动及其他大的问题，均由盟分会讨论决定后执行。6 月，察哈尔省政府正式划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为“自治区”。[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察哈尔、锡林郭勒盟建立民主政权，开展自治运动，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在农区进行除奸反霸和减租减息，在牧区削弱封建特权，并实行自由放牧，奖励生产，打击旅蒙商的不等价交换和发展国营贸易事业等措施，逐步解决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困难，为把察哈尔、锡林郭勒盟建成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46 年 1 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奎璧、李文精等到绥蒙解放区的巴彦塔拉盟和乌兰察布盟开展自治运动。不久，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察布盟分会和巴彦塔拉盟分会成立，奎璧和李文精分别担任巴盟分会和乌盟分会主任。由于巴彦塔拉盟和乌兰察布盟大部分地区处在国民党统治下，内蒙古自治运动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尽管如此，巴盟分会和乌盟分会仍在绥蒙解放区的蒙古族聚居地区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

---

① 《云泽关于察盟工作给苏剑啸、陈炳宇等同志的信》，《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76 页。

② 《察省推进民族自治，划察锡两盟为自治区》，1946 年 7 月 3 日《解放日报》。

各项方针、政策，发展联合会会员，推动了自治运动的发展。

在巴彦塔拉盟，首先成立了联合会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支会和该四旗各苏木支会，吸收各旗进步人士为支会委员，发展会员 260 名。[①] 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联合会的工作方针，巴盟分会"以调整'随缺地'，奖励生产，作为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心，"[②] 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同时以联合会会员为骨干，改造四旗旧政权，民主选举旗长，旗政府吸收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参加。随着民主旗政权的建立，对于各旗保安队也进行了改造。为发展该地区自治运动的需要，巴盟分会挑选 200 余名青年到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学习；还就地培养了 90 多名军、政、民干部。在这四个旗内建立 5 所小学校，完全实行公费入学，特别强调以蒙文蒙语授课为主，使 200 余名蒙古族贫苦儿童有了上学的机会。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察布盟分会于 1946 年 1 月成立后，在四子王旗等地进行自治运动的宣传工作。李文精还率领内蒙古游击大队在土木尔台打退了国民党鄂友三、赵大义部的进攻。在乌盟分会领导下成立了联合会四子王旗支会和土木尔台支会，发展会员约 300 名；民主选举产生了四子王旗旗政府，吸收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参加政府工作；成立合作社，减轻了奸商对牧民的剥削。

根据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决议，为大力培养蒙古族军政干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于 1945 年 12 月在张家口创办内

① 《奎璧在执委扩大会上作巴、乌盟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205 页。

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205 页。

蒙古军政学院。晋察冀中央局派朱荣、苏镜、齐永存和延安来的梁洪及延安民族学院的蒙、藏、彝等各族干部十余人到学院工作。乌兰夫任军政学院院长，朱荣任教育长，齐永存任教务处长，寒峰任军事部长。军政学院下设行政部、军事部、中学部。学院的教育方针是以“提高政治水平，根绝旧社会恶习，为广大蒙古人民服务为目的。”学院招收了在张家口的伪蒙疆兴蒙学院的几十名学生和乌兰察布、巴彦塔拉、锡林郭勒、察哈尔等盟以及昭乌达盟一带的蒙古族知识青年入学。[①] 学院设社会科学、国际政治常识、国内政治常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蒙古民族社会常识、蒙古革命运动史以及蒙文、算术、美术等课程。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反复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性质和前途。同时，反复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内蒙古民族解放道路的教育。经过二三个月的学习，绝大多数学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蒙古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奋斗，才能获得解放、发展和繁荣。学生中的一些先进分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46年4月，学院学生人数达到“250人，内女学生20余人”。[②] 军政学院军事部的学员主要来自内蒙古骑兵独立旅，将200多学员编为两个大队，除进行日常军事训练外，主要进行政治教育，加强思想改造，清除旧军队的恶习，提高对党和人民军

---

① 梁洪、庄昆：《一所新型的学校——内蒙古学院》，《内蒙古周报》创刊号，1946年3月17日。

② 《张家口内蒙古学院》，1946年4月16日《解放日报》。

队的认识，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建军路线和原则。军事部的学员经几个月的学习训练，绝大部分人的思想觉悟、军事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他们大部分人后来成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6师的骨干力量。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中明确提出："应当确定为人民谋福利之经济政策，""提倡合作事业，禁止和取缔过去奸商在蒙地之不等价交换和欺骗的贸易。在贸易上，基本上应当是公平交易，互利互惠并以有利于蒙民生计为原则。……创办有益于蒙古人民之事业，和救济各盟旗的贫苦人民。"[①] 根据这一方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1946年年初开始筹备成立内蒙古实业公司。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紧缩开支，挤出部分经费用以创办实业公司。另外，采取入股分红的办法，动员社会集资，筹足了公司所需资金。内蒙古实业公司组织了董事会，乌兰夫任董事长。乌兰夫还提请中央批准从派往东北的干部中截留20多名做过财贸工作的干部在内蒙工作。又从旧政权留用人员中挑选部分从事过贸易工作或愿意从事民族贸易工作的蒙古族青年，充实到内蒙古实业公司；另外还从社会上招收一部分"具有蒙语会话和商业技术知识的人员"，[②] 到实业公司工作。

内蒙古实业公司于1946年3月在张家口正式成立，赵云驶任总经理，关起义任副总经理。公司设秘书室、营业部、研究室等机构。内蒙古实业公司下设宝源、明安旗、贝子庙等三个分公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案》，1945年11月29日《晋察冀日报》。

② 林蔚然：《我在内蒙古地区民贸战线的经历》，《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1辑，第86页，1990年。

司，于4、5月间分别成立并开始营业。内蒙古实业公司是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下的开发资源、发展生产、改良畜牧、组织合作事业和土特产加工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体，同时又是输入牧民生活必需品、输出畜牧土特产品的商业机构。到是年6月份，内蒙古实业公司在锡林郭勒盟“已经有19个经营单位，察哈尔盟有5个经营单位”。[①] 另外在张北县和多伦县也设立了分支公司。内蒙古实业公司的方向是以实业为主。但是根据牧区的实际情况，先以贸易为中心，向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广大牧区输送牧民急需的日用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解决牧民的燃眉之急。同时，为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在国民党经济封锁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收购了大量的皮毛。这些贸易活动，受到了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内战爆发以后，内蒙古实业公司转移到贝子庙，其任务改为对军队和地方机关的后勤供应，牧区的民族贸易暂时停顿。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就曾明确提出“关于蒙文报纸和印刷机关之建设，也应立即着手进行。”[②] 据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报社，勇夫任社长，石琳任总编辑。从1946年3月17日开始出版了蒙汉合璧的《内蒙古周报》。这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刊物，“以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的实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团结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努力建设新内蒙古，配合全国解放为宗

---

① 林蔚然：《我在内蒙古地区民贸战线的经历》，《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1辑，第104页。

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案》，1945年11月29日《晋察冀日报》。

旨。"[①]《内蒙古周报》的内容有评论、各盟报导、一周时事简述、通讯、卫生常识、文艺等。该刊限于当时的局势和交通条件，主要发行于张家口、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等地，"总共约出刊20余期。"[②] 1946年9月，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自治运动联合会转移到贝子庙，《内蒙古周报》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伊克昭盟绝大部分地区依然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武装仅控制着鄂托克旗南部及乌审旗西部根据地。为了适应国共停战后的新形势，推进伊盟地区的民族自治，194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伊克昭盟的工作。会议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伊盟形势，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指出伊盟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北方门户，对巩固边区上，具有战略地位，"[③] 而且蒙古民族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要求，并不会因为和平时期的到来而改变或减弱的。根据这种形势，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伊盟地区的基本政策，即"民族自治，土地要完整，内部要统一，团结蒙古人民在统一基础上，从区域（各旗）自治开始，实行地方自治"；伊盟工作的方针是"广泛开展上层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团结蒙人，巩固和平，统一内部，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政策。"[④] 对于蒙古民族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应在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民族自治中适当提出逐步解决，帮助蒙古人发展经济，举办医疗、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

---

① 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第9页，内蒙古图书馆刊印，1987年。

② 同上，第10页。

③《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伊盟工作纪要》，《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03页。

④《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卷，第304页。

与宗教信仰。会议还决定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仍单独设立，直接受西北局领导，专门领导伊盟工作，并与中共三边地委保持联系。伊盟工委由赵通儒、曹步诚、曹栋子、高增培、徐子猷、田万生、孙润华、黎光、刘长汉等九名委员组成，赵通儒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乌审旗工委和鄂托克旗工委，并向东胜县、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及桃力民等地派出干部开展工作，吸收蒙古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会议不仅确定了对伊盟工作的方针、政策及领导机构，而且对乌审旗、鄂托克旗的工作也作了具体部署，提醒在伊盟工作的同志，不要因和平时期的到来，放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警惕，要更加谨慎，时刻了解敌人，了解和研究新情况，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广大蒙古人民，实现全伊盟的自治。

总之，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经过中共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西北局、晋绥分局、冀热辽分局以及西满分局的共同努力，分头工作，尤其随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从东到西，普遍开展起来了。

四、“四三”会议及其历史意义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将联合内蒙古一切民族解放力量，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确定为联合会的既定方针。联合会成立后不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代表包玉琨带着特木尔巴根、萨嘎拉扎布、哈丰阿、乌云达赉等四人写给乌力吉敖其尔、白海风、佛鼎、敖其尔等四人的信来到了张家口。信中介绍了日本投降后的东蒙情况，并请乌力吉敖其尔等介绍中国方面内部情况和对内蒙的决议等。因此，为了解东蒙自治情况，研究解决内蒙古统一自治的问题，并在东部几个盟建立联合会分、支会

机构，乌兰夫提请晋察冀中央局同意，组成东蒙工作团，开展东蒙工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刘春任团长，克力更任副团长，成员有包彦、乌兰、孔飞、田户、乌力吉那仁、才喜雅拉图、庆格勒图、高德明、桑培勒、白音仓等。决定由刘春代表联合会和乌兰夫主席，赴王爷庙同东蒙负责人谈判联合问题。

东蒙工作团和包玉琨一起于1945年12月底抵达承德，向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和军区司令员肖克汇报了东蒙工作团的任务，商谈了在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分、支会，开展自治运动的问题。在承德还设立了联合会驻承德办事处，田户任主任。东蒙工作团经围场分批到达中共热河省委所在地赤峰后，便派乌力吉那仁随包玉琨先期前往王爷庙，请东蒙派代表来赤峰或承德会谈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不久，又派克力更带乌兰夫的亲笔信与包彦一起前往王爷庙。

乌力吉那仁、包玉琨到达王爷庙时正值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乌力吉那仁应邀以来宾身份参加。不久，克力更等也经郑家屯赶到王爷庙，会见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负责人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转交了乌兰夫的亲笔信，并面陈来意。博彦满都、哈丰阿等对于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商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很积极，决定亲往赤峰会谈。

1946年2月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的孔飞、乌兰、田户等根据联合会的指示，在中共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的积极帮助下，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到卓索图盟开展工作的白云航、苏赫、阿英嘎等进步青年合作，在赤峰组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白云航任主任，孔飞任副主任，乌兰、金起铣、田户、陈布仁、乌力吉扎布等为委员。

1946年初，为卓、昭两盟地区培养蒙古民族干部，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中共冀热辽分局商定，在赤峰成立内蒙古自治学院，由热河省政府主办并解决办学经费。内蒙古自治学院于194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金起铣任院长，王松龄任教务主任。教员起初只有从延安来的汪士汉和李啸风，另有于乐图、图布分管院务。"四·三"会议后，乌兰夫兼任院长，刘春、金起铣任副院长。自治学院以"培养忠实为内蒙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建设新民主主义内蒙古的各种人才为宗旨。"[①] 学院属短期训练班性质，学期为3——6个月，开始时只设行政部和中学部，学员约一百多人，大多是从卓、昭盟各旗动员来的蒙古族中、小学生。行政部主要培养党、政工作干部；中学部则以学文化为主。学院的课程主要讲授社会发展概论、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等。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学员除在校学习理论、文化课程外，还参加工作组，分赴农村、牧区开展群众运动，参加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逼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迁到林东。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其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在东北问题上陷入被动局面的国民党则利用这一问题混淆视听，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9日，蒋介石在致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并转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的"代电"中称："查兴安蒙旗酝酿独立，必有共党与

① 申居宁：《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内蒙古地区创建的三所院校》，《内蒙古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6期。

外蒙方面之阴谋策动，殊堪注意。应即切实设法，就地消弭……。”[①] 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策划下，以曹剑章、贺其业勒图墨尔根等封建上层、大地主 22 人在沈阳联名发出了《反对兴安独立通电》，诬蔑中国共产党“分裂国家”。同时，国民党还开动宣传机器，在东蒙古自治问题上制造舆论。一些“边疆专家”也趁机鼓吹“民族同化”。[②] 针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中共中央于 2 月 18 日致电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指出：“国民党现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已引起国内外注意，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同时还指出：“内蒙人民革命党纲领过左，我们不能赞助该党之纲领及活动。如有可能，并应劝告其改变方针。并对国民党谣言设法加以揭破。”[③]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告东北局：“我们研究了东蒙人民自治政府的主张与行动以后，认为在今天整个国内国际形势下，成立这种自治共和国式的政府仍然是过左的，对蒙古民族、中国人民与苏联和外蒙的外交都是不利的，徒然供给反动派一个反苏反共的借口。”“东蒙今天应依和平建国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行地方自治，……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④]

1946 年 2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出胡昭衡等人到兴安盟王爷庙，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领导人取得联系，调查、了解情况。3 月 28 日，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成立，张策为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 141，档号 1058。
② 李士钟：《辟所谓“东蒙自治”》，《绥远新生》第 12 期，1946 年 3 月 1 日。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00 页。
④ 同上，第 1011 页。

西满军区全权代表，成员有先后到达的方知达、胡秉权、胡昭衡、胡子寿、蒋弼仁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党在东蒙的工作方针，即：广泛建立蒙汉民族统一战线；孤立、打击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掌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青年团的领导权。目前工作中心是建立广泛的蒙古人民统一战线，掌握蒙古民族武装与政权，发动农牧民，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①] 3 月 3 日，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中共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西满军区副政委黄克诚就东蒙自治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出报告，分析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纲领、主张以及领导成员，提出“热河蒙古自治运动缺乏领导核心，最好请云泽同志抽出一定时间来此，以便掌握东蒙古人民正确领导关系。”[②]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内蒙问题的指示电，要求“对东蒙自治政府政策应慎重，并要相机说服他们接受区域自治，但仍应以团结为主，不要操之过急促他们离开，使他们趋向国民党。”[③]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东北局、冀热辽分局为促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共同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在组织、联络、护送代表等方面作出了妥善的安排。

3 月中旬，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领导人与克力更、包彦、乌力吉那仁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成员一道由王爷庙抵达赤峰。经中共冀热辽分局提议，会议改在承德举行。3 月下旬，双方代表转赴承德，在热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42—1043 页。
② 同上，第 1014 页。
③ 同上，第 1023 页。

烈而融洽的气氛中会合。双方确定，各派 7 名代表参加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为：乌兰夫、刘春、克力更、包彦、田户、乌力吉那仁、庆格勒图；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包玉琨、白云航、义达嘎苏隆、喀萨巴特尔。列席代表 4 名：黄静涛、常永新、厚和哈达、厚和巴图尔。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共召开了 5 次预备会议。会上，双方代表各自介绍了自治运动开展以来的情况，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对统一自治运动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细致的探讨、协商。双方代表都认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共同解放，是蒙古族人民的普遍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尽快实现统一。但是在自治运动的方向、道路和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上，双方代表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虽赞同自治运动的统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但不愿放弃最终实行内蒙古“独立自治”的主张，提出了自治运动统一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主张。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上述主张，坚持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的方针。在讨论中，通过深入分析内蒙古的社会情况和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关系，展望了两种不同性质自治运动的前途，指出：内蒙古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必须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治”的主张，将使内蒙古自治运动陷于孤立而导致失败。为更加广泛地团结人民，集中力量抵御国民党向内蒙古的进攻，应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的各项

工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代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耐心、诚恳的劝导和严肃、坦率的批驳，最终使双方在关系到内蒙古自治运动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在行政管理、行政设置、人事安排以及与各解放区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上也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正式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正式举行。乌兰夫在致词中说：“东西两部蒙古同志们在这里能谈自己的自治和民族如何解放的问题，从内蒙古解放运动的历史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此次东蒙古代表同志为蒙古的事各处奔走，为的是解放蒙古，对这个我们是很钦佩的。”“内蒙古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去争取奋斗的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不约而同。”“只要站在为内蒙古民族有利益的一个立场去争取、努力，那么，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的。”① 博彦满都在致词中说：“今天的会议是内蒙古民族最重要并且在内蒙古革命历史上也是很光荣的一个会议。”“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蒙古民族的生存的道路已经打开了，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途径去努力。我们得到解放的好环境，就是因为中共八年抗战和北边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力量。我们认为中共是为解放民族，为民主主义而努力的，中共的目的和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因这一样的关系，我们跟随中共，在中共领导下而迈进，这就是我们的途径打开了。更有我们作中心的云泽主席从来为蒙古民族自由奋斗到今天，他又曾在中共中心的延安研究过多年民族问题，我们有这样理想的中心人物，实在是可以放心的。所以，在近几日的会议，通过衷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49页。

心的谈话，意见一致，思想一致。由此可想，这个现象实在为我们蒙古民族好的光明。"[①]

经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决议"内容为：

一、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共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在目前的形势下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分会、支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选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及帮助。

二、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曾申明内蒙自治运动有统一机构后即撤废，现东西蒙已统一于联合会，决定东蒙代表回去就召开代表会议，施行解散，今后在东蒙设联合会总分会领导工作。

三、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盟管旗，专署管县，蒙人优势区或深入蒙人区之汉人区实行民主自治，受民主盟政府领导，盟旗政府按具体情形应有汉人委员。"九一八"以前未设县之地不再设县，设治局废除，不改设县。深入蒙地之汉县，八路军得在该地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维持治安，以防特务活动。

四、联合会统一领导蒙古军队武装，并处理关于内蒙古建军、整编、训练、人事等问题。鉴于目前的形势条件，规定各蒙古军队应分别地域，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一切内蒙古军队必须使之真正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民主自治的人民武装。

五、扩大原联合会机构为八部一处：组织部、宣传部、总务部、经济建设部、文化教育部、军事部、妇女部、青年部及秘书处。

执委由25人增选至63人（名单略），候补执委，由2人增

---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50—51页。

选至 12 人（名单略）。并由执委中推选常委 26 人：云泽（乌兰夫）、奎璧、克力更、乌兰、田户、乌力吉那仁、包崇新、胡尔沁毕力格、包彦、索德那木扎木绰、关起义、刘春、乌力吉敖其尔、李森、白云航、博彦满都、玛尼巴达喇、特木尔巴根、阿思根、桑杰扎布、哈丰阿、义达嘎苏隆、萨嘎拉扎布、朋斯克、宝音扎布、旺丹。

云泽为执委会兼常委会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组织部长奎璧、副朋斯克；宣传部长哈丰阿、副勇夫；文化教育部长包彦、副桑杰扎布；军事部长云泽、副阿思根、田户；经济建设部长特木尔巴根；妇女部长乌兰；总务部长玛尼巴达喇、副克力更；秘书处长刘景平、副乌力吉那仁、义达嘎苏隆；青年部长特木尔巴根、副宝音扎布、索德那木扎木绰；秘书长刘春、副哈丰阿。（但在东蒙古自治政府未宣布解散前，不能公布。）

在联合会下设东蒙总分会，领导东 4 盟（哲里木、兴安、纳文慕仁、呼伦贝尔盟）工作。

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 4 盟受联合会直接领导，西蒙总分会领导西 3 盟（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伊克昭等）及宁夏蒙古之工作。

六、各解放区国大代表，应注意蒙古代表问题，并争取选举民族代表，补国民党既指定之蒙古代表中已死或投敌、罪大者的名额。

七、各解放区政府、各军区帮助解决救济蒙民、培养干部、军队训练、给养及机关经费、服装等问题。西满多派干部参加王爷庙蒙古工作。

八、目前联合会之中心工作为大量放手以发动群众参加民主自治运动，发展会员建立分、支会，改选政权，预防特务破坏活

动，给国民党反动派与一切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行动以打击。

九、以赤峰为内蒙古临时中心区域地，联合会建此，并在林东准备。①

“决议”通过后，由中共冀热辽分局上报晋察冀中央局，并转呈了中共中央。

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之所以能够由开始时的重大分歧，经辩论和协商，最终通过会议决议，是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分不开的。东北、华北解放区为会议的成功召开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下，东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者们在面临决定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命运的重大历史时刻，经过探索、徘徊的历程，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从而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不仅放弃了“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而且在行动上自觉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会议期间，根据本人申请，经中共冀热辽分局的批准，哈丰阿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特木尔巴根由苏联共产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为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立场，还致电召回了派往北平，向国民党要求“高度自治”的东蒙古代表团。

“四三”会议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的形成，结束了自清代以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实现了蒙古族以及内蒙古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为组织、动员内蒙古各族军民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必要而适时的准备，同时也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全面、深入发展，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会议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内蒙古自治运

---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51—53页。

动的方向、道路问题，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自治运动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在正确处理蒙、汉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会议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原则，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地区在行政管理、群众利益等方面一度出现的矛盾，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四三"会议为标志，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节　内蒙古人民的自卫解放战争

一、绥蒙地区的国共对峙与斗争

自从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17 日绥蒙军区部队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抢占卓资山、集宁、丰镇等军事要地的进攻之后，根据国共和美国 3 人军调组的协议，便以卓资山为界与国民党军队形成对峙局面。

国民党军队虽然停止了对绥蒙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但是小的战事始终未断。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曾配合阎锡山部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进攻，还向绥东绥南解放区不断进行"蚕食"。绥蒙军区部队为了保卫解放区，从 1946 年 2 月至 7 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以前，采取了积极防御自卫、坚持阵地、寸土必争的方针，进行了激烈的反"蚕食"斗争。在绥南，晋绥军区第 11 军分区步兵 7 团与骑兵 1 团收复了被国民党抢占的村庄 80 多个，并与五分区偏（关）清（水河）支队配合，迫使清水河县

城的敌军不敢出动。在绥东陶林一带，绥蒙军区骑兵旅严密监视敌军动态，防止敌军进犯解放区。6月4日骑兵旅与第9团各一部驱逐了驻红旗大庙、白银堂、白雁沟一线的敌军。在反“蚕食”斗争的间隙，绥蒙军区部队开展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帮助地方政府建立民兵武装，以保证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绥蒙解放区由于国共军事对峙争夺，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农村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触动，封建剥削和战争创伤，使整个解放区农村经济困难，人民生活相当贫困。因此，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保卫解放区，减租和生产两项工作便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1945年10月1日，晋绥分局发出《关于普遍深入发动群众的指示》,[①] 指出新解放区的发动群众工作要从反奸、清算开始，逐步过渡到减租减息。绥蒙区党委和绥蒙政府从1945年11月开始，领导绥蒙解放区人民进行了群众性的反奸、清算运动。1946年4月，又从反奸、清算发展为减租减息、增资赎地和发展生产的运动。

绥蒙区党委于1945年10月1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任务与群众工作指示》[②] 中就提出了发动群众、清算、减租减息的任务。10月10日，绥蒙政府公布了《绥蒙区减租交租保护佃权条例》和《绥蒙区减息交息条例》。1946年3月15日，晋绥行署公布了《新解放区特殊土地问题处理办法》,[③] 规定凡敌伪组织侵占的私有土地应退还原主，凭借敌伪势力非法抢占的公私土

①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267－272页。

② 《关于目前形势、任务与群众工作的指示》，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43(9)。

③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第312页。

地应归还原土地所有者。1946 年春，绥蒙政府又制定《绥蒙区减租赎地增资暂行办法》，对于减租、赎地、增资等作了具体规定。据与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龙胜县（今卓资县）的统计，全县 62 个乡中就有 51 个乡进行了清算、减租和增资运动；组织生产、组织农会、发展民兵的工作，占总乡数的 82.3%。其中“36 个乡进行了清算斗争，有 8000 人参加斗争，在 1100 余户基本群众中作了减租增资赎地、减息工作。”① 4 月 21 日至 27 日，绥蒙政府在丰镇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会议指出绥蒙区“在两个半月内发动 10 万多群众，有 2 万人参加了农会、民兵，今后要以生产为中心，继续减租，改造政权。”②

为动员解放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绥蒙政府于 1946 年春季发放了 4600 多万元农业贷款和籽种，解决群众困难。其中贷给丰镇县 1500 万元，集宁 1100 万元，凉城和卓资县各 800 万元，陶集县 200 万元，绥东四旗 200 万元。还利用骡马大会等形式调剂了耕畜和农具。

绥蒙区党委和政府为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商业、铁路交通及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到 1946 年 4 月，集宁不仅恢复了原有的 200 余家商店，而且还新增加了 10 余家店铺；在绥蒙政府所辖平绥铁路西段交通管理处的积极努力下，3 月 18 日恢复了丰镇至卓资山的铁路运输。③ 绥蒙区党委于 1946 年 7 月 1 日在集宁创办了《绥蒙日报》，每天印行 2000 份，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介绍国内各地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

---

① 龙胜县委：《群众工作报告》（1946 年 7 月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208。

②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第 315 页。

③ 秋浦：《复苏中的集宁》，1946 年 4 月 5 日《解放日报》。

平、挑动内战的阴谋。绥蒙政府还制定发展教育计划，恢复原有的学校，举办小学师资训练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与发展教育事业。

绥蒙解放区是蒙汉杂居地区，由于国内长期以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和日伪统治时期的反动宣传，这里的民族关系复杂，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突出。绥蒙区党委和绥蒙政府特别注意正确解决这里的民族问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集宁成立了东四旗（即镶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引者）办事处，由李永年负责，在绥蒙政府领导下进行民族工作。"[①] 1946年5月16日，绥蒙政府专门发出了《关于调整蒙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指示》，[②] 对于蒙旗财产管辖、蒙旗汉民籍贯处理、蒙汉人民负担、土地纠纷、减租清算以及蒙汉人民诉讼处理等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大力宣传，严格执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尤其在解决土地纠纷和进行反奸清算中必须事先充分征询蒙汉人民的意见，避免失误。正确的政策和细致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得蒙汉人民顺心满意、融洽相处，民族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景象。5月20日，绥蒙政府又发布了《绥蒙区各蒙旗政府暂行条例》，[③] 对旗和苏木（佐）的组织机构、管理范围、组织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

绥蒙区党委和绥蒙政府领导绥蒙解放区蒙汉各族人民，经过改造旗县和区乡政权，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增资、赎地斗争，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事业，使解放区

---

①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18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321－324页。

③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第317页。

人民分得了土地、粮食和牲畜，政治上翻身，经济上得益，人民成为解放区的主人。蒙汉各族人民扬眉吐气，十分珍惜已经获得的和平生活和民主权利。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绥蒙地区西半部却是另一番景象。日本投降的时候，绥远国民党军队数万人从河套、伊盟进入包头、归绥，占领绥蒙大部分地区。日伪殖民统治下苦度八年的沦陷区人民，曾涌上街头含着热泪欢迎他们。但是没过多久，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使这里的各族人民尝到了国民党残酷压迫的苦头。

国民党接收包头、归绥以后，尽管不像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样乌烟瘴气，但同样是混乱不堪、暗无天日，少数人乘机发了"劫收"财。国民党包头市警备司令部及政务委员会接管日伪物资仓库后，在警备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马秉仁的指使下，由副官处长袁阴浓及原伪蒙疆保商督办蒋辉若的参谋长王华亭、省财政厅科长赵亚民等人随意揭开物资仓库的封条，将一些重要物资盗走。还用假公济私的手段由当地人提供线索，收集敌伪隐藏和转移的物资，从中贪污和盗窃。绥远省的中统特务组织——"党政总队"从陕坝迁到归绥以后，把日伪特务统统吸收过来，派往各地以"调查"为名进行敲诈勒索，并由他们去惩治汉奸。一些罪恶累累的汉奸用金条和鸦片行贿，以减免罪责，逃脱法网；而"党政总队"的特务却个个乘机中饱私囊。总队长张庆恩，主任秘书王兰田等受贿数量相当可观。王兰田于1945年8月"从陕坝迁来时，只有一个破火柴箱子，而两个月时间，皮箱罗列，用具一新，厨子也有了。"① 时隔不久，这伙官僚、特务由于受贿

① 谢新吾：《绥远地区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5辑，第43—48页。

不匀，互相嫉妒，致使国民党绥远当局被迫于1946年初扣押了马秉仁和原自卫军第二路参谋长李聚五等，枪决了袁阴浓、王华亭和赵亚民，企图以此收揽民心。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那些大发“劫收”财的达官显贵的替罪羊。

抗战胜利后，绥蒙地区的各族人民期望严惩一切助敌为虐的汉奸与卖国贼，以泄深仇大恨。但是国民党绥远当局却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敌伪合流，将一些汉奸、卖国贼封以高官，使其逍遥法外。绥远地区的头号大汉奸王英被国民党任命为第12战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李守信被任命为第12战区第10路军总司令，宝贵廷任参谋长；伪蒙疆民生会会长王明远被任命为绥远省“党政总队”上校小队长兼平绥线特派员。

国民党绥远当局对汉奸、卖国贼如此宽容厚待，而对各族人民却实行野蛮的统治。国民党在包头、归绥接收了大量伪蒙疆货币后，流通市面。当局压低物价，用伪蒙疆币向商号和民间大量收购物资、粮食，还发给士兵充作军饷。但是当伪蒙疆币全部投入市场，转到人民手中之后，又立即宣布作废，使商民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占领绥东、察西期间，纵容大土匪苏美龙、鄂友三等部奸淫杀掠、残害人民、无恶不作。1945年9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占陶林县城以后，当即到处抓妇女，许多年轻女子被奸污。9月10日，傅作义委任的陶林县县长到任即发布告，“要各乡、镇切实遵照办理的事有23件，其中有11件是马上要东西的，12件是先填报然后再要东西的。”① 每乡每天要交莜面400斤、油15斤、烧柴2000斤，装青草的牛车15辆；7天内送军鞋300双；5天内送羊皮400张，绵羊50只；每甲先

① 仓夷：《傅军所至哭声遍野》，1945年11月17日《晋察冀日报》。

交款 30000 元，每亩地摊 20 元；每天每户出听差一人。国民党军队还下令要银发卡，要四尺长半斤重的银链条，要酒、要烟、要皮鞋。仅 40 天左右，陶林县城周围 40 里以内的莜麦、谷子被抢得一干二净。在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凉城、武川等县，也难免遭此灾祸。人民叹息道："原来如此，傅作义就是这样；中央军就是这样。"① 老百姓愤怒地说"今天盼、明天盼，一盼盼了八年半，盼回一伙王八旦。"②

国民党军队抢占归绥后不久，将设在归绥小较场的伪蒙古陆军军官学校改为第 12 战区干部学校。1945 年 8 月 18 日绥蒙军区部队初次攻打归绥时，曾派人争取军官学校师生反正，但由于宝贵廷等人从中作梗未能成功。国民党军队对该校学生百般歧视与虐待。军官学校学生对国民党军队长官腐败，士兵军纪不严、军容不整的现象愤愤不平，很不服气。因此屡屡发生军官学校学生与国民党士兵冲突事件。

1945 年 10 月，八路军晋察冀、晋绥军区部队联合发动平绥战役时，绥蒙军区为配合攻打归绥曾派毕力格巴图尔潜入归绥市策动该校学生反正。但是此事被第 12 战区司令长官部察觉。国民党绥远当局以此为借口，命令暂 3 军第 11 师师长王子修以搜捕共产党为由，武力解除军官学校学生的武器。1945 年 10 月 25 日上午，暂 11 师第 1 团团长王子余（王子修的弟弟）带领全团人马包围了军校，并亲自带领 30 多名敢死队员到军校教学楼，声言搜捕"奸党"、"奸军"。因为没有搜到他们所说的"奸党"，

① 仓夷：《傅军所至哭声遍野》，1945 年 11 月 17 日《晋察冀日报》。

② 韩祥符：《国民党"劫收"大员罪行录》，《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第 127 页，包头市政协编印，1983 年。

便命令学生交出武器，致使学生开枪自卫，团长王子余当即被军校学生击毙。军校学生在毫无准备、又无人指挥的情况下，奋起反击，各自为战，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攻，打死打伤很多国民党士兵。最后，国民党方面逼迫该校校长的副官阿拉坦巴根代表校长向学生喊话，劝学生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学生们无奈交出武器，集体当了俘虏。这次战斗中军校学生战死 9 名、负伤 11 名。而国民党士兵大多是不久前从河套抓来的农民，既没受军事训练，也无打仗的实践，在这场国民党蓄意制造的流血事件中白白地送掉了性命。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傅作义部队集体屠杀蒙古族青年学生的"小较场惨案"。[1]

国民党绥远当局在其占领的农村全面恢复了保甲制度，并利用其特务组织刺探解放区的各种情报，在其统治区内推行恐怖统治。1946 年初，蒋介石反动集团迫于全国人民的呼声，在要求政治民主化形势的压力之下撤销了一部分公开的特务组织。绥远地区的特务组织第 12 战区党政总队也于 1946 年 1 月明令撤销。但不久，国民党绥远当局即追随蒋介石反动集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又于 1946 年 5 月在归绥成立了"第 12 战区民众工作总队"，[2] 以绥远调统室特务为骨干，组成了三个大队，分别活动于绥南、晋北、绥东及察北等地；国民党中统大特务张庆恩仍任总队长。大批特务在归绥、包头等地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以所谓"奸党"、"奸军"嫌疑敲诈勒索无辜群众；同时配合国民党军队"蚕食"解放区，潜入解放区边沿地区，招纳逃亡地主、

① 和希克：《一九四五年小较场事件》，《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56－66 页，呼市政协编印，1983 年。

② 谢新吾：《绥远地区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5 辑，第 49 页。

兵痞，组织还乡团、自卫队，侦捕和暗杀解放区的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颠覆解放区的基层政权，策反、瓦解民兵和地方武装，破坏解放区的各种设施。据绥远省特种汇报处1946年编印的资料统计，该民众工作总队共组织还乡团队和自卫队6290人，策反民兵及民兵干部613人，破坏区公所1个、乡公所2个，刺杀解放军官兵6人，收枪271支，切割电线4000余斤。

国民党反动派在绥蒙地区一意孤行，推行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不给人民以和平和自由，归绥、包头等地商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剥削和压迫，纷纷逃入绥东及雁北解放区。有不少蒙古人则逃往张家口，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仅从集宁路过的便至少有三四万人。

国民党绥远当局还利用国共停战之机大肆扩充势力，积极准备发动内战。绥远国民党军队向国民党中央"请准调配本战区辎汽一个团，105榴弹炮一个营，七吨半战车两个连，……又请蒋介石拨补大量美、加新式轻重机关枪、弹药及通讯爆破器材等。"① 与此同时，对所属部队的兵力部署和指挥机构、部队、兵站、地方行政以及驻平联络代表等重要人事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对战区所属军、师、旅、团、营以及各游杂部队、地方团队都陆续分派督战人员和政工人员，积极加强反共宣传和军事训练，为发动全面内战做了各种准备。

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创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明确提出

---

① 贾璜、任崇玉：《集宁战役前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九辑，第27－2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①] 1945 年 8 月 11 日，绥蒙政府在讨论绥蒙地区蒙古民族工作时就决定：“建立蒙古军，以团结蒙古人民；……军事上决定成立蒙古军队，先按各地方分别成立。”[②]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中也指出内蒙各盟旗自治政府应组织地方武装。1945 年 11 月 23 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目前对内蒙古政策的几个要点》中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③]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蒙古民族武装给以极大的关注，这不仅是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保证。所以，立即组建蒙古民族武装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1945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八路军发动平绥战役的时候，国民党新编第 10 路军第 9 师部分官兵，第 10 路军伊盟暂编保安师第 2 旅 1 团部分官兵及陶林县保安团全体官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队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由李秀山、林国梁、华林泰等人带领，分别在察素齐、包头、集宁举行起义。八路军将这三支蒙古族起义部队分别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 1、2、3 支队。

1945 年 12 月中旬，平绥战役结束后，这三个支队全部开到集宁进行整训。不久，绥蒙军区和绥蒙政府以这三个支队和分散活动的大青山蒙古游击队、绥东游击队、绥西游击队为基础，并吸收了一批农牧民和青年学生，派八路军老干部和从延安民族学院来的部分蒙古族干部，组建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独立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84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册），第 292 页。
③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12 页。

下辖三个团，共700余人。李秀山任旅长、李森任副旅长、云麟任参谋长、寒峰任政治部主任、锐军任供给部主任。这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一支蒙古民族新型的人民军队。独立旅组建之初，建立了部队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李森任党支部书记、寒峰任副书记。旅、团均设立政治部，连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当时全旅共有20多名党员，成为领导和团结全旅的核心力量。独立旅组建初期在军事上归绥蒙军区指挥。1946年2月归属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并由集宁经玫瑰营子移驻张北县大囫囵，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3月，根据乌兰夫主席的批示，独立旅在察盟哈巴嘎和宝昌县龙王庙剿灭两股土匪武装，对于稳定察盟局势，为锡、察盟地区开展自治运动和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察盟人民除了害。4月，独立旅分两批到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整训、学习。

1945年8月由乌力吉敖其尔率领的伪蒙古军第9师官兵，在四子王举行起义后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集训。1946年1月，乌力吉敖其尔、毕力格巴图尔率领这支部队回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南部的查干宝格达，并同晋察冀军区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取得联系。乌兰夫、蔡树藩、曾涌泉、段苏权、乌力吉敖其尔以及苏联驻晋察冀军区代表尼古拉也夫共同研究决定，将这支部队番号定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乌力吉敖其尔任司令，关保扎布任政委，扎木舍楞任参谋长，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武器弹药及后勤供给由晋察冀军区察北七分区负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晋察冀军区和苏蒙之间的运输线，即化德到（今）二

连浩特的交通孔道。”[①] 内蒙古人民游击队还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察布盟分会和陶集县、土木尔台游击队领导人李文精、李新民、王弼臣、梁劲秀等取得联系，派出两个排分驻土木尔台和四子王旗五井庙，互相配合，清剿土匪，协助乌盟分会和陶集县的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并为部队征集粮草。同时，派部分部队到苏尼特右旗、正黄旗及察盟西部几个旗动员农牧民参军，以扩充部队。

抗战胜利后，在内蒙古东部各盟、旗陆续建立了一些蒙古民族武装，它们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组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设立了 6 个师的建制，计划扩充、改编各盟旗的蒙古民族武装，由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力量的组建和成长，经历了一个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分散到统一，由弱小走向壮大的过程。

1946 年 2 月，王爷庙民警总队扩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 1 师，莫德勒图任师长，都固尔扎布任副师长兼参谋长；下辖 4 个骑兵团，分别驻扎在白城子、洮南、突泉、科尔沁右翼中旗等地。在与土匪、“光复军”的斗争中，骑兵 1 师扩大了活动范围，加强了与东北民主联军的合作。3 月，骑兵 1 师仿效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工作方式，成立了师政治部，都固尔扎布兼任主任。应 1 师的要求，中共西满分局派出胡秉权、黄文飞、李一夫等干部到 1 师任师团政治委员，在思想、军事方面对部队进行整顿、训练。

战后的哲里木盟地区处在各种政治势力频繁斗争的复杂局面

---

① 钱林豹：《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第 25 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 年。

中，土匪和反动武装十分猖獗，社会秩序极为混乱。1945 年 12 月，根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的指示，在巴彦塔拉建立了兴安南地区警备司令部，乌力图任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向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支援了部分武器装备。1946 年 1 月，阿思根、那钦双合尔等人到哲里木盟开展组建军队和成立地方政府的工作。2 月，在中共西满分局和辽西省委蒙古工作团的支持下，将兴安南地区警备司令部改组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 2 师司令部，乌力图任师长，白音布鲁格任参谋长，协儒布僧格任政治部主任。骑兵 2 师组建后，将各旗的地方武装编为 5 个骑兵团，共 2000 余人，分别驻扎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后旗、前旗和库伦旗、奈曼旗。3 月，根据“吕阿协定”，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向骑兵 2 师派出政治工作人员。中共辽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哲里木盟蒙古工作团团长赵石任第 2 师政治委员；耿青、李维涵、张泽民、王景义、陈玉良等分别担任各团政治委员或副团长。同时，骑兵 2 师还选调了一批经东蒙军政干部学校培训的蒙古族青年到所属连队任指导员。

3 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四平展开激战。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 2 师奉辽西军区指示参战，副师长白音布鲁格率 11、12 团承担了掩护梨树至四平交通线任务，数次击溃了窜扰的国民党“光复军”。其他各团配合辽西军区保安 1 旅在哲里木盟东部进行大规模剿匪战斗，使动荡的局势迅速得到了稳定。

日本投降后，昭乌达盟各旗县大都处在蒙古族地方武装的控制之下。在当时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管辖区域、隶属关系以及政策执行等等复杂的原因，部分蒙古民族武装与进入热北及昭乌达盟的八路军部队一度发生冲突，形成了磨

擦的局面。经中共热北地委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协调，双方部队的反复协商，至1946年初，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1946年1月3日，和子章（清卓力克图）等蒙古族上层人士召集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所属9个旗、县的代表在巴林左旗林东镇举行“昭卓盟各旗联防会议”，通过了盟政府设置、贸易、交通和实行各旗县共同防卫，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等项议题；会议推举和子章为昭盟共同防卫总指挥。3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的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工作团到达昭乌达盟，筹备成立昭乌达省，对各旗警备队进行整编。4月1日，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4师司令部在林东镇成立，和子章任师长，仁钦宁布任参谋长；下辖6个团共3000余人，分别驻扎在巴林左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和扎鲁特旗。随着“四三”会议的召开，昭乌达盟的蒙古民族武装结束了与八路军部队的磨擦，在军事和行政工作等方面开始进行密切的合作。4月8日，萨嘎拉扎布、那苏图、确吉敖斯尔等人前往林西，与中共热北地委、八路军热北军分区领导人李望淮、张盘新、俞楚杰等举行会谈，达成了以“互助互爱，协同工作，为蒙汉人民服务”为主旨的协议。[①]

呼伦贝尔、纳文慕仁（蒙古语，即嫩江）地区的部分达斡尔族、蒙古族武装是在中共嫩江省委、八路军嫩江军区的帮助、领导下建立并逐步壮大起来的。1945年底，嫩江省政府设立蒙政厅后，向呼、纳地区派出干部，深入农村、牧区，动员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群众建立自卫武装，反击国民党的进犯。至1946年初，先后组建了齐齐哈尔蒙民自卫大队、莫力达瓦达斡尔大队（亦称阿尔拉蒙古大队）和扎兰屯布特哈大队等主要由达

① 《昭乌达盟地方志·总论篇》（初稿），第121页。

斡尔族、蒙古族农牧民组成的地方武装。嫩江军区向各大队提供了武器、装备，并派出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担任了政治委员。部队组建后，担负了清除匪患，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并多次配合八路军嫩江军区部队打击活动在呼、纳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1946年1月，齐齐哈尔蒙民自卫大队在龙江县阻击国民党"光复军"，歼敌近百人，生俘敌团长；在杨家窑等地剿灭数股土匪。2月，蒙民自卫大队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5旅，亦称达斡尔自卫军第5旅，鄂秀峰为旅长，德文斌为政委，下辖两个团，共1000余人。莫力达瓦达斡尔大队于1946年1月配合嫩江军区2分区部队作战，解放了由"光复军"占据的尼尔基镇；2月，在嫩江军区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讷河、嫩江的战斗。2月5日，达斡尔大队扩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8旅，下辖两个团，共500余人。布特哈大队在嫩江军区的指挥下，于1946年春参加了围歼驻朱家坎、莫古气等地国民党"光复军"的战斗。2月，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2旅，鄂嫩日图任旅长。

1946年3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为统一编制，在扎兰屯将2、5、8旅合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5师，由鄂嫩日图任师长，朱子休任政委（后由克力更接任），鄂秀峰任参谋长（后由姚凤贤接任），下辖5个团，共2000余人。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骑兵第5师选派了一批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干部、战士到东北民主联军设在齐齐哈尔和北安的军政学院接受培训。还由嫩江军区抽调了部分共产党员担任各团、连、排干部。同时，根据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要求，原呼伦贝尔保安总队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6师，登登泰任司令员。

除上述武装部队外，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还有包启文率领的

扎赉特旗警备大队（于1946年2月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兴安支队）；有那钦双合尔率领的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6支队；以陈达力为团长的郭尔罗斯前旗蒙古骑兵独立团等。这些民族武装在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土匪，稳定地方秩序，建立、巩固内蒙古东部解放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三”会议后，根据会议精神，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武装部队统一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乌兰夫任司令员，阿思根任副司令员（后增任王再天为副司令员）。锡、察地区的原内蒙古骑兵独立旅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李秀山为旅长，云麟为参谋长，寒峰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巴、乌地区的原内蒙古人民游击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乌力吉敖其尔为支队长，关保扎布为政委，武能齐为参谋长，李文精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大队，共700余人。

1946年5月25日，在王爷庙召开的东蒙古人民临时代表会议上，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阿思根兼任兴安军区司令员，哈丰阿任政治委员，胡克巴特尔任副司令员（后增任莫德勒图为副司令员），张策任副政治委员，包明德任参谋长，胡昭衡任政治部主任。兴安军区组成后即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各支蒙古民族武装实行统一整编。将原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第1、2、4、5师及兴安支队、6支队、警卫团、教导团一律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部队，同时对各师、支队指挥员进行了部分调整。骑兵第1师，师长莫德勒图（后由王海山接任），政委胡秉权，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都固尔扎布，参谋长额博尔图，下辖4个骑兵团。骑兵第2师，师长那钦双合尔，政委赵石，副政委包彦，参谋长白音布鲁格，政治部主任协儒布僧格，下辖5个骑兵团。骑兵第4师，师长和子章，政委乌力吉那仁，副师长阿民

布和，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政治部副主任刘昌，下辖6个骑兵团。骑兵第5师，师长鄂嫩日图，政委朱子休（后由克力更接任），副师长何忠明，副政委夏辅仁、吴泽民，参谋长鄂秀峰（后由姚凤贤接任），政治部主任沃志文，下辖5个团。兴安支队归骑兵第1师指挥，支队长包启文，政委沙友石，参谋长莫日根。第6支队归骑兵第2师指挥，支队长由白音布鲁格兼任，丹森宁布任参谋长。

各部队整编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与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组成了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兴安盟、哲里木盟的对敌斗争。邓华为司令员、阿思根为副司令员、陶铸为政委。陶铸等与阿思根等还在通辽举行会议，确定了联合司令部的工作方针，即加强蒙古族内部的团结，增进蒙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内蒙古地区反动势力相勾结进攻内蒙古解放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内蒙古早日获得解放。会后，陶铸和阿思根共同签署、发布了《告蒙古同胞书》、《告蒋管区蒙汉同胞书》，向各族群众发出了参军参战，支援人民军队，团结抗敌的号召。

5月17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2师与东北民主联军辽西军区通鲁警备区共同组建了蒙汉联军，乌力图任司令员（后由高体乾接任），高体乾任副司令员，吕明仁任政委，赵石任副政委，谭刚任参谋长，包文卿任副参谋长，曾敬烦任政治部主任，协儒布僧格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东蒙军政干部学校与辽西军政学校实行合并，成立辽吉军政干部学校，乌力图任校长，梁一鸣任副校长。

5月底，原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保安总队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6师，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铁路警备旅共同成立

了联合卫戍司令部，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副主席兼内防处长功果尔扎布为司令员，铁路警备旅旅长王化一为副司令员，苏林为政委。6月29日，根据西满军区指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6师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6师，登登泰任师长，王化一兼任政委，拉一任政治部主任，明善任参谋长。7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呼纳指挥部在海拉尔组成，特木尔巴根兼任司令员，方知达兼任政委。7月13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6师改称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军，登登泰为司令员，钢苏和为政委，伊士敖力布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团，共300余人。

1946年7月，八路军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围攻大同时，乌兰夫主席派人到国民党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先遣第1旅驻地白马城，争取蒙古族武装海福隆部起义。海福隆毅然率部到解放区阳高县八里台，于8月11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毛主席、朱总司令特电贺勉励。绥蒙军区和乌兰夫议定将这支以蒙古族为主的起义部队拨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乌兰夫主席在张家口为海福隆率部起义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之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内蒙古军政学院调云继光、金巴扎布、那音太等10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协助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整训，并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整训后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5支队，任命海福隆为支队司令员，齐广武为副司令员，塔宝福为参谋长，巴音巴图为政治部主任，赵晓东为参谋处长；支队下属一个团五个连，共约400余人。

1946年6月以后，当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时，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各部队与各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起，在东起哲里木盟西到伊克昭盟的漫长战线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自卫解放战争。

三、国民党军队进攻内蒙古解放区及内蒙古人民的自卫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中国共产党阻止内战的建议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于1946年6月26日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动用193个旅、158万人的兵力向我各解放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内蒙古地区从东部的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盟到西部的锡林郭勒、察哈尔、巴彦塔拉、乌兰察布、伊克昭等盟很快处在内战的滚滚硝烟之中。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为扩大两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扫清阎锡山在晋北的势力，由张宗逊、杨成武、罗瑞卿等指挥，于1946年7月31日发起大同战役。但因敌军防守坚固，久攻不克。9月间，国民党12战区傅作义部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倾巢出动，向绥蒙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初，傅作义即在归绥召集少数高级将领，部署进攻绥蒙解放区的军事行动，指定董其武、孙兰峰为第一线步、骑兵总指挥，以鲁英麐35军、卫景林机动兵团、刘春方新编骑兵第4师为第二线部队，打算一举攻克卓资山，进而夺取集宁，然后打通丰镇到大同的铁路线，以解大同守敌之围，占领整个绥蒙解放区。

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调集其暂3军主力暂17师及35军新31师，于9月5日向卓资山发动进攻；刘春方新骑4师由归绥经凉城县崞县窑子向五里坝附近进兵，以阻止从凉城北援卓资山的解放军，并欲切断卓资山我军南退之路；35军主力及机动兵团从归绥沿铁路线向白塔以东推进，准备随时支援其第一线部队。敌军进攻卓资山以后，晋绥野战军独1旅因兵力单薄，

放弃卓资山阵地，向东南方向转移。傅作义立即命令董其武、孙兰峰率步、骑兵主力继续东进，夺取集宁。同时命令第二线部队推进到卓资山、马盖图、十八台等地待命。

傅作义部准备占领集宁后大举东进增援大同守敌。9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张宗逊、罗瑞卿发出指示，要求晋察冀部队除留部分兵力监视大同守敌之外，由张、罗率主力北上集宁，阻击傅作义部队的进攻；绥蒙军区部队由姚喆指挥坚守集宁，并配合野战军消灭来犯之敌；绥蒙军区骑兵旅在集宁外围机动作战。①

10日，董其武指挥新31师和暂11师组成第一线主攻部队，以暂10师为总预备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集宁发起总攻。暂11师从霸王河南攻击集宁城西南角；新骑4师在集宁东南截断平绥铁路线，并牵制坚守老虎山阵地的解放军；新31师在猛烈火力掩护下，从集宁城东南方向攻占卧龙山阵地。11日，张宗逊、罗瑞卿指挥主力部队从集宁东南方向发起反攻。在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等地歼敌3000余人，并截断敌军西退之路。

傅作义面对集宁战斗失利，部队伤亡惨重，而且陷于被动状态，遂命令第二线部队郭景云机动兵团105榴弹炮营，取道三义堂向集宁以西地区急进，以增援其攻城部队；电令新骑4师刘春方部从五里坝向集宁西南进发；令董其武、安春山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强攻，占领集宁；令孙兰峰率骑兵向集宁以东迂回攻击，策应董其武部攻城；令鲁英麐率35军一个师与机动兵团向三义堂附近进发，与郭景云部紧密配合。12日中午，董其武部在增援部队和炽烈炮火配合下攻入集宁城。绥蒙军区部队与敌军展开激

①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第326页。

烈巷战，下午在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增援下，将敌军赶出城外。13日，敌军以炮兵、骑兵、步兵联合作战，再度攻入城内。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其援军陆续进入集宁，解放军奉命于当夜撤出老虎山等阵地，放弃集宁城。

我军在集宁战役中毙伤敌军3370余人，俘敌530余人。集宁失守后，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分别撤回驻地休整和补充；绥蒙军区部队及绥蒙地区大部分党政地方干部经丰镇转移到雁北左云一带休整，一部分地方游击队及党政干部则撤到锡、察地区，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会合。

傅作义部占领集宁以后，打通了集宁至大同的铁路线，并奉蒋介石的命令，出动二个军，一个骑兵集团、九个师计约2万多兵力，由集宁、大同经兴和、尚义及平绥铁路东进，配合国民党第11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个师进攻张家口。10月7日，傅部攻占张北；10日，始攻张家口。11日，晋察冀军区及地方党政机关主动撤出张家口。察北的多伦、宝昌、商都、化德等县城也相继被傅部占领。

1946年8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结束了在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的整训，根据晋察冀中央局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决定，向察哈尔、锡林郭勒盟转移，担任保卫察、锡盟根据地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的任务。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则继续坚持乌兰察布盟东部及察哈尔、锡林郭勒盟西部地区的骑兵游击战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撤离张家口前夕，因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5支队对巴彦塔拉、乌兰察布盟地区情况熟悉，将其拨归中共巴乌工委领导，以土木尔台为中心，向绥北、察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军队向察、锡根据地的进攻。

1946年11月7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召开第六次常委会议，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对锡、察、巴、乌地区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为了适应自卫解放战争的需要，会议决定以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旅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6师，任命李秀山为师长，王铎为政委，刘景平为副政委，寒峰为政治部主任，并将郝秀山、黄波率领的绥蒙大队编为该师第2团；16师“以察、锡两盟为其防区，……。执行坚持察、锡自卫战争的任务。”[①]在巴彦塔拉、乌兰察布地区成立巴乌军区，任命乌力吉敖其尔为司令员，奎璧为政委，“统一指挥现在该地之军队，领导进行该地之自卫战争”；[②]以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师，任命乌力吉敖其尔为师长；以原第1支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2师，任命李森为师长；以原第5支队为基础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7师，任命海福隆为师长；第11、12、17师均由巴乌军区负责组建并统一指挥。1946年底和1947年初，除第12师以外，其他两个师的组建工作全部完成。

1946年6月，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占领锦州、沈阳、长春、承德等大、中城市后，出动其主力第93、71、72军各一部，以李守信、包善一等为首的地方反动武装为配属力量，向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发动进攻，相继占领了开鲁、通辽、赤峰、库伦旗、吉尔嘎朗、巴彦塔拉以及毗邻的彰武、法库、双辽等城镇、旗县。

---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关于察锡工作的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40页。

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关于成立巴乌军区的决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39页。

随着国民党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加剧，内蒙古中、东部部分盟旗的地方反动势力也在解放区燃起了反革命暴乱的凶焰。一些大地主勾结日伪残余和土匪，与国民党军队相呼应，煽动地方武装叛乱，袭击民主政府，建立反动政权和军队，在我根据地疯狂窜扰。8月，叛匪苏和巴特尔在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发动叛乱，纠集匪众，杀害旗公安大队长朱塔兴阿和政委李云，同时还策动科左后旗的叛乱，杀害了中共哲盟地委派出的干部、副旗长张杰。国民党军队占领巴彦塔拉后，即扶持组建了以贺喜业勒图墨尔根为盟长的哲里木盟政府及国民党党部。9月，匪首武奎甲等拼凑反动地主武装，在喜扎嘎尔旗（今属科右前旗）制造了“索伦惨案”，旗长唐永祚、兴安军区教导团副团长吉格木德等8名干部惨遭杀害。10月，锡林郭勒盟发生了额仁钦匪帮的叛乱，锡察解放区革命斗争受到严重干扰。11月，以塔尔巴、额勒登格为首的反动势力在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残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驻该旗的工作团团长业喜扎拉森及多布沁巴拉珠尔等干部，裹胁地方武装和寺庙喇嘛，发动叛乱十余起。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地方反动势力猖獗的严重形势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所属各部队主动放弃部分城镇，在距城市和铁路线较远的广大乡村、牧区开展游击战争，一面顽强抵御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侵，一面积蓄力量，积极准备收复被敌军占领的各战略要地，展开了剿匪和平息反革命叛乱的斗争。

10月7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1、3团及炮兵部队出击喜扎嘎尔旗，击溃了占据索伦镇的反动武装，俘获匪首白天柱、乌云毕力格等；12月，骑兵第1、2师抽调部队南下哲里木盟，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斗。31日，内蒙古骑兵部队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作战，击垮了苏和巴特尔、格瓦拉喜匪帮，收复了

哲盟重镇舍伯吐。1947 年 1 月 1 日，敌军集中 2 千余人的兵力再次攻占舍伯吐。骑兵第 1、2 师与兄弟部队乘敌立足未稳之机，发起迅猛的攻势，夺回舍伯吐，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凶焰。

1947 年 1 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2 师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与辽吉军区第 5 分区组成蒙汉联军，由阿思根任司令员，高体乾为副司令员，赵石任政委。联军组成后，即向盘踞在哲里木盟及毗邻地区部分城镇的敌军发起攻击，接连收复了哈尔套街、后新秋、哈尔沁屯等地。2 月，蒙汉联军攻克开鲁，给国民党“热河蒙旗自卫军”以毁灭性打击，俘敌 800 余人，匪首李守信与少数残敌侥幸脱逃。3 月，骑兵第 1 师奔袭吉尔嘎朗，一举歼灭敌保安队 300 余人，俘虏敌保安司令贺喜格。内蒙古骑兵部队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部队相互配合，勇猛出击，使得各地敌军相继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强大攻势的压力下，国民党东北骑兵第 1 军所属王华兴、洛布、黄廷等部被迫向我军投诚。随着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反动武装“联防”的瓦解，哲里木盟广大地区逐步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部队所控制。

1946 年 7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迫近赤峰。为适应形势需要，加强卓索图盟地区对敌斗争的力量，经乌兰夫提议、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批准，于 9 月 8 日在赤峰组建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白云航任司令员，孔飞任副司令员，金起铣任政治部主任，田户任副参谋长，乌兰任政治部副主任，统一指挥喀喇沁左旗、敖汉旗、土默特中旗（今辽宁省北票县）等旗县的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4 师，保护西拉木伦河南北交通要道，清剿在我根据地袭扰的反动地方武装和土匪。

10月8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4师与冀察热辽军区第20军分区部队在林东镇共同组成昭乌达盟蒙汉联军，俞楚杰为司令员，和子章为副司令员，权星垣为政委，乌力吉那仁为副政委，阿民布和为参谋长，卜云龙为副参谋长，蒙和舞乐极为政治部主任，刘昌为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初，国民党第13军集结两个师的兵力由承德、隆化、围场出动，第93军一个师由赤峰出动，在反动地方武装和土匪的配合下，向昭、卓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围攻，妄图捣毁冀察热辽根据地后方，占领昭、卓盟全境。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盟纵队协同作战，在天山（阿鲁科尔沁旗）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粉碎了各路敌军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冀察热辽解放区及其与东北、华北各解放区相连接的交通要道。

在保卫解放区，抵御和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斗争中，由蒙汉各族革命武装共同结成的战斗集体——蒙汉联军发挥了重大作用。联军各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紧密配合，并肩作战，步、骑兵各展所长，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失时机地与敌反复争夺战略要地，使敌军无法实现其长期分割、包围各解放区的战略意图而不得不收缩战线，有力地发展了东北、华北解放区的侧翼战场，为扭转东北解放战争的局面作出了贡献。通过联合建军的方式，壮大了蒙古民族的革命力量，加快了蒙古民族武装的革命化、正规化进程。蒙汉各族指战员在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四、伊克昭盟革命斗争的发展

1946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伊盟工作方针和基本政策后，中共伊盟工委及乌审旗工委、鄂托克旗工委大力开展伊盟工

作，在伊盟南部解放区组建了三支蒙古民族武装，即阿尔宾巴雅尔（王悦丰）领导的西乌审保安队，金汉文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保安第4营和马富纲、马良诚等人领导的鄂托克旗起义部队。此外，还有伊盟工委和鄂、乌两旗工委的三支警卫队和一部分区、乡、村基层人民政权。但当时伊盟绝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总体形势还是敌强我弱。

日本投降的时候，国民党在伊盟的正规部队全部东进，开往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内战前线。但是这绝不是说国民党不重视伊盟。相反，它将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改为伊盟警备司令部，派陈玉甲为司令，先后在准格尔旗、乌审旗、郡王旗设立3个警备区，组建3个警备师；在原7个旗保安团的基础上组建了7个保安师和1个游击师，共设12个师级司令部，任命17名将官，其中中将2名，少将15名；还组织了东胜县、达拉特组训处、桃力民办事处的6个自卫团和1个大队。在伊盟地区总共有11个蒙古师，6个汉人团，1个大队，共计36个团的建制，约两万多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均由当地的蒙汉人组成。他们熟悉地理民情，成为国民党统治伊盟的支柱。国民党在伊盟有盟党部和8个旗、县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1947年3月，仅国民党准格尔旗党部就“辖40个分部，共有党员2223个人”。[①] 在伊盟有“中央调统室绥远分室驻东胜组，张垣绥靖公署第三处直属陕北办事处，国防部新闻局第二厅绥远联络站东胜组”[②] 等特务机构；中统山西晋北区站也在东胜、准格尔旗一带活动。大批国

① 高增培：《准旗情况与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25。
② 绥蒙公安局：《绥蒙区特务活动概况》（1948年8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131·1。

民党特务分布在伊盟各地，以强化其政治统治。因此，伊盟地区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横行，各路特务遍地。特别是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伊盟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194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伊盟工作，伊盟工委高增培、薛向晨等参加。会议指出，伊盟工作是有进步的，但是未能很好利用日本投降以来的很多有利机会，"依旧没有把蒙古工作与边区工作分别开来，还没有认真尊重蒙古人民的自治，没有认真尊重蒙古人民的利益，"没有放手团结争取蒙古上层人士。决定目前仍以西乌审（乌审旗西部）及鄂托克旗作为开展伊盟各旗工作的中心和基础，其中心方针是"多做建设事业，帮助蒙人把军队，把政治（改良办法），把经济（发展畜牧等），把卫生等办好。""对蒙古人内部矛盾仍然应是调解方针，要求团结。"会议特别强调在西乌审、鄂托克旗"应放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蒙古人中积极分子，进步青年都宜吸收入党。"对于国民党，会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起义，到处点火。对已起来的采取积极办法，派干部去支持和领导之。发动与组织广泛的反蒋傅的统一战线。蒙汉联合、王公平民联合、驱逐傅作义。""口号是反对抽丁，反对征粮，反对送粮，反对改编保安团等。"要求乘傅作义无力顾及伊盟之机会，"配合全国局势，到处点火。""我们的目的是以群众武装起义，发展到使伊盟脱离傅作义，获的（得）自治。"①这是西北局在内战爆发后对伊盟工作做出的战略性部署。

1946年秋，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扫清边区北线外围之敌的战役，相继解放了陕北的镇川堡、响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60页。

水和波罗等地，包围了横山县城。中共伊盟工委为配合这次战役，奉命组成北线东进指挥部，工委书记赵通儒任总指挥，带领王悦丰的西乌审保安团和西乌审游击队等，同三边军分区步兵大队一起进驻乌审旗南部的海流图庙一带。驻守横山县城的国民党22军18团王永清部迫于形势，伪装起义。北线指挥部委任王永清为旅长，并要求他率部参加攻打东乌审国民党伊盟第二警备区奇玉山部。王永清率部进驻海流图庙附近的乌拉尔林村后，秘密与榆林国民党军队及奇玉山部联系，布设圈套，约请赵通儒和北线指挥部各部队负责人到乌拉尔林“共商解放乌审大计”。[①] 赵通儒等缺乏警惕，没有识破王永清的诡计，于10月24日如约前往，结果被捕。与赵通儒一同被捕的有乌审旗工委书记白汉臣以及王耀卿等干部战士共13人，酿成伊盟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乌拉尔林事件”。王永清匪部阴谋得逞后当即向海流图庙等地进攻，企图消灭西乌审部队和三边骑兵大队。王悦丰、李振华、徐子猷、曹布诚等及时组织部队撤退到纳林河一带，并通知三边骑兵大队提防，避免了军事上的更大损失。

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由高增培代理伊盟工委书记，曹布诚代理乌审旗工委书记，并将“伊盟工委划归三边地委领导”。[②] 同时派徐锡林、杨经伟、高平、朱邦仁等加强伊盟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继续开展伊盟的自卫解放战争。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34个旅，23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的“重点进攻”。3月18日，胡宗南部占领延

---

① 王庆富：《乌拉尔林事件》，《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五辑，第77页，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1985年。

② 高增培：《回忆伊盟的革命斗争》，《伊盟革命回忆录》第一辑，第34页，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委编印，1981年。

安。伊盟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也配合胡宗南部，向伊南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军事进攻。国民党伊盟第二警备区司令奇玉山率部伙同伊盟榆林交界处一带的叛匪宗文耀部，于3月12日向西乌审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同时，派遣特务策动西乌审保安团1大队部分人叛变，里应外合占领了西乌审根据地的红柳河以北地区。王悦丰、高平、李振华等当机立断，集合部队，扣捕内部叛变分子，稳定了部队。王悦丰等率西乌审保安团在三边骑兵大队和伊盟工委警卫队的接应下，于3月底撤出了西乌审根据地，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瓦房、王家湾一带。4月2日，宁夏马鸿逵部集中8个团的兵力攻占了定边县城。随后，马鸿逵部相继占领了伊盟工委所在地鄂托克旗城川和鄂托克旗南部解放区。伊盟工委、鄂托克旗工委也撤到靖边县，与乌审旗工委、西乌审保安团汇合，开始了艰苦的山区游击作战。国民党军队东西夹击，占领了整个伊南解放区。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统一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5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批准，三边军分区和伊盟工委决定将伊南解放区各部队和全部武装人员统一整编，在靖边县张家畔正式成立了师级建制的伊盟蒙汉支队，王悦丰任司令员，高增培任政委，高平任副司令员，周仁山任副政委。蒙汉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由300余名骑兵组成，受三边军分区和伊盟工委双重领导；原西乌保安司令部建制继续保留，王悦丰兼司令员，奇福禄任参谋长。

蒙汉支队成立后不久，在靖边县张家畔附近的芦河（红柳河上游支流）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战斗任务。自从1947年3月18日解放军主动放弃延安以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带领中共中央机关昆仑支队，在安塞县及靖边县境内与敌人周旋。5月

间，昆仑支队进入靖边县境内的小河村、天赐湾一带。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向三边、伊盟地方武装下达命令，要求死守红柳河一线，堵截来自北线的敌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一股危害中央机关安全的敌军越过红柳河防线；同时要求绝不能泄露党中央行踪的秘密。5月20日，马鸿逵部第20旅派出19团伙同靖边县还乡团冯海潮部，共500多骑兵窜到芦河对岸，向伊盟蒙汉支队防守的中心渡口发动了轮番冲击。伊盟蒙汉支队第1大队一个连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锋，使敌军未能渡河。为尽快击退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支队司令部派第2大队骑兵及防守王家湾渡口的另外两个骑兵连，从中心渡口右侧迅速渡河，向敌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敌阵地顿时乱作一团，未及调整兵力即全线溃退，蒙汉支队全力以赴穷追猛打，追击20余里，胜利完成了坚守芦河，保卫中央机关北线安全的任务。这次战斗是伊盟蒙汉支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与敌正规部队交战，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直接贡献。

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3月至5月连获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西出陇东消灭马步芳部4000余人，于6月下旬挥师北上收复了三边。7月初，伊盟蒙汉支队也乘主力部队收复三边之机，解放了小桥畔、柠条梁等地。伊盟工委在柠条梁召开会议，决定收复鄂托克旗城川，全面恢复伊南解放区，重组鄂托克旗部队。蒙汉支队于7月4日收复了城川；7月中旬，在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一个加强连的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鄂、乌两旗反动武装对城川的进攻。伊盟工委向鄂托克旗和乌审旗派出工作人员，大力开展工作，迅速恢复根据地。7月下旬，蒙汉支队东进乌审旗，将奇玉山部赶出红柳河以南地区。至此，伊盟蒙汉支队收复了伊南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地区。

8月，中共伊盟工委副书记周仁山同马富纲、马良诚等重组鄂托克旗武装，编为伊盟蒙汉支队第3大队，马良诚任大队长，天宝（藏族）任教导员，并保留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的建制。8月中旬，为加强党对蒙汉支队的领导，经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同意，成立了伊盟工委军事部，韩是今任部长，高平任副部长，谢有德任参谋主任。军事部成立以后，“统一了伊盟各旗军事领导，统一供给，开始在部队建立各种制度，”[①] 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1947年8月初，西北野战军主力从三边东进围攻榆林，而马鸿逵部骑兵第20旅乘机再次进占三边地区，一面东援榆林守敌，同时企图消灭蒙汉支队。8月13日，伊盟工委再次撤出城川，向乌审旗西部牌界地一带转移，与蒙汉支队一起行动。9月中旬，马鸿逵部第20旅20团进犯红柳河南岸之大石砭一带，袭击蒙汉支队，高平副司令员身负重伤，马良诚、鲁富业等沉着指挥1、3大队，粉碎了马部消灭蒙汉支队的企图。

11月底，伊盟蒙汉支队先后转移到靖边县、吴起镇，在三边军分区政治部的领导下开展“两忆三查”整军运动，提高了蒙汉支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1948年1月，三边地委和绥宁工委[②] 在吴起镇召集伊盟工委负责人讨论伊盟工作，

---

① 《伊盟一年零三个月部队发展概况》（1948年5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323。

② 绥宁工委：1947年1月17日西北局决定将宁夏工委与伊盟工委合并成立宁绥工委（大多数文献中称绥宁工委），对外称三边地委统战部（见《西北局讨论宁绥工委工作记录》1947年1月17日，宁夏档案馆）。4月，在绥宁工委下重组伊盟工委。1948年7月初伊盟工委分为伊东、伊西工委后，绥宁工委仍领导伊西工委。1948年9月5日，西北局决定撤销绥宁工委，在三边地委下设宁夏工委和伊西工委。

提出了整顿部队和党的组织，开展伊东、伊西解放战争的任务；同时对伊盟工委和乌审、鄂托克两旗工委进行了调整。伊盟工委由高增培、周仁山、杨经纬、薛向晨、韩峰、高平、赵诚等7人组成，高增培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周仁山任副书记兼鄂托克旗工委书记，薛向晨任宣传部长，杨经纬任乌审旗工委书记。1月26日，伊盟蒙汉支队整编为相当于师级建制的伊盟自治支队，王悦丰任支队长，周仁山任政委，马良诚任参谋长，马富纲任副支队长，高平任第二副支队长，伊盟支队下辖三个大队，计有500余骑兵。仍保留西乌审、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建制，王悦丰仍兼西乌审保安司令部司令，杨经纬任政委，赵玉山任副司令，赛音朝克图任参谋长；马良诚任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部司令，天宝任政委。伊盟支队经过这次整编，建立了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成为一支野战性质的正规化少数民族武装部队。

1948年3月，高增培、王悦丰、高平等率伊盟支队第1、2大队开赴伊盟东部准格尔旗，开辟伊东解放区；周仁山、马富纲、马良诚等带领伊盟支队第3大队，坚持伊西游击战争。

伊盟支队第1、2大队从伊南解放区出发，行程千余里，于4月9日到达府谷县哈拉寨和准格尔旗五字湾；4月11日，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1旅一举攻占准格尔旗神山，消灭国民党伊盟第一警备区警备师大部，俘获少将警备司令奇涌泉和少将参谋长陈有明。解放神山以后，伊盟支队司令部和伊盟工委发布了《伊盟支队司令部第一号布告》和《对伊盟蒋管区蒙汉人民的口号》30条，宣传党的政策，报导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同时建立人民政权，救济灾民，初步稳定了准格尔旗局面。在准达工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准格尔旗委员会，积极进行建党、建军工作，成立了准格尔旗自治政务委员会，组建了准格尔

旗步兵第1团。伊盟支队第1、2大队在准格尔旗境内清剿土匪，安定地方秩序，到1948年8月，解放了准格尔旗黄河以南的11个区，并向达拉特、郡王、东胜等旗县发展。

伊盟支队第3大队在中共伊西工委的领导下，坚持鄂乌两旗根据地，先后建立了7个区级基层政权机构。5月，3大队在乌审旗南部的掌高图、王耀湾一带休整时，突然遭到三边一带惯匪张庭芝部200余骑兵的袭击，伊盟支队参谋长、3大队队长马良诚为掩护部队转移，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1948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决定将伊盟工委分为伊东工委和伊西工委，7月初正式成立。伊东工委以高增培为书记，直接受西北局领导，负责准格尔旗、札萨克旗、郡王旗、达拉特旗和东胜县等伊盟东部地区的工作；伊西工委以周仁山为书记，受绥宁工委领导，开展乌审旗、鄂托克旗、杭锦旗、沃野设治局、桃力民等伊盟西部地区的工作，并“开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工作”。[①] 伊东工委为了开展郡王旗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成立了东郡工委，由云北峰任书记。伊盟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伊东、伊西工委的领导下，分别由东向西、由西向东发展，使整个伊克昭盟地区处在彻底解放的前夜。

---

① 西北局城工部：《对伊盟工作的意见》（1948年6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229。

第四节　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伟大胜利

一、自治运动的胜利发展

1946年5月26日——28日，东蒙古人民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举行。各族各界群众、军队和地方代表共400多人参加了会议。5月27日，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东蒙古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为了全内蒙自治运动的统一，执行“四三”会议决议，取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撤销所属各省建制，成立兴安省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①] 会议决定：兴安省以呼伦贝尔盟、纳文慕仁盟、哲里木盟和兴安盟为管辖区域，省政府受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双重领导。经大会选举，特木尔巴根当选为兴安省政府主席、张策当选为副主席；方知达任秘书长；博彦满都任兴安省参议会议长，克力更任副议长。同时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哈丰阿为主任，胡昭衡任秘书长。会议宣布撤销东蒙古人民自卫军番号，所属各部队以统一编制，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成立兴安军区，由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员阿思根兼任兴安军区司令员，哈丰阿任政委，张策任副政委，杜固尔扎布任参谋长，胡昭衡任政治部主任。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兴安盟分会，乌云达赉任主任（后由特布信接任）。中共西满分局决定将中共东

① 1947年5月31日《东蒙新报》。

蒙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张策任书记，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方知达、胡昭衡等为委员。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撤销以及兴安省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民族运动在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之后，最终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下，东部地区各盟、旗都相继成立了联合会分、支会，建立了民主政府。

4 月上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成立，孔飞、白云航分别任正、副主任。5 月 1 日，昭乌达盟分会在林东成立，乌力吉那仁为主任，那苏图为副主任。6 月 5 日，昭乌达省建制撤销，昭乌达盟行政委员会成立，萨嘎拉扎布任主席，吴广文任副主席。5 月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分支机构——呼伦贝尔文化促进会在海拉尔成立，哈达为主任。6 月 7 日，纳文慕仁省政府改组为纳文慕仁盟行政委员会，额尔敦任主席，夏辅仁任副主席。6 月 1 日，哲里木省建制撤销，哲里木盟民主政府在通辽成立，乌力图任政府主席，吕明仁任副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哲里木盟分会成立，协儒布僧格为主任，赵石为副主任。在自治运动的推动下，各地普遍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农村，开展了打击封建势力的斗争。农会、牧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地方政权的改造和民主政权的建立，使革命斗争的烈焰迅速燃遍了内蒙古地区。《大公报》一位记者写到："自治运动是在那片草原上一个最大的火球，这个火球今日在草原上滚动，火球本身是由于星星之火集成，火球的滚动必然引起更多的火把。"①

① 1946 年 8 月 9 日《大公报》。

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派出郭维城、王化一、苏林等，率领铁路警备旅与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的蒙古民族武装互相配合，消灭了数股活动在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光复军”、“保安队”，顺利地接管了中长铁路滨洲西线。呼伦贝尔地区的局势得到了稳定。在此期间，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系，向东北行政委员会呈递了21项条款，要求恢复呼伦贝尔自治。中共中央东北局对此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反应。6月，东北局邀请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派代表到哈尔滨，共同商讨呼伦贝尔自治问题。7月，以德春、葆定、额尔很巴雅尔、郭文通等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张平化和苏林等人对自治条款进行讨论，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也参加了研讨会议。经反复协商，将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提出的21项条款归纳为6条，于9月20日以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的名义，正式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10月2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呼伦贝尔实行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自治政府。额尔钦巴图仍就任自治政府主席。12月25日，呼伦贝尔地方自治代表团到达哈尔滨，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致谢，并进行了有关呼伦贝尔地方自治问题的会谈。12月28日，彭真和额尔钦巴图共同签署了《关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基本原则》，强调指出：“为贯彻呼伦贝尔民主自治方针，必须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必须加强蒙古内部和蒙汉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平等合作。”[①] 宣布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改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并对政治、经济、公安、司法等项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呼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22页。

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归属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1948 年 1 月 1 日，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撤销，改称呼伦贝尔盟政府。

1946 年 6 月，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前锋已迫近通辽、郑家屯一带，内蒙古解放区的东南部已逐渐处于战火之中。为适应战时需要，根据中共西满分局的指示，兴安省政府机关于 6 月 21 日由王爷庙迁往海拉尔。兴安军区机关撤至阿尔山、索伦。6 月 25 日，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北部分委在海拉尔组成，特木尔巴根任书记，方知达、苏林、夏辅仁、贾石为委员，统一领导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的工作。同时，在海拉尔设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呼纳办事处，特木尔巴根为主任，成员有克力更、方知达、桑杰扎布等。在王爷庙设立兴安省政府办事处，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仍在王爷庙坚持工作，领导各族军民与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武装展开游击战争。

1946 年 9 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形势下，决定放弃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及中央局机关撤到河北省阜平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及所属各机关撤到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加强对内蒙古工作的领导，晋察冀中央局于 9 月 23 日向中共中央建议，并经批准成立了内蒙古党委，由乌兰夫、奎璧、刘春、王铎组成，乌兰夫任书记。内蒙古党委的管辖“范围暂定为察哈尔之察哈尔盟锡林郭洛（勒）盟及绥远之乌兰察布盟及巴彦塔拉盟。”① 同时，晋察冀中央局还原则批准“在内蒙古党委下拟设立察哈尔盟工委、锡林郭洛（勒）盟工

---

①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建立内蒙古党委的提议》（1946 年 9 月 23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253。

委及巴乌工委。”①

9月底，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相继从张家口撤退到了贝子庙。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

1946年11月初，乌兰夫在贝子庙主持召开内蒙古党委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内蒙古党委和自治运动联合会下属的党、政、军组织机构作了调整；决定组建中共察锡工委、巴乌工委和察锡地方行政委员会，扩充整编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部队，调整联合会执委会机构。紧接着在贝子庙召开一系列会议，落实内蒙古党委会议的决定。

11月7日，中共察锡工委和巴乌工委正式成立。察锡工委由王铎、刘景平、杨平、寒峰等组成，王铎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景平任宣传部长，杨平任社会部长；巴乌工委由奎壁、李森、云一立、李文精、赵俞廷等组成，奎壁任书记。中共察锡工委成立后当即召开会议讨论锡察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共察哈尔盟工委，归察锡工委领导，刘景平任书记，肖诚为副书记，苏剑啸、陈炳宇等为委员；锡林郭勒盟的工作由察锡工委直接领导。②

同一天，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也在贝子庙召开第六次常务会议，对察、锡、巴、乌地区的军事斗争及行政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决定成立巴乌军区，任命乌力吉敖其尔为司令员，奎壁为政委；在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4支队、第1支队、骑兵旅及第5支队基础上分别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第12、

---

① 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建立内蒙古党委的提议》（1946年9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253。

②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216—217页。

第16、第17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锡地方行政委员会。

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常务会议，为了适应自卫解放战争的需要，便于集中领导，以抽出一部分干部加强基层工作，调整了联合会执委会机构，决定联合会执委会下设行政、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社会、总务等六个部，奎璧任行政部长，刘春任政治部长，乌兰夫兼军事部长，阿思根、王再天任军事部副部长，特木尔巴根任财政经济部长，吉雅泰任社会部长，哈丰阿任总务部长。[①] 同时，内蒙古党委发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分析了自卫解放战争的性质和形势，预测了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必胜的前途；号召内蒙古的全体共产党员和蒙古民族以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提出了进行自卫解放战争，争取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的方针与任务。[②]

中共察锡工委于11月10日召开会议，拟定了察锡行政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确定贝子庙为察锡行政委员会所在地。22日，召开察锡行政委员会筹备会议，与党外人士及民族上层人士商讨决定行政委员会机构设置及人事安排等问题。25日，察锡行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贝子庙葛根仓召开，乌兰夫主持大会，宣布察锡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指出察锡行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联合会工作方针，管理地方行政工作，组织人民生产，搞好地方治安，做好物资供应，支援军队对敌作战，”号召“内蒙古各族各阶层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41页。
② 刘春：《内蒙工作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第138页。

拥护内蒙古自治的主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援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反美反蒋和剿灭地方叛匪的斗争，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内蒙古。”[①] 大会宣布由特克希布彦、松津旺楚克、王铎、李秀山、刘景平、苏剑啸、奇峻山、寒峰、陈炳宇组成察锡行政委员会执委会及常务会；任命特克希布彦为主任，松津旺楚克、王铎为副主任；赛音吉雅、补达巴拉、萨木腾、洛蚌喇嘛、查干葛根、阿拉坦瓦其尔、巴拉贡苏荣等32人为委员。察锡行政委员会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察锡地区的代表机关，同时又是统一领导察锡两盟行政工作的地方行政机关。察锡行政委员会下设秘书、民政、财经、公安等四个处，任命乌力吉卜仁为秘书长、萨木腾为民政处长、丹巴为财经处长、云世英为公安处长。[②]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立场，千方百计地阻扰和破坏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内蒙古人民的革命运动。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相继成立或恢复了以赵诚璧、于德纯、薛兴儒、金崇伟、李宗洲为主任特派员的国民党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黑龙江省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即所谓绥蒙、察蒙、热蒙、辽蒙、黑蒙党部及兴安省党部，从组织上完成了环绕内蒙古解放区的反革命部署。另外还任命了几十个旗级党部书记长。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以热、察、绥等省调统室和沈阳、长春区分室为中心，成立了专门对蒙工作的情报站、组；军统特务组织以北平、沈阳为中心，专门组织了东蒙情报组及辽北、兴安、

---

①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220页。

② 同上，第221页。

热河、西满等组。国民党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恢复了日伪时代被取消了的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在占领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察哈尔盟部分地区之后，又相继拼凑成立了哲、卓、昭、察盟政府，任命了一部分蒙古王公为盟长。此外，以吴焕章为主席的国民党兴安省政府也开厅办公。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占领区内大量收罗各方面的反动分子，为配合其武装进攻，假手上述党部、盟政府，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内蒙古解放区各盟旗，破坏内蒙古自治运动，策动各旗王公上层叛乱，瓦解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及自治运动联合会基层组织。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向内蒙古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以及暗中策动，从 1946 年 9 月到 1947 年 5 月，察哈尔、锡林郭勒、昭乌达及哲里木盟地区的不少反动上层分子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内蒙古解放区，妄图扑灭内蒙古自治运动。也有一部分上层分子则标榜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保持中立，散布国共之争与内蒙无关等言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镶黄旗支会主任穆克登宝则在察哈尔盟组织了所谓“退出内战委员会”，发表宣言，挑拨中国共产党同广大蒙古族人民的关系，企图瓦解内蒙古自治运动。不久，穆克登宝撕下了“中立”的假面具，跑到张家口，当上了国民党察哈尔盟旗第一区保安司令及伪“国大”代表，组织反动武装，充当了国民党军队进攻察锡解放区的马前卒。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坚决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过程中，严厉打击了内蒙古自治运动中出现的这股逆流，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反动封建上层分子所标榜的“中立”、“退出内战”，实质上是企图分裂内蒙古自治运动，出卖蒙古民族利益的阴谋。9 月 21 日，兴安省政府在海拉尔逮捕了原东蒙古人民自

治政府副主席玛尼巴达喇。玛尼巴达喇在1946年2月11日至5月17日率“东蒙代表团”赴北平向国民党要求自治期间，接受了国民党军统局的任务，带领军统东蒙情报组特务携电台返回王爷庙。他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开辟内蒙古地区工作，主张向国民党投降的代表人物。逮捕玛尼巴达喇的行动，得到了进步上层人士和广大青年的支持。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通过大量的思想工作，帮助、教育部分上层人士放弃错误主张，排除了干扰。

内蒙古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团结和依靠各级民主自治政府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中的领导骨干和进步军官、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农牧民群众，坚决镇压和清洗了煽动叛变投敌分子，争取了动摇观望分子，初步巩固了部队，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保卫了内蒙古解放区，保证了自治运动的胜利发展，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的基本方针

1946年下半年，全国解放区战场的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不断的沉重打击，至1947年初，取得了歼敌71万的辉煌战果。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已陷入了疲敝、被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初步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行将到来。

随着自治运动在内蒙古解放区的广泛、深入开展，建立统一的、代表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人民政权，已成为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各界群众的普遍愿望。1946年8月1日，乌兰夫在关于内蒙古土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提出：“目前，我党在绥察热及东北蒙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11个盟一百七

八十万人口的自治问题。过去阶段党已经克服了两次独立运动，承德会议在蒙人中影响极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的满足蒙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①] 10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博彦满都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在齐齐哈尔举行会谈，议定了《关于蒙古问题谈判纪要》，[②]对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及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构想。

1946 年 11 月 15 日，由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会上，围绕内蒙古的自治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对出席伪国大的部分蒙古族封建上层和知识分子提出的内蒙古自治要求，国民党继续玩弄政治手腕，由热、察、绥三省国民党地方当局充当打手，对“高度自治”、“地方自治”的提议一律大加笞挞，使蒙古族“国大”代表在内蒙古自治问题上一无所获，只是在会议炮制的伪宪法中填加了两项毫无实际意义的条款。

伪国大召开期间，乌兰夫在中共热辽地委机关报《群声报》上发表声明，“代表内蒙二百万人民郑重否认伪‘国民大会’，‘伪国大’不能代表内蒙人民意志，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内蒙问题的权力。”[③] 12 月 20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兴安省政府行政委员会及参议会举行联席扩大会议，愤怒声讨国民党对内蒙古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宣布不承认没有蒙古人民真正代表的“国民大会”，提议“召开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或人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106 页。。
② 同上，第 135 页。
③ 转引自《解放战争时期的林西》，第 196 页，林西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1985 年。

民代表大会，立即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坚决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之伪中央政府，确立联共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1] 并讨论通过了《关于成立内蒙最高自治政权案》[2] 等项决议。

中共中央及有关中央局、分局在反复、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自治问题采取了积极而审慎的态度。1946 年 11 月 18 日，西满分局在致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并转乌兰夫的电报中提出：“现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都主张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大公报记者亦有要求内蒙自治的呼吁。在此情况下，我们对内蒙自治政府问题应采取如何态度，是否召开内蒙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比自治运动联合会更具政权性质的机关。此问题根据全国形势，我们是否可以在国民党之先有一确定之主张。”[3]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指出：“前此东蒙自治正值政协初开与东北问题紧张时期，现在政协与东北问题均成过去，国内舆论逐渐同情内蒙自治，而国方亦已逐渐侵入内蒙，故中央认为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此事请即考虑，提出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以便于最近期内实现。”[4]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乌兰夫、刘春等于 12 月 14 日与中共冀热辽分局和热河省委负责人程子华、胡锡奎等在林西召开会

---

①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卷，第 357 页。
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150 页。
③ 同上，142 页。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83 页。

议，对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性质、管辖区域、党的统一领导以及自治政府与相邻解放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商讨，并于15日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还提出“为统一内蒙领导，建议组织内蒙党中央分局，归东北局领导，”“务组内蒙解放同盟，作为内蒙扩大进步分子的组织”[①] 等意见。1947年2月3日，乌兰夫在中共热北地委干部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问题的讲话，阐述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重大意义，即更加紧密地团结蒙古族人民，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②]

2月14日，乌兰夫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共40余人抵达兴安盟王爷庙。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兴安省政府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代表和各族军民数千人前往车站迎接，并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表达了各族各界人民群众拥护自治运动的统一、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热切愿望。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迁至王爷庙后，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向各族各界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为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开始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2月20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向各盟、旗分支会发出举行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并要求各地组织及出席会议人员准备工作报告，搜集群众意见。3月14日，乌兰夫就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汇报中共中央：“内蒙古人民代表会准备3月下旬开会，组织自治政府。”[③]

3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向有关中央局、分局发出指示，指出：“东蒙及热察蒙民久已要求成立统一的自治政府，我们不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43页。
② 同上，第157页。
③ 同上，第169页。

应再加劝阻，故原则上，我们同意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产生内蒙统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在大会宣言中应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它所反对的为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府及其所制定的取消民族自治权利的伪宪与其卖国内战反动的政策。”对于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各盟旗，中央指示：“在政府组织中，要为西蒙代表留出位置……以期待西蒙盟旗之加入。”同时，中央还对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与各相邻解放区的关系、自治政府辖区内的民族关系、军队的组建问题也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完全盟旗的地方成立各地区的民族自治政府；蒙汉杂居，汉人占少数的地方，即隶属民族自治政府，但这些地方政府中须有汉人代表；蒙汉杂居，汉人居多数的地方，仍隶属解放区政府，但这些地方政府中须组织蒙民委员会，处理蒙民事务。”“在军队方面，各自治政府下应建立独立的蒙民武装队伍，在军政上由内蒙民族自治政府统一编制管理，但在指挥作战上，应统一于各人民解放军的军区。”同时，中央对党的领导以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等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① 4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原则同意《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草案，并责成东北局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共同商订具体条文。指示要求乌兰夫就内蒙古自治区域的划分、政权组织、人口和经济状况、武装部队、土地问题、宗教情况、中共党员数量以及与各解放区关系等问题分别电告中央。② 同日，中共中央还向各中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94—1096页。
② 同上，第1102页。

央局、分局发出指示，安排布置全国各解放区向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致贺以及新闻报导等项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自治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再次表明了帮助、支持国内少数民族人民实行自治、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定立场。经长期酝酿而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不仅对于团结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对于蒙古民族以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1947 年 2 月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哈丰阿、刘春、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奎璧、乌力吉敖其尔、克力更等前往哈尔滨，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筹备工作情况。3 月初，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安排下，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围绕内蒙古自治的性质，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自治政府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期间，起草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经讨论后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审定，并转呈中共中央，请求予以原则批准。会议认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组成，应体现内蒙古人民的共同利益，代表内蒙古各民族、各地区、各阶级、各阶层。为此，初步议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等项事宜，共同协商拟定了自治政府委员、参议会参议员名单，称之为“选举联盟”。为实现最为广泛的团结，

“选举联盟”包括了一些在当时不为广大蒙古族青年所拥护的上层人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组成了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专门负责组织、领导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党团组织，为顺利实现会议制定的各项计划，圆满完成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议程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4 月 3 日至 21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兴安盟王爷庙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总结自治运动开展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安排部署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及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事项。联合会总会执委、候补执委 53 人，东蒙总分会执委、候补执委 22 人以及各盟旗代表共 200 余人出席了会议。乌兰夫致会议开幕辞，他指出：“这个大会的胜利开幕，是说明全内蒙古人民在自求解放的自治运动中，有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才能在这里开幕了这样一个空前的大会议。同时也说明了，从去年‘四三’以后，我们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解放事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把几百年来在大汉族主义压迫下的分裂局面改变了，我们从大汉族主义压迫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从前不统一的东西蒙也统一起来了。我们今天的团结统一，不仅表现在去年‘四三’承德会议上的会议统一、领导统一；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志上表现了统一、一致。这种团结和统一就奠定了内蒙古人民在自求解放事业上必然胜利的基础和保障。这次大会的召开将成为内蒙历史上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这次会议将研讨和通过内蒙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正式组织——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实现内蒙古人民的高度自治。”[1] 4 月 9 日，乌兰夫在会议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173 页。

深刻分析了内蒙古革命的形势以及面临的困难，在军事、生产、教育、民族团结等方面提出了奋斗目标。刘春在题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以来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论述了联合会的各项方针、政策。会议期间，哈丰阿作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工作的报告》；特木尔巴根作了《兴安省工作的报告》；奎璧作了《巴、乌盟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王宗洛作了《锡盟工作的报告》，陈炳宇作了《察盟工作的报告》；白云航作了《卓索图盟工作的报告》。[①] 这些工作报告对自治运动开展以来各盟的基本情况向会议代表作了详细介绍，在群众工作、政权改造、军队建设、对敌斗争、干部培养、经济发展以及与友邻解放区的团结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会议还对有关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完全就绪。

4 月 23 日，王爷庙街彩旗招展，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成吉思汗庙山下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会场庄严肃穆。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乌兰夫、斯大林、乔巴山的彩色画像和以五星、套马杆、锄头为图案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旗。会场两侧挂满了友邻解放区和内蒙古各盟旗、各单位赠送的贺幛。下午 1 时许，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外，有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共 393 人。代表包括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上层人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189—213 页。

士。乌兰夫致大会开幕词，他指出："自十三世纪以来我们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有着极其光辉的历史。成吉思汗在前期为了民族统一和反抗异族侵略，曾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长时期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为了自由幸福的生活，为了彻底求得民族的解放是曾经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前赴后继地作着英勇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能在长期英勇斗争的基础上，而特别是在一年多来自治运动的基础上，为这样一次盛大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我们的斗争已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果实。""由此次会议产生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将一定能团聚着蒙古民族和境内所有的汉回等民族，发挥最大的威力，给予重重的一击，加速蒋介石的崩溃。我们有了民族内部和蒙汉间的团结，又有了外部的援助，深信这一目的是一定达到的，蒋介石的进攻一定能粉碎，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内蒙也一定会出现。"① 中共西满分局、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代表张平化、辽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黑嫩省参议会议长于天放等来宾出席了大会，并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内蒙古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衷心祝贺。张平化在致词中提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实行自治，争取自决"② 的口号，受到了与会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博彦满都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对中国共产党和友邻解放区给予内蒙古革命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以乌兰夫为首的、由2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和以大会秘书长哈丰阿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提案审查委员会。当日，《内蒙自治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开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04—1105页。

② 《内蒙古档案史料》创刊号，1992年。

始了人民的代表会议，我们有了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道路的机会。这机会是难得的，因此我们感谢为内蒙解放而拼命流血的烈士们，感谢苏蒙军摧毁日寇统治的义举，感谢二十多年来帮助我们越来越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和我们并肩作战打击大汉族主义者蒋介石的八路军民主联军。"①

4月24日，乌兰夫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回顾了内蒙古革命的历程，指出："内蒙自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分歧，这两条道路，一为以白云梯为首的少数上层分子的投降道路，一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道路。20余年来的内蒙革命运动史，可以说都贯穿着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② 报告中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在开展自卫战争，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等方面提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主要任务。4月25日至28日，大会经深入讨论，通过了乌兰夫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完成了提案审议和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审查，并对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划。

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全文如下："毛主席、朱总司令：我们以无比的热情，遥向你们致以衷心的谢意。三百多年来，蒙古民族一直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痛苦是难以尽述的。只有在你们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才完全改变了这种历史的不正常关系，

① 1947年4月23日《内蒙自治报》。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07页。

真正以民族平等的精神，来大力协助我蒙古民族的发展求得彻底解放。今天，我们内蒙古人民代表，所以能聚会一堂，商讨并决定自己民族今后的命运，也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功劳。深信在你们的英明领导下，内蒙民族的前途，必然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谨向你们表示，我们一定能遵从你们指示，团结民族内部，并与全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蒋介石进攻，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与新内蒙而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①] 大会还于当日向斯大林、乔巴山发出了致敬电。

29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始进行选举议程。在选举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过程中，由于意见分歧而出现了一些波折。少数代表在会前就已进行了非组织的活动，试图否定在哈尔滨会议上共同商定的人选方案，私下提出了所谓"三不选"，即不选延安来的干部，不选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不选汉族的错误主张，并重新拟出了一份选举名单。在部分代表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些错误主张和活动，受到了多数与会代表的抵制和反对。为此，会议党团在共产党员和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团员中进行了动员、布置，坚决执行原定的"选举联盟"，不仅确保部分人所谓的"三不选"代表入选，还必须保证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持错误主张的代表入选。经无记名投票选举，基本实现了原定选举方案。排列在参议员人数限额之内的最后4名得票数相等的候选人经会议讨论，采用抽签的方式使"选举联盟"拟定的人选当选，从而解决了由选举引发的一些问题。4月30日，会议宣布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结果，当选参议员121人，其中蒙古族、达斡尔族96人，汉族24人，回族1人，妇女

---

① 《内蒙古档案史料》创刊号，1992年。

代表5人。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宣告诞生。

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和“三不选”错误主张的提出，是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期间围绕内蒙古自治问题展开的争论的继续和表现形式，反映出一部分人在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道路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各民族、各阶层，许多人投身革命的时间不久，对关系到内蒙古自治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不尽相同，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还抱有疑虑或抵触情绪。因此，在会议中不同意见之间很自然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为：一，关于内蒙古自治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代表们对“民族自决”、“高度自治”理解不同，一些人认为自治只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低级形式，只有依照苏联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方式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才能实现“自决”；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代表强调实行地方自治，对民族自治持有异议。二，关于在内蒙古地区是否实行民主改革的问题。当时，在内蒙古东部的农业、半农半牧业地区已较为普遍地展开了减租减息、除奸反霸的群众性斗争，并已逐渐影响到牧业地区。如何使民主改革运动与内蒙古的实际相结合，已成为方针、政策、思想认识上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会议代表中相当数量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土地、牲畜等财产私有性质的改变顾虑重重。一些人则以运动过程中的某些失误为由而否定民主改革。有的代表强调内蒙古地区的特殊情况，主张不实行或暂缓实行民主改革。三，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一些人提出了重新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具体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主张。

为了使广大代表提高觉悟、统一认识，大会主席团采取了党

内外结合的方式，引导会议就内蒙古自治的性质、内蒙古革命的方向、道路问题和民主改革的有关问题，在充分民主的气氛中展开了深入讨论。关于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经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研究，决定留待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讨论解决。

在讨论过程中，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们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思想交流，部分共产党员和自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与错误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他们在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的基础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及内蒙古的历史与现状，批驳了部分人在内蒙古自治问题上所持的错误观点，指出“自决”不是分离，而是联合，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经充分讨论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关于“内蒙古自治政府是由内蒙古民族各阶层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的规定，使代表们最终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施政纲领》中规定的“保护蒙古民族土地总有权的完整、保护牧场、保护自治区域内其他民族的土地现有权利，对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的土地财产予以没收，分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及贫民，合理解决蒙汉土地关系问题，实行减租增资与互助运动，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政策，较好地阐释了内蒙古地区民主改革的目的、方向、任务和方式，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拥护。历史实践证明，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前后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的讨论具有重大的意义。不同意见、分歧的交锋，澄清了理论上、政治上的是非，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增进了党内团结和民族团结，为使代表们的思想逐步趋于统一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对内蒙古地区革命事业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参议会议长及驻会参议员的选举。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当选的政府委员有：特木尔巴根、奎璧、阿思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乌兰、胡尔沁毕力格、王再天、那钦双和尔、鄂嫩日图、王海山、哈萨巴特尔、都固尔扎布、高布泽博、旺楚克、包彦、刘春、王铎、胡秉权。博彦满都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议长，吉雅泰当选为副议长。特古斯朝克图、义达嘎苏隆、拉玛扎布、王海峰（白音布鲁格）、克力更、尼玛、旺庆、高万宝扎布、图布信（即特布信）当选为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5月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闭幕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隆重举行。[①] 全体政府委员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全体代表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宣誓就职。乌兰夫诵读了誓词："余等誓以至诚，为内蒙古人民服务，并为坚决争取自卫战争与解放战争之胜利，与彻底解放内蒙古而奋斗。"乌兰夫还向大会发出了"全体人民应一致亲密的团结在自治政府的周围，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而努力"[②] 的号召。庆典礼成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一部以雄壮的军容接受了检阅。聚集在王爷庙的数千名各族军民群情激昂，纷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共同欢庆胜利。

5月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召开了首届政府委员会议，任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王再天任办公厅厅长，奎璧任民政部部长，

---

① 根据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预定议程，4月30日进行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副主席及政府委员、正副议长及驻会参议员选举；5月1日举行自治政府成立典礼。经考订，预定议程在会议进行中有所变动，其变动如本书所述。

②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237页。

阿思根任公安部部长，高布泽博任文化教育部部长，松津旺楚克任参事厅厅长。会议决定：将5月1日定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旗；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设兴安盟王爷庙。5月30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第一号布告，公布了会议决定。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从12月1日起将王爷庙街改为乌兰浩特市，任命章泽为市长。5月15日，兴安省政府宣布撤销。至此，组成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各项工作已告圆满完成，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盟旗已纳入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

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贺电全文如下："亲爱的内蒙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们！你们5月17日来电收到了。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①] 东北、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冀热辽、绥蒙等解放区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也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纷纷来电致以祝贺。《新华日报》、《东北日报》、《晋察冀日报》、《冀热辽日报》、《西满日报》和《内蒙自治报》等各解放区报刊出版单位都相继发表社论或报道，盛赞内蒙古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内蒙古蒙古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27页。

主、团结奋斗的愿望。《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对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性质、任务、施政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内蒙古自治政府系本内蒙古民族全体人民的公意与要求，根据孙中山先生‘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论联合政府》中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主张及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而成立。

二、内蒙古自治政府是由内蒙古民族各阶层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

三、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四、内蒙古自治区域内的蒙、汉、回等各民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对内蒙古民族及各民族人民的侵略压迫，并联合全中国一切赞助内蒙古自治的民主党派及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为实现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而奋斗。

五、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民族自由发扬本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与革命传统，自由发展本民族的经济生活，共同建设新内蒙古。

六、内蒙古自治政府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通讯之自由，所有内蒙古人民（农人、牧人、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公务人员、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地主、牧主、工商业家、喇嘛以及以前的王公等）的人权财权，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对蒙汉奸卖国

贼等民族败类，如无悔改诚意，则应受到内蒙古自治政府法律之制裁。

七、凡内蒙古人民，年十八岁以上，不分阶级、性别、民族、信仰、文化程度，除剥夺公民权及精神病者外，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八、内蒙古自治政府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内蒙古人民所选举之内蒙古参议会为权力机关，参议会选举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参谋（议）会闭幕后，自治政府为最高行政机关。自治政府以下之各级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人民有罢免其代表及参议员之权，任何公务人员如有不忠于人民利益的行为，人民有控诉之权。

九、建设与发展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必须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拥护政府，遵守政府法令，加强团结，提高觉悟严整纪律，保卫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坚决粉碎大汉族主义者的侵略，争取自卫战争胜利。政府必须爱护军队，保障兵源与供给，优待军属烈属，抚恤伤亡。政府与军队协力发展人民自卫武装，共同肃清土匪奸细，保护交通，安定社会秩序。

十、保护蒙古民族土地总有权之完整。保护牧场，保护自治区域内其他民族之土地现有权利。对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的土地财产予以没收，分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及贫民。合理解决蒙汉土地关系问题，实行减租增资与互助运动，减轻剥削，改善人民经济生活。

十一、提倡劳动，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农业区改良农作法，奖励植棉。畜牧区应改善饲养法，提倡打井储草，发展毛织、皮革等手工业。组织运盐采矿，提倡造林，保护森林，施行有计划的采伐。建设道路、通讯、邮电事业，恢复驿站。组织运

输合作社，调剂日用品，保障公务人员、教员、技术人员、学生、文艺工作者等必须（需）物资生活。提倡机关学校军队的劳动生产，减经人民负担。整理财政，建立合理税收制度，废止差役，厉行节约，严惩贪污。建立内蒙古银行，发行货币，发展商业贸易，取缔奸商。

十二、普及国民教育，增设学校，改善教师待遇，培养人材。开办内蒙古军政大学及各种技术学校，推广蒙文报纸及书籍，研究蒙古历史，各蒙古学校普及蒙文教科书，发展蒙古文化。增进医疗卫生防疫及兽医设备，免费为贫苦人民治疗。公布禁止种吸鸦片法，减少疾病与死亡。禁止堕胎，奖励生育，生养子女四人以上者给以各种奖励，增加内蒙古人口。

十三、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立，保护庙产，提倡喇嘛自愿投资经营农工商业与各种合作事业，奖励喇嘛自愿入学与参加劳动、行医、识字。

十四、爱护与教育青年，培养青年干部，帮助贫苦青年入学，发展青年组织。

十五、保证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上的平等，提倡婚姻自主及一夫一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蓄奴、纳妾、童养媳妇等一切不良制度。

十六、欢迎一切热心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参加内蒙古自治工作。

十七、援助蒋占区蒙古人民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及蒋家暴政的一切斗争。”①

这一“施政纲领”的最基本点是：第一，内蒙古自治政府是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11—1113页。

根据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成立的；第二，蒙古民族联合内蒙各民族实行自治，是体现了蒙古民族在内蒙古自治中的主体地位；第三，内蒙古自治是在中国版图内的民族区域性自治；第四，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人民的民主政府；第五，内蒙古自治区域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第六，内蒙古自治区内的蒙汉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共求解放。

《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为内蒙古最高行政机关。内蒙古自治政府可在中国民主联合政府法令范围内制定公布单行法。确定了自治政府辖下的法院及各部、厅等机关的设置。各级地方政府由民选组成、自治政府委任；地方制度划分为 3 级，即盟、旗（县、市）和努图克（苏木、街、村）。①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这一内蒙古历史上空前的盛举，实现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多年来渴求统一与自治的愿望，标志着蒙古民族政治上的彻底解放，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求解放的革命热情。对于推动内蒙古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不仅引导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也为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内蒙古革命事业又一新的里程碑，为其他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124—1126 页。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初，所辖区域包括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5个盟，30个旗，1个县及3个市。她不仅面临着国民党军事进攻和地方反动势力骚扰破坏的严峻形势，还担负着在复杂环境中进行社会改革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历史责任。正如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伟大的斗争尚在开始，摆在前面的还有一段异常艰苦的过程，只要再接再厉，不懈不怠，才能度过难关，迎接光明。"[①]

四、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采取了分别区域，归属各相邻解放区直接领导的方式。中共中央东北局、西北局、晋察冀中央局及各有关分局、省、地市委在所属区域内领导、支援内蒙古地区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内蒙古解放区的党组织共同推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各盟都先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党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大。蒙古族党员人数已由1946年初的100余名发展到1100余名，其中绝大部分是抗战胜利后投身革命的青年。

但是，在关系到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权的重大问题上，内蒙古地区革命阵营内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虽然在"四三"会议上对此已取得了基本认同，改组后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早已停止了活动，但这一问题并未从组织上、思想上得到根本解决。1947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

① 1947年4月26日《内蒙自治报》。

表会议筹备工作期间和会议进行过程中，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等通过各种方式提出了重新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这一主张一经提出，即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于是，他们又提议将问题提交执委扩大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哈丰阿等认为：内蒙古的社会状况与内地不同，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成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而应成立代表牧民和农民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内蒙古的革命运动；外蒙古革命是由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内蒙古与外蒙古不仅是同一民族，而且社会经济结构也相同，所以内蒙古也只能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历史上也曾有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应重建该党。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一部分人对于内蒙古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仍持有片面的、错误的认识。

中共中央对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多次下达指示，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和内蒙古地区党组织反复讨论、研究，寻求解决办法。3 月 14 日，乌兰夫在致中共中央的请示电中提出："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我们提议成立内蒙分局或内蒙古党委员会，受东北局领导，现在管东蒙、察蒙及绥北蒙古地方的工作。"[①]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在对内蒙古自治问题发出的指示电中指出："如果内蒙人民中积极分子主张解散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而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我们应予以赞助，并以中共分子加入成为领导核心，如果时机尚未成熟，亦不妨暂时保存内蒙自运会，作为向西蒙活动的人民团体。""内蒙人民中进步分子，应多多吸收加入中共，并给以党的教育，准备

①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169 页。

到相当人数后，宣布成立内蒙共产党。目前内蒙党的领导机关，可成立内蒙工作委员会，即以云泽同志为书记，受东北局或西满分局领导。”① 4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分析了产生错误主张的历史原因和影响，并提出建议：“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问题应慎重考虑，待内蒙共产党及群众有相当基础，东蒙领导分子经过考验进一步靠近我党时，看清情况是否需要再定。”“目前是首先成立内蒙临时自治政府，组党问题以时机未达慢慢考虑不提出。”②

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的问题，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此，乌兰夫主持召开了党内的专门会议，听取哈丰阿等人的意见，针对错误的论点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乌兰夫、刘春等人指出：同一国家、同一社会不可能在各个民族中分别产生和形成各自的无产阶级，任何一个中国境内的民族都不可能单独产生和形成自己民族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着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并非哪一个民族的党；事实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才能走向胜利。③ 哈丰阿等人表示同意上述主张，但又提出：在内蒙古地区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但不建立各级组织，不发展党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直接领导内蒙古的各项工作。

党内争论的情况报告中共西满分局后，西满分局于4月10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95页。
② 同上，第1097—1098页。
③ 刘春：《内蒙工作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第150—151页。

日致函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提议“立即同意组织人民革命党，在自治政府成立后，即由云泽等发起筹备组党工作，并同意哈、特等所提三条（一）接受中共领导，（二）为内蒙民族与人民服务，（三）反对法西斯大汉族主义，作为基本纲领。”[①] 4月18日，中共东北局向中共中央作出汇报，建议“原则上同意内蒙建立实际上是各革命党派联合的政党，但因‘八一五’以后在东蒙组织的人民革命党参加的成分复杂，在蒙古进步群众中影响不好，且遭外蒙解散，故其名称可叫民主党或民主革命党。”同时还提出：“对哈、特、乌、彭（即朋斯克——引者）等非组织的活动，采取诚恳的态度，在党内进行批评，并经过蒙古进步青年广泛宣传中共对内蒙的主张和政策。”[②] 4月20日，中共中央对中共东北局4月1日电作出复示，指出：“不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而保留内蒙自治联合会，此意甚好。”“内蒙工作委员会应即成立，直受东北局领导。”[③] 23日，中共中央又电示东北局和乌兰夫：“关于内蒙人民革命党问题，如照东北局主张，能以内蒙自治联合会代替人民革命党为内蒙人民群众组织，吸收一切赞成内蒙自治的积极分子参加从事政治活动，而以我党从中领导，自为上策。如人民革命党既未宣布解散，而这些人又极力主张恢复，我们党员亦一时难以说服，则不如采取积极态度以我党为中心来建立人民革命党，领导其向革命发展，而不必预存废止之意。同时，仍保持内蒙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与发展。”“但两者，究以何者为好，并行得通，仍望东北局根据实况商定之。”[④]

---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99页。
② 同上，1101页。
③ 同上，1102页。
④ 同上，第1103页。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在乌兰夫的主持下召开了多次党的会议，哈丰阿、刘春、张策、特木尔巴根、方知达、阿思根、胡昭衡、朋斯克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党内的意见分歧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充分发表了意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持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帮助和规劝，使他们逐步地认识了错误，在党的会议上自觉地剖析了思想，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在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交错影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其尔、朋斯克等为代表的蒙古族革命者和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由激进的民族、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复杂的转变过程。在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进行积极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中，他们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而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当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后，则坚决地放弃了错误主张，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为内蒙古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7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指示："内蒙党的组织可称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①] 5 月 26 日，东北局作出了《云泽等 9 同志为内蒙古工委委员的决定》，[②] 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春、奎璧、克力更、王再天、王逸伦、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王铎为委员，吉雅泰、阿思根为候补委员，方知达为秘书长。中共兴安省工作委员会即行撤销。6 月 2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建党问题及党内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奉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不再建立任何外围党。全体党员要

---

① 《东北局致云泽电》，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5。
②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6。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加强党内团结，严格组织，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迎接伟大而艰巨的革命斗争。"①

7月1日，在王爷庙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6年纪念大会。乌兰夫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6周年纪念日，又是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诞生的日子。"7月9日，王爷庙举行了隆重的群众大会，乌兰夫在会上又公开宣布了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革命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内蒙古的党组织开始形成了坚强、统一的集体。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受到了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蒙古族青年的热烈拥护，也为内蒙古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与各友邻解放区党组织密切配合，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内蒙古解放区各盟、旗党的各级组织。1947年7月，中共巴乌工委与察锡工委合并，称察锡巴乌工委，奎璧任书记，王铎任副书记，刘景平、杨平为委员；中共纳文慕仁盟工委成立，克力更任书记，夏辅仁、陈立新为委员；中共兴安盟中心旗委成立，宋振鼎任书记，吉雅泰、高布泽博、杰尔格勒等为委员。11月，中共兴安盟中心旗委改称中共兴安盟工作委员会；中共纳呼工委组成，吉雅泰任书记，高锦明、夏辅仁任副书记；1948年12月，纳呼工委撤销，分别组成中共纳文慕仁盟工委和中共呼伦贝尔盟工委。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地区的领导，壮大干部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大事记》，第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队伍，提高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又先后开办了内蒙古军政大学、内蒙古党校等院校，以适应军事斗争、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需要。

1947 年 6 月 14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作出决定：将原东蒙军政干部学校改为内蒙古军政学校，哈丰阿兼任校长，刘春兼任政委。8 月 7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内蒙古军政大学，乌兰夫兼任校长、政委，丁士一任教育长。将内蒙古军政学校改为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一院，同时在齐齐哈尔设立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二院。9 月 10 日和 11 月 1 日，两院分别正式开学。

8 月，设在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与冀热辽解放区创办的建国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合并，成立了冀察热辽联合大学，赵毅敏兼任校长，徐懋庸任教育长。

1948 年 9 月 9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办内蒙古党校的决定》，乌兰夫任校长。11 月 7 日，内蒙古党校在王爷庙正式开学。

通过办学的方式，大批地方政府在职干部、部队指战员和参加革命的各族青年在各院、校接受了政治、军事、财经、文化等方面的教育，结业后被陆续充实到各级工作岗位，输送到斗争第一线，并造就了大批各项事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据 1949 年的统计，内蒙古地区干部队伍已具有一定规模，各类干部已达 16885 人，其中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4625 人，占干部总数的 27.39%，妇女 1942 人，占干部总数的 11.5%。许多蒙汉各族农牧民、青年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斗争的考验，逐步成为内蒙古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第五节　伟大的社会变革

一、农业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7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0 月 10 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号召。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正式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告"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动员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在革命大踏步走向胜利的形势下，内蒙古解放区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在为抵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保卫自治运动成果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时，除察哈尔盟部分地区尚被敌人占据，锡林郭勒盟匪患较严重外，大规模的对敌军事斗争已基本结束。随着地方革命政权的建立，特别是通过一年来自治运动的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反霸的斗争，人民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农村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在部分与东北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相邻的农村中，有些群众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开始组织农会，展开平分土地的斗争。

在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的五个盟中，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约有 3/4 的人口从事着农业或正在转向农业。纳文慕

仁盟的东南部、兴安盟东部、以及察哈尔盟南部地区以农业为主；哲里木盟和卓索图、昭乌达盟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较完全的农业区。这些地区由于经营土地的历史不尽相同，各地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在广大农村中，存在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农民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占有了农村土地的70——80%，而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只占有农村土地的20——30%。地主和农民的租佣关系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即分收、死租和伴种（又分大伴种和小伴种）。地租的基本形式是实物地租，租额一般占土地总产量的50%以上。此外还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一些地区出现了货币地租。由于蒙古族从事农业的历史较短，经营方式十分落后，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沉重压迫下，蒙古族农民与汉族农民一样遭受着蒙汉封建地主的剥削。他们经营的土地大多是“漫撒子”地，产量低下，在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下，终年劳作而往往所剩无几，甚至还欠租负债。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多用“死契粘单”或“押青苗”的方式，迫使农民以土地和在田作物抵押，无力偿还时则不得不将土地或成熟的农作物廉价出卖或向地主付出劳役以抵偿债务。随着农民的破产，土地的兼并和集中程度也不断加剧，蒙汉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经济上也长期陷于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这种状况，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逐年下降。1947年内蒙古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36年约减少了30.05%。

与内地农村相比较，内蒙古地区农村的社会状况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汉族“二地主”——即“揽头”、“地商”从蒙古族王公贵族和地主手中包揽土地，再转租给汉族农民，将全部地租转嫁到汉族农民身上，并对汉族农民进行远远超过原租额的中间剥削，这样不但加重了汉族农民的负担，还导致了蒙汉民族间的

矛盾。第二、蒙古族农民一般占有较多的土地，但因生产技术落后，劳动力不足，无法全部由自己经营，汉族农民就以付给轻微“蒙租”的代价来租种蒙古农民的土地，这样又形成了蒙汉劳动人民之间的剥削关系。因此，在内蒙古地区的土地问题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一年来的减租和清算反霸运动虽然打击了农村的地主阶级势力，在一定程度减轻了剥削，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冲击，与封建制度同时存在的原有政权组织形式，包括某些王公上层的特权世袭制度，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改造。这种状况严重地压抑着广大蒙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族劳动群众迫切要求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内蒙古解放区农村与全国各解放区农村一样，面临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1947 年 11 月 5 日——16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多的群众工作。会议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决定立即在内蒙古解放区广大农村发动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乌兰夫在会议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发出了在农村“要组织力量大举进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实现耕者有其田”[①] 的号召。这次会议为在内蒙古解放区农村全面展开土地改革运动作好了干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8 年 1 月 1 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由乌兰夫撰写的社论：《1948 年我们的任务》，指出：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蒙古民族真正走向统一，获得了民主自治初步胜利，蒙汉人民获得了平等与自由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针是“配合全国大反攻，

---

① 1947 年 11 月 23 日《内蒙自治报》。

实现耕者有其田，使贫苦农民彻底翻身。”[1]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同时，根据内蒙古农村土地关系的特点和民族关系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土地改革政策。它的基本内容是：

1、内蒙古境内的土地为蒙古民族所公有；2、对汉族地主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没收平分其土地、耕畜和财产；3、取消“二地主”，取消蒙租；4、将蒙族大中地主的土地、耕畜及财产没收平分给蒙汉农民，除大蒙奸恶霸外，其家属和一般地主均留给与农民相同的一份；5、出租户口地的小地主的土地不动，其财产也不分；6、蒙古族富农剥削量不超过其总收入50%的，耕畜和财产一般不动；土地只分其多余部分。中农的土地坚决不动，许进不许出；7、在斗争果实的分配中适当照顾蒙古族农民的利益，以弥补取消蒙租带给蒙古族农民的部分损失。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内蒙古地区的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充分反映了蒙汉族农民群众的共同要求；它既正确地解决了内蒙古农村蒙汉地主阶级与蒙汉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又正确地处理了围绕土地问题所产生的民族矛盾，使蒙汉各族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向封建势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共同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彻底解放而展开斗争。

1947年11月底，土地改革运动就在内蒙古东部的兴安盟、纳文慕仁盟、呼伦贝尔盟农村中发动起来了。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农村也在辽北省和热河省的领导下掀起了土地改

① 1948年1月1日《内蒙古日报》。

革运动的高潮。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各相邻解放区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队），奔赴农村，发动群众，造成农村大革命的形势，斗争的火焰迅速燃遍了整个内蒙古解放区的广大农村。

土地改革的方针从一提出直至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部分民族上层人士以“内蒙古土地广阔，没有土地问题”和“内蒙古没有阶级，不必进行土改”的主张反对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些同志也提出了“内蒙古的土地是民族总有，不应实行土改”，或“蒙地蒙分”的错误观点，对土地改革持消极的态度。反动的地主则竭力利用土地问题上存在的民族矛盾，捏造所谓土地改革是“汉人占蒙地”的谬论，离间、欺骗蒙汉农民，对抗土改运动。有的地主还纠集反动武装，与国民党军队以及土匪相勾结，在解放区后方大肆骚扰。部分群众由于对我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缺乏了解，在反动地主的挑拨下，竟迁往外地逃避土地改革运动。

内蒙古地区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针对这一问题，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反复的讨论。在各种集会和报刊上对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澄清了模糊认识，以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明：内蒙古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农村中民族问题的关键。土地改革是在确定内蒙古的土地属蒙古民族公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完成这场历史性变革是解放内蒙古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扩大蒙汉各族人民的民主权利，繁荣内蒙古的必由之路。同时，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改革的具体原则，以调整民族关系，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这些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在发动对蒙族地主恶霸的斗争时，主要依靠蒙族农民进行，在发动对汉族地主恶霸的斗争时，由蒙汉农民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重申

在土地的分配中要照顾蒙古族农民的利益。另外还规定了对部分进步的民族上层人士及其家属予以适当的保护等项措施。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阻力，农村中的民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内蒙古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与国民党土匪、反动地主武装激烈斗争的残酷环境中进行的。坚守在解放区后方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担负起了保卫、支援土地改革运动的艰巨任务。1947年12月，乌兰夫在给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第2团的信中写道："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民族，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压迫、帮助农牧民翻身，希望你们剿净残匪保证后方治安，并且要为农民撑腰，帮助农民打倒恶霸地主，分配土地，以使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获得彻底解放。"[①] 1948年3月1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命令》，指出"现在内蒙古地区的全体农民，正在进行打倒地主恶霸、彻底平分土地改革运动，内蒙古所属武装部队，自应绝对拥护穷苦农民这一正义要求。"[②] 遵照命令，各部队一面追剿骚扰土改运动的土匪武装，一面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帮助群众平分土地，建立政权，组织民兵武装，有效地保卫了土改的胜利成果，使人民军队成为群众运动的坚强后盾。

到1948年2月，内蒙古解放区各地农村大致上都已完成了发动群众、斗倒地主、划清阶级、平分土地的任务。在土改运动迅速发展、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左"的倾向。

---

① 转引自钱林豹：《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第141页。

② 1948年3月6日《内蒙古日报》。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阶级的标准，错划了部分农民的成分，扩大了打击面，中农的利益普遍受到侵害，破坏了属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些地区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使运动失去了有效控制，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削弱了党对土改运动的指导；在蒙古族聚居的农业区搬用了汉族农业区的斗争方式，很快打破了原定的分配原则，忽视了蒙古族转入农业不久、生产力较低的特点，平分了出租户口地的蒙古族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普遍发生了斗争喇嘛、破坏寺庙的现象，给党的宗教政策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左”的错误，严重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给内蒙古的革命运动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恶果。

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自中共中央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全党范围内存在的“左”倾错误对内蒙古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在没有模式可依的情况下，人们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以及反映在土地问题上的复杂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没有能够很好地执行稳步前进的方针，未能有效地把群众的自发斗争完全引向自觉的斗争。这种“左”的偏向，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和蒙汉民族间的团结，影响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必须及时地克服这种偏向，才能保证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

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领导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对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以来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从 1948 年 3 月开始，全面展开了纠偏工作。工委向干部、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 1947 年 12 月会议关于纠偏的指示精神，组织干部重新学习土改政策。在各地迅速采取了纠偏的措施，纠正了部分错划的成

份，严格以剥削量划分阶级；补偿被侵犯的中农的损失，经济上保证其正当利益，政治上吸收中农参政；给土地、财产被平分的部分地主、富农留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补偿被侵犯的工商业；严禁在运动中乱打乱杀，对一切过火行为予以坚决的制止；加强对广大群众的政策教育，同时也使地主、富农明白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以提高其守法性，减少抗拒性。

由于克服了“左”倾错误，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政策水平，土地改革运动迅速脱离了“左”偏状态。此后直至1949年4月，党和各级政府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不断进行复查和纠偏，以主要精力领导各族群众在农村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使土地改革运动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正确的政策轨道发展。

1948年4月和6月，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7月，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研究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内蒙古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由平分土地的斗争转入发展生产、建立稳定秩序的阶段。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打垮了地主阶级，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内蒙古解放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各族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汉农民共得到296.7万亩土地，15.6万头耕畜。打碎了封建枷锁，摆脱了剥削压迫的劳动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他们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将土改中发挥出来的积极性转到生产上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内蒙古解放区农村普遍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

爱国丰产运动。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发放大批农业贷款支援农业生产的同时，提倡精耕细作，推广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使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大大增加，如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在土改前每垧地平均产量为 1200 斤，到 1949 年，已提高到 1600 斤。整个内蒙古解放区 1948 年的农业总收获量是 1947 年的 130%。

政治上的解放，提高了各族群众的革命觉悟，使他们进入了高度的主动状态。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会、人民代表会完全掌握了乡村的政权，民兵和自卫队武装不断壮大，在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安定地方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内蒙古解放区获得了更加坚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在内蒙古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哲里木盟有 1.2 万多人参军，组织支前民工 3.6 万多人；昭乌达盟则动员了四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先后组织了 28 万民工支援前线。各地群众在生活还比较困难、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积极缴纳公粮、捐献财物运往前线。仅兴安盟、纳文慕仁盟、呼伦贝尔盟在三个月内就缴送了 1.1 亿多斤公粮，哲里木盟缴送了 3.2 万斤牛羊肉和 8.4 万多斤草料。各族群众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为我军在东北战场取得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长期以来在内蒙古农村中复杂地交织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得到了基本解决。高利贷盘剥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蒙租”的彻底废除，使蒙汉民族间的关系有了极大改善。蒙汉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并肩斗争，建立起了兄弟般的友谊，团结、友爱的新型的民族关系开始形成。

二、牧业区的民主改革

牧业经济在内蒙古地区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内蒙古自治政府直辖的五个盟中，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察哈尔盟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地区是牧业区，兴安、纳文慕仁盟也有部分地区牧业经济占着优势。此外，昭乌达、哲里木盟部分地区也属牧业区。在这些地区，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牧民共约 20 多万人。因此，在牧业区进行民主改革，直接关系到内蒙古解放区政治上的巩固和经济上的恢复、发展。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使蒙古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而获得解放。

牧业区封建所有制关系的主要标志是王公贵族、大牧主和上层喇嘛占有着大面积水草丰美的牧场和拥有大量的畜群。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对广大牧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 1948 年对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的调查：全旗 538 户中，牧主 32 户，占总户数的 5.9%，而占有牲畜数却是总牲畜数的 47.9%，中等以下的贫苦牧民 464 户，占总户数的 86%，占有牲畜数只是全旗总牲畜数的 36.7%。据对呼伦贝尔盟索伦旗辉苏木 5 个巴嘎的调查，牧主平均每人占有牲畜 459 头（只），富裕牧民平均每人占有 183 头（只），贫苦牧民平均每人只占有 16 头（只），牧主人均占有牲畜头数竟达贫苦牧民占有牲畜头数的 28 倍！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苏鲁克”制度，在牧业经济日渐凋敝的情况下，剥削的程度也随之不断增强。包租王公、牧主和寺庙、旅蒙商畜群的牧民，整年辛勤劳动，只能得到一些羊毛、牛奶及少量其它畜产品。羊毛的收获基本按畜主得七成，“苏鲁克”户得三成的定例分配。一些地区还须将全年生产的奶制品的一半以

上交畜主，繁殖的幼畜除一胎产双羔可留一只外，全部归畜主。在牧放期间，牲畜如有损失，必须如数赔偿，无力偿还者，只能以被畜主长期役使去抵偿。庙仓对“苏鲁克”户的剥削量则大于其他剥削者，而且在喇嘛教的束缚下，牧民还要主动向召庙布施自己本已少得可怜的牲畜和畜产品，这使得牧民承受的负担更加沉重不堪。加之牧业经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牧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往往在一个灾年之后便沦为赤贫。

建筑在这些剥削基础之上的雇佣关系在各牧业区都有较为普遍的发展。一部分破产的蒙汉族农民为生活所迫流亡牧业区，促进了雇佣制的流行。受雇的牧工除终年为牧主牧放畜群外，还常常被迫从事其它杂务劳作。超经济的剥削使牧工仅仅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领主制的影响，牧业区仍保留着人身依附关系。一些地区社会生活中仍能看到奴隶制的残余。王公、大牧主有摊派兵役、随丁，无偿役使牧民，随意凌辱、处罚牧民，任意降低牧工报酬和待遇的种种特权。还有一些牧主以收容孤儿、抱养子女等方法占有劳动力，使其终身象奴隶一样从事无偿劳动。在封建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下，广大贫苦牧民生活极端贫困，政治上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高利贷资本的摧残、掠夺，使内蒙古草原呈现着一派凄凉景象，具有悠久历史的畜牧业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和萎缩的状态。1946 年，内蒙古地区的牲畜总头数为 751 万头，比 1936 年的牲畜总头数 937.6 万头减少了 19.9%。锡林郭勒盟 1946 年的牲畜头数比抗日战争前平均下降了 48%，其中马下降了 60%，牛下降了 58%。

内蒙古自治运动广泛开展以来，牧业区的封建剥削制度虽然受到了巨大冲击，但还未从根本上动摇，旧有的政权组织形式已

进行了初步的改造，然而还有许多基层政权仍旧把持在王公、大牧主或旧日的伪警察、官吏手中，劳动牧民还未真正当家作主。这种状况压抑着广大牧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因此，废除封建制度，清除各种社会障碍，解放牧业区的生产力，已成为蒙古民族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上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广大贫苦牧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他们渴望摆脱封建枷锁，改善贫困的经济状况。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经过大力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民主改革方针的宣传工作，群众已发动起来。随着大规模剿匪斗争的进行，内蒙古解放区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国内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影响，为民主改革运动在牧业区的全面展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牧业区的民主改革与农业区的土地改革相比较，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运动的任务和步骤上有较大的差别。鉴于此，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牧区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都要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的生活为出发点。内蒙古工委和自治政府依据蒙古民族的经济特点和地区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在牧区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政策，经过建立民主政权，废除封建剥削阶级政治上的一切特权，实行民主选举，废除奴隶制度残余，完成对封建所有制的逐步改革。内蒙古自治政府除颁布若干政策、法令外，还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牧区广泛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势力，以和平改良的方法推行互助运动。由于采取了慎重缓进的方针，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

在牧区的民主改革运动全面展开之初，由于“左”倾思想在

实际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一些牧业区错误地划分了阶级，不仅发动了对牧主的斗争，还有部分基本群众被划为牧主、富牧。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的部分地区被划为牧主、富牧者占总人口的20%以上，扩大了斗争的打击面，挫伤了部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盲目地搬用农村土地改革的做法，仿照农业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提出"牧者有其畜"，对牧主的牲畜和财产采取了一律没收、平均分配的办法，主张"黑黄封建（指世俗封建势力和宗教封建势力）一齐消灭"。一些地方在运动中，将牧主和召庙的牲畜、财产集中起来，由牧民抓阄实行平分。斗争方式简单、过火，各牧业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

畜牧业经济是极不稳定的自然经济，它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保持它的畜群结构。由于忽视牧业经济的特点和蒙古民族的传统习惯，采取平分牲畜的政策，导致了劳动力的浪费，出现了管理不善，任意宰杀、转移、出卖牲畜的现象，造成了牧业生产的混乱，引起了牲畜头数在一个时期内的急剧下降。当时，"左"倾错误比较严重的昭乌达盟、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据昭盟地区的统计，1946年全盟牲畜为143万头（只），而1948年却下降为93万头（只），损失1/3左右。据锡盟的调查，1947年牛的数量为120万头，到已有回升的1949年，仅达到169万头。虽然这里有自然灾害、土匪抢掠、战争负担等因素，但"左"的错误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

政策上的失误，引起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扩大了打击面，部分人跑到敌人阵营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势力借机煽动叛乱，土匪愈加猖獗，使各项工作的开展受到很大的阻力，

直接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贯彻实施。部分基本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产生怀疑，一些牧区发生了牧民为逃避斗争而迁徙的事件。

牧业区民主改革过程中“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和教训说明：只凭革命热情无法使蒙古族人民从封建剥削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从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制定、执行符合内蒙古实际、符合畜牧业经济客观规律的方针、政策，才能完成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

1948年7月，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干部会议，对内蒙古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牧区民主改革运动的经验、教训做了认真的总结。针对牧区出现的划阶级、斗牧主和平分牲畜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分析了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在理论和政策上明确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和步骤，对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的思想及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党在现阶段牧区的工作重点是削弱封建剥削，“牧者有其畜”的口号和“彻底消灭封建”的方针是十分错误、极其有害的。明确地提出了牧区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即“废除封建特权，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放牧制度，”“除罪大恶极的蒙汉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实行民主改革，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游牧区经济”。[①]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还要求从事牧区工作的干部认真调查研究内蒙古牧区的阶级结构、经济特点和生产发展状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地贯彻党的总任务。

① 《云泽同志在内蒙古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1948年7月30日），《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421页。

在工作中力戒盲目和急躁的情绪。会后，党和政府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纠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回不良影响。撤回一些地区的工作团（队），停止对牧主的斗争和平分牲畜的做法，制止乱打乱杀行为，动员群众安心生产。此后，在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的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的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的牧区工作总方针。采取“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即：在与牧主的斗争中不采用激烈的方式，不分配牧主的牲畜和财产，不公开划分阶级；保护牧主经济在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限制牧主对牧工的剥削。以比较缓和的特殊方式解决牧区的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保证畜牧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在此基础上，内蒙古自治政府向牧业区发出了“增畜保畜”、“人畜两旺”的号召，受到了广大劳动牧民的热烈拥护。

各牧业区都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旧的“苏鲁克”方式进行了改良，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实行了牧工与牧主按比例分配租放期间繁殖的幼畜，适当提高牧工的劳动报酬，确定合理赔偿办法等对牧工和牧主都有利的新“苏鲁克”方式。在牧工的工资问题上，各地一般都采用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经牧工、牧主双方协商，订立合同，照章执行；一种是经牧工、牧主代表会议协商，规定出本地区小范围的工资标准。确定牧工工资标准的原则是：既不能影响牧工收入的逐年增加，也不能挫伤牧主经营牲畜的积极性，保证“苏鲁克”方式的合理性。地方人民政府对工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仲裁、监督。规定牧主不得随意解雇牧工或收回畜群；牧工也须履行合同，管理好畜群，切实贯彻执

行“牧工牧主两利”的方针。

由于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自治政府对“左”的错误及时地进行了纠正，牧区的民主改革运动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牧业区的社会面貌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通过对各级政权自上而下的改造，盟、旗、努图克政权已基本掌握在人民手中。随着各种形式的超经济剥削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废除，封建王公、牧主的政治统治已被彻底打垮，广大贫苦牧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牧场公有、放牧自由”政策的实施，打破了数百年来王公、牧主霸占大面积优良牧场的封建特权，牧民群众有了在划定区域内自由放牧的权利；实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后，牧主的部分牲畜以工资的形式转移到了无畜、少畜的牧民手中，使牧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由于牧工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调动，牧主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对于喇嘛和庙仓，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采取了慎重的方针，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彻底废除了喇嘛和庙仓的一切封建特权，其畜群全部实行新的“苏鲁克”方式，鼓励、提倡青年喇嘛还俗，参加生产劳动，对喇嘛进行了团结、教育、改造。

为了扶持畜牧业生产，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牧区发放贷款，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同时对牧民采取了逐步减轻税收的政策，取缔了不法旅蒙商不等价交换的高利盘剥，组织牧民劳动互助，进行牲畜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使大批劳动牧民较为迅速地摆脱了贫困状态。许多地方扭

转了牲畜头数下降的趋势，牧业区开始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如呼伦贝尔盟，1948 年各类牲畜数量的增殖较 1945 年平均提高了 45.5%。[①]

这一时期在牧业区普遍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蒙古民族的社会生产力，使内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革命的进程，为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半农半牧区的社会改革

在内蒙古解放区的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有着面积广阔的半农半牧区。这里的阶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与农业区、牧业区不同，既是农牧业经济交错结合的地方，也是蒙汉民族杂居的地区。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各盟中，有十多个旗属半农半牧区。

内蒙古地区的半农半牧区，大部分是清末以来随着牧场的开垦和移民的增加而逐渐形成的。一些汉族官僚、地主、地商通过开垦，侵吞了大片牧场；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大牧主也从“放荒”、“招垦”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相互勾结，结合成地方封建势力，对蒙汉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牧场的日趋缩小，造成牲畜数量的不断下降，牧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长期以经营牲畜为生的一批批蒙古族牧民被迫弃牧为农，或不得不部分经营农业。许多牧民由于不谙农业生产技术而将牧养地招垦耕种，经“揽头”向前来开垦的汉族农民收取一定数量的租额，从而形成了蒙汉族群众间的剥削关系。还有部分牧民将牧养地作价出典，逐渐沦为流民。他们无法摆脱王公牧主的压迫，并且还要

① 1949 年 2 月 9 日《内蒙古日报》。

遭受汉族地主、地商的敲诈、剥削，境遇每况愈下。前来开垦的汉族农民因无地、少地，并承受地租或高利贷剥削，故而无能力、也无兴趣向土地投资，耕作技术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低下，地力消耗甚烈。不少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于种植业的发展，开垦后不久便出现了严重的沙化现象。这种状况形成了一方面耕地不断蚕食牧场，一方面已开垦的土地相继“撂荒”的恶性循环，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农牧业之间的矛盾激化，还因此常常引起蒙汉民族间的纠纷。

在半农半牧区，比较普遍地实行着“榜青”雇工制。即地主招来无地的流民或少地的自耕农为其耕种土地，收获按一定比例分配，是一种保留着劳役地租残余的剥削形式。它基本上可分为“里青”、“外青”和“锄头青”三种形式，“里青”，也称“榜里份”，是由雇主提供土地和劳动工具以及雇工的食宿条件，雇工在地主或其代理人监督下从事农业生产。收获后扣除春播费用和雇工一年来的口粮归还雇主，而后双方依照定约分配粮食，一般为对半或“四六”分粮。雇工在农闲期间须为雇主从事无偿的杂务劳动，一些地区还须为雇主额外耕一垧左右的“马料地”。“外青”也称“榜外份”，雇主只提供土地和种籽，出借口粮，其它所需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以及食宿须由雇工自备、自理，收获后扣除所借口粮和种籽归还雇主，然后按定约分配，或四六分成，或对半分成。农闲期间雇工须为雇主做5——20天不等的杂务，一些地区还须为雇主耕种半垧左右的“马料地”。“锄头青”，雇主提供耕畜、农具、种籽，出借口粮，所借口粮和种籽必须加利息于秋后归还雇主，并且所耕之地多为劣地，收获物对半分成。虽然各地的“榜青”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剥削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是雇工的命运同样是十分悲惨的。雇工辛劳一年的

所得大部分为雇主所占有，只能得到勉强维持全家生存的食物，遇到灾荒或其它变故时，只得向地主告贷，逐渐将自己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因此，“榜青”雇工制是封建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土地使用不合理的结果，也是民族压迫政策带来的民族矛盾、农牧矛盾的产物。“榜青”雇工制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它既不同于封建租佃制，又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内蒙古部分地区农牧业经济和民族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雇主提供土地，备置生产工具，负担租赋，增强了生产过程的劳动协作，因而创造的产品价值也较高。同时，与农业区相比较，“榜青户”所受的剥削也要轻一些。

半农半牧区的农业生产历史较短，蒙古族农民的生产技能落后，由牧业转向农业后发展为地主和富裕户的比较少，中农的数量也很少，地主经济尚不发达。这些特点决定了半农半牧区的社会改革不能简单地用农业区土地改革的方式进行，既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阶级矛盾，也要调整农牧关系和民族关系。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在考察分析了半农半牧区的社会状况后，决定在半农半牧区不实行土地改革，制定了“在半农半牧区，发展农业，发展畜牧，适当地提高贫苦农民与牧民的生活”[①] 的方针。根据半农半牧区的经济特点和民族特点，制定了解决阶级矛盾，调整农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具体政策：即在半农半牧区的农业占优势地区，大中地主固定的大垄地与耕畜实行平分，漫撒地和牧畜一律不分，小地主和富农不动。在牧业占优势地区，除大牧主耕畜分给农牧民外，牧畜不分，财

① 《高岗在内蒙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8月3日），《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432页。

产不动。个别恶霸地主的土地、牲畜和财产，经政府批准后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和愿从事农业生产的牧民，牲畜由政府组织牧民统一经营，严禁分散畜群。通过这些措施，使半农半牧区的农牧民摆脱了封建特权的压迫和封建地主的剥削，解放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在民主改革的同时，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自治政府提出了“以牧为主，兼顾农业，保护牧场，禁止开荒，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生产”的方针。根据群众的意愿和自然条件，确定半农半牧区的范围，划分农田、牧场的界限，停止盲目的开荒。对自然条件适宜农牧业经济并存的地区采取“农牧并重”的政策，鼓励农牧业共同发展，缓解以农挤牧、以畜伤农的矛盾状态；对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现状予以维持；对农业生产经营不善，易引起矛盾纠纷的地区，一般采取适当封闭耕地的办法。帮助农业区的牧民和牧业区的农民逐渐转向各自擅长的生产方式。同时，大力提倡“蒙汉互助，发展生产”。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农牧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援，农业区及时向牧业区运送大批粮食、饲料，减少了牧民对牲畜的食用性消费，增强了抗灾能力，提高了牧业生产水平；牧业区向农业区输送大批耕畜、肉畜和有机肥料，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困难，出现了农牧业生产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好势头。

为了在经济上扶助半农半牧区的畜牧业生产，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自治政府对部分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重农轻牧”、“牧业落后”的错误观念给予了批评、教育，及时地纠正社会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偏差，保证了半农半牧区的各项改革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同时，在半农半牧区实行了轻税政策，以调动农牧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规定以农业为主，或农牧兼

营而所占比重基本相等的农户、牧户免征牧业税，提倡和鼓励农民兼营牧业，从而促进了半农半牧地区牧业生产的发展。由于兼营牧业在农民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牧民的牧业生产得到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农牧矛盾的逐步解决，蒙汉各族人民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

四、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自近代以来的内蒙古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充满祸患的动乱时期。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摧残下，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一直处在缓慢发展的状态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滞，面临着经济崩溃、文化衰退的惨痛现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一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艰苦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为铲除封建剥削，摆脱贫困愚昧状态展开了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争取政治上彻底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为恢复和发展内蒙古地区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在短暂的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农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土地改革及民主改革的基本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受封建制度长期束缚的劳动生产力，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面貌。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使濒于崩溃的内蒙古农牧业经济和极度衰退的各项文化事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在农村，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拥有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热情。在此基础上，内蒙古自治政府采取了奖励与扶助生产，保护农民私有财产，实行合理负担等项政策，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

量。自治政府还向农村发放低息贷款，及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并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农业税收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在党和各级政府的积极倡导下，蒙汉族农民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生产互助组。到1949年，已建立起来的常年或季节性互助组达21535个。通过大力提倡改进耕作技术，实行施肥、选种、精耕细作和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合理利用水资源等办法，蒙古族农民经营农业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194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已有60%以上的蒙古族农户的耕地开始施肥并加强了田间管理。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爱国丰产运动的推动下，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1949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46年增加了36.63%，超过了1936年的水平。以此为标志，内蒙古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开始步入繁荣发展的时期。

通过民主改革运动，牧区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内蒙古自治政府对畜牧业生产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组织工农牧业的相互支援，发放牧业贷款、救济粮食；疏通商业渠道，取缔不等价交换及高利贷盘剥；在牲畜及畜产品的收购上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并实行了税率较低、方式简便的税收、征畜政策。为解决牧区劳动力不足和生产工具缺乏的问题，贯彻了“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参照蒙古族畜牧业的历史传统组织牧业生产互助组。采取了一些增畜保畜的有效措施，组织群众搭盖棚圈、打草储草、打狼、打井等，加强了牧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牧民对牧业生产的经营水平。在基层设立兽医机构，培训兽医，广泛开展了防治牲畜疾病的工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内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基本上扭转了牲畜头数下降的趋势。1949年，自治政府辖区内的各类牲畜总数已达到9408231头，比1947年增长了13.6%，比1948年增长了

1.8%，超过了1936年的牲畜总数。畜牧业经济开始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为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调动广大工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下，1949年2月，在乌兰浩特市举行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劳动模范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自治区域内各地的劳动模范249人。会上，乌兰夫主席致词，提出了“提高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繁荣内蒙古人民经济”[①]的号召。王逸伦向大会作了关于1948年生产情况的报告，在总结成绩和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并阐明了1949年的生产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这次大会，对开展内蒙古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完成1949年的生产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总结了过去的生产成绩，广泛交流了生产经验，深入地宣传了党的各项政策，明确了发展生产的方向，树立了各个生产战线上积极劳动生产的先进旗帜，而且消除了农牧民群众中的那些有碍于生产的思想顾虑，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

由于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自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内蒙古蒙汉各族劳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下，掀起了空前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改善了人民生活，为内蒙古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内蒙古地区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只有一些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加工厂、发电厂和手工业作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仅有687个工业企业单位，其中只有8个粮食加工厂、8个发电厂及1个毛织厂初步具备了现代工业的一些特征。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产值）为

① 1949年2月11日《内蒙古日报》。

5300多万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6%。内蒙古的丰富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加工工业落后，长期存在着拥有大量原材料而不能加工，连皮毛制品都要依赖外地供应的不正常现象。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自治政府在“保护发展工业，供给军需民用”的方针下，鼓励和扶助私营工业恢复与发展，并在较大的城镇初步建立了一些大型地方国营工厂。同时根据内蒙古的实际，大力发展了畜产品的加工工业和森林工业。当时这些地方国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总额或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虽小，但它是内蒙古工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对后来的内蒙古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内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一直处在缺乏活力的状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传统习惯的影响，蒙古族人民的商品观念极为薄弱，商品渠道严重阻塞。人民群众所需的皮革、布匹、农牧业生产工具以及棉花、茶叶等其他日用品均须由外地长途运进，地处偏远的牧区粮食供应紧张，生活必需品奇缺。这种状况使得内蒙古的经济命脉长期为高利贷资本、旅蒙商所掌握。他们利用不等价交换和诈骗等各种手段，搜刮着内蒙古地区的财富，吮吸着蒙汉各族人民的血汗。人民的农牧业产品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却要以高昂的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1946年，旅蒙商的一块砖茶可以换一只羊，一双靴子要换一头牛，30尺布要换一吨高粱。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存在着的严重的不等价现象和因经济凋敝引起的物价不断上涨，给各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内蒙古自治运动兴起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决定迅速发展新民主主义商业，通过商业恢复生产，供给人民需要，使商业工作成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项先行工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制

定了“以有利于蒙民生计为原则”的贸易政策。1946年3月，成立了“内蒙古实业公司”，在战争环境中担负起了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的繁重任务。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首先掌握了银行、大宗贸易、林业、渔业、矿业等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以巨额投资开办了粮食、畜产和百货三大地方国营商业公司。1947年8月，成立了内蒙古贸易总公司，在财政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重点扶持了商业。1947年，自治政府对商业的投资占财政总预算的65.7%。自治政府还大力发展了合作社营商业，开展群众之间、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恢复旧商路，开辟新商路，活跃各种经济，为农村、牧区和城镇的结合，逐步取代私营贸易开辟了道路。据1949年8月的统计，内蒙古地区的各类合作社已达809个，社员共有44万人。地方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建立后，开始承担了内蒙古解放区物资交流的主要任务。组织、供应人民群众所急需的物资，合理收购牲畜及其它畜产品；开发木材、盐碱资源；限制取缔投机活动，减轻中间剥削，有计划地稳定物价和消除不等价交换；合理收购农牧民的牲畜、皮毛、粮食等主要农牧业产品，初步改变了工农牧产品不合理的差价。到1949年一只产肉37斤的绵羊，可换到白糖40斤，或白布99尺，或砖茶11块。人民购买力比1948年提高了130%。在沿海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控制时期，东北解放区所需食盐主要由锡林郭勒盟盐池源源不断地送往东北、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内蒙古东部地区作为东北解放区西满根据地的一部分，为东北解放战争贡献了力量。1949年，社会主义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零售额，已占内蒙古地区商品零售总额的24.8%，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商业对市场的领导。由于商业工作的开展，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自治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自治运动

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内蒙古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缺医少药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牧区，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各种疾病的流行得不到有效的遏止，每年都有大批人在一般常见病中丧生。鼠疫、天花、霍乱等恶性传染性疾病不时地侵袭着草原，每一次流行都吞噬着数以万计的生命。日本投降后，内蒙古东部地区鼠疫蔓延，致使兴安盟、哲里木盟的许多地方流行人间鼠疫并在后来的几年中一再复发。1947 年，鼠疫患者多达 3 万余人，其中 2.5 万人不治死亡。性病危害严重，一些地方的发病率竟高达 80%。据 1949 年对陈巴尔虎旗的调查，1945 年——1949 年，由于性病的残害，每年平均死亡 43 人。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得不到保障，婴幼儿，特别是新生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苏尼特右旗的调查，1945 年全旗只养活了 15 个婴孩。作为蒙古民族文化遗产的蒙古医药学长期得不到整理和发展，群众求医无门，只能求助于喇嘛的经文咒语。疾病摧残着人民的健康，严重地影响着蒙古民族的延续和发展。

内蒙古自治政府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首先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群众性的防治鼠疫运动，提出了“扑灭鼠疫，抢救生命”的号召，把防疫工作同军事斗争、生产并列为自治政府的三大中心任务。在各友邻解放区的支援下，各疫区都建立了防疫指挥部和防治所。1948 年，为 45 万人免费进行了防疫注射；组织群众捕鼠，消除隐患；1949 年在鼠疫多发区捕鼠 970 余万只。经过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逐步控制和减轻了鼠疫的蔓延和危害。1949 年比 1947 年鼠疫发病人数减

少了98.7%，死亡人数也只占发病人数的1.2%。为扭转内蒙古地区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状况，自治政府对医疗卫生工作作出了长远的规划，在许多旗县都设立了卫生院，由各族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卫生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村牧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开办医务训练班，在群众中普及卫生知识。1947——1948年两年间，共培训出医务工作人员700多人，派往农村牧区为群众服务。不久又展开了大规模防治性病的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各族人民开始摆脱恶性传染性疾病的戕害，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新气象。

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民族文化遭受了极大的摧残，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的状态。民族教育事业在困境中挣扎而无法求得发展。据统计，1946年内蒙古地区有小学1627所，学生13.7万人，其中蒙古族只有1万多人；中学22所，学生4000多人，其中蒙古族仅400余人。没有高等学校，甚至连一所正规的中等专业学校也没有，85%以上的劳动人民是文盲。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学校教育向工、农、牧劳动人民开门”、“学校教育为少数民族开门”的方针，着手整顿了学校教育，鼓励劳动人民子女和少数民族子女学习，并采取发放助学金的办法帮助他们克服经济困难，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得到了求学的机会。1949年全区小学比1946年增加了289.7%，中学增加了72.7%，学生总数比1946年增加了150.1%，少数民族子女的入学率大大提高。为迅速改变广大群众文化落后的状况，自治政府大力倡导了社会教育，各地积极组织开办了“冬学”，利用农闲时节为农民进行“扫盲”和生产、生活知识的普及教育。1948年，有30多万农牧民参加了“冬学”活动。

内蒙古自治政府对蒙古族文艺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重视。1946

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民的文艺团体——内蒙古文艺工作团。该团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走向广大的农村牧区，以蒙古族多彩多姿的艺术形式，热情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发动群众进行解放战争，投身社会改革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48年，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为文工团制定了“执行党的新文艺政策，推广新文化运动；培养新文艺干部；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创造民族新文艺”的工作任务和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一批新的文艺工作者成长起来，各部队、各盟都建立了文艺工作团，不仅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又为发掘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后，陆续创办发行了《内蒙古周报》、《东蒙新报》、《自由》、《呼伦贝尔新报》、《内蒙自治报》等报刊。1948年1月1日，创办了《内蒙古日报》，对于推进内蒙古解放区的各项经济文化事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仅1949年，《内蒙古日报》蒙汉文版的总印数就达300多万份。从1947年开始，蒙古族中小学用蒙古文教材，到1949年已出版了各种蒙文课本200多万册，保证了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

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到全国解放这一短暂时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使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内蒙古的经济文化事业从萎缩和停滞的状态中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虽然社会改革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蒙古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尚处在恢复阶段，但是为即将到来的全面的改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节　内蒙古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内蒙古骑兵在战斗中成长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根据《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的规定，对所属各部队进行了教育、整顿。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力量，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各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整训工作虽历时不久，但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参加东北解放战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北民主联军继取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后，为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收缩战线，彻底扭转东北解放区被敌军分割、包围的不利局面，自 1947 年 5 月至 1948 年 3 月，连续发动了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1、2、5 师、第 6 支队奉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命令奔赴辽北、辽西战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5 月 23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2 师配合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部队在哲里木盟以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一举攻克了通辽，并对逃敌进行追击。27 日，将敌辽北骑兵第 18 团大部围歼于哈拉乌素庙一带，生俘敌师长田久安。通辽解放后，骑兵 2 师对流窜在哲盟地区的小股敌军和土匪武装进行清剿，缴获了大批马匹、物资及武器弹药。6 月 8 日，2 师与辽北 1 分区部队协同作战，击溃国民党新编骑兵第 1 军包善一部。至此，哲里木盟

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6月5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和第6支队开赴前线。6月30日，1师与民主联军辽北第1分区部队在康平组成蒙汉联军司令部，以赵东环为司令员，都固尔扎布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所属各部队，担负肃清辽河以北国民党军队及土匪武装的作战任务。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守敌发起强攻，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军第1师王华兴部前往增援，途中因被蒙汉联军阻截而遭重创；7月4日，蒙汉联军又在法库县重创国民党新编骑兵第1军包善一部。在夏季攻势作战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5师和第6支队南下作战十余次，肃清了康平、法库、彰武外围的敌军，取得了毙敌151名、俘敌629名、击落敌机一架的战果。

9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参加了破袭北宁路的战斗，先后三次深入敌占区腹地，破坏铁道、炸毁桥梁，使敌军重要的交通补给线——北宁铁路完全陷于瘫痪。10月12日，骑兵1师配属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参加了攻打大虎山的战斗，有力地牵制了东进的敌军。至1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部队配合主力攻克了彰武、法库、新立屯、黑山、阜新和新丘等城镇。

在冬季攻势作战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等参战部队奉命在法库县一带执行堵截逃敌，监视彰武、新立屯之敌的战斗任务。同时对出城抢粮的敌军进行追歼，配合主力部队对困守孤城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全面封锁。11月，骑兵1师连续作战，扫清了活动在东辽河流域的土匪武装。11月29日，1师和辽北第1军分区部队向通江口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新6军第22师突击大队200余人，生擒敌突击队长李志民。1947年12月至

1948年2月，骑兵1师挺进辽南奔袭作战，先后解放了台安、盘山、辽中三县，有力地支援了友邻部队。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1、16师在辽阔的察哈尔、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进行了频繁、艰苦的骑兵游击战斗，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越战越勇，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察、锡根据地的任务。1947年7月，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中共巴乌察锡工委及11、16师巩固察、锡根据地，迅速肃清叛匪，发动牧民恢复各旗及苏木工作。[①]

根据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及冀热察军区的指示，为集中力量尽快消灭察、锡地区的叛匪武装，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于1947年秋成立了察北蒙汉联军司令部北线指挥所，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师师长乌力吉敖其尔任总指挥，察北7分区副政委苏克勤任政委，察北7分区副司令员吴广义任副总指挥，刘景平任政治部主任。北线指挥所统一领导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16师及察北地区的地方武装，受察北蒙汉联军司令部及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双重领导。[②]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16师从1947年4月到11月，打退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部11兵团三次大规模的步骑炮联合兵种的重点进攻和"毁灭扫荡"；先后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上百次战斗，消灭或击溃太仆寺右旗的丹巴部，多伦喇嘛印务处的何文瑞部，苏尼特左旗的仲乃部，布里亚特旗的额仁钦

---

① 内蒙古党委会：《内蒙古党委半年至八个月工作意见（1947.7—1948.2）》，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1—25—1。

② 《察北北线工作汇报》（1948年），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10—2—194；另见乌力吉敖其尔：《回忆内蒙古民主民族革命始末》，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第006卷。

部，镶黄旗的穆克登宝部以及西乌珠穆沁旗的胡图凌嘎部等叛匪武装。1948 年 1 月 26 日至 29 日，察北蒙汉联军北线指挥所总指挥乌力吉敖其尔亲自指挥 11 师及 16 师 5 团，长途奔袭，在苏尼特右旗陶高图庙一举歼灭该旗叛匪及国民党拼凑的锡林郭勒盟政府，活捉国民党锡林郭勒盟党部书记长那顺巴雅尔等。[①] 陶高图庙战斗之后，察、锡地区的叛匪武装基本被肃清，根据地得到巩固，迫使一些散匪逃窜于乌兰察布盟一带。国民党拼凑的察哈尔盟旗第一区保安司令部穆克登宝部及蒙边剿匪第一路军司令部胡图凌嘎部等亦龟缩于宝昌、康保、多伦一带，或向太仆寺、明安、正白等旗进行骚扰，靠国民党的补给苟延残喘。

1947 年 11 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正式成立。1948 年 1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下辖骑兵第 1、2、3、4、11、16 师，卓盟纵队，警卫团，独立 3 团，独立 5 团等部，共约 2 万余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所属各部队中广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在思想、作风、斗志、历史等方面深入进行整顿、清理，加速了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军内外更加团结一致，广大指战员士气旺盛，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同时各部队在侦察、阻击、包围等项目上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参加东北、华北战场的战略决战。

1948 年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2 师开赴彰武以南地区，执行封锁沈阳、新民之敌及清剿辽西地区土匪武装的战斗任

---

① 乌力吉敖其尔：《回忆内蒙古民主民族革命始末》；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 250 页。

务。4 月，2 师配合兄弟部队与装备精良的敌军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消灭了近千名试图逃出封锁线的敌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8 月 8 日，骑兵第 1 师到达新民城下接替 2 师任务，并打击抢粮敌军，保护群众秋收。9 月 10 日，参加围困长春之敌的骑兵 1 师 3 团与嫩江军区、辽北第 2 军分区等部队并肩作战，一举全歼了由长春窜出的国民党保安旅。

1948 年 9 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1 师奉命配属东北野战军第 10 纵队，转战北宁路和饶阳河两岸，执行战役侦察、运动防御任务，阻击由沈阳、新民西进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 月 13 日，骑 1 师将突入我军防区的敌骑兵旅一部击溃，支援了主力部队攻击锦州的作战行动。10 月 15 日，锦州解放。骑 1 师连夜向台安、盘山、沟帮子一带奔袭，阻截由锦州出逃的残敌，19 日，骑 1 师在大虎山、黑山一线布防，掩护东北解放军第 10 纵队前沿阵地，阻断企图由锦州东逃的敌军退路。10 月 22 日至 24 日，敌大批精锐部队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援助下，向胡家窝铺、清水泡子两地骑兵第 1 师阵地发动猛烈攻击，面对兵力超出我军数倍的强敌，各族指战员相互激励、顽强战斗，击退敌多次冲锋。并且发挥骑兵勇猛、迅速的优势，不失时机地向敌阵发起突袭，遏止了敌军的攻势。在激战中，1 团 2 连连长布和吉雅、2 团 3 连连长拉木扎布、指导员敖敦满都拉等近百名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内蒙古骑兵部队在黑山、大虎山的浴血拼杀，为保障兄弟部队阵地侧翼的安全，为东北野战军在辽西包围、全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的战斗赢得了时间。10 月 27 日，骑兵 1 师奉命直赴黄花甸子追歼残敌；在完成追歼任务后，由辽南北上，于 11 月 12 日抵达彰武，追歼由辽西战场窜入内蒙古解放区的苏和巴特尔匪部。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2师于9月初奉命开赴长春外围，在大黑林子镇、范家屯等地布防，执行堵截突围敌军的任务。长春解放后，第2师向沈阳方面迅速挺进，与兄弟部队一道，对辽河北岸的逃敌展开合围。10月30日，第2师在阿其堡全歼敌196师运输团一个营，毙俘敌1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辎重。11月2日，沈阳解放。第2师返回哲里木盟。

1948年9月至11月，为配合我军在东北发动的辽沈战役、牵制傅作义部队出关，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和第3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发动了察绥战役。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1师、16师亦奉命参加了这次战役。9月上旬，11师、16师奉命进至察北地区，与察北骑兵旅配合攻打平定堡守敌；在康保——宝源公路上截击敌人的汽车，引诱高山堡守敌出城，俘虏敌步兵800余；击溃国民党安恩达骑兵旅。接着，16师进至尚义县南壕堑一带，配合3兵团在绥远地区的作战，侧击从张家口西援绥远的敌主力部队。

11月，为适应我军战略大反攻的形势和解放内蒙古西部盟旗的需要，成立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统一领导11师和16师，乌力吉敖其尔任司令员，吴广义任副司令员，苏克勤任副政委。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所属之11、16师参加了著名的平津战役。这期间，11师、16师配合察北骑兵部队，先后解放了敌人占据的张北、宝昌、商都、化德等察北8个县，出色地完成了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张家口的任务。我军围攻张家口之际，11师在张北一带切断了张北至张家口的公路，担任堵截从张家口西逃之敌的任务，并在大猴山公路附近阻击了增援张家口守敌的骑兵12旅；在七里河

一带追歼敌人150余人，生俘国民党暂4军副师长慕介夫。

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在新保安全歼傅作义部35军16000余人；24日，收复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歼敌54000余人。这样，华北地区傅作义部队困守北平、天津等少数城镇。我军主力收复张家口之后，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1师又追歼从城内突围西逃之敌，在涕波起山经两小时激战，毙伤俘敌260多人。接着，又西进清剿国民党逃窜之残匪，毙俘大批敌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16师于11月中旬奉内蒙古军区命令，回师察锡草原，在截击从东北逃窜而来的苏和巴特尔匪部的途中击溃胡图凌嘎、温盖等残部，夺回被敌赶走的成千头只牛羊。接着，在正蓝旗巴格来一带击溃苏和巴特尔部，迫使该敌不敢在锡察立足向西逃窜。12月下旬，16师回师向南，一举解放宝昌；又于28日在四台房村歼灭国民党逃兵60余人，俘获100多人。

1949年2月初，内蒙古人民解放军11师、16师根据中央军委和内蒙古军区的命令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由锡察军区副司令吴广义、副政委苏克勤指挥，进军绥远。为了集中力量打击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缩小其占领区域，形成我军从东、北两面对其包围的态势，由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指挥，决定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所属骑兵11师、16师、察哈尔省军区骑兵旅和第8纵队骑兵旅共同发动绥北战役。为保证战役计划的顺利实现，根据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命令，由上述三大骑兵部队主要军政领导干部“组成了临时的蒙汉联军前线党委会及前线指挥部”，[①] 由第8纵队骑兵旅旅长康健民任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察

---

① 《蒙汉联军前线党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1949年2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241·1。

哈尔省骑兵旅政委梁中正任指挥部政委，锡察军区副司令员吴广义任指挥部副司令员，锡察军区副政委苏克勤任指挥部副政委。前线党委和指挥部的任务是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骑兵部队，“配合主力作战，解放绥远全境，随时准备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① 1949年2月12日至27日，内蒙古军区骑兵11师、16师配合察哈尔骑兵旅及第8纵队骑兵旅，在蒙汉联军前线党委及前线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参加了绥北战役，围歼从张家口逃到武川、乌兰花一带的国民党骑兵部队。其间，经过四次战斗，歼俘敌军900余，给敌人以较沉重的打击，并由此促进了敌人内部的分化，对归绥、包头守敌形成了半包围态势，为绥远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5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王再天、那钦双和尔任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将所属部队统一编为骑兵1、2、3、4、5师和一个直属警卫团。内蒙古骑兵在对敌斗争的战火中成长壮大，为解放内蒙古，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绥蒙解放区的恢复与发展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绥蒙区党委、绥蒙政府和绥蒙军区部队撤到雁北，在短暂的休整中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随时准备回师绥蒙。绥蒙军区骑兵旅在1946年10月和12月两次北上绥蒙敌占区，纵横驰骋，摧毁国民党部分基层政权，以牵制这

---

① 《蒙汉联军前线党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1949年2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241·1。

里的国民党军队向雁北根据地的进攻。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绥蒙军区也组织了前方指挥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并陆续投入反攻战斗。从1947年7月到1948年7月，在雁北、河西、绥南、绥东、应县、平保等地配合晋绥、晋察冀部队先后作战20余次，恢复了绥东、绥南部分解放区。1947年9月8日至10月25日，绥蒙区党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部署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并开始在雁北及绥南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在雁北和绥南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同整个晋绥解放区土改一样，一度出现了“左”倾错误。但是在党中央和晋绥分局的领导下得到了及时的纠正，于1948年6月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在雁北和绥南有80%的农民参加了土改，大约有3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培养了8000多名农民积极分子，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为开展绥蒙解放战争创造了后方基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8年8月，为了配合东北的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华北野战军第2、第3兵团，并由第2、第3兵团联合发动第二次察绥战役，把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牵制在平绥路一线，阻止其出关增援东北。8月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部署了组织第二次察绥战役的任务，决定由第3兵团统一指挥晋绥第8纵队，内蒙古骑兵第11师、16师以及晋西北地区的地方部队，进军绥远。并对第3兵团进军绥远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形成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同时，党中央和军委任命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为第3兵团政委，李天焕为副政委。

8月9日，聂荣臻、杨成武在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易县远台村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动员进军绥远。聂荣臻司令员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进军绥远的指示，对华北战场敌我态势和进军绥远的战略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部队提出了要求。杨成武分析了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部署了具体作战任务。会后，第3兵团所属第1、第2、第6纵队立即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8月21日，第3兵团各部分别从易县、涞源、满城等地出发，于9月上旬到达预定的朔县、代县、山阴等地集结。

9月初，为配合第3兵团进军绥远作战，绥蒙军区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以11旅为主干升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8纵队，姚喆任纵队司令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绥蒙军区所属部队除11旅外，还将骑兵旅及新编成的14旅拨归第8纵队建制，并由第3兵团司令部统一指挥。①

9月12日，第3兵团前委在朔县米西马庄召开了绥蒙区党政军及第8纵队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杨成武司令员传达了毛主席和军委关于察绥战役的指示，进一步研究部署了战役计划；确定了“就地取给”的方针，制定了征借粮食、建立乡村政权及地方武装等政策；李井泉领导由绥蒙区党、政、军干部组成的随军工作团，负责发动群众，就地取给，支援战役等工作。会后，第3兵团的三个纵队及第8纵队分别在驻地进行实弹、攻城、夜战及作战指挥等训练，并在部队进行形势教育和诉苦活动，确立必胜的信心和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勇于打向敌占区的思想。鉴

---

① 《野战第八纵队九十两月工作报告》(1948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99·11。

于绥远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并有回、满等少数民族的特点，兵团司令部特别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并印发有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蒙古族、回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事项的材料在部队中组织学习，以便实行。[①]

绥蒙区党委向所属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军队进入绥远后党政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政策的指示》，[②] 其中粮食政策规定：向地主征借其总产量的35%，富农30%，一般农户20%，佃农，雇农及赤贫户免征；经营农业的蒙民比汉人少征借10%，对经营牧业的蒙民免征。对于干部除已经分配者之外，其余均采用工作团方式随军行动，临时分配，就地发动群众，征借粮食，组织担架，建立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安定后方秩序；对于乡村旧政权的保甲人员一般暂时留用，在监督之下进行支前工作；要求在可控制地区迅速建立武装，平绥路以南四个县在原游击队基础上建立四个支队。这些政策和措施在战役过程中有力地保证了支前工作的顺利进行。

9月上旬，为了掩护第3兵团的行动，第2兵团在平汉路南段及平北山区积极活动，吸引华北敌人的注意力。9月21日，第3兵团所属各部队、8纵队及随军工作团分别从雁北驻地出发，迅速向绥远进军。8纵队及1纵队第2旅向集宁进军，于24日分别解放了丰镇和隆盛庄；26日，8纵队11、14旅及1纵队2旅经过一天激战攻占集宁；与此同时，第3兵团主力2、6纵

---

① 绥蒙区党委：《关于绥远新区工作中几项政策草案》（1948年8月14日），《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卷，第439－454页。

② 绥蒙区党委：《关于军队进入绥远后党政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政策的指示》（1948年10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115·28。

队和1纵队一部相继解放了凉城、和林、清水河、卓资山等县城，完全控制了丰镇至白塔间的铁路线。之后，又夺取了察素齐、毕克齐等地，于27日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并决定30日开始总攻，夺取归绥市。

傅作义发觉解放军西进绥远之后，急忙从北平、张家口等地抽调35军、暂4军及新编骑兵第4师等步骑兵10个师沿平绥路两侧昼夜西进援绥。29日，其先头部队到达集宁以东之马莲滩、玫瑰营子一带。为此，中央军委电令第3兵团停止攻打归绥，截击援绥之敌。30日，8纵队撤出集宁，转移到官村西南一线，掩护主力部队集结。第3兵团在集宁、天成村一线与援绥敌军形成对峙，东线第2兵团和冀热察军区部队以及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11、16师为策应3兵团行动，对平承铁路和平绥路东段展开猛烈进攻，一周之内先后攻克察北之崇礼、尚义、沽源、商都县和宣化以东之赵川堡；在北平与宣化之间切断平绥路数处，直接威胁张家口。傅作义深感平、张告急，被迫放弃援绥计划，命令部队火速回援张家口。10月5日，援绥部队掉头东返，解放军乘势收复了集宁、兴和等地。

10月11日，第3兵团在丰镇附近召开了进入绥远后的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总结前一段战况，部署下一阶段的行动，决定留一部分主力部队在集宁、兴和地区掩护开辟地方工作，巩固绥东已解放的地区，并向东警戒；第3兵团第1、2、6纵队和8纵队一部向绥北、绥西进军，首先攻占陶林、武川、乌兰花、毕克齐、察素齐、磴口等城镇及周围广大地区，乘胜夺取包头，孤立归绥守敌，最后攻占归绥市。

10月14日，西进各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分别向绥北、绥西挺进。8纵队11旅及骑兵旅组成西进右纵队，于16日攻克陶

林；骑兵旅于20日进占乌兰花；11旅及纵队直属部队于23日占领武川县城；3兵团主力迅速包围归绥，逐步逼近寇家营、百什户、昭君坟一带，迫使敌军收缩到归绥市区。第3兵团2纵队迅速向归绥以西进军，萨拉齐守敌不战而逃，退入包头。22日，2纵队进至包头以东磴口，沙尔沁一线，逐步逼近包头市。驻守包头的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紧急召集团以上军官商讨应急措施，并急电请示傅作义。傅作义电示邓宝珊酌情而定。邓宝珊遂于22日深夜带领国民党驻包头部队和各机关要员弃城西逃。23日，解放军进入包头市。为防敌军反扑和窜扰，中央军委决定对包头实行军事管制，任命2纵队政委李志民为军管会主任，绥蒙政府主席杨植霖为政治委员。[①] 24日，由2纵队及第6旅机关大部人员和绥蒙地方干部组成的包头军管会成立并入城办公，同时还成立了包头卫戍司令部，负责维持市内秩序。26日，8纵队骑兵旅解放固阳县城；29日，8纵队11旅赴包头接受城防任务，维持市内治安；30日，2纵队主力向西追击自包头西窜之敌，解放了公庙镇和安北县城。归绥守敌完全陷于孤立境地。

解放包头以后，军管会迅速接管了铁路、电灯、自来水等重要公营企业，并照常营业。市内广播电台于24日照常播音；由军管会主持召开了15000多人参加的市民祝捷大会，召开了全市临时市民代表会，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在蒙古族上层人士中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军管会还将在包头缴获的乌兰察布盟东公旗政府的49000多斤小麦、

① 杨植霖：《青山足迹——杨植霖回忆录》，第18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00多斤荞麦、160多斤白面，如数归还。[①] 住在包头的伊盟达拉特旗札萨克康达道尔计，于解放军进入包头的第二天派人带着起义文书到卫戍司令部，宣布起义，命令其部队不准与解放军作战，保持中立，暗中配合。包头市军管会对康王的这种明智态度表示欢迎，立即退还收缴康王府的武器弹药。军管会负责人还前去看望康王，并派医生为康王治病。准格尔旗保安师师长兼旗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奇致中于11月5日在其驻地黄河南岸的大树湾率领1935名官兵起义，并亲往包头谒见解放军首长。[②] 还发表了《脱离国民党军，投奔解放军的宣言》，宣言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是弱小民族的救星，早为我们蒙人所深晓。权衡形势，今日实乃我蒙族彻底解放及致中等再生之千载良机。于是服从众意，决心率部起义。"[③] 后来，解放军主动放弃包头东撤，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部队再次被国民党绥远当局所控制，奇致中被绥远省保安司令部扣押。

10月30日，中共包头市委和包头市政府成立，潘纪文任书记，李维中任市长。11月4日，包头军管会撤销，包头市的各项行政工作均由市政府接管。[④] 2纵队主力撤离包头，执行攻打归绥的战斗任务。包头、固阳、萨拉齐、察素齐等地的防卫任务由8纵队担负。我军占领包头期间，入城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的城市政策，受到包头市各族各界人民

---

① 《包头市粮食工作总结》（1948年12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339·1。

② 《伊盟准格尔旗保安师长奇致中率部起义》，1948年11月16日《内蒙古日报》。

③ 《奇致中等宣言》，1948年11月16日《内蒙古日报》。

④ 《包头市军管期间物资处理部财政问题各项表册》（1948年12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339·2。

的普遍称赞。11 月底我军撤出包头时，有 200 多名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基层政权工作人员自愿参加了革命。

11 月 5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打归绥的部署给杨成武等同志的指示》，命令杨成武、李井泉等“应争取 10 天左右攻克归绥。”[①] 第 3 兵团主力再次集结于归绥周围，准备夺取归绥市。11 月 7 日，杨成武、李井泉、李志民向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攻击归绥计划的请示电》，[②] 报告了敌情和我军部署计划，拟于 11 月 16 日 15 时发起总攻，先占领旧城与车站，再解决新城之敌。11 月 8 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计划。第 3 兵团司令部在部署攻城战斗方案的同时发布了攻城动员令。中共归绥县委与县政府在绥蒙区党委及政府的领导下，协同随军工作团，在归绥市周围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区、乡政权，为部队征集粮草，支援即将开始的攻城战斗。在归绥西郊成立了临时工委，统一指挥支前工作；归绥东郊则由随军工作团协助县委发动群众，制做担架，修筑工事，征集车辆，准备粮草，全力为攻城战斗做准备。绥蒙区党委和政府还研究确定了中共归绥市委、市政府组成人员。

11 月 9 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为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部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彻底歼灭该敌，决定停止攻打归绥，命令第 3 兵团东进，协同即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进行平津决战。第 3 兵团遂于 14、15 日撤围归绥，向张家口挺进。第 8 纵队和绥蒙军区部队担任保卫绥蒙解放区的任务。11 月底，8 纵队主力撤出包头、萨

---

① 《关于攻打归绥的部署给杨成武等同志的指示》（1948 年 11 月 5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349。

② 《关于攻击归绥计划的请示》（1948 年 11 月 7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358。

拉齐等地，经托克托县、和林县到卓资山、集宁、丰镇一带集结，一面向归绥方向警戒，一面进行休整。第二次察绥战役遂告结束。在这次近 40 天的察绥战役中，解放军“解放县城 11 座，歼敌近万人”，[①] 达到了牵制傅作义部出关的战略目标。

第二次察绥战役结束后，绥蒙解放区辖丰镇、集宁、陶林、兴和、凉城、龙胜 6 个完整县，和林、武东（新划设）、清水河、归绥 4 个不完整县以及正红、正黄、镶红、镶蓝 4 个旗，“人口共 70 余万”。[②] 中共绥蒙区党委及绥蒙政府在解放区进行锄奸剿匪，减租减息，调济土地，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抗灾救灾，发放农贷，发展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各项社会改革工作。根据绥蒙区党委的决定，《绥蒙日报》于 1949 年 5 月 15 日在丰镇正式复刊。

与此同时，绥蒙区党委和政府对新解放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及教育等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为进一步进行社会改革取得了较可靠的资料。尤其对这一地区的蒙古族土地关系、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以及减租减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确定绥蒙解放区蒙古民族工作总方针，即“团结蒙古民族各阶层，继续深入贯彻广泛的反蒋美统一战线，发动广大蒙民群众，实行民主自治运动。”[③] 1949 年 3 月 15 日，在集宁成立了绥蒙政府绥东四旗蒙旗办事处

---

① 绥蒙区党委：《紧急指示》（1948 年 11 月 13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3—1—115·2。

② 绥蒙区政府：《三、四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1949 年 4 月 30 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58。

③ 《绥远省蒙民回民人口调查及绥东四旗人口牲畜土地统计表》（1949 年 4 月—10 月），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74。

及蒙旗保安队队部，作为统一领导蒙古工作和指挥各旗武装的机构；召开了绥东四旗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改造了旗、苏木政权，团结和教育了广大蒙古人民。此外，培训了150余名蒙古青年干部，为开展蒙古民族工作增加了新的力量。在负担方面，照顾蒙古族农民的特殊情况，一般的比汉族农民减轻10%；在减租方面，除了大地主同汉人地主一样对待外，中小地主酌情少减或不减。在牧业方面，采取“保护牧群、牧场，不分散、不负担”①的方针，并且进行兽防工作，给23228头（只）牲畜注射了防疫针，降低了牲畜死亡率。通过以上方针、政策的实施，蒙民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8月，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了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工作委员会，任命李森为主任。②

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战略决策之后，为适应和平解放绥远的新形势和逐渐统一行政建制，决定从1949年4月1日起把绥蒙区由晋绥划归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领导。6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又决定“绥蒙区自即日起改称绥远省，绥蒙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③任命杨植霖为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8纵队于2月底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军；5月29日，绥蒙军区与第8军合并，成立绥远省军区，任命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王长江为副司令员，杨叶澎为第二副司令，刘华香为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

---

① 《绥东解放区一年来的工作报告》（1945年12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58。

② 《绥远省人民政府通令》（1949年8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67。

③ 《华北人民政府令》（1949年6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45。

任。[①] 中共绥远省委和省政府设在丰镇，省军区驻集宁。绥远省党、政、军三套组织机构积极工作，为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准备。

自从1948年秋解放军发动察绥战役以来，绥蒙解放区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并对绥远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半包围的态势，成为促使国民党绥远军政当局走向和平解放道路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内蒙古地区的剿匪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匪患十分严重。反动地方封建势力及日伪残余与惯匪相勾结，窜扰于解放区腹地，充当了国民党进犯我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仅给各族人民造成了长期的祸患，也成为人民革命斗争的严重障碍。因此，清除匪患、安定解放区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始终是我党我军面临的重大任务。

抗战结束后，内蒙古各盟旗大都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部分惯匪和反动地主利用日伪军溃退时散落的枪械乘机纠集匪众，称霸一方。当时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土匪武装竟多达数十股。土匪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破坏进步的民族运动。一些大股土匪武装已不满足于一般的劫掠行径，而着力扩充实力以待国民党的收编。

国民党为了加速其“接收”内蒙古地区的进程，将土匪视为可利用的军事力量，相继在长春、沈阳等地设立了“招抚办事处”，派遣人员对各地股匪进行招纳、收编，以各种名目拼凑匪

---

① 《绥远军区司令部通令》（1949年5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档案，2—1—107。

军，委任了众多的“司令”、“队长”。在兴安盟地区有马海泉、宋桐山等为首的“光复军”、“挺进军”；在呼伦贝尔地区有袁师古、李桂萱为首的“先遣军”；在哲里木盟有包善一的“保安队”；在1945年12月8日，以谢万厉、张绪武为首的反动势力勾结土匪，在通辽发动暴乱，于17日惨杀了中共辽北省委派到通辽开展工作的县长徐永清等干部、战士29人。昭乌达盟、卓索图盟有张念祖、张桐轩等股匪。这些拥众较多的土匪武装被国民党收编后行动上更加有恃无恐，与小股土匪相呼应，争相攻城略地，阻断交通，窜犯于内蒙古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中间地带，给各族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严重地妨害着我党我军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

八路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后，即与蒙古民族武装一道对各地的土匪进行了大力清剿。对愿放下武器，改恶从善的匪徒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国民党支持的顽匪则坚决予以剿除。1945年11月，八路军嫩江军区第1支队配合兴安盟王爷庙民警大队消灭了号为“快马神枪”、横行王爷庙地区的惯匪阎振山及其匪众。[①] 至1946年上半年，八路军和蒙古民族武装并肩作战，在白城子、洮北、突泉、科尔沁右翼前旗和呼伦贝尔南部地区先后消灭了“草上飞”、“钢子”、“江边好”等多股土匪，击溃了马海泉、宋桐山匪部，收缴了大批枪支，初步稳定了局面。[②] 1946年1月，新四军第3师开赴哲里木盟，将包善一匪部逐出了通辽地区。3师还与东蒙古自治军第2师配合行动，围歼了“金龙”、

---

① 《兴安党史文集》第2辑，第175页，中共兴安盟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3年。

② 同上。

“阎王”、“野狼”等股匪，击溃张念祖匪部。[①]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加剧，内蒙古地区的匪患也愈加猖獗起来。国民党向各地土匪提供武器装备，使其充当进犯解放区的辅助力量。1946 年 6 月内战爆发后，土匪出身的李守信由蒋介石亲自派遣，在昭乌达、卓索图盟网罗旧部，组成“热辽边区自卫军”；国民党辽蒙党部也招纳部分逃亡的地主和流散土匪，建立了“东北蒙旗自卫军”；驻锦州的国民党东北行辕“蒙旗联防指挥部”频频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煽动、策划暴乱。在国民党的扶持下，各地土匪在解放区大肆骚扰、袭击地方人民政权，残杀干部、群众，对根据地造成了极大危害。1946 年 8 月，哲里木盟叛匪苏和巴特尔配合国民党第 71 军，发动了对哲里木盟解放区的进攻；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的穆克登宝、何文瑞、嘎希等大股叛匪配合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向察哈尔盟南部解放区多次进犯。9 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由张家口撤往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以额仁钦为首的反动势力勾结昭乌达、卓索图盟的股匪发动暴乱，在锡、察解放区疯狂窜扰，仅 9、10 月间就残杀我地方干部及无辜群众近百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包玉琨也遭该匪杀害。匪首额仁钦参与国民党组织的伪锡盟政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被任命为“察哈尔省蒙边剿匪一路军”少将司令。

为保障锡察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中共察锡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指挥部于 11 月调集两个骑兵连对额仁钦匪帮进行了追剿，将其逐出了锡察根据地。1947 年 5 月，该匪又由多伦窜往昭乌达盟，与白金辉、韩桑杰等股匪结伙为害。6 月 12

---

① 《革命回忆录》第 1 集，第 141 页，中共哲里木盟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6 年。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16师协同冀热辽军区蒙汉联军，将该匪合围在察哈尔盟南部正蓝旗境内，经激烈战斗，除匪首额仁钦及部分匪徒在国民党军队的接应下脱逃外，大部分匪徒及家属被缴械、俘虏，并在战斗结束后送往呼伦贝尔盟予以安置。

1947年1月6日，察哈尔盟代理盟长关起义率武工队在哈巴嘎区奇门地沟开展工作时，突遭大股土匪袭击。关起义等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壮烈牺牲。6月6日，著名革命音乐家、中共开鲁县委宣传部长兼组织部长麦新在执行任务的途中与土匪遭遇，不幸牺牲。

1947年1月，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指挥下，塔尔巴、韩桑杰、白金辉等大股土匪集结近2000人，由三面向昭乌达盟东部重镇天山（阿鲁科尔沁旗）发动进攻，企图夺取战略要地，切断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盟纵队配合冀热辽军区独立团与进犯匪军展开激烈战斗，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取得了天山保卫战的胜利。

1947年5月，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作战，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各部队全线出击，相继收复了开鲁、通辽、赤峰，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地区再次获得解放。曾在解放区后方猖獗一时的股匪纷纷溃散，“热辽边区自卫军”、“东北蒙旗自卫军”等土匪武装也相继被歼灭、击溃。6月12日，中共东北局发出剿匪指令：“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反复搜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匪患。”[①] 7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2师奉调开赴东北战场，其他各部队继续开展剿匪斗争。在剿匪斗争中，我军贯彻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的方针，发动

① 《兴安党史文集》第2辑，第176页。

群众分化土匪武装，并在旗县间组织联合剿匪队，使土匪难以在解放区立足。在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大股土匪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匪徒被迫投降。内蒙古解放区的局势逐步趋于稳定。

1947 年夏、秋季，锡林郭勒、察哈尔盟的地方反动势力在匪首胡图凌嘎的策动下，乘内蒙古骑兵部队参加东北解放战争之机纠合股匪，发动叛乱。除胡图凌嘎匪帮外，还有达布苏、贡嘎、温都尔夫等股匪在锡察解放区为害。昭乌达盟的匪徒也与之相呼应，劫掠物资和牧民牲畜、财产，破坏交通运输，颠覆地方民主政权。至 1948 年 10 月，胡图凌嘎与额仁钦两股匪帮合流，与各股土匪时聚时散，形成了一股危害极大的反革命势力。10 月 25 日，察哈尔盟商化康联合县在张盖湾（今属锡盟正镶白旗）召开县区干部会议时，突然遭到于秀成、白金辉股匪 400 余人的袭击。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治华为掩护干部、群众安全撤离而陷入重围，壮烈牺牲。同年 12 月 8 日，中共察哈尔盟工委代理书记肖诚、察哈尔盟盟长苏剑啸等 20 余名干部、战士，在由锡盟贝子庙返回察哈尔盟途中与胡图凌嘎匪帮 200 余人遭遇。蒙汉各族干部、战士在腹背受敌的险境中与敌展开顽强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肖诚、苏剑啸、牛润清、朱玉珊等 18 人不幸殉难。

辽沈战役结束后，部分由东北战场出逃的国民党骑兵窜入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有以苏和巴特尔为首的“蒙骑第一旅”残部及塔尔巴、吐喇嘛等纠集的溃兵。残匪在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民兵武装的打击下相继窜入锡林郭勒盟以逃避追剿，作垂死挣扎。

为彻底消灭流窜的土匪、残敌，内蒙古自治政府于 1948 年 12 月 14 日向全区发布公告，重申了政策，即：对能够主动投降的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予以宽大处理；对继续为害者则予以严

惩。自治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公安机关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全力剿匪。《内蒙古日报》也以《加强锄奸剿匪，巩固后方治安》为题发表社论，号召内蒙古各族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民兵建设，肃清一切散匪。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锡盟贝子庙成立了以王再天为总指挥、奎璧为政委、包明德为参谋长的临时剿匪指挥部。同时调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第10师及军区警卫团，分别开赴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盟，展开大规模剿匪斗争。中共冀热辽分局也发出《关于限期肃清匪患的决定》，[①] 成立剿匪司令部，张苏任司令员，王逸伦为政委，集中力量堵截消灭昭乌达盟以及热北地区的各股土匪。制定了"深入匪巢，连续围剿，奔袭合击"、"不分地界，不让喘息"、"分化瓦解，剿抚兼施"的剿匪方针。

经各支部队的连续追剿，疲于奔命的苏和巴特尔匪部被迫逃往乌兰察布盟，与宝贵廷匪部汇合，投奔了绥远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5月，该匪又西逃阿拉善旗，追随德王，参与组织"西蒙自治政府"。全国解放后，匪首苏和巴特尔终究未能逃脱人民政府的严厉制裁。

在追剿凶残狡猾的胡图凌嘎匪帮的过程中，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顶风冒雪，连续追击、围歼，先后消灭温都尔夫、达瓦根登、贡扎布等股匪。1949年5月5日，各部队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北部包围并一举全歼了胡图凌嘎匪帮。经过近半年的艰苦作战，内蒙古各族军民终于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从而保障了内蒙古地区土地改革、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

① 中共昭乌达盟赤峰市委档案馆档案，案卷号15。

四、“绥远方式”与绥远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辽沈战役之后，又于1948年11月29日发动了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55万人被围困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的千余里战线上。根据中央军委“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东进，与第2兵团以及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一起向平绥铁路东段发动进攻，包围张家口、新保安，切断敌人西逃的通道；东北野战军主力插向平、津之间和津、塘之间，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切断敌人海运南逃的通道。到12月20日，在完成对敌军的战略包围和分割的同时，又于22日至24日全歼新保安和张家口之敌5400余人。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动进攻，第二天解放了天津，活捉了曾经屠杀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2、3兵团包围了北平。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①] 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和平解放北平的通电。由于受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的影响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所迫，加之我军耐心争取，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邓宝珊等爱国人士的促进，傅作义终于接受了和平解放的通电。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北平城内，2月3日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绥远国民党集团面对解放战争的这种形势，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解放军第8纵队适时地对绥远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一次有限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86—139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的军事进攻。1月28日，第8纵队从绥东向归绥东郊推进，占领了陶卜齐、榆林一带，对驻防古力板乌素之刘万春部111军发动攻势，迫使其龟缩至归绥市区。31日，中央军委命令停止进攻归绥，第8纵队遂于2月1日撤退到卓资山一线，绥远国民党军队收缩到归绥、包头、萨拉齐、托克托、固阳一带，再次形成敌我以卓资山为界对峙的局面。在伊克昭盟，伊盟支队从伊东伊西发动全面攻势，各旗上层及保安队纷纷脱离国民党的控制，主动接洽起义问题。唯从张家口败逃绥远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率数千人马，在绥北乌兰花、武川一带抢占地盘，扩充势力，建立据点，企图扭转败局。为了清除和平进程的障碍，2月12日至28日，第8纵队骑兵旅、察哈尔骑兵旅、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1师与16师，奉命发动了绥北战役，歼俘敌900余人，给孙部以沉重打击。绥远国民党军队已经处在东逃无路，西窜不得，南北受阻，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从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在解决天津、北平的解放问题时就已经酝酿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绥蒙政府也根据中央的精神，电告绥远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这也是绥远各族人民和国民党军队广大士兵及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绥远国民党当局的中上层人士中的大部分人也已看清了形势，不愿再打内战，希望和平。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就是主张和平解放绥远的代表人物。在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当天，董其武即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倾听傅作义的开导，思考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绥远地方上层人士张钦、阎肃及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积极倡导组织“绥远和平促进会”，要求绥远军政当局与人民解放军消除对立，“停止移运公有物资及其他有碍和平

措施，"[①] 还以绥远省参议会名义"建议省政府，遵照中央命令，释放政治犯。"[②] 董其武当即接受了这些建议，停止了征粮征兵，释放了关押在归绥的400余名政治犯。在绥远国民党统治区和平解放绥远的因素在增长。

1949年1月初，在第二次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傅作义打算将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作为一个整体同中国共产党搞联合，提出所谓"平、津、塘、绥一齐解放"[③] 的建议。1月9日，中央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④] 1月16日，聂荣臻向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周北峰转达了中央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即如果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能顺利完成，绥远的问题将采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绥远方式"，即"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

---

① 《绥远省和平促进会致省政府公函》(1949年2月12日)，《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一期。
② 《绥远省参议会致省政府公函》(1949年3月10日)，同上。
③ 杨平川、魏响：《绥远和平解放》，《内蒙古党史通讯》，1990年第一期。
④ 《中央军委复林彪、聂荣臻电》(1949年1月9日)，转引自《内蒙古党史通迅》，1990年第一期。

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①] 以后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解决绥远问题作过多次重要的指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绥远方式”的内容。

“绥远方式”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解决绥远问题的重大战略和重要的策略，而且对于全国的解放战争的发展和最后的胜利也具有重要意义。“绥远方式”的提出，向民主人士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气魄及和平建国的诚意，便于争取国民党集团中主张和平的军政人员向我党靠拢，以分化国民党集团，动摇其军心，削弱其抵抗力量，使人民避免战争涂炭和人民解放军减少战争损失。

为了尽快推进绥远和平解放，实施“绥远方式”，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立即到绥东卓资山，3 月 20 日召开绥蒙区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和具体部署，详尽地阐述了“绥远方式”的意义和方案，并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克服阻力，坚决实行。为了表达实施“绥远方式”的诚意，决定停止对绥远国民党部队的瓦解和策反活动，以友军相待；允许归绥、包头等地的群众自由与解放区往来、经商；将“前半年扩军任务从 15000 人减少到 6000 人”；[②] 工作重点转向剿匪减租、发展生产，以争取缓和双方的敌对情绪，促进绥远和平形势的发展。当然，也不能放松战斗的准备，还要揭露顽固派“借水养鱼”、伺机反扑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25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高克林：《绥远和平解放和起义部队的改造》，《中共党史资料》第 26 辑，第 183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年。

阴谋，打消其东山再起的幻想，促使其走和平道路。

但是，绥远真正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困难很大，阻力不小。绥远的国民党正规军有近7万人，还有一些组织庞杂、番号众多的地方游杂部队，主战与主和的两派势均力敌。因此董其武只好先从提高军政干部思想认识着手，克服困难，排除阻力，逐步实现和平起义。2、3月间，董其武在绥远省政府高级干部中间展开小型座谈讨论，逐步扩大其范围。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对国内及绥远复杂多变的政局，心中无数，开始时顾虑重重，大多数人不敢轻易表态。4月1日，傅作义在北平发表通电，声明政治立场。他在通电中痛切检讨了过去的错误立场，表示“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① 傅作义的通电对统一国民党绥远省军政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很大作用。

这时全国及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24日，解放太原；5月1日，大同敌军接受和平改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鼓舞了坚持走和平道路的绥远广大军民。国民党绥远军政干部讨论会也由小型到大型，由秘密到公开，人数由少到多，并且大多数人逐渐认定国民党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实现和平解放绥远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这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和绥远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特务分子采取种种卑鄙手段阻挠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南京政府曾强令董其武率部西撤。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头目潘秀仁、张遐民等也

① 《傅作义将军通电声明政治立场》，1949年4月3日《人民日报》。

再三煽动董其武执行西撤命令。但董其武及身边主和的高级将领以绥远暂时还较安定为由，拒绝西撤的命令。华北地区中统和军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史泓等先后来绥活动，一面鼓动董其武、刘万春、孙兰峰等高级将领要和共产党作战到底，一面部署潜伏特务，企图破坏和平解放。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不停顿地与傅作义协商绥远和平解放问题。3 月间，华北局与傅作义议定双方各派 3 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在北平商谈解决绥远问题的有关事宜。华北局的代表是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的代表是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双方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协商，达成了协议。6 月 8 日，在北平举行《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简称《绥远协议》）签字仪式，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兰公武和傅作义出席仪式。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 6 名委员在《协议》上签字。《绥远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绥远协议》共 6 项 17 款，主要内容为：划定人民解放军与绥远国民党部队的临时分界线，双方同意以陶卜齐与白塔之间古立板乌素为中心，向南北划定界线，以东者归解放区管辖，以西者归董占区管辖；恢复平绥铁路通车，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统一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人民币可以在董占区自由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双方可以互相贸易，均不征收出入口税；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与董方协商解决一切临时发生的具体问题；解放区书报在董占区可以发行；

董占区内停止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1]

在绥远和平谈判的过程中，我方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同时考虑到董其武的处境和困难，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让步。《绥远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在绥远和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绥远和平谈判在北平进行期间，董其武为配合谈判，于5月19日在归绥主持召开了军政革新大会，正式成立"绥远军政革新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革新会"首先改革人事制度，裁并省级机构，将原省政府厅局处20多个单位裁并为四厅二处，重新任命了负责人。于7月11日在原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旧址成立了"绥远省革新学院"，分期分批训练省、县科长级以上干部。同时，整顿军队，贯彻精兵主义，统一军令政令，整饬军纪，确保社会治安。总之，革新会对绥远实现完整的起义起了积极作用。

《绥远协议》签字后，傅作义于6月14日派王克俊携带《绥远协议》到归绥帮助董其武进行实施协议的工作，在绥远军政干部中传达了协议内容。国民党绥远军政当局的大多数人员已认识到和平起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赞成《绥远协议》。

中共中央华北局及绥远省委为保证《绥远协议》各项条款得到落实，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6月25日，华北局将《关于执行〈绥远协议〉的决定》电告绥远省委。28日，绥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贯彻《绥远协议》的各项条款的问题，并制定绥远省委的工作步骤。经过讨论，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和华北局的方针。会后，绥远省委向县、团级党委发出《关于绥

---

①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32—3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远协议的传达提纲》。同时，根据《绥远协议》中有关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问题的条款，抽调富有统战工作经验以及在金融、贸易、铁路等方面有专长的人员组成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潘纪文任处长。7 月 11 日，联络处首批工作人员 26 人由鲁志浩带领进驻归绥；17 日，潘纪文带领联络处全部工作人员由旗下营到达归绥。至此，双方合作执行《绥远协议》的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潘纪文等与董其武商谈实现《绥远协议》措施，并分别与地方知名人士张钦、阎肃、荣祥等人交谈，说明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和联络处的任务，与归绥各方面建立联系，了解情况，宣传协议精神。在联络处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下，我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的政策深入人心，受到绥远各族各界人士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败退到广州，但是并不甘心放弃对绥远的寄托。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亲自出面，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的历史关系，用金钱和名位收买驻绥部队中的个别高级将领，企图通过拉扰分化，挑起叛乱。7 月 16 日，阎锡山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指挥所主任，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董其武对绥远军队的指挥权。同时成立第 9 兵团，委任孙兰峰为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统辖 111 军骑 5 旅、12 旅和 13 旅。

当王克俊来绥远协助董其武贯彻《绥远协议》时，各路特务四下活动，散发传单，百般污蔑，并投掷手榴弹进行威胁。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进驻归绥后，国民党特务更是恨之入骨。在联络处第一批人员进驻归绥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便以《奋斗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和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为借口，砸了《奋斗日报》社，驱赶进步编辑。7 月 24 日中午，国民党

特务又蓄意制造了枪杀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击伤陶俊、光棣的惨案。

枪杀王士鑫的惨案发生后，联络处处长潘纪文立即将事件经过电告华北局，同时向董其武提出严正抗议，指出绥远当局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并宣布“尽管发生了这个事件，绥远和平的方针不变，但联络处要护送王世（士）鑫的灵柩回解放区。”①

7月25日，华北局电示中共绥远省委和归绥工委，杀害王士鑫一案如果是董其武所为，则坚决撤退；如果是反董反共的特务所为，则暂不必撤退，但必须使董其武下决心逮捕特务并加以镇压。26日，潘纪文决定留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3人，以便继续观察动态，了解情况；同时向董其武表示和平并未决裂。他本人带领132名联络处工作人员护送王士鑫灵柩返回丰镇，实施《绥远协议》的进程暂时停顿。

由于国民党中央的阴谋破坏和特务的猖獗活动，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一再受阻，董其武等便请求傅作义亲自来绥远坐镇，以便早日实现绥远的和平解放。傅作义也考虑到绥远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各成体系，单靠董其武不易掌握。于是，经毛主席批准，他和邓宝珊携带中共中央专批的20万银元及其他慰问品，于8月24日从北平出发，路经丰镇，同高克林、杨植霖、姚喆等作短暂叙谈之后便由鲁志浩陪同于25日下午抵达归绥。

傅作义到绥远后接见国民党绥远地区各部队长官并给每人发放5元慰问金；还与士兵直接见面，给每人发放2元慰问金。同时，接见了张钦、于存灏、荣祥、吴桐等政府各级人士和当地蒙、汉、回族知名人士及工农代表，还对个别人进行说服、争取

① 潘纪文：《追述绥远和平解放》，《内蒙古党史通讯》，1990年第一期。

工作，使绥远和平起义得到了绥远军政当局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赞同。而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从广州迭电傅作义，催其前去一晤，企图拉他重回国民党阵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也曾电令归绥特务刺杀傅作义；归绥、包头的特务也散发传单，极尽谩骂、威胁之能事。9 月 17 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蒋介石亲笔信飞抵包头，妄图对傅作义进行最后的策动。国民党反动派最后的挣扎并没有动摇傅作义坚持和平的坚定信念。

9 月 19 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 39 人，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聚会，举行光荣起义。会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庄重地发出由董其武等 39 人签名，代表绥远省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举行光荣起义的通电。通电宣布："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华的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①

9 月 20 日，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董其武等，"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② 聂荣臻、薄一波亦复电，对绥远和平解放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

---

① 董其武等：《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 64—66 页。

②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复董其武将军等》，《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 67 页。

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

为庆祝绥远和平解放，绥远军民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分别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使广大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9月25日，董其武发布《为绥远军民起义告全省人民书》，[①] 更详尽地说明了绥远军民起义的意义和绥远今后的前途，鼓励绥远人民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至此，绥远省全境宣告解放。

五、内蒙古全境的解放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内蒙古地区的解放战争也在胜利发展，中东部地区全部获得解放，绥蒙地区也处在解放的前夜。这一年的下半年，由于绥远和平解放进程的迅速发展，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伊盟支队向国民党统治下的伊盟各旗发动全面进攻，各旗王公札萨克和蒙旗地方武装纷纷接洽和平起义事宜，乌盟各旗也在观望形势的发展。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仍然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尚未解放的内蒙古西部盟旗的王公上层、流落各地的蒙古族政界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在国民党军政各机关任职的蒙古族官员等，都在思考各自的未来，寻找自己的出路。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在北平“隐居”3年的德王，乘国民党所派专机到达南京。他看到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的大势，同

① 《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69—73页。

在南京的一些蒙古族人士商谈内蒙古自治问题，提出要到内蒙古西部盟旗发动自治运动。这一设想不仅得到在南京的蒙古族政界人士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李宗仁代总统的应允。从来就不允许蒙古民族真正行使自治权利的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却有一些要人表现出支持德王发动内蒙古自治的姿态。其实，与其说他们支持内蒙自治，还不如说是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想利用德王等蒙古王公上层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1 月底，德王乘专机从南京经武汉、西安、兰州，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他在兰州会见了国民党西北各省军政长官，介绍了赴阿拉善旗的意图，得到了毫无价值而又无保证的支持。同时，纠合其流落在各地的旧部，联络西部盟旗的王公和各界人士，准备发动所谓蒙古自治。

德王在阿拉善旗得到该旗札萨克达理扎雅的支持，并同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林庆僧格等会商，于 4 月 13 日举行了所谓的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议定了《确定内蒙自治方案》、《内蒙自治军案》等一系列提案，成立了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推选未到会的伊盟杭锦旗札萨克阿拉坦瓦其尔（不久病故）为委员长，德王、林庆僧格、巴文峻、达密林旺楚克为副委员长。决定由该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事宜；确定德王、林庆僧格、鄂其尔呼雅克图、金巴图道尔计为晋京请愿代表。会后，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备案，并请求准许成立内蒙自治政府。

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民族自治的立场，德王等人是知道的。国民党反动派执政伊始，不仅不允许蒙古民族自治，而且是一贯坚持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是实行“反共灭蒙”政策，公然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存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反动集团一直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就是对投靠它的蒙古王公上层、官僚以及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治要求也一概拒绝。1945年9月，德王从日本的卵翼下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再次乞求内蒙自治，仍然被否决。1946年初，玛尼巴达喇率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团到北平请求国民党承认东蒙自治，不仅遭到拒绝，玛尼巴达喇被派回东蒙破坏自治运动；1945年11月，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也派代表团到长春向国民党东北行营要求呼伦贝尔自治，其结果也没有两样。在国民党党政各界任职的蒙古人士，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蒙古族官僚、政客和知识分子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蒙古族政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屡屡提出内蒙自治的要求，甚至以防内蒙“赤化”为由提出自治建议，均未得到允许。直至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时，在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及与会蒙古族代表，与会内会外形成了要求内蒙自治的热潮，其要求之强烈、措词之严厉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仍毫无结果。事实证明，向国民党乞求自治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1949年5月，德王率所谓蒙古自治请愿代表团，经银川、兰州、西安、重庆到达广州，沿途游说，甚至以协助国民党“戡乱”为理由，向国民党乞求批准成立自治政府。初则被严词拒绝，尤其是阎锡山反对最力；后来由于想利用德王阻止解放军进入内蒙古西部，也只批准成立自治筹备委员会，并拨给250支枪和10000元银元，对于成立自治政府的要求则未置可否，只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表示同意，但无国民政府的任何正式批示。德王于7月10日返回定远营。

这时，从内蒙古东部地区和锡、察、乌等盟流窜到阿拉善旗的国民党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额仁钦等部以及散兵游勇，成为

德王发动自治的武装力量；从南京、广州、台湾等地赶来的德王旧部，国民党政界人士和当地军政要人，成为德王搞自治的骨干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后，于8月5日在定远营召开了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拼凑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通过了《蒙古自治法》和会议“宣言”。德王任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扎雅任副主席，吴鹤龄任议会议长，白海风、李守信、林庆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任委员。这个“自治政府”是以德王为首的一批蒙古王公上层、国民党政客以及少数蒙旗政界人士，在国民党行将垮台的前夕，在恐慌、紧张、失望、挣扎的气氛中成立起来的。这时内蒙古西部地区及整个大西北的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底伊盟全境解放，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西北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8月26日解放兰州，银川的解放也指日可待。在这种形势下，德王拼凑成立的“蒙古自治政府”很快四分五裂，其中一部分人逃往广州、台湾，留在定远营的政府成员也发生意见分歧。达理扎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主张接受和平解放，而德王等一部分人则坚决主张西撤到沙漠地带，相机向青海、西藏或国外转移，成立所谓流亡政府。9月20日，德王率部分人员，同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的骑兵会合，窜到阿拉善旗西北部的拐子湖一带。

9月23日，宁夏解放。同日，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扎雅在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的积极推动下，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宣布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 通电全国，举行起义；27日，额济

---

①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代电》，《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2期。

纳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嘉布代表额济纳旗地方军政全体人员发表了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并转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通电，宣布起义。[①] 至此，内蒙古全境获得解放。

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内蒙古各族人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在内蒙古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过程中，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在内蒙古地区继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1949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区划构思。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有关领导人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而且提出“为将来便于领导管理全区工作，应将自治政府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驻归绥市。”[②]

5月，根据中共中央及东北局的决定，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当时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和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划归内

---

① 《额济纳旗札萨克塔旺嘉布的起义通电》，《内蒙古档案史料》，1993年第2期。
②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367页。

蒙古自治政府管辖。11月23日，乌兰夫、哈丰阿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提出将内蒙古自治政府由乌兰浩特迁往张家口的申请。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批准了他们的申请报告。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乌兰夫、哈丰阿分别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副主席。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归华北局领导，并指导绥远省委的工作。同时成立东部区党委，刘春任书记。12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开始向张家口搬迁，直到1950年6月25日搬迁工作全部结束。

1950年9月22日，将察哈尔省所辖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撤销绥远省建制、实行蒙绥合并，是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1952年初，周恩来总理召集内蒙古、绥远、华北局、新疆分局的领导人和政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专门研究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划问题。周恩来总理针对有人对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不甚理解，甚至不同意中央的设想的情况，明确指出："推行内蒙古区域自治还有阻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理解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质，还不了解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意图。"[①] 他说毛主席对蒙绥合并有明确指示：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②] 周恩来总理再次明确地指出，蒙绥合并是中央已经定了的问题，要按中央定

①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368页。
② 同上，第369页。

的、毛主席说的办。[1] 5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华北局《关于内蒙古与绥远工作关系问题的四项解决办法》。6月，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从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市。7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也从张家口迁到归绥市。9月，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与绥远省委合并为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同月，撤销了察哈尔省建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1953年11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绥远省人民政府合署办公。1954年1月11日至17日，绥远省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归绥召开，会上通过了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议。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的报告。3月6日，正式撤销绥远省建制，绥远省辖区全部划归内蒙古自治区。3月15日中共蒙绥分局改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4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改归绥市名为呼和浩特市。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并撤销绥远省建制的决定。2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为题发表社论，热烈赞扬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

1956年1月1日，国务院根据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式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属原热河省所辖翁牛特、喀喇沁、乌丹、赤峰、宁城、敖汉等6个旗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所设的热、察、绥三行省全部撤销。

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另外，1962年为解

①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第369页。

决内蒙古自治区与河北省行政区划的遗留问题，中央决定将河北省的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圆满完成了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任务。

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汉、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朝鲜等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获得了彻底解放，逐步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同样，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内蒙古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团结斗争的结果；内蒙古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内蒙古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斗争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也是极其丰富和宝贵的。回顾内蒙古革命的光辉历程，总结内蒙古革命的经验教训，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四个现代化建设及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　录　一

大事年表

1919年

5月　　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部分学生回到归绥宣传“五四”运动。　中旬，归绥中小学学生组织学生会，相继罢课，举行反帝爱国示威游行。

9月　　8日，北京政府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签订了“中日四（平）洮（南）铁路借款合同”。

1921年

5月　　1日，京绥铁路修至归绥。

9月　　1日，京绥路段正式通车。归绥几所中小学学生发

动了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

12月　13日，京绥铁路工人举行了全路机务工人索薪大罢工。

1922年

6月　12日，北京政府交通部与美国太康洋行签订了以京绥铁路抵押外债的《展期合同》。

7月　16日——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中共党员何孟雄到京绥铁路开展工人运动。

8月　9日，在中共领导下改组的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发表《京绥路同人会反对交通部丧权之宣言》。31日，交通部致函太康洋行撤回合同。

10月　27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举行全线总罢工。28日，交通部被迫答应了罢工条件。29日，车务工人同人会发表《京绥路罢工胜利宣言》。归绥民族资本商业大号大盛魁，集资创办了归绥电灯公司。

1923年

1月　李大钊发表《平民主义》，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与民族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5月　7日，归绥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大会，并进行游行示威。8日，绥远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砸了归绥专营日货的盛记商号。

6月　　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秋季　　北京蒙藏学校复学，内蒙古东西部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

1924年

1月　　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4月　　中共北方区委派荣耀先、白海风赴广东黄埔军校入第一期，王瑞符入第二期学习。

10月　　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

12月　　18日，段祺瑞任命冯玉祥部下张之江为察哈尔特别区都统。

从这一年下半年开始，多松年、李裕智、赵诚、奎璧、佛鼎、吉雅泰、孟纯、云润、云泽等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

1月　　13日，"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内蒙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宣言》。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张家口。李鸣钟被任命为绥远特别区都统。

3月　　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奎璧、吉雅泰、赵诚、高布泽博以“以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身份参加大会。　李大钊发表《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论述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　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帮助国民党建立北方地区党组织，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和包头4个工作委员会。

4月　　28日，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在北京蒙藏学校创刊。

5月　　30日，“五卅”运动爆发。

6月　　上旬，绥远学生联合会在归绥举行各族各界声援“五卅”惨案蒙难者、响应“五卅”运动大会。

8月　　中旬，京绥铁路总工会在张家口成立。

9月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蒙古问题议决案》。

10月　　13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　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成立，肖三任书记。

12月　　14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祝贺大会召开。

冬季　　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在张家口召开，李大钊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派，云泽、多松年、云润、康根成、荣照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

1月　　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热、察、绥三特别区派代表出席。

2月　　锡尼喇嘛回到乌审旗，在“独贵龙”基础上发展内

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

4月　下旬，在海留图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党部。

春季　中共绥远特支在归绥成立，路作霖任书记。

5月　热、察、绥三特别区工委选派17名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8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由张家口迁至包头。

9月　17日，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将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任总司令。　中共绥远特别区地方委员会建立，熊味根、路作霖先后任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绥远地方委员会建立，杨曙晓任书记。

10月　20日——30日，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联合会议在包头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派代表列席。

11月　乌审旗保安队被编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12团，锡尼喇嘛任团长。

1927年

3月　28日，中共绥远地委和国民党绥远区党委在归绥城南的"孤魂滩"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当局废除清丈费、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等，并组织农民游行示威。

4月　28日，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归绥各族各界人士在五族学院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　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多松年在张家口被捕，并牺牲于大境门外。

7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在银川召

开。

8月 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 5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在乌兰巴托召开，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中央机关暂设乌兰巴托。

10月 中共绥远特别支部成立。王建功任书记。

1928年

2月 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成立于天津，韩麟符任书记。

3月 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白云梯负责组织蒙藏委员会筹备处。

4月 9日，中共内蒙古特支作出《关于内蒙古问题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同月，又作出《关于内蒙政治经济情况的报告》。

4月 23日，阿拉善旗爆发"小三爷事件"，建立旗政务委员会及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

7月 9日，呼伦贝尔平民军成立，福明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7日，福明泰、郭道甫发动呼伦贝尔暴动。

9月 17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改行省的命令。 中共顺直省委制定《关于内蒙党目前的工作计划》，决定成立中共热河临时县委，郑丕烈任书记。吴鹤龄率"蒙古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反对国民党在内蒙古设省。

1929 年

2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给蒙委的信》中对内蒙古人民革命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将内蒙特支改称中共内蒙古特委。蒙藏委员会成立，阎锡山任委员长。

6 月　　15 日，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决定召开蒙古会议。　下旬，佛鼎、乌兰夫等组成中共西蒙工委，回国后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工作。

9 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在乌审旗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党的工作。

秋季　　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从莫斯科返郑家屯，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身份开展秘密活动。

11 月　　13 日，嘎达梅林发起武装抗垦和反对封建王公的斗争。

1930 年

3 月　　17 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鄂尔多斯、察哈尔秘密特别会议在乌审旗召开。

5 月　　29 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制定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

6 月　　内蒙古特委书记郑丕烈及韩麟符等在天津被捕，特委遭破坏。

9 月　　17 日，中共顺直省委提出《关于热河工作的计划》，建议以热河为中心开展内蒙古工作。

10 月 2 日，在热河滦平县金沟屯召开内蒙各旗县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内蒙古特委。16 日，临时组成内蒙古特委，李铁然任临时书记。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制定《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提出内蒙古革命的政纲和方针。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重建内蒙古特委，李希逸主持特委工作。

同年 佛鼎奉调回共产国际，乌兰夫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

1931 年

2 月 1 日，李铁然、刘刚向北满特委和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内蒙党的工作报告》，及《关于内蒙古一般的经济状况的报告》。

4 月 中共山西省委派赵鹏九、刘子安、李莉春来绥远建立中共绥远特委，赵鹏九任书记。

7 月 王若飞、吉合、潘恩普回国组成中共西北特委，王若飞任书记。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10 月 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

11 月 7 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发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告国内少数民族书》，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列入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条文。21 日，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后囚禁于绥远“第一模范监狱”。

1932年

3月　　1日，伪“满洲国”成立。　9日，伪“满洲国”国务院设立兴安局掌管蒙旗事务，齐默特色木丕勒任局长。

8月　　3日，兴安局改称兴安总署，齐默特色木丕勒任总署长官。

9月　　1日，高文彬率李海山、刘震玉等部向通辽日伪军发起攻击。　15日，中共内蒙特委发表《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苦民众书》。　27日，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率部向入侵海满地区的日伪军展开攻势。

10月　　马占山、苏炳文在海拉尔东头道街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通电抗日。

11月　　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成立，苏炳文任总司令。　17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发表通电，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　27日，日军大规模进犯海拉尔、辗子山、扎兰屯。

12月　　3日，苏炳文被迫率部退入苏联境内。

冬季　　绥远反帝大同盟在归绥成立第一个业余话剧团“绥远剧社”，杜如薪任社长。

1933年

1月　　内蒙特委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共内蒙特委，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发表《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宣言》。

2月　中共归绥中心县委成立，杜如薪任书记。反帝大同盟绥远省委在归绥建立，受中共归绥中心县委领导。

3月　4日，日军占领承德并直逼察哈尔。李海山率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团被迫撤往多伦、康保一带。

4月　上旬，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绥远反帝大同盟派韩燕如出席。　中共内蒙特委迁往张家口。

5月　23日，中共临河县委成立，王森任书记。　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7日，中共前线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省御侮救亡会”。

6月　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收复察北4县。　22日，同盟军克复康保。

7月　1日，同盟军收复宝昌、沽源。　12日，同盟军攻克多伦。　13日，冯玉祥任命张凌云任多伦警备司令。　26日，内蒙古自治第一次会议在百灵庙召开，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

8月　中共绥远特委在包头建立，刘仁任书记。

10月　9日，内蒙古自治第二次会议在百灵庙召开，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　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等部门联合提出解决内蒙古自治问题的3项方案。　18日，国民党中央举行政治会议讨论3项方案。　下旬，黄绍楊、赵丕廉抵百灵庙与内蒙古自治会议方面谈判。

1934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苏维埃的民族政策”。

3 月　国民政府公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

4 月　23 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成立，云端旺楚克任委员长。

6 月　7 日，兴安军官学校在郑家屯成立。

12 月　1 日，伪“满洲国”兴安总署改称蒙政部，齐默特色木丕勒任蒙政部大臣。

1935 年

5 月　4 日，红 26 军 42 师和红 27 军 84 师主力在陕北王家湾会师成立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蒙汉骑兵游击支队归属。

7 月　23 日，周久荣率部攻取八仙筒镇。

8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制定“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　8 日，周久荣、兰天林率抗日救国军包围辽西重镇北票，并攻克矿务局。

1936 年

2 月　12 日，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德王任总司令。23 日，绥境蒙政会在归绥成立，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任委员长，阎锡山任指导长官。21 日，云继先、朱实夫等在百灵庙发动军事暴动。

3 月　6 日，绥远最早的以妇女问题为主题的刊物《新女性》创刊。

4 月　24 日，“第一次蒙古大会”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通过建立“蒙古国”的一系列决议。

5 月　12 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云端旺楚克任主席，德王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高岗任书记。

6 月　9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求注意同鄂托克旗建立通商关系，并通过鄂托克旗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

7 月　30 日，王道一率伪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木尔台。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衡到圪子补隆垦区组建中共绥西工委，李衡任书记。

8 月　4 日，日军指挥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向红格尔图进攻。毛泽东分别致信宋哲元、傅作义，敦请抗日。2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

9 月　18 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

10 月　蒙古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

11月　6日，绥远省妇女会成立。通过《绥远省妇女会简章》。　18日，红格尔图战役告捷。　24日，百灵庙战役告捷。

12月　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　10日，傅作义部收复大庙。

1937年

2月　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的指示》。　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

2月　中旬，蒙古族赴延安参观团抵延安。

3月　15日，绥远抵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归绥烈士公园举行。　30日，"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将《燕然》半月刊定为会刊。

7月　1日，伪"满洲国"政府将蒙政部改为兴安局，扎噶尔任总裁。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组建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李衡任书记。　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　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动员全民族实行抗战。　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指出：驱逐日寇出绥蒙和蒙汉联合抗日是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　月底，由绥远民先队、牺盟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国团体联合组织了"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

8月　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　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声明；蒋介石表示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　14日，日本关东军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入侵察哈尔省；董其武率第2战区第7集团军218旅

收复商都县城。　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27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与日本中国驻屯军直属第5师团配合，侵占张家口。

9月　4日，日军操纵在张家口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　13日，察哈尔派遣兵团侵占大同；　19日向丰镇、集宁进攻；23日丰镇陷落；27日集宁失守。　29日，绥远省政府人员和国民党绥远驻军退入山西。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绥远国民兵政训处创办了《绥远抗战日报》。

10月　2日，德王率伪蒙军占领了百灵庙。　5日，日本关东军编组第26师团配置察绥地区。　10日，察哈尔派遣兵团1个旅团和伪蒙军分3路向归绥进兵；14日，归绥失陷；16日，萨拉齐县城被日军占领；17日，包头陷落。　15日，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　19日，安北县东北垦区在中国共产党垦区党支部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武装暴动。　27日，"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召开，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中共三边特委和三边专署成立，领导伊盟、三边和宁夏地区的抗日斗争。

11月　22日，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自治政府在张家口联合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　共产党员杨植霖、刘洪雄、贾力更、高凤英在归绥一带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抗日武装。　由东北垦区暴动队伍组建的"抗日民族先锋队"正式成立。

1938年

1月　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内蒙古的工作问题，李富春，高岗、王若飞等出席。　8日，日本

陆军中央部编组直属大本营的驻蒙兵团。 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蒙古混成旅工作的意见》，认为该部队是蒙古族抗日武装。

3月 30日，毛泽东电询贺龙、关向应等，能否在大同以北兴和、商都、康保地区建立根据地，能否沿大青山脉组织一支游击队性质的骑兵支队事宜。

春季 杨植霖等在归绥附近农村组织“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

4月 18日，毛泽东等再次致电贺、关等，要求迅速调查在平绥路以北广大地区能否创建游击根据地。 国民党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率部从晋西北反攻绥远，发动了绥南战役。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 马鸿逵部突然进军阿拉善旗，解除了该旗保安队的武装，并将该旗札萨克达理札雅押到银川，软禁了8年之久。

5月 14日，毛泽东电示贺、关等：“在平绥路以北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仍任书记。 31日，中共绥蒙工委和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从定边出发，进驻伊盟桃力民。 中共桃力民工委和河套特委建立。

6月 7日，贺龙、关向应等将在绥察调查的情况电报朱德、彭德怀；10日，朱、彭转报毛泽东；11日，毛泽东电复朱、彭、贺、关等，对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问题作了全面具体的指示。 下旬，八路军120师决定358旅715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游击根据地。李井泉任大青山支队支队长兼政委。

7月　在晋西北岢岚县组建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总动委会），武新宇任主任；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支队组成总动委会第四支队。同时组建了中共大青山特委，武新宇任书记。均与大青山支队赴绥远开辟游击根据地。　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进军大青山的命令。　29日，大青山支队从杀虎口越过长城进入绥远凉城县。

日本驻蒙兵团改称驻蒙军，隶属华北方面军。

8月　2日，总动委会和第四支队从五寨出发北上大青山，参加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9月　1日，大青山支队等到达大青山腹地大滩和甘沟子。3日，大青山支队夜袭陶林城；9日，攻打乌兰花；月底在蜈蚣坝伏击日军，打开绥中局面。　21日，在绥中大滩成立了大青山游击区第1个区级动委会。

10月　12日——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蒙、回、藏、苗、夷、瑶、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抗战中民族工作总方针，并提出民族工作的四项基本政策。

11月　20日，毛泽东等就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团结蒙古民族抗日等问题，电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　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确定了绥蒙工作的方针和各项政策，并决定成立中共绥远省委。

12月　大青山支队主力两个营调往冀中，所留部队和动委会、四支队全力进行剿匪斗争。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主管陕、甘、宁、青、绥五省的蒙古族、回族工作。　马鸿逵在阿拉善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

1939年

2月　　傅作义率35军由山西河曲抵达绥西五原，设立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中共中央派南汉辰、肖克、曾三等在五原与傅作义会谈共同抗日问题。

3月　　中共绥远省委在陕北组成，白如冰任书记。　中共绥蒙工委和大青山特委撤销，新建中共伊盟工委，受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绥远省委经晋西北来到大青山。绥远省委下辖河套特委、绥中特委、归陶工委、绥东工委。　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在张家口成立。　下旬，傅作义在五原新公中主持召开“抗战建国讨论会”，并决定成立“绥远抗日动员委员会”。

5月　　日苏诺门罕战争爆发，战争历时100多天，以日军惨败而告终。

6月　　21日，成吉思汗灵榇从伊盟迁往甘肃途经延安，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干部与群众两万多人举行盛大祭典。　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大青山骑兵支队正式组建，李井泉任支队司令员。

8月　　冀东八路军派周治国率工作组，赴热河南部承德、平泉、宁城一带活动。

9月　　总动委会改称八路军绥蒙总动委会。　1日，伪“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绥远省战地动员委员会成立，傅作义任主任，下辖县、区、乡动委会。

秋季　　第一批蒙古族青年30余人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赴延安学习。

12月　　19日，傅作义率部乘夜攻打包头日伪驻军。　21

日，日军调大批援军反攻，傅作义部撤退。　中共绥远省委改称中共绥远区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下辖绥西地委、绥中地委、绥东工委、归绥工委、土默特旗蒙古工委。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部组织西北远征军指挥部，率军首次进入呼伦贝尔开展游击战争。

1940年

1月　28日，日寇调集大批日伪军，分3路向河套进攻。

2月　月底，日军主力回防原驻地，仅在五原留驻日伪军15000余人，傅作义部收复陕坝、临河，以丰济渠为界，与日伪军对峙。　李井泉奉调回晋西北，姚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长（后改称司令员）。

3月　20日，傅作义率部攻打五原；21日收复五原县城，驻五原日伪军大部被歼。　抗联西北远征军在呼伦贝尔转战千余里，月底返回嫩江以东。

4月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提出绥远敌占区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各方面的政策，特别是对蒙古民族工作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决定建立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

6月　中共绥远区委组建了绥察独立第2支队，于占彪任司令员，白如冰兼政委，下辖绥中，绥西、绥南3个游击大队。

7月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毛泽东批示：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　24日，中共绥远区委与雁北合并成立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先后受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晋绥边区委员会领导，下辖绥西地委、绥中地委、雁北地委、绥南地委。　刘洪雄、贾

恭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救国会员100余人在归绥牺牲。

8月　　绥远敌占区各族各界各党派抗日力量代表会议，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绥西武归县小西梁村召开，决定并成立了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简称绥察行政办事处，姚喆任主任，杨植霖任副主任。下辖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

10月　　陕北公学设立民族部，专门培养蒙古等少数民族干部，从大青山到延安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大部分到这里学习。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成立，吴玉章任会长。同时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题写："成吉思汗纪念堂"。

1941年

1月　　抗联第3支队在呼伦贝尔转战3个月，最后转移到苏联境内休整。

3月　　撤销中共晋绥边区委员会，在中共晋西区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书记白如冰，下辖绥西、绥中、绥南3个地委。

4月　　15日，绥察行政公署成立，杨植霖任主任、苏谦益任副主任，下辖绥西、绥中、绥南、绥东4个专员公署。

5月　　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其中规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6月　　30日，延安陕北公学正式组建民族部。

7月　　抗联3路军指挥部再派3支队三进呼伦贝尔，在布

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博克图、牙克石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8月　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大青山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党政军领导要亲密团结，加强统一领导，对付艰苦的斗争。

9月　18日，延安民族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首批300多名少数民族学员中蒙古族学员占绝大多数。

10月　1日，颁布《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规定了绥察行政公署的施政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　28日，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蒙古抗日游击队长高凤英等12人在万家沟小火烧营地的战斗中牺牲。

11月　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伊盟守备军总司令，率部进入伊克昭盟。

12月　绥察独立第2支队番号取消，所属部队归大青山骑兵支队统一指挥。

1942年

2月　5日，中共晋西区委作出《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要求坚持游击战争，执行隐蔽政策，积蓄力量，以备将来。　抗联3路军第3支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是年秋天，第9支队也撤到苏联境内。

5月　5日，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　冀东根据地党组织和八路军组织路北武工队，开辟承平宁地区的工作，建立了4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

7月　25日，日军调动近3万兵力分5路对大青山绥中游

击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8月　2日，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部和绥察行政公署机关与日军周旋8个昼夜之后，骑兵支队主力突围到蛮汗山。4日，绥察行署、绥中地委、专署和所属游击队也突围到绥南游击区。17日，日军在绥南集中8千余兵力进行大扫荡，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雁北右玉、偏关转移。

10月　15日，日军以6千余兵力向绥西游击区展开“梳篦式清剿”。24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绥察边区党委与雁北地委合并，成立中共塞北区工作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撤销中共绥察区委；同时成立塞北区行政公署，杨植霖任主任；成立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姚喆任司令员，撤销绥察行政公署和大青山骑兵支队建制。

11月　冀东军分区派主力部队700余人进入热河，攻占了宁城洼子店、黄土梁、八里罕等地伪警察署。

1943年

3月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26日，伊盟札萨克旗保安队和该旗蒙古族群众，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政策举行武装起义，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伊盟事件”。31日，国民党伊盟守备军派两个团进攻札萨克旗王府；4月1日，守备军占领王府，该旗札萨克沙王随同起义部队和群众向乌审旗转移。

4月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主力从热河撤退，高桥率11团2连在承平宁一带坚持斗争。

5月　中共冀东地委决定正式建立承平宁联合县，分别设

立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和联合县办事处。12日，沙王代表札萨克旗起义军民提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的6项要求。

6月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组成第3区队，高桥任队长，黄克任政委，开赴承平宁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7月　塞北军分区派出由安正福率领的武工队进入蛮汗山区，在和林县进行群众工作。同时派李佐玉、王瑜山率领的武工队和工作组进入绥中开展群众工作。另外，骑兵1团、2团分别进入蛮汗山绥南游击区恢复活动。

1944年

1月　安正福武工队发动群众，粉碎日伪军500余人7路扫荡。

3月　和林武工队建立了和林县抗日民主政府，安正福任县长。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对安正福武工队给以极高的评价，毛泽东批示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29日，冀东军分区第3区队高桥等22名指战员，在宁城八素台双庙村附近的老威沟被日伪军讨伐队包围，在激战中高桥等9人牺牲。

4月　24日，国民党特务诱杀了札萨克旗“三二六”起义的领导者劳赖。

夏季　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定边，称三边公学民族学院。

1945年

1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和晋绥军区27团北上大青山，准备参加全面反攻。

2月　17日，中共中央电复中共晋绥分局，同意在绥远成立中共绥蒙区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中共伊盟工委。　国民党军队杀害了乌审旗革命武装领导人奇金山。　中共冀热辽边区委员会、冀热辽军区和行政公署派3支北进支队挺进热河，恢复热河的抗日斗争，扩大根据地。

3月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三边公学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内的城川办学，称为城川民族学院。

4月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1943年对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了抗战胜利后党的民族政策。

5月　冀察军区部队发动了察南战役，将日伪军压缩到张家口和铁路沿线。

6月　中共冀热辽分局和冀热辽军区组织了3支部队挺进热河，第2支队向平泉、宁城、赤峰推进。

7月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蒙政府，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　塞北军分区改称绥蒙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兼政委。

8月　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　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延安总部发出全面反攻的命令；同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　11日，兴安盟王爷庙伪陆军兴安学校师生举行反日起义，迎接苏蒙联军。　12日，晋绥解放区战场以归绥为中心的北线反攻全面展开，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18日，归绥战役总指挥部发布攻城命令，但被国民党军队和伪蒙军里应外合夹击八路军，抢占了归绥。　同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在兴安盟王爷庙成立；以内蒙古人

民解放委员会名义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　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力争绥察热全境》的指示。

9月　　9日，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成立。　19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

10月　　上旬，乌兰夫、奎璧等到苏尼特右旗，改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11日，该政府迁往张北，自行解散。5日，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在兴安盟王爷庙组成，特木尔巴根任秘书长。　8日，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在海拉尔成立，额尔钦巴图为主席。　18日——12月22日，八路军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发动第一次察绥战役，收复了绥东及绥南部分城镇。　23日，中共中央发出《内蒙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内蒙古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

11月　　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张家口组成，乌兰夫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晋察冀中央局，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26日——28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召开，乌兰夫当选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常务委员会主席。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

中共热北地委组成，王逸伦任书记；热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张盘新任专员。

12月　　上旬，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代表包玉昆抵达张家口，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取得联系。　18日，内蒙古军政学院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任院长。　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成由刘春为团长的东蒙工作团，启程前往内蒙古

东部地区。

1946 年

1 月　12 日——16 日，新四军第 3 师一部解放通辽、开鲁。　16 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葛根庙举行，发布《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通过《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东蒙古自治法》，宣布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旬，中共通鲁工作委员会在通辽成立，喻屏任书记。　25 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等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在双辽举行会谈，签订了“吕阿协定”。

2 月　15 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王爷庙正式成立，博彦满都任主席。　21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伊克昭盟工作，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伊盟的工作方针。　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成立，白云航任主任。

3 月　15 日，内蒙古自治学院在赤峰成立，乌兰夫兼任院长。　27 日——4 月 1 日，察哈尔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察哈尔盟政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哈尔盟分会成立，陈炳宇当选为盟长，苏剑啸任分会主任。　28 日，八路军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成立，张策任主任。　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　30 日——4 月 2 日召开预备会议。

4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正式举行。　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确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平等自治的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选举了内蒙

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成员，乌兰夫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常委会主席。 5日，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在王爷庙成立，张策任书记。 同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林郭勒盟分会成立，阿拉坦敖其尔任分会主任；锡林郭勒盟民主政府成立，松津旺楚克任盟长。

5月　26日——30日，东蒙古第二次临时代表大会在王爷庙召开，决定撤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成立兴安省军区，特木尔巴根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哈丰阿任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主任；阿思根任兴安省军区司令员，哈丰阿任政委。 28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兴安省分会成立，特布信任主任。 同日，中共东蒙工作委员会改称兴安省工作委员会。

6月　1日，哲里木盟政府成立，乌力图任盟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哲里木盟分会成立，协儒布僧格任主任。 3日，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正式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2、4、5师及兴安支队、6支队，统归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指挥。 5日，昭乌达盟行政委员会成立，萨嘎拉扎布任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成立，乌力吉那仁任主任。 同日，呼伦贝尔文化促进会在海拉尔成立，哈达任主任。7月5日改称自治运动联合会呼伦贝尔盟分会。 7日，纳文慕仁盟政府成立，额尔敦任盟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文慕仁盟分会成立，志达图任主任。 25日，兴安省政府机关迁至海拉尔。

7月　1日，《内蒙自治报》在兴安省王爷庙创刊。

8月　1日，乌兰夫就内蒙古土地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提

出“在畜牧区不进行分配土地，在半农半牧区一般不分配土地”的民主改革基本政策。　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伊克昭盟工作，制定了加强民族团结，加快军政建设的工作方针。

9月　　5日——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卓资山、集宁、凉城、丰镇、商都、化德、宝昌、张北、张家口等地。　8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成立，白云航任司令员。　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发出《关于东蒙工作的指示》。23日，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提议，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内蒙古党委，乌兰夫任书记。　同日，中共锡察工作委员会、中共巴乌工作委员会成立，王铎、奎璧分别任书记。　下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由张家口迁往锡林郭勒盟贝子庙。

10月　　13日，锡察盟行政会议在贝子庙召开。　24日，驻横山国民党王永清部，诱捕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书记赵通儒等干部、战士13人，伊盟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2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

11月　　7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锡地方行政委员会在贝子庙成立，特克希布彦任主任。　同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6师组成，李秀山任师长，王铎任政委；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巴乌军区成立，乌力吉敖其尔任司令员，奎璧任政委；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11、12、17师组成，归巴乌军区指挥。　26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及所属分局，对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并着手进行准备。　28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彭真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在哈尔滨举行会谈，共同制订了《关于呼伦贝尔地方自治基本原则》。

1947 年

1 月　6 日，察哈尔盟代理盟长关起义等在与土匪的战斗中牺牲。

2 月　3 日，乌兰夫在林东中共热北地委干部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阐述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重大意义及相关的几项具体政策。　14 日，乌兰夫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抵王爷庙。

3 月　14 日，乌兰夫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党的组织及领导关系的请示电》，建议成立内蒙分局或内蒙党委会，受东北局领导。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自治诸问题的意见》，对内蒙古自治政府及其施政纲领等 6 个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4 月　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央提出《关于内蒙自治问题的意见》，对于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 3 点建议。　3 日——21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在兴安盟王爷庙召开，乌兰夫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刘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分别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各方面的工作作了总结报告。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给东北局并转云泽电》，原则同意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和施政纲领草案。　23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召开。24 日，乌兰夫向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25 日，乌兰夫就《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草案向代表会议作了说明；27 日，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施政纲领》、《暂行组织法》及《内蒙古自治政府参议会议员选举条例》、《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内蒙

古人民代表大会致毛主席、朱总司令电》；28日，讨论通过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候选人名单；29日，代表会议举行参议员选举；30日，宣布参议员选举结果，内蒙古各族各界代表121人当选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5月　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博彦满都当选为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吉雅泰当选为副议长。　2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闭幕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典礼在王爷庙举行，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席哈丰阿和议长博彦满都、副议长吉雅泰以及政府委员、驻会参议员等宣誓就职。　13日，兴安省政府发布第5号布告，宣布自5月15日起取消兴安省建制。　19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电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内蒙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乌兰夫任书记。　30日，内蒙古自治政府颁布第1号布告，决定5月1日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为自治政府旗，内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暂设兴安盟王爷庙街。　伊盟蒙汉支队在靖边县张家畔成立，王悦丰任司令员，高增培任政委。

6月　2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建党问题及党内团结的决议》，指出要求全体党员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加强团结，统一思想。

7月　1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在王爷庙成立，乌兰夫任书记；9日，乌兰夫在王爷庙干部群众集会上宣布了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中共察锡工委和巴乌工委合并为中共巴乌察锡工委，奎璧任书记。

8月　7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内蒙古军

政大学，乌兰夫任校长兼政委。　内蒙古贸易总公司在王爷庙成立。

9 月　　8 日——10 月 25 日，中共绥蒙区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对于土地改革、整编精简等问题作了新部署，开始在雁北及绥南地区进行土地改革。　10 日，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二院在齐齐哈尔开学。

11 月　　1 日，内蒙古军政大学第一院在王爷庙开学。　5 日——16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召开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决定在内蒙古自治政府辖区内的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民主改革。　8 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呼纳盟地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吉雅泰任书记。　月底，伊盟蒙汉支队转移到靖边县和吴起镇进行“两忆三查”整军运动。

秋季　　察北蒙汉联军司令部北线指挥所成立，乌力吉敖其尔任总指挥，苏克勤任政委，统一指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 11、16 师和察北地方部队。

12 月　　4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成立，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取消了兴安省军区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军事部。　5 日，王爷庙街改称乌兰浩特市，成立市政府，章泽任市长。

1948 年

1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阿思根、王再天、那钦双合尔任副司令员。　同日，《内蒙古日报》在乌兰浩特市创刊，其前身为《内蒙自治报》。　同日，取消呼伦贝尔临时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呼

伦贝尔盟政府；15 日，任命额尔钦巴图为呼伦贝尔盟盟长。26 日，伊盟蒙汉支队整编为伊盟自治支队，王悦丰任支队长，周仁山任政委。

3 月　　1 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发出《保卫土地改革的命令》。

4 月　　11 日，伊盟支队解放准格尔旗。

7 月　　月初，中共伊盟工委分为伊东工委和伊西工委，高增培、周仁山分别任书记。

8 月　　2 日——5 日，内蒙古干部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总结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统一思想，乌兰夫和高岗在大会作报告。　13 日，绥蒙军区部队升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 8 纵队，姚喆任司令员。

9 月　　12 日——11 月 2 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1、2 师参加辽沈战役。　21 日——11 月 15 日，华北野战军第 3 兵团发动绥远战役，解放绥东、绥南地区。

11 月　　7 日，内蒙古党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在乌兰浩特举行。　14 日，兴安盟政府在乌兰浩特市成立，杰尔格勒任盟长。　29 日——1949 年 1 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11、16 师参加平津战役。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锡察军区成立，乌力吉敖其尔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11、16 师。

12 月　　8 日，中共察哈尔盟工委代理书记肖诚、盟长苏剑啸等在察哈尔盟沙布尔台遭土匪袭击牺牲。　24 日，华北野战军主力收复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市。

1949 年

1 月　内蒙古妇女联合会成立，乌兰任主任。　22 日，北平和平解放条款签定；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2 月　10 日，西北野战军第 8 纵队成立蒙汉联军前线党委和前线指挥部，康健民任司令员，梁中正任政委，统一指挥第 8 纵队骑兵旅、察哈尔省军区骑兵旅和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 11、16 师；12 日——27 日，上述骑兵部队发动绥北战役。　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 8 纵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 军。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和平解放绥远的“绥远方式”。　15 日，绥蒙政府绥东蒙旗办事处在集宁成立，李新民任主任。　25 日——30 日，内蒙古首届青年团代表大会在乌兰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4 月　1 日，绥蒙区政府和绥蒙区党委由晋绥划归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　11 日，呼伦贝尔盟和纳文慕仁盟合并为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简称呼纳盟），额尔钦巴图任盟长。　13 日——15 日，“内蒙各盟旗代表会议”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成立“内蒙自治筹备委员会”。

5 月　1 日，昭乌达盟由热河省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15 日，哲里木盟由辽北省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同日，《绥蒙日报》在丰镇复刊。　19 日，绥远军政改新委员会在归绥成立，董其武任主任委员。　29 日，绥蒙军区与第 8 军合并成立绥远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

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

6月　8日，《绥远协议》在北平签字。13日，绥蒙区改称绥远省，绥蒙政府改称绥远省人民政府，杨植霖任主席。14日，中共绥蒙区委员会改称为中共绥远省委员会，高克林任书记。

7月　11日，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第一批工作人员进驻归绥；17日，第二批工作人员进驻归绥；26日，联络处大部分工作人员撤回丰镇。

8月　5日——10日，“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召开，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25日，傅作义、邓宝珊到归绥看望绥远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官兵。月底，伊盟全境解放。

9月　19日，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为首的绥远省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在包头发表起义通电，绥远省宣告和平解放。20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复董其武将军，对他们的义举给以嘉勉。25日，董其武将军发布《为绥远军民起义告全省人民书》，号召绥远人民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21日——3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代表乌兰夫、王悦丰、刘春、王再天、王逸伦、特木尔巴根等出席会议。23日，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发表起义通电，阿拉善旗和平解放。27日，额济纳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塔旺嘉布发表起义通电，额济纳旗和平解放。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1月　2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呈请中央人民

政府，为便于对内蒙古地区的统一领导，将自治政府由乌兰浩特迁驻张家口。　24日，周恩来总理批复准请。

12月　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乌兰夫任书记。　分局下设东部区党委，刘春任书记。　23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开始办公。　31日，原设在丰镇的绥远省人民政府与原绥远省政府正式合并，组成绥远省人民政府。

附录二

参考图书文献资料目录

1、参考图书目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二、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983年。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
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
王树盛、郝玉峰主编：《乌兰夫年谱》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
王昆仑：《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内蒙古英烈传》（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中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8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第一卷，1987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1983年。
甘肃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中、下），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熊耀文编：《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蒙藏委员会，1934年。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61、1968年。
编写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1、2、3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1986年、1987年。
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
史筠：《民族法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编写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浩帆主编：《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社会主义过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 年。
钱林豹：《解放战争时期的内蒙古骑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内蒙古图书馆刊印，1987 年。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年。
《蒙古会议汇编》，蒙藏委员会编印，1930 年。
马福祥：《蒙藏状况》，蒙藏委员会编印，1930 年。
黄奋生：《蒙藏新志》，中华书局，1938 年。
陈玉甲：《绥蒙辑要》，1937 年。
孔祥哲：《蒙旗概况》，1937 年。
卓宏谋：《蒙古鉴》，养和书屋，1935 年。
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商务印书馆，1935 年。
黄奋生：《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中华书局，1935 年。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 年。
纪霭士：《察哈尔与绥远》，文化建设月刊社，1937 年。
傅角今：《新省区》，商务印书馆，1934 年。
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北平京城印书局，1933 年。
方范九：《蒙古概况与内蒙古自治运动纪实》，商务印书馆，1934 年。
《绥远概况》，绥远省政府编印，1933 年。
民族问题研究会：《蒙古民族问题》，内蒙古出版社，1946 年。
《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 年。
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伪蒙政治经济概况》，正中书局，1943 年。

西北研究社：《抗战中的绥远》，西北研究出版社，1941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四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1993年。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992年。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80年。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石光真臣等：《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日）第一卷，1914年。
国难资料编辑社：《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生活书店，1938年。
（苏）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
（日）江口圭一：《资料·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岩波书店，1985年。
（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日）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85年、1992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人民出版社，1991年。
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1984 年。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研委办公室、晋绥革命根据地史料征编指导组办公室编：《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区大事记（1947——198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研究室、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史资料（1925.3——1987.1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年。
《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
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纪念文集》第一、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1990 年。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王逸伦：《路漫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王若飞在狱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年。
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编：《在艰苦的岁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 年。
《青山足迹——杨植霖回忆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年。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 16、17、26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1986 年、1988 年。
《革命回忆录》(8)，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党史资料》第一、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1989 年。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43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年——1991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投笔从戎血沃青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阿拉善盟文史》第一——四辑，1985——1988年。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王在阿拉善》，1988年。
阿拉善左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阿拉善左旗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年。
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编：《阿拉善史志资料选编》，1986年。
阿拉善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一——四辑，1986——1988年。
伊克昭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伊克昭文史资料》第一——三辑，1986——1988年。
伊克昭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伊盟革命回忆录》第一、二辑，1983年。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回忆伊盟解放战争》，1984年。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伊盟革命斗争史料》第1——10辑，1983——1987年。
李克仁：《准格尔旗近代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
巴彦淖尔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十三辑，1983年——1992年。
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巴彦淖尔史料》，第一——六辑，1983年——1985年。
包头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包头市档案馆编：《包头史料荟要》

第三——十四辑，1980 年——1985 年。
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六辑，1982 年——1984 年。
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一——四辑，1982 年——1985 年。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编：《呼和浩特史料》第一——九辑，1983 年——1991 年。
中共土默特左旗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土默特革命史料》第一、二辑，1987 年、1988 年。
土默特左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二辑，1986 年、1987 年。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史料》第四、五、七、九、十、十三、十四、十七、十九、二十辑，1982 年——1986 年。
中共乌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乌兰察布盟党史资料》第一——三辑，1984——1988 年。
乌兰察布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兰察布盟文史资料》第一——三辑，1984——1985 年。
乌盟史志办公室编：《乌盟史料汇编》第一辑，1983 年。
锡盟党史地方志编委会编：《锡盟革命回忆录》第一、二辑，1983 年、1984 年。
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和子章与蒙骑四师》，1989 年。
中共哲里木盟委党史办公室编：《革命回忆录》第一集，1986 年。
兴安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兴安革命史话》第一——三集，

1987——1990 年。
中共兴安盟党史办公室编：《兴安党史文集》第一、二辑，1993 年。
呼伦贝尔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三辑，1985 年。
呼盟党委党史资料征集、革命史编审办公室编：《呼伦贝尔史料》第一、二辑，1984 年。

2、主要文献资料目录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 年 7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64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
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蒙古问题议决案》（1925 年 9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19 页。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928 年 6 月），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274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年 1 月 23 日），《孙中山选集》，第 586 页，人民出版社，1956 年。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体民众宣言书》（蒙文）（1925 年 10 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记录，A—6—1—2—14。
《中共中央致内蒙特支指示信》（1928 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1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共中央给蒙委的信》(1929 年 2 月 3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0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1930 年 11 月 5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36 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 年 11 月 7 日),《苏维埃中国》第 1 集,第 119 页,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 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 年 1 月 22 日),《苏维埃中国》第 2 集,第 242 页,1935 年。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 年 8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 683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1935 年 12 月 20 日),《六大以来》(上),第 732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 年 12 月 23 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第 416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1936 年 8 月 24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416 页。
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应以援绥抗日为中心的指示》(1937 年 2 月 3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448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1937 年 2 月 7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450 页。
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1937 年 7 月 1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545 页。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 年 11 月 6 日),《六大

以来》（上），第 100 页。
中共中央：《关于蒙古混成旅工作的指示》（1938 年 11 月 2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10 页。
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1938 年 11 月 22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12 页。
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1940 年 4 月 5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46 页。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940 年 7 月），《六大以来》（上），第 1118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23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64 页。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复晋察冀中央局电》（1945 年 11 月 1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76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的指示电》（1946 年 2 月 18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00 页。
中共中央：《关于不宜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 年 2 月 24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11 页。
中共中央：《对东蒙问题的指示》（1946 年 3 月 1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23 页。
中共中央：《关于考虑成立内蒙自治政府的指示》（1946 年 11 月 26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83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1947 年 3 月 23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94 页。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示》（1947 年 4 月 2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102 页。

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对策给东北局的指示》（1947年4月23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03页。

《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内蒙工作方针》（1928年3月），中央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7页。

《中共顺直省委关于内蒙党目前的工作计划》（1928年9月），《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43页。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关于绥远党的工作报告》（1934年2月29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39页。

《中央驻北方代表石心致中央信》（1934年6月15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78月。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会的信》（1934年7月7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24页。

少委蒙民部：《目前绥远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工作》（1937年6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68页。

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央对绥远工作指示的意见》（1940年7月24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2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绥远工作任务的决定》（1940年7月24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22页。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78页。

《中共晋西区委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1942年2月5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24页。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给塞北工委的指示信》（1942 年 11 月 24 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35 页。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绥远工作给塞北工委的指示信》（1943 年 3 月 14 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39 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座谈伊盟工作记录》（1945 年 2 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735 页。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成立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报告》（1945 年 11 月 8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974 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蒙古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46 年 2 月 2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02 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伊盟工作的记录》（1946 年 2 月 21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05 页。
《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关于热河蒙古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46 年 3 月 7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21 页。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东蒙问题致东北局电》（1946 年 3 月 13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27 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蒙工作方针的意见》（1946 年 4 月 17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41 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伊盟工作会议纪要》（1946 年 8 月 22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59 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目前蒙古工作中纠正和防止左倾的指示》（1946 年 9 月 1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64 页。
《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及几项政策的规定》（1946 年 9 月 13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067 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呼伦贝尔自治问题的具体要求向中央的请

示》(1946年10月2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77页。
《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关于蒙古工作的总结》(1946年)《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87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对内蒙自治问题的意见向中央的请示》(1947年4月1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097页。
《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内蒙人民革命党问题的信》(1947年4月10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99页。
《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关于组织内蒙党问题向东北局的请示》(1947年4月13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39页。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内蒙组织人民革命党问题的请示报告》(1947年4月18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00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准格尔旗减租问题的决定》(1948年10月27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69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和平解放伊盟问题的几个步骤致伊盟工委并三边地委电》(1949年2月12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223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内蒙建军工作总结》(1949年2月14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225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伊盟工作讨论纪要》(1949年6月1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240页。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伊盟解放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9月27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275页。

中共内蒙特支:《关于内蒙古问题与党的任务的报告》(1928年4月9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2页。

中共内蒙特支：《关于建立内蒙特委及工作方针的请示》（1928年8月17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0页。

中共内蒙古特委李铁然等：《关于内蒙党的工作报告》（1931年2月1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23页。

中共内蒙古特委：《关于内蒙古一般的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1931年3月），《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33页。

中共内蒙古特委：《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告蒙汉劳苦民众书》（1932年9月15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49页。

《中共内蒙特委书记李铁然报告书》（1932年12月16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55页。

中共绥远特委郗汝村：《关于绥远情况给河北省委的报告》（1933年1月25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65页。

中共内蒙特委：《关于健全特委开展工运及学生牧民等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5月30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91页。

《河北前线工作委员会关于内蒙阶级状况的分析》（1933年7月10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03页。

中共绥远特委：《给北方代表的工作报告》（1934年4月30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64页。

中共绥远特委：《关于绥远铁路临河等工作的报告》（1934年7月15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04页。

中共绥远特委：《关于群众斗争和内蒙工作的报告》（1934年9月6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29页。

中共绥察区党委：《关于绥察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1941年8月24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227 页。

中共绥察区党委：《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1941 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233 页。

《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1941 年 10 月 1 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265 页。

《绥察行政公署告蒙古同胞书》(1942 年 10 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301 页。

《绥察行政公署关于绥远工作的总结》(1942 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321 页。

《塞北工委关于对敌占区乡政权工作的指示》(1943 年 2 月 26 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385 页。

《塞北军分区司令部 1944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420 页。

《塞北军分区关于当前形势的宣传要点》(1945 年 5 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437 页。

《绥蒙军区关于在日寇投降条约签订之前作战部署的命令》(1945 年 8 月 12 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第 491 页。

《绥蒙政府主席云泽谈内蒙自治问题》(1945 年 11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8 页，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9 年。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1945 年 11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第 10 页。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1945 年 11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第 12 页。

《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51页。
《东蒙古人民代表临时大会宣言》（1946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68页。
《兴安省施政纲领》（1946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70页。
《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231页。
《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1947年4月27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24页。
《绥蒙区党委关于绥远新区工作中几项政策草案》（1948年8月12日），《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439页。
《绥蒙区党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指示》（1948年11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1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绥远省关于1949年下半年工作任务的决定》（1949年5月16日），《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24页。
《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1949年9月19日），《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档案史料选编》，第64页。

李守常：《平民主义》（1923年1月），《李大钊选集》，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
陈独秀：《我们的回答》（1924年9月17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76页，三联书店，1984年。
李守常：《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1925年3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9页。

瞿秋白：《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1926 年 1 月 21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71 页。

陈独秀：《国民党右派大会》（1926 年 4 月 23 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 167 页。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1926 年 9 月 8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76 页。

《刘晓同志关于蒙古工作给总政和党中央的报告》（1936 年 7 月 19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501 页。

王稼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1936 年 7 月 22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506 页。

《刘晓关于盐池及蒙民工作报告》（1937 年 7 月 6 日），《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 355 页。

《刘晓同志对蒙古工作的意见》（1936 年 7 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511 页。

刘春：《怎样团结蒙古民族抗日图存》（1940 年 3 月 20 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819 页。

乌兰夫：《纪念蒙古民族的祖先——成吉思汗》，1944 年 4 月 14 日《解放日报》。

乌兰夫：《控诉十八年来国民党内反动派压迫蒙古民族的罪行》（1945 年 5 月 3 日），1945 年 5 月 8 日《解放日报》。

乌兰夫：《在“四三”会议上的致词》（1946 年 4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49 页。

博彦满都：《在“四三”会议上的致词》（1946 年 4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 50 页。

乌兰夫：《关于承德会议主要内容致中央、中央局、东北局、西满、晋绥分局电》（1946 年 4 月 5 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

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54页。
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6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油印），第018号。
哈丰阿：《在西科前旗工作团群众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提纲》（1946年7月24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80页。
乌兰夫：《关于蒙地工作问题的报告》（1946年7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93页。
乌兰夫：《关于内蒙土地问题的意见致中央电》（1946年8月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05页。
张平化：《关于"呼伦贝尔自治问题"给东北局的报告》（1946年8月13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13页。
张策：《关于东蒙古地区（兴安）的工作情况和经验》（1946年8月15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315页。
乌兰夫：《关于绥蒙蒙古工作的意见给高、姚等同志的信》（1946年8月1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07页。
奎璧：《蒙古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8月22日《晋察冀日报》。
乌兰夫：《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1947年2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57页。
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上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1947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77页。

刘春：《在执委扩大会上作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工作的报告》(1947年4月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80页。

特木尔巴根：《在执委扩大会议上作兴安省工作的报告》(1947年4月1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89页。

奎璧：《在执委扩大会上作巴、乌盟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47年4月1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第198页。

乌兰夫：《在内蒙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政治报告的摘要》(1947年4月24日)，《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07页。

乌兰夫：《在兴安盟群工会上的讲话》(1947年11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自治区牧区民主改革专题资料》，第5页，1992年。

乌兰夫：《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任务》，1948年1月1日《内蒙古日报》。

乌兰夫：《在内蒙古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1948年7月30日)，《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412页。

高岗：《在内蒙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8月3日)，《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第425页。

3、主要历史档案目录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全宗号141，1928年——1949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档案》，全宗号4，

1946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全宗号 6，1946 年——1947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中共绥蒙区委员会档案》，全宗号 3，1945 年——1949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绥蒙政府档案》，全宗号 2，1946 年——1949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兴安省政府档案》，全宗号 5，1946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档案》，全宗号 243，1947 年——1949 年。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档案》，全宗号 11，1945 年——1949 年。

4、主要参考报刊目录

《绥远日报》，1932 年。
《绥远社会日报》，1936 年。
《绥远西北日报》，1935 年，1936 年。
《黄报》，1922 年 8 月——9 月。
《新民意报》，1922 年 11 月。
《民国日报》（上海），1928 年 3 月，1929 年 3 月。
《晨报》（北京），1921 年 12 月，1925 年 3 月，1927 年 1 月。
《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1947 年 3 月。
《绥蒙日报》，1949 年 5 月——9 月。
《东北日报》，1945 年 11 月——1949 年 9 月。
《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1947 年 2 月。

《东蒙新报》，1946年3月——6月。
《群众报》，1946年7月——12月。
《内蒙自治报》，1947年。
《晋察冀日报》，1945年8月——1948年6月。
《内蒙古日报》，1948年1月——1949年9月。
《新蒙古》（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
《东方杂志》第27卷，第14期。
《内蒙国民旬刊》第一、四册，1925年。
《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档案史料》，总第1——6期，1992年——1993年。
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研究室：《内蒙古青运史研究》，总第1——3期，1985年——1986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内蒙古党史资料通迅》，总第1——41期，1981年——1988年。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内蒙古党史通迅》，总第1——11期，1990年——1994年。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委办公室：《内蒙古地方志》总第1——47期，1983年——1994年。
中共兴安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兴安盟党史通迅》，总第1——6期，1983年——1984年。
中共哲里木盟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内蒙古哲里木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哲里木史志》，总第1——14期，1984年——1988年。

后记

《内蒙古革命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项目，郝维民教授是项目负责人、本书的主编，金海为副主编。本书编著者分工：郝维民除设计全书方案，拟定编写指导思想和要求，最后统稿定稿外，执笔撰写了绪论、第1章、第2章第1、2节和第3节第1目、第4节第1、2、3目。甘旭岚执笔撰写了第2章的第3节第2、3、4、5、6目和第4节第4、5目。李鸿执笔撰写了第3章。金海除了协助主编工作外，执笔撰写了第4章的第1节第2、3目、第2节第1、2、3目、第3节和第6节第1、2、4、5目。赛航执笔撰写了第4章的第1节第1、4、5目、第2节第4目、第4节、第5节和第6节第3目（著者署名以章节分工为序）。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内蒙古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关鹏云亲自主持和组织专家进行了项目鉴定验收。专家组成员有内蒙古师范大学郝志模

教授、娜琳高娃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朱风研究员、郭冠连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特布信教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戴其芳社长审阅了全书；蒙古史研究所薄音湖教授、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白拉都格其副教授对绪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内蒙古大学科技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全力支持和组织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该所的宝音朝格图、裴小燕、娜仁托雅、乌云格日勒以及出版社的和平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乌兰夫纪念馆、内蒙古博物馆等有关单位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方便。在此，我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著 者

一九九七年六月